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7

宋元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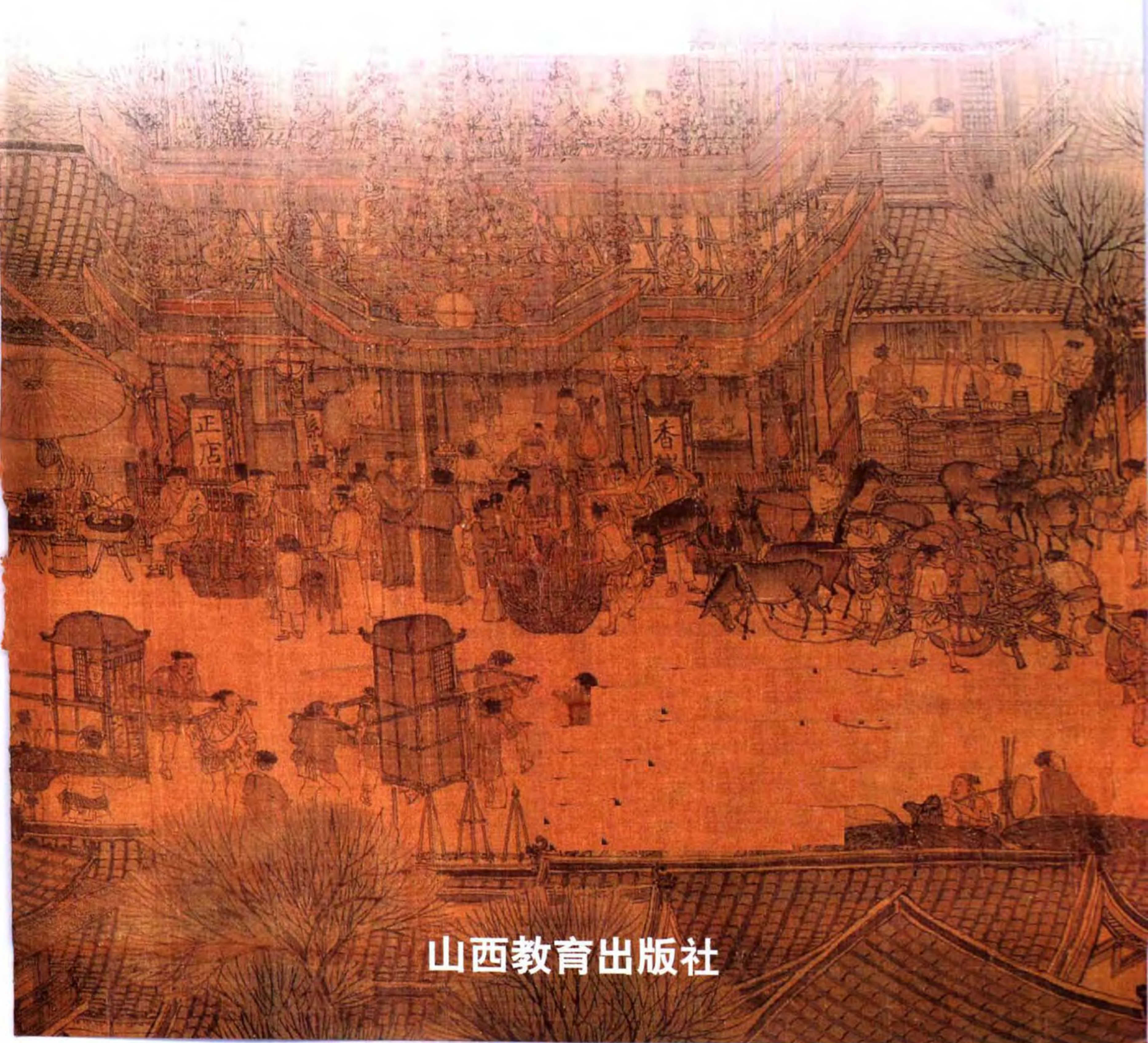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7

宋元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中国史·宋元时代 /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40-2647-7

I.文...II.中... III.①中国—历史—宋代—普及读物②中国—历史—元代—普及读物③文物—中国—宋代—图录④文物—中国—元代—图录
IV.①k209②k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4448号

《文物中国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文物中国史·宋元时代

编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版发行: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总 责 编: 王宇鸿 张金柱

责任编辑: 李少霖

助理编辑: 郭志强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张金柱

装帧设计: 孟 孟(香港)

排版制作: 陈先英(香港) 李秋云(香港)

责任印制: 林佳年(香港)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全套定价: 800.00元

《文物中国史》编辑委员会

主 任：朱凤瀚

副主任：李 季 董 琦

委 员：王冠英 信立祥 孙国璋 高世瑜 王冠倬 刘如仲

编 者：

史前时代：李 季 安家瑗 孙其刚（绘图：郑 婕）

夏商周时代：李维明

春秋战国时代：王冠英 韩 钟

秦汉时代：陈成军 王永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孙国璋 邵小萌

隋唐时代：高世瑜 胡晓建 梁 丰

宋元时代：黄燕生 陈 煜

明清时代：苏生文 王 芳 李雪梅

编 务：王永红 董 青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

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的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备，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史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练。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将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第一章 多民族政权的并立 2

- 第一节 北宋的建立 2
- 第二节 辽与西夏 8
- 第三节 战争与和平 15
- 第四节 西藏与大理 21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与党争 26

- 第一节 积贫积弱 26
- 第二节 改革与党争 35
- 第三节 官人社会 42



第三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52

- 第一节 女真的兴起和北宋的灭亡 52
- 第二节 宋室南迁 58
- 第三节 两个王朝的终结 71



第四章 社会经济 80

- 第一节 南北不同风 80
- 第二节 精耕细作 89
- 第三节 走向精致 97
- 第四节 逝去的都市 121
- 第五节 交通运输与海外贸易 139



第五章 科技文化 148

- 第一节 观天测地 148
- 第二节 三大发明 159
- 第三节 编史修志 166
- 第四节 山野新声 176



第六章 大元一统 194

- 第一节 大蒙古国 194
- 第二节 天下混一 201
- 第三节 新的疆域 208
- 第四节 走向衰亡 212



第七章 治国的努力 220

- 第一节 蒙古人的都城 220
- 第二节 经济发展 229
- 第三节 西域南海 239



第八章 艺文之光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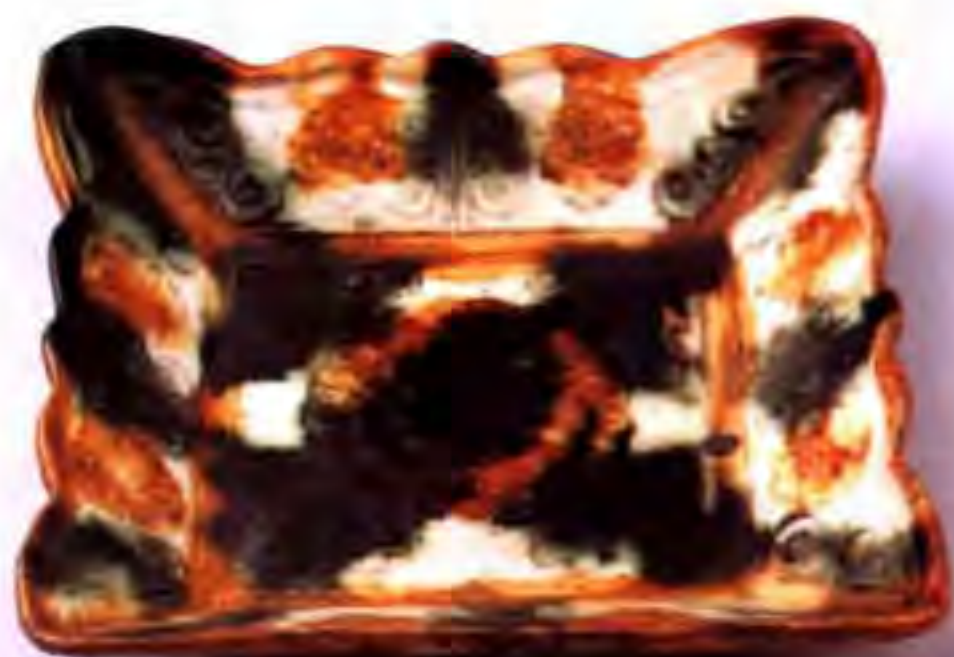
- 第一节 宗教流布 248
- 第二节 流行风尚 258
- 第三节 典章文化 266
- 第四节 中西交汇 277

- 参考书目 284
- 图片索引 286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章

多民族政权的并立

公元1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与北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有东北的辽、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辽、宋、西夏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但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第一节 北宋的建立

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了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北宋王朝逐步统一了从岭南至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为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宋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解除了一批高级将领的兵权，派京朝官出知各州县，将地方军权、财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采用分割事权的方式削弱相权，同时扩大科举入

仕之门，保证文官队伍的延续。

一、陈桥兵变

距河南开封东北约20公里处，穿过黄河古道，一片黄沙弥漫之中，能见到一座歇檐式屋顶的建筑。拾阶而入，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院中铁栅栏围起一株形态怪异的古槐树，黑褐色的枝干仿佛曾经被烈火熏烧过，弯曲的树干似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座院落就是古代驿站——陈桥驿的遗址。一千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陈桥兵变。那棵枯干的古槐，据说是兵变谋划者赵匡胤用来系战马的，因而被叫作系马槐。槐树旁边矗立的石碑上大字书写着“宋太祖黄袍加身处”几个大字。

一千多年前，在这座普通的院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据宋代史料描述，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三，一支军队在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穿过京城爱景门，向北进发，准备抵御北汉和契丹的进犯。黄昏时分，大军来到陈桥驿安营扎寨。将近黎明，四面叫喊声骤起，声震原野。醉卧之中的赵匡胤正要起身，他的弟弟赵匡义（即赵光义）和谋士赵普匆匆进门禀报，诸将领要求“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正说着，传来急促的叩门声，赵匡胤推门而出，诸将领已手执兵器环立院中，“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将领拿出一件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其他将领马上拜倒在地上，齐呼“万岁”。赵匡胤再三推辞，众将领不答应，将他强行簇拥上马，向京城方向返回。赵匡胤万般无奈，说道：“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若能听从我的命令，我就同意；如若不然，我就不能当你们的主子。”众将听了这番话，全都下马表白：“惟命是从。”赵匡胤又说道：“近世帝王初立时，进入京城都纵兵大掠，擅劫府库，你们不得如此，待大事已定，当有厚赏；否则诛杀全



陈桥驿系马槐

族。”众将皆拜。于是，大家重新上马，整军回师京城，北上抵御外敌进犯的任务似乎已不存在。赵匡胤的把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作为内应，早已打开宫门迎候。当日，百官早朝未退，诸将已簇拥着赵匡胤进入皇城宣德门。见到后周宰相范质、王溥，赵匡胤流着眼泪说道：“我受先帝厚恩，一旦至此，惭愧天地，但被六军所迫，也不知该怎样做才好。”范质等尚未答话，站在赵匡胤身后的一名大将挺剑向前，喝道：“我辈无主，今日



陈桥驿遗址

位于开封市东北，为古驿站。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在这里发动兵变，建立宋朝。

必得天子！”无论赵匡胤怎么呵斥，诸将不退，见此情形，两位后周宰相只好跪拜于地，向这位昔日同僚三呼“万岁”。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好办了，全有前朝先例。赵匡胤在宰相的引导下来到崇元殿行禅位礼。召文武百官就列，宰相扶新皇帝升殿，穿上龙袍，群臣拜贺。朝廷原主人——后周恭帝也被请了出来，封为郑王，遣送洛阳居住。

陈桥兵变的发生，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约十年前，同样的一幕就曾上演过。950年11月，后汉禁军大将郭威受命抵御辽军进犯，率兵到澶州，将士们也称天下无主，撕下一面黄旗披到郭威身上，郭威被众将士的赤诚所打动，“被迫”当上了皇帝，接着便不记得还有北上御敌的任务，直赴京城，逼后汉幼主及寡太后“禅让”，完成了由后汉至后周的演变。赵匡胤不仅亲眼目睹了那一次黄袍加身，而且作为郭威的亲信，他也是那

次兵变的参与者之一。稍稍不同的是，郭威以“周”代“汉”，以示崇尚三代之美德；大约考虑到周王朝以前的朝代均以荒暴天子而终，赵匡胤果断地摒弃了这种一味好古的习气，因起兵之前他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命名新的王朝为“宋”。除此之外，几乎每一细节都在效法他的前朝主子。尤其相似的是，郭威在正月初五（951年2月13日）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广顺，成为后周的第一代天子，去世后庙号周太祖。赵匡胤也是在正月初五（960年2月4日）改国号为宋，改元为建隆，成为宋朝的第一代天子，驾崩后庙号宋太祖。

二、杯酒释兵权

同样是黄袍加身，同样由军事统帅改当皇帝，赵匡胤可比郭威要幸运许多，也英明许多。郭威看到了藩镇割据和契丹南侵是朝廷最大的内忧和外患，先后贬杀了两名掌握军权的重臣，又平定了镇将作乱。但他急于求成，过于信任自己提拔上来的人，尤其致命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十分不佳。赵匡胤确实对后周太祖心存感激之心，并受其影响，顺利地穿上了天子的黄龙御袍。但他看出了前朝皇帝在防御内忧外患方面策略的偏差，看到了黄袍加身有可能重演的危险，意识到要使国家稳定，不再陷入频繁地改朝易代的局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他询问赵普：“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八易姓，争战不息，生民涂炭，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何办法能够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呢？”赵普答道：“原因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要改变现状，没有别的办法，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然安定。”赵匡胤未等他说完，便道：“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明白该怎样去做了。”

宋太祖像



建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军权的亲信。酒酣之际，太祖屏退左右，对他们说道：“朕若没有诸位鼎力相助，哪会有今天的位子。但做皇帝并不比你们当将军的舒心，我几乎没一天能睡个好觉。”诸将领询问是何缘故，太祖道：“这还不清楚？这皇位谁不想坐呀！”石守信等人闻言，相顾失色，连忙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摇头道：“并非如此。你们虽无异心，可你们的属下能没异心吗？一旦把皇袍披在你们身上，想不干也不成了。”众将听了皇上的这番话，才明白他是担心他们这些功臣中间再出现谋反篡位者。篡位这个罪名谁也不敢承当，于是他们一齐流着泪请求皇帝指明一条生路。太祖早已成竹在胸，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想要富贵，不过是多积蓄钱财，及时行乐。你们何不解去兵权，出守大藩，多买些田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置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亲家，这样，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平安，不是很好吗？”众将领全都明白了，要想免除皇帝对他们的猜忌，只有交出手中的兵权。次日，将领们纷纷称病告老。宋太祖一一抚慰，赏赐甚厚，同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仍兼侍卫都指挥使，但已不掌握兵权。此前，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已被免职，同样出为节度使。

当然，要使国家不再重蹈军阀擅权、藩镇割据的覆辙，仅靠一两次御宴的把戏是不够的，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按照赵普设计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



赵普像

收其精兵”的三部曲，宋太祖首先对军政机构进行了全面改造，殿前司不再设都点检和副都点检，而以属官都指挥使充任；侍卫亲军司不再设置统领马、步军的都指挥使，马军与步军直属朝廷，加上殿前司，形成禁军的三衙，均由一般将领负责，职权也被限制为对所辖部队的管理，发兵权属于基本由文臣负责的枢密院，实际上禁军出征往往临时任命将领，有时以文臣为统帅。以文制武，三衙相互制约，兵权由此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接着，宋太祖着手削弱藩镇实权。以往节度使出守大藩，把所辖区域当成了自己的地盘，设税养兵，将自己养得兵强马壮，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听朝廷号令，这是造成藩镇割据乃至入城逼宫的根源所在。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要求地方选送精兵至京师，补充禁军，当时还往各地派送了身材健壮的“兵样”；挑剩下的士兵留在地方充作厢兵。同年，宋太祖又下了两道诏书，要求各地将每年税收所得的钱帛，除必要开支外，一律解送京师，不得截留。在此前后，宋太祖陆续派朝官出知府、州、县，而这些京师来的

《宋太祖蹴鞠图》

元 钱选绘

上海博物馆藏

蹴鞠起源于战国时期，唐宋时极其兴盛。既可两人对打（称为“打二”），也可多人同场比赛，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该图表现了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赵光义和大臣赵普、石守信等蹴鞠娱乐的情景。



文官只听朝廷号令，不受任何人节制。由此，地方的军、政、财权均被朝廷收回，节度使徒具虚名。到后来，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担任节度使的官员基本上都不出京城，此官职成了一种虚衔。

三、统一南北

宋朝建立之初，天下仍陷于唐末以来的割据局面。北有占据北方的契丹和割据太原的北汉，南有南唐、后蜀、吴越、南汉、湖南、荆南等割据政权以及占据泉州、漳州的割据势力。赵匡胤接受了赵普等人提出的“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在防御北方劲敌的同时，陆续出兵，逐一消灭盘踞南方的割据势力。

乾德元年（963），宋朝出兵讨平实力最弱的湖南和荆南，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次年十一月，宋军分兵两路，自北、东两个

方向进攻后蜀，蜀军连战皆败，至乾德三年（965）正月，宋军占领剑州。退守成都的后蜀主孟昶见大势已去，派人献上了降表。后蜀四十五州、一百九十八县归入宋朝版图。开宝三年（970）九月，宋太祖派大将潘美等率兵讨伐南汉，连克贺州（今广西贺州）、昭州（今广西平陆）、桂州（今广西桂林）、韶州（今广东韶关）、英州（今广东英德）、雄州（今广东南雄）。到开宝四年（971）二月，宋军兵临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只得奉表投降。宋朝又得六十州、二百一十四县。宋朝平定南汉后，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的南唐后主李煜担心宋军乘胜攻打南唐，连忙改国号为江南，又增加对宋的进贡，表示臣服。宋朝则加紧督造船只，做好渡江的准备。开宝七年（974），宋朝要李煜进京朝见，李煜担心被扣留，称病不行。于是宋朝以此为借口，以曹彬、潘美为统帅，率兵向南唐进发。当



《宝篋印经》

北宋

1924年杭州雷峰塔出土

版框高5.7厘米，长205.8厘米

首铸“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共三行文字，次铸佛说法图，又刻陀罗尼经全文。乙亥为宋太祖开宝八年，即975年。此为吴越王钱俶归顺北宋后所刻。

年十一月，宋军在采石用船搭建浮桥过江，先后击溃南唐水、陆两军，直逼金陵城下。李煜派使节到东京（即开封）见宋太祖，说江南事宋如父，并未有罪。太祖说：“江南无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次年十二月，宋军进入金陵城，南唐灭亡。南唐后主李煜降宋后，被安置在东京居住，他写下了不少抒发亡国之痛、思乡之情的词章，引起宋朝统治者不满，三年后被毒死。经过十年的征战，到宋太祖去世时，南方的割据政权，只剩下完全臣服于宋的吴越和泉、漳两州。

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被宋任命为平海军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的割据将领陈洪进入京，献出泉、漳二州，并留居京城，宋朝也予以厚待，任命他为使相。建都杭州的吴越，在宋攻南唐时曾出兵协助攻取常州和镇江。开宝九年（976）和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俶先后两次入朝觐见，并在第二次入见宋太宗时，被留在东京居住。陈洪进向宋献出泉、漳之后，钱俶主动请求罢去吴越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希望回吴越居

住，遭到宋太宗拒绝，钱俶只得效法“泉漳纳土”的例子，将所辖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献给了宋。至此，南方的统一基本完成。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曾亲征北汉，围攻太原数月之久，终因担心辽兵来援，加之雨水不断，疾病流行，无功而返。南方完全平定之后，宋朝得以全力对付宿敌北汉和契丹。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亲征北汉，派潘美等将领分兵四路，并在三月击败辽援军，四月各路军马围攻太原，北汉帝刘继元出城投降。至此，除在后晋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幽云等州，北宋基本实现了南北统一。

宋初完成的南北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近百年的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局面，为社会生活的长期稳定和生产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初沿袭唐代行政区划，将全国各府、州划分为十三道，设转运使，负责财赋和监察。宋太宗平定北汉之后，在至道三年（997）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即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

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分西川路为益州路和利州路（益州路在宋仁宗时改成都府路），分峡路为梓州路和夔州路，这样川蜀地区成了四路，习惯称为四川；又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全国共分十八路。宋神宗熙宁五年至熙宁七年（1072—1074），先后分京西路为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淮南路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陕西路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河北路为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京东路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全国增至二十三路。北宋末年，一度复置京畿路和燕山府路，全国最多时有二十五路。

第二节 辽与西夏

916年建立的辽（契丹国）曾多次入侵中原，并占据了幽云地区。1038年建立的西夏也对宋朝西北边疆构成威胁。辽和西夏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巩固统治，他们都模仿中原政制设立管治机构，其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一、契丹的兴起与建国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原是鲜卑族的一支，在辽西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唐贞观年间归附唐朝，唐设松漠都护府，由契丹部族首领任都督。唐末藩镇割据，契丹部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与割据军阀朱全忠等相勾结，借机扩充势力。907年，在朱全忠建立后梁、取代唐朝的同时，耶律阿保机即位为契丹可汗，九年后，耶律阿保机又废止了由契丹八个部落推举可汗的制度，正式称帝，建立契丹国，建元神册，立长子为太子。契丹神册三年（918）修建了皇都（938年更名为上京临潢府，遗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改国号大契丹国，到道宗咸雍二年（1066），又恢复大辽国号。

辽太祖、太宗时期，辽国依赖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陆续占据了幽云诸州和渤海国。辽全盛时，设立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契丹对不同的统治区域实行不同的制度，在契丹旧

嵩德宫铜铫

1950年辽宁义县清河门辽墓出土

全长27.2厘米，高8.4厘米，重1公斤

这是一件由朝廷铸造的标准量器，筒身内有档隔，将铜铫分为上下两个皿状容器。上部容器容量为1047毫升，下部容量为500毫升。铜铫外壁刻有铭文：“嵩德宫造重一斤□□□三日”。



地和西北游牧地区实行部族统治，在原属中原王朝的幽云十六州和渤海地区，沿袭了原有的官制和法律，实行汉族封建制统治。契丹皇帝面东升帐，中枢官员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负责汉人事务。太宗至世宗时，又分别建立南北两个枢密院，南枢密院掌管汉人兵马，北枢密院负责契丹军事。契丹仿效汉族建立了以世袭皇权为特征的国家制度，同时还仿效汉字和回鹘字，设计了契丹大、小两种文字，推行到全国。

二、辽对中原北方地区的侵占

早在耶律阿保机时期，契丹就不断向南侵扰。神册二年（917），耶律阿保机亲率军队围攻幽州（今北京）长达半年之久。此后，先后在神册六年（921）、天赞二年（923）、天赞三年三次进攻幽州，但在汉军的顽强抵御下，均被迫退军。耶律阿保机曾对后唐使节说：“如若以黄河作为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分界，我就不再向南侵入。”又说要与中原天子“面为盟约”，将幽州划归契丹。耶律阿保机死后，继承皇位的次子耶律德光利用一切机会，交结和招纳对中原王朝怀有异心的军阀，试图侵蚀后唐北部疆界。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因害怕削藩，起兵反唐，并派使臣到契丹求援，表示如契丹帮助灭唐，愿向契丹称儿称臣，并割让幽、云等十六州。耶律德光大喜，亲率大军南下，当年九月将后唐军队主力包围于太原城西南晋安寨，三个月后，唐军副帅杨光远率五万将士投降。石敬瑭于闰十一月进入洛阳，后唐末帝自焚身亡。此前一个月，石敬瑭在太原称帝，被契丹册立为大晋皇帝，成为后晋高祖。契丹也如愿所偿，得到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

儒、武、云、应、寰、朔、蔚等十六州（今北京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的大片疆土。契丹占据幽云后，又攻灭渤海政权，吞并渤海地区（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再次扩展疆域。幽云和渤海地区居民以农业为主，这



三彩印牡丹纹方碟

辽

内蒙古宁城辽墓出土
边长12.5厘米，宽2.5厘米
方碟壁上印花卉纹饰。碟内
饰圆形菊花图案，四角为花
叶。通体施黄、绿、褐三色
釉，釉色莹润明艳，有细碎
开片。碟的整体设计美观大
方，釉色协调，是辽三彩器
中的珍品。



绿釉凤首瓶

辽

1950年辽宁义县清和门萧慎
微祖墓群2号墓出土
高52厘米，口径11.6厘米，
腹径17.5厘米
此瓶造型像一只伸颈欲翼的
凤鸟，故名凤首瓶。这种器
形流行于西域，唐代也有类
似制品，称作“胡瓶”。辽代
陶瓷器中，有很多凤首瓶，
可能是受到突厥、回鹘等西
域民族的影响。

黄釉长颈瓶

辽

高 35.1 厘米，口径 10 厘米，
底径 7.5 厘米

此瓶胎质粗硬，釉色洁净，
光泽甚强，黄釉仅至瓶身中
部，外观似汉族地区的玉壶
春瓶。



大康通宝

辽大康年间（1075—1084）
铸造

辽境内产铜，建国后即自铸
铜钱。天赞元年（922 年）铸
造“天赞通宝”，以后各帝王
均铸年号钱，如“清宁元
宝”、“统和元宝”等，共有
18 种之多。辽铜钱形制同汉
族地区的铜钱一样，钱文全
部用汉字，但制作水平较
低。

使得契丹统治区域的生产方式存在多种形
式。

宋建立后，试图夺回幽云十六州，与辽
多次发生战争。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
秋，辽兵再次南下侵宋，受到宋朝军队的有
力抗击，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宋每年向辽输



送银绢，辽则不再南侵中原，史称“澶渊之
盟”。此后，宋辽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共
处。

西夏在公元 11 世纪崛起，与辽西北部疆
域接壤。西夏皇帝元昊曾采取和亲手段，维
系与辽的友好关系，后因元昊引诱辽山南党
项归夏，关系一度破裂，辽兴宗于重熙十三
年（1044）举兵讨伐西夏，却被西夏军队设
伏击败，西夏取胜之后主动请和，辽兴宗不
甘失败，又先后多次伐夏，一直攻到西夏国
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以称臣纳贡的
方式，与辽达成和约。

三、辽的发展和衰落

辽太宗去世后，辽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皇
帝继承权展开激烈争斗。后来，主张改革的
耶律阮击败敌手，继承皇位，是为辽世宗。辽
世宗及其后任者辽穆宗在位期间，内部争斗
仍在持续，他们先后被政变者杀死。保宁元
年（969）辽景宗即位，他加强对内部叛乱者
的镇压，并对宋太宗进攻辽南京（今北京）进
行了有效抵御。乾亨四年（982），辽景宗病
死，十二岁的辽圣宗继承皇位，承天萧太后
摄政。萧太后是一位有谋略的女政治家，她
任命汉人韩德让为南北枢密院使，总领契
丹、汉人事两院政务，开始实施一系列汉化
政策，如改革地方官制，将各部的长官（令
稳）一律改为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又颁布
新的法律，规定契丹人与汉人斗殴，同等治
罪，统和六年（988），模仿汉族的科举取士
制度，在汉人居住地区设立进士科，招考汉
族文士。为适应农业区域的生活，萧太后下
诏将部分胁从为奴隶的人解放，让他们从事
农业生产，成为向朝廷贡赋纳税的民户。萧
太后还亲自率兵抵御宋朝的北伐，携辽圣宗
向南侵宋，迫宋真宗订立城下之盟；又接纳

与宋对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的降附，以此巩固西部疆域。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推行改革措施。过去，辽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俗，皇帝行帐随季节而迁徙，地点并不固定。辽圣宗时，这种称为“四时捺钵”的游猎行帐的转移有了固定的地点，并形成完整的制度。辽圣宗重视汉族文化，他喜读《贞观政要》，能吟诗作词。他将科举录取人数扩大到每科几十人，进一步扩大了统治基础。萧太后、辽圣宗统治的四十八年（983—1030）是辽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获得新的发展。辽圣宗在统和二十八年（1010）亲征高丽，虽然最终迫使高丽臣服纳贡，但历时十年之久的战争，也极大地消耗了国力。

辽圣宗去世后，辽兴宗即位，他在位二十五年（1031—1055），继续实行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巩固边疆的政策。此时，西夏在西北兴起，并击败辽的进攻，但尚未构成对辽本土的威胁。辽兴宗死后，辽道宗即位，辽国重又陷入激烈的皇权争夺中，内部叛乱和民变不断发生。此时，北方诸族相继崛起。西北的鞑靼部族首领磨古斯在大安八年（1092）起兵反辽，辽道宗出兵征讨，虽然取胜，但国力进一步削弱。东北的女真人也建立部落联盟，开始对辽构成新的威胁。

四、党项族在西北的割据

盘踞西北地区的党项人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居住在西北高原，以游牧为生。唐代末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率兵助唐剿灭黄巢起义军，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时辖银（今陕西米脂西北）、夏（今陕西横山西北）、绥（今陕西绥德）、静（今宁夏灵武）、宥（今陕西靖边）五州。五代后周时，他又被加封为平西王。



北宋建立之初，党项人继续臣服中原王朝。太宗时，因宋朝插手其部族争斗，一度中断了互市贸易，边境冲突骤起。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击败宋军，夺取灵州（今宁夏灵武西），改称西平府。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在对吐蕃作战时中箭身亡，其子德明

道宗哀册

辽

1930年内蒙古巴林左右旗辽庆陵永福陵出土



西夏文刻石残片

1972年宁夏银川西夏皇陵出土
高21厘米，宽15.5厘米
西夏皇陵每座陵墓前原均有石碑，但都已被砸毁，现仅存残片。1972年至1977年，考古人员曾在此发掘了一座皇帝陵和四座陪葬墓，清理了皇帝陵碑亭两座，共出土残碑石3272块。碑石皆用西夏文和汉文刻成，此残片的文字为西夏文。

绿釉兽面瓦当残片

西夏

1972年宁夏银川西夏皇陵出土

残长35.5厘米，厚1.4厘米。这件筒瓦的瓦当饰以兽面纹，外表施绿色釉，晶莹光亮。瓦及瓦当施绿色釉起于北魏，直到唐代数量还很少。西夏王陵的瓦及瓦当上施绿釉的比例已大幅增多，但仍主要用于宫殿及陵墓建筑。



成为新的统治者。德明奉行有条件地臣服于宋的策略，接受宋朝所赐赵姓。宋封其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党项还获得宋朝赏赐的钱帛茶药，又通过互市贸易，获得中原的大量产品。在德明统治的二十六年间，党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了新的增长。

宋天圣九年（1031），德明去世，次年其子元昊继位。元昊对父亲屈从宋朝十分不满。当年德明嘱咐元昊：“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反驳说：“我族以皮毛为衣，以畜牧为生，志向是做英雄、当霸王，锦绮算什么！”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为大夏，定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城。自宋康定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至皇祐元年（西夏天祐垂圣元年，辽重熙十九年，1050），西夏先后与宋、辽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边境战争，三方互有胜负。西夏统治者意识到以其实力难以与宋、辽进行长期对抗，宋、辽统治者 also 感到对夏战争的消耗过大，于是在宋庆历四年（1044）和

辽重熙二十二年（1053），宋、辽分别与西夏订立和约，此后三朝互开边境贸易，基本维持友好局面。辽与宋互称北朝、南朝，宋与西夏互称东朝、西朝，三朝并立的形势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

五、西夏的发展和衰亡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元昊被废太子宁令哥等刺杀，国相没藏讹庞又杀宁令哥及其母野藏后，立刚满周岁的谅祚为帝，没藏氏为太后，自己独揽大权。谅祚成年后，诛杀没藏讹庞全家，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谅祚掌权后，改蕃礼为汉礼，增设汉官和蕃官职官，吸纳汉人参与国政，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并不断扩展疆域，招纳吐蕃部落，侵扰北宋边境。谅祚死后，年仅八岁的秉常即位，其母梁氏摄政，梁氏弟梁乙埋为国相。为获得党项贵族的支持，梁氏掌朝第二年就废除汉礼，改用蕃礼，并从赐礼盛国元年（1069）开始发兵攻宋。宋朝以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经略西北防务，



褐釉剔刻花瓷扁壶

西夏

1985年宁夏海原征集

高33.3厘米，口径9厘米，腹径32厘米

此壶小口，卷沿，口沿一侧有锥刺纹。腹部扁圆，正面为褐釉剔刻的两组牡丹花纹，背面有圆形圈足。

击退了西夏的入侵。连年征战，使西夏内部矛盾加剧。大安六年（1080），年满二十岁的秉常欲恢复汉礼，与宋和好，结果被梁氏后族囚禁。宋神宗闻知西夏政变，发兵五路围攻西夏，为西夏击败。大安九年（1083），梁太后和梁乙埋等为缓和内部矛盾，恢复了秉常的帝位。两年后，梁太后和梁乙埋相继病死，但梁乙埋之子梁乙逋继任为国相。不久，秉常也故去，其年仅三岁的儿子乾顺继承帝位，乾顺之母梁氏（梁乙埋之女）升为太后，西夏王朝仍是梁氏专权。作为“一门二后”的第二代，梁氏为长期把持朝政，对皇族和前朝老臣进行残酷迫害，同时穷兵黩武，联络吐蕃阿里骨部和辽，向宋西北边境发起连年

不断的进攻。在屡遭兵败后，梁乙逋因谋反被首领仁多保忠杀死；梁太后因对辽上表出言不恭，被辽使臣以毒酒毒死。

永安二年（1099）正月，乾顺亲政。为改变长年征战、民不聊生的局面，乾顺采取息兵谋和的方针。他在当年二月，出兵助辽平定拔思母部叛乱，请辽派使臣到宋说和，宋哲宗提出夏国必须交出鼓动梁氏向外扩张、侵扰宋朝边境的罪魁祸首保没、陵结讹遇二人，方准和解。乾顺很快就将这两个梁氏专权时的将领杀死，又向宋递上谢罪表，表示今后“恒遵圣化”，“永绝争端”。与宋达成和议后，乾顺又向辽朝求婚，并在贞观五年（1105）迎娶辽成安公主，以依附辽朝的国策



乾祐元寶

西夏
铜质，乾祐是夏仁宗仁孝的年号（1170—1193）。西夏铸造货币20多种，有铜钱，也有铁钱；钱面文字有西夏文，也有汉文，均为年号钱。西夏钱币制作精美，文字整齐，说明西夏王朝经济、文化已达到很高水平。

遏制宋徽宗时开始的拓展疆土的威胁。乾顺倾慕汉族文化，他在亲政的第三年改元贞观，反映了他对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向往。他在完成息兵靖边后，即着手整治内政。一方面，实行汉人的分封制，恢复梁氏专权时被削弱的皇族势力；另一方面，继续推行凉祚时的汉化政策，于蕃学之外建国学，设置教授，选皇亲贵族子弟三百人入国学学习汉族文化。由于乾顺的倡导，西夏“养贤重学，兵政日弛”，风气为之一变。

1125年，金灭辽。此前，西夏曾一度出兵援辽，但看到辽大势已去，乾顺及时改变立场，于元德六年（1124）向金称臣，并在金攻宋之际，于元德八年（1126）出兵夺取宋西北许多州县。正德元年（1127），夏、金划定疆界，东自黄河西岸，南至米脂、萧关、会州，西夏疆域达到建国以来的极盛。

大德五年（1139），乾顺病逝，子仁孝继承帝位。仁孝在位五十五年，这期间社会较为稳定。仁孝的母亲是汉人，他对汉族文化也很看重。人庆元年（1144），他下令在州县设学校，在宫中设小学，第二年又设立太学。

人庆四年实行科举考试，使文人广泛参与政事。他还让人参照汉人书籍，修订乐书、律法。天盛十四年（1162），中书省、枢密院移至宫廷内门外，使西夏官制基本采取汉制。仁孝注重节俭，禁止奢侈，能够听取臣下的直言。仁孝在位期间，西夏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

乾祐二十四年（1193），仁孝卒，子纯祐即位。纯祐基本奉行仁孝时的对外依附金宋、对内休养生息的政策。天庆十三年（1206），其侄安全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安全在位期间，崛起于北方的蒙古先后三次入侵。应天四年（1209），成吉思汗率兵围攻夏都中兴府，引黄河水灌城，安全于城上与成吉思汗达成和约，以出嫁公主和称臣为条件，请蒙古撤军。1211年，齐王遵顼又发动政变，废黜安全。遵顼改变了夏、金盟好的既定国策，依附蒙古，向金开战，金则发起反击，连年战争消耗了夏、金的国力。光定十一年（1221），蒙古木华黎部渡过黄河，西夏无力阻挡，遵顼令五万西夏兵归附木华黎前去攻金，两年后又派十万军队随木华黎围攻金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但因半途撤兵，被蒙古军队围攻，蒙古遣使逼遵顼退位。

遵顼子德旺即位后，派人到金议和。1226年春，成吉思汗带领十万蒙古大军攻夏，连破黑水、沙州、肃州、甘州等城。同年夏，遵顼、德旺相继去世，德旺侄睨被拥立为帝。同年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灵州，西夏将领嵬名令公率兵往援，经过激烈战斗，西夏兵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灵州被占。1227年，蒙古军围攻夏都中兴府长达半年，至六月，城中粮尽，末帝睨被迫出降，被蒙古军杀死，西夏灭亡。

第三节 战争与和平

北宋王朝为夺取幽云十六州，先后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辽也曾数次南下袭扰，都遭到宋朝的顽强抵御。西夏与辽、宋也发生多次边境战争，后来都订立了和约。宋朝采取每年缴纳银绢的方式，换取边境和平。在和平的岁月里，宋、辽、西夏维持着正常的交往和频繁的边境贸易。

一、兵败高粱河

在北宋建立前，中原军民一直以石敬瑭甘当儿皇帝和割让幽云十六州为奇耻大辱。石敬瑭死后，后晋出帝石重贵在开运三年（946）派兵北伐，试图收复幽州等地区，结果被契丹击败，契丹军队直攻入后晋都城开封，石重贵本人也被契丹降为负义侯，押解至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居住。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六年（959）也曾率军北伐，收复了瀛、莫等州，可惜当年六月，柴荣病逝，中原王朝只占据了瓦桥关、益津关以南地区。

宋太祖是涿州人，他对故乡被划归契丹始终耿耿于怀。尽管他派兵扫平了南方各割据政权，使国家基本统一，但仍不同意群臣拟议的加“一统太平”的尊号。他告诫臣下说：“幽燕未平，何谓一统！”他还将得自荆湖、后蜀的金帛另收一库，称为封桩库，并对近臣说：“待库中金帛积至四五百万，就可派人去契丹赎回幽燕，若是不肯，我以二十匹绢买一契丹人头，其精兵不过十万，二百万匹绢就够用了。”宋太祖和他的继任者宋太宗都把夺回被契丹侵占的幽云十六州作为实现统一的重要步骤。

太平兴国四年（979）北宋攻灭了北汉，宋太宗随即把目标转向辽南京（即幽州，今



宋太宗像

北京）。这年六月，他亲率大军，日夜兼程，直逼幽州城下。夏历七月六日，宋、辽军队在幽州城北高粱河展开激战。由于日夜行军，未经休整，宋军的战斗力下降，而数万契丹援军则分成两路，左右夹击。战至夜晚，远处的契丹士兵每人手举两个火把，以壮声势，宋军大恐，自相践踏，溃不成军，宋太宗也受了箭伤。次日拂晓，宋太宗乘驴车仓皇南逃，失去指挥的将士丢下旌旗、兵器、铠甲，纷纷奔逃。一夜之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契丹人不仅获得了此次战役的全胜，而且赢得了此后百余年间宋辽战略关系的主动权。

宋军北伐失败后，辽军在三年内先后三次南侵攻宋，但由于驻守北疆的宋军将士的顽强抵抗，均无功而返。雍熙三年（986），宋太宗经过精心策划，分兵三路，再次北伐攻辽。由潘美、杨业率领的西路军，北出雁门关，很快攻占了寰、朔、云、应诸州；由田重进率领的中路军攻占了灵丘、蔚州；由曹

“神卫左第四军第二指挥第五都记”铜印

981年铸

长5.5厘米，宽5.3厘米，高4.2厘米

此印背刻“太平兴国六年八月”。“神卫”是宋禁军主力部队之一，属侍卫司步军，与“捧日”、“天武”，“龙卫”三支部队并为上四军，充作皇帝卫队。“都”是禁军基层编制，百人为都，五都为指挥，五指挥为军，十军为厢，厢分左厢、右厢。此印即为“神卫”左厢所辖第四军第二指挥第五都的印信。



彬、崔彦进率领的东路军攻到了河北的固安、涿州。辽朝得到消息，刚刚即位的辽圣宗和摄政者萧太后一面命讨伐女真的军队急速返回，一面亲自领兵直赴前线。由于宋军三路并进，互不统属，加之粮草供应不济，先是东路军在岐沟关与辽援军遭遇，被打得大败；继而西路军统帅潘美与副帅杨业失和，未能按约定设伏，致使杨业孤军奋战，在陈家谷被辽军围歼，杨业重伤被俘，后绝食而死；中路军也只得退守边关险要，力保疆土

寇准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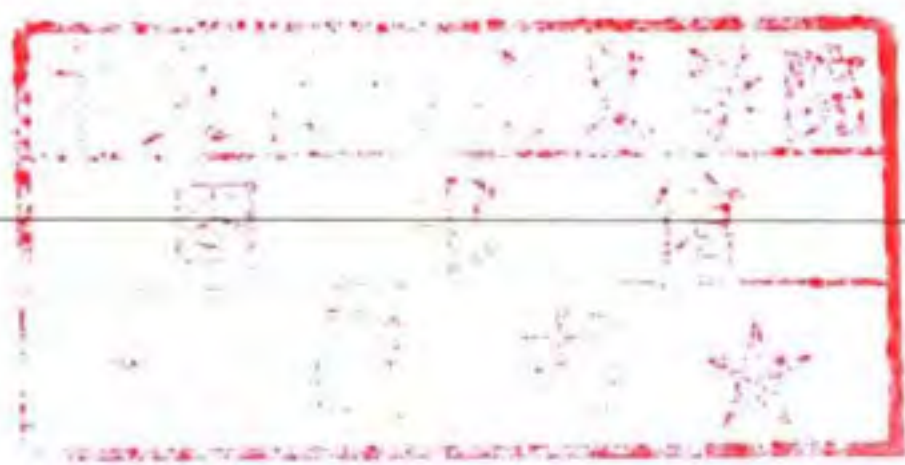
不失。

两次伐辽失败后，宋朝君臣都伤了锐气，不再奢谈收复幽云十六州，只想抵御住辽兵的进犯就算万事大吉。他们设想最好是双方互不侵犯，永结盟好。这一如意算盘，终于在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时代实现了。

二、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秋，契丹以收复关南之地为名，大举侵宋。辽圣宗和承天萧太后率十万大军亲征，长驱直入，其先头部队很快就包围了河北重镇定州。屯驻唐河的宋北面都部署王超急报朝廷，至十月六日，奏报抵达京师。看到辽军避开宋军防御线、直扑中原的形势，宋真宗和一些朝臣惊恐万分，参知政事王钦若请宋真宗“南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副使陈尧叟请真宗“西幸”成都，意思均是要皇上带着朝臣离开有可能成为战场的京师，避至安全地区。只有宰相寇准坚决反对离开京城，他对宋真宗说：“谁为陛下谋划此策？其罪可斩。今天子神武，将帅和谐，若车驾亲征，敌人自当退去；不然，或出奇兵扰敌，或固守城池，以逸待劳，怎么能抛弃社稷，躲到南方去呢？”将领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他说：“陛下若离开京城一步，城中将别有主人了。士兵、将士都是北方人，家在京城，谁肯为之效力？陛下能走到金陵吗？”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被迫同意亲征澶州（今河南濮阳）。

澶州位于开封东北，位居南北交通要道，奔涌的黄河穿城而过，将州城一分为二，北城面对通往边境的要津，南城直抵京师的路口。若被攻陷，辽军就可安然渡河，直逼京师。五年前，在另一次辽军侵扰时，宋真宗曾亲征到此，并且安然无恙地返回京城。



他期待着上一回经历的重演，同时又担心这次辽军大规模入侵难以抵挡，所以在同意了亲征澶州之后，仍呆在京城不动。从十月七日接到北面都部署的急报，到十一月二十日启程，中间还隔着一个闰十一月，他居然耗了两个多月。这期间，他先是下手诏给在辽军任职的原宋将王继忠，要他“密达朕意于北朝，共议偃革事宜”，接着，又派遣崇仪副使曹利用急速北上，前往辽军营议和。在一切准备妥当后，他才在众臣和将士的簇拥下向北开进，走了七天才抵达澶州南城，又不肯上黄河浮桥到北城。寇准上前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高琼也在一旁说道：“陛下若不到北城，百姓会像死了亲爹娘那样难过。”高琼挥鞭指挥卫兵，强把真宗架过了黄河浮桥。宋真宗亲临澶州北城前线，宋军士气大振。

在宋真宗到达澶州前三天，辽军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澶州，并出动轻骑向州城西北角突袭，被李继隆指挥的宋军击败。辽军先头部队统帅萧挾览也被宋军所发劲弩射中头部，不治身亡。辽军进攻的势头被遏止。看到前方遭到宋朝军队坚固的抵抗，后方把守边关的宋军实力毫发未损，辽圣宗和承天萧太后也担心被抄了后路，遂准备退兵，于是同意与宋谋和。

从辽营返回至澶州行营的宋使臣曹利用带来了契丹人退兵的条件，正合宋真宗的心愿。于是在这年十二月七日，一道以汉、契丹两种文字写成的盟誓正式颁布了。盟誓规定宋朝每年给辽二十万匹绢、十万两银的“助军旅之费”，换回辽军不再向南侵扰的承诺。由于澶州郡名澶渊，所以这一盟誓被史家称为“澶渊之盟”。盟誓的签订，基本结束了辽宋敌对状态，宋北部边境的和平局面持续了约一百二十年。



定州料敌塔

宋

在河北定县东南，又名开元寺塔。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宋仁宗至和四年（1055）竣工。“盖筑以望契丹者，故又名料敌塔。”塔高84米。十一级八角形楼阁式。最上两层东、西、南、北四面开真门，其余四面设浮雕假门。可作为了望之用。

镶铜口白瓷盘

辽

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出土。高4.9厘米，口径22.1厘米，底径9.1厘米。

此盘盘口呈莲瓣形，镶有铜扣，圈足也镶有铜扣。盘身通施白色釉，有冰裂纹。瓷盘造型和釉色略同于宋代定窑的白瓷盘。定窑白瓷在匣钵中往往覆烧，故镶有铜扣，以遮盖盘口的毛刺。这种莲瓣形的盘口在宋瓷中已不多见。



三、宋夏之战

就在宋辽达成“澶渊之盟”的那一年，盘踞西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在对吐蕃作战时中箭身亡，其子德明成为新的统治者。宋朝廷也向德明提出议和条件，次年正式达成和约。宋朝廷封德明为西平王，袭定难军节度使，每年赐金、帛、缗钱各四万，茶二万斤。此后，双方又在边境设榷场，互市贸易重新开始。宋天圣九年（1031），德明去世，其子元昊继承父位。他对德明臣服于宋很是不满。为了表明自己不再臣属于任何“天子”，他首先将姓名改了，称嵬名氏，名曩霄；接着放弃了宋朝赐予的封号，自称“兀卒”，意为“青天子”。元昊又下秃发令，以使本地风俗与祖先羌人一致。1033年，元昊升兴州为

兴庆府，扩建宫城殿宇，同时制定了“本朝”的官制服饰。1034年（宋仁宗景佑元年），元昊建立了自己的年号，并开始试探性地进攻宋西北要镇环州（今宁夏银川东南）和庆州（今甘肃庆阳）。这时期，元昊的主要进攻目标还是西部的吐蕃、回纥，先后夺得肃（今甘肃疏勒河东）、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甘肃敦煌）等州，基本截断了宋与吐蕃的交通。至1038年，元昊完成了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其拓疆计划转向东南，于是便与宋朝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边境争夺战。

宋宝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集结大军，一举攻下宋西北要镇金明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宋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兵前往救援，行至三川口（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汇合处，今陕西安塞县东），鄜延路都监黄德和等人也领军赶到，刘平合步骑一万多人，结阵东行，不久便与西夏军队遭遇。当时平地积雪有数寸厚，双方都结偃月阵，夏军两次涉水进攻，都被宋军击退。激战中，刘平左耳、右颈都中了流矢，依然神情自若，指挥战斗。黄昏时分，西夏士兵再次掩杀过来，宋军坚持不住，略略有些后退，负责殿后的黄德和看到部队向后撤，马上带着自己的部下向西南方向奔去，结果造成全线崩溃。次日清晨，夏军四面合击，疲惫的宋军已无还手之力，大将刘平、石元孙均被俘虏。

三川口失利震惊了宋朝廷。二月，仁宗宣布改元，将当年（宝元三年）改为康定元年。七月，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兼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分知泾原和延州，协助夏竦主持西北防务。但不久韩、范二人在防务策略上发生分歧，韩琦主张集中所有兵力向西夏发起进攻，范仲淹则主张固守。正当朝廷为攻守之

腰牌

西夏

通高6.8厘米

腰牌是通过关卡的证件，为铜质，上有持有者的姓名，可系挂在腰带上，通过关防时守卫者一看便知为使者。党项族是以游牧和狩猎为主的骑马民族，又不断同宋、辽发生战争，传递文书、下达命令全靠骑马的使者完成。



道举棋不定时，前线又传来新的败绩。

庆历元年（1041）二月，西夏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急令环庆路副总管、知庆州任福率所部一万人，加上新募勇士八千人，绕至敌后，断其退路。任福进军途中与西夏军队遭遇，敌军一触即溃，丢下马、羊、骆驼，向北逃去，任福与钤辖朱观分兵两路，合力追赶。他们没有料到，亲率十万精兵的元昊已经在前方设下天罗地网。宋军行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西夏铁骑漫山遍野涌出，将疲惫不堪的宋军挤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中午，任福身中十余箭，最后铁简落地，任福手扼自己喉咙，气绝而亡。就在任福被围之际，相距五里外的朱观率领的几千宋军也陷入西夏军队的重围。从附近赶来的援军没能救出朱观，自己反倒被乘胜而来的元昊主力截住，六千将士壮烈殉国，只有朱观带着一千多士兵靠着一面残垣的遮护，侥幸逃脱出来。当年十月，宋仁宗听从陈执中等人的建议，将陕西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韩琦知秦州（今甘肃天水）、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庞籍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各兼经略安抚招讨使，分掌各路军事，摆出了一副死守边境的姿态。

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发兵进攻镇戎军。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泾原路副都总管葛怀敏率兵抵御。葛怀敏领兵行至瓦亭寨，即分兵四路前往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九月二十一日，与西夏主力遭遇，宋军不敌，葛怀敏等人仓皇入城。西夏士兵拆毁城壕板桥，截断宋军退路，从四面包围，并切断了水源。宋军人马饥渴难耐，冒险突围，被夏军一举围歼，自葛怀敏以下十四员大将战死，九千四百多名将士、四百多匹战马均被俘获。元昊乘胜直抵渭州城下，

烧毁民居，屠杀居民，掠夺牲畜。王沿带领少数留城的军民，举起许多旗帜，布下疑兵阵，这才将西夏大军“惊”走。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师，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

宋、西夏三次大战，经略西边的宋军将帅未获尺寸失地，反而损兵折将，接连让宿敌攻入境内，以往党项使节朝贡大宋的通道几乎成了西夏人随便出入的自家便道。由于连年作战，互市贸易早已中断，西夏的国力也被消耗殆尽。宋、西夏意识到，双方谁也吃不掉谁，议和的结局已是不可避免。早在庆历元年十月，知谏院张方平就上奏请和，称：“今边事之费，岁课千万，用兵以来，系累杀戮不啻十万人。故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戎为害。”仁宗看到这一奏疏，连连点头称是。

庆历三年（1043）宋与西夏开始议和。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最终达成和议：宋册封元昊为西夏主，每年赐绢、银、茶等二十五万五千，恢复互市贸易，重新设置榷场。此后



“鄜延第四将带器械”铜牌

北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传世品

高6厘米，宽4.2厘米

牌呈长方形，上端有一系带穿孔。一面阴刻楷书“鄜延第四将带器械”，另一面阴刻楷书“将直”二字。鄜延路为北宋防御西夏进犯而设置的帅司之一，隶属于陕西路，以延州（今陕西延安）为治所。“带器械”意为可携带武器，“将直”为值日之意。此铜牌为鄜延路驻屯军第四将下属军官携兵器值勤戍守时佩带的符牌。

宋、西夏间恢复了正常往来。

就在宋、西夏连年开战、财匮兵疲之际，辽兴宗于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屯兵疆界，并派出使节萧英、刘六符，要求宋朝归还当年被周世宗“占领”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宋朝廷派富弼前往谈判，最终以每年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换得了边境平安。

四、榷货与交聘

辽、宋、西夏三朝并立时期，尽管相互间发生过战争，但在更长时间里和平相处，经济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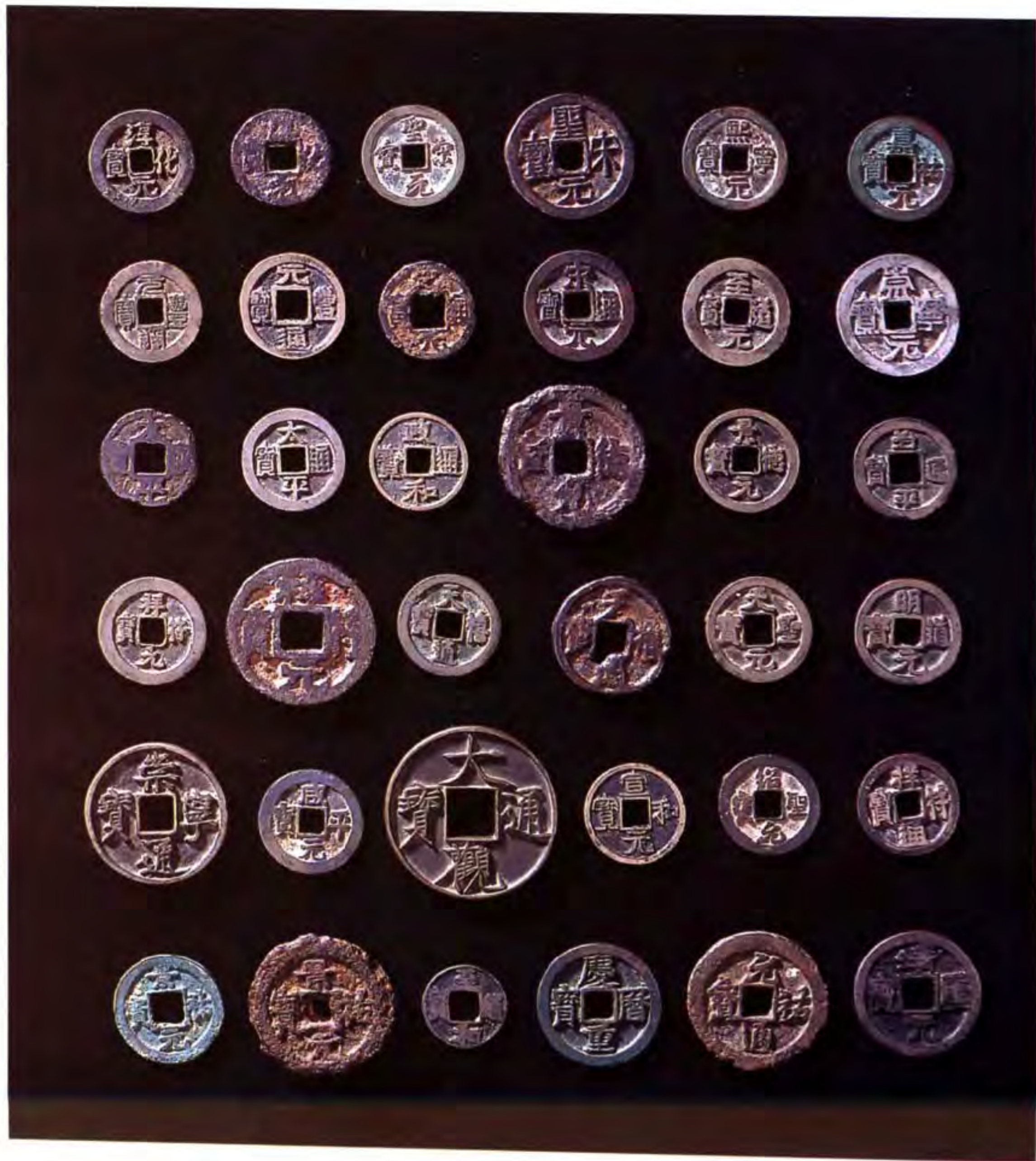
在北宋初年，宋辽官方和民间贸易往来

时断时续。“澶渊之盟”订立后的第二年，宋朝即在河北雄州、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设置榷场，恢复边境贸易。辽也在新城（今河北涿州东北）、朔州设立榷场。由宋朝输往契丹的货物有香药、犀角、象牙、苏木、草茶、漆器、缙帛和书籍，换回的契丹商品有羊、马、银钱等。宋辽均对贸易品种作出限制规定，如宋朝不允许出境的货物首先是铜钱、盐、米，还有硫磺、焰硝及可制造兵器、火器的材料；辽对输出皮裘、粮谷、马匹也有限制。但商人为了牟利，走私贩运违禁物品屡禁不绝。宋神宗时期，官府为了获取税收，一度放宽对铜、锡和铜钱的出口限

铜铁钱

北宋

北宋政府每年铸钱在五百万贯以上，相当于唐代每年铸钱的20倍。当时多数地区流通铜钱，仅四川地区使用铁钱。宋钱以年号钱为主，约有50余种。每种年号钱又有多种形式，从字体看，分为楷书、隶书、草书和篆书；从钱上文字看，分元宝、通宝和重宝。此外，宋太祖铸有“宋元通宝”，宋仁宗铸有“皇宋通宝”，宋徽宗铸有“圣宋元宝”和“圣宋通宝”。宋代铜钱和铁钱是中国历代货币中品种最多、版别最繁复的钱币。



制。由于互有所需，河北榷场的商品成交量很大，每年宋人在这里购买的契丹羊就达数万只，契丹人购回的茶的数量也很惊人。自景德元年（1004）以后，宋每年要输送契丹“岁币”三十万，后增至五十万。据宋仁宗时期的文臣宋祁说，这些运往北疆的银绢，每年通过榷场贸易，有十分之六“还入汉边”。

早在西夏建国前，宋朝就在保安军（治延州，今陕西延安）设置榷场，允许党项人来此与汉民开展贸易。宋人以缁帛、罗绮换得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用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物换回蜜蜡、毛褐、柴胡、红花、翎毛等物。元昊建国后，宋与西夏在陕西交战，榷场被关闭，贸易停止，党项物价暴涨，“匹布至十余千”。双方议和后，宋恢复了榷场贸易。西夏除了用畜产品和食盐大量换取宋境内生产的粮食、布匹、茶、药材和其他商品外，还用这些商品去同吐蕃、回鹘交易。吐蕃、回鹘商人若到中原做买卖，则要向西夏缴纳10%的过境税。

除了榷场贸易，宋与辽、西夏在和平时期还保持着交聘礼仪，即每逢元旦、帝后生辰、帝后逝世及重要事件，都派出使节前往庆贺、吊唁、回谢和报信。每当使节出行，都要携带大量礼品，如金银器、丝织品、鞍马、茶、盐、果实、脯腊等。这种交聘每年往返数回，由此形成的货物交流也是很可观的。

第四节 西藏与大理

从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内部的各政权和势力都先后走上相似的道路：旧有的统治分崩离析，社会经济结构开始重组，通过战争完成新陈代谢的使命。在中原陷入割据和战乱的同时，地处西南的西藏和云南也开始

了破坏与重建的过程。吐蕃王朝崩溃前就已经天灾人祸不断，又经历了百年的战乱，人力物力的匮乏使各个分裂势力都很难把西藏大地重归统一，于是宗教力量与世俗权力相结合成为新的政治形态，争夺转在另一层次进行。在云南虽然一度也发生了频繁的政权更迭，但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和平统一的形势很快得到恢复。仰慕中原文明的大理国一直试图使自身成为正统的一部分，所以直至灭国都在设法与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西藏的分裂时代

强力灭佛的吐蕃赞普朗达玛在842年被刺身亡以后，像每个未能完成正常王位传递的政权一样，继承权之争使西藏大地陷入混乱之中。朗达玛死时只有侧妃怀了他的遗腹子，长妃为了不失去权势，找来一个幼儿，声称是自己所生，希望在权力重组的过程中获取利益的贵族和大臣们分别拥立长子翰松和嫡子云丹，结果各自形成派系，前者占据山南，后者占据拉萨，矛盾日益激化，从政治斗争上升为武力抗衡。

为了使自己一方取得最后胜利，斗争漩涡中的人们设法发动一切可以动员起来的力量，结果使这种态势很快从权力中心扩散开来，几乎全藏区都被牵扯到纷争之中。围绕着山南、拉萨两大势力，各地出现了长系和幼系、多数派和少数派、金派和玉派、食肉派和食糌粑派等许多派系，各派系间彼此征伐，使前藏与后藏之间既成的分裂局面演变得更加复杂。

连年不休的战争和灾荒，使西藏人民蒙受了难以承受的损失。终于，在869年，一场空前规模的平民、奴隶起义爆发了。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安多和康区的奴隶，紧接着拉萨一带的人们趁着派系混战之机揭竿而起，

然后是山南的奴隶喊出了“砍山腰难，砍人颈易”的口号，很快各地都出现了起义的队伍。一些贵族派系趁机与义军结合，消灭原有的王公贵族，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任命自己的官员，在西藏地区形成了若干地方割据势力，再加上原来割据一方的王室和贵族们，统一的藏族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吐蕃王朝彻底土崩瓦解，西藏大地进入了分裂时期。

当时的分裂十分彻底，如果史籍对这一时代的记录可靠的话，西藏仿佛又回到了早期的部落时代。几乎每一个山沟里都有一位领主，他们都建有坚固的堡垒，管辖着数目有限的属民，并且拥有武装，每到收获时节，就要掠夺其他领主或者设法防御其他势力的抢掠。

9世纪末，斡松的后裔被云丹的子孙驱逐到后藏西部和阿里一带。崩溃的吐蕃使王统之争失去了意义，多年的征战也让各方面的力量都疲惫不堪，于是在混乱局面仍然继续的情况下，藏族社会渐渐趋于安定。到了10世纪中期，经济开始复苏，农牧业、商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除了物质上的需求，经历了百余年战乱的西藏人民更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这时，在吐蕃时期已经深深植根于藏族社会的佛教重新受到重视。

朗达玛灭佛所带来的后果使西藏在一百三十七年间看不到佛法和穿袈裟的僧人，但他的子孙们却是使佛教在西藏重新流行的倡导者。978年，云丹的六世孙、山南地方势力的领袖意希坚赞派出了以卢梅·楚成喜饶为首的十个人前往多康地区学法。相传朗达玛消灭佛教时，有三名分别名叫藏饶赛、约格琼和玛释迦牟尼的僧人带着经书逃离虎口，经过阿里、新疆、青海，最后到达多康地区的玛垅。这里也是藏族地区，但离吐蕃本部

较远，比较安全，于是他们就留在这里进行宗教活动。后来的佛教徒们认为西藏佛教的香火就是仰赖他们的保护才得以留存的。学法的人回来后，意希坚赞已去世，他的儿子继续在卫藏地区大规模新建、重建佛教寺院，发起了重振佛教的运动。因此，后人将978年视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开始，把通过多康地区的传教活动称为“下路弘法”。

与此同时，居于阿里古格地方的斡松后裔意希沃也在极力复兴佛教。他是古格王朝的创建者，后来在佛像前自受戒律出家。他及他所代表的地方势力，凭借地域之便先后派人前往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学习佛教经典，还邀请各地的一些著名僧人到阿里地区传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来自孟加拉的阿底峡大师。后来人们通常把通过阿里将佛教传入卫藏地区的活动，称为“上路弘法”。

各据一方的领主们看到了推行佛教对维护利益、强化统治的好处，纷纷积极地参与其中。一些人大力资助僧人学法，支持传播佛教，并且与新兴的教团结成“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另一些人则直接投身佛教，出家修行，将世俗权力和宗教地位集于一身。西藏特有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这一时期初显端倪。

在各方面势力的大力推动之下，佛教在西藏得到迅速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朗达玛灭佛前的规模。佛教虽然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在西藏地区传播了两百多年，也有了相当的规模，但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风格。这次复兴运动正好带来了机会。一方面，佛教与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本教固然接受了许多佛教的内容，佛教也因为争取信徒的需要，糅合了一些本教的内容。另一方面，这次佛教得到复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来源，以



古格王统世系图（壁画，局部）

古格时期

纵104厘米，横82厘米

西藏札达县古格王国都城遗址白庙北壁

吐蕃王朝崩溃以后，最后一任赞普的长子衮松一系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处于劣势，被对手驱逐到藏西和阿里一带，后建立了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都城兴建于10世纪的下半叶，在17世纪的上半叶被废弃。这幅壁画描绘了古格王国的部分王室成员，是西藏仅存的吐蕃、古格王统世系图，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

及背后不同的支持势力，使传入西藏地区的佛教产生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地区的佛教终于逐渐摆脱其他地区佛教教派的影响，开始形成有西藏特色的佛教系统，也就是藏传佛教。

二、心向中原的大理国

唐朝灭亡之前，地处西南的南诏已在902年崩溃。此后的三十六年间，原南诏的

大姓贵族们群起争夺，政权不断更替，相继建立了郑氏的大长和国、赵氏的大天兴国、杨氏的大义宁国。936年，白族贵族段思平在高、董两大姓贵族的支持下，以免除徭役为条件，联合滇东三十七部的军事力量，以减半征收税粮、三年免服徭役的诺言，赢得了广大自耕农的支持，一举推翻大义宁国，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大理国统治的疆域与原南诏国大致相同，包括现在的云

崇圣寺三塔

位于大理城西北1公里苍山中和峰麓

崇圣寺始建于南诏国第十代王劝丰祐时(824—859),三塔中的主塔也于当时建起。主塔全名“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又名千寻塔,高69.13米,共高16级,是一座典型的唐代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各距主塔70米的南、北两座小塔建造于大理国时期,有着浓重的宋代建筑风格,高度为42.19米。在大理国时期,崇圣寺是云南地区的佛教活动中心。崇圣寺在清末咸丰、同治年间毁坏,三塔至今保存完好。



南、四川的西南部、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的西北部。

大理国的建立结束了西南地区几十年的动荡局面,宽松的统治制度使社会安定、百姓富裕,维持了相当长的太平岁月。但执政的段氏家族内部却纠纷不断,留下了许多隐患。1063年,洱海地区的杨氏贵族叛乱,在开国时居于显要地位的高氏贵族后裔平叛建功,势力大长。1080年,杨氏贵族再次政变,杀死当时的国王,又是高氏出面诛杀乱党,扶立新君,从此高氏的权势已是难以动摇。1094年,高升泰迫使段氏国王逊位为僧,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太中国”。这是一次失败的篡位,高氏虽然没有引发流血冲突,但也没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所以两年后高升泰病死,王位又还回段氏手中,号为“后理国”。不过自此以后,大理的宰相成为高氏的世袭官职,段氏只是拥有虚位,实际的权力全在高氏的掌握之中。

早在南诏时期,中原文化就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西南边陲。大理国建立以后,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更是自觉地把自已放在正统王

朝的藩属地位,而且迫切地渴望得到承认。宋军平定后蜀以后,大理国立即派遣使者前去表示祝贺,但是宋政府却对此表现得非常冷漠。宋太祖赵匡胤一直将唐朝的灭亡归咎于驻扎在桂林防御南诏的部队兵变,所以对大理深藏戒心。有一个在宋代就已经很流行的说法:后蜀平定后,宋朝将领进献云南地图,建议乘胜进攻,但赵匡胤有感于唐与南诏之间的战争,用玉斧划大渡河以西,说“在这以外就不是我的疆域了”。这个故事所表现的正是宋朝统治者是如何看待大理问题的。

在大理国多次主动提出通好的要求下,宋朝终于有了回应。982年,宋太宗命令黎州的官员在大渡河上修造大型船只,以便大理国进贡,从此双方确立了贡赐关系。大理国的使者们带着马匹、麝香、牛黄、细毡等特产频繁地前往宋朝,并满载所需要的书籍、金银、棉布、食盐等回来。最初,宋朝皇帝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军都王”,后又封为“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南姚州爨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

顺王”，还是把大理视为化外蛮荒之地，把大理国王看作蛮夷的首领。随着双方交往的加深，终于在1117年，宋徽宗非常郑重地派遣儒臣前去册封大理国王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并颁赐宋行日历一册，正式认可大理国对宋的臣属关系，大理国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正统行列。第二年，宋朝的科举考试用特殊方式对这件事表示纪念，当时的题目是“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辞历日”。宋与大理的关系就在一方深怀戒心、另一方积极主动的状态下畸形地发展着。直到宋室南渡之后，双方还一直维持着官方的交往，只是深受异族侵扰之苦的南宋政府更加疑神疑鬼。

比起艰难发展的政治关系，大理与宋之间的经济交流却是十分发达。北宋曾在黎州、泸州、戎州等地，南宋曾在衡山寨等地

设立博易场，作为双方贸易交往的场所，马属于其中最主要的商品。由于战事的需要，北宋与南宋都需要大量的马匹，大理所产的马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在交易中占的比重最大。此外，药材、皮毡、大理刀等也是很受欢迎的商品。

大理国内通行汉字，对汉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而且非常重视教育，兴办学校，推广儒学。大理向宋进贡和贸易的目的之一就是搜罗中原典籍，同时也仿效中原，用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这一切都使正统思想在大理深入人心。文化的传承沟通了民族的血脉，虽然当时还有不同政权之间的隔阂，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大理已经与中原王朝融为一体，这也为入元以后云南顺利成为中国一统的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与党争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在防止藩镇割据、维护政权稳定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造成官僚机构庞大、对外防御虚弱，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日益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北宋中叶，范仲淹施行“新政”，王安石进行“变法”，但因触犯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都没能取得实效，由改革引发的党争却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第一节 积贫积弱

为加强中央集权，北宋统治者采用“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等国策，造成军费开支庞大，但边疆防御十分虚弱。为维护政权的稳定，宋朝扩大科举入仕之门，给予文官优厚待遇，造成官僚机构臃肿不堪，但效率极其低下。宋代不立田制，土地兼并日趋严

重，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兵变、民变不断发生。

一、强干弱枝

北宋建立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防止藩镇割据的重演。唐末以来，由于抵御外族侵扰和镇压民变，地方军阀纷纷拥兵自重，导致皇权被削弱，甚至被代替。为了将内部颠覆的危险降至最低，宋太祖、宋太宗一方面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策略，削弱藩镇的权力；另一方面采用“强干弱枝”、“内外相维”和“守内虚外”的政策，加强中央禁军的实力，并通过分割事权、兵将分离等措施，强化朝廷对禁军的控制。

“强干弱枝”，即由朝廷募养一支强大的中央禁军，屯驻京师附近，为皇帝保驾。北宋建都于地处平原的开封，无险可依，于是

“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以兵为险”；同时，采取更戍法，让驻防京师的禁军部队轮番到地方戍守，驻城西的将士要到城东仓库取粮，驻城东的将士要到城西取粮，不许雇人和用车。这使得禁军士兵长期处在演练劳苦之中，不致懈怠。由于士兵经常换防，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一切都在帝王掌握之中。

“内外相维”，即将禁军一半屯驻京师，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以此防止内变和外乱。

“守内虚外”，即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对付内乱上。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由此可见，宋初统治者关注的是内部作乱，为此，集强大的军队于京城四周，边疆防御则放在次要位置。尽管本着“内外相维”的方针，约有一半的兵力戍守在外，但这些军队散布于全国各地，实力显然难以和驻京禁军相抗衡。

这些政策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削弱了对外敌入侵的防御能力。在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前，辽兵数次侵入中原，直抵黄河岸边，在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西夏三败宋军，都反映了宋朝军事防御的虚弱；另一恶果就在于为了保持强大的内外驻军，朝廷每年要耗费大量的钱财，尤其遇到边患时，军费开支更为庞大。积贫积弱成为北宋中期以来困扰每一代帝王和文臣的难题。

二、官、职、差遣分离

北宋建立之初，即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改造，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大臣、宗室、外戚、宦官擅权。在中央设立



宋陵武将像

宰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分掌政务和军务，又设三司使负责财政，同时将御史和谏官的地位提高，用以监督百官。唐代的三省六部虽未撤销，但其职能多被新设立的其他机构所替代，直到宋神宗时，才恢复了三省（门下、中书、尚书）



“拱圣下千都虞候朱记”铜印

北宋

长5.5厘米，宽5.4厘米、高5.7厘米

这方铜印为禁军官印之一。北宋初年，为加强对禁军的直接控制，不设最高军职，殿前司由都指挥使主管，侍卫司分别由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主管，三个都指挥使均由皇帝任命，号称“三衙”。“拱圣”为侍卫司马军所辖部队之一，宋太宗时建立，拥有二十一个指挥（每一指挥编制为五百人），驻守京城。都虞候是这支部队的副长官。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原有职能。宋代地方政府分为府州军监、县二级，地方长官多以朝官出任；全国的州县又划归为若干个“路”，由中央派出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分别掌管一路的财政、司法及民政，有些路还设立安抚使掌管军政。

宋代官制与前代最大的不同，是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唐代的官名到宋代成了表示品秩、领取俸禄的官阶，馆阁大学士则成了授予高级文官的职衔，官员真正的职务是朝廷派出的差遣。官、职、差遣的分离，给宋朝廷带来官僚机构的极度膨胀和中央财政的困难。

按照宋朝对各级官员实行的磨勘、序迁制度，文臣任满三年、武臣任满四年，要经有关部门考核政绩（称为磨勘），如无大的过失，就转升官阶，科举出身的官员还可以超资升迁。这样，每年都有大批官员需要升转。宋朝对文臣十分优待，俸禄优厚，升转官员

过多过滥，造成政府财政支出浩大。宋朝还有一项优待高级官员的政策，即遇到朝廷重要礼仪（郊祀、明堂大典及皇帝生辰）和高级官员退休，还可以推举亲属、门生入官，称为“荫补”，宰相可荫补亲属十人，执政可荫补八人。如此恩荫下来，逐年积累，靠祖上荫德登进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中虽也有尽心尽力为国家办事的，但相当多的是无所事事，徒耗国财。而且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官僚机构，也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三、天子门生

开宝九年（976），宋太祖病逝，皇弟赵光义出人意料地继承了皇位。据说太祖去世的那个雪夜，赵光义一直守在他身边，外面的人看到和听到的只是“烛影斧声”。不久，太祖的两个儿子和幼弟赵廷美相继莫名其妙地死去。宋太宗为了消除世人的疑虑，巩固

花卉纹银六角杯盘

宋

1983年四川遂宁出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高1.5厘米，口径17.2厘米



自己的统治，一方面授意宰相赵普编造了所谓“太后遗命”，另一方面加倍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并加紧提携这些士子进入中央政府任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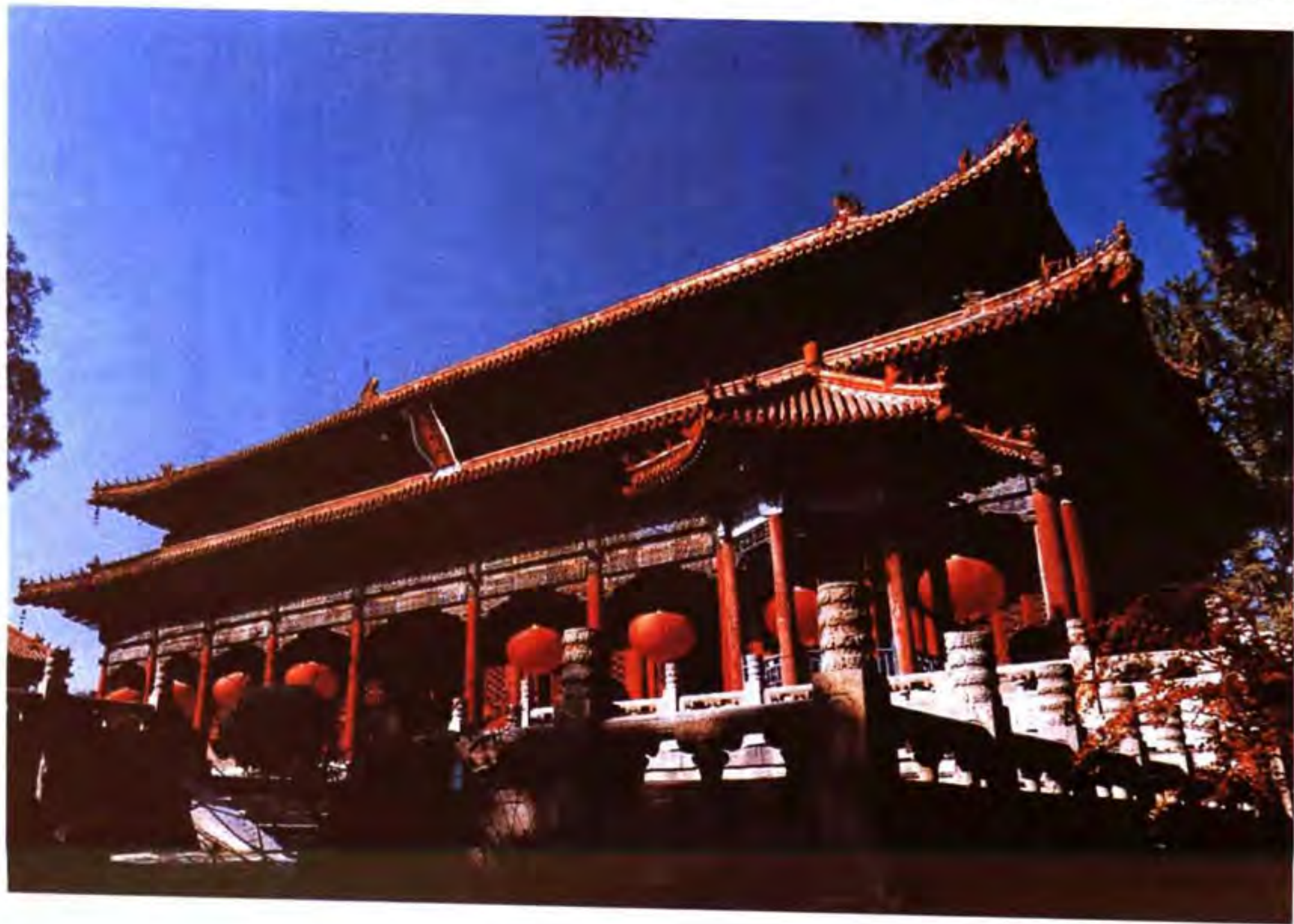
宋太宗即位的第二年，适逢朝廷贡举，一次就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五百人，相当于往届取士数额的十几倍。宋太祖在位十七年，总共才取士 347 人；而宋太宗在位的二十二年间，共开八榜，录取进士 1457 人、诸科及特奏名 4359 人，总计 5816 人，这个数额相当于唐朝二百九十年间取士的总和。自宋太宗开了扩大科举取士的先例，其子孙莫不因循效法。据统计，北宋一百六十六年间，总共开科六十九榜，共取进士、诸科 34163 人，大体每榜取士 495 人。

宋太宗不允许举子与主持贡举的文官建立师生之谊，而将他们一律视为“天子门生”。既为天子门生，自然要得到皇帝的格外关照。像太宗第一榜钦点的进士第一名吕蒙正，仅六年时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五年后升为宰相。宋太宗曾说：“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材，拔而用

之。……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宋太宗扩大科举取士，使成批饱读诗书的文人登进朝廷，隋唐以来的门阀政治和军阀暴政终于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如此大规模地招取文人入仕，必然造成朝廷官僚机构的臃肿膨胀，恰如后来包拯分析的：“三岁一开贡举，每榜近千人，复有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言之，不止于三倍。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四、天书封禅

与宋太宗继承皇位时的情形相似，宋太宗的第九子赵恒在 998 年登基时也有些不自信，尽管能对皇位构成威胁的人早已被父皇剪除，但崇尚道教的赵恒还是需要证明自己的继承大统乃天命所定，而非人谋所致。本来他亲征澶渊，逼迫契丹军队无功而返，又签定盟誓，化敌为友，为宋帝国赢得了长久的和平，应是展现了帝王之英武，可翰林学士王钦若却认为“以万乘之尊为城下之盟”是被《春秋》列为耻辱的事，毫无吹嘘价值。



泰山天贶殿

位于泰山岱庙仁安门北侧，是岱庙中的主体建筑，传为宋代创构。民国时始称天贶殿，以寓宋真宗因“天书”下降封禅泰山之事。

宋真宗像



为向臣民表明自己继承大位乃天命所定，虽然宋辽结为兄弟之国，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道统仍在自己这一边，宋真宗接受了王钦若的建议“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

要举行封禅大典，就应当出现些“祥瑞”作为铺垫。于是，在景德五年（1008）二月，一条长二丈的黄帛从天而降，落在大内承天门殿顶的鸱吻上，上面写着：“赵受命，兴于

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当内侍爬上殿顶取下黄帛，发现帛内另有黄字三幅，词句似是抄自《尚书·洪范》和老子《道德经》，内容是表彰赵恒能够以孝道治国，如继续清净简约，必会世祚永延。宋真宗命大臣宣读之后，群臣称贺。真宗当即宣布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又派专人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自这道不明来历的“天书”下凡之后，上至文武百官，下至番夷僧道，先后有两万多人上表，请求皇帝封禅泰山。与此同时，各地不断传来发现“祥瑞”的报告，随着先期赶到泰山的封禅制置使王钦若献上灵芝八千余本，数不清的芝草、瑞木、金丹、嘉禾纷纷在各地呈现，泰山下甚至涌出醴泉，真宗即命在涌泉处建亭。不久，据王钦若奏报，六月六日又有“天书”降于泰山醴泉亭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赵恒终于踏上了东封泰山的路途。真宗登泰山顶完成了祭天仪式，第二天又在社首山举行了祭地典礼，下诏封

《泰山神启跸回銮图》

传为宋人绘
高3.3米，长62米
为泰山岱庙天贶殿壁画。该图描绘泰山神出巡回銮的盛况，场面宏大，人物众多，造型极为生动。



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并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同月，真宗御书《青帝广生帝君赞》碑，立于青帝观，御制《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刊于岱顶；又让大臣们撰写了《封祀坛颂》、《朝觐坛颂》、《社首坛颂》、《天贶殿碑》等歌功颂德的文章，分别刻石立于山下。自十月初启程，至十一月下旬返回京师，历时四十七天，耗资八百余万，真宗仍嫌不够，大中祥符四年（1011）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地方父老百姓的强烈请求下，他又踏上了西祀汾阴后土地祇的路程；三年后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祭祀老子，并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一月，一座豪华的皇家宫观在京师建成，专用于供奉“天书”。这座拥有2610间屋宇的玉清昭应宫在建成十五年后失火，烧得只剩下两座配殿，其时宋真宗已故去，“天书”也陪葬于永定陵。

在北宋中叶，包括东封西祀在内的祭祀活动以及兴修佛寺道观等的耗资，给国家财

政带来沉重负担。有大臣统计，朝廷每三年举行一次的郊祀和享明堂等典礼，耗费极为巨大，尤其是朝廷郊祀赏赉，原为五百万，真宗景德郊祀用七百余万，东封泰山用八百余万，西祀汾阴又用去一百二十万，此后的郊祀，都以真宗时的用度为准。到宋仁宗时举行合祀天地、五方、日月等神的明堂典礼，赏赉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宝元元年（1038）因郊祀之耗，国家财政已是入不敷出，当年京师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支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适逢对西夏用兵，财政度支更显捉襟见肘，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危机。

五、冗官、冗兵与冗费

宋朝建立之初，中央和地方官员还不算臃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冗官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士大夫为之头痛却又无计可施的难题。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冗官的受益者。宋真宗时，文武官员达到9785人，仅隔四十余年，到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就增



宋真宗对辽用兵，兵力增加至九十一万二千，禁军有四十三万二千人。宋仁宗时，因防御西夏侵扰，军队总数进一步扩充到一百二十五万人，仅禁军就增加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到皇祐时，更增加到一百四十万人。当时人形容为“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

冗官、冗兵、冗费，成为宋朝廷的沉重负担。对此，当时一些官员也有清醒认识，宋真宗时期，就有不少官员上奏要求限定官员

数额，裁减坐食国粮的军队冗员。宋仁宗时，宋祁上《三冗三费疏》说，“天下有定官无限员”是一冗，“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是二冗，“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是三冗。他沉痛指出：“三冗不去，不可以为国！”

归根结底，宋朝廷采取广开仕途、厚养文官和募养禁军的政策，在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财政的窘迫、边防的松弛、社会矛盾的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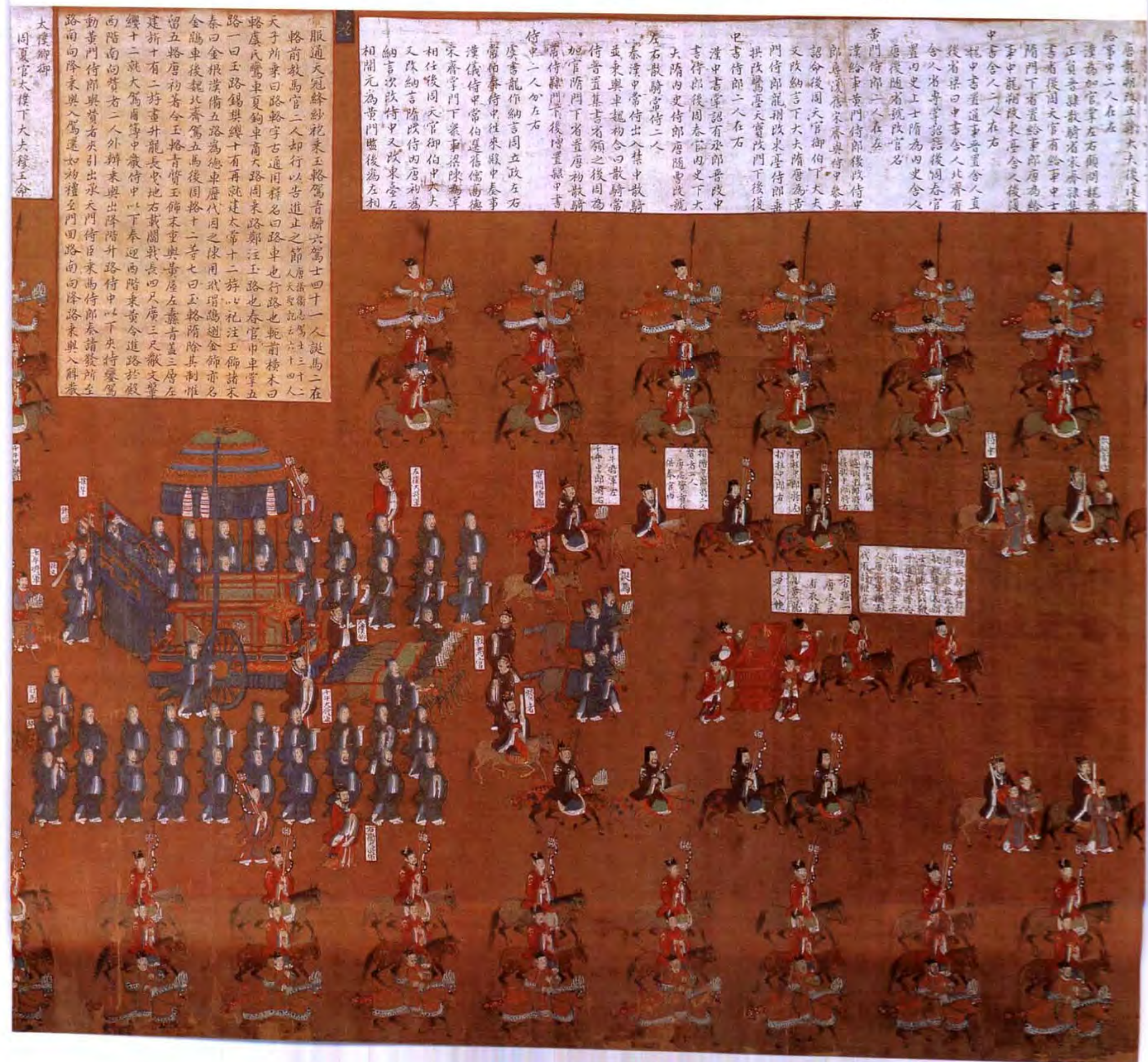
《大驾卤簿图》(局部)

北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纵51.4厘米，横1481厘米
绢本设色

图卷首上端题“大驾卤簿图”，题下小字注“中道”。该图描绘了皇帝前往东京（即开封）城南青城祭祀天地的宏大场面，是研究宋代卤簿制度以及舆服、仪仗、兵器、乐器等的极为难得的形象资料。



和各地兵变、民变的持续不断。

六、兵变与民变

北宋常年保持着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按常理应该在防御内忧外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防御辽与西夏侵扰时软弱无力，败绩不断，即便是对付各地草寇叛乱，也显得力不从心。当时甚至百十人的叛乱，也能纵横数县。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发生了大范围的春旱，京东、京西、湖南等地接连发生叛兵、饥民起义。五月，京东路“捉贼虎翼军”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聚集了四五十个士兵，发动叛乱，杀掉了沂州巡检使，然后一路南下，经密州（今山东诸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真州（今江苏仪征），到高邮军（今江苏高邮）时，已扩充到二三百人。王伦

穿上黄袍，自封为帝，还定了年号。直到这年七月，朝廷派出大军围剿，才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将其击败。没过一个月，京西、陕西又发生几次饥民的起义，往往也是几十个人啸聚为盗，逐渐扩充，势力越来越大。陕西南的张海、郭邈山义军开始只有几十人，由于不断有饥民、叛兵、囚徒参加，竟扩大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州县官军无法抵御，最后陕西宣抚使韩琦调集精锐部队才将其剿灭。荆湖南路的瑶民起义也发生在这年八月，后来发展到五千人，因山区地形复杂，官军多次进剿都无功而返，最后采用招抚手段，才将其瓦解。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河北路又发生了宣毅军小校王则发动的兵变。王则占据贝州（今河北清河），自立为东平郡王，定国号安阳，年号得胜。百姓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均招募为兵，在脸上刺“义军破赵得胜”六字，公开与宋朝廷叫阵。宋朝廷先后调集十万禁军进讨，经过六十多天的围剿，才将叛乱平息。

庆历期间兵变、民变的此伏彼起，显现出宋朝吏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软弱。欧阳修分析说，自对辽和盟之后三十多年来，军队懈怠骄惰，卫兵入宿，被子都要人拿着。过去禁军取粮要自己从城东背到城西，现在都要雇人背负。他沉痛指出，这些“未尝闻金鼓、识战阵”的士兵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能不骄惰吗！从另一方面看，兵变、民变的频繁发生，也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宋朝厚养文官，募养禁军，“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偏偏忽略了对民众的休养生息，而这正是国家赋税之源。宋朝不立田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批农民失去了田地，沦为给地主耕田的佃户，而各地赋税极为不均，往往是豪富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

开宝寺塔

北宋

塔高 55 厘米

开宝寺塔又名铁塔，建在宋东京城（今开封）北开宝寺中，原为木塔，后焚于火，庆历四年（1044）重建为八角十三层的砖塔。由于塔外壁镶嵌褐色雕花砖和琉璃瓦，远看近似铁色，故称铁塔。



一遇荒年，要么流离失所，要么铤而走险。

第二节 改革与党争

为解决“三冗”弊端和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北宋中叶，范仲淹和王安石先后进行改革。范仲淹试图从政治体制入手，严格官吏选任制度，改变纲纪涣散、“官壅于下，民困于外”的局面，却遭到既得利益者的猛烈攻击，其“新政”实施不到两年就被终止；王安石从经济改革着眼，政府加大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剥夺了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的部分利益，其“变法”措施因此屡被废止。两次改革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由改革引发的朝廷党争则越演越烈，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一、庆历新政

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建议，但均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北宋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去世，十三岁的宋仁宗继承皇位，刘太后临朝听政长达十年时间。在此期间，朝廷对消除时弊也无所作为。直到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逝，宋仁宗亲政，才将改革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起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倡言改革的人望之士进入二府，并在天章阁问策，要他们将“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列闻奏”，新任参知政事范仲淹写下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从而正式拉开了全面改革的序幕。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指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

狄骄盛，寇盗横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为此，他提出了包括十个方面的改革方案。

第一，“明黜陟”。即改革官吏磨勘转迁制度。当时官员升迁，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将政绩呈京师考课院等机构覆核，如无大过，例行迁转，谓之磨勘。但考课形同虚设，年资几乎成了官员升迁的惟一根据，“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共进”。范仲淹认为这样的制度极不合理，凡是兴利除弊、有所作为的官员，往往被同僚指责为生事，遭到嫉妒，迁转受到无理阻挠；而庸碌无为的人却照例升官。范仲淹建议：在京任官，经保举的任职三年磨勘，自己申请的任职五年方得磨勘；任职期间能够兴利除弊的官员，由上级申报，可不隔磨勘；那些经考核属于“事状猥滥，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则另行安排。

第二，“抑侥幸”。即改变现行的恩荫任子制度。范仲淹提出，今后两府并两省官，遇大礼只许奏一子充京官，如果是弟侄，还需考试录用；转运使及边任文臣须到任二年后方许奏荫子弟，如此内外官位才能避免官宦



范仲淹像

嘉祐铜则

北宋 衡器

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
高30厘米，厚20厘米，重64公斤

铜则是官府颁发的标准权衡器。该铜则略呈扁方柱形，圆顶平底，上端有一圆孔，可插杠或系绳。通体刻细团花，前后两面均阴刻铭文，铭文居中竖写，四周围以双线字框，一面注明制作年代：“嘉祐元年丙申岁造”；一面标示重量和编号：“铜则重壹百斤黄字号。”

子弟充塞，而孤寒之士方得以一显身手。范仲淹还特别提到，像馆阁这样重要的职位，两府、两省子弟不得陈乞进入，应由两制考核进士任用。

第三，“精贡举”。即对贡举取士及学校教育进行改革。范仲淹认为现在的贡举，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举子都不去学习治国做人之道，尽管济济盈庭，有真才实学的却十无一二。要改变现状，应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首先在各地学校聘请通经有道之士教学，务在实用；其次进士考试先策论后诗赋，诸科考试除了考儒经章句，更要考经书要旨，从而“使任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仲淹还提出，由各地发解举子，过去要考察家履，现在专以辞藻、墨义

取士，考卷又加弥封，不见姓名，失去了乡里举荐选取的本意，也应改变。

第四，“择官长”。即将地方官员的循资升迁改为保任序迁。范仲淹拟定的办法是由中书、枢密院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十人，大州知州十人；由两制（负责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和起草外制的知制造）共选知州十人；由三司副使及判官、御史台、开封府、各路转运使及提点刑狱使分别保举知州五人；由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知州、通判选取部分知县。如此荐选，地方官素质才有保证。

第五，“均公田”。自真宗时开始，宋代官员由国家授职田，作为薪俸的补充。经过几十年，职田往往分配不均，并出现扰民现象。范仲淹不赞成因噎废食而取消职田。他认为职田的设立有利于官员保持清廉，所以希望朝廷派人出外检查，“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第六，“厚农桑”。范仲淹指出，养民之政，必先务农，现在国家不重视农桑，粮价上涨，府库日虚，因而造成贫弱之民困于赋敛，祸乱不断，京师军粮匮乏，江淮漕运不济的现象。范仲淹又说，要重视农桑，就应该兴修水利，减少灾患。他请求每年秋收之后，由朝廷下文给诸路转运使，督导州县访求兴农之法，或开河渠，或筑堤堰，由官府计定工料，于第二年动工。如此坚持下去，数年之间，农利大兴，饥民必少，不但粮价保持稳定，国家用于运送东南漕粮的费用也可节省许多。

第七，“修武备”。范仲淹指出，实行募兵制以后，国家每年耗巨资用于养兵，由于西北开战，京师禁军多赴外地，一旦敌人侵入境内，便可长驱直入，若招募新兵，国家



财力又显不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范仲淹建议恢复唐初实行的府兵制，于京师附近招募五万民兵，每年三季务农，冬季训练，以此缓解京师兵力的不足。

第八，“减徭役”。范仲淹认为西京洛阳仅七万五千余户，仍置十九县，有的县只有七百户，能供服役的不过百家，不如省县为镇，放公人归农。他建议先将这十九个县合并为十县，“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

第九，“覃恩信”。即朝廷诏敕要有信用。范仲淹说：“今大赦每降，天下欢呼。一两月间，钱谷司督责如旧，……至于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寡、振举滞淹之事，未尝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尽成空言。”他希望皇帝下诏，今后赦书内宣布的事，如各级官府不能落实，一律按违制论处，或流放，或刺配，毫不留情。他还建议今后每遇南郊大赦，派臣僚前往各路检查颁布的有关事项是否一一施行，并核察地方官才干，访求百姓疾苦，以求取信于民。

第十，“重命令”。范仲淹主张令出则行。他尖锐地批评现在国家每降宣敕条贯，繁而无信，常常更改，下面也不好好施行，上失其威，下受其弊。他请求今后百官拟定条贯，由中书、枢密院审核，必可经久，方得颁行。一旦颁行，敢故意违反者，并以违制处罚。如地方官提出条贯不合理，仍由两府审核修改。

以范仲淹为首的新进文臣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也使急于改变积贫积弱国势的宋仁宗看到了希望。他对范仲淹所陈十事，除修武备外，基本上都接受了下来。从庆历三年（1043）十月开始陆续颁诏，施行全面改革，时称“庆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改革吏治，具体内容一是

加强监督机制，赋予地方行政长官按察甄别属官的职能；二是改变以往按年资叙迁的磨勘制，重视对官员政绩的考核，择才而用，举荐与循资并行；三是限制高级官员的荫子特权，逐步消除冗官之患；四是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凡不按照朝廷诏制敕令办事的官员，要依法追究其责任。

由于新政触犯了官僚阶层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同时也由于范仲淹等实施新政的官员与朝廷中另一些官员政见不和，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强烈抵制。反对新政的官员攻击范仲淹等人私结朋党，最终宋仁宗发生动摇，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贬往外地，新政也随之流产。

二、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被废止后，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并未缓解，司马光等人继续呼吁减裁冗费，保养税源，希望通过“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等措施来使国家上下交足，另一位庆历二年（1042）进士王安石则主张因时制宜，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法规制度来改变颓弱的国势。他在嘉祐年间（1056—1063）先后呈进《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和《上时政



王安石像

宋神宗像



疏》，指出：“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病逝，养子赵曙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仅在位四年，除了与太后的矛盾和为生父濮安懿王争称号引起的“濮议”，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治平四年（1067）其子赵顼继承皇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读过王安石的文章，非常赞赏他的主张，当时朝廷内外也有不少人十分推重王安石。宋神宗登基第二年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不久又任命他为宰相。在王安石的建议下，朝廷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全面规划和实施变法改革。王安石的变法与二十多年前的庆历新政不同，他不是以整顿吏治为重点，而是以变更祖宗之法为手段，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他推行的新法主要有以下几项。

1、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的第一个新法。由朝廷拨出五百万贯钱和三百万石米，并设置发

运使，统一调度江浙荆淮六路的上供物资。过去上供京师物品的数量是固定的，无论丰歉，都不能改变，这样就造成“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由于京师对物品的需求在不断变化，而地方供应未能及时作出调节，富商大贾趁机贱买贵卖，从中渔利。均输法施行后，以朝廷的财力，“变易蓄买”，以备京师上供之需，对各地供应的物品，也采取“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办法，改变以往各地以支移、折变等名目多征私占、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农民不堪重负的状况，使之“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最终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

2、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行。规定各地将用于平抑物价和赈济灾害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粮作为资本，在每年正月和五月，由官府分两次向处于青黄不接的农民发放贷款，待收获季缴纳税粮时一并还贷，还贷时加收二成的利息。青苗法的颁行，在于改变富商趁农民困难之际大放高利贷、盘剥农民的现状，地方政府直接操作放贷行为，以此辅助贫困，抑制兼并。新法规定，对具有一定田产的富户也要“抑配”规定数额的贷款，由此得到的利息用以防备荒年之需。

3、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利害条约》，规定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等工程，由受益人按照户等高下出资；如资金不足，可由官府贷款，按青苗法计息；官钱不够，由州县官劝说富户出资相助，官府代为催缴还款及利息。《条约》还要求熟悉农业耕作和水利修建的官民可向各级官府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凡属可行之举，由地方政府实施，提出建议的人按照成效大小予以

奖励和授官。

4、免役法。

熙宁四年（1071）正月在开封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施行。其主要内容是取消过去按户等轮流差役的旧规，改由地方政府雇人代役，雇佣役人所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大致上三等户分为八等出“免役钱”，随夏税秋粮一同缴纳；原不充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和坊郭户也要按定额缴纳半数“助役钱”。地方政府根据役事多少制定役钱数额时，要额外加收二成，以备荒年之用，称为“免役宽剩钱”。免役法的实施，使以往一些轮流充差役的农户得以解脱，也使以往享有不供役特权的官户形势户必须缴纳役钱，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各级政府。但发动全民为政府派役出资，实际上是在法定的赋税之外又添加了一项税钱，这也使其成为引起较大争议的新法之一。

5、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在开封设立市易务，由内藏库出资百余万贯钱为本，控制市场和物价。当一些货物滞销时，市易务“平价”收购，待价格上扬时再出售。市易务招纳一些京师商贩，具体操办购销事务。这些商贩可以向市易务借贷，但必须“以地产为抵”，还要申报自己的产业，五人以上结保，对所借官钱每年付二成的利息。商贩可“结保除请”，为官府代销货物，市易务根据商贩产业多少，将收购来的货物交给他们销售，以半年至一年为期，到期还清货款，同时还要加收二成的利息。这项措施实际使官府成了京师最大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商人无论购销都在市易务的控制之中，而宋朝廷通过这项新法，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也正因此，不久就将市易法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长安等大城市推广施行，各地相继成立了市易

务，而开封府市易务改称都市易务。

6、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八月颁行。宋代采取计产征税，根据占有田产多寡将农户划分为五等，上等户纳税较多，中、下等户纳税稍轻，没有土地的农户不纳田粮。随着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和土地兼并加剧，以往的统计数据已不能反映现实，官僚地主广有田产，却隐瞒不报，失去土地沦为佃农的农户却还承担着沉重税粮。诡名挟佃、隐漏田税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并直接导致赋税的流失。为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工作就是重新核定田产，据实确定各户税额。这就是王安石让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的主要目的。“方田”即在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以千步为一方，按土地肥瘠不同，定为五等，登记在账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额。无论是分家析产，还是典卖土地，都要按丈量之后的田亩数为据，以往诡名挟佃的农户都要改正过来。新法先在京东路实行，逐渐推广到各地。这一法令的颁行在解决地主豪强隐漏田税、增加政府田赋收入方面取得一定实效。

7、免行法。

熙宁六年九月颁行。以往京师官府衙门供应所需物品，由京师诸行供应，由于“官司上下须索”，往往高价购进货物以供官衙之需，各行商铺苦不堪言，中小商贩甚至不愿入行，“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免役法和市易法施行后，有的商人提出采用按照产业不同出钱代供的方式。同年，由市易务主持，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制定了《免行条贯》，规定各行商铺按“利人之厚薄纳免行钱”，免除以往对官府的例行供应。

8、将兵法。

熙宁二年（1069）开始对禁军进行并营，

裁汰老弱；熙宁四年对厢军也进行了裁并。经过整顿，禁厢军人数比英宗时期减少了三十六万人。为改变过去兵将分离、士兵缺乏有效训练的问题，熙宁三年，泾原路曾采取将本地民兵分作五番，“遇上番结队，各隶诸将”的方式进行训练，由此将得专兵，这也就是将兵法的雏形。从熙宁七年开始，宋神宗将此法推广到禁军，陆续在河北、京畿、京东、京西诸路设置三十七将，在陕西设置四十三将，在东南设置十三将，总计全国九十二将。“将”成为军事编制单位。每将置正将一人，副将、部将、队将若干，全权负责士兵训练。这项措施“使兵制其将，将练其士卒”，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9、保甲法。

熙宁三年十二月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制》，规定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一家有超过两名十五岁以上男子，就要出一人为保丁，选“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分别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副保正。保丁要置兵器弓箭，学习武艺，夜间轮流巡警，追捕盗贼，维护治安。保甲法在京畿试行后，很快推行到全国。这项新法改变了国家仅靠募兵制维系国防治安

的旧制，采取“寓兵于农”的方式训练民兵，缓解了由于养兵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同时由于各地人户联保结网，治安也得到改善。

10、保马法。

宋代因国防之需，朝廷设牧监养马，不仅占地广，开销大，而且所养之马多不堪用。针对这一弊端，不少大臣建议让民户养马。熙宁五年（1072）五月，宋神宗下诏，允许开封府界诸县保甲代官府养马，次年又颁布《保马条例》，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实行，规定每户可养一至二匹马，养马诸户免除部分上供负担，三等以上的养马户每十户为一保，四等、五等户每十户为一社。保户马死要独自赔偿，社户马死则由同社诸户分摊，按半价赔偿。保马法施行后，极大地节省了官府在养马上的开支。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理财”和“整军”措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国家获得的新增税源，原为一些皇族、大官僚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大地主、大商人所有，变法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使得特权阶层的利益受到侵害，因而在变法实施的十五年中，自始至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翰林学士司马光先后三次致书王安石，指责新法“尽夺商贾之利”；朝廷中的一些元老重臣也纷纷上书，申诉新法扰民；还有人画《流民图》给宋神宗看，说旱灾乃是实施新法引致的，“去安石，天乃雨”。宋神宗与他的两个弟弟在宫中击毬，说以玉带作赌注，两个弟弟却说，如胜了，惟愿废除青苗、免役两法。在一片反对声中，宋神宗也有些动摇。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二次辞去相职，居住江宁（今江苏南京）。元丰八年（1085）宋神

司马光像



宗病逝，十岁幼子赵煦继承皇位，神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病居洛阳十年的司马光被请回京师，任命为宰相。司马光重返政坛一年间，将新法全部废止。

三、元祐党人

在广西桂林市郊龙隐岩，有一处宋代摩崖石刻，题为“元祐党籍”，内容是一份包括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在内的三百零九人的名单。这份昭示天下的“党人”名单，说明在北宋中后期，朝廷党争是何等激烈。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被视为“旧党”，尽遭贬谪。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及旧党人士重返京师，他们不仅以废除新法为己任，而且对实施新法的官员进行大规模清洗。那时，在京师设立了一个“看详诉理所”，专门受理在变法期间遭受“迫害”的臣子投诉，为他们平反昭雪。同时，定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九十人为王安石亲党，“榜之朝堂”。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病逝，文彦博继任为相，旧党逐渐分化成若干派，因政见不一，相互争吵，主要有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刘摯、梁焘、刘安世、王岩叟等人组成的“朔党”，一旦发现与自己主张不同，就攻击对方附会新党，使得朝廷内讧不断。

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年轻的皇帝决定继续先皇的变法事业，他改年号为“绍圣”，重新起用新党章惇、蔡卞、曾布等人，陆续恢复了免役、保甲、青苗、市易诸法。其间，京师又成立了一个“反看详诉理所”，罗织旧党官员罪状，旧党吕大防、刘摯、苏辙、梁焘、范纯仁等被流放岭南，韩维等三十人被贬官，就连司马光、吕公著等已经故去的官员也被追加贬斥，朝廷定“元祐党

籍”七十三人。

在宋哲宗绍述父业、重举变法旗帜之际，新党内部也发生了争执，曾布攻击章惇擅权，章惇与蔡卞也政见不和，朝廷间的党争愈演愈烈。

元符三年（1100）初，宋哲宗病逝，因无子，其弟赵佶继承了皇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约

融水元祐党籍碑

南宋

长142厘米，宽79厘米
宋徽宗即位后，宰相蔡京以推崇新法为名，将自己的政敌和反对新法的人定为“元祐奸党”，刻石榜示天下。后宋徽宗下令销毁全部刻石。现存两块“元祐党籍碑”均是南宋时重刻的。图中拓片原碑出自广西融水，刻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



半年时间，其间新党人士章惇、蔡卞、蔡京等先后被贬，旧党陆续召还，已故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也被追复官位。

元符三年七月，宋徽宗亲政，在曾布的鼓动下，立意绍述神宗、哲宗的未竟事业。他改年号为崇宁，即崇法熙宁，又任用蔡京为相，仿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讲议司，打着推行新法的旗号聚敛民财。蔡京为了排斥异己，重定元祐党籍。崇宁元年（1102）九月，定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一百二十人“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到崇宁三年，经蔡京再次操持，“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石立于文德殿之东壁。又由蔡京书写，令各地刻石，“永为万世臣子戒”。在新定的三百零九名“元祐奸党”中，不仅有司马光、苏轼等老牌旧党，还出现了章惇、张商英、李清臣等主张变法的新党官员。这些列入党籍名册的官员，尚在人世者，或被贬谪，或被编管，大都逐出京师，其中流放岭南的就有三十二人，而且非经特许，不得迁回内地。后来宋徽宗又觉立石不妥，在崇宁五年（1106）下诏销毁全部党籍碑。现今保存在桂林龙隐岩的石刻“元祐党籍”，乃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由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重刻的，此外在广西融水也保存着一块，均已是稀见之物了。

第三节 官人社会

为扩大统治基础，宋朝统治者广开科举入仕之门，使大批学有素养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并予以优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但这并未带来政治清明、国强民富，相反，官僚机构的庞大，官员的循默苟且、不恤民情，却

日甚一日。虽然有帝王亲撰的铭记警训，也有包拯这样的清官作为楷模，但真正能将“奉公”、“修德”铭记于心，能像铁面包公那样不徇私情的官员仍十分罕见。此外，政府官员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地位显赫，还造就了“官本位”的世风。

一、宰相须用读书人

鉴于唐末以来军阀擅政、横征暴敛的历史教训，宋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把恢复社会秩序、重修礼乐、重用文臣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宋太祖公开表示对读书人的好感，不止一次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宰相范质去世时家中无任何奢侈品，他感叹道：“范质止有居第，不事生产，真宰相也！”由此他得出结论，派一百个文臣到地方，即便全贪污，也比不上一个武将贪得多。他派出大批文臣前往各地接掌政务，亲自到国子监听课，与儒生讨论郊祀、仪典，并在晚年亲自登殿主持科举考试，由此创建了皇帝殿试诸生的制度。宋太祖尤其重视贫寒之士，他下令废除唐代盛行的“公荐”制度，并在首次殿试时表示：“过去登科的名额，多被势家子弟占去，以致孤寒之士难登朝殿，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革除此弊。”为了防止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科场作弊，他还在开宝元年（968）下诏，规定今后凡食禄之家的子弟赴考，一律要复试。此后朝廷规定官员的子弟亲属应试，另设考场，称“别头试”。宋太宗即位后，将每年举行的贡举考试改为三年一次，同时将每届取士名额扩大了十倍。真宗以后，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平等和公正，陆续采取了“糊名”（在阅卷前将试卷上考生的名字用纸条糊上，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评定等次后再揭开）、“誊录”（为防止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作弊，在阅卷前由书手将试卷重新

抄写)和“锁院”(自考官和考题确定之日,至阅卷评定等次结束,知贡举等相关官员留住贡院,不得与外界联系)等制度。大批文人通过科举之路进入政府,使得“重文轻武”成为宋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宋朝沿袭唐五代之旧,科举考试分为贡举(三年一试)和制举(不定期举行),贡举又分为进士和诸科。王安石施行变法时,于熙宁四年(1071)废诸科和制举,设“新科明法”,宋哲宗“元祐更化”时被停止,绍圣时重设。此外,还有武举、童子举等。制举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三科,宋仁宗时分设六科,宋神宗时一度被罢,后复设。宋代科举虽名目繁多,实以贡举为重,贡举之中,时人最为看重的是进士科。若想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士子要历经三次严格的考试,即解试、省试和殿试。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主持,在秋天举行,考试合格者方可入京参加省试。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在春季举行,一般要连考三天,合格者由礼部奏明朝廷,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极少辍落,主要是根据考生的才学排定名次,这一排名极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考生今后的仕途命运。最初进士登科分三等,后增至五等。礼部试(省试)第一名称“省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宋朝帝王通过相对公正的科举考试制度,将大批学有素养的知识分子纳入各级政府,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朝廷还对文官予以优厚待遇,厚俸养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重定百官俸禄,自宰相而下分四十一等,宰相、枢密使的月俸定为三百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使二百贯,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翰林学士、知

制造等为一百二十贯;以下东宫三师三少、仆射、御史大夫、六部尚书、侍郎等依次递减;一般知县的月俸是十贯至二十贯。除了薪俸,还有禄米,宰相及武官中的太尉,每月均可领到一百石粮食。有人计算过,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代官俸最高,大约高级官员的薪俸收入相当于汉代的十一倍、唐朝的四倍、元明的五倍、清朝的十五倍。不仅如此,在政治地位上,宋朝廷也给予官僚阶层极大的特权:在户籍制度上,设置官户,可免差役和科配;在刑法上,凡参加过省试的

宋陵文官像





《大驾卤簿图》(局部, 武将)

北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举子, 可以用赎金替代杖责。过去举子登科唱名, 须自备鞍马, 宋真宗时改为由官府出金鞍骏马, 并由金吾司派出七名士兵护送开道。宋朝统治者鼓励文臣大胆进言, 宋太祖甚至刻碑立石, 写下了“不杀大臣及言事者”的誓言。

相比而言, 武将的地位就差了许多, 政府中的要职基本上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把持, 二府中负责军事的枢密使也极少由武将担任。宋仁宗时, 在西北负责抵御西夏的也是范仲淹、韩琦等文官。大将狄青因在对夏战争和平定瑶民起义中立了大功, 被宋仁宗擢为枢密使, 立即在朝廷中引起大哗, 欧阳修甚至上书说: 武臣掌机枢, 只能使那些心怀不轨的军人高兴, 于国家大局不利。时任三司使的韩琦原是狄青的上司, 对狄青也不像对待其他二府大臣那样客气。狄青曾对人发牢骚: 韩琦的功业官职与我一般, 我不过少一进士及第罢了。在此风气下, 读书人仕

成为社会职业中的首选。唐朝人向往的是“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 而宋朝最流行的《神童诗》写道: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在宋代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二、眼前何日赤, 腰下几时黄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 中国社会发展到宋代, 统治阶层的主体已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官僚地主。在“元祐党籍”碑榜上有名的文彦博就说过, “本朝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

官僚社会的特点是“官本位”, 各级官员按照官阶高低享有不同特权。宋代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宋代官名实际上只用于定品秩、俸禄和章服, 因此又称为“阶官”或“寄禄官”。宋神宗时, 京朝官共二十五阶, 宋徽宗时增为三十七阶。差遣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 也称“职事官”。职事官的高低也与俸禄有很大关系, 倘若有官无差遣, 犹如在职不在岗, 待遇要差许多。

宋代寄禄官分九品, 有品位的文官分为京朝官和“选人”。实际上朝官并不是参加朝参的官员, 京官也并不特指在京任职的官员, 朝官、京官都包括地方官, 朝官指七品以上的高中级文官, 京官指八、九品的低级文官。“选人”指幕职州县官, 官品与京官相近, 是京官的候选官员。士人考中进士后, 通常只有殿试第一等(前三名或前五名)直接授予京官, 绝大多数进士都要从“选人”升起, 只有通过各种年资考核, 或有人举荐, 方能升改京官。

不同官品的官员穿着不同的服饰, 从颜色上就可区分。宋神宗元丰改革官制以前, 三品以上官员服紫, 五品以上服朱, 七品以上服绿, 八、九品服青。元丰之后, 取消服



鎏金腰带

1983年广东上下川岛海域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藏

长170厘米

腰带由四股八条鎏金丝线编织成，一端连接带钩，一端连接一方形饰件及四个小环。带钩可锁定任意一个小环，以此调节腰带的松紧。设计巧妙，制作十分精美。

青，四品以上官员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在中国古代社会，无官位的百姓，只能穿黑、白布制的衣服，因而称布衣之士或白衣之士。除了公服颜色，腰间所系之带和所佩之鱼符袋也是表明身份品级的重要标志。按照宋制，四品以上高级官员方能束金带，四品以下官员只能系银、通犀带。小吏和庶民只能系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材料制成的带。带铐上的纹饰又有毬路、荔枝、师蛮、海捷、宝藏几种，“毬文四方五团带”专授宗室亲王、宰相执政等，一般官员不敢期望。宋徽宗时，宠臣蔡京得授太师，方得赐排方玉带。对于许多人来说，官至三品，能得赐“御仙花排方带”，即后来俗称的荔枝纹金带，已是莫大的荣耀。鱼符原为官员出入宫禁的符牌，佩于腰间，逐渐也演化为身份贵贱的一种标志。鱼符以不同颜色纹饰的袋子盛着，三品以上可佩金色鱼袋。韩愈诗中“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宋代沿袭了唐代制度，六品以上官

员均有资格佩鱼袋。虽说服绯紫佩鱼袋都是朝廷命官的章服，但腰间的颜色依然能显示出官品的高低，衣绯者鱼袋以银饰之，衣紫者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方能以金饰之。因而

《大驾卤簿图》(局部，文官)

北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服紫金”就成了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理想。

宋仁宗时，四十六岁才登科的知制造燕肃作《陈情诗》给当时的宰相，诗云：“鬓边今日白，腰下何日黄？”宰相一看便明白了。按宋代制度，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始赐金带，燕肃已做待制十年，而待制只能系黑色犀带。宰相动了恻隐之心，在其建议下，燕肃终于在六十多岁时升直学士，得束金带。南宋诗人陆游描述说，国初士大夫相遇，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指的就是穿着绯紫色公服的官员虽多，但能得赐金带、佩金鱼袋，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三、从《戒石铭》到《文臣七条》

在官僚社会中，各级官吏代天子而行王权，以人治为主，以法治为辅。为了对各级

官员进行有效监督，朝廷除了制定相关的律例条规外，还在中央政府专设有御史台和谏院两个监察机构，在州县衙署设有通判，可参劾同级和上级官员，均直接向皇帝负责。当然更为直接的警示是由帝王给臣下所作的训诫。

南宋人洪迈所撰《容斋随笔》有一篇《宋太宗〈戒石铭〉》，记述了宋太宗亲自书写十六字《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令各郡县刻在碑上，立于衙署厅堂正南。《戒石铭》的铭文出自五代蜀主孟昶的《令箴》，原文二十四句：“腾念赤子，吁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意，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宋太宗从中摘出四句十六字，使这一警示更加简练凝重，表达出宋初帝王对五代军阀酷吏向百姓横征暴敛终致覆亡这一历史教训的深刻反省。民为立国之本，要保社稷苍生的平安，各级官吏必须懂得官为民养的道理。若不恤民情，欺虐百姓，就是在肆意毁坏朝廷赖以生存的基石，终究难逃惩处。这篇著名的《戒石铭》自宋太宗之后，曾多次被后代帝王和名臣书写石上，由黄庭坚手书的太宗御制《戒石铭》，还在南宋时重新颂刻于各郡县。直到近代，不少州县衙署还矗立着刻有《戒石铭》的高大石碑。1990年冬，河南省卢氏县县署旧址就出土了一块黄庭坚手书的《戒石铭》石碑，碑高139厘米，宽57厘米，厚17厘米。《戒石铭》的重新露面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为了保护这一珍贵文物，同时也为了警示今人，修整之后的石碑被安放在卢氏县政府办公楼厅前。

《戒石铭》（拓片）



除了《戒石铭》在河南等地出土了原石，在山西新绛古州衙还保存有另一块宋代石碑，上面刻写的是宋真宗所撰《文臣七条》，这是另一篇宋代帝王对臣子的训诫。碑文如下：“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贵实。谓专求实效，勿竞虚誉。五曰名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这块石碑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知绛州时恪所刻，碑高116厘米，宽70厘米。由于碑文是告诫官员要清正廉洁，爱民务实，当地人称此碑为廉正碑。为昭示后人，1984年当地政府将《文臣七条》石碑重新镶嵌在绛州大堂内壁上。

如果认真比较《戒石铭》和《文臣七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帝王劝诫官员的口吻是很不一样的。在宋太宗书写的《戒石铭》里，透着一股杀气，这十六个字，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地责令地方官员不得怠懈职守，不要忘了百姓的疾苦和皇帝的重托，那句“上天难欺”，足以令贪官污吏胆战心惊。的确，北宋初年，对贪赃枉法者的惩处极为严厉。史载，宋太祖在位的十七年间，不断有赃官被处以“弃市”，即拉到大街上砍头；宋太宗曾将多名官员“杖杀”。按照《皇宋刑统》的规定，现任官员受财而枉法者，受一尺，杖一百；受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绞。如此严厉的律法，使得官员在伸手索拿国家、百姓财物之时，都不能不想起太祖、太宗酷爱使用的屠刀和杖棒。宋代开国皇帝乃行伍出身，不懂得道德感化之类，他们相信金钱和屠刀的效力。为约束官吏，将贪赃枉法的比例降至最低，他们一方面予以厚俸，

另一方面对犯赃者严惩不贷。宋朝第三代帝王宋真宗所撰的《文臣七条》，口气就和缓多了，文字显得空洞。清心、奉公、修德、贵实、名察、劝课、革弊七条的中心是“修德”，即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然而，几乎与倡导清心、奉公、修德同时出现的，是宋朝的法纪松弛，官场循默，苟且、姑息之风日盛一日，贪污腐化愈演愈烈。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描述说：“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符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宋仁宗时，宣徽南院使、南京（今河南洛阳）留守郭承祐随意决配士

《文臣七条》（拓片）



兵和百姓，害死多条人命，御史包拯等人数次上书论列其罪，皇帝仅将他降为许州（今河南许昌）部署；太常少卿任弁在做知州时，让一百一十六名士兵给他织驼绒毯子，又动用官府杂工织绸绢一千六百匹，被揭发出来后，按律当免职，可朝廷的判罚仅是罚铜十斤。据史书记载，在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里，“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有司断狱，或事连权倖，多以中旨释之”。宋徽宗即位之后，出于对特权阶层的关照，干脆将有关律令条文也作了修改，规定，在官犯罪，去官勿论，明确表示官员的乌纱可以抵罪。实际上更多的官员即使犯了事、贪了赃，依旧仕途通达。徽宗的宠臣蔡京家中堆满了各地官员进奉的土特产，“黄雀鲋自地积至栋者三楹”。当时人为发泄对官场腐败的愤恨，甚至将宋太宗《戒石铭》作了修改：“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脂民膏，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包拯像



四、清官包拯

中国历朝都设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宋代承袭唐代制度，在中央政府设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负责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宋代帝王重视言路，允许御史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并可“风闻”举劾（即在不掌握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传言就能弹劾）。谏院原为向皇帝进谏的机构，宋真宗以后，“台、谏合流”，御史可上言朝政，谏官可参劾百官，其权位之重不言而喻。宋代不少著名人士都曾出任过御史台和谏院的长官，但能够名传千古，为普通百姓家喻户晓的只有一位——包拯。

包拯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知天长县（今属安徽）、知端州（今广东高要），在庆历三年（1043）担任监察御史，后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1052）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嘉祐元年（1056）知江宁府，不久又升权知开封府，后迁权御史中丞。嘉祐四年任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任枢密副使。同年去世。

包拯为官清正，不徇私情，《宋史·包拯传》形容他：“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在家乡庐州任知州时，他的一个从舅犯了法，包拯于公堂之上将其杖责。后来他出知端州，端州以产砚著名，他上任伊始就革除了前任增加的“贡砚”数额，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包拯知开封府期间，治政刚严，不畏权贵。京师惠民河多年淤塞，遇到大雨就排泄不畅，包拯查明原因在于不少势家大户沿河道修建园第，立即要这些人将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其中有座横跨河堤的亭

榭，是宫中一位很有身份的宦官修的，这名宦官拿出了地契，想蒙混过去，包拯发现他私自增加面积，便毫不留情地向皇帝参劾。包拯对犯在他手上的高官贵戚决不手软，但对普通百姓则给予方便，过去百姓诉状不许入府衙大门，包拯一改旧例，允许诉讼者径到大堂自陈曲直。包拯知开封府一年，吏民畏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连街巷童稚、妇女都知道他的名字，京师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极为憎恶那些靠着裙带关系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的人。皇祐二年（1050）六月，他在任知谏院时，与同僚一起弹劾张尧佐。张尧佐是宋仁宗的宠妃张氏父亲的从兄，因张贵妃的关系，他官运亨通，担任了掌管财政的三司使。包拯上奏皇帝说，张尧佐乃凡庸之辈，靠着与后宫沾亲带旧，骤升显贵，根本不懂政务，“是非倒置，职业都忘，诸路不胜其诛求，……而尧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迫于舆论，仁宗免去张尧佐三司使一职，但为了安慰他，改命为宣徽南院使、淮

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次日又加同群牧制置使，并赐张尧佐的两个儿子进士出身。张尧佐摇身一变，又身兼四使，此制书一发布，朝野哗然。包拯再上《弹张尧佐》奏，词语异常激烈，称张尧佐无功受禄，不知羞耻，“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在台谏及朝野舆论的一致声讨下，宋仁宗迫不得已，免去张尧佐的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两官。过了一段时间，宋仁宗耐不住张贵妃的枕边唠叨，又起复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包拯不顾皇帝先前的警告，与其他官员再次上书极谏。包拯为了说服宋仁宗，多次上殿争辩。一天下朝，宋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张尧佐说话。宋仁宗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包拯一生廉洁自律，他曾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之名，在当时就远播海内外。吴奎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



包孝肃公墓园

位于安徽合肥包河南畔。包拯病逝次年，被安葬在故里庐州合肥城东公城乡（今合肥东郊大兴集）。南宋时，包拯墓园曾遭到严重破坏。1973年考古工作者对包拯墓进行清理发掘，出土包拯及其夫人、儿子、儿媳、孙子等六人墓志和部分陪葬品。1985年至1987年当地政府重建包公墓园。

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包拯去世后，有关他的事迹被编写成戏曲小说，流传至今。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刻有一百八十三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独不见包拯之名，据说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经常用手指点其名，经过数百年，包拯二字竟被磨平了。

包拯死后，被安葬在家乡庐州公城乡，即今合肥东郊大兴集。1973年文物考古部门对包拯及其亲属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包拯遗骨及部分陪葬品，并发现了包拯墓志。1985年合肥市人民政府根据各界民众的愿望，重建包拯墓园，历经二年建成，每年前往参观祭奠者络绎不绝。

五、官家和官人

在以当官为荣的宋王朝，“官本位”的思想不仅弥漫在官场，也浸润于全社会。非常

有意思的是，连皇帝在宫中也常被呼作“官家”。据北宋《湘山野录》的解释：“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看来宋代皇帝对这种称呼感觉十分荣耀。

“官家”之称，确实绝妙。皇帝管官，官管百姓，恰恰体现了当时社会专制集权的特点。官位即是权力、荣誉、利益的象征，难怪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大都认定官称才是对人的尊称。于是在宋代，皇帝自封为“官家”，小吏被呼为“官人”，富豪被称为“员外”，巫师卜祝唤作“助教”、“巡官”，看病的医生则谓之“郎中”、“大夫”，在茶坊酒肆跑堂的叫做“博士”，甚至在东京的娼妓也不知从何时起一律被封授了“录事”的头衔，以至连妓院较集中的小巷也改名为录事巷了。当时的已婚男子很觉骄傲，因为不管做官与否，回到家中，妻子都要尊称丈夫为“相公”或“官人”。

到宋代第八代“官家”宋徽宗在位时，朝廷出了一位最大的“相公”和“官人”，这就

《中秋诗》

宋徽宗书



是徽宗的亲家蔡京。蔡京四人中书为相，是位真正的“相公”，不过到了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朝廷内外已不再称他为相公，而是改称“公相”，因为年届八十的蔡京此时已被授予鲁国公兼太宰，总领三省了。蔡京对国家的“贡献”不止于编制和书写《元祐党籍》碑，他还为朝廷“理财”，搜刮了财富，并投皇帝所好，发明了“花石纲”。作为王安石的传人，蔡京不认为国用不足与“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存在必然联系，他更相信国家的“增收”与百姓的“节支”是相辅相成的。为此，他制定的几项措施，都打民众的主意。首先是恢复榷茶法，将茶叶列为官府专卖品，禁止商人与茶农私下贸易，由官府设置茶场。四年后又宣布解禁，允许商贩向种茶户买茶贩卖，但须由官府发给茶引。经他来回变更茶法，到政和元年（1111），朝廷每年仅茶税一项就收入四百余万贯。接着是变更盐法，规定陕西旧盐钞换东南新盐钞，新钞折钱三分，旧钞折钱七分。盐钞之法方通行天下，忽然下令改易，所有旧钞都成了废纸。盐商纷纷叫苦不迭，昨日还是巨富，今日便成了乞丐。而朝廷的榷盐收入，增加了上千万贯。

宋徽宗对蔡京的“理财”成果非常赞赏，因为这些新增的财税大部分转为内廷供奉所用。据统计，各路每年向朝廷上供的数额，经过蔡京的一番料理，已比变法前增加了十几

倍。蔡京还指令亲信将每年采买东南粮米的大部分本钱，移作上供。宋徽宗喜好书画古物，各地官员争先恐后地搜罗进贡，引发了遍及全国的盗墓风潮；徽宗还喜爱奇花异石，于是由童贯和朱勔先后领衔的苏杭应奉局在江南成立。“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大批形态怪异的木石被装载上船，每十船编为一“纲”，号曰“花石纲”，向京师运送，一路上，凿河拆桥，毁堰拆闸。徽宗在皇城东北建起一座周围十余里的艮岳，存放搜刮来的各种珍宝。宋徽宗比封禅泰山的宋真宗还要笃信道教，他不仅广修道观，还在自己的皇帝称号前加上了“教主道君”四个字，并给天下道士授了官。徽宗及其宠臣蔡京、童贯等极尽奢靡，蔡京的太师府宅在皇城西南，“极天下土木之工”，蔡京做寿，各地官员纷纷呈进礼物，号称“生辰纲”。宦官童贯被抄家时，家中积存的胡椒珠竟有八百斛。朱勔在苏州有多处园第，又广占良田，每年收租十多万石。宰相何执中在京师开设邸店，“日掠百二十贯”。另一位宰相王黼公开受贿卖官，当时盛传京师的民谣是：“五百索，直秘阁；三百贯，直通判。”宋徽宗在位期间，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加剧，激起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尽管农民起义相继被平息，但极大地削弱了国力，最终导致了亡国悲剧。

第三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1125年至1127年，金相继攻灭辽和北宋，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赵宋王朝迁都杭州，史称南宋。南宋建立之初，金军多次南侵，遭到宋军民的顽强抵抗，1141年，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形成了长期对峙局面。1234年和1279年，金、南宋先后被蒙古所灭。

第一节 女真的兴起和北宋的灭亡

女真族是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之一。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各部，于1115年建立了金政权，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1125年，金灭辽，同年进犯中原，宋朝军民顽强抵抗。1127年，京师开封失守，北宋灭亡。

一、女真的兴起和建国

女真族是居住在黑龙江流域黑水靺鞨的后裔，其先祖可追溯到先秦时的肃慎、汉魏时的挹娄和勿吉、隋唐时的靺鞨，契丹建国后，转译为女直或女真。辽太宗天显三年（928），渤海人南迁，女真人进入渤海故地，并与原地居民杂处，相互通婚，逐渐融合，因而在辽和北宋文献中所称的女真，实际泛指居住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一带的各族。其中，南迁至辽阳以南的女真被编入辽户籍，称之为“熟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小城子）东北的女真人，也在辽统治之下，但不编入户籍，各部族向辽缴纳马匹等贡品，被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原处于父系氏族社会，以渔猎游牧为生。到11世纪，农业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女真进入奴隶制社会。辽兴宗

时(1031—1054),定居于安出虎水(今黑龙江阿什河)的女真完颜部发展成为最强大的部落。完颜部联合其他部落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乌古迺被辽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乌古迺及其子劄里钵经过多年战争,巩固了部落联盟。辽道宗时,颇剌淑、盈歌、乌雅束先后继任联盟长,其间完颜部击败另外三个部落联盟,形成女真惟一的部落联盟。辽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劄里钵次子完颜旻继位为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六月,被辽任命为节度使。

完颜旻即金太祖阿骨打,他曾协助父兄平定内乱,征讨纥石烈部,屡建战功。他在继任联盟长后,察觉到辽内部虚弱,遂于天庆四年(1114)率女真兵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攻克宁江州。辽天祚帝派都统萧讹里等率步骑十万人征讨女真,两军会战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女真将士仅三千七百人,但在阿骨打的指挥下,一举击溃辽军,俘获许多俘虏,兵力扩充到万人。此后又连续攻克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祥州(今吉林农安境)、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镇)。阿骨打于1115年夏历正月,仿汉族制度称皇帝,建国大金,年号收国,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同年阿骨打率兵攻克辽东北重镇黄龙府,又击败辽天祚帝亲自统率的辽军。次年,攻占辽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天辅四年至六年(1120—1122),阿骨打先后攻占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天祚帝逃入夹山。金兵乘胜南下,将进攻目标指向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二、海上之盟

女真族在东北兴起之际,北宋王朝正处



列鞞

1973年黑龙江绥滨中兴金墓出土

全长37.7厘米

这是女真贵族腰间佩带的豪华饰物。出土时由数层丝绸包裹,上部为一鍍金银盒,子母扣。银盒两侧各有一串玛瑙珠,大部分呈椭圆形。底有黄金叶托。银盒下方以黄色丝线缀一多面体水晶球,球两端有鍍金银花托。以下又有一个椭圆形玉球,球下为两片长方形玉条,两端各有一孔,玉条下为一棱形玉块。最下部为十五个红玛瑙珠。银盒下还缀有长方形金饰,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缠枝花图案,内镶两块红玛瑙。用料考究,做工精细,是金朝中晚期的手工艺精品。

于宋徽宗、蔡京、童贯的腐朽统治时期。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宋朝君臣还沉醉于由自己构建的“丰亨豫大”的天梦之中,幻想着击败辽军,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祖宗的宿愿。因而当政和元年(1111)一个名叫马植的辽人被童贯带到开封,向宋朝献上联金灭辽之策后,立即引起宋徽宗的重视,他先后数次派使臣从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渡海到辽东与女真谈判联合攻辽之事。至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1120),双方经多次往来协商,约定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攻辽,宋出兵攻取辽南京析津府,金出兵进攻辽中京大定府

《听琴图》中的宋徽宗

传为宋徽宗赵佶所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绢本设色

纵147.2厘米，横51.3厘米



蹴鞠纹铜镜

传世品

直径10.6厘米，边厚0.6厘米
圆形，有钮。这面铜镜的背面图案描绘了几个人在草坪上踢球的场面。左下方一人衣袖飘扬，一腿略略抬起，球颠荡在其足尖之上，旁边几个人注视着踢球者的动作，跃跃欲试，正准备接球。画面充满了动感。

(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辽灭亡之后，燕云地区归宋，宋则将每年纳于辽的岁币转纳于金，这个不怎么光彩的结盟谈判被称为“海上之盟”。

金军依仗自己的实力，顺利击溃辽军，



先后夺取了辽中京、西京等重要城市。而长年养尊处优的宋军将士在统帅童贯、副统帅蔡攸的率领下，几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都被辽守军打得大败。童贯为逃脱败军之责，秘密遣使到金营，请求金军攻打燕京。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金太祖阿骨打亲率大军一举攻克辽南京。由于宋未能履约，金要求宋每年纳岁币五十万之外，另付一百万贯作为“燕京代租钱”。宋朝君臣认为能将燕云收回，已是光耀史册的旷世奇功，对金的要求无不答应。宣和五年（1123），金将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燕京已是一座空城，城中财物尽被劫掠，居民大部分也被金人当作奴隶掳走，宋接收官员看到的是一派“城市邱墟、狐狸穴处”的残破景象。但这并不影响腐朽统治者的自吹自擂。童贯上《复燕奏》，称屡战屡败的宋军居然是“凯旋还师”。宋徽宗不仅将童贯封赐王位，给王黼、蔡攸等人也晋了官。朝廷专门建立“复燕云碑”以纪功。当战争的烟云散去，宋朝的党争重又开战，太宰（右相）王黼与少宰李邦彦（左相）等相互倾轧，引起宋徽宗的厌烦，于是年近八十的蔡京再次出山，总领政事，由幼子蔡絛协助，白时中、李邦彦分别为太宰、少宰。一年后，蔡攸又与童贯、白时中、李邦彦等人合谋攻击蔡絛擅权，蔡京再次被罢官。北宋王朝在面临新的疆土危机的形势下，统治者却毫无察觉，依旧醉生梦死，内斗不已，直待强悍的外敌兵临城下。

金太祖在攻克燕京之后，于天辅七年（宋宣和五年，1123）病逝于返回东北的途中，其弟完颜晟（吴乞买）继承皇位，是为金太宗。天会三年（宋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金军俘获辽天祚帝，辽灭亡。金太宗将进攻的目标转向宋，借口宋朝屡次“招纳

叛亡”，有背盟约，于当年十月分东西两路进犯宋北部疆域，西路军以宗翰（粘罕）为统帅，自云州（今山西大同）南攻太原；东路军由宗望（斡离不）率领，直取燕京。

三、东京保卫战

宋朝从金人手中赎回燕京后，改燕山府，又设燕山府路，管辖燕云地区，领枢密院事童贯兼河北、燕山宣抚使。当金军南下的消息传来，正在太原的童贯却逃回开封。金西路军连克朔州（今山西朔州）、武州（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山西忻州），直达太原城下。太原军民在知府张孝纯、副总管王禀的率领下，顽强抵御，坚守太原长达九个月。由金太祖之子宗望率领的东路军先后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逼近燕山，宋守将郭药师率军迎战，在白河（今北京通州东）被金军击溃，郭药师献城投降。金军在郭药师带领下，直趋中原。

宋徽宗听到金军南下占领燕京、围困太原的消息，开始还摆出一副迎敌的姿态，罢除花石纲及内外制造局，下罪己诏，令各地起兵勤王，并以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实际是想让太子“监国”，自己逃往南方。在给事中吴敏、太常少卿李纲的坚持下，徽宗不得已于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传位太子。赵桓即位，改元靖康，是为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的消息传到京师，已成为道君太上皇的宋徽宗带领宠臣蔡攸等人连夜南逃，童贯、高俅、蔡京等也以“扈从”的名义紧随其后而去。

宋徽宗逃走的当天，宋钦宗宣布“亲征”，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后又任命其为亲征行营使。正月初七，金军到达东京城外，城内军民在李纲的率领下，打退



李纲像

金军的多次进攻。金派使臣前来，要求宋遣亲王、宰相到军前议和。宋钦宗派李纲为使臣前往金营。宗望对李纲说：“今若议和，当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表缎百万匹，尊金帝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在汉者，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而以宰相、亲王为质，送大军过河，乃退耳。”李纲等回奏后，宰相李邦彦、张邦昌都劝宋钦宗答应金的退兵条件。宋钦宗命刮借都城金银，甚至连倡优家财都在搜刮之列，仅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李纲说：“金人所需金币，竭天下之财尚且不足，何况都城！三镇乃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他建议，先与金人谈判，待大兵四集，孤军深入的金军必不敢久留，再谈和议，条件就不会这样苛刻。李邦彦等却说：“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镇？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宋钦宗同意议和，于是派康王赵构（徽宗第九子）为军前计议使，宰相张邦昌为副使，带三镇地图，至金营签署誓书。

就在宋钦宗竭力谋和退兵之际，陕西等地的二十多万“勤王兵”在种师道、姚平仲等人率领下，已云集开封周围，而南下的金

李纲铜

传世品

福建省博物馆藏

通长96.5厘米,总重4500克;
鞘长76厘米,重900克;铜
长94.2厘米,直径3.3厘米,
重3600克;铜身长74.1厘米,
铜柄长20.1厘米。

铜身为钢铁铸造,有四棱,
铜柄套花梨木,柄首呈瓜
形,近首处有系带穿孔。铜
鞘以圆形红木制成,表面阴
刻对称银饰花卉、蝙蝠、古
磬等图案,鞘口及末端包镶
铜边,中部箍铜佩璲两道。铜
棱阴刻篆书“靖康元年李纲
制”,字体嵌金,清晰醒目。



军不到六万人。种师道入城见宋钦宗,反对割让三镇,请求“于城内扎营,而城上严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师”。宋钦宗却说“业已讲和”。李纲建议在黄河渡口设兵把守,绝金军粮道,以重兵临敌营,待金兵粮尽力疲,派人取回割让三镇的誓书,放其北归,待敌兵半渡黄河时予以袭击;种师道也认为不可急战,上奏说到春分再袭击金军。但宋钦宗毫无主见。二月初一,他同意姚平仲夜袭敌营,被金军击败。宗望召宋使责问,并派使入城,要求换其他亲王为质。李邦彦对金使说:“用兵乃李纲、姚平仲的主张,非朝廷之意。”为安抚金人,宋钦宗罢免李纲,撤销亲征行营司,派使臣到金营谢罪。李纲被罢的消息传出,东京全城群情激愤,太学生陈东等上万人聚集在宣德门外请愿,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李邦彦等人。愤怒的群众砸碎登闻鼓,前来宣御旨的太监也被打死数十人,直到宋钦宗迫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守御使,又让种师道入城与群众见面,请愿者方才散去。李纲复职后,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守军欢呼雀跃,攻城的金军稍稍引退。

由于金西路军在太原受阻,孤军深入的东路军虽挺进中原,但宋勤王之兵络绎不绝进驻开封。在这种形势下,宗望不得不考虑撤兵,而宋钦宗改派三弟肃王赵枢和新任命的首相张邦昌为人质,同意割让三镇,基本

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二月十日,东路金军不等宋人筹齐金银数额即开始北撤,东京解围。

四、靖康耻

东京被围时,退位的宋徽宗带着蔡攸、童贯等人逃到镇江,以太上皇帝圣旨,截留东南地区发往京城报告和纲运物资,并阻挠“勤王”援兵北上,妄图继续把持东南各路军政和财政,在局势稳定后重新上台。宋钦宗对此极为警惕。宋钦宗即位之初,太学生陈东上书,指斥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为误国之“六贼”,要求将其“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钦宗为安抚民心,首先将企图拥立郗王赵楷为帝的王黼贬官,并秘密处死,将李彦赐死抄家,将朱勔放归田里,后又以“朋附”王黼之名,将梁师成处死。靖康元年(1126)二月十七日,宋钦宗得到金军渡河北去的消息,第二天就下诏将跟随宋徽宗南逃的蔡京、童贯、蔡攸贬官。宋徽宗被迫给宋钦宗写密信,表示回开封后“甘心守道,乐处闲寂”,不再“窥伺旧职”。同年秋,宋钦宗将蔡京、蔡攸、童贯等流放岭南,蔡京在奔赴贬所的路上病死,蔡攸、童贯、朱勔等相继被处死。

金军退兵时,尽管宋钦宗下诏割让三镇,但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军民拒绝接受割地诏书,金军只能继续围困太原,主力分

别退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和燕京(今北京)。宋钦宗在李纲等建议下,于二月中旬废除割地协议。宋将姚古、种师中率军队北上,收复许多城池,但种师中在榆次被金军合围,力战而死。金兵乘胜又击败姚古,支援京师的陕西军队损失很大。六月,宋钦宗任命李纲替代退休的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进兵解太原之围,但只给一万二千人的部队。李纲在七月赴两河,招募兵士训练,修整器甲,但朝廷却下诏解散新募之兵,到了九月,又将李纲等主战派贬官。宋钦宗打算以缴纳代税钱的方式“赎回”三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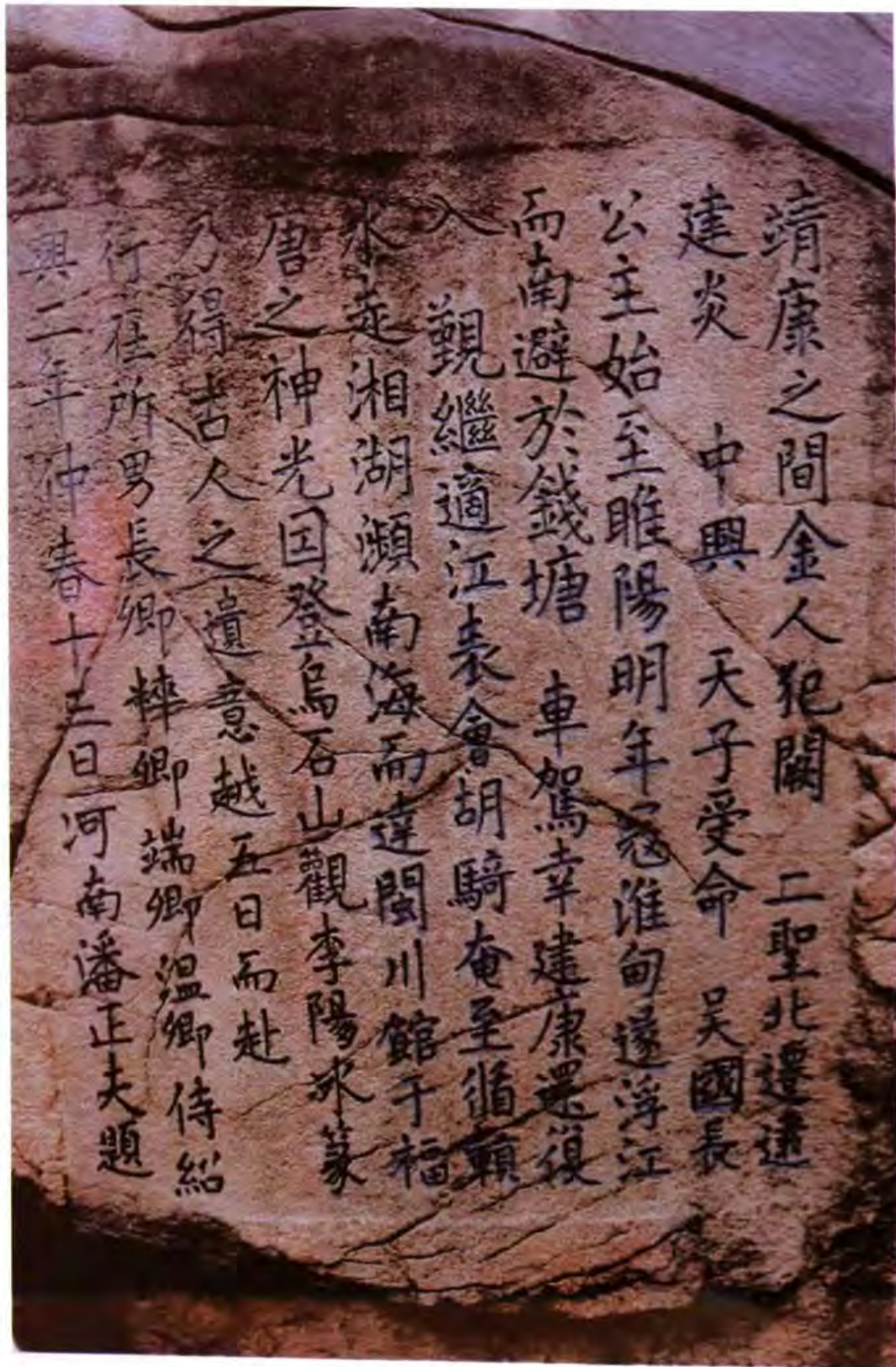
这年八月,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为由,命宗望、宗翰分率东西路军第二次侵宋。太原军民在王禀率领下已坚守八个多月,断粮多日,军民以树皮、草筋为食,终于在九月三日被金军攻入城中,王禀率军民巷战,最后投水自尽。十月初,真定府也在被围四十天后陷落。两路金军迅速南下,宋钦宗急忙派出康王赵构为割地请和使、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前往求和。赵构等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被知州宗泽留下,王云则被当地百姓认作奸细打死。这时,东路金军已经渡过黄河南下。

金军大举进犯前夕,老将种师道檄召四道总管司中的南道总管和西道的陕西制置使率部勤王,保卫京师。当南道总管张叔夜和陕西制置使钱盖率军前来拱卫,朝廷竟以议和使已出发、不必聚兵为由,将两道军队遣归。东路金军渡过黄河后,派使到开封,提出划黄河为界,割让河东、河北之地,宋钦宗立即同意,于十一月派专使耿南仲、聂昌分别前往两路金军营前,商议割地求和。耿南仲与金使来到卫州,乡兵要杀金使,金使逃走。耿南仲前往相州见康王赵构,称奉旨意要康王尽起河北诸郡兵勤王。聂昌持诏书

到绛州城下,为守军所杀。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东路军到达开封城下,不久西路军也到,开始攻城。由于宋援军被遣,城中只有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宋钦宗派人持蜡书出城召兵来援,却多被金人俘获。宋钦宗又听信邪说,任命士兵郭京为成忠郎,郭京自称能施六甲法,用 7777 人,可“生擒金二将而扫荡无余”。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开宣化门出战,神兵一败涂地,郭京逃走,金军乘势攻入京城。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踏雪出城,奉上降表,称:“背恩

记述靖康之难的福建鼓山石刻



致讨，远烦汗马之劳；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请。”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回城。金派官员进城，将皇城九十二个内藏库中的金银锦绣宝货封存，又遣使索要犒军绢一千万匹、金一百万锭、银一千万锭。宋朝廷再次下令大刮民间金银，因数额不足，搜刮金银的宋官员被杀，宋钦宗也被押至金营为人质。除搜刮金银绢帛，金军还将皇宫中的玉玺、仪仗、地图、乐器、祭器和图书文籍、珍宝古器全部掠走。

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二月六日，金太宗下诏废徽、钦二帝。三月七日，另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四月初一，金军带着已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和皇室宗族、大臣、内侍、百工、技艺、妇女、僧道、医卜、倡优等，以及掠夺的金银财物、仪仗法物返回东北，北宋王朝灭亡。

第二节 宋室南迁

1127年，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了南宋，1131年定都杭州。南宋建立之初，金军大举南侵，遭到宋朝军民的顽强抵御，宋军也多次北伐，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城池。1141年宋金订立和议，以淮河至大散关为界，形成长期对峙局面。南迁杭州的宋朝皇室为维护统治，赋予宰臣更多的权力，用以压制主战派，由此形成权臣迭起的情形。金朝迁都燕京后，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加速了民族的融合。

一、两河义军

开封第二次被围时，宋钦宗派人送出蜡书，任命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今河北定州）

陈遵为元帅，知相州汪伯彦、知磁州（今河北磁县）宗泽为副元帅，要他们领军援救。赵构只派宗泽打着大元帅的旗号南下开封，自己则会集河北各路兵马移师济州（今山东巨野）。三月，传来金军北撤、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的消息，宗泽等人劝赵构称帝，延续宋祚，赵构遂前往南京应天府。张邦昌自知其伪政权不能长久，在金军撤离开封后，迎宋哲宗元祐皇后孟氏入居延福宫，请其垂帘听政，并在四月十日宣布退位。元祐皇后孟氏下手诏要赵构即位，并派人送去“大宋受命宝”。靖康二年五月一日（1127年6月12日），赵构在南京即皇帝位，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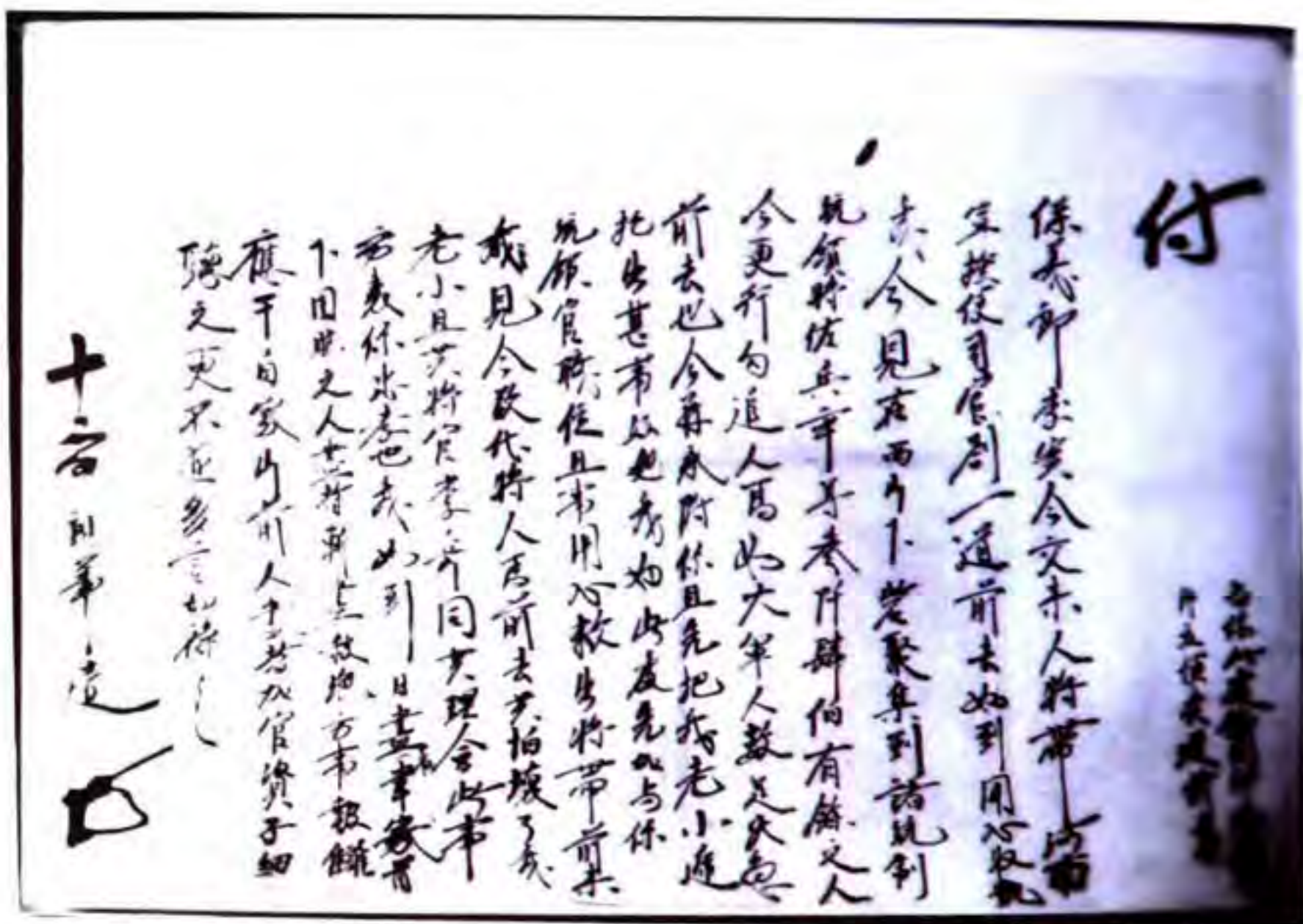
宋高宗即位后，尊哲宗皇后孟氏为隆祐太后，任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后来在孟太后的督促下，高宗任命主战的李纲为右相。李纲提出罢和备战，收复两河，并举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东京留守，召抗金义军。李纲和宗泽请宋高宗回开封，称“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但惧怕战争的宋高宗一意思逃往南方。八月，他罢免了任相仅七十五天的李纲，撤销了河东经制使司和河北招抚使司，废除各项抗金措施。十月一日，宋高宗从南京应天府乘船南逃扬州。

北宋灭亡后，河东、河北多数州县尚未被金人占领，各地民众奋起抗击金军，有的是由当地民众自发组织的武装，还有些前往京师“勤王”的部队，在宋朝廷下令解散之后，留在北方继续抗击金军。一些抗金义军在宋主战官员的训练和指挥下，力量不断壮大，成为两河地区反抗金兵侵略的重要力量。最著名的有发起于河东的红巾军和活跃在河北的八字军、五马山寨义军。

河东民众和士兵在太原失守后奋起袭击金人占领的城镇，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巾军”。当地民众纷纷参加红巾军，队伍不断壮大，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组织严密，熟悉敌情，屡战屡胜。一次袭击金军大寨，几乎活捉金左副元帅宗翰。红巾军活动灵活，金军抓不到红巾军，就去杀害平民，结果造成更多的民众加入红巾军武装抗金的行列。1966年，在山西灵石绵山出土了有关河东义军的书信和委任劄子，共五件，内容记述了建炎二年河东义军与官军联手抵御金兵的活动。这些书信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抗金将领张所在被罢去河北招抚使一职后，其派遣的王彦已率领岳飞等十一员将领、七千士卒渡过黄河，后与金军主力遭遇，损失很大，残余的部队转入太行山区，联络两河豪杰，继续抗金。金人悬赏捉拿王彦，战士们为表示跟随他抗金的决心，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因而被称为“八字军”。八字军英勇杀敌，影响遍及两河，王彦与士兵同甘共苦，受到战士们的拥戴。各地义军纷纷加入，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十余万人前来归附，声称愿受王彦节制。八字军与金军多次交战，斩获敌兵无数，被金人视为心头之患。为剿灭八字军，金出动大军准备攻击其营寨，但首领不肯领命，跪地称：“王都统寨坚如铁石。”宗泽留守东京，联络各地义军，王彦受命率部前往开封，金军以重兵尾随其后，就是不敢发起攻击。

五马山在今河北赞皇，靖康元年(1126)冬，北宋武翼大夫赵邦杰到此组织义军，第二年，多次出使金朝的马扩也来到山寨。后来他们得知信王赵榛在被金人押解北上的途中逃走，于是迎其到山寨，奉为主将。因宋



皇室的缘故，五马山寨义军迅速扩张，发展到十余万人，在两河影响很大。建炎二年(1128)三月，马扩受命去见宋高宗，宋高宗任命赵榛为河外兵马大元帅。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山寨被金军攻破。

除了这几支规模较大的义军，在北宋末至南宋初，由各地农民、商人、僧道、士兵组成的各种名号的抗金武装和割据势力，建立的大小山寨水砦，如星火燎原，遍布黄河流域和淮河南北。宗泽任东京留守之后，积极与两河、陕西、京东义军联络，共同抗金，准备收复两河。当时，听命于宗泽的河北、河东义军纷纷南下，集结于开封周围，号称百万。正是有了这些武装力量，金军不敢轻举进犯。宗泽先后上疏二十余道，请宋高宗回京师开封，但都被黄潜善、汪伯彦扣留，决意屈从金人、放弃两河的宋高宗对宗泽的主张不屑一顾，却派了一名东京副留守，监视宗泽的举动。七十岁的宗泽忧愤成疾，于建炎二年七月病逝，死前还连呼三声“过河”。宗泽去世后，王彦将部队留在东京，自己率亲兵前往扬州，请命北伐，结果惹恼了欲漂泊南方的朝廷。宋高宗不予接见，让他充御营平寇统领，王彦不愿接受，称

河东义军书信

南宋

1966年山西灵石绵山出土
纵30厘米至60厘米，横24
厘米至44厘米

共五件。均用白麻纸书写，其中四件有建炎二年(1128)年款。信札内容相互关联。第一件为河东路都统制李武功授义军首领李实为进校尉的委任劄子；第二、三两件为统制武仪写给李实的书信；第四件为官劄，劄首有“都统河东路军以安抚使”印，内容是表彰李实攻破敌寨，并准备保举他转迁官职，劄尾钤官印二方，署建炎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五件为李武功拟升李实为成忠郎的官劄，未署日期，较前件晚十一天。这些书札，表现了南宋建立前后，河北、河东义军与官军联手，共同抵御金兵侵犯的史实。书札叙述的这些活动，与史籍记载的当时情况完全吻合。

《中兴四将图》

南宋

传刘松年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绢本设色

纵26厘米，横90.4厘米

南宋建立之初，金兵多次南下，宋朝军民进行了顽强抵御，遏止了金人的南犯，形成宋金长期对峙的局面。宋代史家称此为宋室的又一次“中兴”，并将这一时期战功卓著的韩世忠等四位将领赞为中兴四将，由翰林画家图绘为像。该画卷自右向左依次绘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四将，皆戴软巾，着窄袖长袍，腰系玉带。四将身后各立一名侍从，侍从着中长袍，以皮革围腰，足蹬长靴，或佩剑，或悬弓箭。四将身侧原有朱笔题款，已被擦去。清乾隆皇帝重新题名，墨书“刘鄜王光世”、“韩蕲王世忠”、“张循王俊”、“岳鄂王飞”，并在卷上题七律一首，下钤“比德”、“朗润”二印。画面上还有历代藏家印多方。

病退休。宋朝廷派杜充任东京留守，杜充性狠好杀，对宗泽的各项措施都反其道而行之，造成人心离散，开封周围的义军纷纷散去。

二、中兴四将

赵构在南京的称帝、张邦昌楚政权的自动消亡以及两河义军的反抗，使得金以新政权取代宋朝的打算全部落空，尤其是宗泽出任东京留守之时，将“出使”伪楚的使臣斩首，并招抚两河义军安营扎寨，与金军抗衡，义军的势力达至燕云地区，直接威胁到金朝的统治。天会五年（宋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金太宗下诏分三路南下攻宋，这是金建立后第三次大规模南下入侵，也是南宋建立后金军的首次南侵。

由宗翰率领的中路军，直袭中州古都洛阳，受到宋西京统制官翟进及其兄翟兴部队的抵抗，连遭败绩，作为宋西京的洛阳一度被收复；由宗辅、宗弼（兀术）率领的东路军，在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1128）一月

侵占今山东部分地区，也遭到梁山泊义军水师的抵抗；由娄室率领的西路军直袭长安，连陷陕西数州，鄜延经略使王庶招募各地义军万人顽强抵抗，由巩州人李彦仙领导的义兵多次击败金军，一个月连破金人五十多个营垒，金军占领的长安等城相继被宋军收复。义军在抵御金人入侵时所起的作用为世人瞩目，但却引起宋朝廷的猜忌，特别是一些义军以收复故土、迎回“二圣”为旗号，使刚刚即位的宋高宗如芒刺在背，下诏指责各地义军“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并将赴扬州请战的八字军首领王彦解除兵权。

建炎二年（1128）七月，金军调整部署，以西路军继续牵制宋陕西军队，东路军和中路军全力攻占中原，直袭南宋朝廷所在地扬州。接替宗泽为东京留守的杜充决黄河水，也未能阻挡金军南下。金军攻陷五马山寨，相继占领濮州、济南、徐州。建炎三年（1129）正月底，金军在占领徐州后，派五千骑兵奔袭扬州。二月初三日，高宗听到金兵距离扬州仅百余里的消息，大惊失色，连朝廷官员



也不通知，仅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宦官康履，一口气跑到瓜州渡口，乘一条小船，渡过长江，逃往镇江。朝廷百官闻知“圣驾已行”，相顾仓皇，连忙改穿服装，奔出城门。扬州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逃。金军进入扬州，掳掠一空，放火焚城后北撤。

高宗到镇江后，仍觉不够安全，召集陆续赶到的众大臣商议，最后在王渊的建议下逃往杭州。来到杭州后，宋高宗被迫下罪己诏，罢免了黄潜善、汪伯彦，改任朱胜非为相、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宦官康履自以为是康王府旧部，恃恩弄权，由他推荐的王渊毫无战功，只会随着高宗逃跑，却骤升太尉，众将领颇为不满。建炎三年三月四日，御营前军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发动兵变，杀死王渊和康履，逼迫宋高宗传位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昀，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正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的礼部侍郎张浚，会同驻守江宁（今江苏南京）的吕颐浩、驻守常熟的韩世忠、驻守镇江的刘光世和即将开赴陕西的张俊等起兵讨伐。四月初一，宋高宗恢

复了帝位。苗、刘兵败被俘处死。宋高宗任命吕颐浩为相，张浚知枢密院事。

建炎三年五月，宋高宗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高宗派洪皓为使节向金求和，结果被金扣留。八月又派京东转运判官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致书宗翰，奴颜卑膝地称：“古者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所以惴惴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但金军毫不理会宋高宗的摇尾乞怜，十月，以金太祖四子宗弼为主帅，十万金军分兵两路南下。十一月，宗弼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大败宋军，渡江直奔建康，主持建康防务的正是丢失了东京的杜充，他先是弃城逃跑，后来干脆率领三千军士投降了金人。宋高宗从建康逃到镇江，从镇江逃到常州，又从常州逃到杭州。金军渡过长江后，进逼杭州，宋高宗又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再从越州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最



后从明州逃到定海（今浙江舟山）。宗弼只派四千精兵，一路追击，如入无人之境，连克越州、定海。宋高宗实在无路可去，在吕颐浩的建议下，于十二月初，乘船入海，逃往温州。金军乘船追击三百里，遇上大风雨，只得撤回。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军撤兵北还，沿路烧杀抢掠，明州、杭州、平江、建康都被金人放火焚烧。

金军北撤前后，遭遇宋军的有力阻击，这就是后来被南宋王朝列入“中兴战功”的早期战役。而南宋初年四支大军的主帅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被称为“中兴四将”。

张俊是北宋末年入援京师“勤王”的陕西部队中的一名小校，曾随种师中进兵太原，种师中兵败后，张俊率数百人突围南逃，后归康王赵构的大元帅府，为中军统制。宋高宗即位后，张俊任御营前军统制。苗、刘

兵变之际，张俊率八千人前往平叛，因升节度使。建炎三年十一月，宋高宗逃到明州，时任浙东制置使的张俊率兵护驾。当年除夕，金军四千追兵抵达明州城下，张俊率所部与当地部队共同抗击，金军死伤千人。正月初二，金军又攻明州，张俊与知州刘洪道在城楼上指挥作战，杀伤大量金兵，直到宗弼派出援军再攻，明州才陷落。明州保卫战是南宋正规部队首次对抗金军进攻，虽只是小捷，但在金军势如破竹，“将帅皆望风奔溃”，江东、两湖、两浙城池连连失守的严峻形势下，已是鼓舞人心，因此后来被列为“中兴十三处战功”之首。

韩世忠也是出自陕西的将领，曾参加镇压方腊起义。金军围攻京城时，已升为统镇的韩世忠参与东京保卫战。北宋灭亡后，韩世忠也率部队到济州，拥戴赵构为帝。宋高宗即位后，韩世忠任御营左军统制。苗、刘兵变时，韩世忠率所部与张俊、刘光世的部队在秀州（今浙江嘉兴）会合，共同进入杭州，促成宋高宗复辟，韩世忠因功授武胜军节度使，升任御营使司都统制。金军占领建康后，韩世忠部队退至江阴。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兵主帅宗弼率主力北撤，韩世忠率所部八千士兵，乘百余艘船只，在镇江截断金兵退路。三月十五日，两军在长江展开水战，宋军“乘风使蓬，往来如飞”，韩妻梁红玉亲自击鼓，使金军渡江不成。宗弼提出，愿放弃所掠财物、人口，请求借道，被韩世忠拒绝。宗弼只好率军转入建康东北的黄天荡，韩世忠的船队将出口堵死，使金军被困。后来宗弼采纳一名汉奸的主意，连夜开往老鹳河故道，才逃脱出来，并放火箭焚烧韩世忠的船队。尽管韩世忠战败，但他以八千士兵阻十万金军四十八日，却成为南宋对金作战史上最成功的战例。四年多后，韩

宋高宗像



世忠再次从镇江出兵，大败金军于扬州大仪镇（今扬州西北），大仪之战被称为“中兴武功第一”。

刘光世是陕西名将刘延庆之子，北宋徽宗时曾随童贯、刘延庆进攻辽南京，刘光世未按部署如期攻城，致使攻辽失败，因此被降官。北宋灭亡后，刘光世率三千士兵前往济州，投奔康王赵构。宋高宗即位后，刘光世很快就升为奉国军节度使。当时很多将领都对宋高宗宠信的王渊、康履不满，惟独刘光世曲意逢迎。刘光世巴结有方，作战无术，他能被列在“中兴四将”之中，全凭其位置显赫。建炎三年，金军南下渡江，刘光世在江州主持防务，每天宴饮聚会，金兵未到就溃退南逃。后以行在五军制置使之职为宋高宗护驾，又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其部下士兵被称为“太尉兵”。在对金协同作战中，刘光世屡次不奉诏配合，因其资格老、军队多，一些部将也打过胜仗，虽然与“中兴十三处战功”毫不沾边儿，也被列入“中兴四将”，很多人对此不满，后以刘锜取代刘光世。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靖康元年（1126），二十岁的岳飞应募从军，为康王大元帅府刘浩部下。宋高宗即位后，岳飞越职上奏请求宋高宗回东京，被夺军职，于是他投奔到河北招抚使张所麾下，被任命为中军统领，隶属于都统制王彦。王彦渡河后组织“八字军”，岳飞则离队投东京留守宗泽，宗泽让岳飞率五百骑出战，以战功抵擅自离队之罪。岳飞大败敌兵而归，被升为统制。宗泽死后，杜充任东京留守，岳飞成为杜充的部下。建炎三年，岳飞随杜充到达建康，金军南下渡江，杜充弃城投降，岳飞率所部退守建康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建炎四年五月，岳飞对渡江北撤的金军发动进攻，金军溃败，被歼三千余人，岳飞与建康

府通判钱需一同收复建康城。岳飞因功被张俊荐为通泰镇抚使、知泰州。岳飞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其部队纪律严明，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因而深受民众爱戴，而金军为之畏惧。绍兴四年（1134）岳飞出兵北上，一举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今湖北襄阳）、唐州（今河南唐河）、随州（今湖北随州）、邓州（今河南邓州）、信阳（今河南信阳）六州，名声大振，三十二岁的岳飞被授为清远军节度使，成为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地位相当的将领，其部队也被称为“岳家军”。

由于宋朝将领的顽强抵御，遏止了金军大举进犯的势头，宋金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为南宋朝廷赢得了生存空间。南宋人称此为宋室的又一次“中兴”，并列出“中兴四将”和“中兴十三处战功”，由翰林画家图绘为像，由史家详细记录。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幅《中兴四将图》，传为南宋刘松年所绘。

三、川陕保卫战

就在以宗弼为主帅的金军南侵江浙、荆湖，逼迫宋高宗飘零海上的时候，由娄室率领的十万金兵，也在建炎四年（1130）正月攻陷了陕州，知州李彦仙拒绝金的招降，突围出城后投黄河自尽。同年七月，金太宗调宗弼率两万精兵增援陕西战场，以右副元帅宗辅统一指挥西路金军。宋朝则以三十三岁的知枢密院事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主持川陕防务。为减轻金军对江浙的压力，张浚在陕西主动出击，调集五路兵马，号称四十万人，东进富平（今陕西富平），与金军展开决战。

建炎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宋金两军在渭水以北会战。金军以土囊填平沼泽，出动骑

兵从左右两个方向夹击，宋各路军队分别迎敌。鏖战之中，刘锜亲率泾原路部队突袭敌阵，围住宗弼所率金兵，金军拼死突围才逃脱出去。战至午后，金军铁骑猛攻赵哲所率环庆路宋军，赵哲临阵退缩，致使宋军全阵溃散，粮草军资都为金军缴获。宋军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一线布防。富平之战后，陕西大部分州县被金军占领。

绍兴元年（1131）三月，金军进逼兴州，张浚退至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十月十日，金军主力在宗弼率领下进攻和尚原。和尚原位于大散关以东，为人川要道，宋秦凤经略使吴玠及其弟吴玠屯驻于此。金军造浮桥于渭水，垒石为城，吴玠命诸将坚守不出，“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箭矢如雨，敌兵不敢近前，待金军稍退，吴玠“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战斗延续三日，金军被迫后撤，宋军沿路截杀，又于山口设伏，大败金军，金主帅宗弼背中二箭，逃回燕山，其女婿、侄子都被宋军俘获。和尚原之战的胜利，守住了川陕最后一道防线，因此被列为“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三。吴玠在战后升任镇西军节度使、川陕宣抚处置司都统制。

绍兴三年（1133）正月，金主帅撒离喝绕开和尚原，率主力东进，击败宋王彦所率义军七千人，攻克金州（今陕西安康），进逼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利州路经略使、知兴元府刘子羽派人向吴玠求援。吴玠亲自领兵昼夜兼程三百里，赶到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与王彦的义军会合。金军没料到吴玠军队神速赶到，接连攻关六昼夜，吴玠指挥士兵弓弩乱发，大石摧压，金军死伤甚众。后金军得知饶风关后有小道相通，派敢死队绕到关后，自高处袭击宋军，饶风关失守，金军占领兴元府。刘子羽拒绝了金军的招降，

退守潭毒山。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于关右筑垒，号杀金坪。金军因伤亡过大，不久也撤回凤翔府（今陕西凤翔）。

绍兴四年（1134）二月，金军卷土重来，金统帅宗弼、撒离喝及伪齐刘夔率十万步骑进犯仙人关。吴玠派一万军队守杀金坪，吴玠领兵由七方关增援，转战七昼夜，与吴玠会合。金兵进攻关垒，架起云梯，宋将杨政以撞竿击碎云梯，用长矛刺杀攀登上来的敌兵。有将领请吴玠转移防守阵地，吴玠以刀划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兵身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命士兵轮番放箭，矢下如雨，阵前全是金兵的尸体。三月一日，撒离喝以火攻西北楼，正在楼上的宋统领姚仲用酒浇灭。吴玠派出统领田晟率士兵执长刀大斧先从左右掠阵，火炬照亮群山，鼓声震动大地。吴玠主力出击，统领王喜、王武率精锐士兵，分别打着紫色和白色旗帜杀人敌阵，金军不敌，四下溃逃。是夜，吴玠派五将分更劫营，金军大乱，死伤万人，只得撤退。统制张彦、王俊又在其归路设伏，再次打败金军。仙人关之战被列为“中兴十三处战功”之四。吴玠因功升川陕宣抚副使，领二镇（奉宁、保静）节度使。

吴玠在绍兴九年（1139）病逝于仙人关。其后，吴玠、杨政、郭浩，及吴玠长子吴玠、吴玠子吴玠相继镇守川陕，使金兵不敢轻易进犯。

四、绍兴和议

建炎四年（1130）七月，金在撤回北方的同时，立降金的原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国皇帝，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伪齐政权招降纳叛，大量吸收宋降官叛将，用以镇压抗金武装，侵蚀南宋州郡。

宋高宗在浙东漂泊数月后，于建炎四年四月回到越州，于次年改年号为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返回临安（今浙江杭州）。绍兴八年（1138）三月正式定都临安。

绍兴四年（1134）五月，岳飞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出兵，一举收复被伪齐占领的襄阳等六郡。刘豫十分惊慌。同年九月，宗弼率五万金兵配合伪齐南下，避开屯兵湖北的岳飞和把守川陕的吴玠，自泗州和楚州两地渡淮，威胁江东。宋高宗在宰相赵鼎的劝说下，亲征平江（今江苏苏州），并重新任命因富平之战失利被贬的张浚为知枢密院事，主持防务。十月，韩世忠在扬州西北大仪镇迎击金军骑兵，歼敌数百名。岳飞接张浚之命，派部将牛皋、徐庆进兵淮西，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击败金军。宗弼担心被岳家军阻断北归之路，加上传来金太宗病重的消息，遂连夜撤退。

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同年六月，他亲往两湖督战，派岳飞剿灭了洞庭湖上的杨么起义军。内乱已平，张浚认为是恢复中原的最好时机，便向宋高宗建议北伐刘豫。绍兴六年（1136）正月，张浚巡视前线，“命韩世忠据承、楚以图淮阳，命刘光世屯合肥以召北军，命张俊练兵建康、进驻盱眙，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以佐（张俊），命岳飞进屯襄阳以窥中原”。刘豫十分害怕，向金朝求救。这时，金太宗已在头年死去，金熙宗完颜亶刚刚继位，顾不上刘豫。刘豫只得倾巢而出，在这年九月，发兵三十万分三路南下。宋高宗也在同月北上建康，鼓舞诸军斗志。十月，宋将杨沂中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大败伪齐东路军，伪齐军撤回淮北。

金天会十五年（宋绍兴七年，1137）十

一月，金熙宗采纳首相宗磐（蒲鲁虎）、左副元帅完颜昌（挾懒）的建议，决定废除伪齐政权，将伪齐统治区交还宋朝，换取宋的臣服。宋高宗对此正求之不得，绍兴八年（1138）三月，宋高宗任命从金营逃回的投降派秦桧为右相，主持和议，并于十二月代高宗接受金朝诏书，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宋高宗、秦桧的投降活动引起朝廷内外的激烈反对。左相赵鼎反对以黄河新河为界，被出知绍兴府；枢密副使王庶反对议和，被出知潭州（今湖南长沙）；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主和大臣，称：“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以求活耶？”杭州民众将胡铨奏章刻版传诵，秦桧气急败坏，将胡铨贬至昭州（今广西平乐）。

但是，绍兴八年的和议未能持久。就在第二年，金发生内部争斗，主和的宗磐、完颜昌先后被处死，主战的宗弼升都元帅。宗弼反对把陕西、河南地交给宋朝，于天眷三



杭州岳庙中的岳飞塑像

岳王庙位于西湖栖霞岭南麓，南宋始建，现在的岳庙为按原样修复。庙内设有忠烈祠、启忠祠。忠烈祠岳飞彩塑像为20世纪重塑。

年（宋绍兴十年，1140）五月发动新的南侵。

宗弼率金军分四路南下，占领东京后，急速行军七日，抵达顺昌（今安徽阜阳）城下。宋将刘锜只有不到两万部队，但坚守城池，抗击三万金兵的四面围攻，白天以强弩射击，夜间出兵袭营。六月，宗弼率十万军队赶到，宋军在颍河水中和城外草上撒毒药，乘金军人马中毒之时，发兵直捣宗弼中军，大败金军。隔了一日，宗弼又派出身披重铠、头带双层头盔的“铁浮图”进攻东门，刘锜领兵出迎，宋军用枪揭去金兵盔，以刀斧劈砍其臂，经过一番恶战，金军死伤上万人，逃回东京。顺昌之战以少胜多，阻挡了金军的攻势，对稳定两淮起到关键作用。这一战役后被列为“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七。刘锜因功授武泰军节度使、沿淮制置使。同月，把守川陕的吴玠、杨政等经过艰苦作战，也击退由撒离喝率领的南下攻蜀的金军。

就在顺昌被围之时，宋高宗命岳飞率军出击，支援刘锜。岳飞于是领兵北伐，直入中原，先后占领陈州（今河南淮阳）、颍昌（今河南许昌）、郑州、洛阳。七月，在郾城（今河南郾师）与宗弼军激战，岳飞派其子岳云

率骑兵冲入敌阵，杀得金兵尸横遍野。又派出步兵，手执麻刀，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大破金军号称精锐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宗弼叹道：“自我起兵以来，未有如今日之败！”岳飞率军乘胜挺进，其先头部队已至东京城外的朱仙镇，却在一日之内接到朝廷的十二道金牌，诏岳飞撤至顺昌，岳飞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遂班师。此前，岳飞已经联络两河义军，待官军一到，各地揭竿而起，当岳飞回师时，百姓拦在马前，痛哭失声。一意乞和的宋高宗、秦桧再次将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葬送。

随着战事的持续，南宋军队有效地抵御住金军的多次进犯。在此形势下，宋高宗向金乞和的意愿更加强烈，因为只有与金达成和议，他方能偏安一隅，坐稳皇帝之位。如果继续作战，一方面被掠至金的宋钦宗可能重返帝位，另一方面会有统兵将帅势力扩张、难以驾御的危险。为此，他继续重用秦桧，由他出面迫害抗金将领，钳制主战言论，向金人讨好献媚。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宋高宗召三大将到临安，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撤销宣抚

岳飞墓

岳飞墓坐落于西湖北岸的栖霞岭下，原称岳坟。前立有“宋岳鄂王墓”墓碑碣，墓道两旁，立有石人、石羊、石马、石虎。岳飞墓对面列有秦桧夫妇等人铁铸跪像。墓园照壁两廊还建有碑廊，陈列着历代碑刻，北廊为岳飞诗词、奏札等手迹，南廊为历代名人的凭吊题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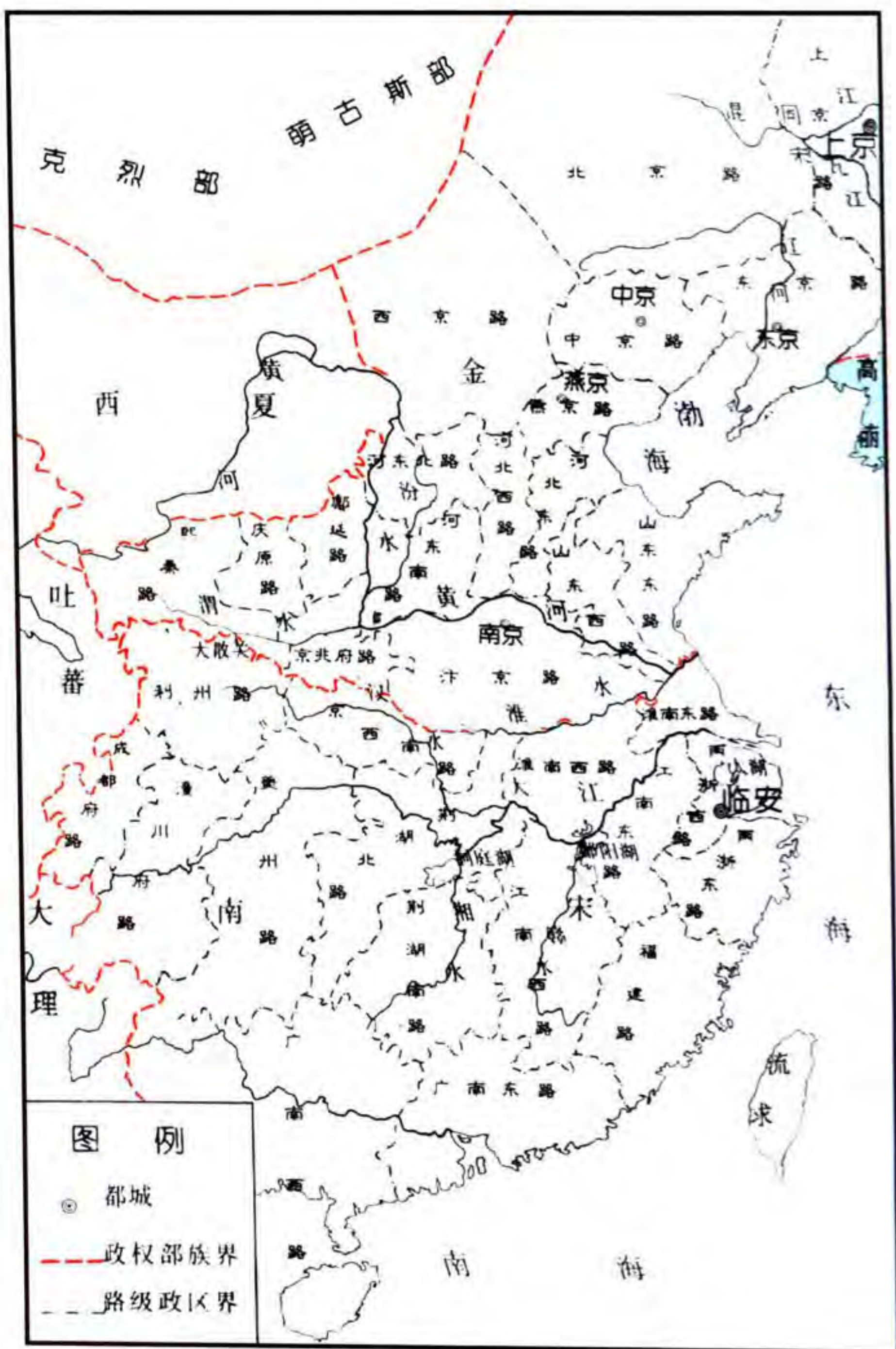


使司,收回他们的统兵权。秦桧勾结张俊,首先以谋反之名,逮捕了岳飞部将张宪,接着又编造“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的谎言,将岳飞及其子岳云投入大理寺狱,秦桧指使御史台和谏院罗织罪名,欲置岳飞于死地,以此警告朝中反对求和的文武官员。同年十二月,岳飞、岳云、张宪被处死。

就在著名抗金将领岳飞被害前一月,宋金达成和议:以东至淮河、西至大散关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绍兴和议的达成,基本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形成宋、金长期对峙的局面。

五、权臣当道

绍兴和议订立后,左相秦桧因“功”封太师、魏国公,不久又排挤掉枢密使张俊,此后独揽军政大权十几年。宋高宗如此重用秦桧,甚至不惜扩大相权,为的是用秦桧去压制反对和议的朝臣和将领,钳制舆论,巩固自己的统治。秦桧心领神会,采取各种手段排斥主战官员。他让御史奏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张浚被免节度使,发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居住。抗金名将刘锜也被解去兵权,出知荆州(今湖北荆州)。岳飞的部将牛皋则被秦桧的亲信在宴席中下毒害死。曾公开反对秦桧议和的赵鼎、王庶、李光,弹劾过秦桧的胡铨等再次被贬至边远地区,赵鼎、王庶都死于贬所。为控制舆论,秦桧大兴文字狱,凡写诗作文涉嫌讽刺和议的都被发配到外地编管。由秦桧之子秦熺主编的建炎至绍兴十二年的《日历》,肆意篡改史实,为秦桧本人歌功颂德,并严禁私撰史书。绍兴二十年(1150),一名叫施全的军校行刺秦桧未遂,被秦桧处以磔刑,此后秦桧出门必带五十个卫兵保护。他还在临安府设“察



事卒”,每天上街打探民众言论,凡议论秦桧的人就逮捕。秦桧权势熏天,朝中官员几乎都由他安排。他贪污腐化,聚敛钱财,家中堆满了各地官员进献的财宝。对于秦桧父子把持朝政,宋高宗并非毫无戒心,绍兴二十四年(1154),秦桧指使考官将其孙秦垕定为状元,结果被宋高宗钦点的张孝祥取代。次年秦桧病逝,秦熺请求接任父职,宋高宗却令其退休,并且贬黜了一批秦桧亲党。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议,集结六十万军队南下,试

南宋与金划界图

宋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订立和议,宋向金称臣,以淮河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线为界,从此开始了宋、金长期对峙的局面。

图攻灭宋朝。宋高宗重新召回年过六十的老将刘锜、吴玠，组织防御。同年，虞允文指挥水军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击败渡江的金军。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发动政变，取代海陵王，海陵王被南下的金军将士杀死，金军撤回北方。

由于金人毁盟入侵，激起了朝野上下一片北伐的呼声。宋高宗被迫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退居太上皇，将皇位交给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一即位，便诏求直言，给岳飞平反昭雪，起用抗金名臣张浚、胡铨等。隆兴元年（1163）四月，张浚都督江淮军马，挥师北上，连下数州，进军至符离（今安徽宿县），因统军大将李显忠、邵宏渊意见不合，互不配合，导致战败，宋、金重新议和。宋孝宗不甘心失败，继续整军备战，并仿效宋太祖，设置封桩库，为再次北伐积累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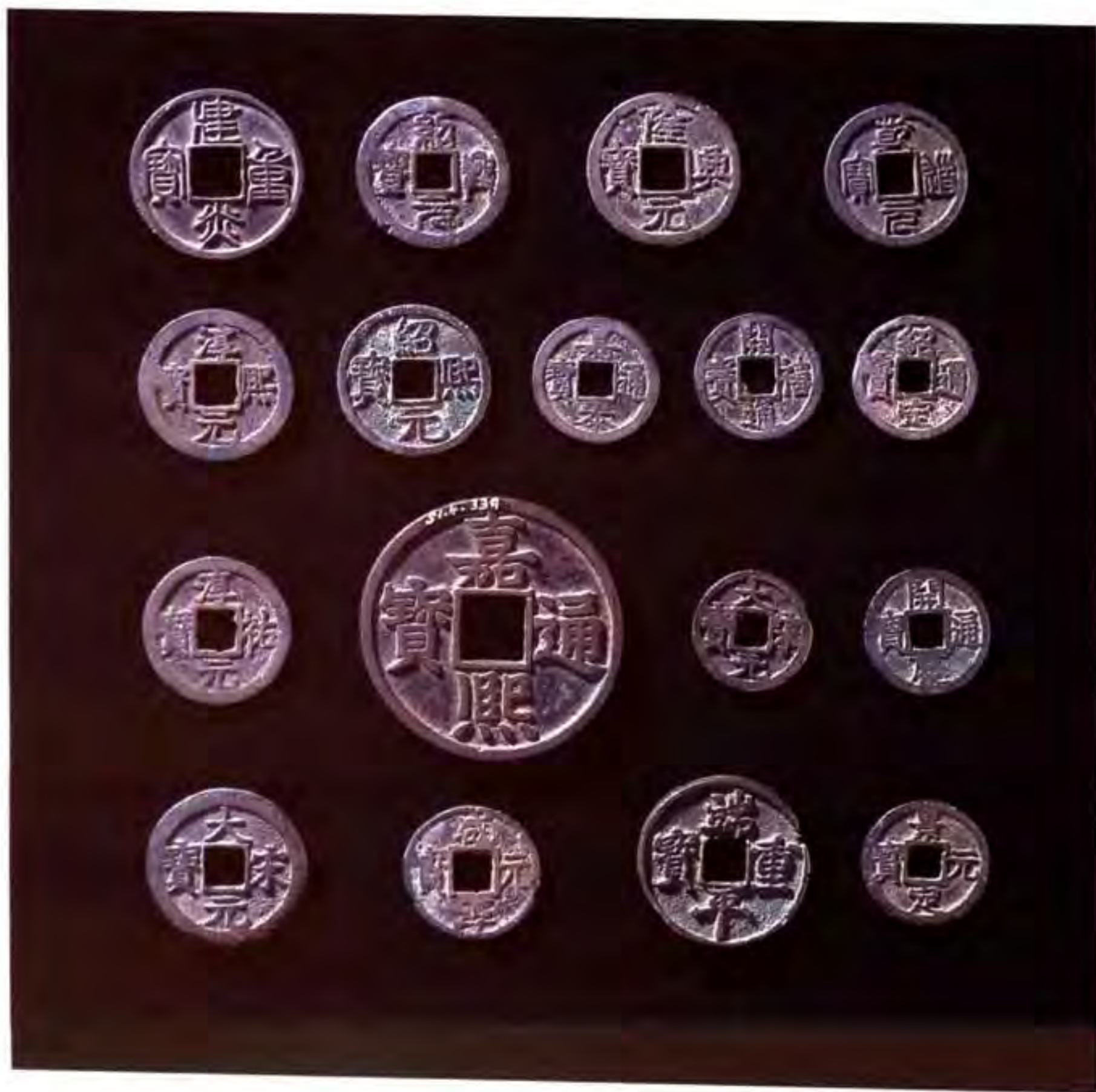
宋孝宗退位后，宋光宗赵惇即位。光宗性格懦弱，又患有精神病，皇后李氏性悍妒，

离间光宗与太上皇的关系，致使孝宗病死。后，光宗不能亲执丧礼。赵汝愚和韩侂胄策划宫廷政变，逼迫光宗禅位给次子赵扩，是为宋宁宗，宋高宗吴皇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韩侂胄依仗他与皇室的国戚关系（韩侂胄夫人是吴皇后侄女，女儿为宁宗皇后），排挤赵汝愚出朝，独揽朝政十四年，成为继秦桧之后南宋第二个权臣。

韩侂胄刚愎自用，打击政敌的手段与秦桧如出一辙。为了迫害赵汝愚及其一再推崇的朱熹，他在庆元二年（1196）八月将理学宣布为“伪学”，第二年立“伪学逆党”党籍五十九人，“凡相与为异者，皆道学人”，予以排斥贬黜，甚至不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韩侂胄将自己的亲属、门人都提携入朝，接连几任宰执都是他的党羽，他自己则以太师、平章军国事的身份，每三日一去相府视事，他还“假作御笔，升黜将帅”。《宋史》称韩侂胄掌朝之时，“威行宫省，权震宇内”。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在主战人士的劝说下，准备北伐，宋宁宗下诏追夺秦桧的王爵，追封岳飞为鄂王，一时大快人心。同年四月，宋军大将毕再遇出兵攻占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等城，但不久金兵主力南下，连胜宋军，并渡过淮河，攻占了濠州（今安徽凤阳）、滁州（今安徽滁州）、真州（今江苏仪征）等地。这时，四川制置副使吴玠投降金朝，金册封吴玠为蜀王，形势非常危急。关键时刻，被吴玠任命为丞相长史的安丙与川中将领合谋，杀死吴玠，平定了叛乱。北伐失利后，宋遣使向金求和。金提出增加岁币、交出用兵者（即韩侂胄）等要求。此时韩侂胄的靠山太皇太后和宁宗韩后都已去世，贵妃杨氏进位皇后，其义兄杨次山勾结礼部侍郎史弥远，伪造御旨，诛杀韩侂胄，将其首级盛匣献给金人。嘉定元年（1208）九月，宋、金

南宋铜钱

南宋承袭北宋制度，政府铸钱以年号为主。每种钱有各种字体。由于通货膨胀，政府发行了大量纸币，铸钱的数量不及北宋。



重新订立和约，宋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另付犒军银三百万两。史弥远出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独揽朝政二十六年，南宋进入第三个权臣擅政时期。

对金人畏惧如虎的史弥远，掌政伊始，就恢复了秦桧的爵位谥号，打击主战官员。他任用的爪牙都以贿赂公行著称。由于开禧时期用兵耗费过大，史弥远等人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嘉定七年（1214），在真德秀的建议下，南宋停止向金朝缴纳岁币。此时金受到蒙古南下的压迫，已迁都到南京（今河南开封）。金以此为理由，在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向南宋进犯，企图扩充疆土，宋、金持续发生局部战争，直到金哀宗即位，遣使重新通好。对于史弥远的擅权祸国，皇太子赵昀非常愤恨，对人说，一旦即位，将放逐他到海南。史弥远得知，便欲废掉太子。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宋宁宗病逝，史弥远伪造遗诏，立宗室赵昀为皇子，即帝位，是为宋理宗，赵昀被废为济王。史弥远擅立皇帝，引起朝野震动。嘉定初，史弥远为笼络人心，追谥朱熹、二程等理学家，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人士。真、魏等人都上书为赵昀被废鸣冤，史弥远则起用梁师大、李知秀、莫泽打击真德秀、魏了翁及其门人。梁师大等三人公开受贿，甚至将受贿物品陈列于堂下，供宾客参观，被时人称为“三凶”。理宗当了九年的傀儡，直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病死，宋理宗方得以亲政。其时蒙古军已包围金南京开封，宋朝也岌岌可危。宋理宗亲政之初，贬斥梁师大等“三凶”，起用理学名流。淳祐元年（1241）下诏以朱熹等从祀孔庙，确立了理学的官学地位。但在国事处理上，理宗听凭宠妃阎氏及其党羽丁大全、马天骥胡作非为。开庆元年（1259），

丁大全因隐瞒蒙古攻宋的情报被罢官处死。宋理宗贾妃的弟弟贾似道出任右相。

贾似道是南宋第四个权臣。他曾受命抵抗蒙古进犯，却私下求和，向朝廷谎报“诸路大捷”。任相后，他推行“公田法”，以贬值的纸币强占民田，增加赋税负担。景定五年（1264），宋度宗赵昀即位，贾似道被尊为师臣，加平章军国重事。宋度宗和贾似道不理政务，奢侈享乐。贾似道在西湖葛岭修建楼台馆阁，陈放各地官员进献的奇器珍宝，整日在西湖与小妾、妓女纵情游乐，时人称为“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名义上贾似道三日至政事堂，实际是“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病死，贾似道立四岁的赵昀即位，是为宋恭帝，理宗皇后谢氏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此时，蒙古已建国大元，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已被元军攻陷，元军在伯颜率领下沿长江东下，逼近临安，朝野震惊。贾似道只得在德祐元年（1275）正月出兵防御，被元军打败，逃至扬州。当年七月，贾似道被谢太后贬至循州（今广东龙川西），途至福建漳州，一个名叫郑虎臣的县尉将他杀死。第二年元军进入临安，谢太后携恭帝出降。

六、迁都之后的金国

金建国之初，废除国相制，设立诸版勃极烈等辅佐国政，社会组织仍沿袭了氏族部落时期的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的原义分别指部落酋长和氏族长，大约每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在长年作战中，猛安谋克成为军事编制，被俘虏的外族人也被编入猛安谋克。金太宗时，仿效汉族官制，设置三省、枢密院，制定了女真文字，并在天会元年（1123）进行科举考试，设南北两科，

韩州刺史铜印

金

吉林九台海布出土
长、宽均为6.3厘米

此印印文为汉字篆体阳文“韩州刺史之印”六字，印背阴刻“大定二年”（1162）四字。金建有五京，置十四总管府、十九个路，共有府州一百九十七个、县六百八十三个。金代官印的形制大致仿照宋、辽旧制，印材有金、玉、银、铜之别，皇帝印多用金、玉，一般官印多用铜质，为长方形板状钮，叠篆书，朱文。韩州是上京路的一个州，韩州刺史铜印是州县长官的印信。



被称为“南北选”。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金统治区域处于多种制度并存的状态。

金灭辽和北宋后，为统治各族，金熙宗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措施。废除诸版勃极烈辅政制，仿效宋朝官制设三师，由尚书省左、右丞相兼领中书、门下二省，下设参知政事。伪齐被废后，在开封设行台尚书省，天眷元年（1138），将燕京枢密院也改为行台尚书省，以两行台尚书省负责汉族地区行政。同年，又全面施行汉族官制，女真官员的旧官职全部换授为相应的汉制新官职。金熙宗还仿汉制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修建都城和宫殿，并制定百官朝见的礼仪和有关制度，颁布新的法律，制定更易于书写的女真小字。海陵王政变上台后，于正隆元年

（1156）对官制进一步改革，废中书、门下二省及左右丞相，只保留尚书省，以尚书令为最高长官，直接听命于皇帝。海陵王最大的举措是将都城由上京迁于燕京（今北京），改为金中都，皇城全依汉制建造。为打击不愿离开老家的女真贵族，正隆二年（1157），海陵王下令平毁上京宫殿及住宅。大定元年（1161），海陵王领兵南下侵宋，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完颜雍发动政变，废海陵王，自立为帝，是为金世宗。金世宗沿袭了海陵王的汉化改革，仍定都中都，官制只恢复了左右丞相和参知政事，同时吸纳更多的汉人、契丹人和女真平民参与军政事务，大量女真人舍弃游牧生活，定居农业区域。金世宗重视休养生息，倡导学习汉族文化，同时

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铜印

金

长、宽均为7厘米

此印印钮为长方形，上刻“上”字，右侧有阴刻汉字“大定十二年十月”，左侧阴刻汉字“少府监造”。其正面印文为汉字篆体阳文：“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印”。此印为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的官印。大定十二年（1172）是此印的铸造时间，“少府监造”的刻文说明此印为官府监制。



不忘女真习俗。这时期与宋朝主要是和平相处，女真贵族之间的内斗也基本结束。

金章宗以后，女真族的汉化进程仍在持续。长期的农业定居生活及与汉人杂处，女真人逐渐习惯了新的生活，许多女真人已经不会说本族语言，不懂女真文字，汉语成为通用语言，很多女真妇女改穿汉人服饰。自幼就熟读儒家经书的金章宗即位后，下诏在各地修孔庙，并要求三十五岁以下的女真亲军也要读《孝经》、《论语》。金章宗喜好书画，在朝廷设书画院，收集到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等书画名品。金章宗顺应形势，于泰和六年（1206）下诏准许女真人与汉人通婚，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快。

第三节 两个王朝的 终结

金与宋时战时和，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使这两个在混乱时势中分别自居正统的政权的国力都遭受了巨大的消耗。在北方草原上悄然崛起的蒙古族把握住机会，对金发动了迅猛的进攻。这是一场与金灭北宋非常相似的战争，不过金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变为被消灭者。强敌的覆亡使对形势没有深入了解的南宋政府作出了利令智昏的判断，一次轻率的收复故土的行动让蒙古军得到借口展开了南下的攻势。几次濒临覆灭边缘的南宋，都因为蒙古军内部的原因侥幸度过难关，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四十多年，最终还是逃不过亡国的结局。

宋与金两个在一起纠缠了百多年的宿敌的命运也非常相似，最终都成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奠基石。



正隆元宝

一、中都易主

长期与南宋政权的相持，内部统治管理的不善，使金的国力开始衰退。对于这种情况最敏感的是它的邻国和辖制下的北方游牧部族。于是，在金章宗时，西夏与北方草原上塔塔儿、蒙古等部开始对金进行更加频繁的侵扰与反抗。金与西夏之间纠缠，到1225年双方重新达成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金对北方草原部族的镇压，则在优势武力下仍然收效甚微，不胜其扰，于是朝中大臣提出修建界壕的建议。

所谓界壕，简单地说，就是修建既深且宽的壕堑和又高又厚的界堤，再佐以壕堡、边堡等设施，起到类似于长城的作用，以防御来自北方的攻击。非常有意思的是，女真人原本也是此类建筑所企图抵挡的对象之一，这时亦要谋求这种被动的庇护，可见金在向中原正统王朝演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和所付出的代价。当时倡议者的出发点是借助界壕，戍边的兵力可以减半，而且每年节约三百万贯的支出。这项工程开始于金世宗时，在金章宗支持下形成了很大规模，到完成时共修建了长达1500多公里、后来又有“金长城”之称的界壕。

在这时候的漠北草原上，蒙古部的领袖铁木真完成了统一各部的使命，建立了大蒙

古国，号为“成吉思汗”。由于在统一战争中借助过金的力量，所以此时的蒙古仍然与金保持着岁贡的关系。但是被辖制的蒙古一方无时无刻不在设法改变这种状态。作为一道防线，界壕在军事上暂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看来，它的修筑实际上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金国实力已衰，对控制北方已是有心无力。

统一后的蒙古对金的第一次进攻发生在1211年。在前一年，蒙古国正式停止了岁贡。更早些时候，西北的吉尔吉斯、秃麻、畏兀儿等部族已被征服。西夏在数年间遭受三次进攻后，也在1209年纳女请和，臣服于蒙古，表示会年年进贡，并派军队支持对方发动的战争。没有了后顾之忧的蒙古人便集中力量，高举着为被金杀害的俺巴孩汗等先祖复仇的旗帜，对金展开了全面攻势。

这一次入侵兵分两路，目的在于掠夺和试探。七月，成吉思汗及其幼子拖雷率领的东路军发动了以金中都为目标的进攻，他的另外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指挥右路军向西京方向进军。金人对蒙古南下的意

图并非毫不知情，事实上在一段时间以前他们就有所察觉，但奇怪的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掩耳盗铃的态度对待此事，战争爆发后，他们才开始匆忙备战，并派使者求和。到了九月中旬，东路蒙古军的前锋部队已经突破居庸关，游骑于金的首都中都城下，西路则在为金朝守护界壕的汪古部的引导下，越过界壕，穿过阴山，一路攻入山西，并迫使金军放弃了西京。第二年初，在一度攻占金中都外城、却始终未能攻入内城的情况下，蒙古军带着大量的战利品退出。这次入侵一直持续到下半年才告一段落。

金人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重整武装，组织防御，准备应付蒙古人的下一次进攻。不料此时朝中发生了政变，成吉思汗所憎恶的卫绍王被大臣杀死，金宣宗即位。到了下一年，也就是1213年的秋天，蒙古人分三路卷土重来，把前一次的战绩又重新表演了一遍。所不同的是，有了前次的经验，蒙古人充分地认识了金的虚实，这次的进攻更加深入，劫掠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山西、河北和山东的广大区域，而主力军队的矛头直指

金界壕边堡

位于达来诺尔湖附近
界壕是金朝为了防御北方草原民族而修建的军事防御工事。从照片上可以明显看出界壕的壕堑、副壕、界堤和边堡。壕堑宽8至10米，深4至5米。界堤分为主堤和副堤，主堤高6到8米，宽为8到10米，从壕堑底部到主堤顶部高达10至13米。为增强主堤的防御力，在主堤和壕堑前面又修建了高约4米、宽约5米的副堤和深、宽都是4到5米的副壕。边堡则是具备一定规模和设施的边防小城，可以进行独立作战，往往位于险要处。



金中都。到了第二年三月，蒙古三路兵马会合在中都城下的时候，金朝领土在黄河以北、华北平原的部分，包括中都在内只有寥寥十余城未被攻破。金宣宗献出了卫绍王的女儿以及蒙古人所要求的大批金银财帛、马匹、童男女求和，并派大臣阻止民间武装攻击蒙古军。蒙古军带着大量战利品顺利北返。

金蒙之战暂时中止，但在过去的四年中，蒙古军所过之处，房屋被烧毁，城池化为废墟，这些地区的物质财富、青壮男女、牛羊马匹都被蒙古人席卷而去，余下的人民几乎被屠杀殆尽，这使中都失去了继续作为国都的基础。在经过了朝廷内部激烈的辩论之后，金宣宗在1214年五月将都城南迁至开封。

朝廷迁走后，中都军民恐慌，驻守附近的部队发生哗变，声明反金，开始进攻中都，并表示愿向蒙古军投降。得到消息的成吉思汗立即派军队南下，与他们配合。此时金已有放弃中都的打算，但还是组织了一批部队前来援救，结果一部分被蒙古军大败，另一部分还未交战便已崩溃。此后金无力再顾及中都。1215年五月，中都陷落。

此后，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将领率领蒙古军和新归附的契丹、汉军继续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抄掠，自己则在第二年的春天回到了位于克鲁伦河畔的大本营。

二、金朝败亡

在金无力抵御蒙古人攻击的同时，红袄军的大规模起义使恶化的局势雪上加霜。

起义最初开始于蒙古人第一次发动进攻时。所谓红袄军，其实并非一个统一的军事集团。趁着金政权在军事上连续大败，无力对北方施行有效的控制和蒙古军队只注重掠

夺、无意进一步加强统治这个机会，若干支以耕农、佃户、奴隶和下层商贩为主体的农民武装打起了反金的旗号。他们各自独立行事，但又都以身穿红袄为标志，故而被统称为“红袄军”。红袄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河南、江苏甚至甘肃也有响应者。其中最主要的领导者，有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等。

红袄军各自行动，偶尔也相互配合，但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长远的打算。红袄军虽然在军事上也有一些胜利，但没能对金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结果或者被消灭，或者被瓦解，或者归附南宋，最后只有李全坚持了下来，并且合并了其他的一些残部，形成了一股割据势力。

大片国土的丧失，蒙古军队的威压，使迁都以后的金政府处境非常艰难。他们首先在防御上作了很大调整，将重兵部署在河南、关中，倚仗黄河、潼关，建立了新的防线。为了挽救颓势，金人急于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又把眼光投向了老对手——南宋。金的君臣们这时有一个自我解嘲的想法：我们的实力虽然不如蒙古，但比起南宋来还是绰绰有余的。一个进攻南宋以拓展领土的计划形成了。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人驱军南下，南宋君臣以屈辱和财富换来的和平维持了不到十年又被打破。

尽管南宋的军事实力仍然逊于金，但多年以来形成的相持局面，即使在金朝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也未能改变，更不要说金国力已衰，同时还要承受蒙古军的强大压力。金对南宋又发动了三次进攻，前后持续了数年，除了双方力量的大量消耗外一无所得。

在金展开攻势南下拓地的时候，蒙古对金的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成吉思汗已经把西方广阔的世界纳入了自己的战

略构想，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对手——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位于中亚的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成吉思汗决定亲率主力西征，而把对金作战的重任交给了最得力的部下木华黎，赐予他象征成吉思汗本人权威的九尾白旗，任命他为“太师国王”——一个蒙古人所能想到的最高级的中原官名，并给了木华黎攻取中原的全权。

木华黎所属部队约有十万人，构成较以往已有了很大不同，大约只有四分之一是蒙古军，其他都是归附的契丹军和汉军。攻金的战略也有了很大的调整：为长期统治中原作准备，以中都为中心，先稳固占领中原地区，再逐步向南推进，占领城邑，招揽地方豪强武装，减少抄掠、杀伐，安抚百姓。在稳步扩大占领区的同时，木华黎还掌握着一支部队，机动作战，伺机打击金军的有生力量。金军一方也与中都失陷前大不相同，他们依靠新的防线，充分利用各地附金武装的配合，运用防御和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虽然无力扭转大局，但也给蒙古军带来很大困扰。在战略目的都有了改变的情况下，双方形成了相持局面。木华黎在1223年病逝于山西。此后他的儿子李鲁接手了对金作战的指挥权。几年后的1227年，李鲁收降红袄军领袖李全，河北、山东尽入蒙古掌握之中。

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于军中。强敌之死和第二年完颜陈和尚战胜蒙古军于甘肃大昌原，使金人士气振作起来，对蒙古的进攻形成更大的阻力。为了打破僵局，窝阔台继位后，将主力投入了对金战争，但是战事仍然不是很顺利。

成吉思汗临终之时，最后一次展示了他的军事天才。他为他的儿子们提出了绕道南宋灭金的策略。1231年2月，凤翔为蒙古军攻破后，金人被迫放弃京兆地区，潼关以西

完全被蒙古军占领，实施这个策略的条件成熟了。蒙古军以次年正月会师于开封为约定，分三路出击。

窝阔台率领的中路和铁木哥斡赤斤率领的左路在次年正月突破黄河防线。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率领的右路则出宝鸡，破大散关，入汉中，在南宋境内强行经过。南宋守军无力阻挡，只得任由蒙古军通行。金得知这种情况，集结主力部队二十万在邓州布防，试图阻止拖雷部的进攻。拖雷一方面用游骑袭扰金军，一方面分路进军开封，与窝阔台部相呼应。金军为确保首都安全，全力回防，在人困马乏之际，被蒙古军困在三峰山地区。拖雷部与窝阔台的部分人马会合后，发起围攻，将金军主力消灭，金军名将更是伤亡殆尽，金朝灭亡的大势已不可逆转。

金政府仍想通过纳贡、送人质这样的方式求和，以拖延时间，但这次蒙古人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窝阔台和拖雷率主力北返，留下速不台等大将继续作战。1232年5月，开封发生了一场历时五十余天的瘟疫，死者达到九十余人。八月，金最后的援军被蒙古人击破，开封已是一座孤城。十二月，金哀宗出逃。次年正月，留守开封的将领发动政变，投降蒙古。

金哀宗辗转逃到了蔡州，暂时立足。他向宿敌南宋派出了使者，希望用唇亡齿寒的道理获得南宋的支援。蒙古也有使节前来与南宋相约联合灭金，并许诺将河南之地还给南宋。南宋政府内的争论非常激烈。尽管有大臣以“海上之盟”为例，指出与蒙古结盟最终必然会引来祸端，但是取得一场必然的胜利和完成复仇大业的诱惑，使南宋政府决定与蒙古达成协议。

失望的金军抢先向南宋发起了进攻，但被南宋军击败，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金朝部



队被宋军消灭了。随后，蒙宋的联合作战开始。蒙古军先至，包围了蔡州，宋军运粮三十万石协助攻城。三个月后，蔡州城破，金朝灭亡。

三、端平入洛与钓鱼城之战

世仇的灭亡使南宋君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尽管有些比较理智的大臣已经意识到蒙古的威胁更大于金，但在欢庆祥和的浪潮中未能翻起任何浪花就消失了。多年来沉重的压迫一旦消失，无比轻松的君臣们开始怀着美好的憧憬，为宋的未来勾画蓝图。

双方的联合军事行动胜利结束后，蒙古人并没有兑现他们的诺言。在分配战利品的时候，或许是自觉在战争中出力有限，南宋的代表似乎对坚持原来的方案并不理直气壮，最终蒙古人拿走了陈州、蔡州西北的土地。当然这已经是宋氏南渡以来最为可观的成绩了，但宋室君臣并不满足，一个大胆的计划正在筹划中。尽管自成吉思汗进攻金朝开始，双方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宋人对蒙古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在他们眼中，蒙古人还是为了掠夺财富而秋来春去的草原

部落，完全没有认识到对方征服天下的野心。金亡以后，蒙古主力北返，南宋朝廷看到中原地区似乎是唾手可得。尽管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恢复中原是几代人梦寐以求、足以名垂青史的伟大业绩，任何不同意见都无法将其阻止。

行动在端平元年（1234）六月开始，仅仅是金朝灭亡不到半年之后。在这几个月时间里，宋人完成了军队调动、最高军事行动机构的组成、军事侦察、舆论宣传、后勤供应保障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宋理宗下达了收复原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的诏书，号称二十万、实为六万的军队兵分两路，出兵河南。

收复开封出乎意料地顺利，城内人杀死了守将——正是他将开封献给了蒙古人，在七月初将宋军迎进了城。光复丧失了百余年的首都，让南宋朝廷再一次陷入欢乐之中，有功之臣迅速得到了封赏。收复洛阳进行得也十分顺利，但是蒙古军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储粮，使宋军陷入困境。在八月初的战斗中，宋军大败，统帅只带了三百余人回到南宋疆界。开封的守将得知这种情况，随即撤

白釉刻花鱼纹瓷钵

金

1985年吉林农安城北金代窖藏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11厘米，口径26.2厘米，足径12厘米

此瓷钵外壁口沿下凹入一圈，内壁相应凸起；外壁素面，内刻双鱼，周围衬以水波纹和水草纹，纹饰自然流畅，线条简洁。

退。轰轰烈烈的光复行动在一个月后以惨败告终，损失的人力、物力无法估计。

幻想的破灭使宋理宗看清了现实，他派出使者向蒙古谢罪，试图像对待金朝一样以和议来摆脱困境。蒙古人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背盟是南宋无法否认的罪名，更是蒙古出兵的最好借口。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战争不可避免，双方都开始了积极的准备。

面对国内产生的一系列危机，宋理宗一方面用罪己诏来安抚民心、缓和矛盾，一方面调整战略，利用自然之险，采取分区防御，设置各种措施来限制蒙古骑兵奔袭的能力，加大防御纵深，宋蒙形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

蒙古人在1235年春天南下，同时展开的东征高丽和西征钦察使这次战役的兵力不够集中，但仍然分为两路大军分别指向四川和襄汉，并且一度获得了较大战果。但是蒙古军战线太长，彼此无法取得呼应，而且江淮的河网、四川的高山，都令蒙古骑兵快速机动的特长无法发挥，蒙古军也没有建立水军，不可能渡江作战。这些因素令蒙古军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但完成了将战场推进到南宋疆域、破坏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防御设

施、以及通过大规模的抄掠来削弱南宋的力量等几个战略目的。

1241年，窝阔台病逝，给南宋带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约十年中，蒙古政权几度易手，使攻宋的计划无法继续实施，双方又陷入了相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南宋的君臣们又故态复萌，过起安逸日子。其间虽然有几位将领锐意整顿军备，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他们的下场似乎都不太好。

蒙古人不会给南宋太多的太平日子。拖雷的儿子蒙哥在登上汗位以后，命令弟弟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指挥诸军对宋作战。忽必烈接受了汉人谋士姚枢的建议，改变蒙古军秋去春来的抄掠作风，在前线重要地区驻屯重兵，并建立后方基地，虽然减少了直接攻击，但对南宋形成了更大的威胁。1254年，忽必烈率军灭了大理国，等于在南宋背后插上了一把尖刀。

1257年，大汗蒙哥亲自挥兵南下。这次与以往不同，灭宋的目的十分明确。次年四月，蒙古军依然兵分两路，蒙哥率领西路军攻入四川，希望能够消灭四川的宋军，然后顺流而下与东路军会合。起初战事比较顺

钓鱼城遗址

位于今四川合川境内

1259年，大汗蒙哥亲自率领的攻宋大军推进到四川合州。南宋守军依仗钓鱼城固守长达五个月。在这年七月，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撤退。



利，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春，战场推进到合州，此时周围的山城几乎全部都为蒙古军占领。虽然孤立无援，但驻守合州的王坚倚仗屈死的著名将领吴玠修筑的钓鱼城顽强抵抗，蒙古军运用了当时各种最好的攻城器械，仍然被阻挡在此长达五个月。这一年七月，蒙哥死于钓鱼城下，一说是染上瘟疫病死，也有人说是被炮石击中，重伤而死。按照蒙古人的惯例，蒙古诸军因此被迫撤军，护送大汗的灵柩北返。

正在指挥东路军作战的忽必烈不想放弃战机，继续进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习惯了臣子们报喜不报忧的南宋政府此时也慌乱起来，宋理宗又发下了罪己诏，甚至有人提出让皇帝准备出逃到海上。就在此时，忽必烈收到了弟弟要谋取汗位的消息，决定回师北上。他诈言直取临安，恐吓住了南宋方面督师的贾似道，获得了以长江为界，宋岁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然后撤退。

贾似道将真相隐瞒，把蒙古人的撤退宣称为自己的战功，于是南宋方面又得到了一场“大捷”。只是这场胜利实在有些见不得人，当忽必烈派遣的使者郝经前来要求南宋履约的时候，立下了“再造之功”的贾似道只好将他长期拘禁起来。

四、赵宋王朝的最后一战

夺得了汗位的忽必烈，把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稳定北方的统治放在了第一位，暂时停止了消灭南宋的计划。再次得到喘息机会的南宋朝廷希望乘此机会有所作为，但奇怪的是，皇帝一心寄予重望的大臣纷纷表示要辞官归田，不想承担责任，而渴望为国效力的人又往往受到排挤和冷落。四川泸州的守将刘整屡立战功，但因为出身北方，所以受到

朝廷中居主流的南方将领的妒嫉，事事掣肘，饱受排挤，终于在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愤然以泸州十五郡、民户三十万人归附蒙古。虽然两年后蒙古军主动放弃了泸州，但刘整的投降仍然给南宋以沉重的打击。

过了十六年以后，被拘禁的郝经成了蒙古军再次南下的理由。忽必烈采取了刘整的建议，将攻击重点放在了襄樊。襄樊是襄阳和樊城的合称，前者在汉水南岸，后者在北岸，是南宋在长江以北最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自从蒙、宋战争发生以来，先后经过南宋名将孟珙、高达等人近三十年的筹措布置，襄樊拥有极其坚实的防御工事和可以支应十年的军需储备。这样的一座要塞，无疑是征服南宋的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蒙古人从十多年前就开始耐心地做着准备工作。丰厚的贿赂使襄樊的守将同意了蒙古人在樊城外设立边境交易市场的请求，随后又同意对方修筑土墙来保护货物的安全。蒙古人借机在土墙内建立了堡垒，一旦战争发生，足以遏制两城之间的相互支援。

或许是因为十多年来相对太平的日子过得习惯了，南宋对敌人的动向表现得麻木而冷漠，直至蒙古军兵临襄樊城下，仍然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于是在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襄樊之战在蒙古军完全占据主动的情况下爆发了。在随后的一系列战斗中，南宋的军队屡屡大败，令襄樊解围的可能化为泡影。李庭芝被宋度宗任命为援救襄樊的主帅，但他根本指挥不动所统辖的部队。国家到了如此危急的时候，南宋的文臣武将们依旧在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互相掣肘，而且即使战败，南宋的将领仍然能够得到宋度宗的嘉奖，无人可用的事实使这位无能又懦弱的皇帝对臣子的要求很简单：只求肯于任

宋少帝陵

位于广东深圳蛇口赤湾
在崖山之战中，宋军大败，
陆秀夫背负宋朝的末代皇帝
投海。后人修建了这座衣冠
冢，表示纪念。



事，并不奢望成绩。咸淳六年（1270），蒙古军完成了对襄樊的完全包围，襄樊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襄樊之战是一场空前的战役，一直持续了六年。双方部队在这两座危城之下将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宋军有着自金人入侵以来一百多年无数次失败中获得的防御经验、丰足的战略物资以及江淮一带地形上的优势。蒙古军也不再是只擅长抄掠的草原游骑，在数十年的征服史中他们学会了足够的攻城手段。火器在这场战役中被大量使用，双方对此都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襄樊傍水，为了控制水路，蒙古人还特地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艘战船、七万名士兵的水军，其中不乏高丽人和女真人。在攻城的部队中还包括畏兀儿人和波斯人等以往征战中陆续归属于大汗们的臣民。其中有两位工匠，是忽必烈亲自从遥远的伊利汗国调遣到此地的，他们带来的大型抛射武器“回回炮”，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给南宋军以沉重的打击。

咸淳九年（1273）三月，在樊城被攻破后不久，襄阳的守将献城投降了，征服南宋的大门敞开在蒙古铁骑之前。就在两年前，忽必烈将国号改为出自《易经》的“元”，把

自己置入历代王朝正统的序列之中，南北统一是他必须完成的大业。在元军大举过江前，忽必烈反复告诫将士，禁止滥杀无辜和肆意掠夺，已经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君主气度了。

宋度宗在忽必烈发布总攻击令后不久死去，这使他免去了成为亡国之君的可能。皇帝之位被一个四岁的孩子赵昀继承，执政的是他的祖母谢太后。朝中大臣们依旧勾心斗角，动辄辞官出走，谢太后以升职来诱惑官员留下，但收效甚微。

在长江南岸，元朝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南宋各地的守将和士兵们除了偶尔交战后大败外，多数都投降或逃走。在谢太后的命令下，贾似道不情愿地率领十三万水、陆大军前往安徽芜湖迎敌。他试图再次用赔款称臣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胜利在握的蒙古人拒绝了他。战斗在丁家洲开始后，立即变成了元军单方面的追击与屠杀。战斗很快结束，南宋最后的主力损失殆尽。贾似道因此被降职贬出京城，在朝中重臣的默许下，在路上被痛恨他的人杀死。

一些希望为国效力的人们终于等到了机会。张世杰集结了上万艘战船，与元军交战

于镇江焦山，尽管宋军在火攻下大败，但这是元军过江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此后张世杰、文天祥等率领的勤王兵马虽然也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对局势没能造成大的影响。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谢太后和重臣们不顾张世杰、文天祥等人的力争，决定投降。二月，皇帝正式上表投降，随后与临安的国库、图书、户籍等一起被送往大都。他被封为瀛国公，在西藏萨迦寺学习佛法十二年。许多年后，他在藏传佛教中已经获得了很高地位，被称为“蛮子合尊”，担任萨迦寺总持，追随者颇多，或许是因为因此受到元朝政府的猜疑，1323年，他被赐死在河西。

一些希望继续维持宋朝血脉的大臣带着赵昀的两个异母兄弟逃离了临安。他们辗转流亡，在福州拥立了年长的赵昀为皇帝，建立了流亡政府。与以前相比，新的朝廷并没有因为处于危难中而有所改变，大臣们仍然在为了权力和利益争斗不休。他们用不断带

着皇帝逃走的方式表示忠于宋朝，虽然无力改变现状，仍然个个自命不凡。

元军不断的追击，使朝廷的逃亡路线从陆地转向了海上，不久赵昀因为受飓风惊吓而病死，他的弟弟赵昺当上皇帝。一些握有军队的忠义之士仍在奋战，并有很多英勇的事迹，可是他们彼此猜疑，各自为战，在元军强大的攻击下逐一被消灭。李庭芝、姜才被杀，文天祥被俘。因此除了减缓进攻者的步伐，这些抵抗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在一次次的失利和逃亡之后，宋蒙双方在宋祥兴二年（1279）正月开始了最后一战。张世杰率领的一千多艘战船、二十万士兵，被元军五百艘战船和数万军队围困在广东崖山海域。就像几年前的焦山之战一样，张世杰错误的指挥将南宋军队带入了绝境。二月六日，决战爆发，宋军大败，官兵殉国者不可计数，丞相陆秀夫背负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在外患的折磨中度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宋王朝，至此彻底终结。



第四章

社会经济

宋、辽、西夏、金时期，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农耕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边疆地区。在长期安定的局面下，农业、手工业生产获得新的进步，粮食及各类手工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人口增长到一亿，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大批农业人口转向工商和服务行业，促使一批大中型城市迅速崛起，草市遍及乡镇，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北宋中叶，四川地区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金对峙时期，纸币已在全国广泛使用。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与海外各国交流之广，进出口货物之多，远远胜于前代。

第一节 南北不同风

辽、宋、西夏、金并立时期，在汉族统治区域和少数民族统治地区，各族人民保持

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契丹、女真族建国之初，仍以渔猎和游牧为主，只是在其占据的汉族生活区域保留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宋王朝地区，承袭了历代男耕女织的传统，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及其文化也影响到周边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女真等民族逐渐习惯了新的定居生活，以往的游牧习俗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遗存保留在相应的礼仪之中。

一、南垦殖·北游牧

在汉族生活区域，农耕仍是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宋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生产，扩大垦田面积，增加粮食作物产量。宋太宗至道元年（995）下诏要求各“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此后宋王朝不断发布此类奖励开垦荒田的诏

令。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户部掌握的全国垦田数已达五百二十四万多顷。南宋拥有的国土面积只是北宋时的五分之三,但富庶的两浙、巴蜀均是农业高产区。为尽快恢复京西、淮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南宋政府招募四川农民前往开垦,由政府提供种子和耕牛,并采取五年内免税,满五年后轻税的政策,鼓励开荒垦殖。南宋各地农桑兴旺的景色,被当时的诗人画家收入笔下,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范成大诗中描绘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便是汉族人民辛勤劳作的写照。

在北方民族地区,渔猎、游牧生产居于重要地位。不少去过北方的宋朝官员都有切身体会。宋真宗时,晁迥作为贺生辰使前往契丹,他描述在一湖泊边见到契丹国主的情景:“泊多鹅鸭,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远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远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宰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曾到过契丹的王曾也说:“自过古北口,即蕃境,……时见畜牧,牛马囊驼尤



多。……挈车帐,逐水草射猎。”

契丹和女真属于草原民族,游牧和渔猎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契丹族祖居中

鎏金龙凤纹银鞍桥

1954年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出土

最大者高35厘米,宽22厘米,厚0.1厘米

鎏金银鞍桥是马鞍外包镶的银质饰件,一组六件。计有鞍桥前、后部银饰件各一件,压印双凤戏珠纹饰,间以流云纹,花纹和周边均为鎏金;刀形、半月形银饰各二件,左右对称,压印牡丹花纹和流云纹。



辽墓壁画

1989年河北宣化下八里店发现

为辽代末年墓葬,共7幅。除墓顶星图外,六壁各有一幅。这两幅壁画分别在东南壁和西南壁,描绘了当时人日常生活的场景。



驭者引马图

辽

内蒙古库伦旗7号辽墓出土
图中驭者髡发，着圆领紧袖
长袍，为典型的契丹人形
象。

褐釉马蹬壶

辽

1956年北京复兴门外出土
高24厘米
因器形似马蹬，故名为马蹬
壶。此壶胎质粗硬、坚致，遍
施褐色釉，釉色较厚，晶莹
光亮。壶身两侧有水波纹，
模仿骑马民族背水用的皮囊
壶而做，两者相同，甚至用
皮条缝制皮片的结、扣都仿
制得惟妙惟肖。



国东北地区，气候寒冷，渔猎是其最主要的生产方法。捕鱼用钓鱼法，即冬季在冰冻的河湖上凿开冰洞，垂下绳钩捕鱼。狩猎的对象是生活于山林间的兔、鹅、雁、鹿、豹、虎、熊等。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有契丹族钓鱼用的渔钩，钩尖甚锐，钩身较长，并装有木柄，印证了契丹族确有“凿冰钓鱼”的习惯。辽宁阜新清河门辽墓中出土了契丹族狩猎用具链锤，为契丹人抛锤击兔用的猎具。辽建国后，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契丹人，继续从事渔猎生产。

契丹人以“车马为家”，骑马射箭是每个契丹男子的日常功课。骑射既是渔猎生产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游牧部族能够顺利地“逐水草而居”所必备的军事保障。在考古发掘的辽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车马具和游牧生活的特有用具，如马鞍、马蹬、车马铃等。契丹族重视马具的制作及装饰。1954年在赤峰地区辽卫国王驸马墓出土了八套马具，其中鎏金龙凤纹银鞍桥的装饰极为华丽。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中也发现有两套完整的马具，包括鞍、蹬、络、衔、缰、带、饰件等，其中一套马鞍保存基本完整，制作工艺精良。该墓还出土有木弓、木弓囊、箭、玉柄银刀、玉柄银刺、鹅锥、鸣镝、佩弓箭腰带、架鹰玉臂鞲等狩猎工具。契丹人的生活用具也带有游牧部族特色，如盛水用的鸡冠壶，又称马蹬壶，原为皮制，系于马上，后改为木制、银制、瓷制，但仍保留了皮囊的形状，瓷马蹬壶上还保留着皮绳、皮扣的纹路。在传世辽代绘画和已发掘的辽早期墓室壁画中，骑射和狩猎也是重要题材。如著名辽画家耶律倍作有《骑射》、《猎雪》、《千鹿图》，胡环作有《卓歇图》、《番部早行图》、《出猎图》和《回猎图》；内蒙古克尔腾旗二八地大郎君墓室壁画有引马

出猎、放牧、住地生活等场面，白塔子辽墓有引马出行、驼车卓歇等图，敖汉克旗辽墓有臂鹰出猎图和出行图。宋姜夔作《契丹风土歌》：“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如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这是对契丹人游牧生活的形象描述。女真族祖居黑龙江流域，在入居中原之前也以渔猎生活为主，骑马和射箭是女真人自幼的训练项目。由于生活区域气候寒冷，女真人用狩猎来的兽皮制成衣帽，用树皮建成房屋，屋中烧火坑。女真人也饲养一种叫做“海东青”的猎鹰捕捉各种飞禽。女真人甚至在建国之初还承袭了辽朝的“四时捺钵”，称为“刺钵”。曾被金人留居十五年的宋使洪皓就记载了金人保留“春水秋山，从驾在外”的习俗。进入中原农业地区后，女真贵族采取授田的方式侵夺汉人土地，大批女真人被迁往淮河以北的农业地区。金海陵王时，又将上京地区的女真宗室迁到中原。这些南迁的女真人将侵占的田地出租给汉人耕种，农业收入成为他们的主要衣食来源。

二、四时捺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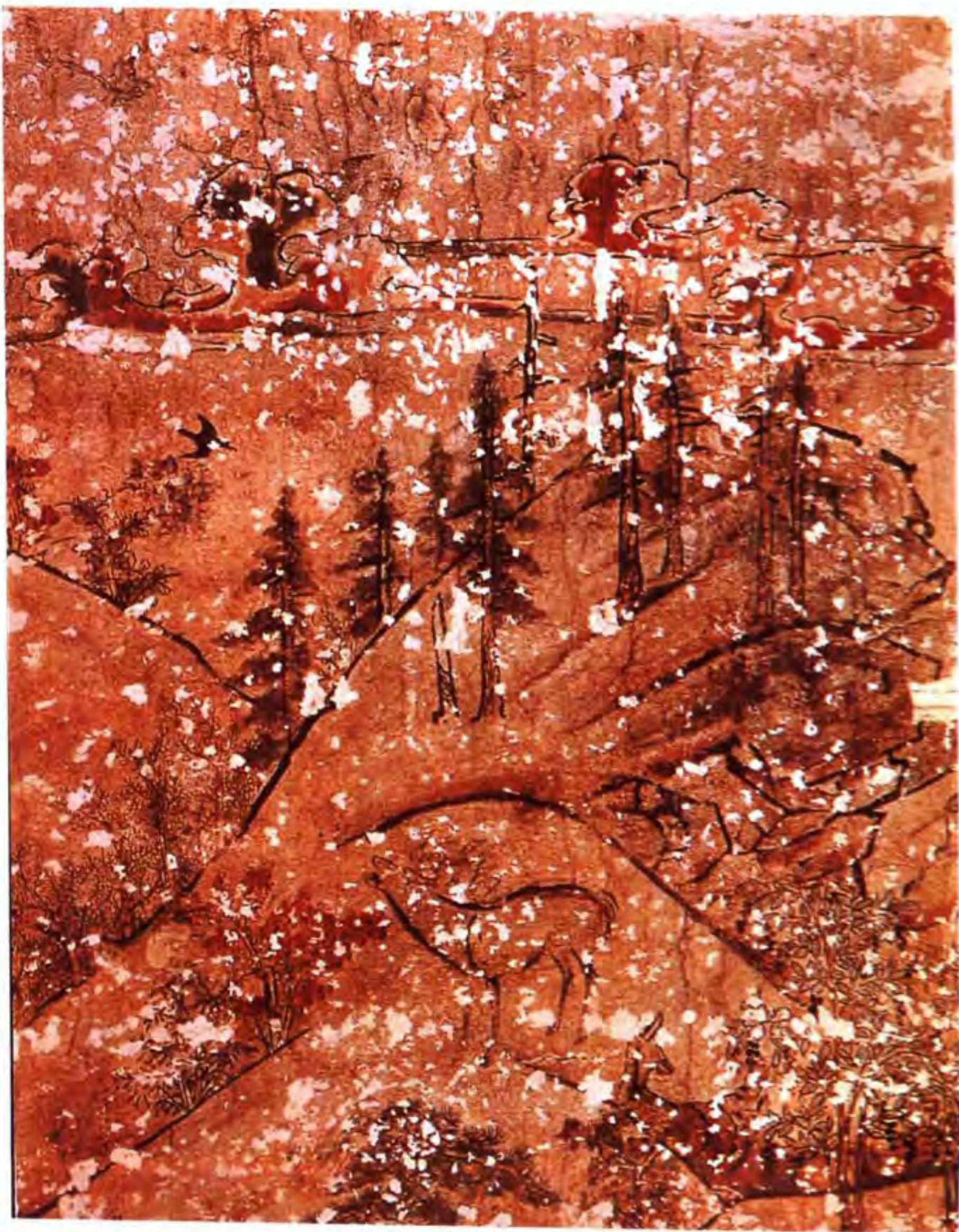
“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义为行宫、行营、行帐，后被引申为契丹君主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辽先后以上京和中都作为政治中心，但其统治者并不固定在京城居住，仍保留着住帐游猎习俗。《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辽皇帝在不同季节于游猎地区设立行帐，分别称为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辽圣宗以后，四时捺钵开始有固定的地点和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

东镇古城）的鱼儿泊捕鹅，或在混同江钓鱼；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避暑、张鹰；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伏虎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平淀猎虎。辽皇帝前往捺钵时，契丹内外臣僚随从出行，汉人枢密院、中书省也有少数官员扈从。夏冬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因而夏冬捺钵也成了契丹朝议军政大事的处所。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辽庆陵中室壁画《四季山水图》，实际上描绘的是辽四时捺钵的场景。

金灭辽后，承袭了契丹的捺钵制，但只讲究春水秋山，没有“四时”之分。春水即春猎之水，秋山即秋猎之山，春水秋山即指所有春秋狩猎地点，后来成为春猎秋猎的代

《四季山水图》（局部）

辽
高260厘米，宽177厘米
1993年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东陵中室发掘
壁画共4幅，分别描绘了辽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构图严谨生动，据考是对契丹皇室四季捺钵之地的描绘。此图为《四季山水图》的第二幅，展现的是夏季风光。



妇女结发砖雕(局部)

宋

河北巨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37.3厘米,宽11.3厘米,
厚2.1厘米

砖面浮雕妇女束发时的情景。妇女侧身而立,身穿宽领对襟短袍,胸前露斜纹抹胸,下着长裙,足蹬高头履,双手上举,至头顶束发。雕砖绘刻简明、流畅。



名词。有关金朝捺钵的情形,北宋宣和五年(1123)出使金朝的马扩曾作过描述。他写道:“朝辞,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纳跋行帐,前列契丹旧教坊乐工,作花宴。”这里的“纳跋”应与“捺钵”同义。金天眷二年(1139)冬,金熙宗“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自此金朝的定期捺钵也形成制度。汉族文人赵秉文曾随

吹笛、击节板陶俑

金 明器

1965年河南焦作出土

高分别为38.5厘米、36.5厘米



金章宗“春捺钵”,并写下《春水行》、《扈从行》、《金莲》等诗篇,记载了他的亲历亲见。在《春水行》中,他这样描述金人的“春水”活动:“光春宫外春水生,驾鹅飞下寒犹轻。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龙旂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鞢掣臂翻青冥。晴空一击雪花堕,迢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鹅夸得隼,一骑星驰荐陵寝。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其捕鱼猎鹅的场面与辽春捺钵时“击扁鼓,远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远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宰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的情景极为相似。

三、衣冠婚丧不同俗

在辽宋并立和宋金对峙之初,汉族和侵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保持着各自的生活习俗,无论衣食住行还是婚丧嫁娶都更多地承袭了本民族的传统。《辽史·营卫志》叙述南北之不同,称:“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的饮食、服饰、婚丧习俗渐渐对契丹、党项和女真族产生了很大影响。

汉族生活区域纺织业非常发达,衣装饰以丝麻织品为主。官服仍讲究宽袖大袍,男子蓄发,戴冠、巾、帽、幞头等。幞头是宋代开始普遍戴的一种帽子,有多种样式。最常见的是直脚幞头,有四带,其中两带系于脑后并下垂,两带反系并折向两边,无论贵贱都可用。硬脚幞头是用藤或纱漆为巾,以铁为左右二脚,唐代惟人主可用,晚唐时方镇僭服,到北宋时成为品官的官帽,而且

两脚越伸越长,据说让朝臣戴这样的长脚幞头,是防止他们在朝会时交头接耳。还有一种圆顶软脚幞头,多为小吏戴。另有无脚幞头,是卫士的服饰。南宋时还出现簪戴幞头,即在幞头上簪插金银、罗绢。总之,幞头被纳入为公服之后,也受社会等级制度的限定,成为身份品级的象征。宋代妇女服饰讲求华丽轻巧,样式多变且配套,福州南宋墓出土的多件衫、袍、背子、裤、裙、袜,色彩丰富,图案斑斓,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各种花样均有,镶边提花织绣,制作十分考究。妇女发式也极多,《梦粱录》有“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可见其装饰之繁富。

辽、西夏、金为北方游牧民族,因气候较寒冷,衣装以兽皮为主。辽建国后,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金“凡番官平居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皇帝、大臣等则服朝服,金建国初强制剃头辮发,穿女真衣装,禁女真人穿汉服,但屡禁不止,后来女真人穿汉服成为时尚。辽与西夏男子都髡发,其发式也相似,契丹人一般剃去头顶的部分头发,头部四周留发,或下垂披肩,或结成辮子,也有的只在两鬓留发,结成辮子。西夏建国后元昊下“秃发令”,无论士庶均剃光头顶,也是四周留发。

汉族重视婚丧嫁娶,讲求礼仪。“婚娶之礼,先凭媒氏。”先秦以来,一直行婚姻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到宋朝时古仪亡阙,很难不打折扣地施行,于是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新制定的礼仪,如司马光的《司马氏书仪》、程颐的《婚礼》、朱熹的《家礼》,经过这些圣贤的改造,“六礼”变成了“三礼”,即纳彩、纳币、亲迎。这三项礼仪基本包括了结婚过程的几个重要方面。



妇女涤器砖雕

宋

河北巨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38.8厘米,宽16厘米,厚1.9厘米

砖面浮雕妇女洗涤茶具时的情形。妇女高髻,身穿对襟上衣,站立于一长案之后。案上放着罐、盏、碗、勺等茶具,一只茶盏正被她拿在手中用布擦拭。砖雕构图生动,刻画极为细致。

原先的问名、纳吉、请期也未被取消,而是分别被合并到纳彩、纳币、亲迎之中。《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对民间的婚姻礼俗都作了细致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既有着严格的议婚、隆重的定聘,也有极为热闹的迎娶。

汉族以农业为主,以土地为家业,丧葬讲求“入土为安”。宋代开始兴薄葬,礼仪周全,但随葬品不像汉唐那样豪华奢侈。北方地区多仿木结构砖室墓,随葬品以生活日用品为主,一般为墓主人生前所用饮食具、文



妇女剖鱼雕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34.1厘米，宽24.1厘米，
厚2.2厘米

砖面浮雕为妇女剖鱼时的情景。其画面构图明快，细腻入微，静中见动，充满了盎然的生活情趣。

具、梳妆具等，陶瓷器、漆器、铜铁器较多，金银器较少。墓室中或有砖雕壁画，有的表现墓主人夫妇对坐场景，被称为“开芳宴”。

契丹、党项、女真族在建国前还是部落联盟性质，较汉族落后。契丹人同姓不婚，但姑表婚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限制。金建国后，曾禁止同姓为婚，继父继母的男女不相嫁娶，但在宗族内仍实行接续婚，还有世族世婚遗俗。西夏和金都有走婚遗俗。文献记载，西夏虽然也有“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的记述，但青年男女

在婚前似乎较为自由，“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女真族青年男女更为开放，少女及笄，可“行歌于途，自歌其家世妇工容色”，以对歌形式求偶。在夜晚举行的歌舞聚会上，一旦选中伴侣，便可自为媒聘，直到有了子女，再回到女方家中“拜门”，父母并不干预。

契丹、党项和女真族早期游牧四方，居无定所，都盛行天葬和火葬。契丹人死后“以其尸置于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党项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女真人“则以木槽盛之，葬于山林，无有封树”。辽在建国后，逐渐改为火葬与土葬相结合，即火化之后再用器皿装好埋入墓室之中，或以真人偶像实以骨灰装入棺木，同时仿效汉族的丧葬礼仪，造坟墓，立墓碑，为皇帝修建陵园。契丹贵族讲究厚葬，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有成套马具和用金银铜制作的生活用具和葬具。宋文维简《虏事实》记载：“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考古发现的这种铜丝网络已有十余件。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公主和驸马用的是银丝网络，网衣由头网、臂网、手网、胸背网、腹网、腿网、足网七个部分组成，七部分编织后，用银丝衔接起来，成一件整衣。此外，辽墓出土的面具也较多，按墓主身份高低，有金、银、铜、铁等不同质地。辽陈国公主墓为皇室贵族墓，下葬的公主和驸马都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璆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十一枚，腰上原束金跨丝带。辽晚期葬俗明显受汉族影

响,1971年发掘的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和1993年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张文藻墓,墓主人都是先火葬再土葬,棺木中以草为骨,穿戴衣冠,模拟真容,棺木上写有梵、汉两种文字的佛经;随葬品有铜镜、漆盘、熨斗、陶壶、陶仓、三彩洗、黄釉唾盂、黄釉碗、瓷盘、瓷瓶等;壁画也是胡汉兼备,券门上绘有三人下围棋的壁画,中间一人着汉装,并戴着硬脚幞头;前室西壁绘有穿汉服的乐人表演吹打的场面,东壁则绘髡发儿童嬉戏的场面。金在较长时间里保持火葬习俗,但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出现墓室墓碑,有的墓室棺槨俱全,有的只有装骨灰的石函瓦罐。

四、交流与融合

在多民族政权并立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宋,和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人建立的夏、女真人建立的金发生过战争,但在更多时间内保持了和平相处,汉族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对其他民族产生了极大影响。北宋时,契丹和生女真等还保留较多游牧习俗,但到了南宋,女真人进入中原以后,为了维持对汉人的统治,基本上接受了中原文化。经过上百年的交流和融合,中原先进文化逐渐取代了燕山以外的落后文化。

辽占据幽云十六州,西夏在西北一隅建邦立国,金更是占据了华北和中原大片地区,为了对这些汉族久居之地实施有效统治,这些王朝都采用了以汉制管理汉人的方式,即不变动原有的生产活动、生活习俗乃至管理体制。同时为了笼络汉人,这些王朝还广泛吸纳汉族文人进入各级政府机关。一些帝王不仅重用汉族习儒之士,自己也努力学习汉族文化。他们从中原搜购了很多儒家经典,并刻印儒经和诸子百家之书。辽、夏、金相继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辽保宁八年



(976),在南京(今北京)设立礼部贡院,主持科举考试。重熙元年(1032)以后,贡举每三年一次,考试也分乡、府、省三试,与宋朝完全相同。西夏自开国即设立“蕃学”,以此选拔人才。仁宗时开始仿效宋朝,在秋季考试举人。此后科举取士作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一直延续到西夏灭亡。金人占领北宋北方大部分地区后,为选拔官员,设立南北两科,以经义、词赋两科考试举人,称为南北选。贞元二年(1154)取消南北选,统一科举制度。辽、西夏、金的科举考题也都出自汉族儒家经典。

契丹和女真初期都信奉萨满教,后佛教传入,影响遍及全国。契丹不仅在上京和各

银丝网络

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研究所藏
全长168厘米



金面具

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研究所藏
长21.7厘米,宽18.8厘米,
重293.5克
由薄金片制作,与银丝头网连缀,出土时覆盖于陈国公主驸马的面部。

州县都修建了寺庙，贵族之家竞相出资刻印佛像经藏，而且向寺庙施舍钱物，甚至子女出家为僧为尼。现在中国北方不少地区还矗立着辽代建造的佛塔，如著名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巴林左旗辽上京南北二塔、宁城辽中京大小塔、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辽宁朝阳南北塔、辽阳白塔、锦州大广济寺塔，北京天宁寺塔等。辽兴宗开始刻印《契丹藏》，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完成。这部中国第二部刻版大藏经一度被认为失传，1974年修缮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时，发现了其残卷，成为中国印刷史上的珍品。西夏帝王自德明时就信佛，曾派人到五台山进香，其子元昊更是“晓浮图学”。西夏向宋朝索求佛经，得赐汉文《大藏经》之后专门在兴庆府建造承天寺贮藏，在天祐民安元年（1090）还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金人也崇信佛教，金中都有许多寺院，山西一女子还断臂募捐刻印了一部大藏经，因藏于山西洪

洞（赵城）广胜寺，被称为《赵城藏》；同时金还盛行全真教，全真教实为汉族道教的一派。

197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宣化发掘辽张世卿墓，该墓室顶部有一幅1116年彩绘星图，星图中央为天极，嵌有一枚铜镜，铜镜周围彩绘莲花，莲花外为日、月、五星及北斗，再外为二十八宿。双子座、室女座图案上的人物均着辽服，表现的是契丹民族的形象。莲花是佛教装饰，而二十八宿源自汉民族传统文化，以天极为中心的盖图法也是中原传统。这一幅星图融会了多民族的文化特色。

由于草原民族逐渐摆脱早期的游牧渔猎生活，定居农业地区，生活方式也渐渐与汉族趋同。金初强制北方汉人穿着女真服装，禁止女真人学汉人衣装，但后来女真人着汉装成为风尚，甚至“燕饮音乐，皆习汉风”。辽、西夏、金人都喜饮茶，与汉族风俗无二，为此每年要从宋朝进口大量茶叶。在宣化辽

童戏图

1993年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出土
该壁画在墓前室东壁，描绘了契丹儿童嬉戏玩乐的情景。



墓壁画中有茶道图，自碾茶至煮茶，描绘得栩栩如生。女真随着农业人口增多，粮食渐成主食，米粥、馒头、汤饼、烧饼、煎饼等汉人的主食和盐、醋、酱、油等调味品相继进入女真人家中。金代饮酒之风盛行，不管汉人还是女真人，也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有酒楼。在山西繁峙岩上寺金代壁画中，可以看到与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的繁华市井极为相似的酒楼茶肆图。

第二节 精耕细作

辽、宋、西夏、金时期，租佃制日益普遍，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所减轻。在长期安定的局面下，社会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垦田面积进一步扩大，作物品种和农耕技术获得交流和进步，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复种间作已为南方许多地区采用，粮食单位产量有了新的提高。

一、《耕织图》

自汉代以来，中国历朝就有将农桑生产

绘图刻石的传统。五代后周时，世宗命人“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于禁中”。宋仁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后来这种耕织图由宫廷发展到民间，一些郡县府衙也在东西墙壁上绘《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这些《耕织图》大都散失了，人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是南宋楼璹编绘的《耕织图》。楼璹是浙江鄞县人，南宋初曾担任临安（今浙江杭州）于潜知县。他有感于农夫、蚕妇耕织之苦，于是“究其始末，为耕织二图”，并将图献给宋高宗。南宋嘉定三年（1210），其孙楼洪、楼深将《耕织图》上的诗刻石。元代程桀编绘的《耕织图》，图数与楼璹的一样，基本上摹自该图。清康熙皇帝南巡，有人呈献宋版《耕织图》，康熙命宫廷画家焦秉贞绘制《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并刻版流传，但该图较楼璹《耕织图》有所改易增损，已失原貌。清乾隆三十四年（1770）令画院将程桀摹本《耕织图》双钩刻石。程桀摹本《耕织图》和乾隆刻石原放置在圆明园多稼轩，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摹本《耕织图》二卷被劫走，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乾隆刻



《耕织图·二耘》

清乾隆 刻石拓片

石《耕织图》部分被毁，幸存的二十三块刻石在民国初被徐世昌收为己有，镶嵌在私宅花园墙壁上。1960年该私宅被拆除，刻石移交中国国家博物馆。

楼璹的《耕织图》原有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耕图内容是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舂碓、舂、入仓；织图内容是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巢丝、蚕蛾、祝谢、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每图皆配以一首五言律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乾隆刻石二十三块，有三块磨损严重，已不能辨识，其余二十块计《耕图》十三图：浸种、耕、耙耨、耖、碌碡、插秧、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入仓；《织图》七图：下蚕、分箔、采桑、捉绩、择茧、蚕蛾、剪帛。存石不足原图一半，所幸的是乾隆刻石的全套拓本尚存于世。

《耕织图》系统而又具体地描绘了当时江南地区农耕和蚕桑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后人研究宋代农业生产技术的珍贵资料。

《耕织图》描绘农田耕作，自浸种至入仓凡二十一事，表现了宋代农业生产更加强调精耕细作。如播种前即有耕地、耙地、耖地，还要用碌碡平整田地。《耕织图》中的“碌碡”诗描述：“力由巧机事，利器由心匠。翩翩转圜枢，袞袞鸣翠浪。三春欲尽头，万顷平如掌。”“插秧”诗叙述了江浙地区使用秧马插秧：“晨雨麦秋润，舞风槐夏凉。溪南与溪北，啸歌插新秧。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我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耕织图》反映的是南宋两浙路的稻作生产场面，种稻尤其重视田间管理，南宋《农书》记载：“浙间三次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耕织图》有一耘、二耘、三耘，所绘与两浙稻作环节完全吻合。“二耘”诗描写农民在烈日下赤膊除草，连午饭也要家人送到田间的情景：“解衣日炙背，戴笠汗濡首。敢辞冒炎蒸，但欲去良莠。壶浆与簞食，亭午来饷妇。要儿知稼穡，岂曰事携幼。”收获入仓本是农家最高兴的时节，但催缴租赋的胥吏接踵而至，一年劳苦半输官，对劳动人民的不幸，《耕织图》的作者也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天寒牛在牢，岁莫粟入庾。田父有余乐，炙背卧檐庑。却

《耕织图·收刈》

清乾隆 刻石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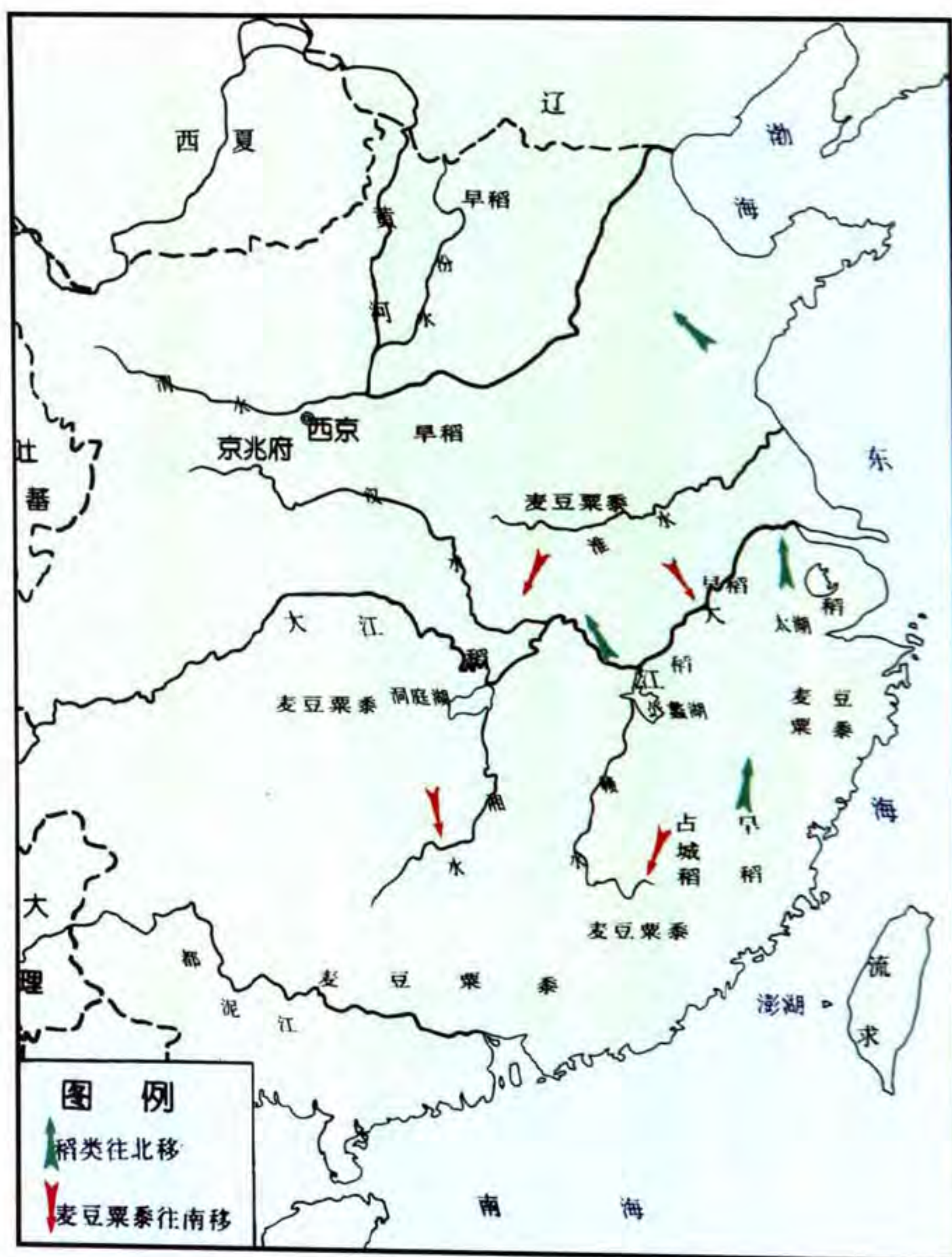


愁催赋租，胥吏来旁午。输官王事了，索饭儿叫怒。”

《耕织图》描绘蚕织，自浴蚕至剪帛凡二十四事。南宋《农书》记述江南“凡育蚕之法，须自摘种，若买种，鲜有得者”。摘种又是从择茧开始的，“开簇时，须择近上向阳或茧草上者，此乃强良好茧”。江浙地区养蚕一年能够饲育八次，《耕织图》“择茧”诗写道：“大茧至八茧，小茧止独蛹。茧衣绕指柔，收拾拟何用？冬来作缥缥，与儿御寒冻。”南宋诗人范成大作诗描写苏州养蚕讲究春季三眠说：“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耕织图》亦有“三眠”，所述与范成大的描写完全相同，其诗称：“屋里蚕三眠，门前春过半。桑麻绿阴合，风雨长繁暗。叶底虫丝繁，卧作字画短。偷闲一枕肱，梦与杨花乱。”每当收获之日，也是官府逼缴赋税之时，《耕织图》“剪帛”诗写道：“低眉事机杼，细意拔刀尺。盈盈彼美人，剪剪其束帛。输官给边用，辛苦何足惜。大胜汉缭凌，粉浣不再著。”可以说，楼琬的《耕织图》完整地表现了宋代男耕女织的生产和劳作，既是江南生产活动的全景图，也是劳动人民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

除楼琬《耕织图》的乾隆刻石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外，曾收藏于清宫廷的《蚕织图》在失散几十年后也于1983年在大庆市发现。该画卷长513厘米，高27.5厘米，分为二十四段，细致描绘了江浙一带养蚕织锦的全过程。据考证，此画卷正是南宋高宗时翰林书画院根据楼琬所进《耕织图》摹绘的《织图》。此外，在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还收藏有传为宋梁楷绘《耕织图》的《织图》部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则藏有该图全部摹本。

在已发掘的一些宋、西夏、金墓中，也



能看到表现农桑生产的壁画和雕砖。1977年宁夏泾原泾河源涝池北宋墓出土了一批雕砖，其中嵌于左墓室右壁券门两侧的两块雕砖均描绘农家收获时的劳作情景。一块表现推磨，一块表现碓米。推磨图画面正中是一石磨，圆形磨盘上横穿一长条推杆，两人正奋力转动推杆。左端是一高发髻的妇女，身着圆领短上衣、长裙，前系长带，双手平握推杆于胸前；右端是一赤裸的男童，背朝外，两腿叉开，双手高高举起，攀住高过其头顶的推杆，也做出一副推磨的样子。碓米图右方浮雕夫妇二人，男子在前，身着翻领左衽长衣，前襟掖起，系于腰带上，双手攀扶栏，脚踏碓杆；身后妇女，着短衣长裙，身背婴孩，也脚踏碓杆，一起碓米。画面左方是插

宋代谷物移植图

两宋时期，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交流进一步扩大。当时，为预防水、旱灾给农业带来的损失，福建的占城稻大量向江淮、两浙移植，江东早稻也移种到河北、淮北的粟、麦、黍、豆向南方各地传播，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广东等地也开始种植杂粮。

在长长的碓杆前端的石杵，下方是石臼，旁边还放着箩、簸箕等用具。画面简洁生动，表现了农家生活的盎然情趣。

二、占城稻

北宋初消除割据，基本实现了统一，不仅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不同区域的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的交流成为可能。

为增加粮食生产，宋太宗时，河北等地开始兴修水田，种植水稻。经过不断的摸索试验，最后成功引进了江东稻种。自此，华北地区“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为促进南北作物品种的交流，宋太宗还下诏要求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地区官员，“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秔稻，并免其租”。由于这项措施的推行，中国的农业生产改变了以往北方种粟、麦，南方种稻的传统耕作方式，不仅北方大面积种植稻米，南方许多地区也开始种粟、麦、黍、豆等作物。北宋灭亡之际，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这些北方人习惯吃面食，又促进了小麦在南方的种植。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江南甚至出现“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的场面。小麦和水稻生长季节不同，因此一些地区采取复种稻麦，使南方的粮食产量有了新的提高。

引进占城稻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史·食货志》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朝廷“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这种产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移种江东、淮南、两浙之后，适应性

极好，增强了作物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外许多经济史专家认为，占城稻的引进，主要优点还不在于其耐旱，而是扩大了作物复种比例，使南方稻田能够一年两获，这是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位产量的主要原因。占城稻是早熟稻品种，生长期100天左右，另一引进的早熟稻品种黄籼稻的生长期只在60至105天之间，都适宜在江南和福建与晚稻间种。北宋初双季稻还不多见，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浙东处州丽水曾出现“稻再熟”，朝廷以为祥瑞，翰林学士杨亿为此还写了篇《贺再熟稻表》。但到了南宋，双季稻的种植就十分普遍了。不仅两浙、福建、江南的许多地区种稻都能一岁两熟，湖北、淮南也出现了稻再熟的记载。除了再生双季稻，宋代还出现了间作双季稻和连作双季稻。南宋《嘉定赤城志》描述浙东台州种稻有献台、相连、寄生、第二遍等品种。其寄生稻，按照明代人的解释：“寄生，以寄种早禾中，故名，一曰晚儿。”即间作双季稻。其连作稻和第二遍稻，显然是指连作双季稻，即早稻收割后，经过整地，再插晚稻的一种双季稻。成书于南宋宝祐间（1253—1258）的《琴川志》形容此稻种的特点是“再时晚熟”。宋《群芳谱·谷谱》也记载：“乌秈，早稻也，……三月种，七月收。其田以时晚稻，可再熟。”另外，南宋福州方志《三山志》也记载：“今州倚郭三县两熟，早种曰献台、曰金州林，晚种曰占城、曰白芒，通谓之稻。”由此可见，连作双季稻在宋代两浙路和福建路的许多地区都有种植。

北宋时期，棉花的种植主要在广东、广西和福建路，南宋时逐渐向北扩展到两浙和江南东西路。大约在南宋初年，原种植于西北地区的西瓜也开始在江南播种。洪皓《松漠纪闻》记载，他自金朝返回南宋时携带了

西瓜种，“今禁圃、乡圃皆有”。大约是气候转冷的缘故，宋代以后，蚕桑业养殖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南方，“杭湖等州属县多以桑蚕为业”。由于蚕桑业的收益高于粮食生产，因而这些地区很多农民弃耕植桑养蚕，蚕桑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南宋杭州富阳县“重于粪桑，轻于墾田”，湖州“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

三、踏犁、秧马、水转翻车、水转连磨

两宋时期，人口繁衍较快，大约到北宋末已超过一亿，但耕地增长有限，各地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而更加重视精耕细作。南宋成书的《农书》强调“广种不如狭收”，体现了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适时播种、合理施肥、加强田间管理的重要性。精耕细作在生产工具上的表现是犁、铧、钁等深耕农具的改进和锄、耨等中耕农具的普遍应用。北宋的铁犁铧、铁犁镜在河南禹县白沙水库、河南洛阳、山东曲阜、山西太原都有出土，虽然历经近千年，外形依然完整。宋代的犁基本由犁床、犁壁、犁铧三部分组成。犁床为木质，耕地时与地面平行，犁壁和犁铧安装在犁床前端，是耕地翻土的主要构件。宋代农民为便于深耕，将犁壁铸造成桃形，因其外观酷似铜镜，所以又称为犁镜。此类犁镜，在金统治区域也曾出土，反映了金代农业生产的普遍。1955年江苏扬州凤凰河出土一件四齿铁钁，长18厘米，宽17.5厘米，保存也很完整，前端有四支平行的钉齿。耙为松土、除草工具，在讲究精耕细作的宋代农村应用十分广泛。1952年在河南禹县白沙水库还出土了铁弯锄和铁耨头，是施肥除草用的中耕农具。铁弯锄锄刃平直，锄柄前部弯曲，柄体中空，可安插木柄，与今天农村中还在使



铁犁镜

宋

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出土

长30.6厘米，宽24.5厘米
宋代的犁基本由犁床、犁壁、犁铧三部分组成。农民为便于深耕，将犁壁铸造成桃形，因其外观酷似铜镜，所以又称为犁镜。

用的铁锄十分相似。

宋代水稻播种面积扩大，使得曲辕犁、水田耙和耖等稻作农具的使用更为普遍。曲辕犁能调节深浅，极适宜水田耕作。耙用于碎土；耖则用于疏通田泥，打混泥浆。水田先耕后耙，耙后再耖，使田面平整，田泥细碎，利于秧苗生长，适应于稻田灌溉。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是宋代主要稻米产区，对稻作农具的改进非常重视，宋人将曲辕犁的犁铧加大，使其能够深耕，且更适用于水田，称为江东犁。宋代江浙间还创制了耘荡，其“形似木屐，而实长尺余，阔约三寸，底列短钉二十余枚”，可用来推荡水田禾垅间草泥，“使之混溺，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数倍”。另外有用于除



铁犁铧

宋

河南洛阳出土

长26厘米，宽20.8厘米
北宋的犁铧有尖头、圆头两种形制，能适用翻耕不同的土质；刃边多用熟铁或钢制，这样，不仅便于深耕，而且不易折断碰缺，经久耐用。

草疏泥的工具耘爪等。中国传统稻作农具在宋代大都出现，并且基本定型。

水稻播种面积的扩大，使对耕牛的需求大为增加。为解决耕牛不足的问题，宋朝廷推广使用一种“踏犁”，即以人力踩踏致犁翻土。周去非《岭外代答》描述：“踏犁形如匙，长六尺许。末施横木一尺余，此两手所捉处也。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处也，……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犁之深于土。”直至20世纪末，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有踏犁的实物，称为“脚犁”。淳化五年（994）三月，宋太宗命人取踏犁样式，制作了几千具踏犁供农民使用。宋真宗景德二年（1006）因河朔地区缺牛，“内出踏犁式，诏河北转运使询于民间，如可用，则官造给之”，“淮、楚间，民用踏犁，凡四五人力可以比牛一具”。南宋建炎二年（1128）三月，由于战乱之后耕牛极缺，又有人建议使用踏犁，在朝廷督促下，踏犁在南宋各路广泛使用。

“秧马”是宋代一些稻作地区大量使用的插拔秧苗的辅助工具，尤其在浙西、江西、

湖北、福建、广东应用非常普遍。其外形似小船，头尾翘起，背面像瓦，供一人骑坐其上，插秧时将秧苗放置船头，取秧插入田中，然后摇动秧马向后，继续插秧；拔秧与此类似，人坐秧马之上，将秧苗拔起，捆好后置于船后，主要作用是减轻劳动强度。苏轼《秧马歌序》写道：“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梧为背，欲其轻。腹如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苏轼还将秧马的使用推广到广东惠州。陆游作《卜算子》，形容“夜雨醉瓜庐，春水行秧马。点检田间快活人，未有如翁者。”楼涛《耕织图》“插秧”图诗云：“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被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宋代以后，类似秧马的秧苗栽移辅助工具在中国一些水稻产区仍有使用，福建称其为秧船。

江浙地区河湖遍布，水源充沛，于是人们发明了以水作动力的灌溉工具和加工工具。如水转翻车、水转筒车、水转高车、水转连磨、水转纺车等。水转翻车无需人力畜力，“日夜不止，绝胜踏车”。苏轼在无锡见到称为“龙骨水车”的水转翻车，惊其奇效，作诗赞道：“翻翻联联衔尾鸦，莘莘确确蛻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水转高车可将低处之水转至高处之田中，“如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皆可及之”。范成大诗“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说的就是这种水车。水转连磨是粮食加工工具。其原理是利用水轮，同时带动九盘石磨，改变了以往只能依靠人力、畜力推磨的粮食加工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工效。江西地区也用水转连磨加工茶叶。若变换机械装置，也可用作水碓和汲水筒车。楼涛的《耕织图》“春碓”诗描述：“娟娟月过墙，簌簌风吹叶。

王桢《农书》中的秧马图



田家当此时，村春响相答。行闻炊五音，会见流匙滑。更须水转轮，地碓劳蹴踏。”

四、梯田、圩田、架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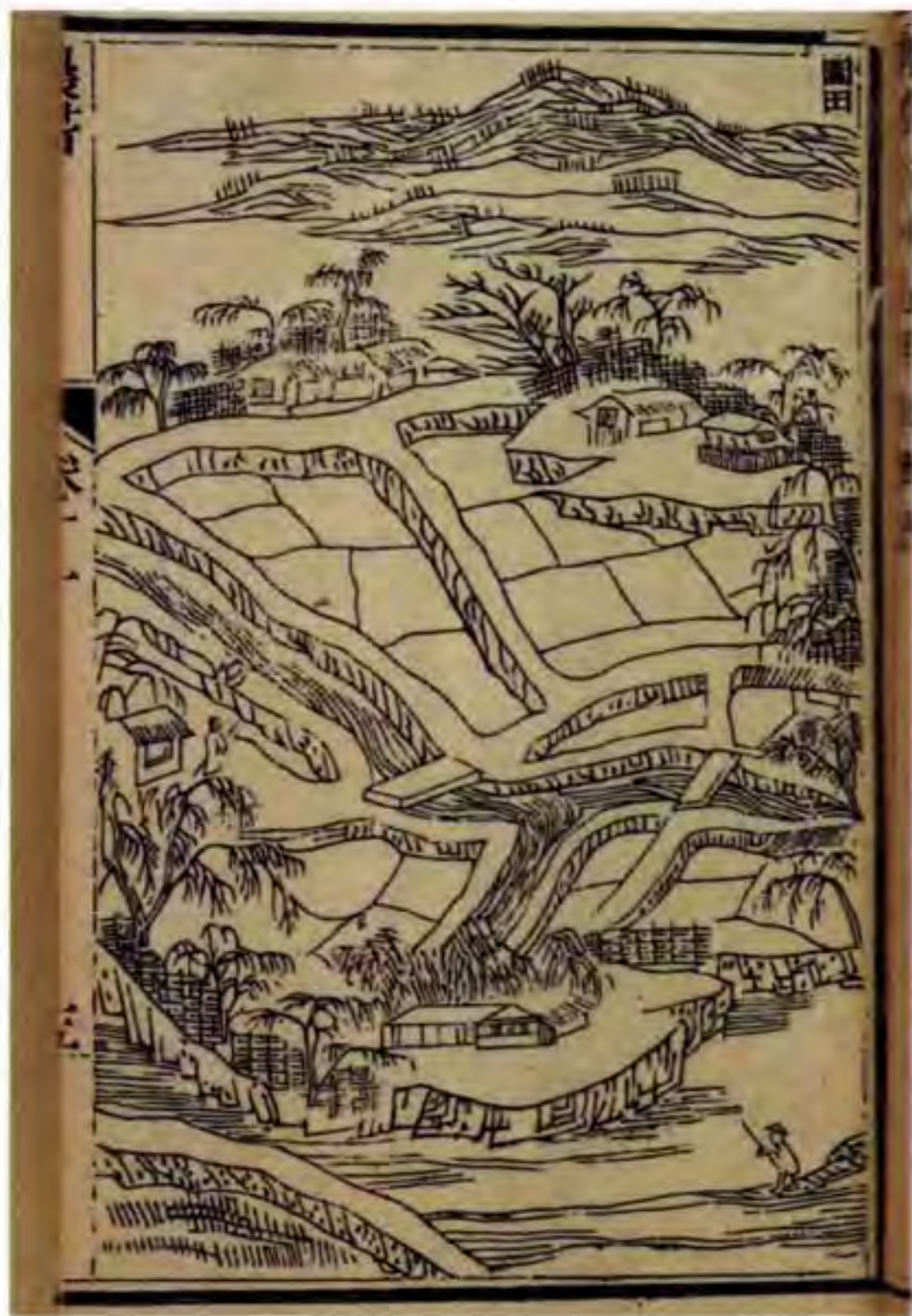
宋代南方人口增长很快。金人南侵，占据了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带来巨大压力，两浙路、福建路和两广地区都出现了耕地不足的问题。如苏州地区，“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当时人形容“浙间无寸土不耕”，“江浙之田，不以肥瘠，民争尺寸”。为寻找新的耕地，保障和扩展现有耕地，这些地区的农民想方设法，与山争地，向水要田，兴修了众多梯田、圩田和架田。

梯田是山川丘陵地区农民与山争地的一种形式。梯田在宋代前就已出现，但最早使用“梯田”一名是在南宋。据范成大的《骞鸾录》描述，江西袁州“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元王桢的《农书》进一步总结了修造梯田的方法，如将土山修成阶梯状的田块、垒石包土以免水土流失等。宋代福建路、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两淮路、广南东西路和四川地区都修建了大量梯田。

圩田主要出现于河湖纵横的江南和两淮地区。最初采取的是简单的围湖造田，即“筑土作围以绕田也”。为了更多和更加合理地将水泊改造为良田，宋人在围田围水时，把修堤开渠与水闸、斗门、车戽等水利设施结合起来，建成能灌溉、能泄洪的圩田。南宋杨万里的《诚斋集》记述：“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宋代官府和民间修建的圩田数量多、规模大。江南东路官圩田七十九

万多亩，宣州（今安徽宣城）有官圩田十七万亩、私圩田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江南东西路、两浙路等宋代主要稻米产区更是圩田相连，遍布各州县。有的圩长达数十里，圩中田地多达百千顷。著名的圩田有永丰圩、万春圩等。万春圩号称有田一千二百七十顷，每年产米八十万斛。江阴境内的芙蓉湖，“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又号三山湖，今皆为圩田”。湖州“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圩田一般都有通畅的引水灌溉系统，能防御水旱灾害，加之以淤地为田，土质较好，往往是粮食高产田。但无论是围田还是圩田，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水系和生态，加之农垦本身就是对周围环境的损害，过度地与水争地，带来的是水网减少和水土流失，这些影响直到20世纪才为人们所认识。

架田又称葑田。南宋陈旉《农书》介绍说：“若深水藪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由于是以葑泥附木架于水面上的田地，故名葑田或



王桢《农书》中的梯田图

架田。宋代江浙等地不少州县采用此法造田。宋蔡宽夫记述：“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陆游曾见到长江江面上在木筏上铺土种植蔬菜的架田。范成大也曾作诗“小舟撑取葑田归”，是说苏州农民种植的葑田可以用小船拉走。架田也是南方水网地区农民与水争田的方式之一，只是架田是浮动在水面上的田地，面积不可能很大，往往被用来种植蔬菜。

五、苏湖熟，天下足

宋代太湖流域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也是京师漕粮的重要供应地，当时有“苏湖熟，天

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称誉，指的就是苏州、湖州、常州等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国家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湖、常等州田土肥沃，又是宋代水利建设开展最频繁的地区。王安石变法期间，各路兴修水利，两浙路的水利工程有两千多处，居全国第一位。《吴郡志》以两卷篇幅叙述水利，主要引述当地著名水利专家单锷所撰《吴中水利书》。南宋时，由于中原和淮北已失，太湖流域作为国家粮仓的地位更显重要。《宋史·食货志》载：浙西“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不间断的水利建设使这一地区“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太湖流域又是宋代精耕细作的典范地区，几乎所有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新农具的出现都和这一

《耕获图》

南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纵24.8厘米，横25.7厘米
无款，绢本设色
此图描绘了农民从播种到收获的农耕生产过程，类似《耕织图》。



地区有关。农民对每一生产环节都非常讲究,如秋收之后,“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春二月又再耕,名曰炒田”。播种后的除草也毫不马虎,先后三次耘田,有时还放掉田中的水,将拔出的杂草沤在泥中,然后再重新灌水入田。遇到天旱,则启动各种水车输水灌溉。这一地区还盛行一种称为“靠田”的育苗技术,即“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还水以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

苏、湖、常地区普遍采用两熟制生产,或一稻两熟,或稻麦两熟。北宋时,占城稻最早引进至两浙等地,经百年实践,培育出众多适应本地的优良稻种。农史专家游修龄根据传世十二种宋代地方志所载水稻品种作出统计,总计新增稻种二百一十三个,属太湖流域的苏、湖、常地区就有六十一个。范成大的《吴郡志》载:“吴地宜杭稻,玉粒甘香,为天下甲,其种名不一。”谈钥的《嘉泰吴兴志》在记录十个稻名后,又说:“询之农人,梗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宝祐玉峰志》卷下“土产”和《琴川志》卷九“叙产”所载昆山和常熟两县的水稻品种,也在五十种以上。

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作物品种的改良,在农民的辛勤劳作和精心培育下,苏、湖、常地区的粮食产量始终居全国前列。北宋时,范仲淹曾知苏州,他记述当地亩产:“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愧郾录》卷六记载:“今苏、湖间上田每岁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计,亦止得八斗。如江乡田,上色可收谷四石,却可得主租二石。”这一地区圩田很多,而且也高产,湖州“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方回《续古今考》卷十八记载,“吴地之田亩产米

三石,山田二石”。这样的产量基本上比其他州县上田的产量。北宋初,苏州每年税米仅十八万石,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增至三十五万石,元符二年(1099)又增至六十万石。南宋嘉定间,仅苏州一地余米就多达一百万石。正因太湖流域的丰歉直接影响到全国的粮食调拨,时人称誉:“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

第三节 走向精致

两宋时期,手工业作坊规模逐渐扩大,家庭手工业产品日益商品化,行业分工更趋细密,矿冶、纺织、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生产技术和产量都超过了前代。手工产品的制作呈现出大众化、艺术化的特征,无论是供应皇室贵族的文思院造作,还是民间手工业作坊,无论是仿古观赏物,还是普通生活用品,器物制作都精致考究,一些日用品都可当作工艺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市场竞争的需要,不少手工产品都标注出产地、店铺名称或制作人姓氏。各行业手工业者极尽天工奇巧,使得各类产品争奇斗艳,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

一、名瓷传天下

宋辽西夏金时期,制瓷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为了供应官府和民间日常需要,瓷器烧造成为重要产业,窑场遍布南北,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工艺水平有了迅猛提高,产品的造型、款式日益翻新,釉色品种更加丰富。一些著名瓷窑的产品形成特定风格,并对其他瓷窑产生影响,从而形成窑系。宋代出现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五大名窑,此外,河北磁州窑、陕西耀州窑、浙江龙泉窑、

官窑贯耳瓶

宋

传世品

高23厘米，口径8.3厘米

官窑是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这件贯耳瓶即仿自青铜投壶，直口阔腹，底足外侈，瓶颈两侧各有一筒形穿孔耳。瓶身有三道平行凹线。除足底无釉，全器施粉青釉，釉面布满开片，口沿因釉薄而微露紫胎颜色。造型端庄，釉色厚润，紫口铁足，是宋代官窑瓷器中的珍品。



定窑划花萱草葵瓣口碗

北宋 盛器

高6.1厘米，口径21.4厘米，

足径6.6厘米

碗内以流畅的刀法刻划出折枝萱草纹样，花纹富有立体感。



江西景德镇窑和吉州窑、福建建阳窑和德化窑的产品都盛名天下，辽三彩、西夏褐釉瓷和金黑白瓷也各具特色。宋代瓷器还远销海外，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定窑遗址在河北曲阳，曲阳古代属定州，故称定窑。定窑瓷器自唐代晚期开始烧制，以白釉为主，也有一些黑釉、绿釉、紫红釉瓷器，产品多为碗、盘、枕等日用品。1969年考古工作者在定州宋塔塔基出土115件瓷器，全部是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很多瓷器底部刻有“官”字，说明是官窑定瓷。定窑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泛黄，纹饰多采用划花、刻花、印花，以缠枝牡丹、莲花、菊花居多。北宋中叶以后，定窑工匠采用覆烧工艺，把盘碗之类的器皿倒扣过来烧，并用较薄的垫圈支垫，以代替过去的匣



汝窑洗

宋 陈设品

传世品

高8.8厘米，口径16.4厘米，
底径13.2厘米

汝窑在北宋末年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仅历二十余年，传世瓷器极为稀少，尤其是汝窑洗，国内外所藏不过十余件。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这件汝窑洗原为清官旧藏。直壁，平底，口径略大于底径。香灰色胎，天青色釉，釉面满布细小开片。

钵。这种装烧方法，充分地利用了空间，增加了产量。但采用覆烧法，口沿难以施釉，往往露胎，被称为“芒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的定瓷器物的芒口镶上金、银、铜边。

汝窑遗址在今河南宝丰（宋代属汝州），北宋末年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1987年下半年，河南文物研究所组织考古发掘队对位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遗址进行钻探和试掘，发现窑址规模在25万平方米以上，并出土了300多件完整或较完整可复原的瓷器。汝窑

仅历二十余年，传世瓷器极为稀少。据南宋人描述，汝窑烧制瓷器，釉料中加有玛瑙。经测定，传世汝窑瓷器的釉中确实含有玛瑙碎末，故釉色晶莹，犹如碧玉一般。

官窑是北宋末年专门烧制御用瓷器的窑场，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北宋官窑遗址至今尚未发现，且传世官窑器物釉色和造型与汝窑相仿，所以有人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官窑粉青弦纹三足炉

宋 陈设品

传世品

高8.6厘米，口径15.8厘米，
底径14.3厘米

直口，直壁，平底，炉壁底部出三立足，足为柱形，较短，上部紧贴炉壁。造型类似古代酒樽，为仿古制品。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布满黄褐色开片。釉色晶莹透明，富有光泽。

哥窑鱼耳炉

宋 陈设品

传世品

高8.8厘米，口径11.9厘米，
口径9.2厘米

相传宋代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都在龙泉（今浙江龙泉）建立窑场，烧制瓷器，人们分别称为“哥窑”和“弟窑”。传世哥窑瓷器与南宋官窑瓷器具有一些相似特点，如胎色灰黑，足底露胎，呈“紫口铁足”状；釉色多为粉青、米黄；釉面布满大小开片，大开片裂纹处色深，小开片色浅，呈现“金丝铁线”的特征；器形除盘、碗、碟、洗外，有不少仿古器物。这件哥窑鱼耳炉造型古朴典雅，口沿微敞，腹底稍宽，鱼形双耳对称，曲线流畅和谐，是一件制作精良的仿古陈设品。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但不见宋人记载，窑址也未发现，仅在相传实物中被认定。器物特征为胎质灰黑，足底露胎，呈现“紫口铁足”，釉色多为粉青、米黄，釉面布满大小开片，呈现“金丝铁线”。传世哥窑瓷器与明曹昭的《格古要论》描述的南宋官窑瓷器“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具

有相似的一些特点。宋室南迁后，南宋朝廷曾在杭州置官窑，文献记载为杭州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郊坛遗址已发现，但修内司窑未知所在。一些陶瓷史专家认为，古人所谓哥窑，实为南宋修内司窑。传世哥窑瓷器极少。

钧窑遗址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八卦洞。1975年，河南省博物馆组织人员在八卦洞附

钧窑玫瑰紫海棠式花盆

宋 陈设品

传世品

高14.4厘米，口径19.5厘米
至24.5厘米

平口四曲，器壁由四条内凸的棱线分成四瓣造型，四云头足。外底面有乾隆时加刻的“重华宫”、“金昭玉翠用”楷书题字。除盆内口沿一圈釉色暗黄，其余部分以蓝紫、紫红色釉为主，色彩绚丽多变，晶莹的天蓝釉色中映现出宛若玫瑰般的紫红，极其斑斓。





钧窑玫瑰紫大花盆

宋 陈设品

传世品

高22.7厘米，口沿23.4厘米
花盆为渣斗式套盆，敞口，直颈，鼓腹，圈足外撇，足底有五处支钉痕迹。全器施窑变釉，釉色紫蓝，上浅下深，可见蚯蚓走泥纹，并显现深蓝色斑点。

近的钧台窑址进行发掘，出土有大量精美的宋钧窑残片。钧窑属北方青瓷系，釉色以青蓝为基调，因釉料中含氧化铜，烧成的瓷器于青蓝中呈现紫红色，人们称其为“窑变”；又因在烧制过程中釉层往往发生干裂，低粘度釉在高温作用下流入裂口，由此形成钧窑瓷器特有的“蚯蚓走泥纹”。

磁州窑和耀州窑均属北方青瓷系。磁州窑的窑址在河北磁县观象台，以烧制民间日用品为主，胎质有灰白、红褐两种，器内多不挂釉，器表则施薄釉。划花、刻花、剔花及珍珠地划花是磁州窑常见的装饰手法。瓷枕是磁州窑的特产，目前已发现数百件宋元时期制作的纹饰各异的磁州窑瓷枕。耀州窑遗址在今陕西铜川，主要生产日用瓷，北宋中后期曾为宫廷烧制瓷器。耀州窑瓷器釉色青中带绿，近似橄榄色，装饰多用刻花和印花，造型多样，仅瓶就有十几种样式。

龙泉窑遗址在浙江龙泉，是宋代南方重



耀州窑刻花莱菔尊

宋 陈设品

高24.2厘米，口径5.1厘米，底径13.5厘米

瓶体修长，侈口，短颈，因形似莱菔，故名。瓶身雕刻缠枝牡丹，施橄榄色青釉。由于刻饰时刀锋较深，施釉后刀刻处积厚釉，使得花瓣边缘呈现阴影，颇具立体感。

要的产瓷区，以烧制民间生活用具及各类文具为主，也烧制香炉、塑像等。龙泉窑青瓷胎骨白色，釉无纹片，釉汁透明，釉色以粉青和梅子青最为著名。粉青釉亦称虾青釉，釉层肥厚，釉表光泽柔和，具有青玉的质感。南宋时，浙江其他地区及福建、江西也纷纷烧制与龙泉窑风格相同的青瓷，形成特有的青瓷窑系，并成为外销瓷的主要品种。

江西景德镇在宋代已成为影青瓷的主要产地。影青瓷又称青白瓷，釉色介于青、白

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泛青，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产品多为盘、碗、盆、罐、瓶、壶、枕等日常生活用品，以酒具、食具较多见。造型和装饰多种多样，器物胎质普遍较薄。1986年安徽全椒石北村北宋张之乾墓出土了六件影青葵口碟，胎厚仅0.1厘米，极为轻盈。由于影青瓷产品以日用品为主，各地又多仿造，故考古发掘出土的影青宋瓷很多。1983年江苏镇江登云山南宋墓出土一套两件带温碗酒注，为古代烫酒器皿。酒注

龙泉窑凸花葫芦瓶

南宋 陈设品
传世品

高26.9厘米，口径4.7厘米，
足径9.2厘米

瓷瓶呈束腰葫芦形，口沿微侈，底部矮圈足。通体施粉青釉，堆贴缠枝花卉。纹路突起处因流釉而露出胎质的白痕，俗称“出筋”。



呈瓜棱形，直颈，溜肩，鼓腹，高流高柄；温碗敞口深腹，托住酒注，碗壁折线形成花瓣，宛若一朵刚刚开放的莲花。1991年，四川遂宁发现数量惊人的窖藏宋代瓷器，近千件南宋影青瓷器同时出土，成为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中有一件影青刻画缠枝牡丹梅瓶，瓶身遍刻缠枝牡丹花纹，瓶颈刻凸弦纹，惟歙口瓶盖无纹饰，除圈足未施釉，露出白胎，整个器物布满青白釉，釉色莹润，花纹飘逸，应属景德镇影青瓷器中的上品。2002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与广东省文博单位合作，对南海宋代沉船进行了勘察，目前已打捞上岸的影青瓷器有4000余件。

吉州窑遗址在江西吉安永和镇。其特色是在瓷器表面施以彩绘，图案有花草、动物、海波纹等，甚至将民间剪纸的花样移至器物表面。吉州窑也出产玳瑁釉瓷，即在烧制黑釉瓷时添加一些淡黄釉，或作块状，或作条状，经炉火焙烧，不同颜色的釉层在高温下相互浸润，烧成后淡黄釉色在黑釉底色衬托



影青瓷带温碗酒注

南宋 酒器

1983年江苏镇江登云山南宋墓出土

一套两件。通高23.9厘米，温碗高23.2厘米，口径17.4厘米，底径10.5厘米；酒注高20.9厘米，底径8.8厘米。带温碗酒注是古代烫酒器皿。该器酒注壶体作瓜棱形，直颈，溜肩，鼓腹，高流高柄，只是壶盖为后配，颜色微黄，托住酒注，碗壁折线形成花瓣，宛若一朵刚刚开放的莲花。

吉州窑玳瑁釉碗

宋 食具

高5.3厘米，口径10.6厘米，
底径3.4厘米

下蜿蜒浮现，似行云流水，更像玳瑁斑纹。福建建阳窑也烧制这种瓷器。

福建建阳窑主要烧制黑釉瓷，因不易作花纹装饰，工匠便采用含铁矿的氧化物作釉料，氧化铁在高温作用下形成气泡升至釉面，冷却时凝固为不同的结晶体，于是便呈现出称为“兔毫”、“油滴”的特有斑纹。德化窑主要烧造白瓷。

辽代制瓷业也比较发达，由于受到宋定窑和磁州窑影响，出产白瓷和褐釉剔刻花瓷较多。考古发现的辽代瓷器具有浓厚的民族

特色。各种釉色的长颈瓶、凤首瓶、笛式瓶、穿带壶、注壶、鸡冠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暖盘、三角形碟、方碟是辽瓷的特有产品。辽三彩承袭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

西夏制瓷也具有一定规模。1983年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灵武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窑炉四座，作坊遗址七处，出土的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类。青釉瓷有素面和刻花两种，其他三类均有素面、刻花、剔花和点花四种。器物有碗、盘、盆、钵、釜、杯、

三彩釉印花游鱼海棠式长盘

辽 食具

1959年内蒙古宁城辽墓出土
高2.1厘米，长27.6厘米
长盘形如海棠花，胎质粗硬，先挂白陶衣，加施黄、白、绿三彩釉，釉面有细微冰裂纹。外壁为黄釉，边缘以绿釉绘卷草纹，盘底以白釉作澈，绘有落花游鱼。釉色莹澈，造型美观大方，是辽三彩中的精品。





黑釉瓷瓶

金

山西大同南郊十里铺出土
左高14.8厘米，口径4.4厘米，足径4.8厘米；右高14.5厘米，口径4.5厘米，足径4.8厘米

两个瓷瓶的造型、胎质、釉色完全相同，当为同时同地烧造。每个瓶体腹部都有三处铁锈花，颇似中原地区定窑烧造的黑釉瓷器，即通常说的“黑定”。

盒、壶、瓶、罐、缸、瓮、灯具、钩等。带双耳或四系的黑釉、褐釉剔刻花扁壶是最具西夏民族特色的瓷器。

金代制瓷分两个时期，迁都燕京（今北京）之前工艺水平较低，主要生产粗瓷，器形有瓶、壶、罐等，器物上往往带有系绳的耳系，具有游牧民族特色。大定（1161—1189）以后，北方一些瓷窑逐渐恢复，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继续生产，工艺水平也有新的提高，白釉黑花葫芦形瓶、黑釉桃形壶是金瓷特有的器形。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瓷器，以定窑为最多，有刻花、划花、印花多种，而以萱草纹、荷花纹较为流行。耀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以青釉为主，也有黑釉，器物以食用器居多。河北观台窑（今河北磁县西南）所烧的白瓷，胎质很薄，釉色带青，

花纹多刻在器内。山东、山西烧制的白瓷，在釉下施以红绿彩绘。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宿州（今属安徽）还出产一种绳纹印饰的白瓷。

二、重见天日的丝织品

宋、辽、西夏、金时期，纺织业获得新的发展。丝织品的生产已遍及全国，棉纺织品已从两广、福建扩展到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传统的麻纺织业在四川、广西等地也很繁盛。宋朝赋税中一个重要项目是布帛之征。皇祐年间（1049—1054）绢帛征收八百四十七万多匹，到元祐初（1086）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五万匹，超过唐代十倍。仅两浙路的上供绢就有一百一十七万匹，还不包括买绢的数额。

丝织业在纺织行业中仍具重要地位。北宋河北路、京东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和四川地区桑蚕业发达，也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区。这些地区都拥有自己的名牌产品。《袖中锦》中列为“天下第一”的有蜀锦和东绢。蜀锦自汉代以来就驰名海内外，“茧丝织文纤丽者穷天下”。东绢产于京东路，这一地区自上古时就桑林密布，许多人家以蚕桑为业。单州“一邑桑柘，春阴蔽野”，所产薄缣盛名天下。京东各州都有上供绢帛，其中青、齐、郛、濮、淄、淮、沂、密、登、莱等州的平绝，皆为丝织品中的精品。其他地区也有丝织名品，如抚州的莲花纱、亳州的轻纱、杭州的唐绢、建宁的濯锦、绍兴的越罗等。河北也是传统桑蚕养殖地区，丝织业有着悠久

的历史，《宋史·食货志》形容“河北衣被天下”。

河北定州是北方的一个丝织中心，以制作缣丝久负盛誉。《鸡肋编》卷上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纬布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刻丝，又称缣丝，用线细密，设色精妙，费工较多，一名妇女织一件衣裳也要花一年时间，实为皇室贵族享用品。缣丝勾络花鸟山水线条分明，颜色浓淡相宜，是极为精致的工艺品，流传后世的不少宋代缣丝作品都是宫廷收藏的

朱克柔缣丝山茶

南宋

高26厘米，宽2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画面上山茶怒放，枝叶飘摇，右上方一只蝴蝶展翅飞来，运笔细腻，图画生动。画面左下角缣“朱克柔”朱色印。



珍品。《清秘藏》说：“宋人刻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剡断，所以生意浑成。”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不少清宫旧藏宋代刻丝作品，其中不乏名家之作，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沈子蕃所作《梅鹊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沈子蕃的《花鸟》和《山水》，上海博物馆藏有朱克柔的《莲塘乳鸭图》，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朱克柔的《牡丹图》和《山茶图》。朱克柔是南宋初年松江的一位女缣丝手，自幼学习缣丝和绘画，人称她“运丝如运笔”，所作人物、树石、花鸟极为精巧，晕色和谐，清新秀丽。她对传统缣丝工艺有新的发展，创造了孱缣法，又称为“长短抢”缣丝法，即以深浅多色层的纬线，长短参错互用，使颜色有水墨画的晕色效果。

丝织品是消耗量极大的日用品，但因保存不易，以往能够见到的辽、宋、西夏、金实物非常少，传世品主要是被当作艺术品收藏的名家缣丝（刻丝）。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后半叶，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丝织品，主

要是服饰衣料。这些重见天日的丝织品，为人们认识和研究这一时期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1975年，在福州市北郊发现了一座南宋墓，墓主是一个名叫黄昇的十七岁少女，出嫁不久便病逝，其家人在安葬她时，将少女生前所用之物都随葬于墓中。除了金银首饰、漆器、竹木器、团扇、铜钱之外，令人吃惊的是层层穿戴在墓主人身上的24件衣物和身边摆放的6大包衣服鞋袜，墓主人身上裹盖的、身下铺垫的也都是保存完整的丝棉被，总计出土了334件丝织品。其中，成件衣、裤、裙107件，鞋6双，袜16双，被衾5条，其他织物60件，另有整幅、零幅织物142件。这批丝织物中，有罗、绢、纱、绦、绉纱、绡等，以罗居多，近200件，绢、绦次之，纱和绉纱数量较少。罗和绦多是提花，图案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绢和纱则为素织。出土的褐黄色梅花瓔珞绦，长1104厘米，幅宽56厘米，匹端墨书“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应是官府



褐黄色罗镶印金彩绘花边广袖女袍

1975年福建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

福建省博物馆藏

衣长120厘米

对襟，广袖，左右开衩，领缘和对襟边缘有三道花边，第一道是印金蔷薇纹，第二、三道是彩绘鸾风云气纹。袍的小襟、下摆、袖口等处也镶有花边。

手工业作坊的产品。

同一年，在江苏金坛一座南宋墓也出土了34件衣物和其他丝织品。该墓主人是一个叫周瑀的太学生，出土时，尸体浸于棺内清水中，外形保存完整。出土的丝织品有短衣2件、裤7件、衫14件、丝棉袍2件、抹胸1件、裳2件、蔽膝1件、贴绣褙裙1件、鞋袜2双、漆纱幘头1件，另外还有丝棉被1条。这些丝织物计有纱、罗、绢、绉、绮、菱六种，以纱、罗居多，包括平素和小提花、大提花织绣。

福州黄昇墓和金坛周瑀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真实地表现出南宋纺织业的发达和纺织技艺的精湛。黄昇墓出土的罗、纱、绉、缎，极其轻柔，色彩斑斓，织花手法多样，有连枝和折枝花两种，有单一牡丹花，也有四季花或多种花卉组合。衣物的边缘装饰丰富多彩，有印金花纹，有刺绣花卉，还有彩绘。彩绘有绘彩勾勒和描金敷彩，图案有百花、虫蝶、卷叶、花果、鱼藻和狮子戏球等十多种。其中一件印花罗褶裯裙，褶裙呈扇状，上窄下宽，纵向褶裯二十一道，褶子有疏有密，左右各有一系带。裙腰及两侧系带为赭石色，裙襟为褐色，素地印小团花。质地轻薄

透明，纹饰淡雅。另一件镶花边罗夹衣的面料为三经绞平纹起花罗，提花芙蓉、牡丹纹，内为平纹绢。对襟缘镶金彩绣花卉，领口外缘罩一层褐色短领。多种颜色、图案极为巧妙地搭配在一起。周瑀墓出土的丝织物图案也有缠枝花、牡丹、山茶花、天竺花等。

除了上述两墓出土的大批完整的南宋丝织品外，1973年湖南衡阳北宋墓中也出土了大量丝麻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质地有纱、罗、绉、绢、麻，其中可辨识的有丝绵袍1件、丝绵袄6件、夹衣3件、单衣1件、裙5条、麻布鞋4双、纱帽1顶、丝棉被1条。1977年江苏武进宋墓也出土少量丝织物。1966年浙江兰溪宋墓出土了一件棉毯，由棉花纺线织成，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是目前发现较早的一件完整的棉织品。

辽、西夏、金考古发掘中也出土有各类纺织品。1992年清理辽耶律羽之墓，出土丝织品上百件，包括绢、纱、罗、锦等几十个品种。同年发掘的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出土丝棉袜一双。1989年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出土了276件丝织品，大都保存完好，其中一件梅花蜂蝶蓝色罗地绣巾，以深蓝为背景，细密针脚绣出梅、竹、蜂蝶，

烟色地双鸾朵梅织金绸绵南护胸



制作极工巧。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和缣丝六类，其中有一件长2米的缣丝被。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一批织锦、绫、罗、刺绣中，有用夹纈和蜡纈法印染的各种花纹。西夏皇陵遗址出土有素罗、纹罗等织物残块。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的丝织服饰，包括服装30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质地有绢、绸、罗、锦、绫、纱，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

三、湖州镜·温州漆

两宋时期，以家庭家族形式从事手工产品制作很普遍，这些产品以出售为目的，为了竞争的需要，相当多的产品上标注了制作者的姓名字号。由于一些商品已形成区域化生产，购买者往往认准某一地区的某一产品，于是产品上的地名标注也多了起来。这种现象表现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南宋太平老人的《袖中锦》列举当时的“天下第一”，有监书、内酒、端砚、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等二十八项。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铜版，中间是白兔捣药图，两侧题“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上方横写店铺字号“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下方竖写广告词：“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在其他生活日用品的经营销售中，标出产地及制作商家名号，以此增加竞争实力，应该说是宋代以后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传世和出土文物中，带有这种商标性质的手工制品还有铜镜和漆器，大都带有地名标志，从已发现的各地产品看，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湖州镜和温州漆。

铜镜是中国古代的照面具，为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生产量很大。辽宋金时期的铜镜承袭了唐代风格，形态多样，既有圆形、葵瓣形、菱花形，也有亚字形、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和带柄形；图案简洁，有缠枝花草、花鸟、人物故事，还有八卦纹镜。出土较多的是一种素面镜，即镜背不做任何装饰，相当多的素面镜背上有类似印章式的长方字框，用来标注产地商家。

从产地看，宋代两浙路的湖州、杭州、苏

济南刘家针铺广告铜版

长12.4厘米，宽13.2厘米。印版略呈正方形，四周围以双线框，线框中又用横线分成上、中、下三部分。该铜版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商标广告印版。



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

宋

传世品

直径16.9厘米,边厚0.4厘米
八瓣葵形,有钮。镜背左面有长方形名号字框,内刻“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二行十四字。湖州为宋代制镜中心,产品销往全国。“仪凤桥石家”又为湖州铸镜商号中很著名的一家,所铸铜镜不仅数量大、分布广,而且铭文多种多样。



吉州李道工夫葵花镜

宋

传世品

直径17.4厘米,边厚0.4厘米
葵形,有钮。镜背左面有长方形题铭字框,内刻“吉州李道工夫”六字。铭记中的吉州即今江西吉安,李道是店家字号,“工夫”则指精心制作。

州、秀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江南东路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和饶州,江南西路的吉州(今江西吉安),淮南东路的扬州,成都府路的成都等,都出产铜镜。考古发掘中湖州镜出土最多,出土地点几乎遍及南方各地,浙江、四川、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福

建、广东、广西都有出土,在日本出土和收藏的宋镜中,也以湖州镜居多,可见湖州镜是宋代流通量最大的铜镜。湖州镜中,少数为官府制作,铭文题“湖州铸鉴局”;多数为私家作坊产品,有石家、方家、薛家、陆家等,以石家铭文镜最多。湖州石家镜中,有的铭文只标地点姓氏,如“湖州真正石家无比铜照子”、“湖州石家炼铜照子”、“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有的列出石家排行,如“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真湖州石四郎造铜镜”、“湖州石十郎家无比炼铜照子”;还有的标明店铺所在地,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八瓣葵花镜,镜背题“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再如题“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湖州南庙前街西石家念二叔真青铜照子”等;也有一些铭文镜标出售价,如“湖州真正石家青铜镜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等。

辽金铜镜也有不少出土,多数的形状、纹式与中原类似,也有一些带有民族特色,如金铜镜龙、鱼图案较多。近几十年来,双



鱼镜仅在黑龙江就出土了二十多面，其中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一面双鱼图案的铜镜，直径43厘米，非常罕见。金朝铜禁很严，民间不得铸镜，因而金代铜镜的铭文多是纪年、地名或官衙的简称，如“承安二年镜子局铸”、“上京宜春县”、“上京巡院正”、“上京警巡院”、“左巡院验记官”、“通州司使司官”等。

宋代漆器制造业十分发达，制成品以日

常生活用具如盘、碗、碟、盒、奁为主。漆器不易长久保存，传世者罕见，现在能看到的绝大多数为宋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从出土器物看，器物上常以不同漆色分别作底色和题记，或是标明制作年代、产地，或是直接写出制作人姓名及店铺字号。宋代漆器主要产地有定州、襄阳、江宁（今南京）、杭州、温州等，其中以温州漆器最为驰名。

1959年11月，南京博物院在江苏淮安清

柳毅传书铜镜

金

1964年黑龙江阿城出土
直径10厘米，边厚0.2厘米，
重100克

此镜表现洞庭湖龙君小女儿牧羊道旁，向柳毅诉说嫁给泾河小龙的不幸，柳毅应允为她传递书信的情景。故事取材于唐朝李朝威的小说《柳毅传》。



双鱼纹大铜镜

金

1964年黑龙江阿城出土
直径36.7厘米，重4.3公斤
此镜镜面平滑，至今仍可照人。
镜背中心有穿鼻钮，两条鲤鱼同向环钮回游嬉戏，富有动感。



理了五座北宋家族墓，出土了72件漆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带有文字题记的漆器，标明制作产地的有19件。其中一件花瓣形圆漆盒，木胎糊织物，施酱红漆，器底外部施黑漆，并用红漆题记“戊申温州□三叔上牢”。1982年浙江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漆器十余件，其中一件带托座漆唾盂，一套两件。唾盂及托座底部均有朱文草书题记，标明该器物为温州作坊制作。

1966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塔基出土了一件檀木描金堆漆舍利函和一件檀木描金堆漆经盒，均为温州产品。经函为方形，须弥座式函基。四面开光，工笔金绘佛像故事各一幅。四周围以连续弧线，弧线相交处嵌一珍珠。弧线外满布描金堆漆折枝牡丹纹。函顶面亦

开光，内饰缠枝菊花，外围饰折枝牡丹。函座四壁中部各堆漆狮子一只，四角饰卷草纹。函内底金书题记十一行，末署“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十二月”，与此函同时出土的经盒皆为1042年制作。该函出土时内有银瓶、佛像等物。经盒分内外两盒，均是长方形。外盒以漆堆雕佛像、神兽、飞禽及花卉，并镶嵌珍珠。内盒盒身未堆塑，除底部外均工笔描金，顶部以忍冬为地，绘出三组龙凤；盒身以菊花为地，绘出八组花鸟；盒座以菱纹为地，四面绘神兽。外盒底部有金书题记，署“大宋庆历二年”。堆漆是在器物表面用漆堆出花纹，西汉时已出现，唐宋时制作技艺更加完善，多见于经盒、经幢等宗教用具。除瑞安慧光塔这件经盒外，1978年在建于北宋

初年的苏州瑞光塔中还发现了一件嵌螺钿漆盒。漆盒由盒身、盒盖、盒座组成，盖、盒间以子母扣相连。木胎夹纆，通体施黑漆，黑漆上又用螺钿镶嵌出花卉图案，极其华贵雅致。此盒原为盛放经卷用，但在发现时经卷已失，惟存装裹经卷的经袱、经帙残片。该塔塔心中还有一座真珠舍利宝幢，八角形的幢座上贴狻猊、宝相花、供养人等花纹，也是用堆漆制成的。

出土的宋代漆器中，漆奁较多。奁为古代女子盛放梳篦、脂粉的梳妆盒，多制成组合式漆盒。由于所放器物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因而在设计制作上要求很高。从已发现的漆奁看，多是由子母漆盒构成，即大盒套小盒，为了能盛放特定形状的铜镜，漆奁的外观有的是莲花形，有的是葵瓣形。1980年江苏江阴城西北宋孙四娘子墓出土了一件藤

漆奁，为扁圆形，以细藤条编织而成，外涂红漆。奁盖外侧与奁身内侧各有一道宽边，形成子母扣，可启合自如。出土时，奁内有漆盒两个、铜镜两面、梳子三把及剪刀等物。1975年福建福州市郊南宋黄昇墓出土的一件镶银边漆奁，设计也很巧妙，为六角葵瓣形，口沿皆镶银边，通体施黑漆。奁分为三层，第二层内有三个小粉盒，粉盒圆形黑漆，素面平底，亦镶银边。出土时奁内装有铜镜、铜钱、银盅、银罐、棕刷、竹刀、梳子等梳妆用具33件，三个小粉盒中，有两个残留粉末少许，其中一个盛粉扑。类似的漆奁还有1978年江苏武进林前乡南宋墓出土的戗金花卉人物奁，外观为六瓣莲花形，也分三层，加上奁盖，可拆分成四件，各层间以子母扣衔接，合口处镶银钿，木胎红漆，漆上细钩戗金各种图案。戗金工艺是古代一种漆器装饰



菱花形漆奁

奁高17.3厘米，直径16.4厘米，小盒高3.6厘米，径5.5厘米

这件菱花形漆奁除奁盖外，可拆分为三层，层与层相连，又可随时拆卸。其中，第一层中还放置大小相同的四个圆形小漆盒，可用来盛放不同的脂粉。漆奁木胎黑漆，外观呈菱花形，结构为盒中套盒式的多层组合，构思奇巧，制作精美，是传世宋代漆器中的精品。

方法，在朱色或黑色漆器表面用刀或针刻划出花纹轮廓，在花纹内打金胶，然后填入金粉或金箔。宋代戗金工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武进南宋墓出土的戗金花卉人物奩，奩盖上为戗金仕女图，盖侧为折枝花卉，奩身亦细钩戗金人物、山石、树木、花卉，奩盖内题“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同时出土的另外两件戗金细钩填漆长方盒，分别题“丁酉温州五马钟念二郎上牢”和“庚申温州丁家桥巷麻七叔上牢”。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代漆奩，外观呈菱形，结构为盒中套盒式的多层组合，构思奇巧，制作精美，是传世宋代漆器中的精品。

剔犀工艺是宋代开始出现的，其特点是在器物表面逐层施两种以上颜色厚漆，然后在漆面上用刀剔刻花纹图案，刀口处便呈现出不同于漆面颜色的花纹。宋代剔犀实物发现很少。江苏武进林前乡南宋墓出土有一件剔犀执镜盒，有朱、黄、黑三色漆层，出土时大部分雕漆已经脱落。1975年在江苏金坛周瑀墓出土了一件剔犀柄团扇，团扇呈椭圆形，细木为轴，细竹丝为骨，扇面糊薄纸。扇柄套在扇轴上，可左右旋转。扇柄略呈橄榄

形，柄上镂空透雕对称三组云头如意纹，上端刻隶书“君玉”二字。扇柄表层黑漆，刀口处呈赭色，显现底层红漆。该器是典型的剔犀器。这件以剔犀为柄的南宋团扇制作精致，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早期剔犀制器。

辽、西夏、金也有漆器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但总的来说不如宋的制作水平高。

四、精美绝伦的金银器

随着大中城市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奢靡之风渐盛，由此带动了金银器制作业的繁荣。当时不止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竞相穿金戴银，普通平民也以金银器皿为日用品。考古发现不少用作酒器食具和用作妇女首饰的金银器物。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描述东京城中的酒楼正店，“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致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以银器供送”。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都有专门从事金银锻造的手工业作坊，其行业被列为“金银镀作”。如同漆器、铜镜等手工制品，流传至今的宋代金银器往往也带有标明制作者的款识，表现出工商业者的竞争意识。

剔犀梳妆盒

南宋晚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口径8.7厘米，高3厘米

盒为圆形，红漆，盖面剔雕一枝桂花，下刻锦纹。盒沿雕刻回纹。盒底黑漆，朱漆篆书“墨林秘玩”印。



由于相当数量的金银器由民间作坊制作，供民间日常使用，因而器物的制作不像唐代那样讲求华丽厚重，而是趋于精巧简朴。不少器物轻薄精巧，制作简洁，器形和纹样具有民间风格，更适合于大众的需求。这一时期的金银锻造业开始出现产业化倾向，考古发现不同地区制作的器物，其形制和纹饰却基本相同，甚至不同店铺生产和销售的器物也相互雷同，显示出金银制造行业的生产具有某些固定样式，并可能开始成批生产这些民间日用品。

目前所见宋代金银器多为考古发掘所得。成批埋入地下的窖藏金银器，有许多是成套器皿。1959年四川德阳出土宋代窖藏银器117件，有银瓶、匜、壶、尊、托、杯、炉、盒等；1977年江西乐安出土南宋窖藏银器100余件，也是杯、盘、壶、碟等日常用品；1980年福建邵武故县出土宋代窖藏银器140余件，有杯、盘、盅、碟、漏勺及各种首饰品；同年在四川平武也出土宋代窖藏银器8件，其中有两件带发针束发银冠；1981年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窖藏银器27件，为一整套餐具；1983年浙江永嘉出土宋代窖藏银器50余件，有鎏金银簪16件、鎏金银钗28件，是成套的首饰；1996年四川彭城出土宋代窖藏金器27件、银器323件；此外在一些宋代墓葬、塔基中也出土有金银制作的首饰、茶酒具和宗教器皿。

宋代金银器的造型极富变化。四川平武龙安镇出土五曲梅花银盏，盏身犹如一朵绽放的梅花，把手则设计为花枝形状，轻轻托起梅花盏。构思奇巧，造型生动，纹饰也很斑斓。1971年江苏江浦南宋墓出土一件五曲梅花银盏。四川德阳出土的双孔雀连枝花银盒平面为三十二瓣花形。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成套酒具，有一组鎏金银盏，造型分

别为五曲梅花、六曲秋葵、八曲方口四瓣花、十二曲六角栀子花，另有单瓣莲花、复瓣莲花、重瓣莲花盏各一件，此外还有一件鎏金蟠桃形银盏，呈半桃形，一端平伸枝叶，巧妙地形成盏把，树枝断面刻出一圈圈年轮，暗示蟠桃年代久远。1996年四川彭州窖藏出土的两件菊花形金碗、两件瓜形盏，造型也很别致。1984年浙江义乌李景德寺村窖藏出土一件金龙，长15.7厘米，宽1.8厘米，重6.84克，龙细颈粗身，五爪，昂首曲尾，呈奔腾状，龙头两角分叉，发髯后扬，全身饰鳞，整体造型精巧，富于动感。1969年河北定州净众院北宋塔基出土一件缠龙银瓶，外壁缠绕飞龙一条，龙身用银丝编成，龙四周饰云纹，瓶上部垂银珠一串，直至龙首，形成银龙戏珠造型，设计很是奇妙，制作亦极精湛。

宋代金银器的纹饰丰富多彩，与变化多端的器物造型巧妙结合。各种花卉、鸟兽纹饰居多，也有象征吉祥的瑞果、鱼藻、牡丹、童子戏球等图案。江苏溧阳平桥乡宋代窖藏银酒具中有一组共九件小银碟，形状、大小、题款完全一致，均是敞口、浅腹、平底，惟口沿内及底部篆刻的花卉分别是牡丹、樱桃、绣球、秋葵、梅竹、栀子、山茶、芙蓉、

“李四郎”乳钉狮纹鎏金银盏

宋

1981年江苏溧阳平桥宋代窖藏出土

高3.8厘米，口径8厘米至10厘米，重76克

银盏制成半桃形，一端平伸枝叶，巧妙地形成盏把。口沿内篆刻卷草纹一周，口沿外侧刻有“李四郎”题款，盏底模压篆书“寿比蟠桃”四字。





五瓣花口金杯

宋

1992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口径7.3厘米，底径4厘米，
高4.9厘米

“张四郎”花卉纹银碟

宋

1981年江苏溧阳平桥宋代窖
藏出土均高1.2厘米，口径8.4厘米，
底径6厘米，重27.8克
共九件，为一套宋代银食具
的构成部分。每一银碟底部
都砸印“张四郎”戳记。

束莲。1981年安徽六安出土的童子花卉银托
盏，由盏、托两件器物组成，鎏金银盏圆形，
圈足，外壁錾刻牡丹、桃花等四季花卉，两
朵莲花上各饰一女童，形成银盏双耳，盏内
底錾刻花瓣纹，盏中一童子盘腿端坐；盏托
圆形，宽边，平底，口沿錾刻卷草纹，盘底
錾刻童子及牡丹花卉纹。

宋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也有新的发展，
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的运用十分
普遍，特别是浮雕凸花工艺的采用，使器物
的图形具有了立体感。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
的鎏金仿古银簋，器形仿古代青铜簋，侈口，

直颈，圆鼓腹，喇叭形高圈足，左右各有一
兽形竖环耳，内外壁为夹层，器身外壁饰斜
方格，方格内以细雷纹为地，中心乳钉凸起，
纹饰均鎏金。银簋器形凝重，纹饰精美，别
具韵味。同一窖藏中还有两件鎏金花瓣银
杯，均为莲瓣口，斜腹，喇叭形圈足，惟口
沿纹饰不同，一件为十二瓣口，通体捶莲瓣
纹，杯底捶出凸起的莲蓬，形如重瓣莲花；一
件为六瓣口，腹壁内捶槌子花十二朵；还有一
件凸花狮子戏球鎏金银盘，呈海棠花形，
浅腹平底，盘底以细云纹为地，中心是两朵
牡丹花，两旁各有一只雄狮正跳跃戏球，狮
子、绣球皆凸出盘底，狮子的躯体高过盘口，
构图富丽，极具动感。镂空技术在宋代也运
用到金银器制作上。1983年浙江永嘉下岙宋
代窖藏出土的鎏金龙纹银簪，雕饰部分近似
船形，边沿饰细珠纹，内镂空细花衬地，一
端是凸出的火珠，一端为腾起的蛟龙，龙身
錾刻菊花三朵。同一窖藏共有鎏金银簪16
件，计八种样式，还有鎏金银钗28件，计十
种样式，为宋代装饰品的一次重要发现。银
首饰的制作采用翻铸、镂空、切削、焊接、浅
刻、捶打、压印等多种技法，具有较高的工
艺水平。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银丝盒，内
外两层是在薄银片外焊以银丝编成的网纹。



1980年江苏南京幕府山北宋墓出土的鸡心形金饰,由两个椭圆形的金片组成,可开合,金饰两面镂空刻牡丹和葵花,花丛中一对凤凰振翅翱翔。镂空的纹样上再篆刻、掐丝,使得金饰更加玲珑剔透。

除了日常生活用具,宋代金银器中也有一些宗教用品和冥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都曾在佛塔中发现了银制小塔。196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一座银塔,高34.8厘米,方型,四面七层,楼阁式,每层四隅檐角系铃铎,银塔全以银片打制而成,精巧玲珑,是宋代金银器工艺的代表作。1982年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还出土一座银殿,为一座单檐歇山式建筑,也是用银片打制而成,惟银殿台基为木芯,外包银片。宋塔基中出土的金银棺槨较多,还出土有银舍利瓶、葫芦瓶、净瓶等佛教器物。

宋代金银器有不少刻砸铭记,主要是标记店铺、产地和工匠姓氏。江西彭泽易氏八娘墓中的银梳上刻有“江州打作”四字。安徽六安南宋墓出土的银勺、银胭脂碟上压印“顾玉郎”三字。浙江永嘉窖藏银器中有“京溪供铺记”、“京溪供铺工夫”、“冯将土工夫”等刻铭。江苏溧阳平桥南宋窖藏出土的鎏金蟠桃形银盏、鎏金海棠形银盏砸印“李四郎”题款,九件花卉纹小银碟则砸印“张四郎”款识。湖北蕲春罗州城出土的窖藏金首饰中,有精雕细刻的花纹和大量的戳记或砸记。1978年四川遂宁出土的神兽纹银盘底部刻题“周卿”二字。1959年四川德阳孝泉镇清真寺宋代窖藏出土的银执壶,壶柄上阴刻“西宅”二字。1993年四川彭城天彭镇西大街金银器窖藏出土的象钮莲盖银执壶,口沿处有制作工匠名号,分别题“充甫”、“维祖二郎”、“□官可二”等。1990年福州茶园南宋许峻墓出土的一件银粉盒底部篆刻“张念七郎”,



另一件鎏金高圈足银杯,器底篆刻“低银刘打”。

辽、西夏、金、大理国的金银器制作水平也较高。其制作工艺和器物风格受到唐宋金银器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玲珑银塔

宋

196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
高34.8厘米

银塔方形,以银片制成。四面七层,楼阁式,每层四隅檐角系铃铎,第一层座面四周有勾栏,三面雕力士像,另一面刻题记:“弟子沈质、范从吉、张护、夏思明、张□公等同造塔一所,范从周舍手打”。第二层至第七层四面均开壶门,门内为佛坐像。顶层檐角有链与塔刹相连。塔刹由多层相轮、宝珠等组合而成。塔底为须弥座。座内篆刻“景祐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乙亥岁记”。北宋景祐二年即1035年。银塔精巧玲珑,是宋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契丹贵族的日常用具有不少以金银制成，如马具及马上装饰、酒具、首饰物品等，契丹讲究厚葬，随葬物中有大量金银器，皇室贵族墓中的葬具亦用金银。考古发现的辽代金银器，大都出土于墓葬中。内蒙古赤峰辽卫国王驸马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敖汉旗李家营子2号辽墓、丰镇永善乡辽墓、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哲里木盟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喀左北岭辽墓、凌源八里村辽墓中都出土了一些金银器。1954年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卫国王驸马墓出土金银器皿100余件，有鎏金银鞍桥、鎏金银带饰、鎏金银铃等马具，还有高足银杯、银盏、提梁银壶等

具有唐代风格的酒具，该墓为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封闭，为辽早期墓。1985年陈国公主墓共出土金器31件、银器147件，为辽墓中出土金银器最多的，出土有金面具、八曲金盒、镂雕金荷包、鍍花金针筒、双龙纹金镯、龙纹带铐、鎏金缠枝花纹金镯、金戒指、金球饰、鎏金高体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银丝网络、银马具、金花银枕、金花银靴、银盒、银钵、银长盘、银唾盂、银托盏、银执壶、小银罐、银粉盒、银器盖、银刀、银锥、银勺等。这批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金面具两件、银丝网络两套，是完整的殡葬服饰，体现了契丹大贵族的丧葬习俗和等级制度。除了葬具，其他器皿明显带有中原特点。根据墓志，该墓为辽圣宗开泰七年（1018）建

鎏金鹿纹银鸡冠壶

辽

1979年内蒙古赤峰出土
高26.3厘米，口径5.5厘米，
底长21.2厘米

壶把为鸡冠形状，壶盖与壶身以银链相连；盖面镌刻对称的四瓣花纹，外沿镌刻八个四瓣花朵。壶颈较高，四周刻有牡丹纹。壶身鼓起，两面镌刻精巧，均在菱形图案中镌刻一只花鹿，鹿前后各镌刻山石、灵芝、海水，犹如仙境。壶身前面成三角形，三条边做成仿皮绳纹装饰。契丹族金银器制作工艺受唐朝影响较大，但器形和装饰花纹保留了骑马民族风格。



造，属辽中期墓。1978年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有折枝牡丹纹八棱银执壶、双鱼团花纹海棠形银盏、柳叶形银碗、荷叶纹五曲银碗、二十五曲莲瓣银碗、复瓣仰莲纹银碗、折枝牡丹八棱形银碗等，从器形纹饰判断与宋代器物无异，应属辽晚期制作。辽与宋朝在经济文化上有许多交流，辽宋交聘礼单上也有大量金银器。从出土的辽代金银器上可以明显看到中原对契丹的影响。

西夏和金代金银器发现不多，工艺水平也逊色于辽宋。内蒙古临河西夏城址出土一批金器，其中有金碗两个，一件碗心刻凤凰团喜，碗腹刻芍药、牡丹和西番莲，另一件碗口两侧和碗心、圈足都刻花卉，另有一件莲花形盏托，制作也很精美。宁夏灵武石坝村出土窖藏银器，有银碗、银盒、银发钗、银钵，有些银器的内底用西夏文墨书重量。西夏王陵出土有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金鞍饰、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鎏金兽面形银饰、银片饰、圆形带钉银片饰等。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其中一件金丝玛瑙管项饰，用12件金丝管和16件玛瑙管分为三组交错相串而成，制作很精致。北京通州金墓也出土一些银簪、金坠饰、金箔片等。

地处中国西南的大理国崇信佛教，同时又信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遗留下许多与宗教相关的历史文物。1978年在修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于主塔塔顶发现580多件文物。其中有一件金翅鸟，重125克，鸟身为银质，通体鎏金，鸟首高昂，双翅展开，颈羽呈火焰形向上展开。金翅鸟又名妙翅鸟，梵名迦楼罗，佛经中说它可以降龙，被尊为大理国的保护神，将其置于塔顶上，意寓护国佑民，消灾祈福。



五、又见百一砚

传统手工制品中有一类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这就是文具。宋代重文轻武，科举教育为时人所重，加之雕版印刷普及，纸、墨、笔、砚的需求量很大，其质量品种也十分讲究。由于各地采用的原料和制作方法不同，产品各有特点，从而形成地域化生产。

宋代民间造纸业发展较快，产量较以往有很大提高，各地造纸一般就地取材。苏易简《文房四谱》说：“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此土（北方）以桑皮为纸，郾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薄焉，以麦

金翅鸟

大理

1978年云南大理崇圣寺主塔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高18.5厘米，重125克

稻油藤为之者尤佳。”宋代造纸技术也有新的进步。徽州歙县造纸素有名气，从沤纸浆开始，当地工匠就很仔细，“数日理其精，然后于长船中浸之”。抄纸浆后，“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止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宋代造纸能够在数量、质量上比前代有极大提高，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生产制作技术更加精益求精，有了很大改进。宋代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增加很多，各地都生产自己的名纸。如四川成都的藤纸、浙东的竹纸、江南的楮纸，有的地区还出产经过再加工的笺纸，如成都的“十色笺”，建阳的椒纸，池州、歙州生产的“澄心堂”，浙江海盐生产的“金粟山藏经纸”等。

北宋时，制墨业中形成各种形式的竞争。李超、李廷珪父子所制之墨最受文人推崇，李廷珪后来移居徽州，由此徽墨成为墨中上品。为了推销产品，宋代墨工将名字标记在墨上，有的已经故去的著名墨工，市场上仍能见到写着其姓名的墨，甚至有人假借秘方抬高自己产品的声誉。

宋代宣城笔最有名气。当时有人将宣笔与蜀笺相并列。宣笔制作又以诸葛氏最负盛誉。当时人甚至将宣城诸葛氏笔当作珍玩收

藏，称“一笔可敌它笔数枝”。常州许家制笔也为士大夫所称，据说不在诸葛氏之下。此外在江东、江南其他地区都有当地的名笔，而一些文人也讲求使用名家制作的笔。

歙砚、端砚在宋代就盛誉天下。歙州自南唐时就开始为官府制砚，北宋时有很多家族世代以制砚为业。端州每年要向朝廷贡砚，北宋名臣包拯知端州，不携一砚归，被传为美谈。当时人视端砚为名贵之物，“琢为时样供翰林，十袭包藏百金贵”，可见其价值之高。端砚以带有石眼者为佳，石眼即端石上特有的圆形石斑，有的翠绿，有的橙黄，形似眼球有晕有瞳，石眼越多越名贵。徐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方南宋十眼抄手砚，温州市博物馆藏有御赐王十朋三十六眼抄手砚。最为珍贵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宋代端砚，砚背刻石柱一百零一眼，被称为“百一砚”，又称“百一眼砚”。百一砚原为清宫旧藏之物，乾隆四十年（1775）成书的《西清砚谱》卷十一著录，后散失民间。20世纪30年代初，文物收藏家苏宗仁在北京琉璃厂见到此砚，以七十元钱购得，“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康生掠走，直到1984年才复归苏家。石砚左上方原镌篆书“陆氏家藏”，右侧刻有乾隆皇帝七言律诗一首及“古香”、“太璞”二

百一砚

传世品

高5厘米，长18厘米，宽10.5厘米

砚面中部微凹，隐现数翠点，砚池深广，砚背刻石柱一百零一眼，故名“百一砚”，又称“百一眼砚”。



印,均已不见,惟新镌篆书“康生”二字。苏家感叹此砚失而复得,于1986年慨然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房四宝为士大夫日常生活必需品,是宋代手工制作中重要的行业之一。一些文人去世后,家人将其心爱的文房四宝陪葬,因而在宋墓中经常能出土一些笔、墨、纸、砚、笔筒、镇纸等文具,尤以砚石较多。1979年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一块叶茂实造寸玉墨。叶茂实是柯山著名墨工,据说因其名气太大,仿冒假借其名售墨的也很多。这块墨光泽如漆,正面模印贴金“寸玉”二字,“寸”字上部已残;背面模印长方字框,框内残存“实制”二字,其上则有“茂”字残存笔画。叶茂实制墨鲜有流传,故此墨的出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1988年安徽合肥城南乡北宋马绍庭夫妇墓出土九华朱黠墨,呈长棱形。正面楷书“九华朱黠墨”五字,背面有枣核形线框,内绘凤形图案,线框外两端各书一“香”字。1952年安徽休宁朱晞颜夫妇合葬墓出土有圆形三足歙砚,歙石细润,通体呈细牛毛纹。砚面至墨池为斜坡状,平沿边,砚底为三圆足。1995年安徽六安三十铺镇枣树村宋墓出土蝉形青花端砚,形状雅致,石色青紫,质地细腻。砚呈蝉形状,砚首为葵花形水池,池底遍刻水波纹,中心雕出一条正在游动的小鱼,砚身近似椭圆形,连接砚首和砚身的是一方形水槽,槽内有小孔与墨池相通,槽上有盖,盖面正中有一活眼,两侧刻缠枝花卉,砚底略凹。1981年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夫妇墓出土蕉叶白端砚,呈不规则椭圆形,砚体紫黑色,底部磨平光滑,砚边以内通为墨池,池中有大片乳白色及青色、淡黄色斑,砚面一侧阴刻隶书“碧玉子”三字。同墓还出土石雕犀牛镇纸、石雕笔架、石雕龟钮水盂等文具。

第四节 逝去的都市

宋代都市突破了以往坊市分置、行业分区的限制,大小店铺临街而立,并出现了众多名为“瓦子”的文艺表演场所。由于交通发达和人口增多,大批农业人口转向城市,促使一批大中城市迅速崛起,草市遍及乡镇,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新兴的城镇,独立工商业者按行业组成“行”或“团”,竞争日趋激烈。北宋中叶,四川地区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金对峙时期,纸币已在全国广泛使用。

一、埋在地下的帝国都城

大中型城市的迅速崛起,是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作为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宋神宗时,东京已拥有百万人口,包括皇室贵族、官吏军队、富商大贾、从事各种职业的居民和大量流动人口。东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一座商业色彩浓厚的消费城市。唐代都城还实行坊市制,居民住在规划严整的坊中,夜间坊门关闭,商业活动只能白天到指定的市中进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坊市制逐渐解体。北宋初,东京城五鼓不禁,取消了对夜市的限制。同时,商业区和居民区也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店铺临街而立,大街小巷到处都建有酒楼茶肆、邸店质库、商店药铺和各类手工作坊。各地货物通过运河,能直抵东京城中。“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商品交易极为繁盛。白天人流熙熙攘攘,夜间还有州桥夜市和“鬼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被称为“瓦

子”、“勾栏”的说书唱戏、表演杂技的场所深受市民喜爱。

十分可惜的是，北宋灭亡后，东京城历经多次黄河泛滥水淹，已被深深掩埋于地下。我们只能通过当时人的描述和考古发掘，了解这座都市昔日的繁荣景象。南宋初年，一名逃到南方的东京官宦子弟化名孟元老，撰写了一部《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述了北宋末年东京的城池河道、宫阙衙署、酒楼食店、寺庙民居、瓦舍勾栏、岁时节令、市井风俗，成为认识和研究宋东京城的重要资料。由于金南京、明清开封城和今开封市依次叠压在宋东京城之上，考古发掘进展较慢，但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步完成对东京外城、内城、皇城和金明池的勘测和试掘，基本探明了北宋东京三城的位置、形制、范围和部分城门。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勘察和文献记载，北宋东京是由三重城墙组成，东西略短，南北

稍长，平面形状为不十分方正的矩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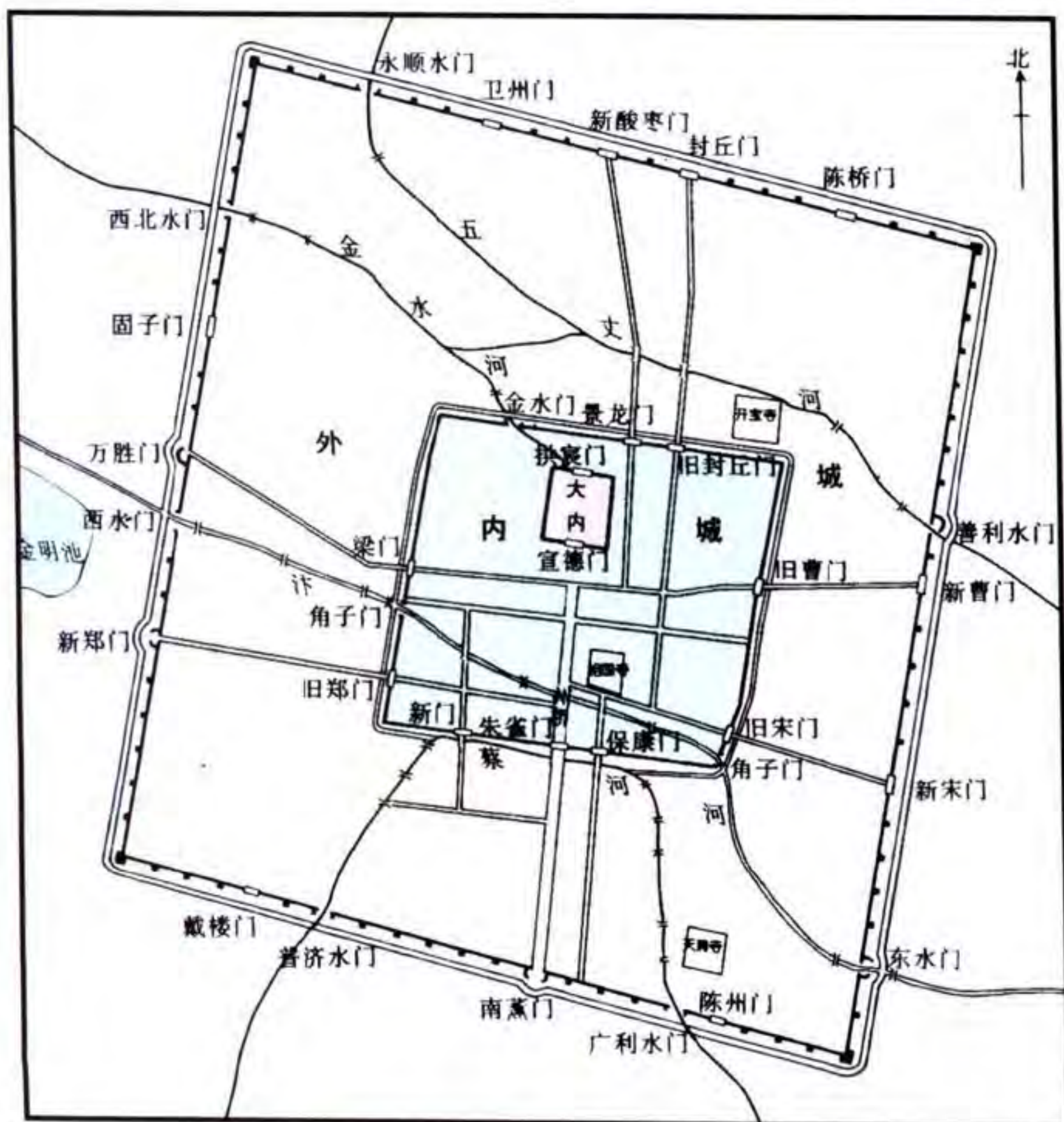
最外面的为罗城，又称为新城，是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前后扩建的。东西两墙长约7.5公里，南北两墙各长7公里。四周总长接近30公里（29120米），超过了汉长安城（周长25100米）、隋唐洛阳城（周长25100米）和元大都（周长28600米）。外城城墙为夯土筑成，上窄下宽，高度在9米以上。南墙居中的南薰门有长方型的瓮城，遗址东西长130米，南北宽80米，瓮门在瓮圈中部，宽达70余米，其他城门也有弧型瓮城。西墙顺天门因通郑州，俗称新郑门，勘探表明也是一座长方形的瓮城，东西120米，南北165米，是已探明的城门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门。万胜门建有弧型瓮城，被称为“屈曲开门”，经勘测，南北105米，东西60米，瓮门位于瓮城右侧，宽约30米，城门位于瓮城的中后部，宽约40米。

第二重为里城，又称阙城，主要用作商业和居民区，也是官署、寺观集中区。遗址相当于今开封市区。形状略呈正方形，周长约11550米，约合宋里二十多里，与文献记载的“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基本吻合。东西城墙基本与明清开封城墙重叠。设有十座城门，南北各三门，东西各两门，均与外城相对应，并且皆建有瓮城。另有两个水门。正南为朱雀门，朱雀门向北是一条宽阔的御路，直通皇城宣德门。

最里面的一重是皇城，为砖砌城墙，周长2500米，约合宋制五里，与宋代史籍记述的“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宫城周回五里”相吻合。共开七门，东墙东华门，西墙西华门，北墙拱宸门，南墙三座正门，东面左掖门，西面右掖门，居中是带阙楼的宣德门。《东京梦华录》记载“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

北宋东京城图

北宋设有四京，以东京开封为首都。城中街巷纵横交错，店铺林立。人口最盛时超过百万，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繁华都市。北宋灭亡后，东京逐渐衰落，后历经黄河泛滥，城区大部分被掩埋于今开封地下。这是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绘制的北宋东京图。



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椳，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应与今北京紫禁城午门的形制相似。皇城中最大的一座宫殿——大庆殿，是宋朝举行朝会大典的地方。这座大殿的台基已为考古工作者探明。台基高约6米，东西宽约80米，南北进深60米，四壁皆为青砖包砌。大殿周围是近1公里长的回廊，形成一个宽广的庭院。里城及外城墙外均有宽阔的城壕。

据《东京梦华录》描述：“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北宋东京名胜之一就是“州桥夜市”。这座著名的州桥遗址也在1984年被发现，但出土的是一座石拱桥，桥面宽30米，桥长17米，与《东京梦华录》记述的“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惟西河平船可过，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不合，而与《如梦录》描述的明代州桥“又名天汉桥。……桥高水深，舟过皆不去桅”很相似，可能明代在同一位置重建了新桥。

北宋灭亡后，开封城经历了至少四次水淹，包括城墙、宫殿、街道、桥梁、店铺、民居在内的各类建筑几乎都被掩埋于地下，昔日皇宫所在，到清代形成潘、杨两个湖泊。今天人们还能够看到的宋代建筑，只有城北高达62米的铁塔（开宝寺塔）和城东南的繁塔，另外还有后代不断翻建的著名的东京大相国寺。



北宋东京城砖

河南开封出土
长32.2厘米，宽15.4厘米，
厚5厘米
这块城砖是在东京外城西墙
遗址发现的。

二、清明上河与龙舟争标

北宋东京虽然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东京梦华录》的描述中想见她昔日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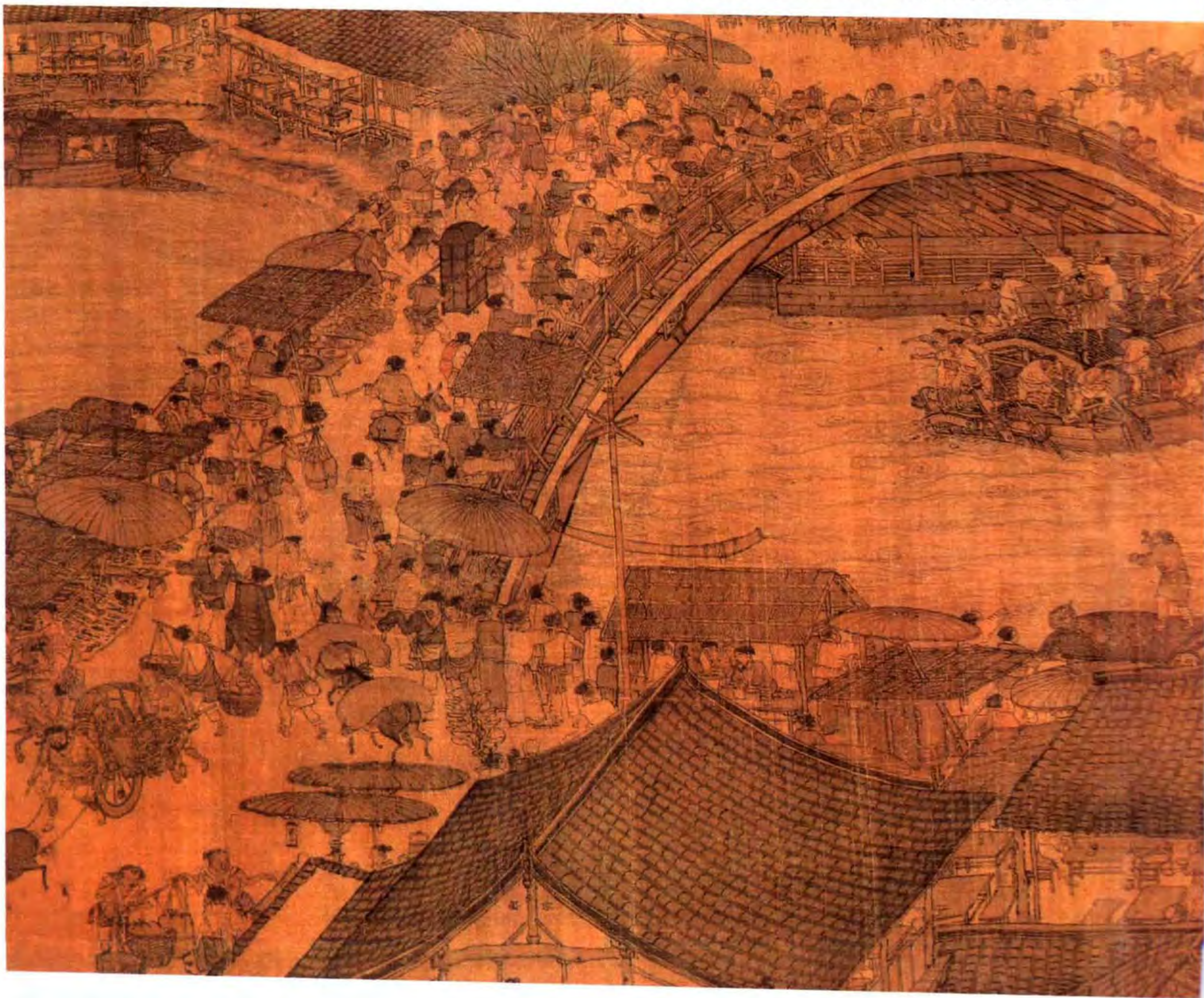
东京城除贯通南北的御路外，还有许多大街连接到内外城各个城门，众多纵横交错的小巷将各条主要大街联通起来。由于城中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弯曲的河渠，在街巷与河渠相交处建有很多桥梁，见于记载的就有33座。皇城南面，御街以东长长的院子是供奉历朝帝后灵位的景灵东宫，御街以西是一座座排列井然的官署，自南向北依次是御史台、尚书省和开封府。尚书省原在皇城之内，徽宗时迁出。沿御街向南行，过了州桥，便是著名的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东京最大的佛教寺院，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市民可在寺院回廊买卖交易，货物有书籍、字画、碑帖、笔墨、工艺品、药品、杂货等。大相国寺庭院宽阔，中庭两廊据说可坐万人。

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主要在三个地方，一处是在皇城东华门外潘楼街、土市子一带，酒楼、饭铺、金银店、珠宝店、彩帛铺、香药铺、织染店鳞次栉比。土市子以北的马

行街设有许多官医开的药铺，“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其余香药铺席、官员宅舍，不欲遍记”。潘楼街以东十字路口还有夜市，“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第二处是在州桥附近，以卖饮食小吃为主，自州桥至朱雀门，各地风味应有尽有。这里的食品也随着季节不断变化品种，夏天有各色冷饮，如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

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等；冬天添加炸烤熟肉，如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夹子、猪脏之类，每天这里热闹非凡，买卖交易直至三更。第三处是在旧曹门外朱家桥一带，“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

东京城乃“天下富商大贾所聚”，商业贸易极为繁盛。《东京梦华录》写道：“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鹞客，余皆



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东京酒楼很多，仅正店就有七十二家，酒楼正店一般店面雄阔，门前结扎彩楼，其中最著名的是白矾楼，“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东京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城中遍布称为瓦子的娱乐场所。每一节令，自官府至平民都有相应活动：“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立春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城中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节前官府在大内宣德楼前做山棚戏台，由城中民间艺人表演“奇术异能，歌舞百戏，……击丸蹴鞠，踏索上竿”。当月圆之日，山棚放喷泉，张彩灯，成为一座灯山，“又于左右门上，各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 张择端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绢本设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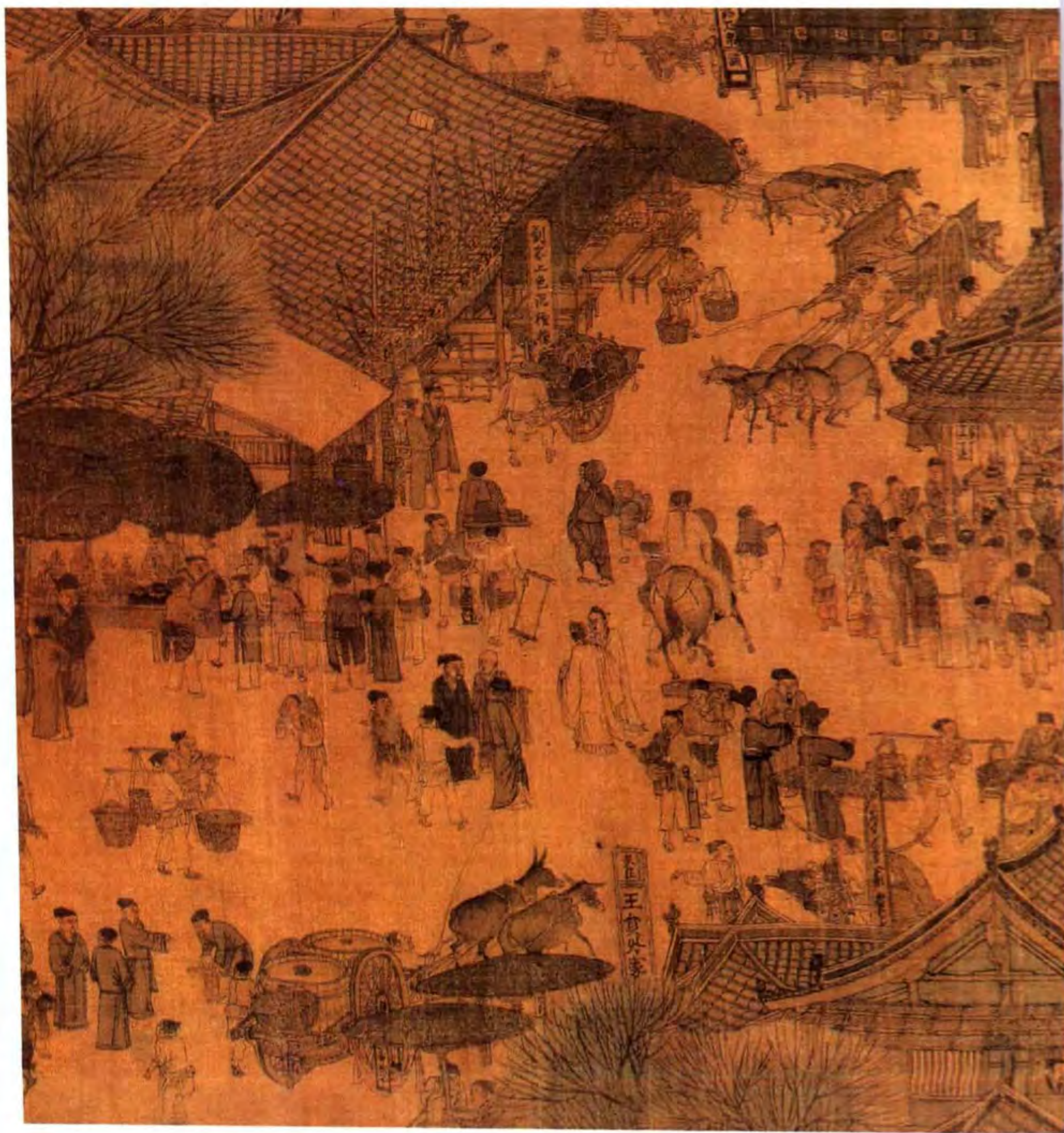
纵25.5厘米，横525厘米

张择端为北宋末至南宋初画家，宋徽宗时曾进入画院。他的这幅《清明上河图》如实再现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繁华景象。全画共绘人物五百多个，车轿二十多辆，各类船只近三十艘，还有约六十头牲畜。尽管图画規制宏大，人物众多，建筑纷繁，但在横向展开的画卷中，作者由近推远，有疏有密，动静相间，布局十分巧妙，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了集中概括，既有在空间上的虚实关照，又有对人物场景细致入微的描绘。这幅都市社会生活长卷不仅为今人了解和研究北宋东京的街市、建筑、交通、商业、民俗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形象资料，而且为风俗画的创作开辟了新途，即在艺术概括与社会写真相融合的基础上，以长篇巨制如实再现了城市生活的瑰丽多姿的纷繁场景。《清明上河图》历经八百余年流传，画卷上留下历代收藏印六十七方，并有金代以来题跋十三通。

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收灯后，都人争先出城探春。清明节，都人出城到郊外扫墓，“士庶阇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袞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

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皇帝驾幸临水殿观看龙舟竞渡争标。四月八日是“浴佛节”，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五月五日端午节，“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七月七日为七夕，“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摩和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中秋节前，“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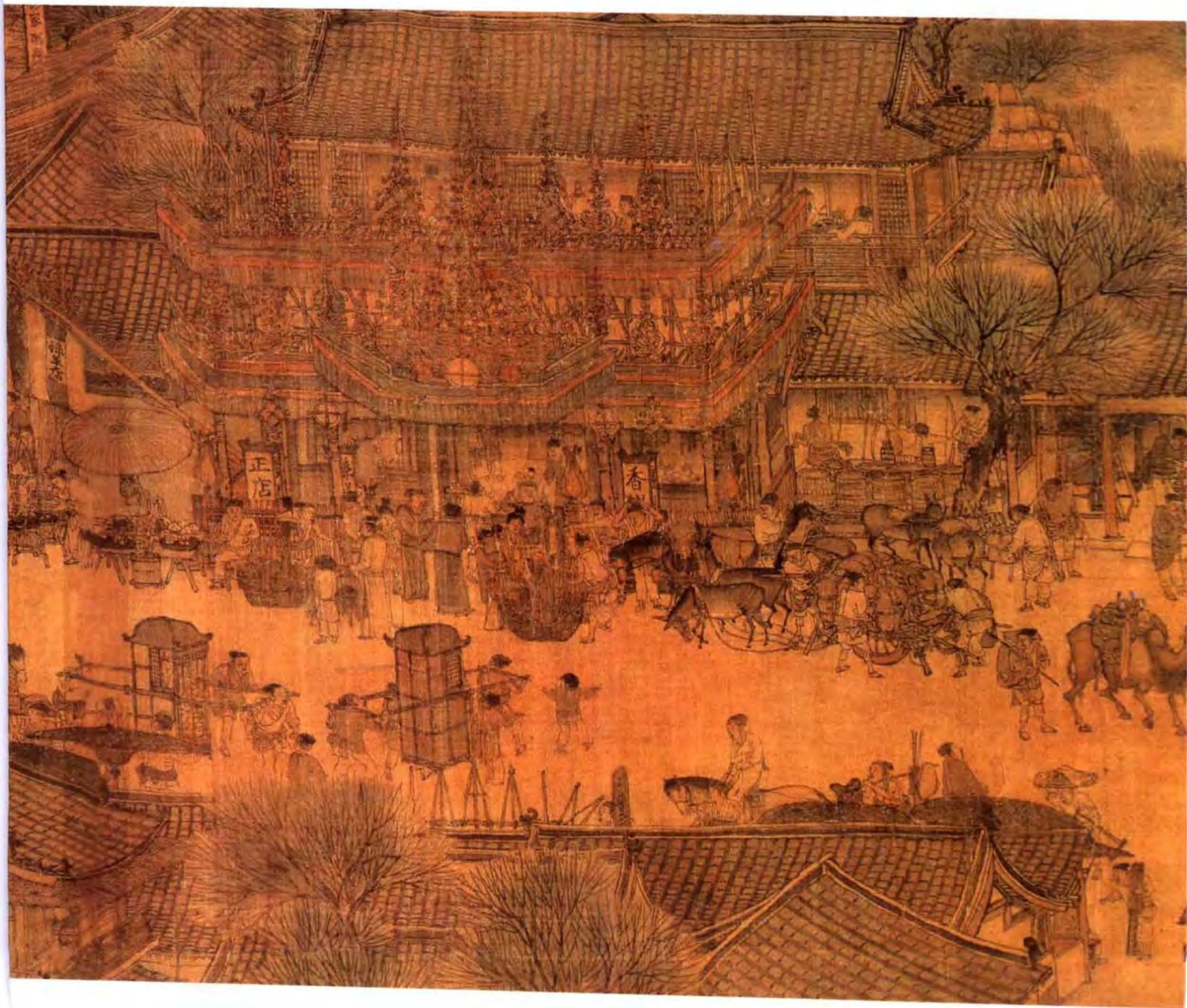
《清明上河图》(局部)



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九月九日，“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

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宋代画家张择端的著名画卷——《清明上河图》，如实再现了北宋末年东京城的繁荣景况。这幅长达五米多的画卷描绘了北宋徽宗时东京居民在清明节出游的情景。画面从东京城郊外的田野绘起，远处一队驮着货物的驴子沿着宁

静的小溪向汴河走来，渐渐有村落出现，道路亦逐渐宽广。新生芽的柳林丛中，远处有一队郊游者归来，男主人骑马，女主人乘轿，轿顶上还插着新折的柳枝。画面沿汴河向西逐渐展宽，由村落而至城关，临河的街道两旁布满了餐馆、饮食小店，河边停泊着一条小型货船，货主正在岸上指挥着搬运货物。再向西去，能看到汴河岸边停泊着一些货船，几个纤夫正在用力地拉着一条大船缓慢地行进。接着一座宛如飞虹般的桥梁出现在画面上，桥下水流湍急，一条大船正奋力前



行，另有一条大船已从桥西浮现船头；桥上往来行人拥挤不堪，桥栏边簇拥着一些摊贩，争相招揽顾客。再向西去，汴河转弯出了画面。经过两个十字街口，便出现一座高大的城楼。进入城门，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首先是一座悬挂“正店”招牌的高大酒楼，酒楼门前结扎了彩楼欢门，横挑出三色酒幌子。再往前，一块“久住王员外家”招牌高出屋顶，这应是一位医生的住处。十字路口北面坐北朝南开了一家大的彩锦铺，一些顾客正在店内挑选缎匹。南面街口上有一个写着“解”字的招牌，应是一家当铺，许多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画面进入一条主要街道，街道上各种人行色匆匆，官员骑马，侍者前呼后拥，妇女则坐了小轿。还有人挑担，有人驾车。《清明上河图》以汴河为中心，对北宋东京的繁华景象作了详尽的描绘，成为人们认识东京城面貌的最直接的形象资料。

张择端是北宋末到南宋初年人，曾供职翰林图画院，擅长于画车马、市街、桥梁、城廓等。除了这幅《清明上河图》，他还有一幅绘画作品流传于世，题《金明池争标图》，现藏于天津市博物馆，描绘的是宋代东京的另一重要景区金明池。

金明池位于北宋都城东京西门顺天门外路北，与路南的琼林苑相对，是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人工开凿的。金明池作为皇家御园，既是皇帝游玩之处，也是供市民观赏禁军演练水战的场所。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虽禁从士庶许纵赏，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池在顺天门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西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

《金明池争标图》描绘的就是皇帝带领

近臣到金明池观水戏、赛龙舟的热烈场面。画面正中落在池心岛五殿，一座五孔拱桥将池心岛连到岸边平台，平台上有女伎作乐，进入大门是临水殿，皇帝在这里观看士兵表演。金明池中，一条巨大的龙舟正缓缓驶向临水殿，龙舟两侧各有五只小船。临水殿前水中，有两排旗杆，正中有一根裹着彩帛的标杆，杆上放置争标夺彩的物品。大龙舟及小船上的水手向着标杆奋力划驶。临水殿东侧有三只小船，每船二人，前边一人执旗，后边一人划船。临水殿西侧还有六只船，船上有艺人在作技艺表演。临池殿内外，穿红着紫的官员和黄衣宦官肃立两旁，戒备森严。池之周围，观者如蚁，场面甚是宏大。《东京梦华录》描述争标场面说：“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龙头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桨，宛若飞腾。至水殿，舣之一边。水殿前至仙桥，预以红旗插于水中，标识地分远近。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队船相交互，谓之交头。又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杆，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金明池在金人占据东京后被毁，池亦干涸。1992年和1996年，开封文物工作队先后两次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勘测和试掘，了解到池周长4940米，池深约3米至4米，池南岸临水殿基长约20米，宽15米，进深约9米。为了再现宋金明池的景象，开封市政府决定投资重建这



《金明池争标图》

宋 传张择端绘
天津市博物馆藏
绢本设色

纵28.5厘米，横28.6厘米
此图描写北宋京城汴京（今开封）金明池水戏争标的场面。

一胜景，相信不久之后，人们不仅能在《东京梦华录》和《金明池争标图》中领略金明池的宏伟，而且能亲眼目睹这一著名皇家御园的景观。

三、城市·镇市·草市

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在杭州设行宫，并改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以临安府为都城。到南宋末年，临安已发展成为具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繁华都市。

南宋临安有内外两城。外城又名罗城，是在五代吴越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城墙高达三丈，厚约丈余，城外绕以十余丈宽的护城河。外城有十三个城门，其中便门、东青、艮

山等门皆建有瓮城。内城位于凤凰山东麓，又称子城、皇城、宫城，即皇宫区。南宋定都之初，一切尚简，宫殿建筑仅及北宋东京皇宫的四分之一。直到孝宗乾道元年（1165）以后，才陆续修建了一些成规模的宫殿楼台。南宋被蒙古灭亡后，仅过了十一年，皇宫失火焚毁了大半。到了明末，皇宫已是一片苍凉，人们只能在《咸淳临安志》所附的《皇城图》和《梦粱录》、《都城纪胜》等书的描述中，想见当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的情景。值得欣慰的是，南宋临安尤其是皇城的考古发掘在近年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但寻找到了御街的踪迹，而且发掘出了南宋太庙东围墙遗址。

南宋临安“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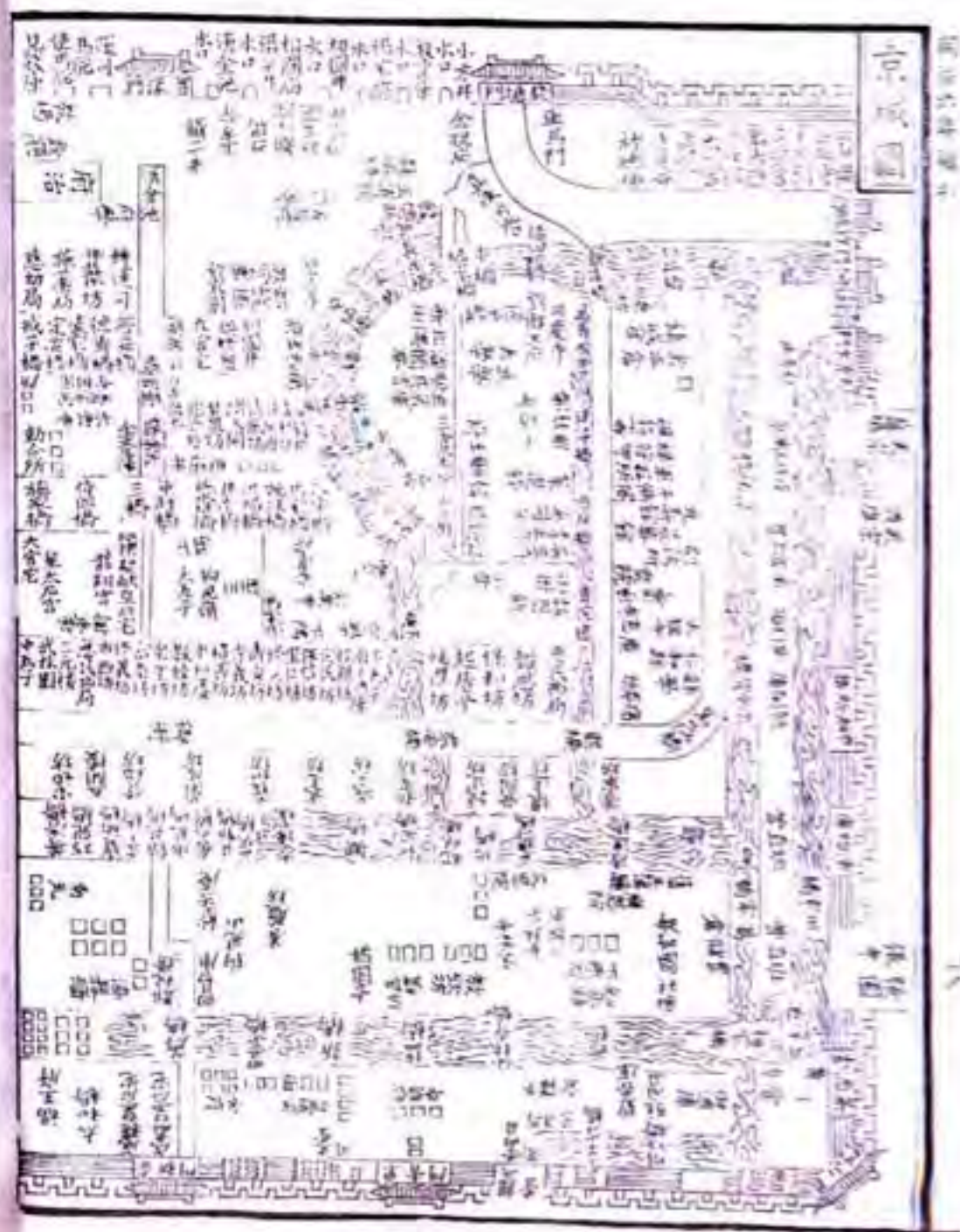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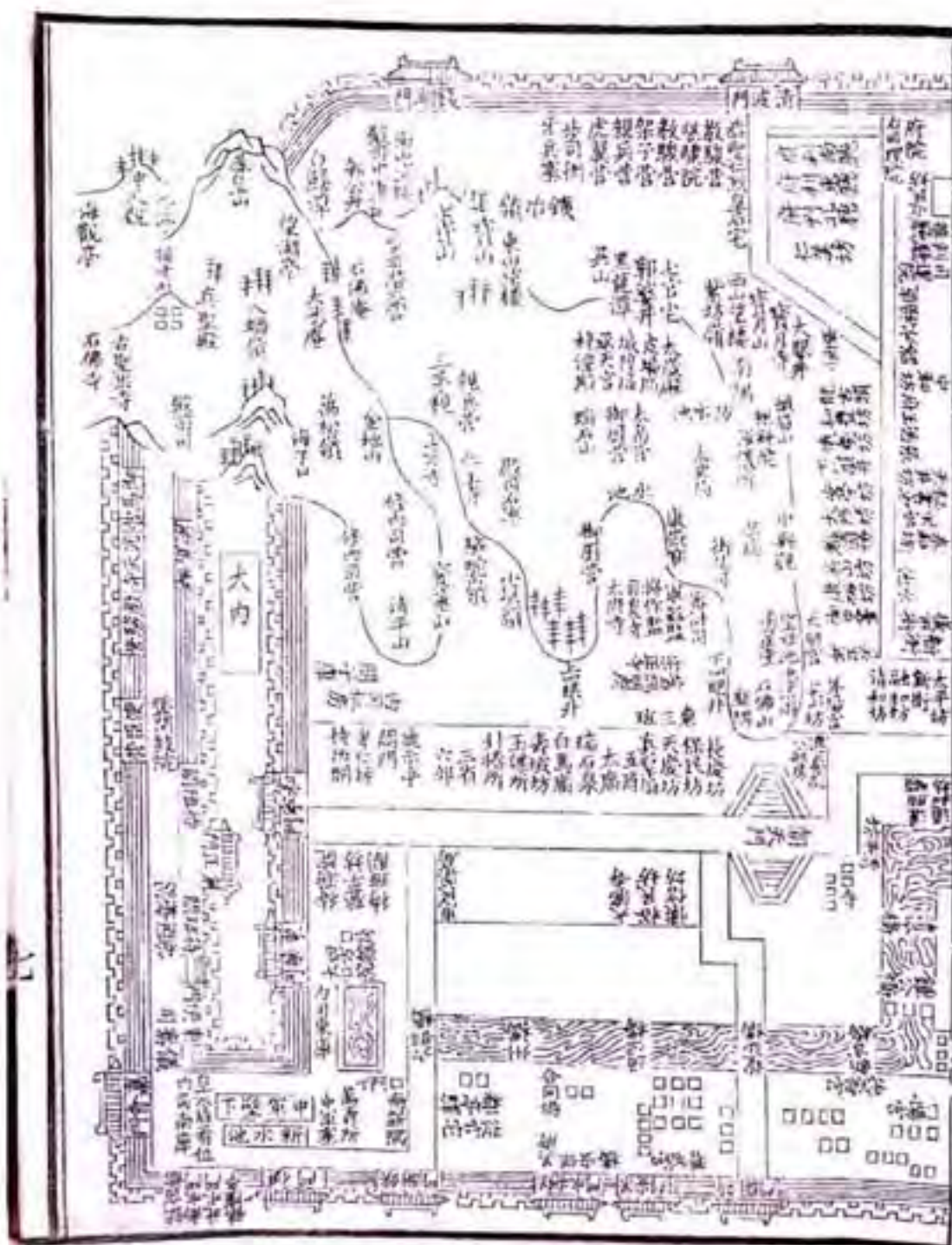
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从皇城北面的和宁门到武林门，是一条宽阔的御街，又称为“天街”，由15300块石板铺成。御街两侧店铺林立，酒楼、歌馆、茶坊、金银铺、彩帛铺鳞次栉比，买卖昼夜不绝。每天早晨五更，早市即已开业，至黄昏之后，夜市复又开张。瓦舍勾栏中，百戏杂技、说书讲史终日喧嚣不已，所有景象都像是宋代东京的重现，难怪当时人作诗讽喻当朝者不思进取中原，沉迷于醉生梦死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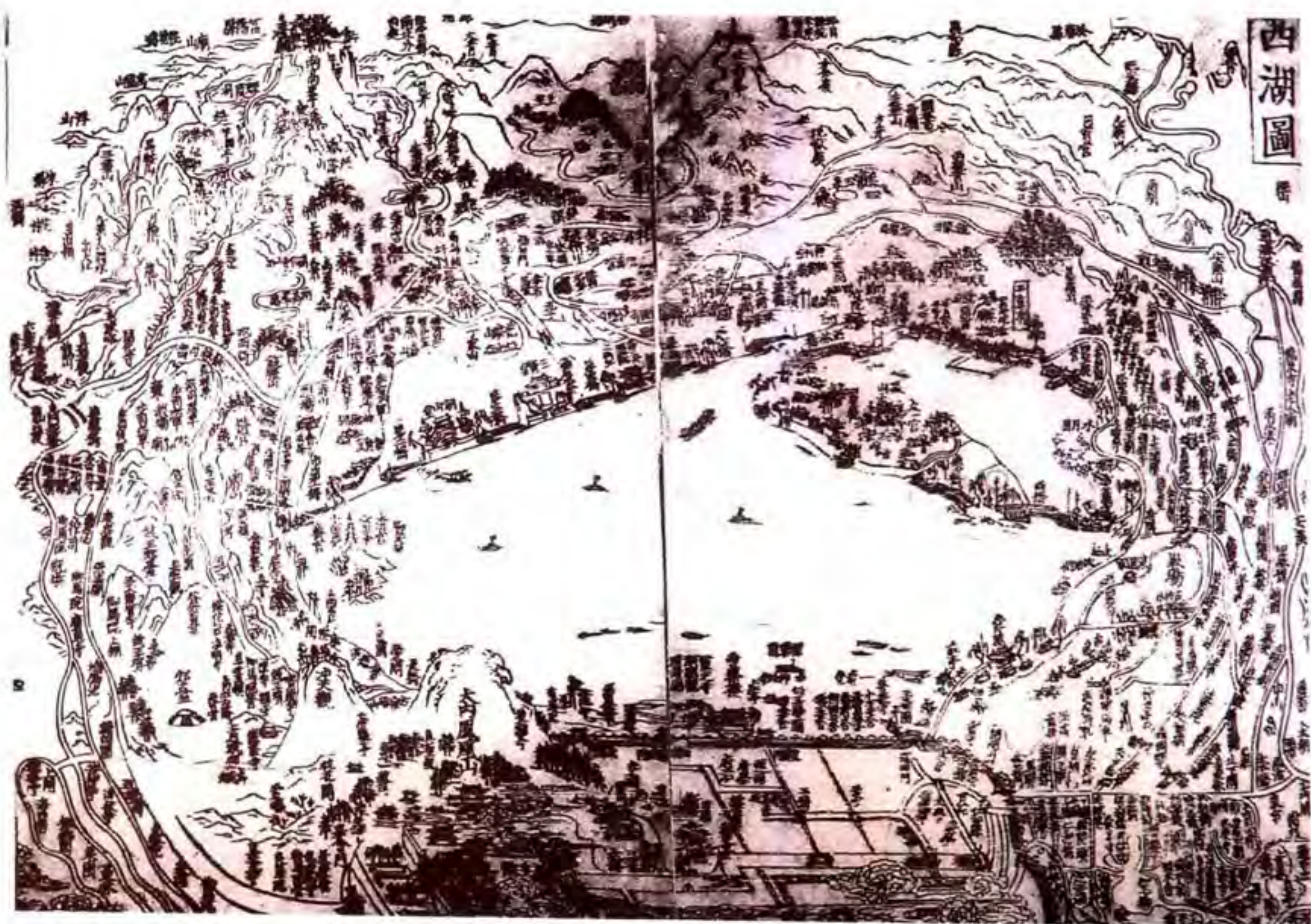
北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江宁（今江苏南京）、扬州、苏州、湖州、常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和四川的成都、夔州（今重庆），广南的广州，福建的福州、泉州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北宋末年，江宁府城人口“十七万有奇”，苏州人口“至四十三万家”。南宋时，北方人口南迁，使得南方城市获得新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人口在十万户以上的大中城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府城人口达几十万。武昌、

长沙、成都也有十万户人口。泉州作为对外贸易中心，州城居民约十万户、五十万人。这些城市工商业都很发达。

在城乡结合部及水陆交通要道，还出现了大量镇市和草市。镇原是驻军地，逐渐形成有一些常住居民的固定贸易市场。临安属县有十五个镇市，嘉会门外有浙江市，北关门外有北郭市、江涨东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西溪有西溪市，惠因寺北教场南有赤山市，江儿头有龙山市，安溪镇前有安溪市，艮山门外有范浦镇市，汤村有汤村镇市，临平镇有临平市，城东崇新门外是南土门市，东青门外有北土门市，“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建康城外也有十四个镇。四川泸州各县有五十多个市。有些城市的发展是以城外镇市的扩张为依托，如鄂州城外的南市，“沿江数万家，麇闹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紧邻长江的沙市镇在南宋时也是“大商辐辏，居民比栉”。太平州黄池镇亦为“客商所聚”的著名

《咸淳临安志·京城图》





《咸淳临安志·西湖图》

镇市。草市本是定期举办的贸易集市，有的地方称为墟市，农民在此出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制品。为了便于商户贸易，一些草市也开设酒店、客店和其他服务设施，逐渐发展成为新的镇。在一些商贾云集、交易频繁的镇、墟、草市，官府设置税场，商税收入相当可观。北宋时，开封府界四十一个商税税务，有二十个设置在镇和草市。有的镇的商税收入超过了县，如沙市商税额为九千八百零一贯，而所属江陵府税额为八千四百六十八贯。湖州“有乌墩、新市，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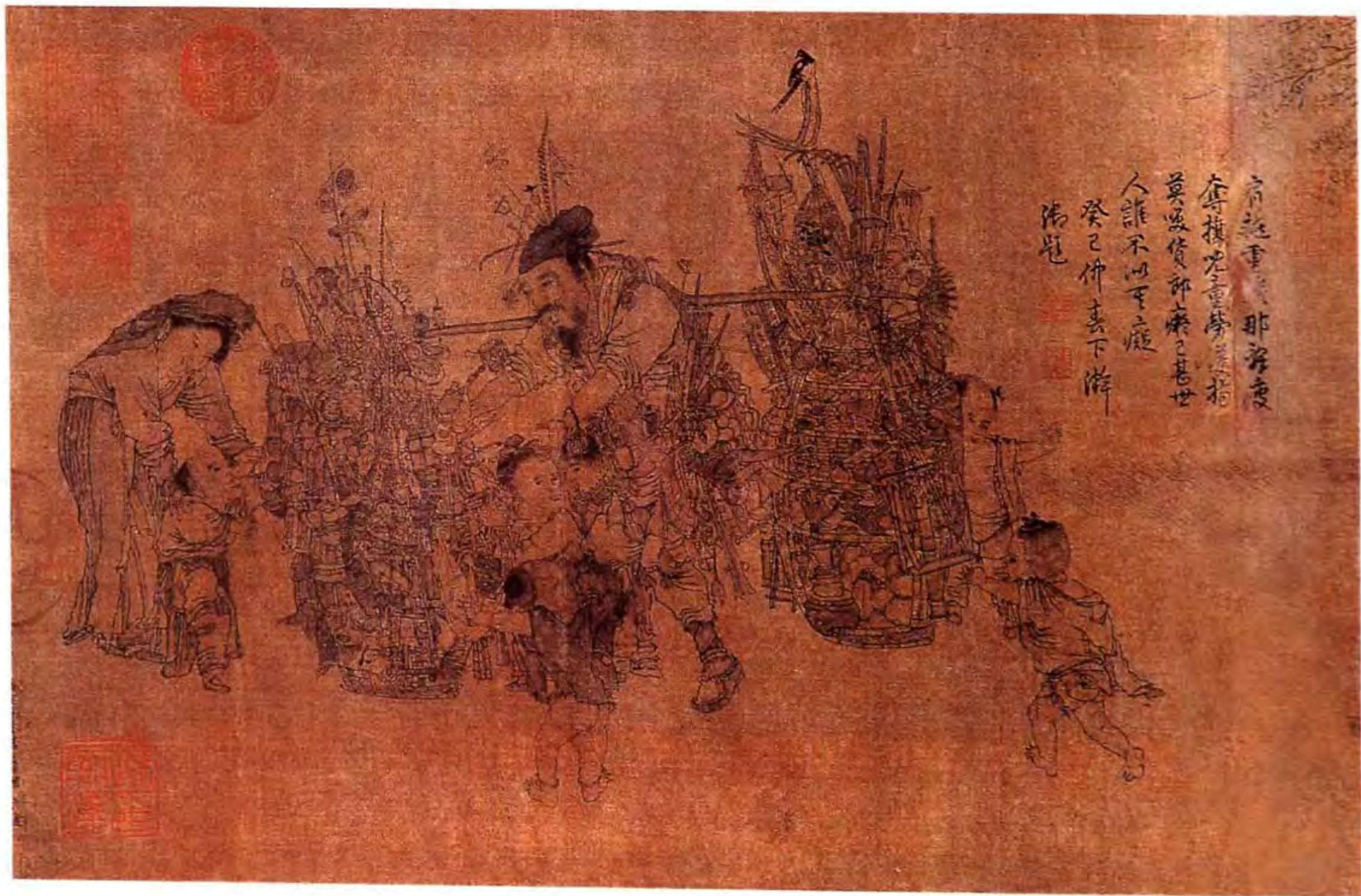
总的说来，由于宋代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增多，形成了包括城市、镇市、草市在内的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贸易市场。封建依附关系的减轻、大批农业人口涌向城市及周边地区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是促成城市、镇市、草市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四、团行市作

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及其他大中城市

里，由于“市”和“坊”的划分已被打破，同一行业分散到各处，在这种情况下，行会组织的作用愈加重要。对于工商业者来说，通过行会组织可以联络交流，平衡市价，同时还可以共同应付政府对本行业的科索；对官府来说，各种行业分布城厢内外，可以通过各业的行会组织，进行管理和控制。北宋以后，“行”的组织比前代更为严密。《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城内工商作坊共有四百四十行，有的叫“行”，如布行、冠子行、销金行、鱼行、蟹行等；有的叫“团”，如花团、青果团等；有的叫“市”，如药市、花市、珠子市、肉市、米市等；还有的叫“作”，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裱褙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等。在镇市、草市中也有类似的行业组织。

《梦粱录》记载：“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这些工商行会是因官府科索而产生的。所有行业内的工商业者都承担向政府派工供



《货郎图》

宋 李嵩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绢本设色

纵25.5厘米，横70.4厘米

此书描绘挑担货郎走街串巷售货的情景，货担上有食品、玩具、文具等，四周有妇女、儿童围观选货，景象生动自然。画面左下方署款“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绘”，嘉定辛未为1211年。画面有乾隆题诗及清内府藏印多方。

物的责任，官府按行业将各家店铺登录造册，带有强制性，并非自愿入行。行内的铺户称行铺或行户，同业的商人也通过商行来保护本行利益；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便不得在本地经商，因而行会又带有垄断本地市场的作用。商行的首领称“行头”或“行老”，由行内物力高强的上户轮充。行头负责确定本行商货的物价，分派官府下派的科索。如供应官物损失或不及时，行头有时要赔垫补偿。行头也代表行铺与官府交涉，充当雇用人力的中介。例如杭州每天需供应大米一两千石，均需米铺来供应。“湖州市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接客出果，……城内外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果。铺家约定日子，支打米钱。其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表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

铺户，大有径庭。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晚不绝可也。且又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故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矣。”在雇佣关系较为普遍的宋代城市里，就连雇佣劳力，也由行老操办。《东京梦华录》载：“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穿着打扮，这也许是宋代都市的一道景观。《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都描写：“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五、交子·会子·关子·交钞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表明商业信贷制度的完善和大宗贸易、长途贸易的增多，传统的铜铁钱已不能满足商品交易的需求，因而需要信用可靠、便于携带的新货币；宋代又是雕版印刷的普及时期，政府先后在一些专营产品的运销上采用钞引作为价值凭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纸币应运而生。

纸币产生于四川，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宋代各地主要流通铜钱，惟独四川使用铁钱。铁钱分量重、价值低，又不便随身携带，给长途贸易尤其是大宗贸易带来困难。当时一匹罗值钱两万，而铁钱两万重达一百三十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宋真宗景德初（1004），民间私印交子贸易，但印刷不一，使用混乱。后来由成都十六家富豪主持，“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发行了统一印制的交子。但不久又因交子利厚，出现了假交子，造成流通中的一些交子不能兑现。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政府接管纸币印刷发行，成立了益州交子务，开始发行官方的交子，每两年发行一次，称之为界。每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作为准备金，并规定每届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官交子最初面额为一贯到十贯，宝元二年（1039）改为五贯和十贯，熙宁元年（1068）又改为五百文和一贯。交子最初只在四川流通，宋徽宗时，扩大到陕西、河东等路。大观元年（1107）又改交子为钱引，增加发行量二十倍，结果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官交子总共发行了四十三界。

南宋初年战事不断，为解决财政匮乏问题，政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成立了交子务，印造和采本钱交子，打算发行于两浙路和江南东西路，因没有准备金，未能发行。当

时临安府民间私下流通一种便钱——会子。到绍兴三十年（1160），朝廷在杭州设立会子务，发行会子，通行东南各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最初发行面额为一千文、二千文、三千文三种，后来增发了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拨左藏库钱十万缗为准备金。会子流通于东南各路，也被称为东南会子。会子到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共发行了十八界，由于经常增发，已是一贬再贬，于是在景定五年，朝廷决定发行关子取代会子。关子也称金银见钱关子、见钱关子、金银关子，这是一种新的铜钱本位制纸币，称为金银见钱关子、金银关子，意味着关子不同于已贬值的铜钱会子。关子只流通使用了十多年，南宋即为元所灭。宋朝还发行过一些在某些地区使用的纸币。宋孝宗时，为筹集军费，在川陕发行关外会子，在兴元府等地发行铁钱会子，与还在四川流通的川引并行；另外，在两淮发行淮交，即两淮交子，在



铜钞版（拓片）

北宋

纵17.1厘米，横9.5厘米

北宋末发行的纸币印版拓片。版面上部绘便钱十枚。中部题写“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下部绘仓房一处，门前二人对立，似背重物，另有一人站立观望。

京西路和湖北路发行湖会，即湖北会子，都是只在本地区流通的纸币。纸币的出现便利了货币流通和市场交易，但宋朝廷时常增发纸币的手段弥补财政亏空，将财政危机转嫁给百姓，给市场造成了混乱。

与南宋并立的金朝也发行有纸币，称为交钞，分为大钞和小钞，大钞自一贯至十贯共五种，小钞自一百文至七百文，也是五种。最初仿宋朝以七年为一界流通，到期兑现或换新钞。金章宗时废除流通界限，改为长久流通的纸币。此后政府多次扩大交钞的发行量，以此弥补财政亏空，导致交钞一再贬值。

纸币不易保存，目前尚未见到宋金纸币原物。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钱币学家奥平昌洪在《东亚钱志》公布了一块宋纸币印版的拓片，据称购自中国。版长16厘米、宽9.3

厘米，图上方有7行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这块印币铜版曾被一些历史教科书认作交子印版，但多数钱币学家认为既然写明“除四川外……流转行使”，就不可能是只在四川流通的交子，应该是北宋末发行的一种流通时间很短的纸币，有的认为是崇宁小钞，也有的认为是崇宁钱引。

此外，1936年又有一块宋纸币印刷铜版被发现。版长18.4厘米，宽12.4厘米，为长方形。上端略损。版面中部为标题栏，大字楷书横写“行在会子库”五字；标题栏上方两侧各有一竖字框，分别题币值，左框内题“大壹贯文省”，右框内题“第壹佰拾料”，两字框之间竖写七行文字，是严禁民间伪造纸币的官府告示，告文称：“敕伪造会子犯人处

行在会子库铜钞版

南宋

传世品

纵18.4厘米，横12.4厘米



斩，赏钱壹阡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此告文与《宋史·食货志》记载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制定的惩罚伪造会子者条律“犯人处斩，赏钱千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大体一致，可以认定是南宋绍兴年间发行的会子。这块珍贵的南宋会子印刷铜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83年，安徽东至县文管会在普查文物时，发现了一套（八件）南宋印刷关子的钞版和印章。印版为铅铁合金，而宋代纸币印刷都用铜版，因而这套关子印版的真伪尚不能认定。

金代钞版发现较多。1965年陕西西安出土了一块金交钞印刷铜版，长21厘米，宽11厘米，上端版首楷体横书“壹拾贯”，版首下有字框，以横线分为两部分，上部正中为面额“壹拾贯八十陌”，两侧分别题“伪造交钞者斩”、“赏钱三百贯文”；下部有七行文字，说明铸造铜版的地区、年代和对伪造者的惩处条格以及对告发伪造人的奖励办法。根据所标年代，这块铜钞版是金贞元二年（1154）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制造的。

六、辽金都城和西夏皇陵

在宋大中型城市蓬勃发展的同时，辽、西夏、金、大理也营建了一批充满朝气的城市，很多城市的遗存直到今天仍依稀可见。

辽上京临潢府是契丹最早兴建的皇都，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始建于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天显元年（926）扩建。该城由皇城和汉城两部分组成，周围约6400米。皇城在北，是契丹族居住的区域，呈不规则六边形。城内建筑有宫殿、官署、寺院、

营幕、作坊街道等；城墙、城门、街道和部分宫殿建筑遗址仍清晰可见，城墙6米至9米高，四面各有城门一座，现存南、西、北三座门址，门宽约50米，皆有瓮城突出城垣之外。城内南部还保存有一些建筑遗迹。皇室所居的大内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北的丘岗上，四面筑墙，北墙尚存，其余三墙多残毁。大内建筑中间有横街，将大内建筑分为南北两组，与《辽史》记载的契丹分南北两个枢密院，北枢密院“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北，故名北院”，南枢密院“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相一致。北院正殿台基高2米，东西宽32米，南北长50米，台基两侧及后方还有九座长方形建筑，正殿之前，左右两侧有八座长方形建筑，大小相同，依次对称排列。经过勘探试掘，在皇城出土了各种建筑材料和各种生活用具，城中散布大量陶瓷片，瓷器有碗、盘、杯、洗，陶器有盆、罐等。汉城在皇城南面，是汉人居住区，也是主要经济贸易区，城内除少数官署庙宇外，多为民用住宅和手工作坊。在皇城南门外500米处，曾发现较大的冶铁遗址，铁渣堆积层有3米至5米厚。汉城还出土有契丹文银币和宋、辽银铤及店铺戳记、押印，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繁盛。据《辽史》记载，上京临潢府住有居民三万六千户，人口十五万余人，除契丹人、汉人，还有渤海人和回鹘人。后周广顺三年（953，辽应历三年），一个到过这里的后周官员描述说：“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

辽仿汉制，设有多个京城。天显元年（926），在扩建皇都的同时，辽太宗迁渤海居民于东平郡，升号南京（今辽宁辽阳）；会同元年（938），得后晋所献燕云十六州地，升

辽上京遗址航拍(照片)



幽州(今北京)为南京幽都府,原南京改为东京辽阳府;统和二十五年(1007),辽圣宗在奚王牙帐建立新都,号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辽兴宗以后,辽共有五京。

辽中京在1959年至1961年由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进行了全面勘测和重点发掘,并在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组成,外城墙周长约15000米,东、西、南三面各有一座城门,其中南门朱夏门建筑遗址尚存,瓮城长宽各50米。内城在外城中部,城墙周长7000米,与外城构成回字形平面,正南设一座城门,即阳德门,现存门址台基。皇城在内城的正中偏北,仅筑有东、南、西三墙,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东、西、南三面城墙长1000米,四角建有角楼。有三座城门,正南闾阖门现存建筑台基,该门与外城的朱夏门、内城的阳德门南北相对,为城市的中轴线。皇城左、右掖门位于闾阖门东、西两侧

约180米,现存豁口遗址。外城街道整齐排列,纵街南起朱夏门,北至阳德门,长1650米,宽64米,很是宽阔。道路两侧还筑有排水沟渠,横街有五条,最宽为15米。内城主街自阳德门至闾阖门,宽约40米,道路两侧建有矮墙。皇城主路自闾阖门通往宫殿区,宽约12米,东西掖门也有道路。外城以官署、庙宇、廊坊建筑为主,建筑遗存很多。中京建成的第二年,宋使臣路振到此觐见辽圣宗和萧太后。他在《乘轺录》中描述:“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余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内城建筑主要有市楼、园圃、驿馆、仓库。皇城宫殿仿北宋东京的布局,从已发掘的武功殿和文华殿遗址看,所建为汉式传统木构架建筑。辽中京城比辽上京更多地仿效了汉族城市的建筑布局 and 建筑模式。

辽东京惟一留下的建筑是辽阳白塔,其他遗址无存。辽西京是在唐云州旧城基础上修建的,四面城墙保存完好,每面长2300米,墙基宽12米至20米,顶宽6米,高8米至10

米,并存21座敌橧(马面),四面各有门,南门瓮城遗址长、宽各50米,北门瓮城尚存,东西宽100米,南北长50米,残高12米。辽南京也称燕京,遗址在今北京广安门外至卢沟桥一带,惟一幸存的一段城墙原在白云观西,长10米,宽5米,高3米,为西墙的一部分。目前探明辽南京城平面为方形,周长约24000米。辽南京的街道、宫殿、市楼、寺庙、坊市、廨舍等建筑基本不存,尚能见到的遗存除残城墙外,就是天宁寺塔。

金上京位于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为金代初期的都城,始建于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定为上京。海陵王在皇统九年(1149)政变夺位后,于天德四年(1153)迁都燕京,因遭到女真贵族反对,遂于正隆二年(1157)下令毁上京宫殿、宗庙、宅第,夷为耕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复称上京,重修宫室寺庙。金亡后,故城犹存,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被毁。金上京分为南北二城,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8米,两城之间筑墙分隔,隔墙长1650米,有门相通。全城现有九处豁口,可能是城门遗址,其中有五处建有瓮城。南城西北部有皇城,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周长2290米。据《大金国志》记载,金太宗时皇城有前朝门和后朝门。现前朝门残存,门道宽6米,两旁高7米的土丘当为阙楼建筑。前朝门内中轴线上有五个宫殿台基,台基两侧有长约380米长的庑廊基址,构成一组建筑群。皇城外向南是一条大街,直通城外郊祭坛。20世纪6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靠近隔墙的地方发现一处冶铁遗址。1978年又在冶铁遗址附近出土了有“上京翟家记”戳记的银镯、银锭、银酒盏、银香炉和凿有“上京警巡院”等铭记的铜镜,可能

是一间银铺的遗址。此外陆续在上京城还出土了金带铐、银碗、银杯、银盏等。1988年在北城内还发现了一处寺院遗址。这些遗址表明,北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

金中都位于北京旧城外城的西南部,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初建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贞元元年(1153)完成,同年金迁都于此。金中都有三重城墙。由外向内分别为外城、皇城、宫城,与宋东京城和明清北京城形制相同。外城略呈正方形,明末《春明梦余录》称其周围“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实为18690米。外城东墙4510米,西墙4530米。北京丰台区马连道附近原有土城,高4米多,蝎子门附近土城高6米,底宽19米,为西墙遗存。南墙长4750米,北墙长4900米,北京复兴门外原有会城门村,即北城墙会城门所在。外城共十三座城门,除北城墙开有四个城门,东、西、南三面各有三座城门。皇城位于外城中偏西,平面略呈方形,南墙中部向外凸出一块。东墙在今报国寺、南北樱桃园一线,西墙在莲花池西,南墙在今菜户营、鸭子桥一线,北墙在今广安门大街南侧。皇城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宫城位于皇城中偏东,是在辽代宫殿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据《大金国志》记载,周长“九里三十步”,与明清北京紫禁城面积相当。南门原名通天门,后改应天门,北门拱宸门,东门东华门,西门西华门。应天门建有阙楼,“正门十一间,下列五门,……左右有行楼折而南,朵楼曲尺各三层四垂,朵楼下有检鼓院”。入应天门内,为宫城中轴线,排列着一组宫殿,自南向北依次为大安殿、仁政殿、隆徽殿。大安殿是举行朝会大典的重要宫殿,据记载,该殿“露台三层,两旁各为曲水。石级十四,最上层中间又为涩道”。“大安殿十一间,朵殿各五间,行廊各

金中都水关遗址

1990年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凉水附近发现

遗址全长43.4米，过水涵洞长21.35米，宽7.7米。南北两端出水口分别宽12.8米和11.4米，底部过水面距现地表5.6米，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最大的。其建筑结构与《营造法式》的规定相一致，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水道设施的重要实例。

四间。”大安殿遗址应在今北京西客站附近，经钻探确认其面阔为十一间，与文献记载相符。

金中都大部分在今北京市区，由于不断进行的城市建设，其地面遗存基本消失。20世纪80年代，在右安门西南发现金水关遗址，距地表5.1米，南北向，石板构筑，以铁锭固定。摆手残高1.5米，摆手前排有密集的圆柏木桩。水关主体呈长方形，流水面平铺石板，石板下衬有粗大的方形横木，即衬石枋；地面上靠近入水口的石板，还用大铁钉固定在衬石枋上。衬石枋之下是成排的地

钉，两者用榫卯结构垂直相接。水关遗址是目前所知金中都城址内保存最大的一处遗址，现已被妥善保护，并建成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此外，西客站旁的莲花池原为金中都西苑鱼藻池，现已辟为公园。金中都西北还建有钓鱼台，为皇帝游幸之处，今地名犹存，位于今玉渊潭。金中都建成后，为便于南北交通，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建成了横跨永定河的一座十一孔石桥，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

金代也设有五京，除上京、中都先后为首都外，还以宋东京开封府为南京，改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沿用辽西京大同府和东京辽阳府。

西夏建国后，元昊设都城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城“周回十八余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兴庆府城有六座城门，南北各二门，东西各一门，城内街坊棋盘式布列，城中的宫城建有宫殿、官署。城西北建有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城西贺兰山东麓还建有离宫、佛祖院、五台山寺、皇帝陵园。今银川西尚存一座64米高的佛塔，为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兴建的承天寺的寺塔。蒙古灭夏时，兴庆府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西夏一直有火葬习俗，但帝王贵族则土葬，并仿唐、宋帝王陵寝制度，在贺兰山麓建造了庞大的皇帝陵园。西夏皇陵早期被盗，地下出土随葬品较少，但从其规模宏大的地面建筑群来看，不但贵族时兴厚葬，而且葬俗和陵墓具有较浓厚的民族特色。距银川市西25公里，是西夏营建的帝后陵区，整个陵区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10公里。共有皇帝陵8座，陪葬墓70余座。从1972年开始，宁夏博物馆对这一占地10万平方米的陵区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发掘了一座皇陵（8号



陵)和三座陪葬墓,清理了两处碑亭,出土了大量文物。8号陵是西夏第八代皇帝李遵瑱的陵墓,墓深25米,墓道长49米,甬道两侧各有武士画像一幅。主墓室两侧各有一配室。由于早年被盗掘,地宫的结构已混乱,在残存的底部只发现了嵌绿松石鎏金银饰件、竹雕、镶蓝宝石铜饰件、盔形铁器、绿釉瓷瓶等。陪葬墓中出土有铜牛和石马。此外,陵园地面建筑尚存陵阙、碑亭、神墙、献殿、月城和内城。月城内沿神道两侧立石象生群。在清理2号陵的碑亭时,出土汉文残碑石511块、西夏文残碑石1265块,复原出一块篆体西夏文“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额,证实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寿的寿陵。西夏皇陵的建筑构件如人像碑座、鸱吻、砖瓦、脊兽、滴水等,都颇具民族特色。巨大的琉璃鸱吻高152厘米,龙首鱼尾,头部有鳍,身披鱼鳞,张口吐舌,双目圆睁,长角斜立,很是威猛。3号陵出土的人面鸟身妙音鸟,形象也很奇特。西夏泰陵、寿陵和李遵瑱陵碑亭遗址出土的11件人像碑座,男女像极为夸张,男像双目突出,獠牙外露,腹带肚兜,双手抚膝;女像姿态与男像相同,惟双乳下垂,手腕、足胫带着双环,极富艺术表现力。

第五节 交通运输与海外贸易

辽、宋、西夏、金时期,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北宋时,汴河、淮河主要承担供应京师的粮米货物的漕运,南宋以临安为中心,通过内河运输与海上交通保障供给。宋辽金都有严密的邮驿制度和遍布全国的驿站。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为



鸱吻

1972年宁夏银川西夏皇陵西碑亭遗址出土

高152厘米,宽92厘米,厚32厘米

鸱吻是屋项正脊两端的装饰物。这个鸱吻呈龙首鱼尾状,龙首与鱼尾分别铸制成形,遍饰鳞纹,施绿釉,釉面光亮。鸱吻形体高大,形象威猛雄壮。

宋代海外贸易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泉州、明州、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朝廷设立市舶司进行管理。当时的海外贸易,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非洲东岸、北岸,加强了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一、汴京四渠

北宋东京有汴河、蔡河(惠民河)、金水河、五丈河(广济河)贯穿全城,称为“汴京四渠”。这四条河渠是东京的重要运输线,各地粮米货物主要通过它们运入京师。《宋史·河渠志》称:“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

汴河即隋炀帝时开凿的通济渠,唐代改称广济渠,是联通黄河到淮河的运河。渠水通过邗沟又与长江相接,并通过江南运河直达苏杭,因而是宋代连接中原到江南的最重要的运输水道。北宋时,东京的漕粮百货主

要依靠东南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两浙路）供应，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至道初（995），汴河漕米增至五百八十万石。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规定汴河每年上供额为粮米六百万石，宋初人张洎描述汴河是“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淳化二年（991），汴河在浚义决口，宋太宗亲赴现场指挥堵塞，并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汴河之水源自黄河，黄河每年有冰冻枯水期，导致了汴河漕运不能全年进行，同时大量黄河泥沙不断带入汴河，造成河道淤积不畅。宋朝曾多次疏浚河道，但效果不明显。到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开封以东雍丘、襄邑一带，汴河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宋神宗接受都水监范子渊的建议，在元丰二年（1079）导洛水入汴河，一度解决了淤积的问题，但后来因水源不够，又恢复引黄河水为源。到北宋末年，汴河堤岸多处决坏，水流干涸。金占据开封后，汴河全线堙废。

蔡河是惠民河的一段，惠民河原为战国时魏惠王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时开凿的鸿沟，也称为沙水、蔡水，唐末干涸，五代后周时导汴水入蔡，重加疏浚。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在原水道基础上重新开浚，使蔡河连通闵水、洧水、滎水、颍水，蔡河从此成为京师连接中原各地的重要通道。“舟楫相继，商贾毕至，都下利之。”当时，陈州（今河南淮阳）、颍州（今安徽阜阳）、许州（今河南许昌）、蔡州（今河南汝南）、光州（今河南潢川）、寿州（今安徽凤台）等地的漕粮主要通过蔡河运至东京。太平兴国六年（981），惠

民河漕运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景德四年（1007）定惠民河每年漕运额为六十万石。

五丈河又称广济河，其故道是济水，因宋朝规定疏浚宽度为五丈，俗称五丈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在开凿蔡河的同时，发丁夫数万疏浚五丈河，又在汴河上造渡槽分隔二河。五丈河经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后分南北两渠，北渠至济州（今山东巨野南）注入梁山泊，出梁山泊沿北清河（亦即古济水）可达郛州（今山东东平）；南渠经徐州注入清水（泗水），可通淮河。五丈河主要承担京东路的漕运。景德四年定五丈河每年上供额六十二万石。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在通津门开凿水道，使漕船可直入京城。

金水河是宋代开凿的水道，建隆二年（961）引水过东牟，“凡百余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横绝于汴，设斗门，入浚沟，通城濠，东汇于五丈河”。宋乾德三年（965）引水入皇城后苑。大中祥符二年（1009），扩充水道，自天波门沿皇城至乾元门，“官寺、民舍皆得汲引”，成为供应城内用水的水源。

汴京四渠中，汴、蔡两河承担了运输江淮地区漕米至京的任务。每年由东南六路经江南运河和汴河运至东京的粮米在六百万石左右，最多时达八百万石。此外，各地物产也通过这些河道运至京城，东京作为百万人口的巨大消费城市，所需物资主要依靠水运。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能够看到汴河上大小船只往来运输的繁忙景象。南宋迁都临安之后，每年运往临安的漕粮仍在六百万石左右，江南运河以及长江成为新的运输通道。

水陆交通的发达也带动了造船业的兴旺。据《宋会要》记载，宋太宗至道末（996年左右）各地承建的漕船达到3337只。两浙路的处州（今浙江丽水）、明州（今浙江宁

波)、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婺州(今浙江金华)、江南西路的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南路的潭州(今湖南长沙)、鼎州(今湖南常德)、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郿县西南)等地,当时都承担大量漕船制造的任务。

宋代运输船只的载重量以“料”计算,每“料”相当于一硕或一石。汴河漕船载重量一般在二百五十料至五百料之间,约合今15吨至30吨之间。北宋政和四年(1114),尚书省奏称缺少平底船,于是朝廷令两浙路各打造三百料船三百只,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南北路各打造五百料船三百只。宋代内河航运也出现了万石船。张舜民的《画墁录》记述,他在鄂州见到的万石船能载米一万二千石,“船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登降以阶梯,非甚大风不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东京金明池龙舟争标时的龙舟:“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檣板皆退光,两边列十间子,充间分歇泊中,设御座龙水屏风。檣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铁铸大银样,如桌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龙头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桨,宛若飞腾。”南宋西湖游船也有载重量较大的。《梦粱录》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有一千料者,约长二十余丈,可容百人。五百料者,约长十余丈,亦可容三五十人。……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

宋代内河船以平底船居多,船上设施齐全,尤其是漕船,设隔离舱,可分类储运货物。1978年上海嘉定封浜河工地出土一只南宋双骨内河船,残长6.23米,约为全船长度的三分之二。船头呈方形,镶梯形铺头板,船舷侧板厚约4厘米,宽20厘米至30厘米,系用若干木板拼接而成,连接处用方形参钉平



口拼接,也有以枣核钉与参钉结合使用的。船体两侧各有两根相叠的舷护木(大腊),系用宽15厘米、厚9厘米的整段木料,以扒头钉钉合在舷侧板上。船体残留七个底舱,其中第一舱(船头舱)密封,以增加船的浮力。各舱长短不一,最长的第七舱长1米,最短的第五舱为64厘米。船为平底,前后由三组木板组成,船底外中心线两侧各有一贯通前后的龙骨,龙骨为半圆形,乃劈成两半的原木,龙骨钉合在船底外侧,增强了船底的抗压能力及船体的纵向强度。船舱残留安插桅杆的金刚座,桅杆已失。根据残留船体形状,推测此船长约10米,载重量在5吨左右。

宋代为演练士兵水战,还不断建造战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曾令京东、京西二路临河各州造战船五百只。宋代战船名目繁多,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游艇、海鹞等,其样式在成书于北宋的《武经总要》中都有图例和介绍。南宋初,杨么起义军为抵抗官军进剿,曾在洞庭湖建造了一种奇特的车船。“置人于前后踏车,进退皆可”,“船两边有护车板,不见其车,但见船行如飞,观

汴河客船模型

全长86厘米,宽25厘米,高62厘米

根据历史文献和图像制作,为平首平尾平底,船舷主版材衔接,以铁钉加固。船中部立“人”字型纤杆,供人力拉纤,可随意放倒或竖起。船首高本绞车,为操舵之处;船尾安平衡舵,用以控制航向。

《武经总要 游艇》



者以为奇异”。有的车船上设置了拍竿，“其制如大桅，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贯巅。遇官军船近，便倒拍竿碎之”。南宋初为与入侵的金军作战，也依车船的样式建造了自一车至八车各式车船。宋金采石大战，“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持满以待，相顾骇愕”。湖南省博物馆曾复原了杨么战船的模型，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急递铺

两宋时期，全国陆上交通四通八达。宋朝和辽、西夏、金各条道路均以京师为中心向各州县伸展，连接重要城市及各州治、县治。宋朝连接各行政区域的道路称官路，一些主要官路同时也是驿路，官府每隔一段路程便修建驿馆，驿路中的主干道称为“大路”或“大驿路”。

宋朝与辽、西夏、金先后发生战争，在和平时期保持不间断的互聘关系，往来频繁，因而对东北、西北的道路交通非常重视。前往辽的路线，自雄州白沟驿（今河北雄县

白沟）至涿州、燕京（今北京），然后出古北口、居庸关、松亭或榆关，到辽中京，最后抵达辽上京。不少出使辽国的宋人描述过这条驿路，路振的《乘轺录》记载：“自白沟至契丹国凡二十驿。”通往陕西边防要镇的道路也屡次修缮，北宋中叶，专门修建了从陕西、甘肃入川的驿道，途中建有阁道2309间，邮亭389间。宋使前往西夏，或自庆州（今甘肃庆阳）出发，沿白马川，出青岗峡至西夏灵州；或由延州（今陕西延安）出发，经洪州（今陕西靖边）、盐州（今宁夏盐池）至苦井，过黄河吕渡经静州（今宁夏灵武境）至兴庆府。金立国之初，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和南京（今北京）之间设长达三千余里的驿路，每五十里置一驿站。金占据开封后，以开封为南京，南宋使臣出使金中都，在到雄州白沟前，走的基本是原来北宋的国道。

宋代在京师修建有专门接待各国使臣的馆驿。北宋时，辽使住都亭驿，西夏使住来远驿，其他地方的使节住怀远驿。在京城以外也修有供来往官员和使者中途休息住宿的驿馆。王应麟的《玉海》记载：“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各驿站之间距离一般在四五十里，也有六七十里。官吏在驿馆留住一般要出示“驿券”，但后来宋政府放宽了对官员的限制，规定“品官之家及未入官人若校尉，虽不请券，并听入”。

宋朝以前，政府公文和书信的邮递都由各地驿站的递夫负责，递夫由乡村百姓充任。北宋改由地方厢兵传递，后来又设立专门的“递铺”，将邮递与驿站在职能上分开，驿馆似乎成了官吏军卒的招待所。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宋代的邮递有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形式。步递用

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为能及时传递重要文书，北宋真宗时，又出现了急脚递，据说能“日行四百里”。急脚递铺也称“急递铺”，用以传递机密文书，当时规定“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真、定总管司及雄州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后来宋神宗时对西夏和交趾用兵，都采用急递铺传递军事文书。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递铺，北宋时分别置铺，承担各自递件的传递。马递铺除了递送文书外，还负责向过往的官员提供乘骑。自北宋雍熙二年（985）开始，宋朝还允许官员将书信与官方文书一起传递。

南宋时，步递、马递、急脚递铺合为一铺，因驿传都属于尚书省兵部的驾部司管辖，故称为省铺。南宋初，出于军事需要，在杭州至江淮一线和通往四川的驿路，还设立了摆铺和斥候铺，每十里置一铺，专门传递

“日逐探报斥候文字”。每铺由五名身体强健的弓手值守，后改为由兵士担任铺兵。

宋代邮驿以符牌为凭信，传信木牌也称檄牌，“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宋太宗时，改用“篆书银牌”，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增加了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金字，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是战争期间用于递送皇帝诏书的专门凭证。《梦溪笔谈》形容金字牌传递：“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南宋初在金牌传递过程中又增加鸣铃，“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收，不得时刻住滞”。南宋绍兴十年（1140），岳飞进军北伐，宋高宗就是以金字牌急递的方式，追岳飞班师。南宋为递传军队和政府紧急文书，在使用朱漆木牌的同时，还新增了雌黄漆青字牌和黑漆红字牌，以急递形式传递。黑漆红字牌书“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要求日行三百里，青字牌要求日行三百五十里。辽、西夏、金的邮驿主要依靠马上传递，辽代驿传凭信是长一尺的



西夏敕牌

通高18.5厘米，直径14.7厘米

敕牌为铜质，由两个圆形符牌组成，以牙口咬合，两片之间形成空腔。上端有长方形提钮，两片合成一体才是一个完整的符牌。一片外侧雕刻回曲花卉纹，纹内双线阴刻汉文“勅”字；另一片刻四个西夏文字，意为“火急驰马”。这种符牌是西夏王朝传递文书、命令时，使者所用的敕牌。

银牌，刻契丹文“宜速”或“敕走马牌”等字。西夏驿站设置较完备，据曾巩的《隆平集》记载，北宋时西夏境内东西有二十五驿，南北有十驿，自黄河至辽境又有十二驿。传世西夏敕牌为上下两块组合成的套牌，上面以西夏文字刻写“火急驰马”。金代驿牌有金牌、银牌、木牌三种，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金使臣入宋，也佩这些驿牌，被称为金牌郎君、银牌郎君。

三、重现人间的宋代海船

唐末以来，吐蕃、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阻隔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交通，同时由于全国经济中心已由西北、中原转向南方，东南沿海城市成为新的对外贸易港口。加之宋代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宋代海外贸易非常兴盛。

早在北宋时，如何从海路发展与各国的

联系和贸易，已经引起政府的关注。宋太宗曾派人分四路前往南海探询航线。两宋时期的海外贸易路线，一条从广州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到大食（阿拉伯）；哲宗时增开泉州港，由此经南海亦可抵达阿拉伯各国；一条从明州（今浙江宁波）或杭州起航，前往日本和高丽；还有一条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密州（今山东诸城）北通高丽，南抵淮、浙、福建、广南。北宋中叶，因担心商船夹带兵器及违禁品到辽统治区域，宋朝廷颁令禁止商人从海路往登州。南宋时，山东半岛的出海港口已为金人所占，主要通商港口是明州、广州。为发展远航，这些城市都有规模很大的造船场。

宋代海船较内河船更加高大坚固，技术水平也更高。《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描述：“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宋神宗时，为了派人出使高丽，曾经打造过两条万料船，分别命名“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也曾建造了两艘载重两万料的神舟，与六只二千料载重量的客舟组成船队出使高丽，船抵达时，高丽国人“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宋代建造的海船不仅载重量大，而且速度快，能调节航向，船舱一般都设立隔舱。朱彧的《萍洲可谈》描述：“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广各数十尺，商人分占贮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航海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海员能运用信风规律出海或返航，并通过天象判断潮汐、风向和阴晴。《梦粱录》记载，南宋的舟师能够“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则知阴阳，验云气则知风色顺逆，毫发无差。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浪拍岸，则知次

泉州南宋海船模型

原船于1974年在福建泉州后渚湾海滩出土，长177厘米，宽60厘米，通高183厘米。根据尚存船体结构及舱内遗物，可以推断此船是一条多桅多舱的南宋外贸海船，载重量约200吨。



日当起南风；见电光则知夏风对闪。……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等分日，此两日若风雨不当，则知一句之内，多有风雨。凡测水之时，必视其底，知是何等沙泥，所以知近山有港”。两宋时期，指南针已在航海上普遍应用。《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提到“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

20世纪以来，陆续有一些宋代海船在国内外出土，为认识宋代的造船水平和海外贸易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74年在福建泉州后渚湾海滩出土了一只南宋海船。船身残长24.2米，残宽9.15米，残深1.98米。复原后长约35米，宽约11米。木船上部结构已失，只保留船体，其平面略呈椭圆形，尖头方尾，尖底。船壳由多重杉木板叠合，底部龙骨残长17.65米，由三段松木连接而成，接合处挖有“保寿孔”。船内尚存桅座、舵座及十三个隔舱，各舱规格不一，第十舱最长，约1.8米，第八舱最宽，约9米。分隔船舱的隔板以杉木居多，少数用樟木和松木。根据尚存船体结构，可以推断是一条多桅多舱的南宋外贸海船，载重量约200吨。同船出土时舱内还有香料药物四千余斤及陶瓷器、铜铁钱、木牌签、象棋等物，应该是自海外完成贸易后返航的一只货船。

1979年在浙江宁波东门口出土了另一只宋代海船，残长9.3米，残高1.14米，大部分船体结构已腐坏，仅艏柱、船底、壳板、抱梁肋骨、龙骨保存完好。龙骨残长7.34米。船板的纵向连接采用直头斜接方式，填充舱料，再用铁钉加固。残存的前半部还有6个船舱，每舱之间有隔板。以船体复原全船，为一只三桅尖头尖底方尾海船。

1992年在韩国全罗道珍岛郡出土一只中

国宋代海船，残长16.85米，残宽2.34米，残深0.7米。船体用三根独木连接而成，即先将三根樟木挖空成槽，再纵向连接起来。船体首狭尾宽，前高后低。船内用六道隔板分为七舱。船中部尚存桅杆座，船内发现有八枚铜钱，最晚是北宋徽宗时所铸政和通宝。

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队开始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打捞一只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沉船，目前已探明沉船的位置和规模，并出水了大量瓷器。此外，2002年在河北东光码头镇出土了一只长约13米至15米的沉船，船中有磁州窑瓷器及残片160件，完整器物30多件，为北宋末年或者金初时期的磁州窑产品。有人推断，此船可能是经渤海出海的一条贸易海船。

在传世宋代铜镜中也有表现航海的场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只宋代海船纹铜镜。镜背以海波纹为底，起伏的波涛中有一条桅杆高耸的海船正在行驶，船头船尾以及船舱中人物清晰可见。

海船纹铜镜

宋

传世品

直径17.3厘米，边厚0.6厘米。八出菱花形。镜背图案以海波纹为底，起伏的波涛中有一条桅杆高耸的海船正在行驶，船头船尾以及船舱中人物清晰可见。镜钮上方铸有篆书铭文“煌亟昌天”。传世宋代海船纹铜镜还有书“天亟安昌”铭文的，均是祈祷皇天保佑出海者平安的意思。带有这种图案和铭文的铜镜不仅是海船上的生活用具，而且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祈祷用具。





青瓷残片
新加坡出土

四、市舶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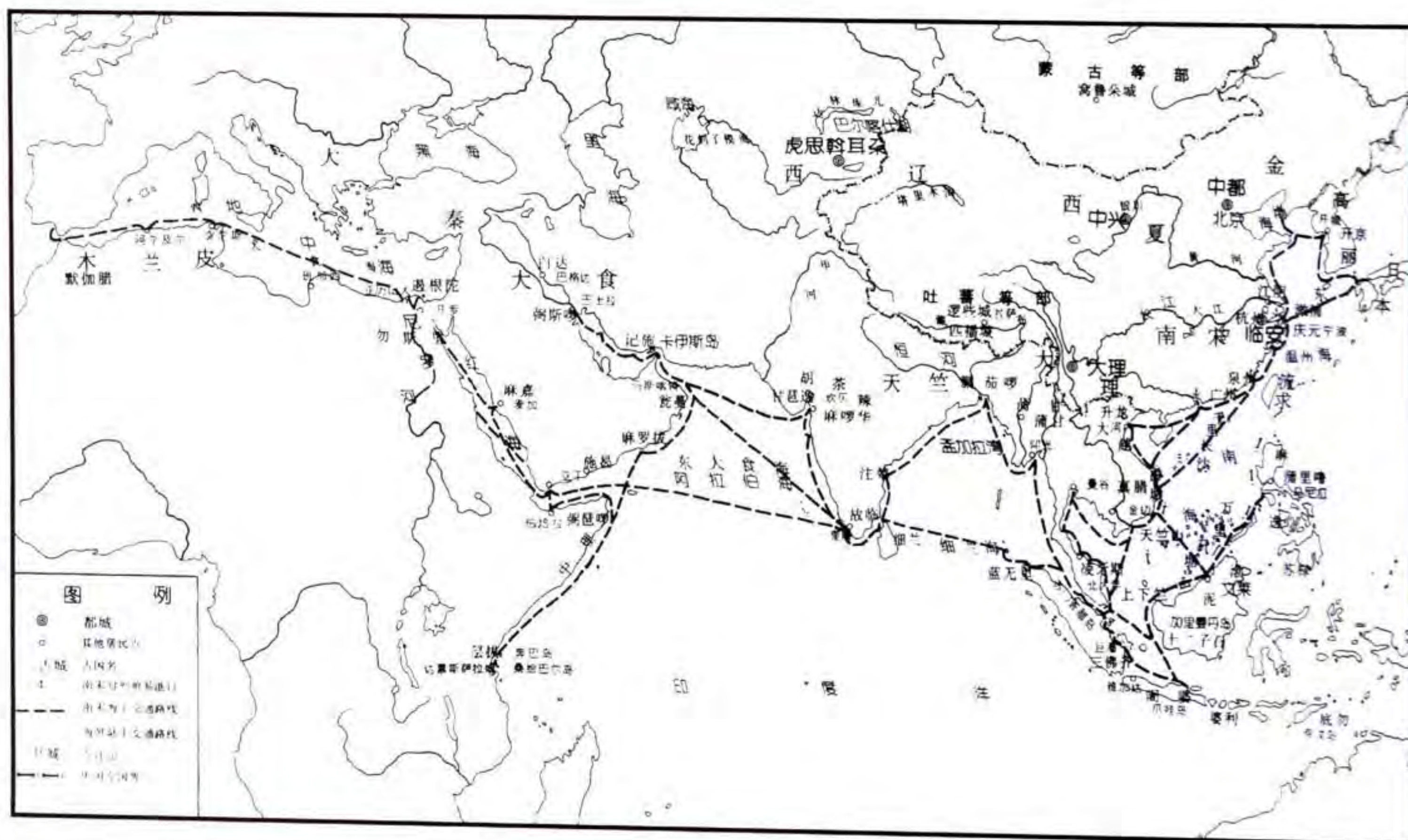
宋代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外贸商税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北宋初，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三个主要贸易港口设立市舶司，宋哲宗时，又增设泉州、密州市舶司，北宋末在秀州华亭增置市舶司。南宋时，市舶司的增损较频繁，大体沿袭北宋广州、泉州、明州的市舶司，增设两浙、福建、广南三路市舶司，一度将杭州的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同时在温州、江阴等

地也设置了市舶司。南宋中叶，罢杭州、江阴、温州、秀州四处市舶司，两浙路只保留明州市舶司，南宋后期，又在澈浦设立市舶场。

市舶司的职能是“掌蕃货海船征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货”。所谓征榷，即对外贸货物按照10%抽取商税。此外还有“官市”，即通过博买，以较低的价格强行购买犀角、象牙、香药等名贵货物。北宋仁宗时，市舶司的收入每年为五十三万贯，到了南宋高宗时，增加到二百万贯。北宋时，广州是最大的贸易港口，宋仁宗时，广州市舶司一年博买乳香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相当于各市舶司博买乳香数量的98%；到南宋，泉州港崛起，逐渐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泉州既临东海，又可达南海，商船往来极为方便。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来泉州贸易的就有大食、波斯、三佛齐、占城、高丽等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船，宝庆元年（1225）成书的《诸蕃志》列举到泉州从事贸易的商人分别来自五十多个国家。据一些海外交通史研究者考证，宋代从海外进口的货物品种在四百种左右，主要有产自大食、真腊、占城、阁婆、三佛齐的各种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苏

广东南海1号沉船上的宋代瓷器





木等，从日本、高丽来的货物主要是硫磺、木材、水银、沙金、珠子、人参、药材、纺织品、皮货、扇子、文具等。日本制造的折扇、刀，高丽生产的白布、螺钿器，在中国很受欢迎。成书于南宋末年的《宝庆四明志》有“市舶”一节，详细开列了当时各国进口到中国的货物品种清单。当时出口货物主要是茶

叶、粮食、药材、陶瓷器、铁器、丝织品、文具、乐器等。宋代外销瓷的产量很大，主要是日常生活器皿。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上万件影青瓷器就是当时出口的主要产品。在东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岸、北岸都曾有宋代中国瓷器出土。

宋代海外贸易交通示意图

第五章

科技文化



辽、宋、西夏、金时期，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化学、医药学、建筑学等方面成就卓著。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进步。这一时期，文化教育极为辉煌。自北宋中叶开始，不仅官办学校遍及各州县，私人开办的书院也日益增多。学者讨论经术时更加强调个人的见解，而不拘于前人的注释，复古和疑古两种思潮同时兴盛，使儒学得到更新，并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大中城市的崛起，市民文化的兴盛，促使这一时期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更加关注现实、贴近大众，而印刷术的普及，又使他们的作品较前人更多地流传后世。当时，涌现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第一节 观天测地

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与探讨，不仅在于使自己获得新知，更在于应用。两宋时期科学家对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发明创造，充分说明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

一、天文图碑和墓室星图

宋朝对天象的观测和记录，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除了司天监定期观测外，皇宫中还设有天文院。目前最早关于超新星爆发的记录，就出自宋代史籍的记载。辽、西夏、金建国后，相继引进中原历法，并仿汉族官制，设立司天监。1126年底金人攻入东京，将灵台上的天文仪器搬至燕京，后在金中都建成规模庞大的司天台。早在西晋时，中国

古代科学家就发现了岁差，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祖冲之编订《大明历》，首次将岁差计算在内，定一年为365.2428日；金代司天监官员重新修定《大明历》，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9日，朔望月长度为29.53059日；南宋庆元五年（1199）颁布的《统天历》，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与实际只差26秒。在辽墓室星图和西夏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出现了黄道十二宫名称，表明外来的天文知识已经传入中国。

宋朝曾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大约每次观测都绘制星图，其中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观测后由黄裳绘制的星图，在南宋淳祐七年（1247）由王致远刻石成碑，图碑原在苏州文庙。碑上半部为星图，外径91.5厘米，星图直径85厘米；下半部为碑文，正文41行，是对太极、天体、地体、南北极、赤道、日、黄道、月、白道、经星、七政五星、天汉、十二辰、十二次、十二分野等古代天文名词的解释。显然这幅星图不仅是实测记录，而且是阐释星空世界的一幅教学图，如同保存在苏州文庙的《地理图》、《平江图》、《帝王绍运图》等图一样，是当时府学的学生了解天地人的直观教材之一。这幅北宋绘制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上绘三个同心圆：以在北纬35度处南天可见的界限为大圆，以北极附近常年可见的为小圆，以赤道为中圆；另画一与赤道交角24度的中圆，代表黄道；又以北极为中心，向外辐射经线二十八道；经线间距不等，分别等于二十八宿中各宿的赤道宿度，并标明十二辰次、十二星野。图中绘星座280个，恒星1434颗。而西方在发明望远镜前所绘星图，最多只收恒星1022颗。南宋天文图碑记录了中国11世纪天文观测的最新结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此外，北宋苏颂《新仪象注要》附有五幅星图，即紫微垣星图一幅、浑象四方中外官星图二幅、浑象北极南极星图二幅，共绘星1464颗。据天文史研究者考证，书中所记也是元丰年间天文观测的记录。苏颂星图以两种不同的投影系统作图，一种是两幅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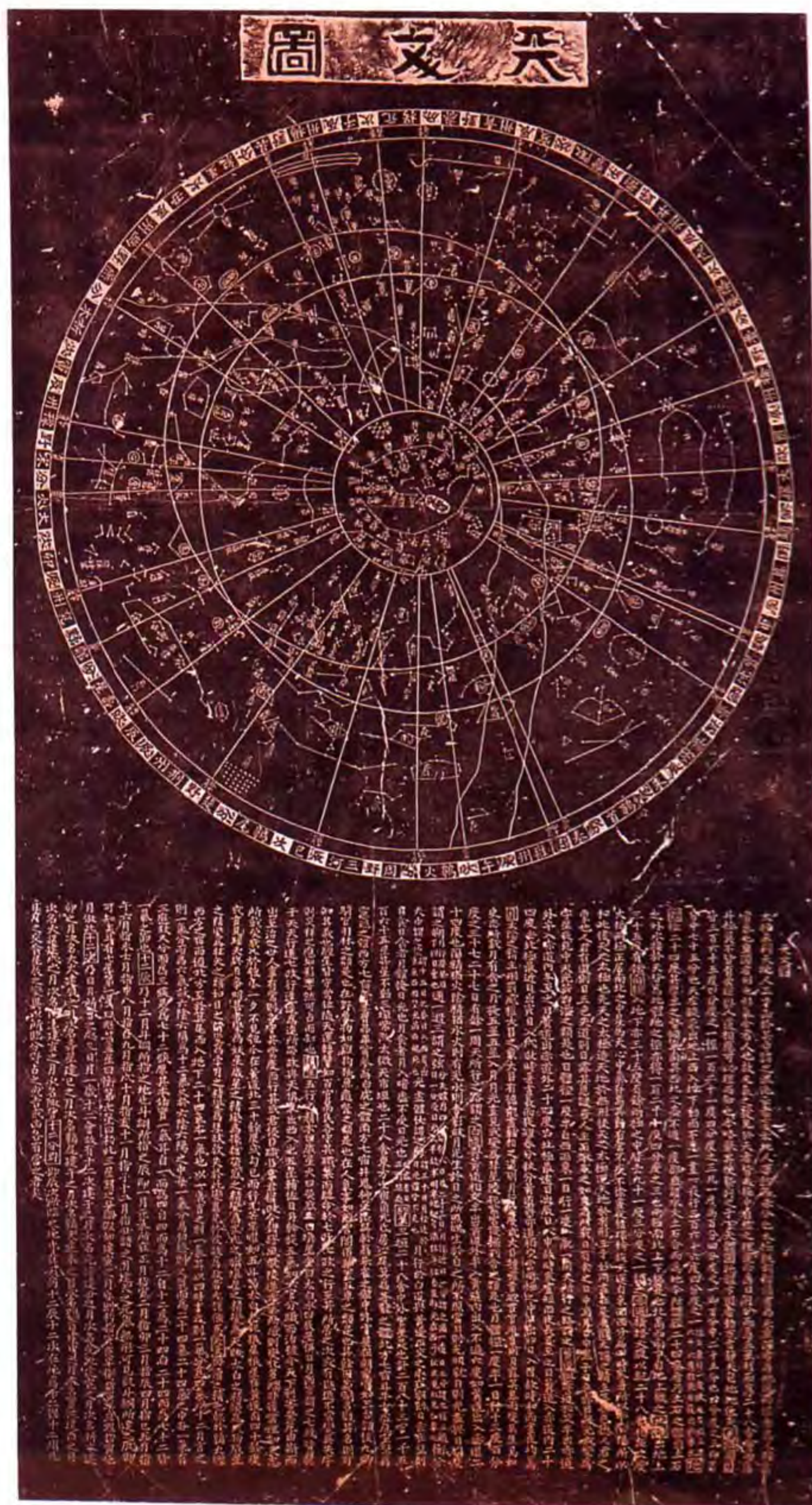
苏州天文图碑（拓片）

南宋

藏江苏苏州文庙

高190厘米，宽108厘米

南宋石刻天文图。青石篆刻。南宋淳祐七年（1247）黄裳作图。



河北宣化辽墓星图

1974年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
张文藻墓发现

直径约2.17米

墓主葬于天庆六年(1116)。
星图位于墓后室窟顶，正中
嵌铜镜一面，镜四周绘宝相
莲花，花外为天宇星空，涂
淡蓝色。



带横图及一幅北极区圆图，按天区分别画出全天恒星，图上用经线将二十八宿隔开，从而避免了盖天式圆图在南纬星区的失真问题，较科学地表现出全天星空；另一种是以赤道为界，将天球分为两半，北半天球以北极为心，作浑象北极星图，南半天球以南极为心，作浑象南极星图，由于观测点处在北半球，南天的星无法观测，因而浑象南极图上有空白部分。

星图在宋墓葬中也有发现，大都是示意图。1975年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的棺盖板内面有墨绘星图一幅，长204厘米，宽56厘米至58厘米。图的上部左边绘日，右边绘月，正中有一朵莲花，莲花中心嵌一直径8.5厘米的金属薄片，莲花下绘波浪，表示银河。图中部有两个亚字形图案，下有幡、节、鸡、马。最下是山岳，全图布满星宿。1988年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一件彩绘星图，长200厘米，宽60厘米，图中自上至下绘出银河，

银河中及两侧分布星云和星宿。

辽墓常有圆弧形券顶，犹如天体苍穹，很适宜绘制星图。1974年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和1993年在同一地点发现的辽张文藻墓就在券顶绘有带装饰意味的星图，1987年内蒙古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和河北张家口辽壁画墓中也都发现了星图。宣化辽墓彩绘星图在星图中心嵌铜镜一枚，表示天极，以铜镜为中心绘成一朵巨大的莲花，莲花周围分层布列日月星辰，第一层为日、月、五星及北斗，第二层为二十八宿，最外层绘黄道十二宫。黄道十二宫本是西方天文观念，是将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分为十二部分，作为太阳所经行宫，每宫30度。前2100年左右，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中就有黄道十二宫的痕迹，后来传到埃及、希腊和印度。黄道十二宫大约是随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的，但被纳入中国天文图中，宣化辽墓星图应是最早的。

二、水运仪象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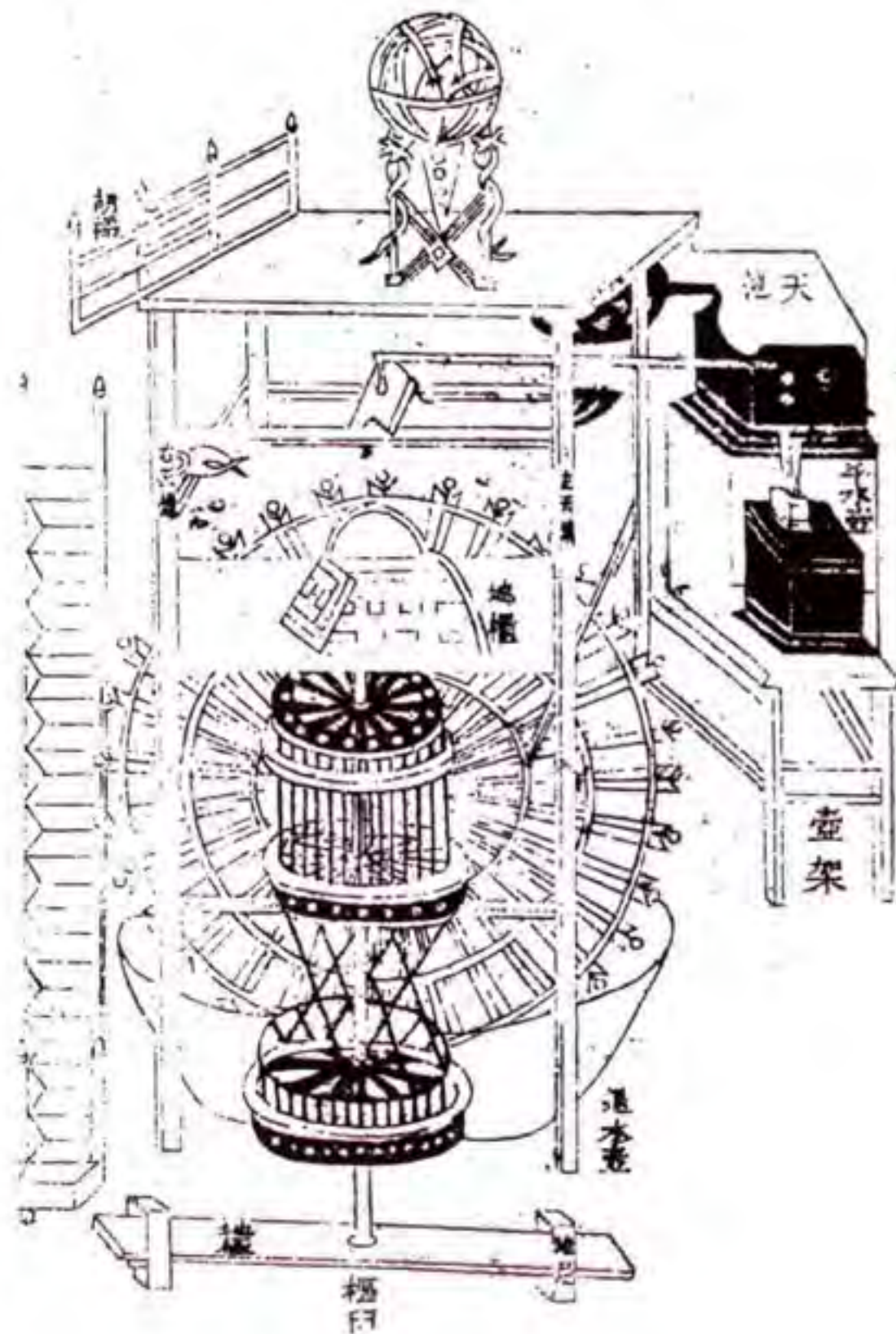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一直在试图用仪器来表现天球运动。东汉张衡制作有浑天仪，以一组齿轮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动力推动浑象绕极轴而转，使昼夜交替、星辰出没等天体现象能在仪器上同步展现出来。唐代科学家还将水运浑象与计时工具结合起来，制作了开元水运仪象，这种仪器不但能表演天球和日月星辰的运动，还能按刻报时。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四川民间天文学家张思训制作了一台较大的“太平浑仪”，高一丈多。这台浑象仪改水力推动为水银推动，使流速更为稳定，并有铃、钟、鼓三种声音报时，“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长短”。张思训对水运浑象仪的改进，为此后苏颂设计制作大型水运仪象台提供了帮助。苏颂是宋代著名天文学家和药物学家，他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主持了《图经本草》的编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他受命修定浑仪，经过认真研究和精心组织，三年后完成了水运仪象台的制作。

苏颂设计和制作的水运仪象台是中国古代最宏伟和最复杂的仪器。根据后来的复原，这座水运仪象台是高12米，宽6.5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小型天文台。其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带动浑仪、浑象运动并能准确报时的一套机械装置。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活动屋顶可以说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雏形。水运仪象台的枢轮，是一个直径一丈一尺，由72根木辐，挟持着36个水斗和36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

部设有一组名为“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轮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轮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枢轮只能转过一幅，依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水运仪象台底部的报时装置设计得非常精妙，在南向前门内装有五层更楼，楼后装有如走马灯的机轮，机轮四围，分层置有报时木人158个，各时辰的时初与时正，第一层左门小人摇铃，右门小人敲钟；每至一刻由中门小人击鼓，第二、三层的木人分别举辰牌与刻牌，当非正点辰刻没有报时声的时候可从牌上看出当时的时辰与刻度；第四、五层的木人敲钲以报更，没有报更声的时候可从木人所举更牌上看出更次。水运仪象台上层浑仪与枢轮相连，使浑仪能与天体运动同步转动，浑仪上的望筒能跟踪观测天体，与现代天文台的原理完全一样。

水运仪象台制作完成后，苏颂在绍圣元



水运仪象台结构图

北宋

采自《新仪象法要》

原件高约12米，底部宽约6.5米

元祐三年（1086），天文学家苏颂、韩公廉等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制成此水运仪象台。台的主体用木柱、木梁结构，外墙是木板。此台造成后被作为寿礼献给皇太后。

年至三年(1094—1096)撰写了一部《新仪象法要》。全书分为三卷,附图63幅,记述了他与众人制作水运仪象台的经过和构思,记录了仪象台的结构、部件形状及尺寸,并附相关图例,从而使这项巨大工程的所有资料得以保存,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天文仪器制作专著。

根据《新仪象法要》的详细记载,1958年,在著名科技史专家王振铎的主持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将苏颂水运仪象台复原,陈列于中国通史陈列品之中,使中国古代这项重要科技成果得以展现。

三、石刻地图与印刷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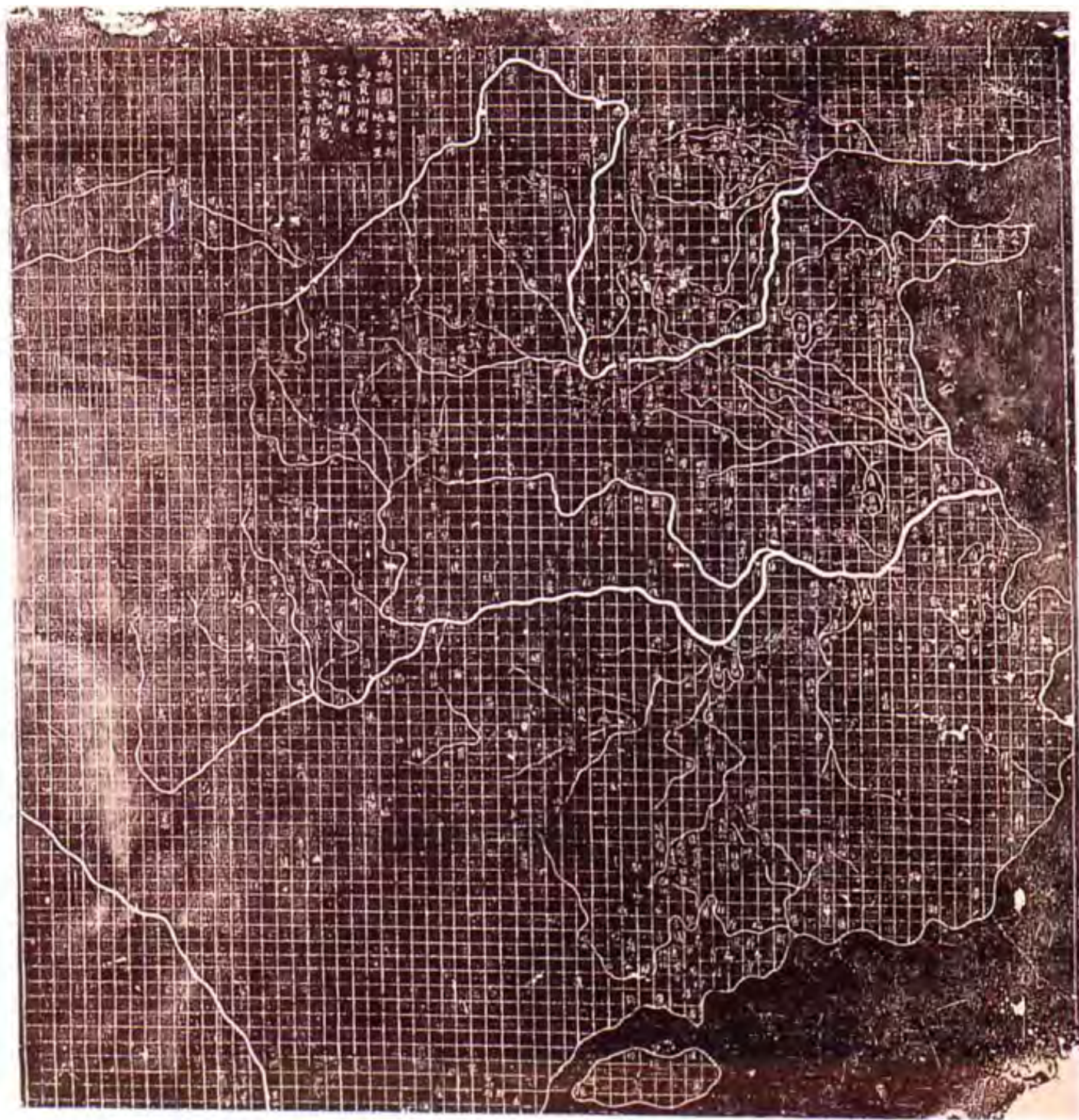
中国早期的地图基本上是手绘的。手绘地图的形式自先秦一直到明清都盛行。两宋时期,出于传播和教学的目的,开始制作石刻地图和印刷地图。石刻地图可以拓片的形式传播四方,印刷地图更可为一般平民收藏

和使用。据《古杭杂记》载,“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说明这时期地图的使用已经十分普及,连到京城游览都有地图沿街出售。若非采用勒石捶拓和雕版印刷的方式,这样大规模地制作和销售地图是很难实现的。

地图被更多地刻石和印刷,使当时的各类地图能够较多地流传后世。

在陕西西安碑林,有一块著名的碑刻,石碑一面刻的是《华夷图》,一面刻的是《禹迹图》,图长宽各77厘米。刻碑时间是伪齐阜昌七年(南宋绍兴七年,1137)。这是当时用于教学的石刻天下地图。《华夷图》一般被认为出自唐贾耽在贞元十七年(801)所绘《海内华夷图》,该图右下方刻有“唐贾魏公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等语,说明该图对贾耽原图有所省略。从地图上所标地名判断,该图的绘制时间应在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1125)之间。《华夷图》右下方还刻有“岐学上石”四字,说明是一幅教学用图。《禹迹图》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这种方法是晋地理学家裴秀提出来的,即“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实际是采用一种比例尺来绘制地图,并在地图中以方格的形式体现出来,便于测量各地间的实际距离。裴秀是否在自己所绘地图中运用了这一方法,因无实据已不得而知,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计里画方地图就是《禹迹图》。《禹迹图》横向画方70格,纵向画方73格,总计5110方。每方折地百里,相当于1:1500000。绘法较精密,海岸轮廓和河流位置都比《华夷图》更加准确。该图所标地名500多个,其中山川70多座,河流近80条,湖泊5个,各级行政区名380个。经研究者考证,该图约绘于元丰四年至绍圣元

禹迹图(拓片)



年间(1081—1094)。在江苏镇江府学,有一块与《禹迹图》几乎完全相同的图碑,上面注有“元符三年正月据长安本刊”等字,说明两图碑源自同一绘本,不过上石时间相差五年,西安图碑刻于伪齐阜昌七年(南宋绍兴七年,1137),镇江图碑刻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

四川省博物馆保存有一块北宋《九域守令图》碑,原在四川荣县文庙,长130厘米,宽100厘米,刻石时间是北宋宣和三年(1121),可能是据沈括所绘《守令图》中的一幅改绘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九域守令图》约按1:1900000比例尺绘制,所标行政区名约1400个,州县位置大体准确,江河海岸轮廓与实际相当该图用不同大小的文字表现行政区级别的高低,将山名标注于山脉之中,将河名标示在河道之内,湖名标注在圆圈里,山名水名都加字框,这些图例的表示方法较《禹迹图》更为先进,而与现代地图图例较接近。

苏州市博物馆保存有一块南宋《地理图》,与《天文图》同时刻石(南宋淳祐七年,1247),也是由黄裳绘制、王致远刻石。石长221厘米,宽106厘米,江河、海岸轮廓大致准确,标示行政区名410个,山脉120余座,江河60多条,也是用于教学的地图。

苏州文庙还有一块石碑,刻有本城平面图,即南宋《平江图》碑。图高276厘米,宽145厘米,刻石时间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上部为碑额,额面正中直栏阴刻隶书“平江图”三字,碑身刻南宋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城市平面图。该图以城垣为界,详细绘刻当时苏州城的二十条大街、二十四条里弄、六十一坊、二百六十四巷、二十条河渠以及桥

梁、官署、寺观、学校、亭馆、酒楼、名胜古迹的位置与名称。城外景观则略作示意。该碑是绍定二年知府李寿明重建苏州坊市时所刻的。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石刻城市平面图。

1971年在广西桂林城北鸛鹑山一面石崖上发现南宋所刻《静江府城图》。这幅巨大的摩崖石刻地图高340厘米,宽300米,绘刻时间约在南宋咸淳八年(1272)左右。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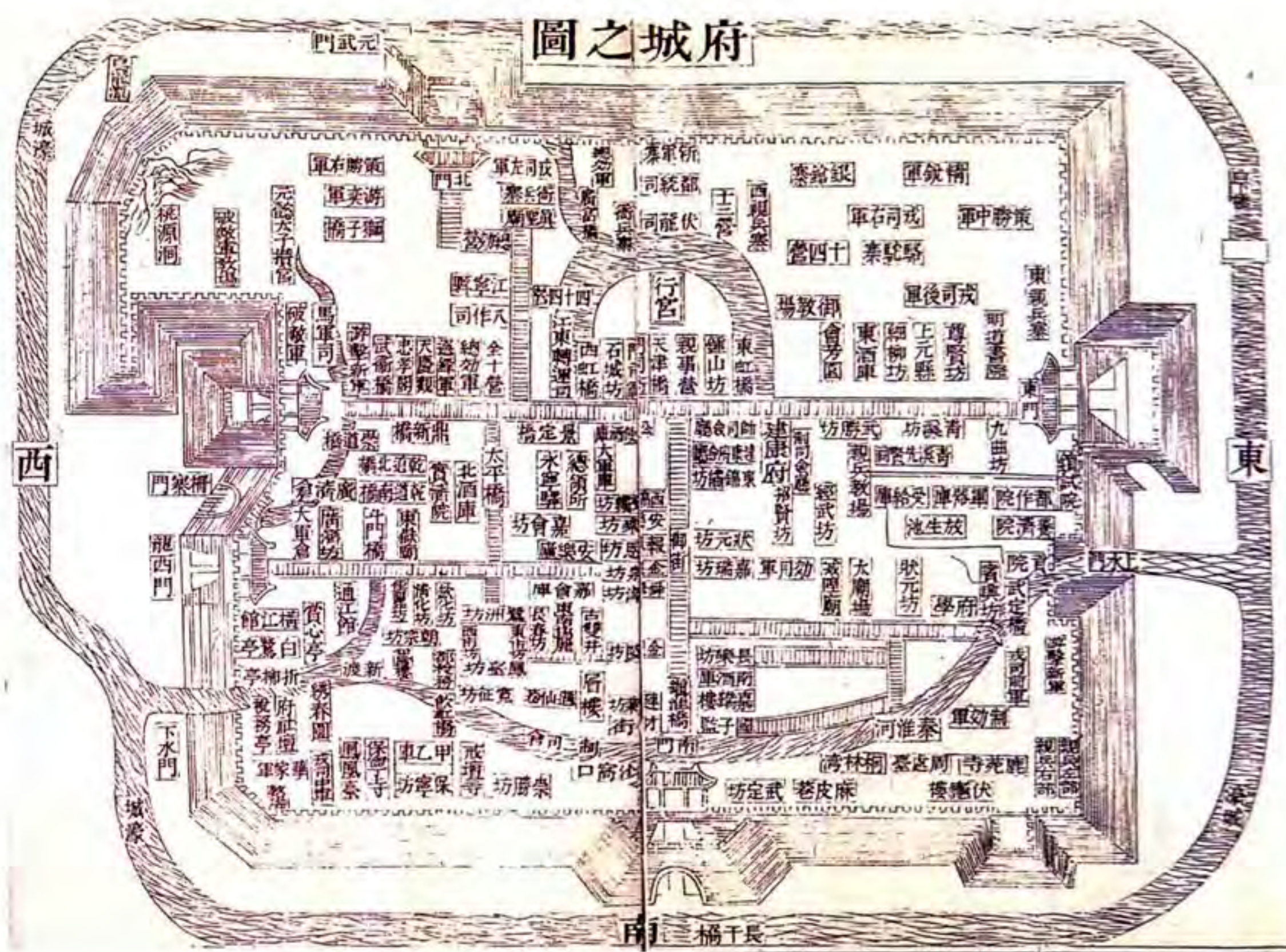
《平江图》(拓片)

南宋



《景定建康志·府城图》

南宋



具有明显的军事用途，对城壕、军营、官署、桥梁、津渡标注得非常详细，展现出当时为防御蒙古军队，该城守军“训练民兵峒丁，申严防遏”的情景。该图对宋末桂林城的十一条主要街道、城郭结构、城外山川也有描绘，只是没有一一标出地名。

宋代印刷地图流传下来的较多，多是作为书籍插图得以传世。大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儒学经典的图释中出现，可称为释经图，如杨甲《六经图》所附《十五国风地理图》、程大川《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说断》所附《禹贡山川总会之图》等地图，以及程公说《春秋分纪》中的《九州指掌图》；第二种是类书插图，如南宋末成书的《事林广记》，地輿类有《历代国都图》、《历代輿图》，宫室类有宋东京图三幅；第三种是方志地图，主要是各州县城市地图，宋代编修方志在五百种以上，但原刻传世不多，宋版原刻带地图的有《咸淳临安志》中的四幅杭州地图和九幅属县地图，《咸淳毗陵志》中的七

幅州县图，《严州图经》中的九幅府县图，《宝庆四明志》中的府县图，《澈水志》中的《澈浦全图》，《景定建康志》存图十四幅，据地理图序称“宋印本止成七图，余皆补画本”。后代重刻本中带有地图的有《嘉定赤城志》中的九幅地图，《宝祐琴川志》中的五幅地图。此外，明朝初修《永乐大典》，整部收录了数百种宋代方志，现存《永乐大典》虽不足原书的百分之四，但仍有一些方志地图保存了下来。据考证，宋代刊刻的有十四幅，分别出自《三阳志》（广东潮州）、《临汀志》（福建汀州）、《邕州志》和《建武志》（广西南宁）、《湟川志》（广东广州）。

辽、西夏、金地图见于著录的很多，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清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有两幅地图，一幅是《陕西五路之图》，一幅是《西夏地形图》。据张氏称，图出自宋刻本《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曾赴西北御边，此图应为防御西夏而作，当是出自宋人之手。

四、针灸铜人

两宋时期,医药学获得新的进步。以钱乙《小儿药证真诀》和吴起予《外科新书》为代表的临床医学著作,以苏颂《图经本草》和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代表的药物学著作,以宋慈《洗冤集录》为代表的法医学著作,以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和曹孝忠《圣济总录》为代表的医方总集的相继编辑出版,说明宋代医药学更加注重交流和普及;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问世和针灸铜人在教学上的使用,表明针灸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发展。

中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自汉末《神农本草》问世以来,历代都将汇编入药之物的著作称为“本草”,本草学成为中国医药学的基础之学。《神农本草》仅著药物365种,到梁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增加到730种,唐高宗时编《新修本草》,分11类著录药物844种。宋朝官方和私人编纂的本草学著作有数十种,基本都是对唐《新修本草》的修订和补充。开宝七年(974)颁行的《开宝本草》收药物983种。嘉祐二年(1057)编纂的《嘉祐本草》收药物1082种,均比唐《新修本草》有了较多增加。宋代苏颂参加了《嘉祐本草》的编纂,他感到历代编修的《本草》存在大量错误,而且由于图谱摹绘不易,大都文存图佚,因此他建议朝廷令各地“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图画,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

后人用药知所依据”。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令各地进行普查并将结果上报。在此基础上,苏颂于嘉祐六年(1061)编绘了《图经本草》21卷,共绘制药物图谱933幅。《图经本草》是最早刊刻的药物图谱,避免了以往因摹绘造成的图谱失真和失传。

《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颁行后,因各自成书,相互参照不便,于是在元祐七年(1092)四川阆中人陈承将两书合并,并加以注释,编纂了一部《重广补注神农本草》,但这部书没能流传。比陈承稍早,四川崇庆府唐慎微在《嘉祐本草》的基础上,增加了经史百家、佛经道藏中关于本草的相关记述,编撰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2卷,共收药物1746种,每药附图,并有单方3000余首,方论1000余首,是一部集大成的药物图谱。《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受到官方的重视,北宋大观二年(1108)、政和六年(1116)和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先后三次由政府组织校订并出版,世称《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和《绍兴本草》。其中,《大观经史证类

元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书影

这部药物著作是北宋四川成都名医唐慎微所著,约在宋元丰五年(1082)成书,共32卷,取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大观二年(1108)雕版刊印,改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宋政和六年(1116),朝廷命曹孝忠对此书再作校正,重新印出,定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全书60余万字。博采以前药书之长,吸收经史百家及佛道著作中有关药物的论述,收录了历代药书的序论、百病主治药方、服药食忌例证,使读者对历代本草著作的源流以及药物的配合与禁忌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全书共收动物药材、植物药材、矿物药材1716种,每种皆附绘图形。其中新增加约600余种。书中又收单方3000余个、方论1000余首,是八百多年前药物学的范本。



针灸铜人

明仿宋铸制

通高213厘米

北宋不断发现针灸新穴位，多由不同医生发现，难以交流验证。为防止混乱，医官王惟一于天圣四年（1026）铸造了两个空心铜人体模型，其全身标注了559个穴位，其中107个是一名二穴，故全身共有666个针灸点。铜人既是针灸医疗的范本，又是医官院教学与考试的工具。考试时，铜人外层涂蜡，穿上衣服，体内灌水，学生根据命题以刺穴，针入水出，方为合格。两具铜人分别放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金灭北宋，相国寺的铜人毁于战火，仅剩医官院内的铜人。元灭金后，将此铜人运至大都（今北京）。因长期使用磨损，不堪再用，于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奉命按样仿铸了一个新铜人。明灭元后，这个铜人仍然继续使用。但到明英宗时，又因磨损而无法再用，于是再仿铸一个，此即现存者。此仿铸铜人忠实于宋代原物，准确反映了宋代针灸学的水平。



《备急本草》和《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在金元时曾多次重刻，并在日本和朝鲜刊刻流传。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认为：“十二三世纪的《重修大观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某些版本，要比15和16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

宋代对医方的搜集和整理也很重视。太

平兴国三年（978）至淳化三年（992），翰林医官王怀隐以十四年时间整理汇编历代医方，撰成《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分1670门，收方16834份，并刻版颁行。宋神宗时，朝廷设立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和良药，出卖以济民疾”。宋徽宗时，拟订了《和剂局方》。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07—1110），太医裴宗元等对《和剂局方》进行校订增补，成五卷，绍兴二十一年（1151）再次增补，增加到十卷，收788方，此时药局改称太平惠民局，因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刻版颁行。北宋政和间（1111—1117），宋徽宗命医官汇编各类医方，编成《圣济总录》二百卷，分60门，收医方20000首。该书编成后即予雕版，金人灭北宋时将书版掠至燕京，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据此书版印行。元大德四年（1300）也曾翻刻此书，日本文化十年（1813）将《圣济总录》印行。

自晋《针灸甲乙经》问世以来，历代都有针灸学著述问世，但因图谱难绘，多数书都只存灸法，不录针法。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宋仁宗要求太医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并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命铸铜人作为针灸模具。王惟一于是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荣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针灸铜人的主要作用是学习针灸者考试时进行认穴操作，使用时把铜人表面涂上黄蜡，堵塞穴眼，体内灌满水，体外穿衣，学生按要求以针刺穴，一旦找准穴位，水就会从穴中流出。这种方法后来成为学习和检验针灸认穴的重要工具，后代屡有翻铸。王惟一还撰写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该书考订针灸穴位354个，比《针灸甲乙经》多出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5个穴位。该书还体现当时

习用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编成后除了付梓印行，还被刻碑存放在对民众开放的开封大相国寺仁济殿，供学习者观摩。元初该碑被迁往北京，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城砖砌入北京城墙。1971年因修地铁，北京拆除明城墙，该碑被重新发现。碑分解为五块残石，其中一块残存文字三栏，中栏刻有“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上”。该残石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此外，北宋所铸针灸铜人在金灭北宋时被掠至燕京，元世祖曾于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修复铜人。元明两代也曾重铸铜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一具铜人，就是明正统八年（1443）重新铸造的。

五、《营造法式》

辽、宋、西夏、金时期，由于大中城市的兴起，手工制作业的进步，各类型建筑的修建极其兴旺。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展现的雄壮的城楼、多层的酒店、宛若飞虹的拱桥、高低错落的民居，可以看到城市建筑的缤纷多彩。现存辽代建筑较多继承了唐代的特点，高大雄阔，柱网对称，制作严密；而宋代建筑结构较以往更加简约合理，结构更加灵巧，装饰极为绚丽；金代建筑既沿袭了辽代传统，又受到宋朝建筑影响，处理大跨度建筑时采用减柱、移柱的方法，使梁架的布置较为灵活，装饰与色彩更加富丽。这一时期，砖石更多地应用于建筑材料，在杭州和广州都发现有用砖石铺建的路面遗址，仿木结构的砖石塔、墓也大量出现。建筑学的进步还体现在建筑规范的制定，北宋颁行的《营造法式》，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科技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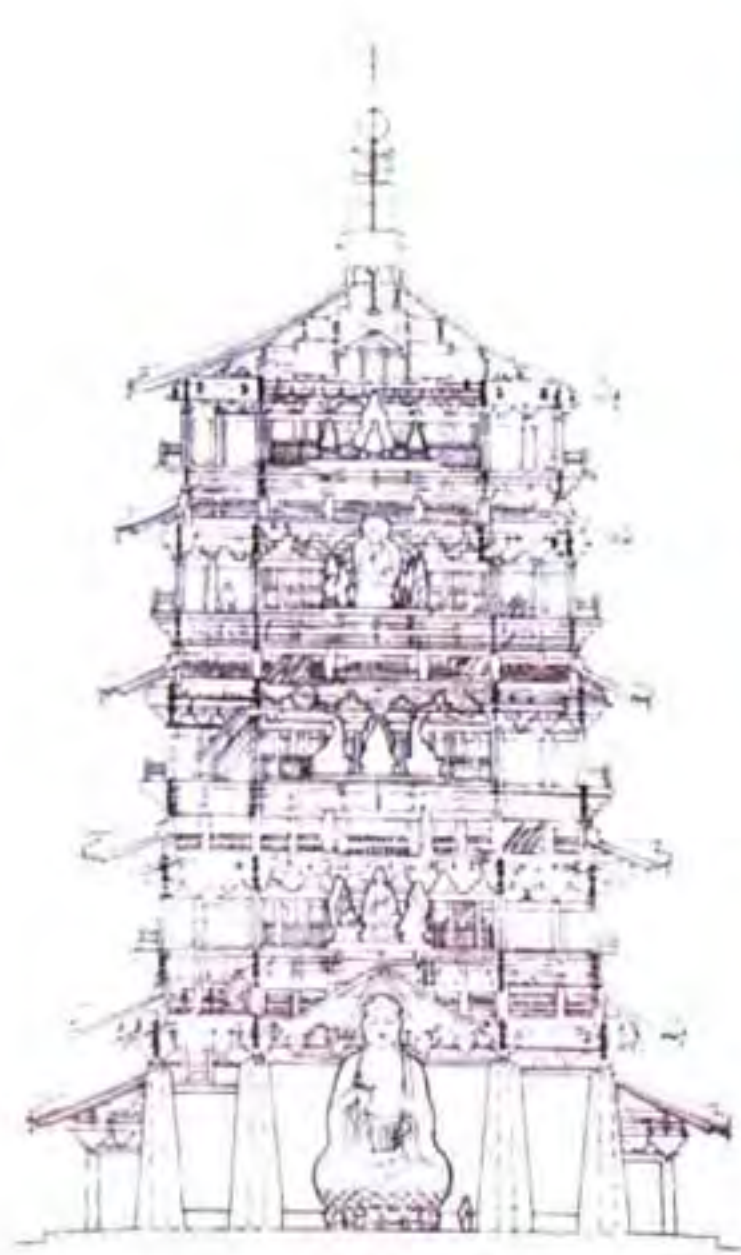
北宋

1971年北京明代城墙中发现
残高99厘米，残宽55厘米，
厚26厘米

石面上残存文字三栏，中栏
刻有“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
经卷上”。该残石现藏中国
国家博物馆。

现存辽、宋、西夏、金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多为宗教建筑，如建于辽统和二年（984）的天津蓟县独乐寺的山门和观音阁，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代的建筑还有山西大同华严寺下寺薄伽教藏殿和善华寺大雄宝殿；宋代的有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浙江宁波保国寺的大雄宝殿，建于北宋天圣间（1023—1031）的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的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和转轮藏殿，建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的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建于金代的木结构建筑有山西太原晋祠献殿，山西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和善华寺的普贤阁、三圣殿、山门，山西朔州崇福寺的弥陀殿等。

太原晋祠圣母殿是宋代建筑的杰出代表。该殿高约19米，重檐歇山顶，正面朝东，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平面近似方形。殿身四周围廊，前廊进深两间，廊下宽敞。圣母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木塔位于山西应县佛宫寺内，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高67.31米，平面呈八角形，底层直径约30米。砖石垒砌的塔基高4.4米。塔身高51.41米，砖砌刹座高1.86米，铁铸塔刹高9.91米。木塔为层檐式，外观为五层六檐，夹有暗层四级，实为九层。木塔采用梁、枋、斗拱层层垒架，内有两槽立柱支撑，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全塔共采用54种斗拱，木柱间采用60多种斜撑，梁、枋、短柱组成不同形式的复梁式木架，无比坚固。九百余年来，虽历经地震、风雨剥蚀和战争破坏，此塔仍巍然屹立，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结构塔式建筑。



殿采用减柱法营造，殿内外共减十六根柱子，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屋架，使殿前廊和殿内十分宽敞，为设置塑像提供了更多空间。殿内有塑像四十三尊，宋塑有四十一尊，其中三十三尊侍女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一个实例。该寺入山门为一长方形院子，钟鼓楼分列左右，北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及其前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最后是一座弥陀殿。佛香阁和弥陀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成纵深布列。

辽代修建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塔。塔为楼阁式，高67.31米，外观五层，加上四个暗层，实际九层。平面八角形，底层直径30.27米。塔身全以木材构成，各层高度基本相等，可见经过精心设计和构建。各层柱子叠接，并向中心略有倾斜，构成各层向内递收的轮廓，所用斗拱有六十多种。位于各楼层间的平座暗层，在结构上因为增加了柱梁间的斜向支撑，也使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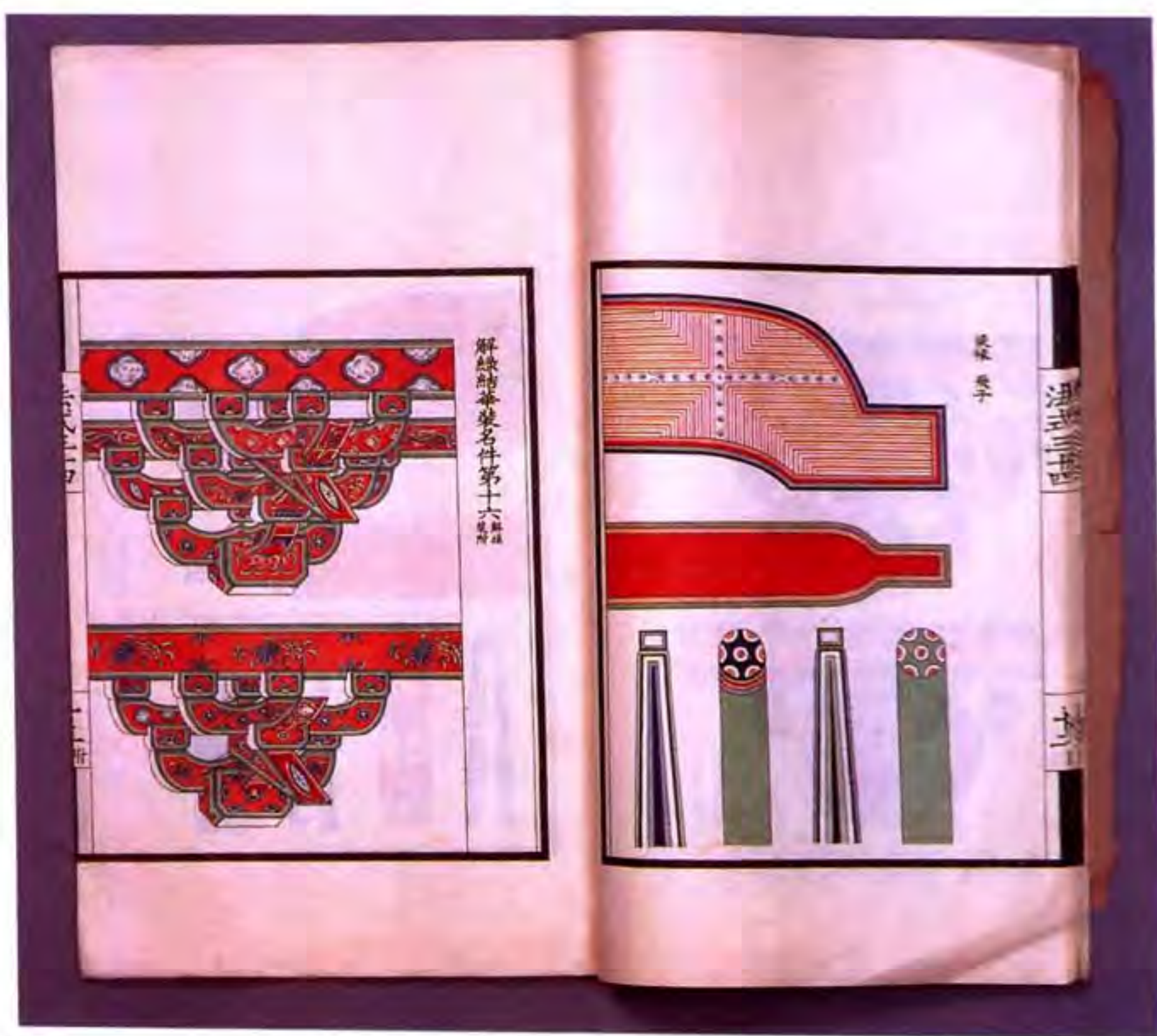
的刚性有很大改善，经过近千年多次地震，仍安然无恙。1974年，考古工作者对该塔进行修缮考察时，在第四层发现了大批文物。

由于砖石更多地应用于建筑材料，仿木结构的砖石塔多了起来，有的佛塔原为木塔，因失火改建成砖塔。北宋开封开宝寺塔原为木塔，庆历四年（1044）中雷失火，皇祐四年（1052）重建为琉璃砖塔，因塔砖呈褐色，被称为铁塔。开封铁塔以及辽庆州白塔、涿州云居寺塔、苏州报恩寺塔、泉州开元寺塔和镇国寺塔除了受材料限制，出檐较短，几乎与应县木塔这样的楼阁式塔形状完全相同。一些密檐式佛塔，如燕京天宁寺塔以及山西灵丘觉山寺塔、河北易县泰宁寺塔等，在须弥座、柱、额、斗拱、门、窗等方面也都模仿木结构形式。仿木结构的砖室墓更是遍布南北各地，辽、宋、金都很盛行。用砖石建造的桥梁较木桥更能耐久，北宋嘉祐四年（1059）建成的泉州洛阳桥、北宋政和三年（1113）建成的福清龙江桥，南宋绍兴间（1131—1162）修建的泉州石梁墩桥、绍兴二十一年（1151）建成的晋江安平桥，嘉熙四年（1241）修建的漳州江东桥，至今仍能使用。最著名的石桥是金大定二十七年至

明昌三年(1187—1192)在永定河上建造的卢沟桥,桥全长266.5米,主桥面宽9.3米,10墩11孔,为石砌的连拱桥,桥孔跨度与相应墩位一致,桥拱采用纵联方式砌成。桥面两侧各有石栏,共279间,相邻栏板间立一望柱,柱高1.4米,顶端有石狮,全桥共有485个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石狮。该桥历经八百多年,仍坚实稳固,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北宋初年,曾参加开宝寺塔建造的工匠喻皓撰写了一部《木经》,提出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为准,阶基高度以柱高为准,这一规范为后世效法。可惜该书未能流传。宋神宗时,敕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至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完成。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宋哲宗在绍圣四年(10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采访工匠,于元符三年(1100)完成了对《营造法式》的修订,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正式刊行。

《营造法式》共34卷,另有1卷看样,1卷目录,正文计357篇,3555条。一卷至二卷为总释和总例,包括建筑术语的考释;三卷至十五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十三个工种的制度;十六卷至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对各工种的构件工时、用料等作出规定;二十九卷至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还有一些工具图样等。这些图不仅使阅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该书文字陈述的内容,同时也为当时和后人具体设计和施工提供了样本。《营造法式》的颁行,体现了当时木构建筑的成熟。该书不仅保存了大量



的宋代建筑资料,所制定的一些建筑规范也受到后世推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建筑学著作,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第二节 三大发明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通常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项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放在两宋历史中讲述,这是因为三大发明虽然在此前已经出现,但真正应用和普及是在两宋时期。火药配方在唐代就已出现,但火器的制造和在战争中的使用是自宋代开始的;利用磁石指示方向,在先秦典籍中就有记载,但采用人工磁化制作指南针并将其应用于海上导航,则是宋人的贡献;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就出现了,但大规模地印刷各类书籍文献和使用活字印刷技术是在10世纪以后。

《营造法式》书影

宋 李诫编著

该书于宋元符三年(1100)年完成。编著者李诫是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在将作监任职的十三年中,主持过多次大型建筑工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编撰了此书。全书共36卷,357篇,3555条。其中的名例、各作制度、功限、料例四大部分共30卷,以文字叙述;又用6卷的篇幅绘制了斗拱、梁柱、门窗、彩绘图案等各种构件详图。这是一部总结性的建筑学巨著,在当时,统一了建筑规格,明确了设计施工的各项制度,制定了估工估料的定额,具有法令性的指导作用,同时对各项规定并不要求拘泥,便于发挥建筑师的设计才能。此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成为中原地区官式建筑、寺院建筑的规范,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一、蒺藜陶弹与震天雷

火药应用于军事战争，是从北宋开始的。《宋史·兵志》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八月，“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毬、火蒺藜”，说明宋初已有填装火药的兵器。宋仁宗时，曾公亮等人编著《武经总要》40卷，首次使用“火药”一词，并详细地记载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砲等三种不同效力的火药配方，如砲火药方为硫磺14两、窝黄7两、焰消（硝）40两、松脂14两以及砒磺、定粉、黄丹、干漆、竹茹、麻茹、黄蜡、桐油、浓油、清油等，表明当时人们对火药性能的认识已经成熟。《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兵器有弓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竹火鹞、铁嘴火鹞等。火球类似近代战争使用的炸药包。毒药烟球是内装毒药的毒气弹。蒺藜火球内装铁蒺藜，火药燃爆后，有刺的铁蒺藜飞散四处，既可杀伤敌人，又可设障

蒺藜陶弹



碍于道路。霹雳火球是将火药与瓷片一同装进竹筒内，燃放时能产生出霹雳般声响。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竹火鹞、铁嘴火鹞应是类似爆竹的兵器，点燃火药后，借燃放的动力射向敌方。

据史籍记载，在宋金战争中，双方都曾使用火器。靖康元年（1126）李纲在抵御金兵进犯东京时使用霹雳炮攻击敌人，绍兴三十一年（1161）采石矶之战，虞允文也使用霹雳炮击败金军。南宋时还出现了以火药燃烧为动力发射子弹的管状火器，叫突火枪。《宋史·兵志》记载：“开庆元年，寿春府造赣筒木弩，……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砲声，远闻百五十余步。”金占领开封后，获宋火器，又制造了铁制外壳的震天雷和用黄纸为壳的飞火枪，用以对抗宋军和后来的蒙古军队。震天雷又称为铁火炮，据《金史》记载，这种火器是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烧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可见威力之大。考古发现最早的管状火器是1970年在黑龙江阿城出土的金军使用的铜火铳，这种铜火铳是对以竹、木、纸为外壳的火器的改造，也是近代火炮的前身。元代已广泛使用的火箭、火炮应是对宋金时火器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二、海上指南

中国在战国时就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磁石制成的司南。汉代的司南是在一青铜盘上置磁勺，盘四周刻有二十四个方位，磁勺居中心，底部光滑，静止时便指向南北方向。司南使用长达千年，直到宋代才以人工磁石代替天然磁石，以磁针代替磁勺，从此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指南针。

宋代制作人工磁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

采用人工将铁针放在天然磁石上摩擦，因磁场作用，使铁针带有磁性；另一种是采用磁场感应。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铃铃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以磁场感应法制作磁针更加科学。铁片加热后，在磁场作用下，磁畴顺序排列，置水中迅速冷却，能使其磁性固定下来。当然，以磁鱼指南，效果还是不如磁针理想。宋代科学家对此进行探讨，终于制作出多种样式的指南针。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纆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沈括的记述说明当时已采用将磁针水浮、缕悬、置于指甲或碗口等四种方法，沈括认为四种方法中以缕悬法最善。

早期的指南针还未配上固定的方位盘，所以有置碗口或指甲上的记述。人们逐渐认识到将磁针置于带有刻度的器皿中更加准确而方便，于是就发明了罗盘。一种是水罗盘，采用水浮法，磁针穿灯心草浮在水面上。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道：“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另一种是旱罗盘，南宋曾三异在《因话录》“子午针”条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里所说地螺，应是测度田地及风水用的罗经，上面刻有二十四方位。1985年江西临川南宋墓出土一件陶俑，俑人左手所持即是一件旱罗盘。



缕悬法指南针（模型）

北宋

高38厘米，底盘各边长21.5厘米

将磁针用蜡粘接在独根蚕丝上，悬挂于木架正中。架下放置方位盘，盘上用八天干、十二地支与四卦标示二十四方位。磁针垂于方位盘正中上方，因地磁作用，静止时两端分指南北。这种指南针非常灵敏，缺点是只能在平静或无风处使用。否则，磁针摇动不止，无法指示方向。

指南针发明之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也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只有发明了昼夜可以导向的指南针，远洋航海才摆脱了以往白昼望日、夜间观星的被动局面。正因如此，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很快就被引入亚洲和欧洲各国，成为航海业的重要工具。



地磁偏角示意图

北宋沈括以缕悬法指南针做试验时，观察到磁针的指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南端微微偏东，从而在世界上首先发现了地磁偏角。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地球本身是个大磁场，南北磁极的连线叫磁子午线。地球又有南北二极，南北地极的连线叫地子午线。磁极与地极并不重合，所以磁子午线与地子午线交叉，形成夹角，就是地磁偏角。磁极又不固定，经常在一定范围内游移，故不同地点有不同的地磁偏角，而同一地点的地磁偏角也随时间推移而变动。只有掌握地磁偏角的变化规律，才能科学地使用磁性指南工具。



水浮法指南针（模型）

北宋

口径10厘米，高2.3厘米

这种指南针是将磁针横向穿过数小段灯心草，然后放在盛水的碗中。灯心草质轻于水，连同磁针浮在水面。静止时，磁针两端分别指示南北。北宋的四种指南针，水浮法指南针最具实用价值。因为碗中之水具有保持水平的特性，只要不是倾覆或急剧的震荡，磁针就能继续使用，所以被选用为海船导航。1099年至1102年时，进出广州港的中国海船已使用这种指南针。宣和五年（1123），北宋使臣徐兢等人出使高丽，所乘海船就是用水浮法指南针导航的。此后，指南针导航技术传向亚欧诸国，把世界航海史推进到新时代。

三、宋版·辽版·金版·西夏活字版

印刷术是在唐代发明的，目前确认最早的一件印刷品是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约刻印于武则天时期。但唐代的印刷仅用于历书和佛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考察证实了这一点。五代开始刻印九经和文集、医书，但未见实物流传。印刷术的真正普及是在两宋时期。

两宋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雕版印刷日益普及，活字印刷也已出现。举凡儒家经典、各类子史名著、诗文名篇乃至医书、算书、类书都纷纷被书写上版，广泛流通。当时的印刷业已遍及全国各地，尤其以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成都眉山，福建福州、建宁、建阳以及辽燕京（今北京）、金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地为中心，各地刻书形成各自风格。当时不仅各级官府刻书，私家刻书和坊肆刻书也很兴盛。

宋代官府印书，主要是由国子监、崇文

院、秘书监以及各府州郡学、转运使司（漕司）、提举常平司（仓司）、安抚使司（帅司）、提点刑狱司（宪司）等机构主持，不少书是用公使库钱刻印的，主要刊刻官方校订的经史子集、类书、医书等。私家刻书和坊肆刻书主要集中在成都、杭州、建阳等城市，刻印内容十分广泛，以经史名篇、诸子百家、诗文集为多。私家刻书以黄善夫、廖莹中等最受称誉，坊肆刻书以临安陈氏书籍铺、尹家书籍铺和建安余氏及建阳麻沙诸坊刻本较为著名。

宋代刻书十分讲究。流传于世的宋版书大都刻印精美，令人赏心悦目。从很早的时候，宋版书就被视作善本，这不仅指其刻印年代早，更主要的是指宋版书无论版式、字体还是用纸用墨，在印刷史上均属上乘之作。

宋、辽、金都曾刻印过《大藏经》。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历时十二年雕印完成《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也称《蜀藏》或《开宝藏》，硬黄纸，卷轴装，卷尾有雕造年代，计5048卷，480函。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刊印佛经。《开宝藏》保持了写经的风韵，无界栏，字体清秀。卷末刻有雕造时间及刻工姓名。该书久已散佚，现存11卷，国内有7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藏4卷。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1031），依据《开宝藏》雕印《契丹藏》，并赠送了5部给高丽。后来高丽显宗王询又曾据《辽藏》和《开宝藏》刻成《高丽藏》。《契丹藏》原已失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61件辽代印刷品，其中有《契丹藏》12卷，同时还发现辽在燕京刻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蒙求》等书。金也曾刊印了一部《大藏经》，传为女子崔珍断臂募捐刻印，因刻于金代，故称《金藏》，又

因藏于山西洪洞（赵城）广胜寺，所以叫作《赵城金藏》。全书682帙，每帙10卷左右。存卷中记述该书雕造年代的有30余处，最早年代为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最晚年代是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该书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时存4957卷。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由北方大学、太行行署保存，后交北京图书馆，时存4330卷，零散残破的9包，北图工作人员悉心修补，又从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征得散失在外者，加之抗战前后北图所购192卷，共4813卷。此外，在西藏萨迦寺也曾收藏有部分散卷。1982年开始编印的《中华大藏经》正续二编，正编即是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缺失部分用《高丽藏》补足。宋、金还都刻印过卷帙浩大的《道藏》。

两宋时期，出现了活字印刷。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



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沈括还介绍说，毕昇印书时，经常用两块拼字铁板，一块板用来印刷，同时用另一块板布字，第一块板印毕，马上就可以用已拼完字的第二板印刷，两块板交替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印刷速度。另外，常用的一些字如“之”、“也”等，都制有二十多块印模，“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所有字模不用时按字韵贴在纸上，装在木格中。通过沈括的记载，人们知道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泥活字印刷已经

刻本《史记集解》
南宋



《赵城金藏》

金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全书6900余卷，现存4813卷。该书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时存4975卷，后又有散佚。《赵城金藏》大部分版式与宋《开宝藏》相同，每版23行，行14字，上下单栏。部分经卷中有开宝、咸平、天对、绍圣等年代雕造、刷印题记，可知《赵城金藏》是以《开宝藏》为底本刻印的。其中还有四十卷的字体、版式同于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可知其部分篇帙据《契丹藏》雕刻。

平阳刻《四美图》

金

1907年甘肃张掖黑水城出土现藏俄国彼得堡东方博物馆版面正中刻“平阳姬家雕印”，为金代平阳印刷品。此画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年画。画面上是绿珠、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四美人立像。人物面容丰腴，有唐人绘画风格，构图富于变化。赵飞燕、绿珠居前，王昭君、班姬在后，除绿珠面朝左，其余三人均面朝右，衣裙都向左斜飘，仿佛是行走时带起徐徐的微风。人物体态极其生动。



出现，但沈括没有讲毕昇究竟使用这种方法印了哪几部书。南宋人周必大在其文集中曾提到“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事》二十八事”。但传世的

《玉堂杂事》未见有泥活字本。这一时期究竟有没有活字本实物流传，一直是印刷史学者关注的问题。

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拜寺沟方塔废墟中清理发现九册西夏文佛经，共四种，其中的《吉祥遍至□和本续》带有明显活字本的特点，如上下文字无相连相交现象，纸面凹凸不平，左右栏线与上下栏线交角处均不相连，版口线与上下栏线也不相交等，特别是《吉祥遍至□和本续》卷四第五页漏排版心，最后一页则省去了版心，且左侧无栏线，这都是活字印刷的特有现象。经宁夏文物工作者考证，并由国家文物局召开专家论证会，鉴定该书是木活字本。

西夏木活字本佛经的出土引起轰动，一些西夏历史研究者联想到以前出土的类似西夏文献。早在1907年至1909年，由俄国科兹洛夫率领的探险队在中国西夏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了大批西夏文

泥活字版（模型）





西夏木活字版《吉祥遍至□
和本续》

献，现藏圣彼得堡，这批文献的一些缩微胶卷已购回国内。经认真整理考辨，最后发现其中《维摩诘所说经》、《大乘百法明镜集》、《三代相照言集文》、《德行集》共四种西夏文献也是活字印刷品。而1989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下卷与黑水城出土的五批《维摩诘所说经》是同一版本。

以上西夏活字本中，《维摩诘所说经》被确认为泥活字本，其余则是木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文字笔画呆滞，边缘不齐，笔端圆钝，缺少尖锋，并有断裂现象；一些字的笔画不够清晰，有晕染现象，表现出吸墨能力较弱的特点。此外，该经版面行列不直，出现弯曲，有人认为，这是早期泥活字印刷行间无夹条、聚版不紧凑所致。

西夏活字本的发现，印证了沈括《梦溪笔谈》所记述的中国宋代已开始运用活字印刷技术的真实性。过去有人怀疑泥活字印刷，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由此推断中国并不是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国家。现在考

古发现多种活字本，尤其是敦煌还发现有回鹘文本活字实物，对于澄清历史事实、全面认识古代印刷技术的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鹘文本活字也是在20世纪初首次发现的。1908年2月，伯希和率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到敦煌搜罗藏经洞中的经卷，在莫高窟北区第181窟（现编号464窟）发现了许多回鹘文、西夏文、藏文文献和文物，文物中有近千个木活字。这些木活字被带到法国，收藏在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中。中国考古工作者近年又发现五个木活字，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来又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发现了数十个回鹘文本活字。

回鹘是维吾尔族的先民。9世纪至13世纪，居住在敦煌、吐鲁番的回鹘人曾建立地方政权。他们使用过突厥如尼字母，后来逐渐过渡到完全使用源于粟特字母的文字，称为回鹘文。回鹘文一直使用到15世纪。这是维吾尔族在使用阿拉伯字母之前使用最广

泛、保存文献较多的一种文字。回鹘文是音素文字，由十九个至二十个字母组成。敦煌发现的木活字应属12世纪晚期，因为到13世纪后半叶，敦煌地区的回鹘已经衰落。木活字有的以字母为单位，有的以词为单位，较多的是以动词词根为单位，还有表示标点符号和界栏的活字。绝大多数活字宽1.3厘米，高2.2厘米，长短并不一致，依据所表示的符号大小而定。

第三节 编史修志

两宋时期，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对文人的重用，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以及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这一时期图书编纂和出版兴盛，官私修史热潮高涨。基于总结五代十国割据分裂的教训，北宋时期的史家较为重视断代史和通史的编纂，《五代史》先后两修，《唐书》再修；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则接续《春秋》，使编年史延续到五代。南宋史家痛感半壁江山的沦陷，对当代史和地方

史的著述十分勤奋，在编纂思想和体例上也多有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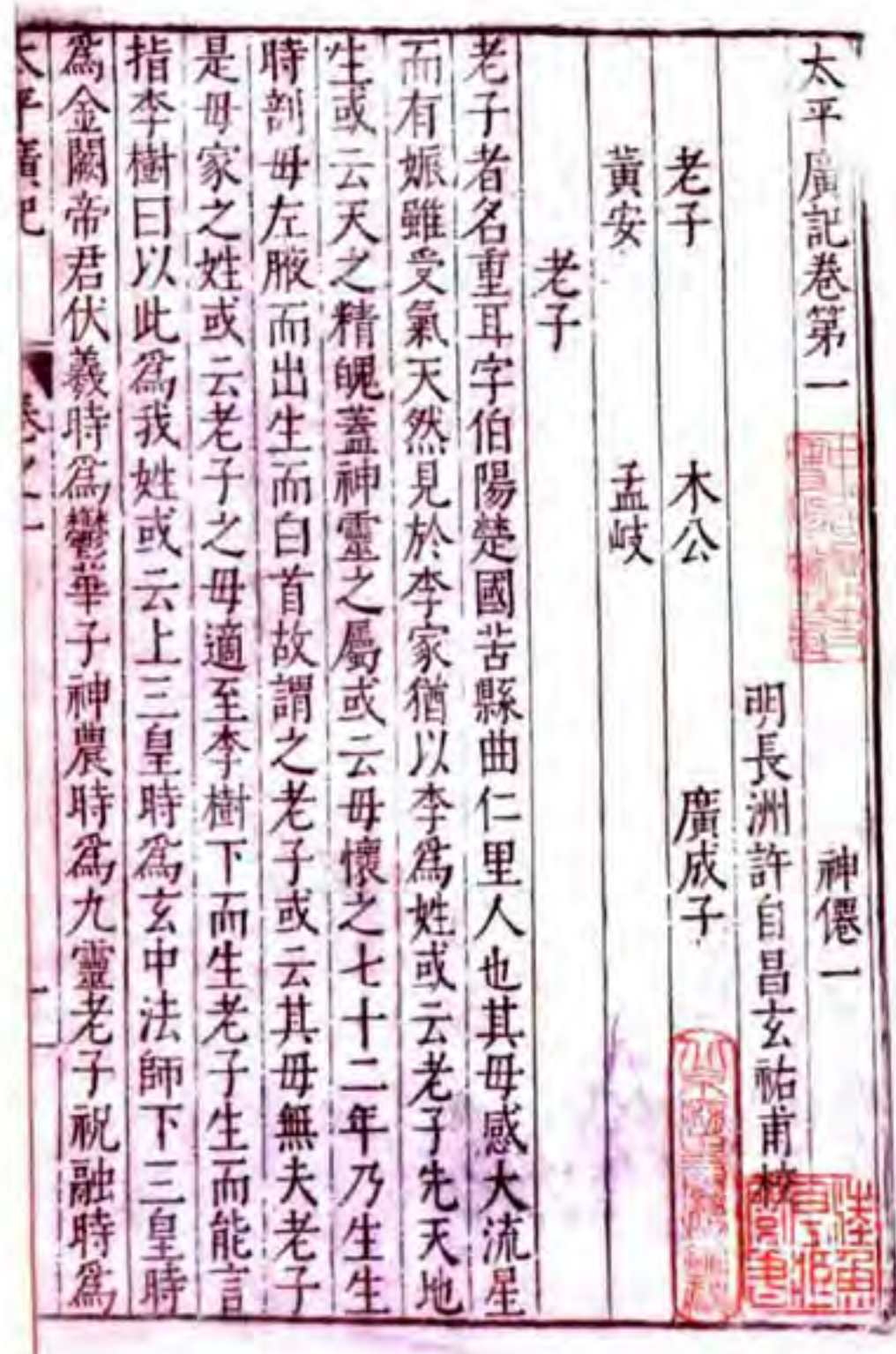
一、四大类书

宋代重文轻武的世风，是在宋太宗即位后形成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在宋太宗的亲自策划下，北宋王朝三项重要举措同时开展，一是扩大科举之门，将录取名额增加了十倍；二是重建“畜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馆、史馆），太宗亲自命名为崇文院；三是开始编纂《太平御览》等大书，这项工作费时较长，直到宋真宗时才完成，修成的书共四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

《太平御览》1000卷，始修于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参与其事的有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四人。宋太宗要求将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别类编为1000卷，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完成，原名《太平总类》，太宗令日进三卷御览，并改名为《太平御览》。该书从天、时序、地、皇王到菜、香、药、百卉，共分为55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4558类。每类按时间先后依次征引相关资料，征引文献都注明出处。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类书，共引书1690种，所引之书到近代有许多已佚失不传，如《十六国春秋》、《汜胜之书》等均因《太平御览》的征引得以保存。该书不仅是一部古代百科全书，而且在文献辑佚学上极具价值。

《太平广记》500卷，是与《太平御览》同时诏修的，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完成。该书汇编历代野史、传记、小说、杂编及释、道藏经中的有关记载，分为神仙、报应、知人、贡举、杂传记、杂录等92类，每类下又有子目，共分150余子目，以神仙、女

明嘉靖刻本《太平广记》书影



仙、报应、神、鬼诸类篇幅最多。书前有《太平广记引书目录》，列所引之书343种，然据卷中统计，实际引书475种。《太平广记》汇编之书，也有许多失传了，如六朝志怪、唐代传奇等，因而该书对研究和校辑古代小说极有价值。该书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刻版印行，深受民众喜爱，因其内容多是小说讲史题材，许多民间艺人以此为“说话”（说书）的话本。

《文苑英华》1000卷，始修于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李昉、扈蒙、徐铉、宋白、苏易简等人，雍熙三年（986）十二月完成。该书是继梁萧统《昭明文选》之后又一部诗文总集，上起萧梁，下至唐五代，共收录2200位作者的诗文约20000篇，分为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制、表、笈、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对喻、颂、赞、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共37类。每类之中又分若干子目，如“赋”分为天象、岁时、地、水、帝都、邑居、宫室等40子目。该书所录诗文，成为历代士子习练各类文章的范本，同时也成为文学史家辑补唐人诗文的渊薮。该书保存了五代以前很多重要文献，因而在校勘学上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册府元龟》1000卷，始修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九月，参与编撰的有王钦若、杨亿、钱惟演等人，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该书的宗旨是“取著历代君臣美德之事，为将来取法”，因而所收以历代史籍为主。全书自上古至五代，分部排列，计有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官、宫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

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官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31部，每部之下，又有小类，称为门，总计1127门（真宗序称1104门，可能是修订结束前的数字）。部、门之前都有序，部序“言其经制”，门序“述其归旨”，皆较简明。另有目录、音义各10卷。宋真宗对该书的编纂非常重视，亲定义例，在编纂过程中也经常过问，检阅篇章，并提出意见。宋真宗要求编修官要相互检视，发现错误要署名，“随卷奏知，异时比较功程等第酬奖，庶分勤惰”。近代史学家陈垣指出：“《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按人物，分门编纂，凡1100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宋以前的一些残佚的重要史籍的辑佚和校勘多依赖此书，如正史中的《魏书》、《南齐书》皆有缺页，据《册府元龟》补足；薛居正《五代史》自明以后不传，今本辑自《永乐大典》，但残缺较多，中华书局点校本便是依据《册府元龟》进行校补。该书保存了唐和五代大量史料，文献价值极高。

宋初四大类书的问世，是中央政府聚集人力和物力对此前各种图书文献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汇编。这项工作的开展为后人阅读和校辑五代以前的史料提供了方便，也为当时人编纂各种体裁的总集、类书开创了先河。自北宋以来，这两类书的编纂绵延不断。属诗文总集类的，有姚铉的《唐文类》（100卷），吕祖谦的《宋文鉴》（150卷）；属私修类书的，有吴淑的《事类赋注》（30卷），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366卷），潘自牧的《记纂渊海》（100卷），王应麟的《玉海》（200卷），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80卷），章俊卿的《山堂考索》（212卷）；属专题类书的，则有江绍虞的《皇朝事实类苑》

(26卷),陈景沂的《全芳备祖》(58卷),传南宋高承的《事物纪原》(10卷)。

二、《资治通鉴》

宋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问世。该书记载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人。他自幼喜读史书,七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二十岁中进士后,因父母去世,在家居丧五年,闭门读书,先后著《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等。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司马光出任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此后担任过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开封府推官、修起居注等职,嘉祐八年(1063)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因不

赞同王安石变法,于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后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此后,司马光不问政事,在洛阳居住十五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一书。

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就准备撰写一部接续《春秋》的通史。他先编写了《历年图》五卷,于治平元年(1064)进献宋英宗,后在其基础上编撰了《通志》八卷。治平三年英宗看到后,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进《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要求司马光将书编完。于是司马光“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于元丰七年(1084)完成了这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凡294卷,又《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354卷。

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目的,在于通过历史事实,为帝王提供可资借鉴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他说:“臣今所述,止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鉴。”司马光认为,自《春秋》之后,历代编写的正史都是纪传体的,篇幅浩繁,许多人读了好些年仍未读完,因此需要有一部承接《春秋》的史书,这部史书的作用不单是删繁就简,而应“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可以“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

完成这样一部史学巨著,仅靠司马光一人是有困难的。司马光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共同撰写,从而使《资治通鉴》的编写质量有了进一步保障。刘攽专攻汉史,刘恕熟悉魏晋南北朝史和五代史,范祖禹精通唐

司马光像



史，司马光根据他们的特长作出分工。在编纂过程中，他采用由助手博采史料，自己删定成书的办法，先将搜集到的史料标题排比，尽量详尽不漏，称为“丛目”；再将丛目中的史料整理修订，称为“长编”；最后由司马光考订删改，润色修订，完成正稿。如唐史长编多达700卷，司马光花了四年时间，将其删定为81卷。据说在洛阳有人亲眼看到《资治通鉴》的草稿装满了两间屋子，草稿中未见一个潦草的字。传世有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一页，计9行460余字，为东晋永昌元年（322）史事。文字叙事并不连贯，似为大纲提要。

《资治通鉴》问世后不久，司马光复出政坛，废止了王安石新法。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病逝。七年后，宋哲宗亲政，恢复新法，并将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大臣列入“元祐党籍”。直到南宋初司马光被再次平反后，《资治通鉴》才广为流传，成为研习历史的必读书。不少学者根据《资治通鉴》著书立说，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王应麟的《资治通鉴地理通释》等。近代以来，研究《资治通鉴》的人更多，“通鉴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三、化腐朽为神奇

私家撰史，重视当代史考述和史学体裁的创新，是两宋时期史学的重要特点。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喻其为“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纪传体史书开始于司马迁的《史记》，本为私撰，但这一体裁被确立为正史并被纳入官修之后，历代陈陈相因，不仅缺乏创意，难成“一家之言”，而且回护偏颇之弊，在所难免。应该说，历代也都有一些有识之士，不满朝廷史馆的官样文章，利用所能考



《资治通鉴》手稿

手稿现存9行，计460余字。楷书，夹有小字，多处用墨笔涂抹。内容叙事并不连贯，往往某一件事只写开头数字，其后即以小字“云云”接之，再下则别写他事。由此可知，这个手稿只是《资治通鉴》的初稿或细纲。史事叙文后，又有陈谢状5行，亦是司马光手迹。最后为题跋。全篇印有皇室及各家收藏印100余方，多数在卷前，卷尾，卷中行文内也有不少。

校的材料，私撰史书，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很少。宋代对文人的重用，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教育的日趋兴盛，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以及印刷术的普及，都为私家撰史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北宋仁宗时，欧阳修在受诏重修《唐书》之后，私自编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对宋初官修《五代史》（即《旧五代史》）在编纂思想和体例上作了新的变革。该书模仿《春秋》义例，强调文字褒贬，并打破朝代界限，以时为序，综述五朝史事。类似的私撰正史还有路振的《九国志》和陆游的《南唐书》等，但只有欧阳修新作的《五代史》被列为官定正史之中。

在私撰史书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对当代历史的撰述。北宋文人还只是将朝中见闻、名臣言行和世俗时尚作为筵席谈资记入笔记之中，而南宋史家则更多地试图将本朝历史全面记录下来。这是因为他们在痛感半壁山河沦陷之后，又遭遇到南宋初年“文字狱”的禁锢，亲身经历过的事件真相一度被篡改和掩盖。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时也为了阐发自己对这一段历史的感受，南宋史家不辞辛劳，埋头整理撰述史料，先后完成几部篇幅巨大的本朝史。最早成书的是李焘的



《通鑑紀事本末》南宋湖州刻本書影

《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一部记录北宋史事的编年史。李焘是南宋绍兴八年（1138）进士，他不满秦桧等误国擅权，因此遭排斥，一生未获重用。他花费四十年时间整理本朝史籍，“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编纂了《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这是中国古代私人撰写的篇幅最大的编年史。该书是接续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作，在编写方法上也与前书相似，先按年月排比史料，为丛目；再整理考订，为长编。为了更多地保存原始记录，“使奸欺讹讹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该书只修至《长编》为止，不再作删削。这部编年史在明代以后亡佚，幸被收入明初所编《永乐大典》中，清代辑出后，编为520卷，现成为研究北宋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史籍。李心传后又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这两部书一为以年月记事，一为以门类记史，完整记录了宋高宗一朝的史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征引史料近200种，“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牘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成为研究宋金战和历史的重要文

献。记述两宋之际历史的还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卷。该书起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下至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主要记录宋金战和的史事，征引当时各类史籍196种。除上述四部史书外，南宋人编著的本朝史还有熊克的《中兴小纪》40卷，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30卷，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5卷，佚名的《两朝纲目备要》16卷，传为叶隆礼所撰《契丹国志》26卷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40卷，分别记述了与宋朝同时的辽、金两朝历史。

《春秋》开创了编年史先例，《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先河，这两种体裁成为撰史的通例。北宋完成《唐书》和《五代史》的编纂，到南宋初，包括《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北朝七史、《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在内的全部十七史均校刊出版。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使编年史接续到北宋建国之前。两种体裁的史书的编修均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史书编纂在体裁上的局限也体现出来。“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为了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叙述历史，使读者不必花费大量阅读时间和考索功夫，南宋人袁枢以《资治通鉴》为基本材料，创立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体，编纂了《通鉴纪事本末》42卷。这种体裁“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络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不但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也创立了以事件的因果为撰史脉络的新的史学编纂方法。袁枢是福建建安人，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进士，他喜读《资治通鉴》，但“苦其浩繁”，且一事或者越多卷，事不贯通，于是自创新意，以《资治

通鑑》中的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列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全书按时间顺序，起自三家分晋，迄于周世宗征淮南，包括1360余年史事，共239事，另有66目作为附录散见正目之后，经纬清晰，事目了然，将纪传、编年贯通为一。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纪事本末体是“化腐朽为神奇”之举。自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先后有杨仲良《皇宋通鉴纪事长编本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等13种纪事本末史书相继问世。

《通鉴纪事本末》初刊于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为严陵郡庠本，半页13行，每行24字至30字不等，世称小字本；再刊于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为湖州刻本，半页11行，每行19字，世称大字本。小字本罕传，民国初年，藏书家傅增湘以重金购得一部，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四、《通志》和《文献通考》

在宋代私撰史书中，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不仅篇幅巨大，而且

体例独特，与唐杜佑的《通典》一起被称为“三通”，成为了解历代制度沿革变迁的必读之书。

《通志》的作者郑樵，出生于北宋崇宁三年（1103），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祖父中过进士，父亲做过太学生，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喜爱读书。后来家道中落，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仍坚持不懈，在家乡莆田（今福建莆田）的夹漈山筑草堂居住，每日与弟弟一起诵读经史，研讨学问，几十年如一日。他的目标是“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然后“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他涉猎很广，经史、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讎、目录等，都有探求，撰有论著。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郑樵将已完成的18种书抄写成140卷，送至杭州献给朝廷，并写了一封《献皇帝书》，叙述自己几十年刻苦读书和写作的经过。宋高宗下诏将其书藏于秘府。八年后，经王纶举荐，宋高宗接见了郑樵，特授右迪功郎，并给笔札资助他抄写所著《通志》，特许他进入京师秘书省翻阅宫中藏书。



《文献通考》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本书影

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完成《通志》的编纂,次年去世。

郑樵一生著作84种,《通志》是集大成的著述,也是他五十年治学的结晶。全书200卷,分为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24卷。其中,纪传是删录诸史而成,年谱仿《史记》诸表;略源自正史各志,共20略,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分别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讎、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郑樵自称,这些内容乃是“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在此矣”。《通志》体现了郑樵的会通思想,即撰述史书要像司马迁《史记》那样通古今之变,陈明历史演进的源流变迁,不能像班固《汉书》那样“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郑樵对断代史的批评不免有偏颇之处,但他注重会通,不以天文灾异附会人事,主张客观书写历史,强调学术分类的地位,都体现了他的学术见识。郑樵的史识,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卒年不详。其父马廷鸾在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因受到权臣贾似道的排斥,为相三年后辞职回乡。马端临受家庭影响,从小勤奋好学。咸淳九年他参加漕试,获第一名,但因父亲病重,没有参加会试。1276年,蒙古攻陷南宋国都临安。国破家亡之际,马端临决定隐居家乡,不再入仕为官,他潜心著述,认真总结历史教训。

马端临重视通史,他赞赏司马迁的《史记》和杜佑的《通典》,因为这两部史书都贯彻了会通的思想。他认为《史记》详于人事,略于制度;《通典》只记述到唐天宝年间,类

目的设置和材料的取舍亦不够精审。因此,他决心编纂一部贯穿古今、综记历代制度的史书。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写作,终于在元大德十一年(1307)完成了《文献通考》这部三百四十八卷的巨著。十年后,元官府访得该书,决定刊刻,马端临于至治二年(1322)亲携书稿前往校勘,该书在泰定元年(1324)印行,这就是传世的西湖书院刻本。

《文献通考》记述历史,自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1224),列二十四考。分别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该书仿杜佑《通典》的分类,但比《通典》详细许多,其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为《通典》所无。《文献通考》的门类和内容包括了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是对宋以前历史的全面总结。马端临认为中国历史经过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太古时期,即三代以前;第二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阶段是秦以后。前两个阶段“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而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是“有公天下之心”的时代;“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因而秦以后是“无公天下之心”的时代。他的这个观点与朱熹所说“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相近,表现出他的历史观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马端临还认为,历史的发展受“势”支配,“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即“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私有化的发展就是这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马端临又认为“势”受“利”的支配,因而恢复封建、井田等旧制度,“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

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要经邦济世，必须稽古知今，懂得知时适变的道理。马端临的这些见解富于卓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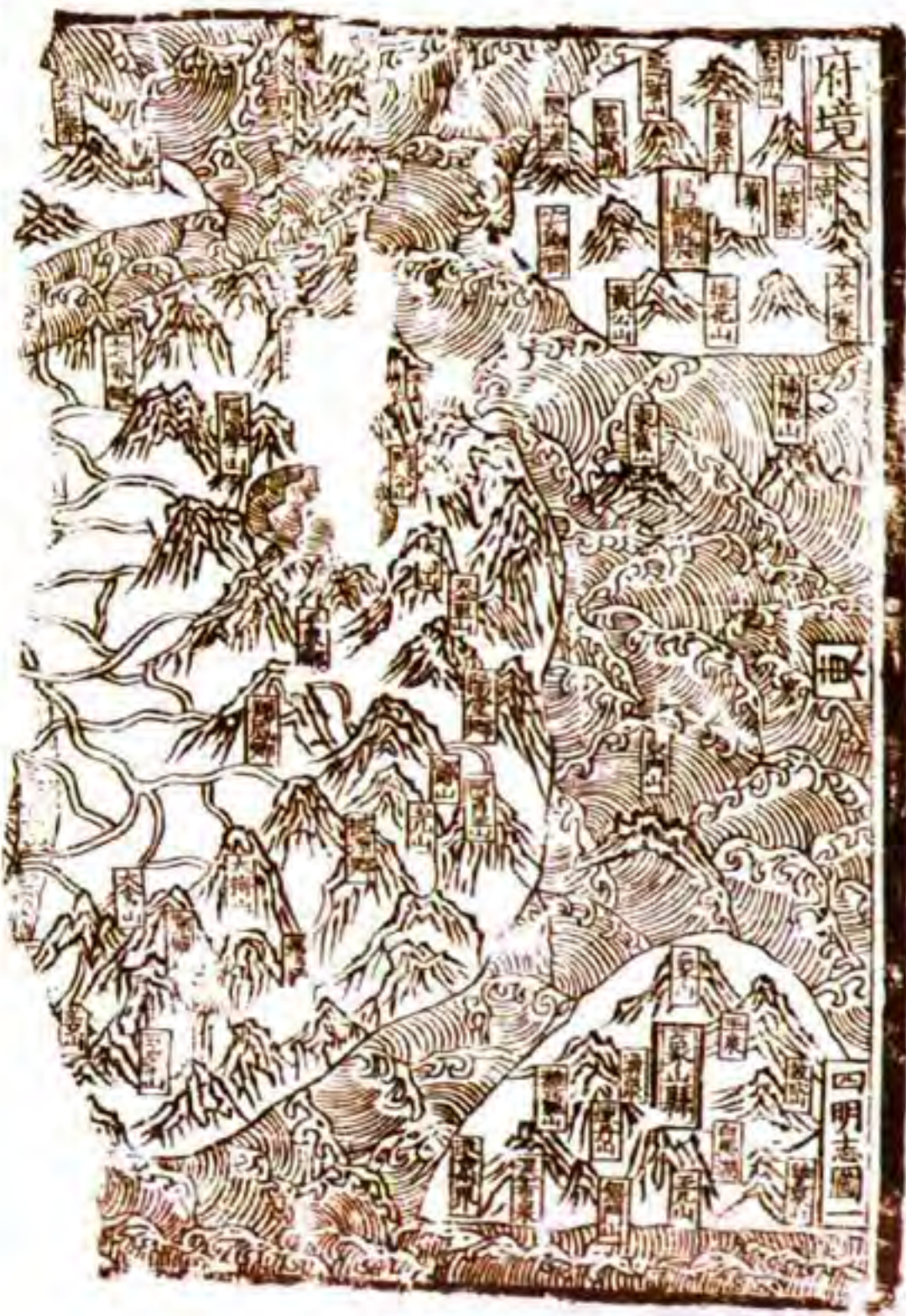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在历史编纂学上也很具特色。全书分文、献、考三个叙事层次。所谓文，即史籍的记载及考订，“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惑者不录”；所谓献，即是指当时人的记录和诸家评论，“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诸儒之评论，一致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考，即是作者的辨析主张，“其载诸史传之记录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文献通考》内容广阔，记载丰富，且详于经济制度，特别是对宋代制度的记载，与《宋史》诸志详略互见，从而为后代史家研究历代制度沿革和两宋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五、从图经到方志

汉唐以来，中央政府为了解各地山川地理、风俗物产，要求地方政府定期造送图经，朝廷汇编各地呈送的图经，形成全国区域志。后来一些学者参与地方图籍的编纂，并在图经的基础上，汇入地方史、人物传记、地方诗文集的内容，从而形成记述广博、体例完备的地方志。一般认为，由图经到方志的过渡，是在宋代完成的。

北宋时，沿袭了唐代图经造送制度，规定州县图经逢闰年一造送，诸路图经十年一上。朝廷在地方呈送图经基础上编次整理，先后汇编了《开宝诸道图经》、《祥符州县图经》和历朝九域志。

由李宗谔等人编纂的《祥符州县图经》，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凡1566卷，目录2卷，抄成新本共342本，于次年颁下。这是宋代最大规模的组织修志活动。九域志是宋代的全国区域志。大中祥符初年，李宗谔修《图经总集》时，有司请约唐《十道图》以定赋额，于是命王曾修《九域



《宝庆四明志》卷首地图

图》，基本是在《祥符图经》的基础上简约而成。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域图》修毕，只有3卷。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王存等人受命重修，成书10卷，因“旧名图而无绘事，乃请改曰志”。该书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每州县列乡、镇、堡、寨及山川名称，并记述户口和贡赋。除《元丰九域志》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天禧九域志》、《熙宁九域志》和《绍圣九域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

北宋时期，一些学者仿效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撰述地理总志，传世有《太平寰宇记》和《輿地广记》。由乐史编纂的《太平寰宇记》200卷，沿袭唐十三道区划列目，始于河南，终于四夷。该书征引浩博，考证精核，不仅大量采录了历代地志、正史和文集材料，还仿酈道元《水经注》列诗文、碑记之法，引用了不少诗赋和碑文，并增加了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姓氏、艺文等目，改变了中国地志只记沿革地理，轻视经济文化的传统，为后世各类型方志确立史、地、文并重的内容形式提供了范例。《四库全书总目》称：“地理之书，记载至是而始详，体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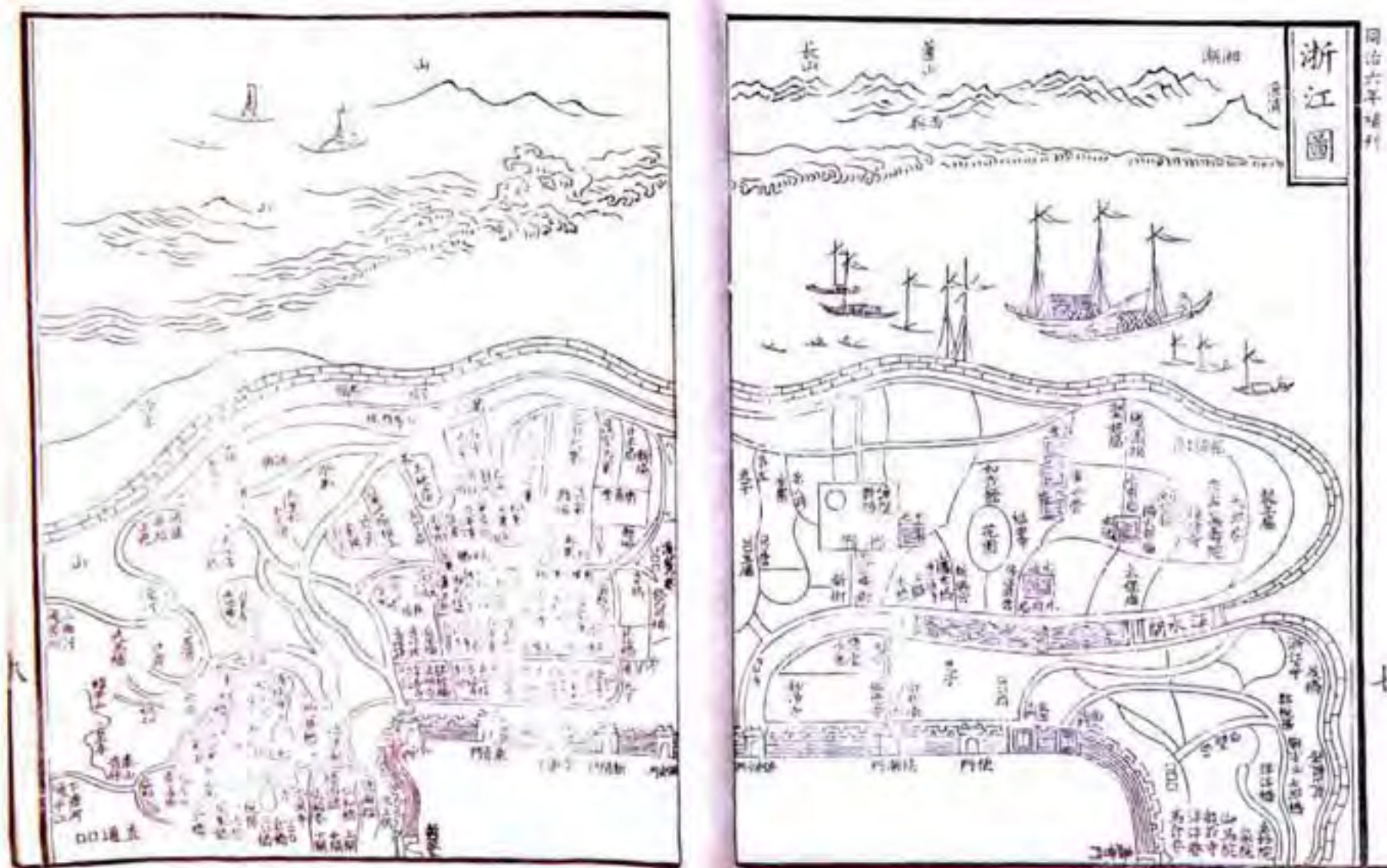
亦至是而大变。”由欧阳忞编纂的《輿地广记》38卷，前4卷叙历代疆域，皆系以宋代郡县名；后34卷述宋代郡县沿革。南宋纂修的全国区域志，传世有王象之的《輿地纪胜》200卷，祝穆的《方輿胜览》70卷。两书均以详述各地名胜为特点。

南宋方志编纂已相当普遍。从编修方式看，已由官修转变为由地方官主持，请名人学士编纂，所修志书体例也非朝廷所定，而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南宋方志的最大特点，在于内容体例更加完善。隋唐北宋图经多只记录一域水道、堰堤、盐池、驿道、古城、学校、寺观、冢墓、古迹、歌谣等，类似于地理书，而南宋方志备载一地的建置、山川、户口、赋税、人物、诗词，史地文并重。这一时期，方志作为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各府州志书每隔几十年一续修，方志的内容和体例也逐渐固定下来，基本完成了由图经到方志的过渡。

北宋府州方志流传下来的只有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和宋敏求的《长安志》，还带有图经和都邑簿的痕迹。南宋所修方志传于今者有27种，体例已十分完备。由范成大编纂的《吴郡志》承袭了图经的分目风格，平列门目39门。由潜说友主编的《咸淳临安志》，有纲有目，分19门，下辖52目。记述一镇之事的《澈水志》虽很简略，也于一些类目中细分小目，如地理门有沿革、风俗、形势、户口、税赋、镇名、镇境、四至八道、水陆名九目。周应合主持编纂的《景定建康志》模仿正史的纪传体，分为录、图、表、志、传、拾遗六体。

南宋方志不仅在编纂形式上各具特色，其内容裁措和文字叙述也都十分得体。《乾道临安志》、《新安志》、《剡录》以叙事简明为纂志主旨。咸淳四年（1268）成书的《咸

《咸淳临安志》书影



淳临安志》100卷，今存93卷，“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记宫禁曹司之事，自十六卷以下乃为府志，区划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记载之法”。罗愿编纂的《新安志》10卷，子目划分甚细，物产分为谷粟、蔬茹、药物、水果、水族、羽族、兽类、货贿等项，杂录分人事、诗话、杂艺、砚、纸、墨、定数、神异、记闻九门。高似孙纂的《剡录》10卷，叙述简洁古雅，被后世志家视为简志体之祖。由梁克家等编纂的《淳熙三山志》42卷和保存于《永乐大典》卷7889至卷7895中的《临汀志》在体例分目上与他志无异，惟其记载当时政事，则详录地方档案，如记述户口、税赋，都分别记录祖额、今额及诸县数字。《三山志》公廨类的子目有47个，记述极为详尽，《四库全书总目》称此志“主纪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之”。

除了定期续修方志，还有一些学者记录区域地理风俗，也成为后世仿效的一种地方史书。如详录都市风情民俗的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以游记形式记录地区风土的有范成大的《吴船录》、《桂海虞衡志》和陆游的《入蜀记》，此外，记述辽、金风俗道里的有路振的《乘轺录》、沈括的《熙宁使辽图抄》、范成大的《揽轡录》、楼钥的《北行日记》、周辉的《北辕录》、洪皓的《松漠纪闻》，叙述域外风土的有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赵汝适的《诸蕃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

宋代学者虽然没有撰述系统研究方志的著作，但在方志序文中，对于方志的起源、功用和编纂体例等方面都有相应论述，于方志理论有很多建树。

六、金石学

两宋时期，出于对古代礼器的考订复制和对古器物的收藏研究，金石学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金”主要指先秦铜器及铭文，“石”主要指秦汉以来的石刻及拓片。对金石的收藏、著录和考释在宋代以前就有，但都只是零散记录，宋人不仅将官私收藏的古代器物著录成书，并且在器物定名、编目分类、图形拓绘、铭文考释等方面形成一整套方法，尤其是开始以古代器物 and 古代遗址考订文献记载的正讹，从而为后世金石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初制礼修乐，由聂崇义撰成《三礼图》，但后来据此复制礼乐器物时，发现其书谬误甚多，往往需要出土实物来订正。由此，古器物的研究和著录逐渐受到重视。宋仁宗时，刘敞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得先秦簠、尊、鬲、彝11件，遂“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并图其象”，于嘉祐八年（1063）撰《先秦古器记》一卷。大约三十余年后，陕西蓝田人吕大临据所见皇家和私人收藏的铜器211件、玉器13件，分类著录，完成《考古图》十卷。该书将所收每件器物都绘图摹文，并作释文，记录每件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和出土地点、收藏者。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宋徽宗时，对古代器物的搜罗、著录和考证达到顶峰，由宠臣王黼主持编纂的《宣和博古图》30卷，著录商代至唐代铜器物839件，分为20类，均绘图像、作释文，所定的一些古器名称沿用至今。南宋初，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收录铜器、玉器和石刻铭文511件，按时代编定，每件器物也都照原样摹写，并加考释。王俅撰《啸亭集古录》2卷，收铜器铭文345种，



《考古图》书影

《考古图》由北宋吕大临编撰，元祐七年（1092）成书。全书10卷，收录了当时朝廷及私人所藏的古器。其中一至六卷所收为鼎、鬲、爵等商周青铜器，第七卷为钟、磬等乐器，第八卷为玉器，第九、第十卷收集秦汉时代器物。每件器物皆摹绘其图形与款识，记录其尺寸、容积和重量，并作出一定的考证，对该器物的出土地点或收藏之处也加以说明。此书体例谨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包括印章37枚，“每列一器，必模其款识而以楷书辨之，刻画甚精”。南宋初，张伦据内府所藏撰《绍兴内府古器评》2卷，收古铜器195种，除梁博山炉外，皆汉以前古铜器。

宋代文人喜好收藏古代碑刻拓片，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欧阳修命其子欧阳棐将自己收集的上至周穆王、下至秦汉隋唐五代石刻拓片1000卷编为《集古录目》，另撰《集古录跋尾》10卷，收录他对金石铭文的考释400余篇。南宋孝宗时，洪适撰《隶释》27卷、《隶续》21卷，收录了他对汉魏石刻文字的考释。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1），王象之撰《舆地纪胜》200卷，记述南宋十七路府州地理名胜，各州古迹碑刻无不备载，后将所记碑目单独成书，为《舆地碑记目》4卷。南宋理宗时，陈思撰《宝刻丛编》20卷，以北宋《元丰九域志》的疆域为范围，记录各州县所存碑刻，每碑石下，集录诸家题跋。

南宋初年，由赵明诚编纂的《金石录》30卷，是综录古代碑刻拓片、古器物铭文的一部著作。作者花费三十年时间，收录金石铭刻2000卷，前10卷为目录，后10卷为跋尾502篇，记述他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

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该书按时代顺序编次，较欧阳修的《集古录》更为合理。

宋代金石学研究并不限于对铜器铭文和碑刻拓片的著录、摹绘、考释和评述，凡可考录历史的古代遗存均受到当时人的注意。关于古代玉器的著录，有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关于古书画的著录，有《宣和书画谱》和米芾的《书史》、《画史》，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等；关于古代钱币的记述，有洪遵的《泉志》；关于古代玺印的考录，有《宣和印史》和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等。此外，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涉及金石考古的有20余条，记录了有关古器物、古墓葬、古城址及民族学的材料；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中，有大量关于古铜器鉴别、定名、款识和关于古砚古书画方面的记载；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中，有关于唐大明宫故址、宣和殿古器和汉简出土的记述；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有关于李公麟好钟鼎古文奇字、夏公好古器珍玩、造九鼎、周宣王石鼓、阎立本画等记载。郑樵的《通志》中的金石略、器服略、图谱略都有涉及金石考古的考述。

第四节 山野新声

两宋时期，地方官学和私学的兴盛标志着教育日益普及。由汉代儒生创立的以章句训诂解释儒家经典的方式在北宋中叶受到质疑，宋代学者更加强调对义理的探讨。南宋朱熹集诸家之大成，完成了对儒学的改造。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也影响到文学艺术创作。由于宋代文学家和艺术家讲究意境，追求神韵，反对刻板地追拟前人，晚唐五代以来注重形式的诗文写作模式和重视形似的艺术风

格逐渐被摒弃，而代之以一派盎然新风。

一、郡学与书院

两宋时期，各类型的教育获得新的发展。辽、宋、西夏、金各朝都在京师设立专门为官员、宗室子弟授课的学校。宋朝以国子监（一度改称国子学）接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宋仁宗时设立太学，接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北宋末年，太学生的人数接近四千人；此外还有宗学，专门接收宗室的子弟。辽于上京和中京设国子学，于南京设太学。西夏设有蕃学和太学。金采用女真、汉人分别上学的方式，分设女真国子学、太学和汉人国子学、太学。这些学校的开设实际是对官僚子弟的特别优待。这一时期，由于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和各地各阶层对科举考试的重视，地方官府和私人开办学校渐成风气，郡学（即州县官学）和书院、私塾成为平民教育普及的开端。

州县办学的第一次高潮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是年“诏天下诸郡咸修先圣之庙，又诏庙中起讲堂，聚学徒，择儒雅可为师者以教焉”。以供奉孔孟先贤的文庙兼授生徒，这一方式一直沿袭到近代。州县办学的第二次高潮是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正是范仲淹实施“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的新政措施之一就是“兴学校”。是年朝廷“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由当地政府拨出一些土地作为学田，以其租廩养学。由于有了相应保障，郡学迅速增加，两浙路杭州、越州（今绍兴）、苏州、湖州、台州、常州、睦州、明州（今宁波）、秀州（今嘉兴）皆开办了州学。据统计当时开办郡学的占州、军总数的60%，连远在海南的琼州也“因诏立学”。宋神宗时期实行变法，在京师太学建立三舍法，将学生分为上舍生、内舍生、外

舍生三等，招考州学生进京，以考试转升入舍等级。宋徽宗时，试图以州县学“升贡”取代贡举的解试，曾完全停止解试和省试，郡学成为科举的入门之学。州县学校也达到鼎盛，不仅各州无不设立学校，许多县也设立县学。学生从县学补入州学外舍，州学上舍生经考试补入太学外舍，形成自低至高三级教育体系。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统计，当时全国各类官学在校学生达到167622人。南宋初，因为战乱的缘故，一些州县学停办，但后来逐渐恢复起来。

受宋朝的影响，西夏在所辖州县也开办了小学，金则在各地建立府学、州学、县学、乡学四级教育体系。

私人办学在两宋时也十分兴盛。宋代重视科举，士庶人家无不以入学受教作为叩开科举之门的惟一途径。虽然官府办学延泽州县，但能到官办学校学习的人毕竟有限，难以满足教育的需求，因而师授和家传这两种传统的授学方式自宋初就十分兴盛。师授学校有私塾、义学、村塾等童蒙教习，多由科举落第的贫困知识分子开设；也有经舍、精舍等经术讲堂，为一些名儒宗师讲学之所。

宋神宗时，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居洛阳

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



讲学，许多儒生不远千里，前来从学，因有“程门立雪”的美谈。南宋时，朱熹先后在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讲学。与朱熹同时代但学术观点不同的陆九渊创立象山精舍，五年间前往求学的人有数千人之多。有些较大规模的私学，得到官方的支持或资助，发展成为书院。

书院在晚唐五代时出现，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带有教育和学术研讨性质的高级学校。宋代有著名的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也有的说是六大书院，除了上述四家，又加上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原为南唐白鹿洞书馆，也是南唐国子学，入宋后改为私人讲学之所。曾有学馆十间，学生数百人。后书堂焚于火，逐渐荒废。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重建白鹿洞书院，并亲自制定学规，延请名流到此讲学。经几十年的营建，白鹿洞书院“规模宏壮，为他郡学所不及”。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先后在此讲课，这里成为理学

研讨和传布的中心。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创建书院，有“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名岳麓书院。北宋后期，官府在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生，又分高等，升岳麓书院生”。此时岳麓书院与州学合二为一。南宋初，岳麓书院焚于兵火。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请著名学者张栻主持。三年后，朱熹到此与张栻讨论经术，前来听讲者甚多。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修书院，并把白鹿洞书院学规颁布于岳麓书院。他每天公事结束后就到书院与学生讨论问题。这里也成了影响很大的理学传布中心，来此求学的学生多达千人。

应天书院在河南商丘。原为后晋时的睢阳学舍，由戚同文讲授，学舍生徒“登第者五六十人”，遂名声大震，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戚同文去世后，应天府民曹诚出资三百万，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重建学舍150

间，聚书1500余卷，并申请作为官学，宋真宗为嘉奖他，特赐名“应天府书院”。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居住应天府，受知府晏殊之请，到书院督导教学，“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庆历新政实施后，州县兴学，应天书院因已成为府学，被改为南京国子监。

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南麓。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赐“太室书院”额及九经。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重修书院，赐名“嵩阳书院”。宋神宗时，程颢、程颐兄弟曾到此讲学。

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向当地官员请求在此办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赐名“石鼓书院”。南宋末毁于兵火。

茅山书院在江苏南京茅山。宋仁宗时处士侯遗建在此教授生徒，天圣二年（1024）江宁知府奏请朝廷拨给田地三顷。宋理宗时因荒废已久，知县访得原址，重新修缮，仍用以接待游学之士。南宋末迁至金坛。

宋代书院在南宋时有了进一步发展。据记载，宋理宗时，“应天有明道书院，苏州有鹤山书院，丹阳有丹阳书院，太平有天门书院，徽州有紫阳书院，建阳有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有武夷书院，金华有丽泽书院，宁波有甬东书院，衡州有柯山书院，绍兴有稽山书院，黄州有河东书院，丹徒道州有莲溪书院，兴化有函江书院，贵州有宣城书院，全州有清湘书院”。

宋代书院的兴起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些书院不仅有严格的学规、丰富的藏书，由名噪一时的学者任教，更有自由探讨学术的气氛。特别是南宋理学各派利用书院辩论问题，阐发自己的学说，书院于是成为各个学派的研讨中心。朱熹在岳麓书院时，“学者云集至千余人，各质所疑，论说不倦”。一些

学者也以明晓经术之理为宗旨，而不仅以科考仕途为目标。可以说，到了南宋，书院已成为学术讨论的讲坛，与以培养科举考生为目的的州县学和早期书院有了较大区别。正是有了书院中的自由研讨，各家学说才得以梳理和融会，新的儒学思想才得到伸张和传布。

二、儒学的更新

“庆历兴学”以来，对儒学的解释和研讨呈现多元化趋势，注重义理探讨，反对繁琐疏证，成为一种时尚。以欧阳修等人为先导，学者纷纷对《孟子》、《周礼》、《易》等一些列为儒家经典的经传提出质疑，并对汉儒的章句训诂的解经方式予以抨击。胡瑗、孙复、石介对《易》、《礼》、《春秋》进行新的阐释，强调义理，讲求“明体达用”，成为理学的先驱。宋代学者对义理的探求非常深入，从宇宙本原到经世致用，从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无不展开多方面的反复论辩。唐代韩愈倡导的“道统”说，佛教的“思辨”说，以及道教以“气”解释宇宙生成，都在宋儒的讨论中得到进一步伸张。

由于见解不一，北宋中叶形成几个重要的流派。周敦颐以《道德经》的阴阳学说释《易》，著《太极图说》和《通说》，所创立的学派称之为“濂学”。张载以“气”为万物之先，认为“太虚即气”，“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张载在陕西关中讲学，他代表的学派被称为“关学”。程颢、程颐认为天下一理，万物一理，以天理作为世界万物之本原，又认为理一分殊，维护纲常即是维护天理，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被称为“洛学”。苏轼著《易传》、《书传》和《论语说》，苏辙著《诗传》、《春秋传》、《老子解》等，二苏倡导通经学古，救时行道，因他们来自四川

眉山，被称为“蜀学”。王安石著《杂说》，主张“天道尚变”，认为事物相反相成，皆有对有偶，“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他这一学派后来称为“新学”，又称“荆公新学”。

北宋后期，“濂学”和“关学”因无传人而沉寂，“洛学”和“蜀学”因程、苏后来被列入元祐党籍受到压制，只有王安石的“新学”在熙宁变法中得以发扬光大。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废诗赋、帖经、墨义，专考《五经》与《论语》、《孟子》；又废明经等诸科，改设明法科。熙宁八年，王安石主持撰写的《三经新义》（《周礼义》、《诗义》、《书义》）颁于太学，作为教科书。《三经新义》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天下号曰新义”。王安石的“新学”被立为官学长达六十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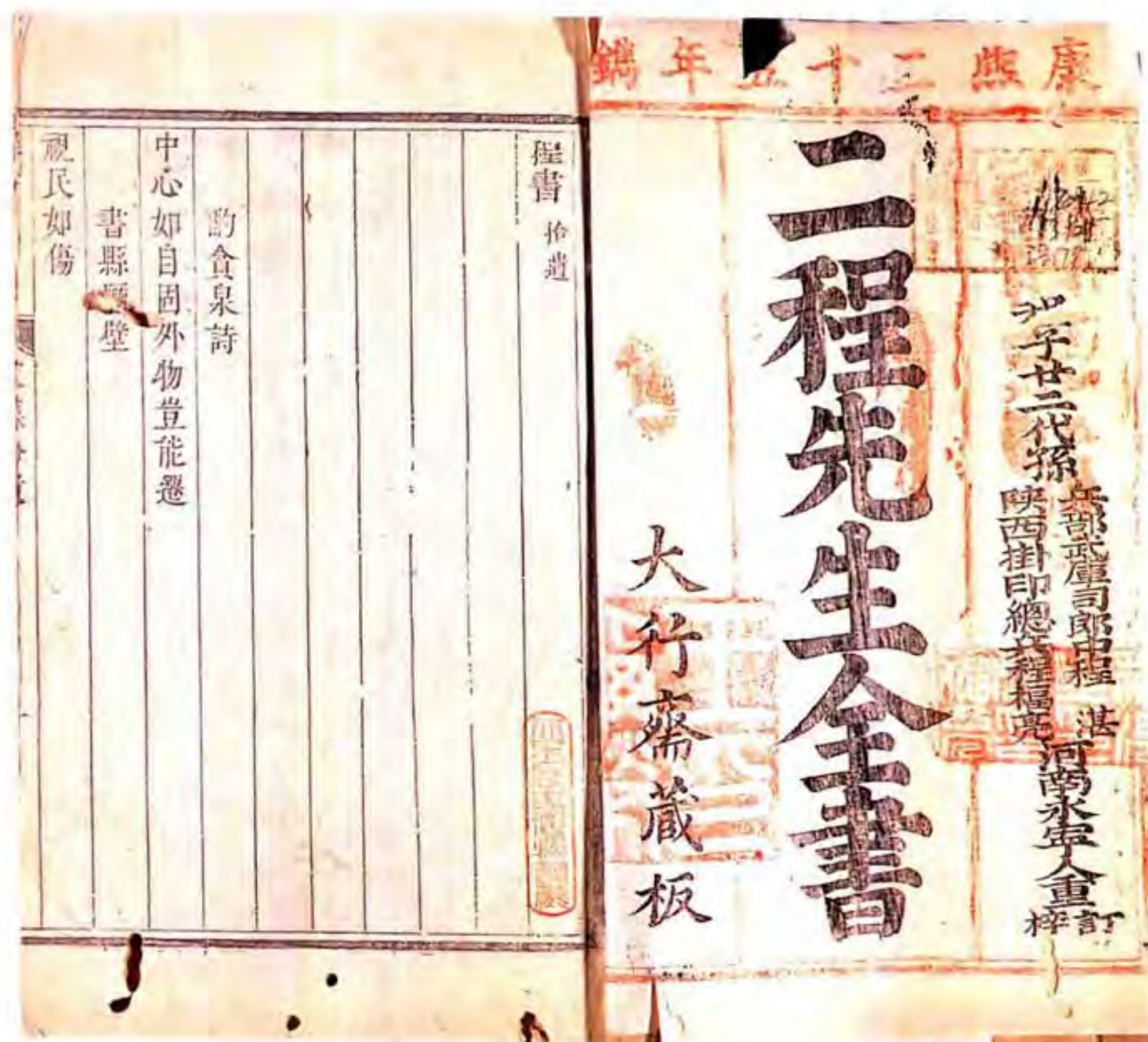
南宋初，元祐党人得到平反，“洛学”和“蜀学”重新振作。基于王安石的“新学”曾受到宋徽宗和蔡京的极力推崇，因而复出的

理学家们纷纷予以抨击，“新学”趋向衰落，与“洛学”和“蜀学”形成鼎足之势。这一时期，理学产生分化，朱熹集诸家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陆九渊融合孟子的道统和禅宗的思辨，形成心学。理学和心学逐渐成为南宋时的显学。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其父朱松是程颐的三传学生。朱熹少年“受学于家庭”，后受学于讲究“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李侗。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中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宋孝宗即位后，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建策三事，第一件就是熟讲“圣学”。此后，朱熹著书讲学，逐步形成了他的理学体系。朱熹以《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核心，提出理在气先，气依理而存在。他综合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等人的学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周密的哲学体系。朱熹通过在各地讲学，宣扬自己的学说，同时与见解不一致的吕祖谦、陆九渊等人展开论辩，产生很大影响。但他在世时始终未获朝廷的重视。宋宁宗即位后，朱熹等人被主持朝政的韩侂胄立为伪学逆党籍，朱熹理学一度遭到禁锢，直到嘉定二年（1209）才获平反，朱熹被追谥为文公，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得以刊行。宋理宗即位后，又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朝廷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等取代王安石从祀孔庙，程朱理学因统治者的褒扬而声名显赫。

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卒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与朱熹是同时代人。他在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中举，赐同进士

《二程先生全书》书影



出身。此后，先后担任县学主簿、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将作监丞等职，去世前知荆门军（今湖北荆门）。陆九渊自幼静重如成人，“生三四岁，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他读书讲求深省其意旨，指出：“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入仕后聚徒讲学三十年，从学者甚众。陆九渊受佛教禅宗影响，认为心理同一，不赞同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不重著述，自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的学说自成一派，与朱熹有很多分歧。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双方在江西信州鹅湖相会，“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辩论数日，朱陆各持己见。朱熹批评以心悟道是“简易”、“无言”，陆九渊认为朱学的泛观博览为“繁琐”、“支离”。陆九渊作诗称：“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作诗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陆学后来经明代王阳明的发展，形成完整的心学体系。

南宋时，除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的理学日益彰显外，还有陈亮、叶适等人的事功之学与其针锋相对。这一派学者反对空谈道德性命，提倡务实事功，“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事功之学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从靡丽到清新

两宋时期，文学创作极为繁盛。北宋中叶的古文运动促使散文、诗词的创作风格由颓靡纤丽走向清新平实，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北宋初年，诗文创作仍然沿袭着晚唐、



朱熹像

五代的靡丽之风。“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杨亿、刘筠等编《西昆酬唱集》，使西昆诗和骈体文风靡一时。这些诗文专事雕琢，词藻华丽，内容空洞无物。宋初柳开、王禹偁倡导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但未能扭转时风。宋仁宗即位后，对这种文风十分反感，他在一篇关于贡举的诏书中指出：“比来流风之蔽，……竟为浮夸靡曼之文，无以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在他的支持下，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欧阳修力排科场上流行的靡丽险怪奇涩之文，凡文章中有明显雕饰痕迹的，一概黜落，登进高科的为曾巩、苏轼、苏辙等擅长古文的学子，使文风为之一变。欧阳修提倡散文，文字平实清新，王安石、曾巩、“三苏”也以议论为文，文从字顺，自然平易，他们共同将唐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重新推向新的阶段，因而后世将韩、柳与欧、王、曾、三苏并称为“唐宋八大家”。一代的文风也体现于一代的诗风。后人曾评价，宋人以文为诗，即诗歌创作出现散文化趋势。欧阳修的诗“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与他同

苏轼像



《白石道人歌曲》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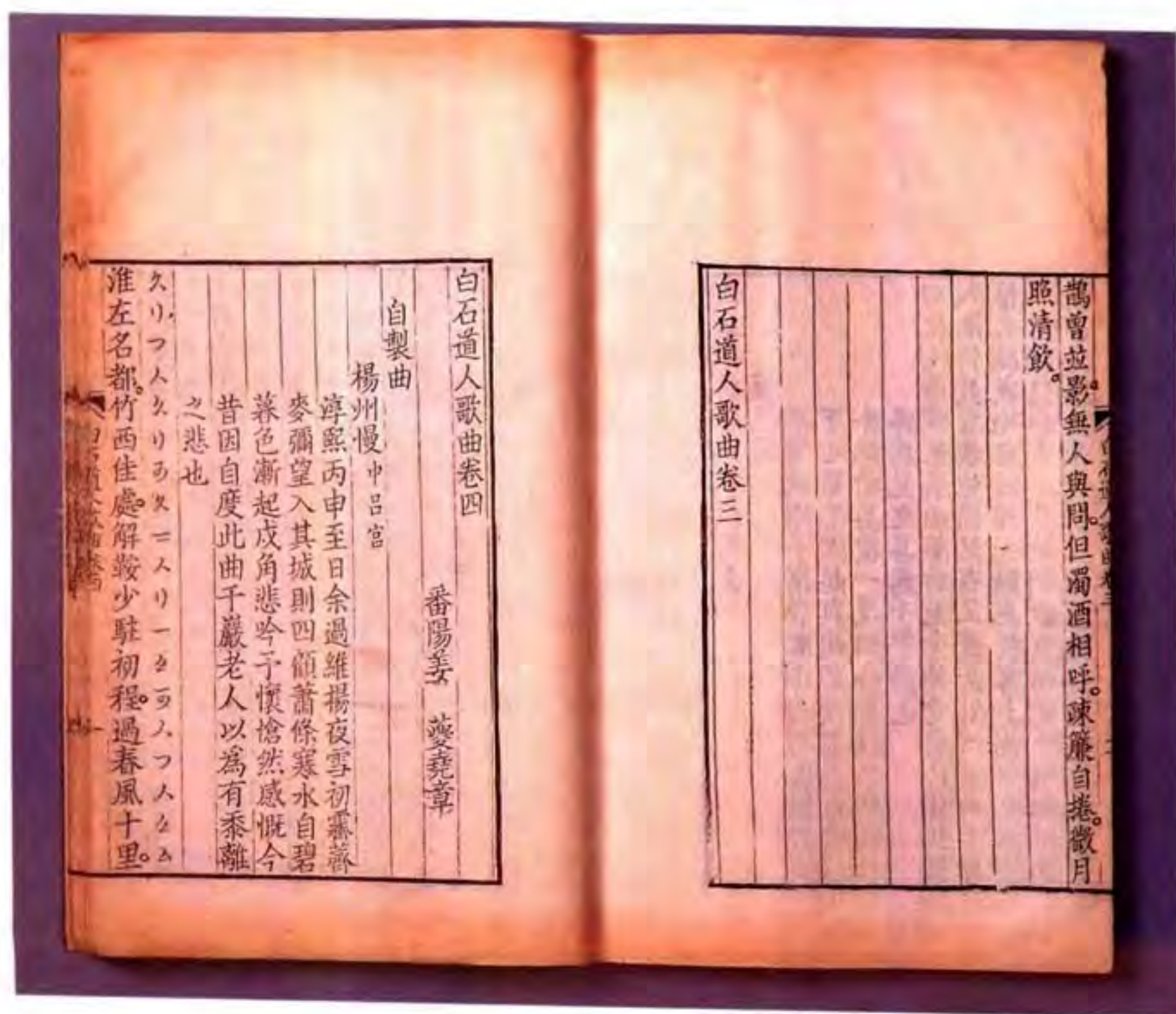
清刻本

这是南宋姜夔的词、曲集。姜夔（1155—1221），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其诗、词俱佳，又精通音律。作品刻意讲求格律与音节的和谐，专注于纯艺术性，内容多为吟风弄月或记叙客游；少数作品虽是对时事有感而作，但情调比较消沉。本书是姜夔的作品集之一，分为四卷。书中词句旁边注有乐谱，有的还注有弹奏时的指法，是现存宋代惟一有谱的词集。

时代的梅尧臣也提倡古朴平淡的诗风。曾参与庆历新政的苏舜卿“时发愤懣于歌诗，其体豪放”。王安石、三苏、黄庭坚等人“诗格极于高古”，他们的诗作都体现了关注政治、关心民众生活的特点。宋室南迁后，半壁山河的沦陷成为众多诗人排解不开的郁结，“万里家山无路人，十年心事与谁论”，陈与义、曾几、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是南宋爱

国诗人的代表，作品风格悲壮豪放。陆游一生作诗万余首，风格奔放，自然流畅。这一时期的诗人也擅长描写田园风光，关注农民疾苦，为人称道的还有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南宋后期一些诗人崇尚晚唐诗风，“炼句为工”，主要有“永嘉四灵”（徐照、徐玠、赵师秀、翁卷）和以陈起、姜夔、刘过、刘克庄等人为代表的“江湖诗派”。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风飘絮”，写下《过零丁洋》、《正气歌》等众多脍炙人口的爱国诗篇。

词的大量创作是两宋文学的重要成就。北宋初受晚唐五代花间派的影响，填词入曲成为士大夫酒筵歌席上的即兴消遣，词风绮丽浮艳。晏殊的《珠玉词》和欧阳修的《六一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洗去了花间派的脂粉气，但创作格调仍受南唐遗风影响。当时以词擅名一时的还有柳永、晏几道、宋祁、梅尧臣、张先等人。柳永原名柳三变，字耆卿，他年轻时失意科场，终日流连酒楼妓馆，以“填词柳三变”著称。他将市井俚语收入词中，使词的语言更加贴近生活，同时他还将慢曲应用到词的创作中，发展出慢词长调。柳永的新词新调风靡一时，为大江南北传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北宋中叶以后，苏轼以其自然豪放的文风一扫词坛上的萎靡之气，他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气势雄浑的怀古词，也写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凄婉动人的离别词，他的词风将欧阳修开创的古文革新推进到词的创作，并启导宋代词坛豪放派和婉约派的同时风行。在他稍后，秦观、贺铸、周邦彦的词基本上都是婉约派风格。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宋室南迁的动荡岁月里，写下大量深婉凄切、刻画细腻的词，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



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被视为婉约派的代表，但她的一些爱国诗词也凝聚着刚强豪放的气势，如著名的《夏日绝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等人作词豪放悲壮。张元幹的《贺新郎》、张孝祥的《六州歌头》、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都为千古传唱。南宋时，姜夔继承了周邦彦的风格，创作了很多婉约派词，传世84首。他精于炼句，又长于音律，自己谱曲。这种对格律技巧的重视影响了南宋后期的词风。

四、说话·诸宫调·杂剧·社火

城市的兴起、教育的普及，促使两宋时期市民文艺极为繁盛。在宋代都市中，有很多用于演出戏曲的瓦舍，又称瓦肆、瓦子，每一瓦舍都用栏杆圈出一个表演场地，称为勾栏，有的还搭建表演棚。艺人在勾栏和棚屋中演出说话、曲艺、杂剧和滑稽戏、傀儡戏、杂技等。

说话是由唐代佛教寺院中的俗讲和民间小说演变而来的，类似后来的说书和弹词。宋代说话题材非常广泛，《都城纪胜》记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此外，还有“说诨经”、“商谜”等表演。说话尤其是长篇讲史深受大众欢迎，南宋《醉翁谈录》描述：“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话人的讲本是话本，流传至今的著名宋代话本有《碾玉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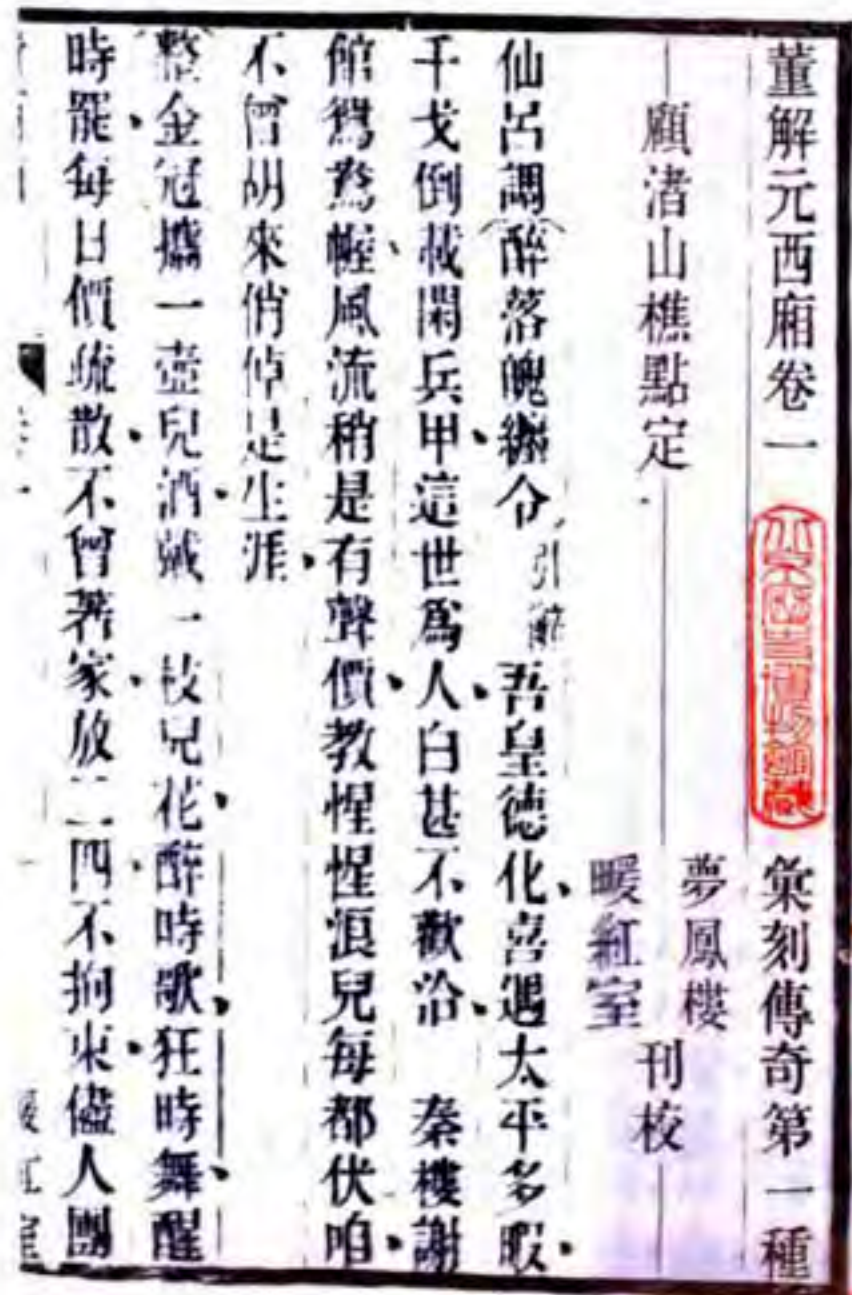
音》、《错斩崔宁》、《快嘴李翠莲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等几十种，分别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中。

诸宫调相传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泽州（今山西晋城）人孔三传首创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特点是有说有唱，伴奏乐器较多，所唱韵文由多种宫调组成套曲，较之一种乐器或一种宫调演唱故事的鼓词、大曲、唱赚等表演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对北曲南戏的形成都有影响。宋代南戏《张协状元》第一回就搬用部分宫调。金灭北宋后，诸宫调在北方继续盛行。保存至今的有著名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是金章宗时（1190—1208）人，他据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对原作进行了重大改变，以张生与莺莺双双出走，共结良缘为结局，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突破。全书八卷，共一百九十四套曲，用了十六种宫调。此外，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时期文献中也有一个残本《刘知远诸宫调》，存七十六套曲，用了十三种宫调。内容取材于《五代史平话》，与南戏《白兔记》的情节大致相同。

杂剧是融合说唱、歌舞及汉唐以来的散乐、百戏、参军戏，由演员装扮各种角色表

明刊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书影

金代董解元撰。内容取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但情节有重要改变。突出了红娘、莺莺、张生与老夫人的矛盾，结局是张生与莺莺结为良缘。文段用十四种宫调套曲来演唱，故曰诸宫调。表演时，一位演员身兼三事：手弹琵琶，同时唱词，念白，其形式颇似现在的苏州评弹。因用琵琶伴奏，此书又叫《弦索西厢》或《西厢指弹词》。后人一般称之为《董西厢》，元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就是以此书为基础改编的。



演的戏曲形式。《辽史》和《宋史》记述宫廷表演，都提到了杂剧。唐代教坊子弟搬演参军戏只服务于宫廷贵族，不过二三人出演，情节简单；而宋代更多是民间艺人在瓦肆勾栏中演出，场次增多，演员每场有四五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宋“丁都赛”杂剧雕砖，传为河南偃师宋墓出土。砖面浮雕一戏装人物全身像，人物头戴诨裹（演杂剧时戴的一种毡帽），诨裹上插花枝，身穿圆领开叉短衫和紧裤袜，足蹬靴子，上身为汉装，下身为契丹服饰，为北宋末年教坊杂剧角色的装扮。雕砖右上角阴刻“丁都赛”三字。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丁都赛为北宋末年京师著名

北宋“丁都赛”杂剧雕砖

传河南偃师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28厘米，宽8厘米，厚3厘米



杂剧艺人，平时在瓦舍中演出，每逢元宵节，皇城正门前搭建露台演戏，丁都赛等民间艺人都要登台献艺，人们称其为“露台子弟”。

宋代杂剧每场次出场演员四至五人，各有不同角色。《都城纪胜》载：“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脚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也记载：“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装孤。”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出土宋杂剧雕砖上雕有四人，分别为引戏、装孤、副净、副末；1958年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发现六块雕砖，其中三块为一组杂剧演出场面，平面雕出五个角色；1982年河南温县前东南村北宋墓出土的杂剧雕砖中演出角色有五人，另有奏乐六人；1973年河南焦作金墓出土了杂剧俑五人，另有伎乐俑七人、侍从俑六人；1959年，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在侯马市郊发掘金大安二年（1210）董氏墓，墓室后壁上端砖砌戏台一座。舞台上雕出五个装饰不同的演员，恰是副末、副净、引戏、末泥、装孤五个角色。山西稷山化峪金墓出土两组高浮雕杂剧砖也都是由五人组成。稷山马村金段氏墓出土杂剧砖雕6组，1、3、8号墓杂剧砖雕为五人，2、4、5号墓为四人。实际上，宋代杂剧演出也并限定在五人之内。《武林旧事》卷三记载宋孝宗时“杂剧三甲”，出现了一甲八人，除引戏一人、次净三人、副末一人，还出现有戏头一人，装旦一人。“装旦”即以男演员装扮成妇人。旦角的出现，表现了宋代戏剧角色已十分完备。

宋代杂剧没有完整的剧本流传，但在《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中，列出



砖戏台

金

山西侯马金大安二年(1210)

董氏墓出土

杂剧名目 280 本。据王国维考证，这些杂剧段数虽在南宋著录，“其中实有北宋之戏曲”。北宋灭亡后，戏曲分为北、南两途。金朝杂剧演员以倡优充任，多居住行院，剧本被称为院本。元杂剧就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科白（表演及对话）继承了金代院本体制，曲调则源于诸宫调。南宋杂剧继续在南方盛行，并结合各地方言风俗，形成新的戏剧品种。宋代旅日禅僧大觉禅师兰溪道隆年轻时居蜀二十年，其《杂剧诗》描述川杂剧曰：“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据此可知，川杂剧已使用变幻莫测的面具，与今川剧特点一致。温州一带形成南戏，即南曲戏文，明祝允明《猥谈》载：“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早期南戏多采用地方词令小曲和民间俚语，传世戏文仅《永乐大典》中保存的《张协状元》一种。

除杂剧日趋成熟外，汉唐以来宫廷中的参军戏、傀儡戏等也走向民间，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参军戏常由两人表演，

以对话形式演绎滑稽谐谑故事，所以又称为滑稽戏。故宫博物院藏有宋参军戏绢画《眼药酸》，高 23.8 厘米，宽 24.5 厘米，所画内容与《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中记载的眼药酸相同。画中右方一人腰间所插扇上有草书“诨”字，左方一人扮作江湖郎中，头

参军戏绢画《眼药酸》

宋

高 23.8 厘米，宽 24.5 厘米



戴高帽，身着大袖宽袍，腰系方袋，袋上绘出一只人眼，身上背挂的成串药丸上均绘有一只眼睛，其高帽上挑出一个带眼药丸，充作招幌。1987年浙江黄岩灵石寺塔出土六块方形戏曲雕砖，其中一块阴刻戏装二人，作对话状，也是表演参军戏的情景。傀儡戏即今木偶戏。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记载，宋代都城的傀儡戏有三种表演形式：一为悬线傀儡，又称提线木偶，傀儡（木偶）头部和四肢均有线绳联结，表演者在上方提线操纵其动作；二为杖头傀儡，木偶两手用竹竿作支架，表演者用棍举起傀儡并操纵其动作；三为水傀儡，是在船上进行的木偶表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宋代傀儡戏纹铜镜，镜背图案描绘了演出杖头傀儡戏的情形。

南宋陆游《春社》诗云：“太平处处是优

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鹅，京都新禁舞斋郎。”社日是中国古代传统祭祀谷神、迎接春耕的喜庆日子，乡村往往燃起社火，通宵演出歌舞戏曲。1973年河南焦作金墓后室出土有社火雕砖8块，同年在河南洛宁县小界乡上村宋墓出土雕砖三组25块，其中一组8块雕砖也表现了乡村社火演出场面。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大傩图》表现的实际上为乡村社火歌舞场面。

五、山水寄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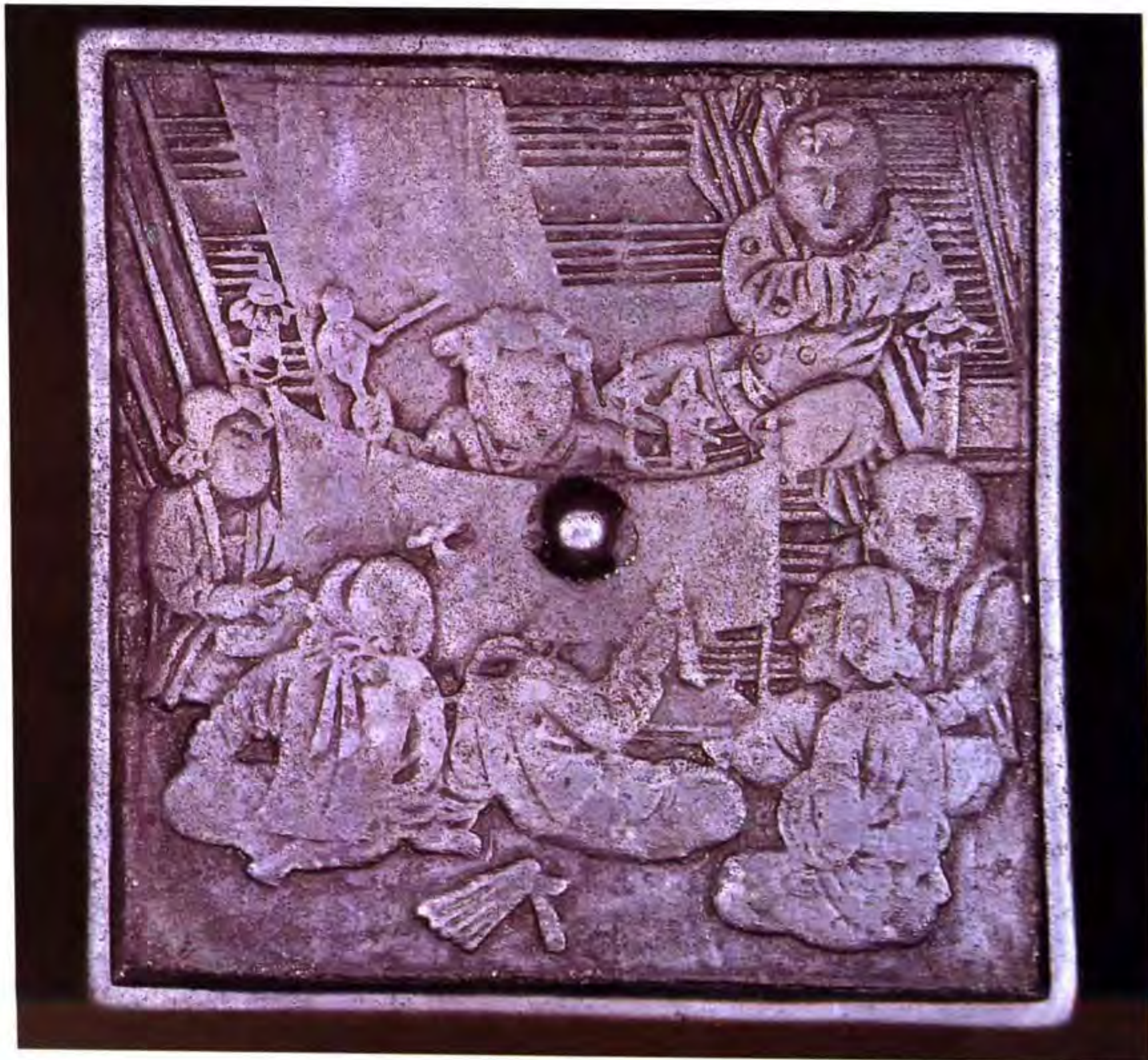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史的一个辉煌时期。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各阶层画家都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无论是绘写人物风俗，还是描述山水花鸟，都表现出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的特征。这一时期，文臣队伍不断壮大，诗书画不但是体现他们素质修养的重要

傀儡戏纹铜镜

宋

传世品

边长11厘米，边厚0.2厘米方形，有钮。镜背图案描绘了演出傀儡戏的情形。图案中央自左至右拉起一道帷幕，幕后一童子手执木杖，杖头挑出木偶；幕前几人盘腿坐地，手持各种乐器，配合着木偶的动作奏乐。中间的两个童子脑袋凑在一起，似乎在为木偶配音。铜镜右上方还有一人坐在台阶上，正观看木偶表演。画面安排巧妙，虽人物众多，却相互呼应，构图十分生动。



标志，也是抒发他们精神情怀的一种途径，由此导致文人画的兴起。而宫廷翰林画院的建立以及朝廷设“画科”取士，又促使宫廷画获得新的进步，画学理论获得新的提高。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文化的极度繁荣，促成绘画市场的繁盛，其结果是造就了一批以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家，同时也使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摆脱了为宫廷和寺庙服务的局限，内容更加贴近大众，更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北宋初年，沿袭了西蜀和南唐的画院制度，设立翰林图画院，招聘各地画家。画院内设立待诏、祗、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六职，予以品官待遇。《画继》卷十载：“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二院职人佩鱼。”画家皆以进入画院为荣。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朝廷进一步将画院招聘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以画取士，设官衔六等给予俸禄。画家人院后除学习绘画外，还兼修他科，画院仿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通过考试决定升降等次。画院集中了各地优秀画家，优厚的待遇，良好的条件，以及相互间的切磋交流，都为画作的繁荣和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画院由于受到帝王的直接关注，也有一些局限，比如题材画风趋帝王所尚，个性难以尽情发挥，“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之不合法度，或无师承”。北宋黄筌、黄居寀父子以工巧、细致、艳丽的画风受到统治者青睐，于是成为画院的标准画格，“校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南宋时又以马远、夏珪“残山剩水”的画格为标准。可见画院制度虽然为画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画家的个性创作。文人士大夫出身的画家往往不屑于画院工整细密的风格，他们不求形似，而重神

韵，“取其意气所到”。文人画的代表有苏轼、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

宋代绘画中，较为突出的是山水画的兴盛。北宋时期，北方山水画承袭了五代荆浩雄奇浑厚的画风，形成以李成、关仝、范宽为代表的三个流派。南方山水画家法五代董源“平淡天成”的风格，形成以米芾、米友仁父子为代表的写意画风。李成是五代入宋

《踏歌图》

马远绘

故宫博物院藏

绢本设色

纵192厘米，横111厘米

马远擅长写绘山水、花鸟、人物，山水画构图喜取边角之景，用笔雄健刚劲，山多峭拔卓立，树多干枝直挺。画面上方有宋宁宗题诗，并钤“御书之宝”印。图右下角署款“马远”。



《溪山清远图》

夏珪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纸本墨笔

纵46.5厘米，横889.1厘米

夏珪为南宋四大家之一，宋宁宗时为画院待诏，善画山水、人物。他的山水画师法李唐，但又有发展，笔法苍劲浑厚，喜用皴笔绘山石，墨色多变化。此图气势宏大，意境悠长。卷末有陈川等人题跋，画卷上还有乾隆皇帝题诗与清内府玺印多方，并“钦赐臣权”、“子孙永宝”、“黔宁”、“公余”、“纬萧草堂画记”等印。



的山水画名家，师法荆浩、关仝，善于以直擦的皴法，绘写山林远景。《宣和画谱》记述他“所画山林数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之状，一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传世代表作有《寒林平野图》和《读碑窠石图》。范宽曾师法荆浩、关仝，后来他感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居终南山、太华山，寄情于景，感悟大自然的壮阔，“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雾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由于他注重大自然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传世代表作有《溪山行旅图》和《雪景寒林图》。北宋熙宁间（1068—1077）的山水画家郭熙曾为图画院艺学，后任翰林待诏直长。他师法李成，兼学范宽、董源，自放胸臆，善于变化，尤擅长描绘山势变幻，乱云怪石，画作“多鬼面石、乱云皴、鹰爪树”，别具一格。他还著有《林泉高致》，提出绘山水的三远（高远、深远、平远）原则，对后世很有影响。郭熙的画作传世较多，代表作

是《早春图》。北宋后期，米芾、米友仁父子以多层渲染的方法，使水墨画的积墨、破墨、渍染、渲染等技巧得以充分发挥，“点滴云烟，不失天真”，被称为“米点山水”，为后世所效法。

南宋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变革时期。宋室南迁后，秀丽的江南风景成为宫廷画家写意的对象，最终形成以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派。



南宋初年，李唐创大斧劈皴法，以水墨大笔挥写山石，点染树叶，行笔酣畅淋漓，其代表作是《清溪渔隐图》。这一手法为南宋后期画院马远、夏珪所继承。马远作画虚实结合，近景为实，远景为虚，画面常留下虚旷的空间，人称“马一角”。其代表作有《踏歌图》、《远山柳岸图》、《寒江独钓图》等。夏珪常以虚代实，将景物置于画面一隅，也留有较大空间，人称“夏半边”，其代表作有《溪山清远图》、《松溪泛艇图》、《烟岫林居图》等。由于马远、夏珪画风相似，并称“马夏”。与此同时，梁楷采用“减笔”绘写人物山水，形成别具一格的画风，其山水画代表作是《雪景山水图》。

宋代画家寄情于山水，却不囿于简单的景物摹绘，而是处处关照社会现实。在传世的众多宋代山水画作中，人们总能看到乡间行旅、劳作、生活的场面。由于画院教学兼工各科，许多山水画家兼长人物、建筑，因而能将天然图景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在绘画题材上，宋代画家的眼界极其开阔。北宋末年，画院学生王希孟作《千里江山图》，以长卷形式描绘连

绵不绝的山岳和波涛奔涌的大江，气势磅礴，色彩绚丽，景物纷繁而颇具章法，山水连贯但富于变化。受其影响，南宋江参绘有《千里江山图》，赵伯驹绘有《江山秋色图》，赵芾绘有《江山万里图》。

宋代花鸟画也很盛行。五代后蜀黄筌和南唐徐熙都善画花鸟，但风格不同，有“黄筌富贵”、“徐熙野逸”的说法。黄筌子黄居寀进入北宋画院，其风格成为院体画的画格。但后来在发展中两派日趋融合。宋徽宗赵佶喜好书画，尤工花鸟、人物，留传下来的作品有《腊梅山禽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

市民文化的兴起，造就了社会风俗画的大量涌现。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绘北宋东京社会生活全景的风俗画。全画共绘人物五百多个，车轿二十多辆，各类船只近三十艘，还有约六十头牲畜。尽管图画规制宏大，人物众多，建筑纷繁，但在横向展开的画卷中，作者由近推远，有疏有密，动静相间，布局十分巧妙，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了集中概括，既有在空间上的虚实关照，又有对人物场景细致入微的描

《千里江山图》(局部)

王希孟绘

故宫博物院藏

绢本设色

纵51.3厘米，横1188厘米
王希孟是北宋末年画家，善画山水，这幅《千里江山图》是他十八岁在画院学习时所作，也是这位英年早逝的画家惟一传世的作品，是宋代山水画的杰作。图卷上钤有宋理宗“缉熙殿宝”，清内府藏玺及历代私家收藏印多方，卷后接纸有宋蔡京题记、元溥光和尚题跋和清乾隆皇帝题诗。



绘，这幅都市社会生活长卷不仅为今人了解和研究北宋东京的街市、建筑、交通、商业、民俗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形象资料，而且为风俗画的创作开辟了新途，即在艺术概括与社会写真相融合的基础上，以宏篇巨制如实再现城市生活瑰丽多姿的纷繁场景。除此之外，描绘乡村生活小景的画作也很多。李唐的《灸艾图》，描绘了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的情景。在苍郁的树阴之下，乡村郎中正为一上身赤裸的老汉施灸，身后一名童子弯腰取药，两个村妇手握老汉双臂，紧张地注视着他的表情，画面极为生动。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货郎挑担售货的情景，货担上挂满各种各样的百货玩具，儿童簇拥紧随，一幅乡村生活的图景跃然纸上。类似作品还有传为王居正的《纺车图》、苏汉臣的《货郎图》、佚名的《车水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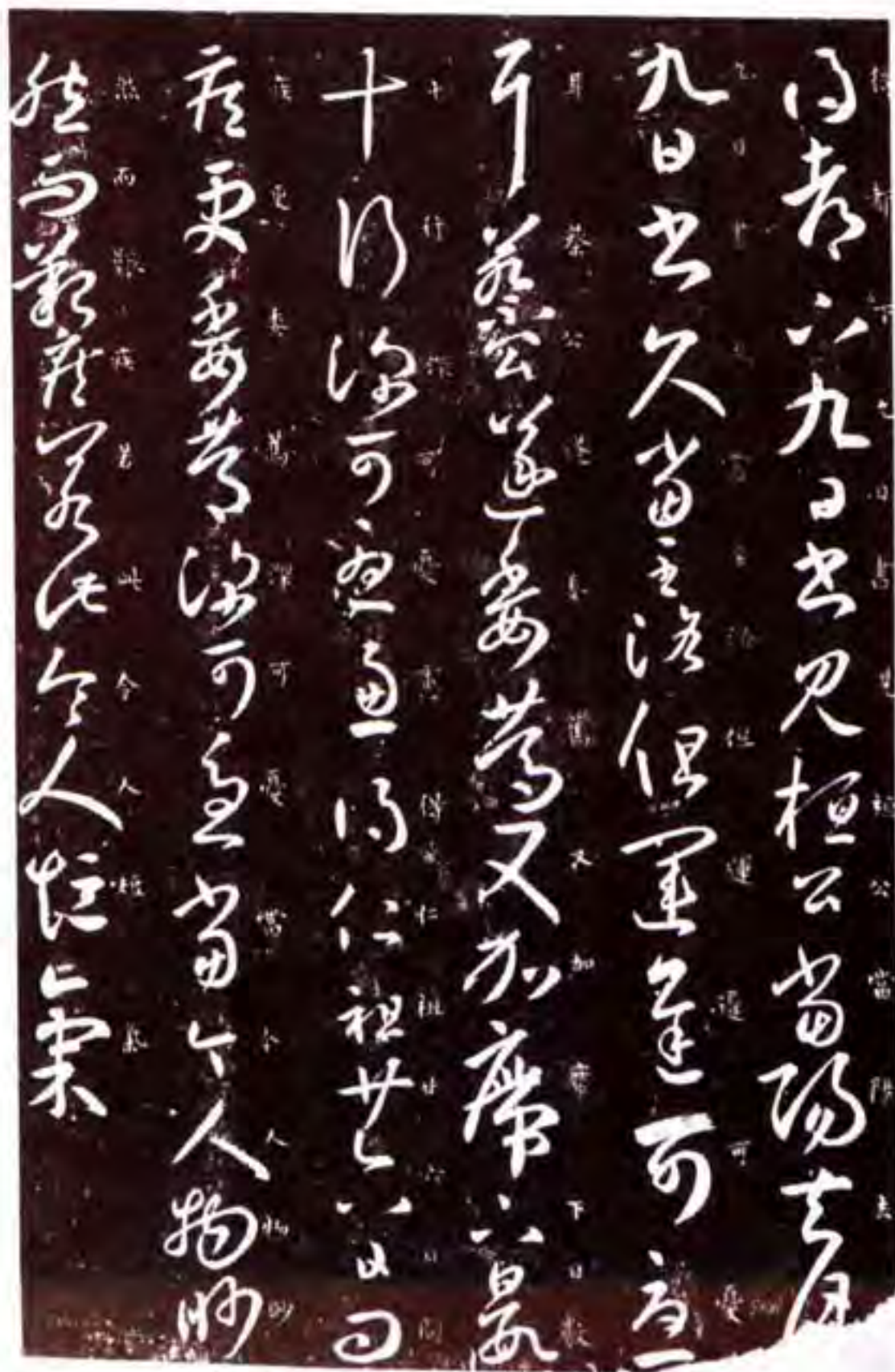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中也有大量反映社会生活场景的画作。宋墓中的壁画多以表现墓主生前家居生活场面为主，白沙宋墓1号墓前室东壁绘女乐十一人，西壁画墓主人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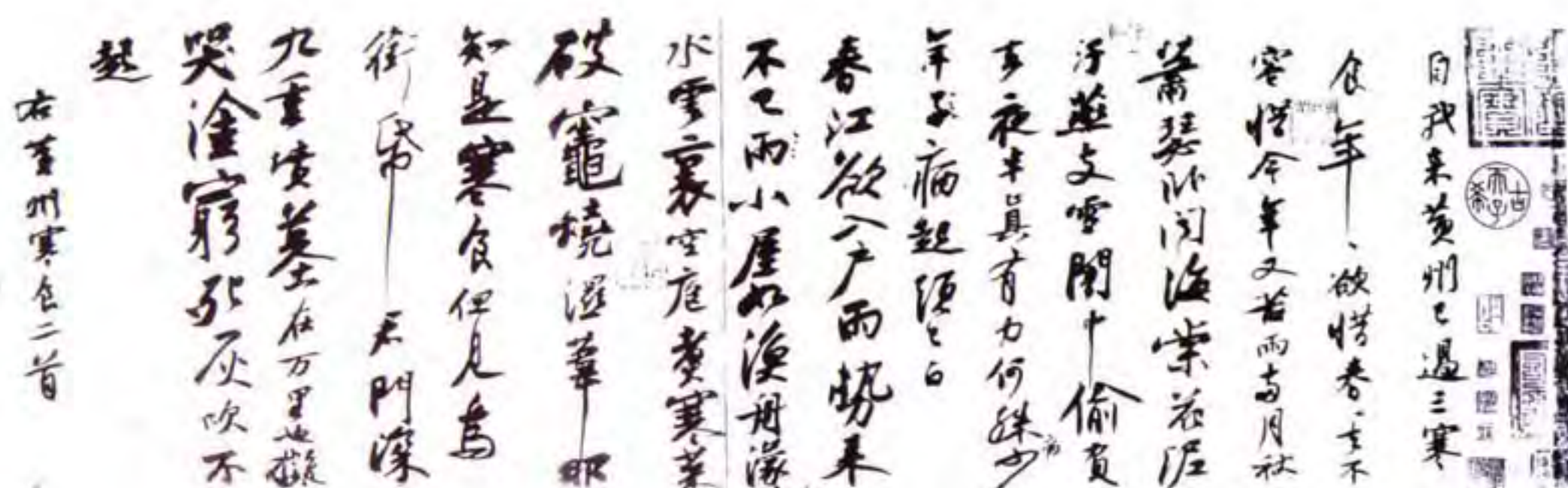
妇对坐宴饮像，后室西南壁画妇女梳妆，东南壁画持物侍奉的男女婢仆。辽墓壁画题材丰富，既有很多射猎、牧马、车帐等表现草原游牧生活的画作，也有大量壁画反映家中宴饮娱乐、烹饪、儿童嬉戏的场面。内蒙古库伦旗7号辽墓壁画描绘游牧狩猎的场面，极为壮阔，驼马成群，帐篷相连；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张世卿墓壁画散乐图人物众多，表情姿态各异，均是壁画中的佳作。西夏寺窟壁画和墓室壁画中，有大量佛经故事和供养人像，也有表现农耕、踏碓、酿酒、锻铁等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图景。金墓中反映墓主日常生活的壁画也很常见，山西绛县裴家堡金墓壁画，除墓主夫妇对坐图外，还有烧火担水的生活场面。

需要指出的是，辽、西夏、金的绘画艺术也具较高水平。契丹画家留给后世的是众多描绘草原风光和骑射游猎的图卷，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等。著名画家胡环作有《卓歇图》、《番部早行图》、《出猎图》和《回猎图》等，在当时就很有名，被宋内府列为神品。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等，反映了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大量佛画，如《文殊图》、《普贤图》、《弥勒佛图》、《阿弥陀佛接引图》等，甘肃敦煌和榆林窟也都有西夏时绘制的壁画。传世金代绘画中，以张瑄《文姬归汉图》最为著名。该画描绘蔡文姬归汉时途经大漠的场景，画面上奋力前行的十二骑描绘得栩栩如生。保存至今的一些金代寺观壁画也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如大定七年（1167）山西岩山寺文殊庙的一组佛经故事画，无论建筑还是人物，都描绘得极为细致，色彩斑斓。

《大观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每半开纵30.5厘米，横20厘米
共十四开半，麻纸裱本。首题“历代名臣法帖第七”，第二行题“晋右将军王羲之书”。末署“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大观帖》刻石未及二十年便毁于兵燹，传世拓片甚罕。这部宋拓本的内容为王羲之书札，极为珍贵。册前有王惕甫书签“真宋拓阁帖”，册后有王文治、宝熙、朱益藩、陈宝琛等跋及历代藏印多方。





六、苏黄米蔡

宋代对收集和汇编历代书法名帖十分重视。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秘阁先后收得王羲之、王献之、桓温、钟繇等晋唐墨迹名帖。淳化三年（992），宋太宗令翰林学士王著编次历代书法，摹勒于枣木板上，所出拓本以澄心纸装裱成册，颁赐二府（中书省、枢密院），世称《淳化阁法帖》。该帖共十卷，收上古至唐一百名书法家的419帖。前五卷为历代帝王、名臣名家法书，后五卷为二王书帖。这是历史上首次汇编历代书法，成为后人习诸家书法的临本，被奉为法帖之祖。《淳化阁法帖》颁行后，受到世人重视，官私摹刻成风，其中以绉本和潭本较知名。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记载：“绉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绉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绉本杂以五代近世人书，微出锋；希白自善书，潭本差能得其行笔意。”

此外，还有二王府本、修内司本、贾似道本、肃王府本、泉州本等。

北宋大观三年（1109），因《淳化阁法帖》版已断裂，宋徽宗命龙大渊重编，刻石于太清楼下，命名为《大观帖》，并命宰相蔡京主持其事，书写前后标题。该帖共十卷，较之《淳化阁法帖》，无论编选还是摹刻都更加精细。宋室南迁后，金占据开封，南宋人只能通过榷货贸易求得拓本，世称榷拓本。南宋榷拓本《大观帖》传世非常稀少，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卷一、二，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卷二、四、六、八、十，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卷六，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卷七。

对历代法帖的汇编和摹刻体现了当时人们习练书法仍重视前人的法度。唐代书法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书法在宋初都受到推崇，不仅成为习字的本，也是版刻印刷初起时的标准字体。这一风气到北宋中叶发生了变化。其原因，一是复古思潮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思维，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出

《新年展庆帖》

北宋 苏轼书
故宫博物院藏
纸本行书
纵30.2厘米，横48.8厘米
作于元丰五年（1082）正月初二，计19行，240字。行书时而近楷，时而若草。全帖行笔潇洒，挥洒自如，势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地表现了苏轼的不拘一格的书法风格。



《自书诗卷》

蔡襄书
故宫博物院藏
纸本行书
纵28.2厘米，横221.2厘米
蔡襄的书法以行、楷见长。蔡襄大约在皇祐三年（1051）写成此卷，共录诗十一首。卷首起笔略具楷意，渐次奔放，行笔至后，已是行中带草。全篇一气呵成，极为流畅。卷末有宋杨时、张正民、蒋璨、向水、元张雨、张桓等人题跋，并有历代藏书印多方。

现了对汉儒解经的质疑，在诗文写作上出现了对浮词用典的摒弃，在艺术创作上也兴起了不拘一格、不循旧例、不讲师承的风气，绘画和书法也开始讲究个性发挥，追求神韵，而不再只讲形似；二是宋真宗以后，科举考试实行“誊录”，考生的字体与成绩无关，更与主考官的好恶无关，由此，宋代文人习练书法完全可以按照个人的爱好，挥洒自如。

在讲求神韵的年代，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字体受到人们的推崇，并称为

“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蔡，原指北宋末年的蔡京。蔡京的瘦金体曾风靡一时，但因其误国，被列为北宋末年“六贼”之首，按照中国传统，在书法名家榜上也被除名，然而四家不可缺一，便以北宋前期的蔡襄代替。实际上，蔡襄书法虽被“推为本朝第一”，却是恪守法度，少有创新，其特点是以习颜体为主，兼修各种书体，苏轼评价他“真行草隶，无不知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其楷书端重，行书绰约，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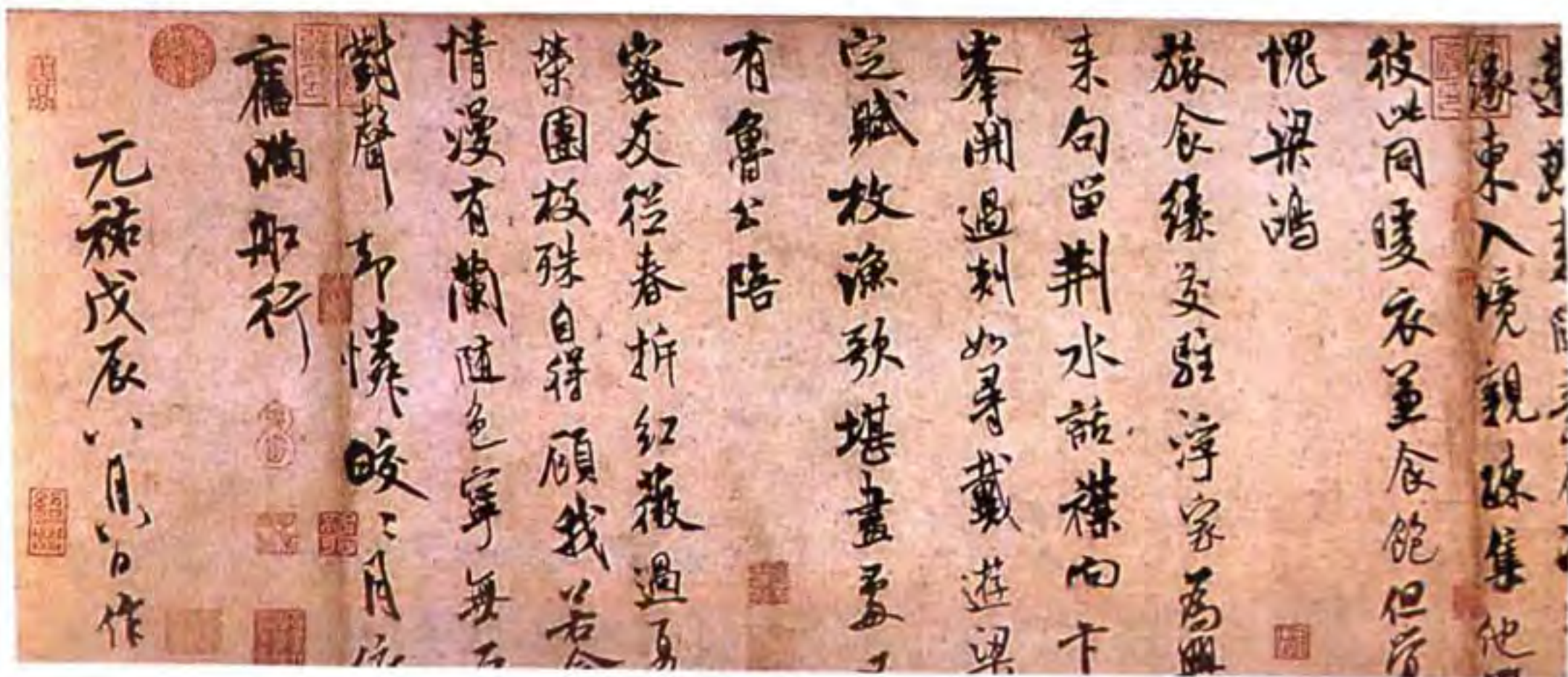
《苕溪诗卷》

米芾书

故宫博物院藏

纸本行书

纵30.2厘米，横189.5厘米
米芾（1051—1107）是北宋后期著名书法家，善行书，亦工楷、草、篆、隶诸体，并能作画。宣和间为书画学博士。《苕溪诗》是米芾于元祐三年（1088）游湖州苕溪时所写，全幅35行，计五言律诗六首。运笔潇洒，结构舒畅，字体秀巧却不失苍劲，行间疏密有致，富于变化。此为米氏中年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独特的书写风格。该卷经历代名家收藏，清代进入内府，有清梁清标等人收藏印，还有乾隆、嘉庆玺印。民国间，此卷被溥仪带到东北后散失，归藏时已有损伤。



妖娆。苏轼的书法讲究“以意为法”，自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又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轼的书法擅长行、楷，用笔丰润，体态宽绰，不计较用笔法度和间架结构，或大或小，或恭或弛，任意挥洒，全在心态意趣所至。苏轼的尚意书法在北宋中叶受到黄庭坚等人的赞赏和效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擅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其行书笔锋伸展开阔，呈放射状，遒劲恣肆；其草书笔锋飞扬劲洒，雄放飘逸。康有为称他的书法“昂藏郁拔，而神闲意浓”。米芾为人狂放，被称为“米颠”，他曾临摹过历代名帖法书，对前人笔意章法领会颇深，用笔讲究率意而为，其行草挥洒豪放，一气呵成，“奋然如龙蛇之起陆，矫然如雕鹗之盘空”，自称为“刷字”。其字体秀劲飘逸，顿挫转折，富有变化。米芾的字在北宋后期很有名气，据说“其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至于请求碑榜，而户外之履常满”。苏轼、黄庭坚、米芾启导了宋代书法的变革，此后的书

衣荷月
歸夜少

刻之 張法亭 以字可令

《明璚诗后题卷》(局部)

黄庭坚书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纸本楷书

纵25厘米，横1004厘米

大字横写，每字直径约为20厘米，为黄庭坚五十六岁被贬戎州（今四川宜宾）时所写。该卷已被后人分割为两部分，明璚诗文不知去向，此为诗后题记。全文大字字体苍劲浑厚，为黄氏的代表作之一。卷末有小字云：“此字可令张法亭刻之。”据此知该卷是为刻石所写，故字大如斗。此卷曾经历代名家收藏，卷首、卷尾分别有南宋贾似道、元赵孟頫、明项汴等人鉴藏印。

法多以意取胜。除了苏、黄、米、蔡，北宋时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文同、宋徽宗赵佶，南宋时陆游、朱熹、姜夔、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都很高，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誉。

第六章

大元一统



来自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者建立起的大蒙古国，通过血腥的征服拥有了广阔的疆域。尽管在内部他们分裂、对立，而且互相攻伐，但在广义上，蒙古人构造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大环境。到了成吉思汗的第三代，蒙古人狂热的征服欲望终于开始消退，这对于他们周围的国家和地区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来说，进攻的停止几乎就意味着失败的开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元朝对中国的统治只持续了一百零八年就结束了，其他几个汗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作为大蒙古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元朝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定位在中原正统王朝。虽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王朝，但与其他几个汗国一样，元朝也是在自身本色文化与被征服地的传统文化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是自身势力被瓦解的重要原因。

第一节 大蒙古国

12、13世纪的中国处在多政权并立对抗的状态，各国间彼此争战，互相牵制，给周边的部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在历经种种艰苦磨难之后，成吉思汗将草原部落统一，转化为游牧背景下的国家，并且向文明社会发起了挑战。原始的天命观念使他相信自己受命于上天，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因此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征服行动。在他之后，他的子孙继承了这种坚定的信念，不断为建立世界帝国而努力，三代人用了六十年左右的时间，营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对欧洲和亚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后来内部的纷争使他们迅速分裂，在被架空了的大蒙古国的名义下，形成了五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一、一代天骄

在12世纪的漠北草原上，生活着一些游牧部落，他们有各自的势力范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土地和属民，还因为彼此间的仇恨，在各部之间、部落内的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在当时的民歌里，草原的情况是这样的：“星宇团团转旋，各部纷纷作乱。谁能在床铺上安睡！都去掠夺财源。大地滚滚腾翻，天下到处作乱。谁能在被窝里安睡！人们相杀相残。”

1162年，刚刚战胜了世仇塔塔儿人的蒙古部乞颜氏首领也速该得到了一个儿子，按照蒙古人的风俗，他用他俘虏的敌人首领的名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在铁木真九岁的时候，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他的部众随即风流云散，铁木真母子陷入了困窘之中。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伦是蒙古族女性的典范，在她的艰苦努力下，铁木真和几个弟妹妹长大成人，家族重新兴旺起来。

为了振兴家业，铁木真用新婚妻子的嫁妆博取了克烈部的首领王罕的欢心。依靠家族的名望和王罕的支持，铁木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就在这时，世仇篾儿乞部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为了复仇，铁木真请求王罕和儿时的朋友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出兵相助。三人联手，大败篾儿乞部，铁木真因而获得大批人口、财物和牲畜，成为草原上的新兴势力。

在孩童的时候，铁木真和札木合曾经两次交换礼物结为安答。安答就是结义兄弟，按照草原风俗，做了安答，就要“一个性命般不相舍弃，作性命的救护”。经过这一次事件，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这种关系只维持了一年多，两人之间就渐生隔阂。铁木

真的势力越来越大，而札木合也早有争霸草原的野心，多年的友情抵挡不住权力和财富的诱惑，两人终于分道扬镳，不久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争斗。

独立后的铁木真在乞颜贵族松散联盟的推举下，被选立为汗。当时蒙古人最尊崇的是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进行选举会议的时候，一个著名的萨满声称他听到神谕：“天地商议好，要教铁木真做国家之王。”这对扩大铁木真的影响大有帮助。称汗之后，铁木真专门派人通知了王罕和札木合，前者表示了认可和支持，后者也叫铁木真放心。但是不久铁木真和札木合的部众之间的摩擦逐步升级，终于引发了大战。

札木合聚集了三万人马，分成十三个编队，在叫作“七十沼泽”的地方摆开了战场，铁木真也排出了同样的阵容。这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十三翼之战”。铁木真是这场战役的失败者，但是与札木合的残暴相比，他被人们认为有君主的气度，反而吸引了更多人前来归附。



成吉思汗像



双龙戏珠马鞍

元
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
阿腾席连镇成吉思汗陵藏
成吉思汗陵中收藏有三套传
说是成吉思汗使用过的鞍
具，这是其中之一。

1196年，铁木真与王罕联合，帮助金朝军队重创了塔塔儿部，这使他完成了为父祖报仇的愿望，还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并得到了金朝的封赏。当时金朝在草原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担任金朝的官职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地位。以后几年，铁木真先后消灭了泰赤乌部和塔塔儿部，占领了东部草原，使草原上出现了西面的乃蛮部、中间的克烈部和东边的蒙古部三足鼎立的局面。

王罕与铁木真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后者的壮大渐渐发生了变化。王罕对此深感不安，札木合乘机与他联合，对铁木真发动了突然袭击，铁木真受到重大打击。后来通过运用计谋，铁木真瓦解了反对他的联盟，王罕放松了警惕，札木合投向了乃蛮部。1203年的春天，铁木真向王罕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消灭了克烈部。王罕和他的儿子虽然暂时逃脱，但是不久后相继被其他部落杀死。

乃蛮是草原上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实力非常强大，他们的首领叫太阳汗。铁木真的崛起对乃蛮部震动很大，但是乃蛮部仍然没把他放在眼里，他们认为“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于是决定消灭蒙古。两军交锋之后，蒙古军锐不可当，很

快就把对手消灭了。就在这段时间，残余的蔑儿乞部也遭到铁木真的沉重打击。与铁木真较量了十多年的札木合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被手下交给了铁木真。面对曾经相约生死守护的结义兄弟，铁木真满足了札木合最后的要求，让他不流血而死。

二、蒙古扩张之路

草原上最后的胜利者铁木真在1206年召开了由家族成员、部下将领和归附的部落领袖参加的忽里台大会（忽里台的意思是大聚会。蒙古部落时期，首领们商议选举领袖、决定战争的重大事件的会议被称为忽里台）。从这次会议开始，蒙古大汗即位，必须经过忽里台推选成为定例。元朝建立后，忽里台制度作为皇室贵族的一种特权继续存在。新皇帝在即位前，仍然要召开忽里台加以确认。

会议进行中，草原上最有声望的萨满宣称最高的天神长生天告诉他已经把整个地面赐给了铁木真及其子孙，铁木真应该有普天下之汗的尊号，他的称号应该是“成吉思汗”。至于“成吉思”的含义，后人众说纷纭，有的说意思是“坚强”，有的说意思是“大海”。最近的研究成果是它来源于古突厥语。



意思是“可怕的”、“强健的”。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原来草原上各有名称的部落都归属在大蒙古国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蒙古族。

建立大蒙古国是成吉思汗精心准备的结果，其中的一些制度从消灭克烈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制定，建国以后更加完备。在这个新兴的草原国家里，成吉思汗和他的亲属们是蒙古各部落成员的“黄金家族”，是核心，千户制度是统治管理的重要基石。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的百姓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交给贵戚和功臣管理。千户既是基本军事单位，又是地方行政单位，下面又分为百户、十户。这种军民合一的制度，充满了草原特色，将国家牢固地控制在大汗手中。

直属于大汗的亲卫军是蒙古军队的精锐，叫做“怯薛”，成吉思汗扩充了这支部队。“怯薛”主要由各级贵族的子弟组成，是保护大汗的主力，成员的构成也有人质的含义，以防贵族们背叛。成吉思汗还设立了大断事官这一职位，掌握司法和立法，实际上还拥有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权力。在建国前后，成吉思汗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训言，后来又重新整理，全部写在纸卷上，编定为《大札撒》。

札撒就是“命令”、“法令”的意思。《大札撒》是大蒙古国的法典，以后每当新大汗即位，或诸王集会共议国家大事，都要先捧出《大札撒》诵读，遵照其中的有关条文行事。

大蒙古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带领着臣民以宗教般的狂热投入到新的征服中。在他的眼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是黄金家族的财产。乃蛮部和蔑儿乞部的残余被继续清剿，北方森林里的百姓和乞儿吉思部被征服，西域的畏兀儿部和哈刺鲁部主动归附。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开始寻找更富庶的土地和更强大的对手。

宋、金、西夏等政权的割据和对立，给成吉思汗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经过三次战争后，西夏首先表示臣服，这是蒙古军队首次击败一个强大的定居国家。接着，成吉思汗打出为祖先复仇的旗号，与金朝决裂。1215年，蒙古军占领了中都，随后对金作战的最高指挥权被成吉思汗交给了得力助手木华黎，他本人则将眼光投向了西方。

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逃走后，通过与花剌子模勾结，在1211年夺取了西辽的皇帝宝座，国号不变。得知这一情况的蒙古军于1218年发动了进攻，杀死了屈出律，西辽灭亡。



成吉思皇帝圣旨银牌

元

银质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成吉思汗陵藏

长22厘米，宽6.8厘米

牌的正面刻有“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字样，背面似乎是契丹字“走马”字样。据学者推测，此牌应该是大蒙古国初期模仿契丹制度而颁发的使用驿站的凭证，也是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就已经有驿站交通的实物证明。

成吉思汗陵

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东南约15公里处。成吉思汗死后被秘密安葬，地点成为历史之谜。后人为了便于祭奠，将他生前用过的官帐安放在阿尔泰山和肯特山之间的高原上，并建起八座白色的毡帐，作为成吉思汗象征性的陵寝，人称“八白室”。在以后的几百年中，八白室曾经多次迁移。1956年建成了现在的成吉思汗陵。



1224年,新即位的西夏国王决定改变与蒙古的关系,于是与金朝和谈,两个沦落的宿敌结成了“兄弟之国”,并且希望借成吉思汗西征未归的机会打击蒙古。对于这种背叛,成吉思汗当然无法饶恕。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亲自领军在1226年的秋天讨伐西夏。途中,成吉思汗在射猎时落马,受了重伤,但他不肯回师休养,继续进兵。

蒙古军的进攻势如破竹,几个月后包围了西夏的首都中兴府,而成吉思汗的伤势越来越重。1227年七月,六十六岁的成吉思汗终于不治。临死前,他命令手下将领秘不发表。三天后,西夏国王献城投降,被蒙古军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杀死,西夏灭亡。

成吉思汗的灵柩被军队护送着返回草原深处。为了避免消息外露,一路上他们将遇见的人和牲畜全部杀死。成吉思汗在一次打

猎时为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地,这个叫作起辇谷的地方成为这位著名的征服者最后的归宿,他被埋在地下深处。几十年以后,这里变成了森林,即使是守护墓地的人也无法找到埋葬他的地方。

三、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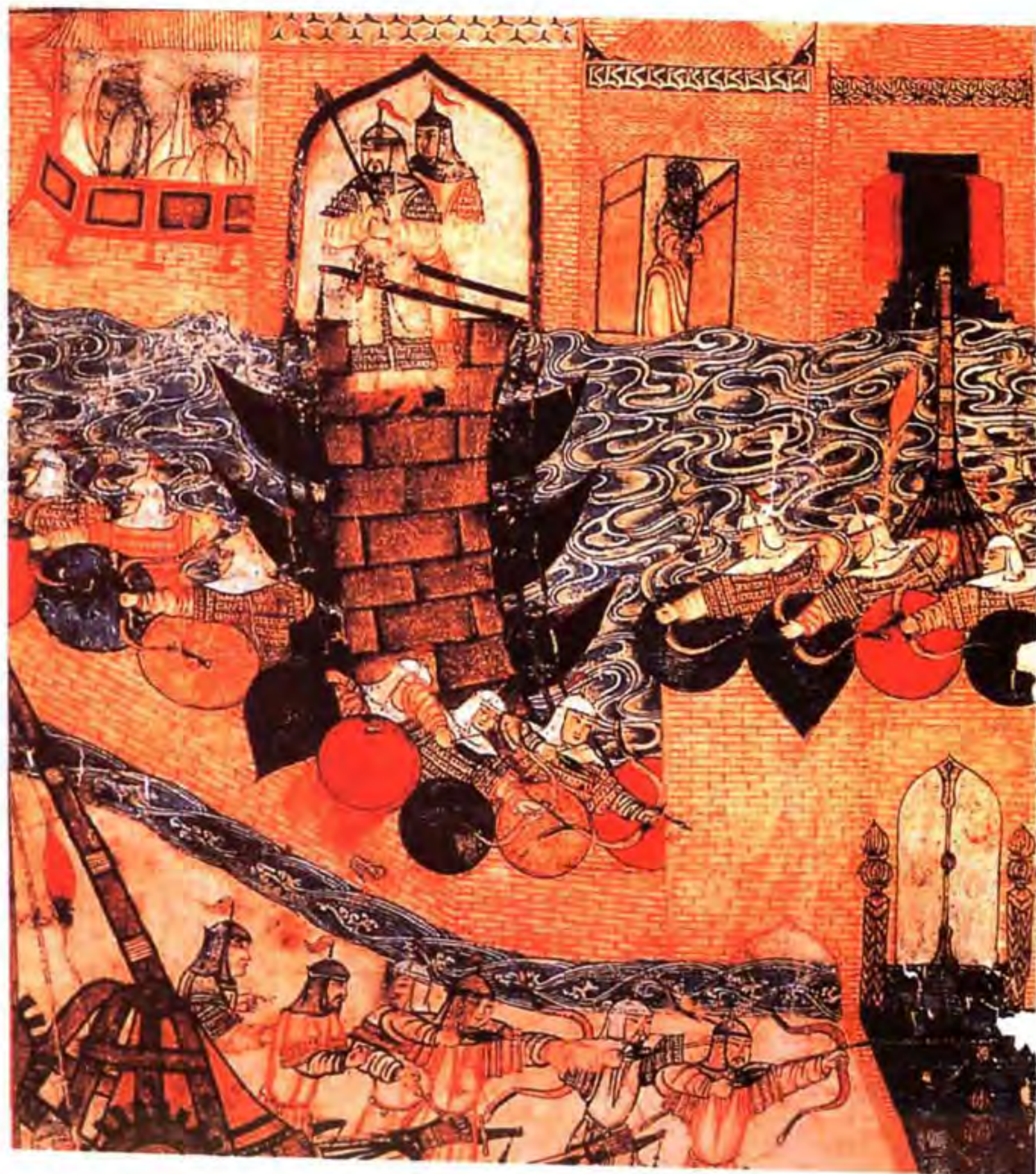
迅速崛起的蒙古国所表现出的强大实力,引起了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花刺子模的国王摩诃末极大的关注。他派出的打探虚实的使团在沦陷不久的中都附近受到了成吉思汗的欢迎。当时成吉思汗还没有把西方的广阔世界纳入征服计划,所以表示了与花刺子模和平共处的愿望,并在回复的国书中说,对摩诃末就像“对待我亲爱的儿子”,这是以长生天代言人自命的蒙古最高统治者表达最深切的亲密之情的方式,但是中亚的霸主却把这视为恶意的侮辱。不久,一支由蒙古人特意组成的四百五十人的庞大商队在摩诃末的命令下被屠杀,引起了成吉思汗极大的愤怒。随后他派去质问此事的使者中正使被杀,副使被削去了蒙古男人最重视的胡子后放回,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一封表达和平善意的国书却成了蒙古人征服西方世界的缘起,这或许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将对金的作战完全交付给得力助手木华黎后,成吉思汗亲自组织了西征的军团。十余万人的阵容以蒙古军为核心,还包括在历次战争中归附的汉军、契丹军、河西军以及一些草原部落。来自中原的工匠是蒙古军的新成员,他们给这支来去如风的铁骑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设备,战斗力大大提高了。1219年的花刺子模拥有四十万军队,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面对锋芒毕露的蒙古军,摩诃末选择了避免正面交锋、分散兵力固守重要城市的错误做法。几个月之

蒙古军攻城图

选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

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大蒙古国前后共发动了三次西征,本图描绘了蒙古军队在中亚地区进攻城市的景象。



后，花刺子模的城市相继陷落，纷纷遭到蒙古军的屠杀和掠夺。成吉思汗自称是上天的鞭子，前来惩罚这些罪人。幸存者心有余悸地回忆当时的情况：“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摩诃末被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追得无处藏身，1220年年底病死在里海的一个小岛上。他的继承人札兰丁一直坚持抵抗，但已无力回天。

结束了征服花刺子模的战争，成吉思汗回军蒙古，原先受命追击摩诃末的哲别和速不台则继续西进。在以后的三年里，这支孤军从今天的伊朗转战到阿塞拜疆，越过高加索山，在里海以北的欧亚草原上击溃阿速人和钦察人，然后在伏尔加河西、莫斯科和基辅一带消灭了俄罗斯诸王公与钦察的联军，之后一直挺进到克里米亚半岛。最后在1223年底，他们赶上了成吉思汗回军的队伍。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圆满地结束了，横跨欧亚的帝国已经形成。

窝阔台登上大汗的宝座后，又一次筹划对西方的征服。这一次的行动被后人称作

“长子西征”，因为各支宗室和各级贵族都派出了自己的长子领军出战，但最高统帅拔都却是位次子，由于他是术赤的继承人，所以他是宗室诸王的领袖。速不台以先锋的身份再次加入西征的队伍。在灭亡不里阿耳，征服钦察，使俄罗斯诸公国相继败亡之后，总数在十二万人以上的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在察合台的长子拜答儿和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合台的率领下进攻波兰，击溃了波兰西里西亚联军、日耳曼十字军和条顿骑士团的联手抵抗，然后转向匈牙利。拔都和速不台则带领主力直取匈牙利，攻陷首都佩斯，挺进维也纳，越过多瑙河。在危急时刻，匈牙利的国王曾经向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两个人——教皇和德国皇帝求援，但是他们正在忙于争权夺利，无暇旁顾。在蒙古军准备进入欧洲的心脏地区的时候，解救了欧洲人的是大汗窝阔台本人，他在1241年年底去世，为了筹备选出新的领导者，西征兵马开始东归。

第三次西征发生在蒙哥在位期间，由他的六弟旭烈兀担任统帅。位于里海之南的木剌夷地区是这次征服的首要目标。控制这里

蒙古骑兵押送战俘图

选自波斯史学家拉施特所著《史集》

窝阔台即位以后，发动了第二次西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子西征”。这幅图画描绘了西征的蒙古军队用木枷押送战俘的场面。



的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亦思马因派，教徒经常从事暗杀活动，甚至已经威胁到了远在哈刺和林的蒙哥的安全。木剌夷在阿拉伯语里意为“迷途者”，是正统伊斯兰教徒对亦思马因派的称呼。消灭了木剌夷后，蒙古军又在1258年征服了被古代中国称为“黑衣大食”的阿拔斯王朝。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在顽强抵抗后宣布投降，遭到了长达十天左右的掠夺、屠杀和焚烧，死难者达八十万人。叙利亚是下一个受害者，很快被征服。伊斯兰世界有实力的国家最后只剩下埃及。这时大汗蒙哥去世，消息传来，旭烈兀决定回师参加忽里台大会，留下大将怯的不花继续作战。在与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的交战中，蒙古军先胜后败，最终几乎全军覆没。尽管如此，蒙古人仍然拥有了有史以来疆域最广阔的国家，尽管它的形成与分裂几乎是同时完成的。

四、成吉思汗的子孙们

成吉思汗虽然去世，但他仍然是所有蒙古人的精神领袖。他一生最大的乐趣是“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

取他们的一切，骑乘他们的战马，用他们的后妃填充自己的后宫”。他的儿子们曾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发生争执，他说：“天下土地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他这种对权力与征服的狂热深深地影响了黄金家族的成员们。

大蒙古国的第二代领导人窝阔台是个敦厚而有智略的人，在成吉思汗生前他就被指定为继承人。1229年，在怯绿连河的上游召开的忽里台大会上，他在二哥察合台的强力支持下登上汗位。窝阔台是成吉思汗各项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在他的领导下，大蒙古国彻底消灭了花剌子模和金，又开始进行对南宋的进攻。著名的“长子西征”为大蒙古国在欧洲拓展了大片土地。窝阔台不是一个只知穷兵黩武的部落领袖，在他的时代，蒙古人建造了第一座都城哈刺和林，各项制度进一步被完善。蒙古人在中原汉地只从事抄掠的作风也有所改变，在成吉思汗时代只能以卜筮者身份出现的耶律楚材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治理中原汉地所带给蒙古国的赋税一度被窝阔台大为欣赏，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因为善于横征暴敛的回回商人更受到大汗的重视。后期的窝阔台逐渐厌倦了处理公务，他更乐于将时间花在饮酒和打猎上。1241年在一次出猎的途中，窝阔台饮酒过量而死。

在汗位空悬的日子里，窝阔台的第六位皇后脱列哥那获得了摄政的权力，她借此改变了窝阔台传位给孙子失烈门的决定，将自己的儿子贵由推上了大汗的宝座。贵由个性强硬，以执法严峻而闻名，他在母亲死后才开始亲政，首先做的便是处死母亲所宠信的女巫和回回商人。贵由与术赤的儿子拔都在“长子西征”期间结下深怨，所以在1248年他开始西巡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要前去

窝阔台像

元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绢本

纵59.4厘米，横47厘米

窝阔台（1186—1241）是成吉思汗第三子，在成吉思汗死后继任大蒙古国大汗，于1229年至1241年间在位，元朝建立后被追赠为太宗。



攻打拔都。蒙古帝国的内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他却在途中不明原因地死去。贵由的正妻斡兀立海迷失顺理成章地开始摄政，这个沉溺于巫术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儿子将蒙古国搞得一片混乱。

拔都用自己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推举拖雷的长子蒙哥为大汗。这个难以被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接受的建议，在拖雷的遗孀、蒙古历史上最著名的贤母唆鲁和帖尼的斡旋下最终成为事实。1251年夏天，各系诸王和贵族在忽里台大会上共同推举蒙哥为大汗。在随后七天的庆祝活动中，窝阔台的三个孙子进行偷袭的企图败露，蒙哥乘机在帝国内部进行清洗，沉重打击了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的势力。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而且是蒙古统治者中少有的不喜欢宴饮游乐和奢靡生活的人。为了巩固汗位，他以两个兄弟为羽翼，旭烈兀负责新的一次西征，忽必烈则“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主管灭宋的军事行动。在即位之初，蒙哥试图革除积弊，更新庶政，但几乎没有成效。他曾经自豪地宣称“尊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被蒙古人看作是成吉思汗精神的化身。蒙哥浓厚的保守色彩与忽必烈的新政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险些兄弟反目。

1259年，蒙哥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病死，大蒙古国因此走向分裂，到了忽必烈时代，终于形成承继蒙古大汗正统的元朝与成吉思汗诸子后裔分别掌控的四大汗国并立的局面。

第二节 天下混一

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如何对待被征服的领土一直是蒙古人面临的问题。变早期的



《觀見蒙古大汗图》

选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
这幅图画记录了各国使者觐见窝阔台汗的场景。

肆意掠夺为管理经营，是统治者们观念转变的结果。因推行汉化政策而获得中原人士支持的忽必烈，获得竞争最高统治地位的资本，并且最终获得胜利，但因此他也失去了大蒙古国大多数领土。他将草原国家改变为中原王朝正统的延续，但是又对汉族士人深怀戒心，还要面对来自蒙古保守势力的压力，导致了国家政策总在遵循蒙古旧俗、用回回人理财和执行汉法之间摇摆不定。前后用了四十四年时间，南宋被平定，中国再次恢复到统一状态，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王朝的开端。

一、西藏归附

在蒙古人的铁骑不断寻找新的对手展开攻击的时候，青藏高原上的人们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这时的西藏大地已经在分裂中度

过了近四百年的时光，佛教重振后新生的各个教派势力大增，占有大量的僧俗民户、土地和游牧部落。原来扶植佛教的地方领袖反而要仰仗高僧们的声望，或者直接依附，或者进入佛门，将世俗的权势与宗教的力量融为一体。止贡、萨迦、帕竹等几个教派最具影响力，势力远及青海、四川、阿里等地，但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能令西藏重新统一的威望和实力。虽然大敌即将来临，这些势力仍然各自做着打算。所以在蒙古人的注意力投向西藏之前，有些势力就已经派人寻找各种途径表示归顺，并且与一些宗王建立了依附关系。

窝阔台继位后，派他的次子阔端驻守凉

州，正式开始经营西藏地区。1240年，蒙古将领多尔达赤率领一支部队深入西藏，对归顺的势力进行招抚，遇到抵抗就武力镇压，很快就抵达了前藏的腹心地带。当时在藏区最为显赫富足的教团是以止贡寺为中心的止贡派，他们没有也不打算投降蒙古人。寺主京俄大师的近侍积极组织抵抗，但还未成事就被俘获，京俄大师只好亲自前往蒙古军营挽救。大师对蒙古人说法，而且赢得了对方的尊敬和照顾，当然这是在他纳款归顺、奉献了辖下地区的户口名册以后的事情。止贡派的遭遇给了其他地方，尤其是还持着观望态度的人们一个警告，各地方势力纷纷放弃了武装抵抗的想法，多尔达赤因此顺利地完成了使命，拆除了各个地方的武装据点，将全藏纳入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

接下来蒙古人需要找到一个能够代表西藏的人。根据多尔达赤带回来的情报，“在边地西藏，僧伽以嘎当派最大，最讲脸面的是达隆的法主，最有声望的是止贡派的京俄，最精通教法的是萨迦派的班智达”。他们首先找到了有过接触的京俄大师，要求他给蒙古人做应供喇嘛。京俄大师显然心有余悸，转而推荐了萨迦派的班智达。

班智达是对精通佛法以及各种相关知识的高僧的敬称，这位宗教领袖的法名是贡噶坚赞桑布。他出自有着悠久历史的贵族款氏家族，先辈有许多著名的僧人。借助吐蕃王朝崩溃的机会，款氏家族占有了颇具规模的领地和属民，当佛教重新在西藏流传时，这个家族重投佛法怀抱，建立了宗教权威与世俗势力紧密结合的萨迦派教团，班智达是萨迦派的第四代领袖。在他的领导下，萨迦派已经成为后藏地区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

使者带着阔端的令旨和礼物抵达萨迦，六十三岁的班智达收到了一个恩威并施的邀

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

明 成化

西藏萨迦寺藏

布画唐卡

纵约90厘米，横约60厘米

本画是系列唐卡《八思巴画传》中的一幅，内容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八思巴离开萨迦寺前往凉州会见阔端。





请。阔端威胁说如果班智达不去，蒙古大军将前来追究此事，这对西藏的佛法和众生将是残酷的打击；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优渥的条件，即把西藏的僧侣都交给班智达管理。班智达从中看到了能给西藏带来安定，并且使萨迦派发扬光大的机会，因而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决定前往凉州。1244年年底，班智达带着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出发了。西藏僧俗大众都非常关注此事，一路上他们与各派领袖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收到众多希望帮忙加以护持的请求和礼物的同时，也接受了对其动机的质疑。班智达表示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不使蒙古军队危害西藏地方，这种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即使抛弃身体性命也要去做。

一年半以后，班智达到达了凉州，但阔端已回到蒙古去参加选汗大会，他们在第二年的正月才得以见面。阔端对班智达能够前来表示非常满意，尤其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的随同，仿佛是政治交易中常见的人质，表现出这位高僧十足的诚意。以西藏方面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的班智达通过畏兀儿翻译与阔端进行会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他为阔端治好了顽症，赢得了对方进一步的信

任。西藏的命运在这两人的手中被决定了。达到了目的的班智达给西藏僧俗领袖们发出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在信中，既确认了西藏归附蒙古、成为蒙古的属地，规定了西藏人应尽的义务，又保证了各方首领归附后的利益，而且还确立了萨迦派在西藏僧俗中的领袖地位。

从此，在蒙古人的统一管辖下，西藏的分裂局面至少在表面上已不复存在，而且作为疆土的一部分，在蒙古由草原国家向中原正统王朝转化的过程中，西藏正式进入了中国版图。

二、漠南汉地的管理者

拖雷的第四个儿子忽必烈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之中是个特殊的人物，相较其他对征服和财富的单纯爱好，他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对被征服地区和人民的统治和管理上。像其他蒙古人一样，忽必烈最初对中原文化的认识也是来自宗教人士。曾经受到成吉思汗重视的僧人海云告诉他，谋求治国之道应该求助于儒家，并向他推荐了子聪。这位后来改名为刘秉忠的著名人物当时只是个普通

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

这个局部描绘的是萨迦班智达带着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离开萨迦寺，途经日喀则和羊八井，来到拉萨。

僧人，但是学识极为广博，“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掌”。他对儒家经世致用的理论和蒙古人最感兴趣的卜筮占星等诸般杂学都十分精通，于是立即受到了忽必烈的欣赏。

在刘秉忠的引领下，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几乎是同时，精通蒙语的儒者赵璧被请到了忽必烈身边。没有语言的隔阂，使赵璧能够向忽必烈教授更多的东西，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宠爱和信任，忽必烈的王妃甚至亲自为他做衣服。在刘秉忠和赵璧的援引之下，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聚集到了忽必烈的周围。

1251年的忽里台大会使大汗的位置从窝阔台系手中转移到拖雷家族。蒙哥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两个弟弟作为臂膀，委以重任：旭烈兀继续西征这一伟大事业，忽必烈则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并且筹备灭宋战争。为此，忽必烈将自己的藩邸南移到桓州一带的金莲川，开设幕府，广招贤能。尽管根本不懂汉文，但忽必烈还是接受了智囊们赠给他的“儒教大宗师”称号，扮演起中原文化保护者的角色，这使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此时在他身边有众

多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理学宗师有窦默、姚枢、许衡等，金朝遗士有张德辉、郝经、王鹗等，汉军领袖有张柔、严实、史天泽等，还有被称为“廉孟子”的畏兀儿人廉希宪、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回回重臣赛典赤·赡思丁和西夏人高智耀等其他各族的优秀人物。正是这个庞大的幕僚集团逐渐将忽必烈推向权力的巅峰。

经过谋臣们的筹划，忽必烈交还政权和财权，以避免大汗的猜忌，与此同时，他获得蒙哥的支持，在中原地区开始了他治理国家的尝试。漠南汉地，在金朝灭亡以后险些在蒙古贵族建议下变为牧场，幸好耶律楚材用治理后所能获得的赋税打动了窝阔台的心，才得以保存。后来伊斯兰商人用更高数目的金额将税收从蒙古人手中承包下来，后果可想而知，这片土地变得越来越贫瘠，百姓也越来越少。雄心勃勃的忽必烈要改变这种状况。汉化的管理最初在邢州实施，成效很快显现出来，忽必烈于是着手在陕西、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进行改革。他改变税制，设立屯田，开辟漕运，发行纸钞，加强吏治，推广农业。几年后，这些地区局面完全改观，人口、赋税大量增加，这使忽必烈对儒家的治国理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平定大理归来后，忽必烈在1256年的春天作了一个重要决定，由刘秉忠主管，在金莲川附近建立一座城市。不到三年，开平城修筑完成。这是忽必烈的第一座城市，也是他管理中原的根据地，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势力的迅速增长让忽必烈受到了兄长的猜疑。蒙哥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钩考局”的机构，核查忽必烈的赋税。这些大汗的亲信在忽必烈管理下的地区大兴牢狱，罗织罪名，欲将忽必烈置于死地。突然陷入惊惧中的忽必烈几乎要起兵对抗，但在姚枢的建议

耶律楚材像



下，他将妻子儿女送往和林作为人质表示忠诚，并亲身去见蒙哥，获得了对方的谅解。危机虽然过去，信任却很难重建，蒙哥虽然没有进一步打击忽必烈，但是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权力，并且将攻宋的指挥权收回到自己手中。

1258年，蒙古大军正式南下，原本应该担此重任的忽必烈却在家中赋闲。为了摆脱困境，他主动派人向蒙哥表示，希望能够助兄长一臂之力。恰好东路军的统帅十分不力，蒙哥再次起用忽必烈。重获军权的忽必烈一边稳步进军，一边将原有的势力逐渐恢复。1259年，在东路军准备渡过长江的时候，传来了蒙哥死于钓鱼城下的消息。为了不放弃战机，忽必烈将大军推过长江，包围了鄂州。这时从他的妻子那里传来了坏消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正在联络宗室亲贵，聚集军队，准备宣布继承汗位。忽必烈匆匆迫使南宋签下以长江为界，宋岁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然后急忙北返，去与自己的弟弟竞争大汗的宝座。

三、元朝建立

蒙哥的突然去世给大蒙古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他在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使帝国内部分裂的暗流表面化。1260年3月，从征宋前线匆匆赶回的忽必烈迅速召集了一批支持他的宗王，在开平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再三逊谢了诸王的推举后，忽必烈如愿以偿地宣布继任蒙古国的大汗。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哈刺和林做了同样的事，蒙古国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两个大汗同时在位的局面。战争随即爆发，兄弟间的争夺持续了五年，以阿里不哥的降附告终。阿里不哥没有受到太重的惩罚，但在几年后可疑地病死。

为了即位的合法性，忽必烈通知各路宗

许衡像



王准备在1267年召开一次盛大的忽里台大会，正式进行选举，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就在这几年里，大蒙古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就各有打算的几个汗国，借这次兄弟争位的机会纷纷走向独立。大蒙古国的分裂成为事实，忽必烈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当时能够掌握的地域只剩下蒙古草原、北部中国、云南、西藏、新疆的东部和南部，从此以后，承继大汗世系的元朝皇帝只是蒙古诸汗国名义上的共主。

1268年，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以大汗正统自居，联合察合台汗国，对忽必烈发动了攻

忽必烈像



刘秉忠像



击。1276年，蒙哥的儿子昔里吉率领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后裔对汗位提出了挑战。1287年，原先支持忽必烈的宗王乃颜也发动叛乱。后两者很快都被镇压了，最具危害性的海都之乱直到忽必烈死后才被平息。这些叛乱的发生一方面源自诸人对至高权力的覬覦，另一方面则反映出蒙古内部对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不满。

在争夺汗位的过程中，忽必烈在蒙古方面缺少有力的支持，这使他更多地依赖汉地的资源和汉人的力量。幕僚们竭尽全力将这

位新任大汗包装成中原皇帝，并且使用了蒙古国第一个年号“中统”。这无疑是昭告天下，忽必烈延续了中原王朝的正统。汗位之争结束后，年号又改为“至元”。在新政府里，机构的设置很像中国传统模式，行政官员也以汉人或者汉化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为主，在大蒙古国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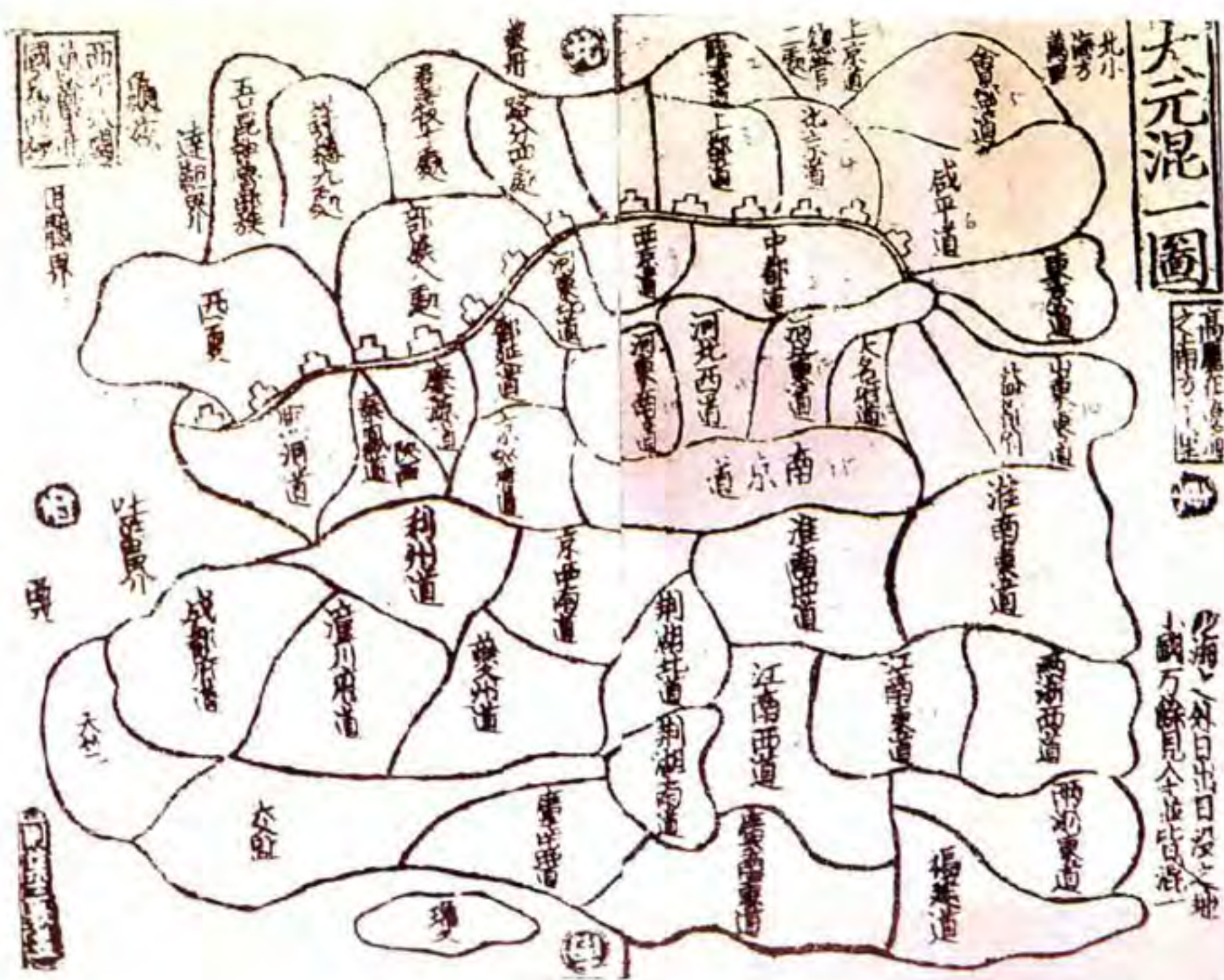
然而不久之后，雄踞山东的汉军世侯李璘趁着争汗位之战正激烈的时候，突然在1262年发动兵变。叛乱只坚持了四个多月就被平息，但是影响很大。忽必烈对众多的汉军世侯和汉人大臣失去了信任，朝廷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央集权加强，成立枢密院掌管全国军队；地方上军民分治，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世侯们不但兵权被解除，而且不再世袭，领地也被收归国有；蒙古人在政府中的比重加强，而且进入中书省，出任丞相；大力提拔不精政治但是擅长聚敛的回回人，以牵制汉人。一系列的变化都是针对汉人的，表现在政府里，就是逐渐形成了以蒙古人为首，汉、回互相制约的局面。

在即位的第二年，忽必烈就下达了进攻南宋的命令，但复杂的局势使这一决策直到1268年才得以正式实施。他接受了降将刘整的建议，将蒙古军进攻的重点放在了长江中游的襄樊地区。五年后襄阳的陷落，预示了南宋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灭宋战争正紧张进行的时候，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在1271年的十一月正式将国号改为大元。这个名字出自《易经》，所谓元，指的是大，大到无法形容就称作元，意思是大到了极点，这里用以概括新兴国家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土。此后，大蒙古国这个名称在汉文文书中就不再使用，但也没有废除，蒙文文书中还继续沿用，通常是与大元并称，写作“大元大蒙古国”或称为“大元

《大元混一图》

此图被收录在南宋陈元靓撰著的《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为至顺年间翻刻该书时所增补。此图中元朝全境分为三十七道，并画出了长城的位置。邻国交趾、天竺也被收入。



的大蒙古国”。次年，正在兴建中的燕京更名为大都，成为元朝的首都，上都开平变为陪都，完成了统治中心从漠北向中原的转移。第三年，忽必烈的儿子，三十一岁的真金正式被册立为皇太子。

1274年的正月，忽必烈在刚刚落成的皇宫中主持了新首都的第一次朝会。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煞费苦心制定出的朝廷礼仪正式开始应用，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蒙古统治者与儒家传统结合在一起。朝会之后，灭宋的议题再次成为朝廷的焦点。在臣子们充分发表了意见之后，忽必烈作出了灭亡南宋的决定。来自伊利汗国的伯颜被任命为灭宋主帅，出师前忽必烈借用北宋大将曹彬的故事希望他在江南不要滥杀。这意味着蒙古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276年，南宋政府决定归降。三年以后，南宋最后的力量在崖山全军覆没。自五代以来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终于得到了统一，一个规模空前的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四、四大汗国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从父亲手中得到的是自也儿的石河以西直至蒙古军队马蹄所及之处的土地，术赤的次子拔都在窝阔台去世后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北达今北极圈一带，南越今高加索山，直至伊朗之地的广阔疆域上建立起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先是拒绝接受贵由的命令，继而通过拥立蒙哥获得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名义上钦察汗国一直尊奉延续蒙古大汗正統的元朝皇帝为宗主，接受皇帝的册封和岁赐，礼仪上处于宗藩地位，两国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往来。拔都的弟弟别儿哥成为黄金家族中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君主，他因为领土争端和不满旭烈兀西征时残酷屠杀伊斯兰

教徒而与伊利汗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14世纪初，钦察汗国已经演变成为伊斯兰国家，不久开始走向衰落。从15世纪20年代起，钦察汗国陆续分裂出若干突厥化的蒙古政权，在1502年，钦察汗的正统政权灭亡了。

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刺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成吉思汗自中亚回师后，察合台受命留在西城镇守。成吉思汗去世以后，察合台开始逐渐吞并蒙古国在西域的领地。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时候，察合台的后代阿鲁忽背叛了阿里不哥，以换取忽必烈承认他拥有东自金山、西及阿姆河这片广阔地区的实际控制权。窝阔台之孙海都一度控制了察合台汗国，但他死后，他扶植起的笃哇反而在元朝政府的扶持下将窝阔台汗国逐渐削弱，并且兼并了大片领土。14世纪前期，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前者掌握窝阔台汗国旧地，后者控制河中地区，并改信伊斯兰教。1370年，西察合台汗国被帖木儿帝国所灭。1487年，在长期的内战以后，东察合台汗国也彻底分裂了。

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是窝阔台得到的封地，他继任大汗以后，将这块土地给了儿子贵由。1251年，汗位转入拖雷家族，由于窝阔台的几个孙子袭击蒙哥的阴谋败露，窝阔台家族遭受了一次不明显

察合台汗国银币

新疆征集
银质

直径3.5厘米，厚0.15厘米
大蒙古国分裂以后，察合台汗国占据了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刺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的广阔地区。而且保持了与元朝的密切关系，但是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枚银币用打印法制成，正面有库法文和阿拉伯文。





蒙古骑兵作战图

选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

蒙古军队以强悍的骑兵进攻名满天下，在开拓大蒙古国疆土的历次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本图描绘的是蒙古骑兵在中亚地区作战的情况。

的打击。虽然在表面上看，除了几个首犯，没有人受到惩罚，而且家族成员纷纷获得封地，但实际上，窝阔台家族的领地被分割成了若干小块。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窝阔台之孙海都乘机把窝阔台系宗王的力量网罗到自己部下，与忽必烈展开了长期的对抗。不久，他又将察合台汗国变为附庸，然后四处扩张。海都死后，他的儿子察八儿被察合台汗国的笃哇控制，在1304年与元朝实现和平。随后，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被察合台汗国侵蚀殆尽。察八儿一度想利用察合台汗国内部混乱的机会恢复疆土，但没有成功，只得投降元朝，窝阔台汗国最终灭亡。

蒙哥即位后，旭烈兀受命进行第三次西征，推翻了阿拔斯王朝。蒙哥死后，为了争取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将他所征服的土地全部赐给了他。1264年，旭烈兀正式被册封为伊利汗，意为从属的汗，一个新的蒙古汗

国在西亚的土地上出现了。伊利汗国的极盛时代，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临地中海，领有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北至太和岭和花刺子模，南濒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为了对抗钦察汗国和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伊利汗国曾经与基督教世界结盟，旭烈兀之子阿八哈还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女儿为妃。当看到基督教世界无法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后，伊利汗国的领袖开始转向伊斯兰化。第三代大汗阿合马首先宣布皈依真主，但是被部下杀死。直到合赞汗统治时期，在强有力的军队支持下，才完成了伊斯兰化的改革。在所有汗国中，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关系最为紧密，这与伊利汗和元朝皇帝之间的血缘最近很有关系。各代伊利汗的袭封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批准才为合法，在他们发布的诏敕、国书中和铸造的钱币上，大汗（也就是元朝皇帝）都排列在伊利汗的前面。两国间的政治、文化、科技交流都非常密切，双方相互影响，始终友好和顺。合赞汗的侄子不赛因继位后，内有权臣党争，对外则战事不利，国家渐渐衰落。不赛因死后，各地蒙古贵族纷纷各自选择领袖拥立为汗，互相攻战，汗位屡屡更迭，五年中换了六个伊利汗，国家陷于分裂。1388年，伊利汗国为新兴的帖木儿帝国所灭。

第三节 新的疆域

在蒙古政权向中原正统王朝转变的过程中，西藏和大理作为新的领土被并入中国版图里。这两块土地都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因此元朝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管理。在西藏，政府没有设立行省，利用有威望的宗教领袖代行行政管理权，与中央的官

员一同完成了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的设置、清查户口和建立驿站等工作。对云南，则采取重臣出镇的方式，建立行省，安抚地方少数民族势力，推动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宣政院与西藏

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迁都燕京，设置了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管理西藏地区行政事务。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这样，作为宗教领袖的八思巴正式拥有了行政职权。所以，当第二年八思巴与其弟(已被封为白兰王的恰那多吉)返回阔别二十一年之久的西藏的时候，身份不仅是萨迦派教主、全国佛教领袖，同时也是蒙古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娶了蒙古公主的恰那多吉更有着宗亲出镇的意味。

在西藏，八思巴秉承忽必烈的意旨，会合各派僧俗领袖，对西藏的行政体系进行了规划。他参照蒙古政府的行政体制，以及西藏地区的惯例，将不包括阿里地区在内的卫藏地区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并区分俗人民户和寺属民户，明确了僧俗领主与农奴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八思巴建立了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地方政权——萨迦政权。在一些藏文史料中，往往将其称为萨迦王朝，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忽必烈即位后，收回了宗室诸王在西藏的分地，只保留了一直支持他的旭烈兀占有的部分，其目的就在于使西藏完全控制在中央政权之下。就此而言，八思巴所建立的萨迦政权，只不过是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代表而已。

1270年，回到大都的八思巴被晋封为帝师，从此，帝师成为朝廷的常设职务。帝师的地位极其崇高，既是皇室的宗教导师，又是天下佛教的领袖，同时也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首领，享有很大的特权。总制院则顺

理成章地改为由帝师兼领。至元二十五年(1288)，八思巴去世八年后，总制院改名为宣政院，地位与中书省、枢密院等平行，仍由帝师兼管院务。宣政院下辖三大宣慰使司，分别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再下，则有安抚使、招讨使、万户、千户等。万户以下官职都是任命当地僧俗上层人物担任，并可世袭。

除了由宣政院管理之外，西藏地区同时还是忽必烈第七子奥鲁赤一系的封地，他们以镇西武靖王的名义掌管西藏地区。但他们的任何举措，都要经过宣政院的同意。

因为有着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两代人所做的努力，萨迦派在西藏政局中占有着绝对的优势。根据忽必烈和八思巴所规划的西藏行政体系，西藏地方政权的最高首领是帝师。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的帝师共十四人，除去三名代理帝师之外，七人出自萨迦款氏家族，四人则是八思巴的门生弟子，可见萨迦一系的威权。帝师在大都期间，政权则由萨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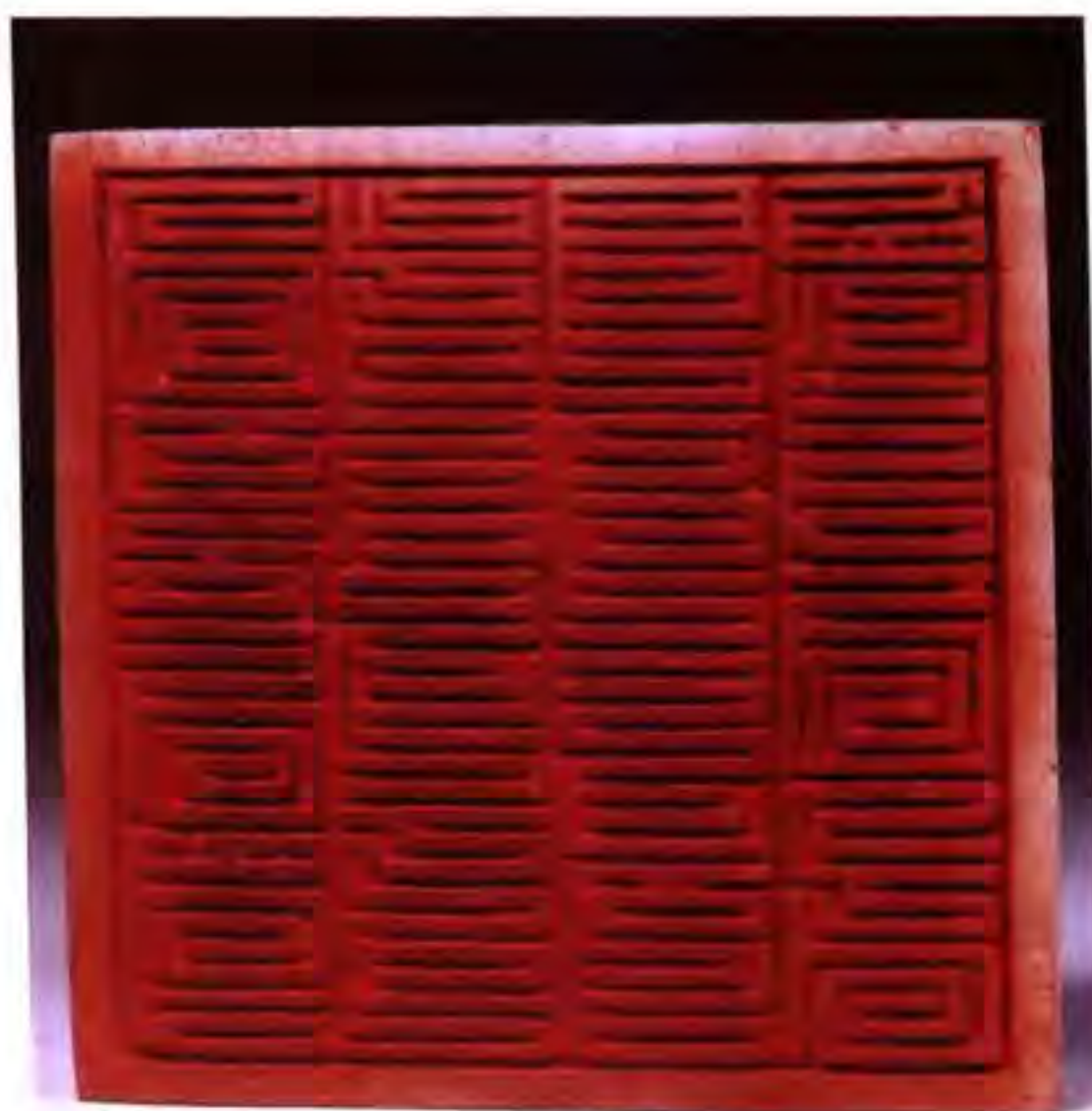
西藏博物馆藏

高8.1厘米，边长9.6厘米

1270年，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帝师，以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帝师制度。帝师是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官员，也是皇帝的西藏事务顾问，对管理西藏有一定权力。由于八思巴的关系，帝师的人选只出在萨迦款氏家族及其嫡系弟子。1292年，曾任八思巴副祝长老、第三代帝师达玛巴拉侍从的扎巴沃色(1246—1303)继任第五代帝师，1295年元成宗将这枚玉印赐给了他。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
释教之印

印文为八思巴字拼写藏文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
兴释教之印”。



迦寺的住持主持。萨迦政权领袖的主要职权包括宗教、行政、人事几个方面。而具体执行者，则是位在帝师和萨迦住持之下的萨迦本钦，这一职务类似蒙古的断事官，职权范围很广，大到登记户籍、领兵出征、审理案件，小到从驾出行等事务。另一重要职务是朗钦，意为内务大管事，主管政权内务。

虽然萨迦政权得到了元朝政府的充分支持，但政府也并非就此完全放手。第二任萨迦本钦贡噶桑波在职时，行为跋扈，残酷暴虐，导致了噶举派的对抗和萨迦政权内部的分裂。忽必烈闻知此事，派桑哥领兵入藏，将其处死。由此可知，萨迦政权虽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但其行为仍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

13世纪90年代，萨迦政权与其他教派的矛盾再次激化，噶举派的分支止贡派经常与之发生冲突，最后竟从伊利汗国请兵进藏助战。当时的萨迦本钦阿迦仑被迫求援于中央，忽必烈派兵三千入藏，最终烧毁止贡寺，杀死许多止贡喇嘛。

到了帝师贡噶洛追坚赞时代，萨迦政权内部的矛盾也已十分明显，于是分裂为四个支系，轮流执政，萨迦政权开始渐渐衰落。到了14世纪中期，萨迦政权已经处在内忧外患

的境地，山南贵族朗氏家族控制的帕竹噶举派的领袖绛曲坚赞乘机蓄积力量，于1354年击败萨迦政权，统一卫藏地区，建立帕竹地方政权，并获得了元朝政府的认可。

二、云南行省

在蒙哥即位后开始的新一轮征服中，“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受命攻取大理，为灭亡南宋做准备。忽必烈与大将兀良合台于1253年秋冬时节率领十万大军借道吐蕃，攻入大理境内。大理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国都大理城就被攻克。此后，忽必烈北返，将余下的事务交给了兀良合台。大理国王被俘后归顺，并且带领蒙古军平定了大理全境和周边部落。对忽必烈来说，这是他亲自夺取的第一块疆域，所以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元政府陆续在被征服的大理设立了各级管理机构，但是“役重税繁”，百姓极为困苦，这一地区仍然非常不稳定，武力反抗的事情时有发生。登上了帝国最高宝座的忽必烈对云南的局面非常忧虑，他认为自己抚恤百姓的心情虽然迫切，但是云南民众在内心还没有真正归顺，所以必须由重臣镇服。他在1267年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前往稳定政局。但是四年后，因为争权夺利，忽哥赤被属下合谋毒死。此事极大地震动了忽必烈，他决定把大理的军政权力集中起来，设立云南行省，并派亲信赛典赤·赡思丁承担治理的重任。

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徒赛典赤·赡思丁自窝阔台时代就已经担任重要官职。他擅长掌管财赋，长期以来一直是忽必烈的得力帮手，在忽必烈设立中书省的时候是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受命以后，赛典赤·赡思丁做了充分的准备，先

对云南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1274年，他到达云南，首先与敌意很强的宗王脱忽鲁理顺了关系，解决了高层内部的矛盾，随即将各级军、政长官都置于行省的统属之下。大理国归附后一直保有优厚待遇的大理国王段氏后裔被提升为大理总管，但失去了大部分权力，而且势力局限在大理地区。同时，全省的地方政权都进行了改革，与全国的行政建置统一起来，置于元朝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彻底结束了自南诏以来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对于当地少数民族势力，赛典赤·赡思丁一改蒙古人的暴力统治作风，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在不长的时间里基本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做到了历代君主包括本地统治者都未能做到的事情。赛典赤·赡思丁非常善于和敢于使用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段氏后裔为首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云南行省的各级官吏中占有很大比重，有效地将元朝政府的管理实施到基层。最为云南百姓感念的是赛典赤·赡思丁对云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力推动。他在云南开展屯田，兴修水利，引进

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推广。虽然大理国时期就对汉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而且非常重视教育，推广儒学，但总体来说，云南的文化还是很落后。赛典赤·赡思丁做了许多工作，设立儒学提举，建立文庙、社学，推广中原风俗，使云南的文化水平和民间习俗逐渐与内地趋向一致，中原的儒学文化、生活风尚在云南广为传播。

任职六年以后，赛典赤·赡思丁死于云南，他的努力让云南保持了二三十年的安定与繁荣。到了元朝的后半期，掌握了一支少数民族军队的大理总管段氏家族逐渐显露出了独立的倾向，与世代镇守云南的宗王梁王一系和云南行省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甚至武力相向。1363年，一支红巾军自四川攻入云南，梁王和行省官员仓皇出逃，被迫求助于当时的大理总管段功。段功大败红巾军，梁王因此将自己的女儿阿盖嫁给了他。三年后，由于猜忌，梁王毒死了段功，阿盖也绝食殉情而死，段氏与梁王间的关系因此完全破裂。

在元顺帝北逃十三年后的1381年，明军



大理城门

位于今云南大理。大理最早于764年建城，南诏、大理国都以这里为都城。在元代以前，大理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元代云南行省建立后，中心才由大理移至昆明。但是，大理仍然是滇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现存的大理城是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建后的格局。

击溃了元朝的守军攻入云南，梁王全家在滇池投水自尽，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结束。第二年，大理被平定，明军俘获大理总管，在云南地区经营了四百多年的段氏家族的历史，就此宣告终结。

第四节 走向衰亡

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蒙古人做了许多尝试，但是所有的努力几乎都被他们自己破坏了。民族等级制度的实施使各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形成了足以瓦解社会安定的对立局面。在传统中原王朝里充当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些人虽然仍然保有一定地位和优越待遇，但政府事实上表现出的漠视令他们十分痛苦。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元朝中后期皇位的更替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斗争，草原的后代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而且失败的一方注定要被清除。胜利者来自不同的文化

背景，所以国家的政策总在发生变化。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执政的基础，一旦来自下层的反抗形成了足够的规模，曾经强大的帝国就会走到崩溃的边缘。

一、“四等人制”与“九儒十丐”

延续了中原王朝正统的元朝不但拥有空前广阔的疆域，更包容了众多的人口和繁杂的民族。从数量上讲，蒙古族是绝对的少数，因此，如何有效地对被征服者加以统治，维护自身的地位，对蒙古统治者们来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元朝政府实行了被后人总结为“四等人制”的民族政策。

“四等人制”这个词并不见于元朝任何典章文献，但当时的许多法律制度都体现了它所包含的精神，到了忽必烈时代的后期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制度。“四等人制”的核心就是将元朝领土内的民众划为四个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充分保障蒙古族征服者的优越地位和统治权，对被征服民族进行压制和分化。

《元典章》中关于“四等人制”的记载

“四等人制”是后人根据元朝的各项制度总结出来的，在当时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有关的法律规定都分别出现在各项诏旨、敕令和文书中。《元典章》是一部元代政书，收录了大量相关内容。左图是关于色目人和汉人相参任官的规定，右图是关于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女真人和汉人奴隶的规定。



这种制度将元朝的属民按降附时间的先后和政治上的可靠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居于最顶端的是以黄金家族为核心的蒙古族。13世纪时，蒙古人大约不到百万，移居中原的不过三四十万，他们中间除少数权贵官僚外，大多属于军队。在蒙古人之下是色目人，这实际上是元朝政府为了牵制汉族、协助统治而设置的一个群体。色目是各色名目的意思，色目人的字面含义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主要指以回回人为主的来自西北和西域的人们，西藏人也在其中。究竟色目人都包括什么人，官方没有明确的界定，以致各地执行政策时经常产生疑问。元朝中期，有一次中央政府这样指示地方：“除汉人、高丽、蛮子人外”，都是色目人。在中原的色目人大约有三四十万。第三个等级是汉人，主要指淮河以北的原来金朝境内的居民。这部分人大约有一千万，以汉族为主，也包括已经汉化了契丹、女真、高丽人。四川、云南各族因为较早被征服，也被归入这一类。处在最底层的是南人，在籍人口有五千万，主要是汉族，由于归附元朝最晚，所以地位最低。从制度上划分汉人和南人，固然有降顺时间先后的原因，同时也是蒙古统治者利用南宋以来南方人和北方人相互间的鄙视和对立，对汉族进行分化的手段。

在这种制度下，不同等级的人所受的待遇差别极大。在法律上，同样的罪过，蒙古人所受刑罚比汉人轻得多。如果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许报复，只能向官府投诉，如果违反，就要治罪。蒙古人因为争执打死汉人，不必偿命，只是被罚出征和支付丧葬费用。在出任官职方面，汉人只能担任部分国家机构的副手，而且不能参与军务。南人更糟糕，连在中枢机构任职都不可以。科举考



试恢复后，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和南人为一榜，题目难易大有不同，但是录取人数却是一样的，从人口比例来讲，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个人拥有武器，蒙古人和色目人没有限制，但是汉人和南人被严行禁止。

实行“四等人制”，最受打击的是汉族儒士，其中又以身处江南者为甚。这种制度不但降低了他们的身份，而且也让通过读书走入仕途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一时读书人的地位大为降低。绝食而死的遗民谢枋得指责按照元朝的制度排列地位，其结果是“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士之低贱可见一斑。郑思肖也提出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

《卖鱼图》壁画

元

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东壁北部

纵260厘米，横210厘米

这是一幅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画作，画中人物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汉人的形象和生活状态。

不过这些都是南宋遗民们感伤故国沦丧，哀叹读书人丧失地位的过激之辞。其实抛开仕进做官的因素，元代的儒士并没有沦落到社会的下层。早在窝阔台时代，经过耶律楚材的大力推动，蒙古政府就专门在诸色户计中设立了儒户，借以保护儒士。儒户的待遇与郑思肖排在第三、四位的僧、道等户计相似，可以免除部分赋役，而且还能得到国家提供的伙食，而所需做的只是每户必须出一个子弟上学，以便在政府考选吏员时参加考试。实际上，元朝的儒户已经是处在贵族和官员之下最受优遇的阶层之中，不过与两宋时期儒士所受的优厚待遇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别，也难怪遗民们大发牢骚了。

二、蒙古人的内斗

元朝皇帝们尽管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王朝的至尊，但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忽必烈开始直到亡国的十一个皇帝里面，有七个人的寿命不到四十岁，其中有五人在三十岁之前就死去或者失踪，在位时间没超过五年的也有七人，尤其是1323年到1332年

这十年里竟更换了五个皇帝，有两人在位时间仅仅一个月左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部分固然是和皇帝们的身体状况有关，另外统治者内部永无休止的内争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有两位皇帝直接死于谋杀，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守成之君元成宗铁穆耳去世后，他的两个侄子相继继承了皇位。武宗海山和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经相约皇位由兄弟叔侄世世相承，这本是避免兄弟阋墙的好事，却埋下了几十年皇室内乱不断的种子。仁宗在位时，已经决定打破约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引起了皇室诸王和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武宗的长子和世璜甚至起兵反叛。晚年的仁宗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使硕德八剌顺利继位的事情上。他死后，十八岁的皇子成为元朝惟一个按照汉人长子继承制原则和平地登上宝座的皇帝。

硕德八剌即位之初，朝政几乎全部掌握在他的奶奶答己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手中。年轻的皇帝自幼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渴望在整顿国家上有一番作为，但一直受到压抑，直至两年后答己太后和铁木迭儿相继死去。硕德八剌选择了开国元勋木华黎的后人拜住为惟一的丞相，着手推行改革，希望给国家开创一个国富民足的新局面，但这触动了很多皇室和权贵的利益，他的政敌越来越多。这一番锐意进取的表现，使他在死后被尊为英宗。

虽然被汉族儒士们视为理想皇帝的形象，但硕德八剌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缺陷。早年在答己太后和铁木迭儿阴影下的生活，让他变得对臣子十分严厉。正因为如此，他的另一个心腹、皇后的哥哥铁失由于贪赃枉法担心受到惩罚，所以联络了一批皇帝的反对者策划政变。1323年，英宗从上都返回大都。

答己太后像



在距上都三十里的南坡过夜时，铁失带领包括诸王和大臣的十六人先杀害了拜住，又夺去了英宗的生命。这件事史称“南坡事变”。

成宗的另一个侄子也孙铁木儿是这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他虽然没有亲身参与，但仍然被阴谋者们拥戴为新的皇帝。他即位后不久就将事变的主犯们处死或者流放。也孙铁木儿在1328年病死在上都，于是引发了新一轮的帝位争夺。武宗的忠实追随者在大都发动政变，并将海山的次子图帖睦尔迎来。为了名正言顺地攻击上都，图帖睦尔在九月宣布继任皇帝。几乎同时，也孙铁木儿八岁的儿子阿速吉八在上都登基。元朝的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两个最高统治者同时在位、王公大臣分为两派互相攻伐的局面，后人称此为“两都之战”。

战争虽然激烈，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十月中旬，上都投降，阿速吉八不知所踪。图帖睦尔终于将帝位夺回到海山后代的掌握之中，此时他的哥哥和世琜也结束了政治流亡的生涯，正在回来的路上。作为武宗的长子和正统继承人，和世琜似乎更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图帖睦尔宣布要将帝位让还给兄长，这本是故作姿态的谦让，却被和世琜将计就计接受了。他等不及回到大都，在南来的路上就正式戴上了皇冠，然后按照武宗与仁宗的旧例，将弟弟封为皇太弟。几个月后，他们终于在旺兀察都行宫会合。这一番帝位的相让，让两兄弟的相见洋溢着手足情深的感人色彩，和世琜热情地招待了弟弟和随从小臣们。不过面对权力和利益，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相让仍然是不变的法则。四天后，三十岁的和世琜“暴崩”，后来有人指出他饮用了图帖睦尔的亲信献上的毒酒。图帖睦尔日夜兼程赶回上都，几天后成为元朝的皇帝。随后，和世琜的妻子在上都被她的妯娌



元武宗像

指使人推入烤羊的火坑活活烧死，这场残酷的“旺兀察都事件”才宣告落幕。

图帖睦尔虽然夺取了帝位，但至死也未能摆脱“两都之战”和“旺兀察都事件”的困扰。阿速吉八的支持者在地方上发动的反抗战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才停止，各种原因的谋反事件更有八次之多。1332年，只有二十九岁的图帖睦尔在上都死去。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在旺兀察都发生的事，是我平生的大错，每次我在夜间想起来，都追悔莫及。正因为如此，他决定将帝位交给兄长的儿子继承。

三、红巾军

1333年，明宗和世琜的长子妥欢贴睦尔终于摆脱了权臣燕铁木儿的阻挠，登上了皇位。这个年仅十三岁的皇帝接手的是一个权臣擅权、吏治腐败、财政空虚、社会动荡、已经陷入绝境的元帝国。在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伯颜执掌着朝廷大权，他为自己弄到一个加起来长达246字的官衔，而且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大局，改变国家政策。在他的指挥下，汉人、南人受到了空前的打击，科举

考试也在1335年废止，而他最著名的建议是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幸好此建议没有得逞。元朝的经济状况这一时期再次陷入低谷，但是“天下贡赋多人伯颜家”，他本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伯颜的擅权令统治者内部也难以容忍。1340年，他的侄子脱脱发动政变，将他驱逐出政治舞台。不久，脱脱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大权在握。他开始推行新政，极力挽回伯颜造成的影响，科举制度得以恢复，儒家的教育和礼仪制度再次走入宫廷，百姓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皇帝本人则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脱脱辞去相位后，皇帝亲政，也是一派锐意进取的作风。一时间，朝廷中弥漫着“中兴”的气象。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新政的主要目的——完善法制、加强廉政、选拔人才——基本上没有达到，土地问题和财政危机更是未曾触及，局势仍在恶化之中。

脱脱被束手无策的皇帝请回相位，等待他的是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几年间水灾、旱灾和瘟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频繁。黄河水患不断，运河受阻，造成朝廷经济紧张，山东、淮北一带哀鸿遍野，死人枕藉。官吏的

贪污贿赂之风愈演愈烈，地方官搜刮民间更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赋役沉重且不均，造成了广大农民的极度贫困，是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面对这种局面，脱脱决定实施“开河”和“变钞”，解决财政危机，使灾民重返家园。这两个看来英明的决定让元政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新钞“至正中统交钞”发行不久，就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令政府原本就不好的信誉更加低落。开通运河的决定也受到了质疑，有人提出运河应受治理的一带连年饥荒，如果聚集二十万民工开河，后果恐怕会比河患更严重。脱脱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白莲教北方教主韩山童多年以来一直在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为号召聚集力量。元朝建立以来，白莲教因为教义简单，迎合普通大众的心理，所以信众日益庞大，影响深入民间，以白莲教为号召的起义屡屡发生。武宗时白莲教曾经被禁，在仁宗时又恢复。此时韩山童在河南和江淮一带已经拥有很高威望，身边也有刘福通等骨干长期追随，他们“倡言天下大乱”，煽动起义反

管军万户府印

元

1967年山东枣庄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铜质

印面边长7.8厘米

此印的印文为阳刻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印背阴刻楷书“管军万户府印”、“中书礼部造”、“龙凤五年二月□日”等字。印侧阴刻“端字十七号”。韩林儿、刘福通建立的大宋政权机构和官称都仿照元朝制度，中央设中书省，下分各部，军职则分别名为元帅、总管、万户、千户、百户等。这是其中书省礼部在1359年监制的军印。



元。“开河”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韩山童等人凿了一个只开一眼的石人，在其背上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并预先埋好，同时散布内容相同的民谣。1351年四月下旬，独眼石人被开河民工挖出，顿时人心惶惶，以为大乱将至。韩山童趁机于五月在颍州颍上县聚集了三千人，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宣告起义，并且鼓吹韩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是南宋名将刘光世的后代，为辅弼，用民族大义抹去了宗教色彩。正当众人在一起誓告天地的时候，遭到官军突然袭击，韩山童被俘牺牲。冲出重围的刘福通，率众于五月初三占领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义军头裹红巾作标志，故称红巾军，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到九月，红巾军已经有了十万人。

被元政府称为“妖彭”的白莲教南方教主彭莹玉也借机起兵。他的徒众铁工邹普胜、布贩徐寿辉也称红巾军，以蕲水为都，徐寿辉为帝，建立“天完”政权。“天完”的意思就是压倒“大元”。徐州的“芝麻李”李二、濠州的郭子兴等也以红巾为名起事。江淮的义军在“双刀赵”赵普胜和“李扒头”李普胜的率领下渡江南下，势如破竹，号称百万水师。河南、湖北一带的“南琐红军”和“北琐红军”也相继起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元朝政府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四、朱衣人作主人公

红巾军来势汹汹，迫使元政府倾尽全力进行镇压。不过这时的元军早已不是纵横天下的铁骑雄师，而是将领“但以酒色为务”、士兵“但以剽掠为务”的腐败军队，所以在红巾军起事后最初的两年里，元军一直居于



龙凤通宝

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铜质

直径2.4厘米

为韩林儿建立的大宋政权所使用的货币。

下风。由于各路红巾军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系，而各地的元军在脱脱的统一指挥下逐渐扭转了局面，形成了围剿的态势，到了1353年底，彭莹玉被杀，天完政权都城陷落，红巾军转入劣势。正在元军全力攻击徐寿辉的时候，盐贩张士诚突然起事，自称诚王，国号大周，结果分散了元军的注意力。脱脱亲自率领包括卫军、蒙古军、蒙古诸王军以及来自西域等地的军马，号称百万，进攻张士诚的中心高邮。眼看高邮即将攻破，脱脱却因为朝廷中的谗言被皇帝夺去了兵权。百万元军不战自溃，一片混乱，元军从此优势尽丧，再也无法组织大规模军事活动。

形势逆转之后，各路义军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刘福通奉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宋”，随即在1356年发动了北伐。北伐兵分三路，其中的东路军一度攻到大都近郊，中路军则攻克并烧毁了中都和上都，但是最终全部被元军消灭。刘福通借元军全力围堵北伐部队的机会，占领了汴梁，似乎有望完成恢复宋室的大业，但在元军消灭北伐军之后的全力攻击下，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托庇于朱元璋。

在元朝政府方面，由于正规军几乎已经

天佑通宝

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铜质

直径2.5厘米

为在元末战争中张士诚建立政权后所使用的货币。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在江苏起事,并于第二年占领了高邮,建立大周政权,年号为“天佑”。



失去了战斗力,各地地方武装组成的“义兵”渐渐受到倚重。内迁的畏兀儿人后裔察罕帖木儿和勋贵后代答失八都鲁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镇压红巾军的战争中都立有大功,被元朝政府大力加以扶持,逐渐形成了北方的两大军阀集团。答失八都鲁死后,他的儿子孛罗帖木儿继续领军,因为势力范围的关系与察罕帖木儿势成水火,双方展开了混战。

随着事态的升级,宫廷内部的争斗也被卷了进来。妥欢贴睦尔对朝政已经失去了兴趣,整天沉溺于西藏僧人传授的以秘密佛法为名的房中术,以及设计制作机械和建筑。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一直与来自高丽的母亲合谋设法令他的父亲禅位,但是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父子的关系日益紧张。察罕帖木儿被刺身亡后,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被部下推举为帅。皇太子与扩廓帖木儿秘密定约,互为党援。皇帝则倾向于孛罗帖木儿。这一场内斗以皇太子和扩廓帖木儿的胜利而告终。不久,扩廓帖木儿的两员得力大将又背叛了他,开始了新一轮的混战。

在北方军阀混战之际,一直行事比较低调的朱元璋羽翼渐丰,展开了削平江南群雄

的行动。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1352年成为郭子兴的部下,然后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渐渐掌握了郭的势力。在南方义军各路人马纷纷称帝称王的时候,朱元璋遵循着幕僚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以宋政权为正统,着力于延揽人才,积蓄力量。

1363年,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拉开了序幕。陈友谅、张士诚在两年中先后被平定,朱元璋在1364年自称吴王。在称王前夕,朱元璋命令手下将名义上的领袖韩林儿、刘福通淹死。1367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和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人马北取中原,在两天后发布的北伐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进展十分顺利。在另一条战线上,消灭南方各割据势力的战争也全面展开。1368年的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

每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必会有一些预言、谶谣到处流传,作为人们揣测未来的线索。当时有一首童谣传播很广:“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1368年的七月,明军已经渡过黄河,直接向大都进发,河南彰德天宁寺塔的颜色忽然从头到脚由黑变红,“如锻铁初出于炉”,这个奇妙的现象正应验了童谣,看来天下易主的时候到了。

1368年八月二日,徐达等率军攻入大都齐化门。几天前,妥欢贴睦尔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北奔上都。统治了中国百余年后,大元政权终于崩溃了。残余的蒙古军继续顽抗,甚至还设计了光复大都的计划,但已无力回天。1371年,明军扫平了所有的残存割据势力,完成了内地的统一。

1370年4月，妥欢贴睦尔在明军的追击中病死。这位亡国之君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朱元璋给了他一个“顺帝”的庙号，表示对他“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的嘉许。被朱元璋称作“天下奇男子”的扩廓帖木儿是明军的头号大敌，智勇双全的徐达

也曾败在他的手下。面对朱元璋开出的百般优遇，他毫不动心，始终不降，不断设法打击明军，直至1375年病逝。爱猷识里达腊在父亲死后终于登上帝位，但是只得到了一个史称“北元”的残破政权。

第七章

治国的努力



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多数蒙古统治者都缺少兴趣，可是一旦看到能够获得明显的利益，他们又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城市可以提供舒适而奢侈的生活，调理经济能够聚集财富，发达的交通既是国家安全和行政管理需要，又能够带来远方的奇珍异宝，所以元朝政府对这几方面的关注程度比较高，加以支持和鼓励。但是体制上的缺陷无法用经营管理来弥补，在元朝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隐含的危机也逐渐浮上表面，这些不稳定因素一旦汇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第一节 蒙古人的都城

从逐水草而居，到拥有自己的城市，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变

化。尽管直到退出中原，不少蒙古人还是宁愿在城市中搭建毡帐生活，但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毕竟给他们带来巨大影响。都城逐渐向南迁移，为蒙古人观念和政策的转变画出了轨迹。而城市格局的变化，则彰显了外部文明产生的影响。既对汉文化充满兴趣，又热爱游牧生活，使忽必烈建立了两都巡幸制度。而武宗兴建中都，又似乎暗示着蒙古高层要求回归草原的呼声。几个都城的历史，不但体现着元朝的荣辱兴衰，也是蒙古统治者矛盾心态的真实记录。

一、从毡帐到城市

早期草原上的蒙古人以马背上的游牧生活为主体，没有定居的概念。他们驱赶着牲畜逐水草而居，根据气候的变化转移自己的居所，毡制的活动帐房是主要的住宅。这些帐房通常被称作毡帐、毡房或穹庐，制作简

单，便于携带，而且能够抵挡风寒，非常适合需要经常迁徙的生活。也有些毡帐是不可拆卸的，搬运它们需要用牛车，就像一所能移动的房屋，名叫“帐舆”。毡帐的规模大小不一，小的不足丈，大的可以容纳数百甚至上千人。大汗们所使用的毡帐在蒙语中称作“斡耳朵”，意为“宫帐”或者“行宫”。规模更为庞大，举行重大典礼仪式或者宴会时所用的毡殿，甚至能装下数千人。大型的帐舆则要二十二头牛才能拉动。每到达一个新的驻地，人们将毡帐按照主人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职责排列安置，俨然形成临时的城镇。

这种情况直至蒙古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没有改变。在成吉思汗时代，他的斡耳朵所在的位置，就是大蒙古国的中心。成吉思汗在蒙古疆域内不同地点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四大斡耳朵作为自己和后妃的居所，但仍是可以迁移的。以后的历代大汗和皇帝都沿袭了这个传统，继位之后都要建起自己的斡耳朵，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制度。

随着对外扩张愈演愈烈，被征服者的文

化对征服者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窝阔台终于准备为大蒙古国建立一个城市作为首都。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哈刺和林，来源于蒙古国的发祥地鄂尔浑河发源地的山名，此前这个名字指的是杭爱山东段北侧范围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哈刺和林的地址选在鄂尔浑河畔，这里地处漠北草原的中心地带，原来是克烈部可汗的驻地，成吉思汗曾经把自己的一个大斡耳朵设在这里。工程在1235年的春天开始，主要的建造者是来自汉地的工匠，也有许多中亚等地送来的伊斯兰匠人。第二年，最重要的建筑万安宫落成，标志着蒙古人的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他们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统治思想都发生了变化。

哈刺和林并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但在草原人的眼里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壮观。它南北长约四里，东西宽约二里。作为一座13世纪的首都，这个城市的结构还不完备，在普通城区和宫城之间没有皇城的过渡，更像是斡耳朵宫帐群模式的延伸。宫城位于哈刺和林的西南角，周长约为二公里，位于中央的



哈刺和林遗址

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

哈刺和林是大蒙古国的第一座都城，坐落在大蒙古国的发祥地漠北草原中心地带的斡耳朵河畔。哈刺和林的地面建筑现在已经全部消失，仅有少量的建筑构件散落在遗址中和额尔德尼召内。

是一座中国传统样式的建筑万安宫。这座宫殿南北长55米，东西长45米，由72根柱子支撑。宫城共开四座门，按照蒙古人的传统习惯，南门为大汗专用，东西两门分别供王子、亲族和后妃、公主出入，北门是普通人的通道。

宫城之外的哈刺和林主要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回回市区，精于商业运作的中亚商人们把这里变成了市场贸易的中心，而且因为距离宫城较近，各国的使节们也经常在此活动。另一个是汉人市区，被征发来的汉人工匠聚居在这里，为大汗和王公贵族们提供服务。这两大区域之外，还有各级官员的住宅。另外一批人也活跃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就是各大宗教和教派的神职人员。到了1253年至1254年间，城中已有“十二个不同民族的偶像寺院”、两座清真寺和一座基督教堂。哈刺和林用土筑成的城墙上开有四座城门，“在东门出售当地少有的粟及他种谷

物，在西门出售绵羊及山羊，在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在北门出售马匹”。

这座都市有许多侧面都反映着世界征服者的战绩与豪奢。在宫城中有一棵大银树，根部是四只银狮子，每个狮子的嘴里都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树干中有四根管子通到树顶，末端向下弯曲，每根管子上有一条尾巴盘绕在树干上的镀金的蛇，分别流出葡萄酒、黑马奶酒、粮食酒和蜂蜜酒。仆人们从这里汲取各种饮料，送到宫中各处供王公贵族们饮用。这棵银树的制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的银匠师傅威廉。与他同时生活在哈刺和林的有许多法国人、英国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和俄国人，多数都是历次西征的俘虏，被带到此地宫廷和贵族们提供服务。这些异国的居民与来自欧亚各国的使节、商人、宗教人士让这座城市表现出浓郁的国际化色彩。

元朝建立以后，统治重心离开了草原，哈刺和林不再是都城，但仍然是漠北草原的经济政治中心，元朝政府将漠北行省的治所放在这里。元朝灭亡后，败走的蒙古政府又以哈刺和林为根据地建立北元政权，明朝军队的不断进攻和内部从未停止的权力争夺使北元很快走向了衰落。哈刺和林见证了蒙古从极盛到败亡的几乎所有过程，最终成为这个一度最强大的帝国的随葬品而被时代湮没，只余下一些残垣断石记录着曾经的辉煌。

二、上都开平府

1256年三月，主管漠南汉地的忽必烈决定兴建一座新的城市。此前他在不出征的时候，夏天都驻帐于金莲川，冬天则要另找地方避寒。他幕府中的大多数人都难以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而且要管理好中原地区，也需

石座狮

元
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藏
这件石座狮风格非常独特，
是原哈刺和林城的遗物。



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刘秉忠选择了滦水北侧、桓州之东的龙岗为政治中心的建设地点。这里气候凉爽，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两方都是广阔的草原，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理想的牧场，而且又靠近农耕地区的边缘，非常适合忽必烈的身份。

这里丰富的水源给建城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修建者花了很大力气排干积水，再用石头、石灰、碎砖等材料将地填平，以致在民间流传着忽必烈向龙王借地的传说。在忽必烈的汉族臣子们看来，建造城市是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向中原传统转化的一个象征，可是在其他黄金家族的成员眼里却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包括建城和体制改革在内的若干原因，忽必烈的长兄大汗蒙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兄弟间几乎兵戎相见。三年之后，一座被命名为开平的草原城市落成。忽必烈即位以后，放弃了原先的首都哈刺和林，将统治中心转移到开平。1263年，开平升为都城，定名上都，因此进行了一系列扩建工程。第二年，忽必烈又将

当时的燕京改名为中都，明确以中都为首都，上都为陪都。

刘秉忠设计的这座城市完全是中国传统都城的格局，面积共约4.94平方公里，由外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外城城墙全用黄土板筑，下宽10米，上宽2米，东墙长2225米，其余三面长度都是2220米。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呈正方形，四角有高大的角楼，每边墙长约1400米，也是黄土板筑，但在表层却用石块堆砌而成。皇城的东墙和南墙同时也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宫城在皇城的中央偏北，东西宽约570米，南北长为620米，四角建有角楼。城墙与外城、皇城一样，也是黄土板筑而成，外层在地基上先铺一层0.5米厚的石条，然后以青砖横竖交替砌起，青砖与土墙之间，还夹有一层残砖。宫城的东、西、南三墙的正中各有一座城门，名称分别是东华门、西华门、御天门。

外城的北部是皇家园林，其余三面都有关厢。西关有马市，应该是商业区，东关邻近皇城，是供到上都来的王公贵族安置手下的地方。南关在皇城的南门明德门外，是进



元上都遗址航拍图



上都宫殿建筑遗址

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入上都的主要通道，非常繁荣。在上都的东、西各有一座规模巨大的粮仓，每年可收贮粮食三四十万石。在城外的草原上，忽必烈还建有“失刺斡耳朵”，也就是皇帝的营帐，当时也被称作“西内”或者“棕殿”，可以容纳上千人，是举办忽里台会议的地方。

上都的标志性建筑是大安阁，这座雄伟瑰丽的建筑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是它的真实写照。其实大安阁原本是金亡以后，汴京惟一一座完整保存下来的建筑熙春阁。为了营建上都，忽必烈将熙春阁整体拆迁。大

安阁共有三层，上层供奉释迦舍利像，中层为帝、后的居所，下层是用来举行重大典礼、仪式的朝殿。自元成宗开始，元朝历代皇帝都在大安阁举行即位仪式。

每年二三月份，皇帝都会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避暑，举行宴饮、射猎、祭祖等蒙古民族色彩很重的活动，然后在九月前后返回，这是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度。类似的制度在辽代、金代就有实行，当时叫作“四时捺钵”。这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的典型做法，定期来往于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之间，以保证既能控制中原乃至全国，又能保持与草原深处诸部落的密切关系。

1358年十二月，一支义军越过大同，攻入上都，然后用一把大火将百年以来陆续兴建的宫殿化为灰烬。从此，元朝皇帝停止了两都巡幸。在连年的战火中，元顺帝仍然想将上都修复，但被大臣劝阻了。1368年八月，最后一位元朝皇帝最后一次来到上都，此时的上都一片狼藉，他只能住在营帐里。几个月后，在明军的进攻下，顺帝逃入草原深处。有一首据说是元顺帝所作的歌这样唱道：“夏季避暑我的开平上都，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未纳拉哈、伊巴乎二人之言，乃我应受之报应。把神明所见的竹宫，把忽必烈薛禅可汗避暑的开平上都，统统失陷于汉家之众。”深切的悲哀溢于言表，蒙古人永远失去了他们的上都。

三、大汗之城元大都

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前，就有蒙古贵族建议他将首都放在曾经是金中都的燕京，理由是燕京“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利于掌控天下。同时对于众多忽必烈汉地的追随者来说，燕京也更适合成为一个中原正统王朝的首都。随着阿里不哥在1264年降附，内部初

汉白玉螭首

元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发现

长82.5厘米。高29.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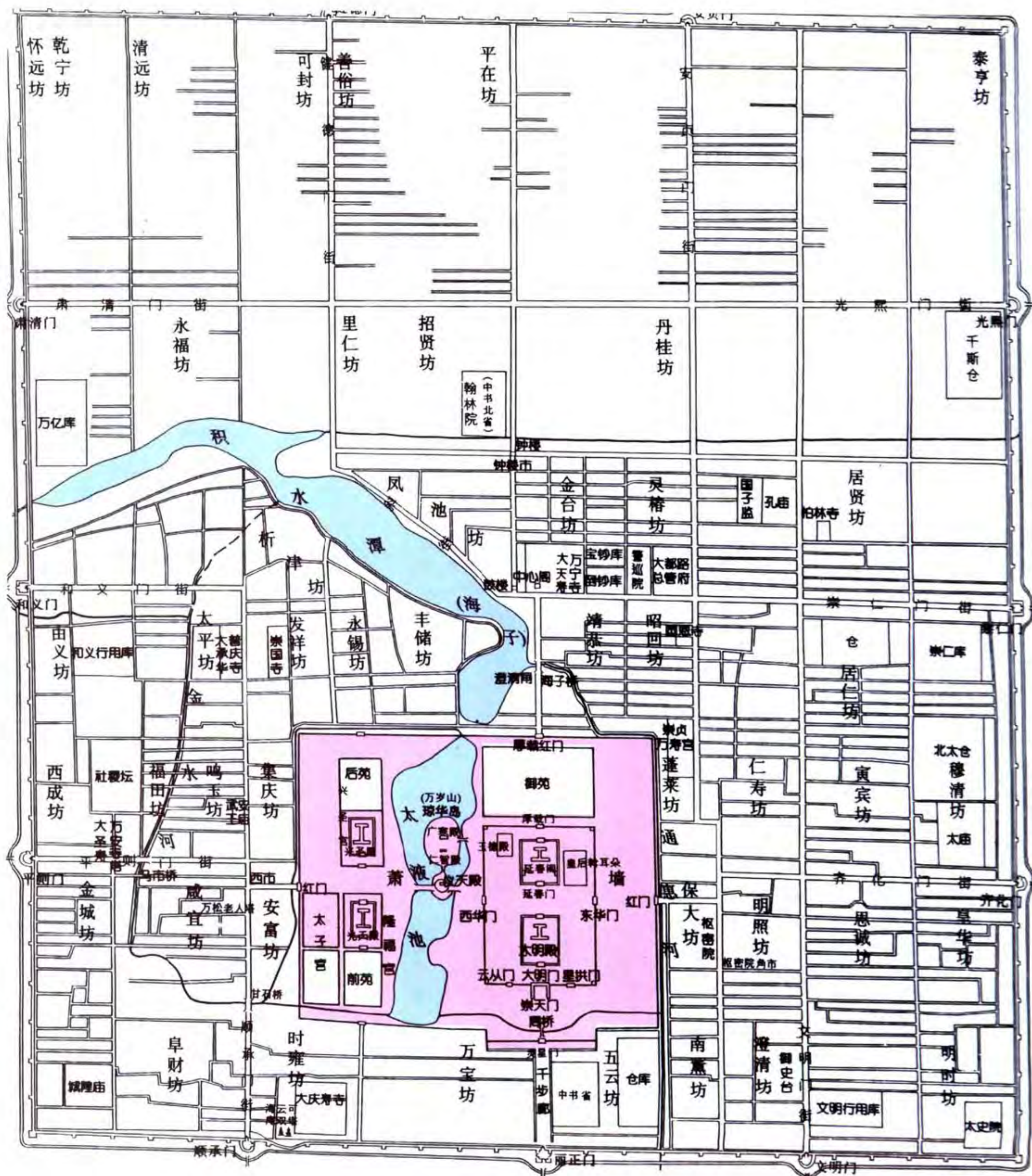
步稳定，忽必烈宣布以燕京为中都，作为大蒙古国的陪都。1272年，元政府又将中都改名为大都，正式成为元朝的首都，这也是北京作为全中国首都七百余年历史的开端。

原有的金中都城经历战乱之后，破坏非常严重，而且城市的格局比较小，水源也缺

乏，因此大都的规划者们选择在旧城区的东北方建造一座新的城市。营建城市的工程开始于1267年。1274年正月宫阙落成，忽必烈在这里举行了朝会。1276年，大都宣告建成，但实际上城内全部建筑完工已经是1283年的事了。

元大都图

元代的大都城在今天的北京市。1267年忽必烈开始在原金中都的东北方兴建新都，称作大都，并于1276年宣告建成。但全部的建筑工程直至1283年才真正完成。



参与兴建大都的人们来自众多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他主持勘定了城址，决定了城市的中轴线，并按照《周礼》设计出了儒家思想中理想的都城。刘秉忠的两个弟子在工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赵秉温勘测地形，绘制图纸；郭守敬设计和修建了大都城的水利系统。汉军将领张柔和张弘略父子、蒙古人也速不花、女真人高觿等负责营建工程。来自大食的色目人也黑迭儿担任营建宫殿的工匠总管。尼泊尔的艺术家阿尼哥主持修建了大圣寿万安寺白塔。河北曲阳的石工杨琼设计制作了许多宫殿楼台的石雕，最著名的是金水河上的三座白石桥。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行工部尚书段桢，他不仅自始至终参与了修建工作，后来还长期担任大都留守，都城建成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墙、宫殿、官署、河道的维修和增设，也是他负责经营的。

建成后的大都，总占地面积约50平方公

里，有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外城东墙长7590米，西墙长7600米，南墙长6680米，北墙长6730米，四周总长28600米。奇怪的是在城门的设置上，刘秉忠打破了对称的格局，东、南、西三面均是三座门，只有北面是两座门。民间传说燕京一带龙王盘踞，操纵水患，所以刘秉忠依照哪吒三头六臂两足的形象筑城，借以镇服龙王，元人的诗中也写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著哪吒城”。另一个说法就更加怪诞了，认为元朝自忽必烈即位到最终灭亡将近一百一十年，所以这个格局是亡国之讖。

皇城以太液池为中心，在大都城的南部中央。皇城的城墙叫做萧墙，又叫阍马墙，开有十五座城门。太液池的东面是宫城，西面南为隆福宫，原来是太子的住处，后来成为太后的居所。著名的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就发生在隆福宫的前面。北是兴圣宫，是太子读书的地方。

宫城也叫做大内，正处在大都的中轴线上，东西宽约740米，南北长约1000米。宫城南面有三门，东、西、北各有一门，四角有角楼，檐脊都用琉璃瓦装饰。大明殿和延春阁是宫城中最重要的建筑。登基、正旦、寿节等重要朝会仪式都在大明殿举行。殿中设有七宝云龙玉榻，榻上摆放白盖金缕褥，两旁还有数排座床，供诸王、大臣们使用。郭守敬设计制造的大型计时器七宝灯漏也是殿中重要的陈设品。在大明殿前的台基上种有忽必烈命人从漠北草原移植来的莎草，用以告诫子孙祖宗创业的艰难。文宗时期的鉴书博士柯九思写有“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艰。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专门纪念此事。延春阁是后廷的中心，与大明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殿内的装饰很有蒙古人“毡帐”的色彩，广泛使用了

双凤麒麟石雕

元

1966年北京市桦皮厂西部明代城墙墙基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纵1.05米，横1.2米，厚0.13米

这块石雕雕刻技艺纯熟，线条流畅自然，是元代石刻艺术的佳作。根据雕刻的内容推测，应该是皇宫或者皇家园林中后妃住所的丹陛石。



壁衣和地毯，木结构露出的部分全部用织物加以遮盖。此外，宫城中还有一些富于异域色彩的建筑，如棕毛殿、畏兀儿殿、水晶殿等，体现了元朝多种文化并存的大背景。

大都的街道规划得十分整齐，主要干道九纵九横，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在干道之间有三百八十四条火巷、二十九条胡同。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北京的“胡同”一词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街道的宽窄也有统一的

规定，大街宽24步，约37.2米，小街宽12步，约18.6米。纵横交错的街道将市区划为五十个坊，坊各自有门，上面写着坊名。坊内分布着官署、市场和居民的住宅。大都的商业区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钟楼、鼓楼和海子一带，商业荟萃，饮食业发达，是大都最重要也最热闹的商业区；另一处是在西城的羊角市，主要是各种牲畜的交易市场。

大都的居民有十万户，约五十万人。无



《卢沟运筏图》

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绢本设色

纵143.6厘米，横105厘米

这是一幅非常写实的画卷，描绘了元代卢沟桥及其附近的景象。卢沟桥位于大都城外西南方，是南来者进入大都的必经之路。桥下是现名永定河的卢沟，在元代也是航运繁忙的河流。

论人口还是规模，都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当时惟一能与之媲美的是被西征的蒙古军破坏前的巴格达。这座伟大的城市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最富庶、商业贸易最发达的都市，同时还是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有这样的诗句：“京师天下本，万国赴如水。”城中除了汉、蒙、色目和其他民族的定居者外，经常可以见到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国的使节、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们的活跃身影，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这里作为永久的家园。对于这座城市，外来者们通常更喜欢用一个突厥语的名字来称呼——汗八里，意思是大汗的城市。

四、被遗忘的中都

1307年，忽必烈的嫡孙成宗铁穆耳在没有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去世，于是引发了又一次帝位争夺。他的两个侄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但暂时摄政的皇后因为与他们有积怨，所以串通亲信试图扶立旁系安西王。希望皇位能够在忽必烈的后裔中传递的另一派势力将爱育黎拔力八达迎到大都，彻底粉碎了皇后一党的阴谋。几

乎同时，原先镇守漠北、战功卓著的海山也率领大军赶到了上都。在这种形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将宝座拱手让给了兄长，海山则将弟弟立为皇太弟，相约帝位在兄弟叔侄间世代相承。

或许是因为希望能与窝阔台、忽必烈这些有着伟大功绩的祖先比肩，或许仅仅是在表示权威和豪奢，海山在登基后的第十天就宣布要营建蒙古人的第四座都城——中都。中都的地址选在今日河北张北境内，距离大都265公里、上都195公里，南、东、北三面是广袤的草原，西方是山脉，附近河湖众多，当时被称作“旺兀察都之地”，意为“有船的地方”。这个地方处在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分界线上，交通十分方便，“北通和林，西达西域，北连草原，南制中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山在漠北草原长期生活的经历，意味着中都一旦建成，元朝的政治格局就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

工程开始于这一年六月，在以后几年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海山对中都的建设表现得非常急迫，一年后，行宫刚刚建好，他就其中大宴群臣。1309年四月，开始修建皇城角楼的时候正值农忙时节，又有蝗灾，有些大臣建议停工。但海山认为建角楼才能体现皇城的宏伟壮观，比起老百姓的生活温饱，这才是更重要的大事。第二年十一月，海山再次严令加快中都的建设速度，其实这时他已经病入膏肓。

虽然作为一个都城被兴建了起来，但中都从来没有机会行使它的职能，甚至连普通城市的功用也未曾启动。刚刚做了四年皇帝，海山就在1311年病逝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如约继承了大位。与兄长不同，这位后来被称为仁宗的皇帝推行汉法，尊孔崇儒，力主以农桑为本，竭力矫正海山留下的弊政。

元中都宫城城墙东北角楼遗址

位于今河北张北北元中都遗址



中都这项庞大的工程在仁宗继位后被立即停止。

尽管未能完工，中都的建筑格局已经十分明确，完全是按照一个正规的汉化都城进行的规划。这个夭折的城市总占地面积为5.9平方公里，规模在蒙古人的都城中仅次于大都。中都由外而内分为外城、皇城、内城三个部分，“回”字形相套。与大都和上都不同，中都的宫城位于全城的中央，为一个长610米、宽555米的长方形，城墙基宽12米，用夯土筑成，四角有外包砖角楼，四面各开一道宽约8米至10米的门。宫城的正中有一个116米长、48米宽，3.1米高的大台基，上有柱础遗址，是宫廷的主体建筑。皇城整体也是长方形，长910米，宽755米，东、西、北城墙距宫城城墙100米，南城墙距宫城城墙200米。外城的东、西城墙各长2310米，南北城墙各长2555米，各距宫城城墙850米。无论是材质，还是纹饰，中都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大体上也与大都、上都相同。这样一座本来可能会改变元朝政治格局的城市，结果被降格成了行宫，十几年后，中都创建者海山的两个儿子又在这里上演了“旺兀察都事件”，这是中都惟一一次在元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成为两个皇帝命运的转折点。

1368年，元朝的末代皇帝在逃亡的途中来到了中都，他的父亲就是横死在这里的和世球。这里地面上的一切已经在十年前红巾军迂回攻击上都的途中被习惯性地烧毁，一代帝王的宏伟规划最终还原为草原牧场，只是在乱草丛中多了些断壁残垣。

第二节 经济发展

在元朝的统治下，中国经济是遭受破坏



莲花灯

元

1985年河北张北出土

还是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早期的蒙古人对被征服地进行大规模屠杀和掠夺，对很多地区的经济形成了沉重打击。表现在中国，最明显的是南方与北方间人口差距和经济发展差距的增大。随着统治政策的转变，到了元朝，中国经济还是得到了发展。全国的统一结束了以往各地区的经济分隔，蒙古统治者对商业非常重视，政府的重农政策令农业恢复得很快，大蒙古国的征服带来了中西交通的畅通，使国际贸易进入新境界，这些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虽然未能达到两宋时期的高峰，但是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并未受到影响。

一、通行天下的宝钞

最初只知道以物易物的蒙古人在征服了中原和西域以后，骤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开始用银作为主要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征收税赋也以银为主。在成吉思汗去世的那年，山东博州境内又开始使用以丝为本位的会子，以后各地纷纷发行局部流通的纸币。



至元宝钞

元

1959年西藏自治区萨迦寺发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货币

纵31厘米，横21.8厘米

中统钞崩溃以后，为挽救钞法，权臣桑哥和江南名士叶李建议改印新钞，于是在1287年又发行了至元宝钞，逐渐取代中统钞。到了忽必烈晚年，政府财政收支极不平衡，再次出现钞法危机，至元宝钞也走向崩溃。在元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宝钞是惟一通行全国的货币。这件在萨迦寺发现的宝钞可以证明西藏地区在元代也在使用宝钞。

1253年，忽必烈在自己的分地京兆也设立了交钞提举司。

1260年，忽必烈即位，着手准备统一货币。为了提倡纸币，刘秉忠提出了一套阴阳学的理论，说铜钱用于阳，纸币用于阴，大汗既然兴起于幽阴的大漠，就应该使用纸币，否则四海不得安宁。这是一个奇怪的理论，但是对崇信怪力乱神的蒙古人很有说服力，其实刘秉忠与他的同僚们只是想推行一套与前代不同的纸币制度而已。这一年的七月，为了革除各地发行纸币的弊端，政府宣布统一印造以丝为本的交钞，但是还未广泛流通，就在当年十月改为发行以银为本的中统元宝交钞，一般称为中统钞。中统钞按铜钱的习惯以贯、文为单位，面额分十文、二

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十个等级。当时久已盛行用银为价值尺度，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以银为单位，称钞一贯为一两、一百文为一钱、十文为一分、五十贯为一錠，但法定比价为中统钞两贯同白银一两、十五贯同黄金一两。

支持中统钞的是一套严密的钞法，包括：银本充实，使用者随时可以以钞换银；印钞数有定额，根据钞本决定发行数量；各地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调节物价；对伪造者处以严刑；禁止金、银、铜、铅等传统货币流通等等。这套制度考虑得非常周详，使中统钞发行后流通得很好，物价平稳，民间甚至认为钞的可靠程度胜过金银。但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十几年，钞法就开始败坏。

转折点是南宋在1276年灭亡，钞法推行到江南，当时政府以中统钞一贯兑换宋会子五十贯，并且禁止使用宋的铜钱。疆域扩展必然导致中统钞的发行量增加，如果严格依照钞法，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当时当权的阿合马等人为了邀功，在无限制增印宝钞的同时，将地方上作为钞本的金银全部转移到大都，结果民间无法正常兑换，宝钞信用全失，钞值大贬，物价飞涨。1281年时，中统钞一贯只相当于发行之初的十分之一。

大臣们提出各种建议，试图挽救钞法，另一位著名的权臣桑哥和江南名士叶李改印新钞的建议占了上风，于是1287年又发行了至元宝钞。至元宝钞面额分十一等，比中统钞多了五文一等，一贯可兑换中统钞五贯，中统钞依旧通行。1288年停止印造中统钞，钞版也被销毁。至元宝钞的发行也有一套相应的钞法，如果严格实行，也不是没有恢复正常的兑换和钞法运转的可能。但是到了忽必烈晚年，国家经费支出相当大，财政经常



至大通宝，至正通宝

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至大通宝直径2.1厘米，至正

通宝直径3.4厘米

人不敷出，钞法败坏的危机再次到来，物价飞涨，民间制造伪钞的活动也日益猖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宗海山先是发行至大银钞，又以一比五的比例兑换至元钞，然后索性改用铜钱，铸造了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而且历代铜钱也可通用，然而没有什么效果。仁宗即位后，将这些措施全部废除，又回到钞法的老路上。直至1350年，元朝通用的货币始终是中统钞和至元钞，基本的核算单位还是中统钞。在此期间，禁止民间私自贸易金银的命令被迫解除。钞法的败坏已经无可挽回。

顺帝即位后，钞虚物贵的情况日益突出，于是在丞相脱脱的规划下，施行了至正变钞，内容包括：发行正面钞名仍为“中统元宝交钞”、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字样及交叉钱贯图形的至正印造中统交钞，一贯相当于铜钱一千文，相当于至元钞二贯。铸造正面文字为汉字楷书，背面上方有八思巴字纪年的“至正通宝”，和折二、当三、当五、当十等大钱，与历代铜钱并用；至元宝钞通行如故。钞法变更以后，局面更糟，没过几年，至正钞已经等同于废纸，元朝的钞法就此彻底崩溃。

纸币的广泛使用令外来者们感到十分惊

奇，方济各会教士鲁不鲁乞在他的旅行报告中写道：“契丹（指中国北方）通常使用的钱是一张绵纸，长宽各有一掌之宽，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汗印玺上的条纹相

中统元宝交钞

元

长27.2厘米，宽20.3厘米



《农书》书影

元 王桢著
清乾隆活字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农书》共分二十二卷，分为三大部分。《农桑通诀》共六卷，相当于耕作总论，论述农业发展历史以及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技术和经验；《百谷谱》共四卷，讲述各种农作物及蔬菜、瓜果、竹木等的种植培养方法；《农器图谱》共十二卷，则是各种农业工具和农业机械，并附有大量图示，这一部分也是全书成就最突出的部分。在书末另外附有《造活字印书法》，系统介绍木活字的制作、存贮、检字和印刷方法。

同。”马可·波罗则将纸币视同为点金术，在他的描述中，在桑树皮制成的纸页上加盖大汗的印玺，这纸也便有了金子或银子的价值。

在元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宝钞作为惟一货币通行于全国各地，包括漠北草原、畏兀儿地方和西藏，只有云南因为旧俗是以贝为货币，可以同时通行贝币和宝钞。在高丽和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宝钞也曾经是流通货币。受到元代钞法的影响，日本也曾印发纸币。1294年，伊利汗国的君主盖喀图汗接受了中国使者的建议，仿照至元宝钞发行了纸币，这也是在当地第一次以雕版印刷的方法大量刊印印刷品。但是这一举措未能得到商人和民众的支持，很快就被迫中止了。

二、重农政策

1260年，忽必烈刚刚即位，就下令选派各地通晓农事的人担任劝农官。这一时期，他领土内的主要农耕地区华北中原一带在经

历了多年的战乱以后，田地荒芜，人口锐减，一片破败景象。接受了农业文明影响的忽必烈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及时将注意力放到了中国经济的基础——农业。此举受到了后人的普遍赞赏，认为他与中国历代君王一样具有英明的见识，远非辽、金君主这样的异族统治者可比。第二年，政府设立了劝农司，忽必烈最重要的谋士之一姚枢出任大司农，率领八十位劝农使督察各地的农业发展。劝农司在1270年改为司农司，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以后这一机构几度更名，最终定名为大司农司。劝农机构一度也设立地方衙署，后来都被并入地方政府，由地方官兼任劝农官，推动并保护农业生产。与此相应，在政府制定的地方官员考绩制度中，农业的成绩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地方官员多以督励农桑为己任，劝农形成一时风尚。

劝农之外，元朝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战乱逃亡者在一定期限内有权收回自己的田产，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愿耕种弃田和荒地，桑麻果树的种植也得到鼓励，而且这些都有相应的减免赋税的优待条件。北方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组成的“锄社”得到政府的推广，民户五十家为一社，进行生产互助，社长由“高年晓事者”担任。各路、府、州、县建常平仓以平抑物价，设立义仓以备荒年。此外，元朝还有一套周密的水利制度，在中央设立都水监，下设河道提举司，专门负责兴办水利，修缮河道，并责成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督察。

在重农政策的大背景下，元代的农业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于季节、时令、气候和土壤等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元人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尤其在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上,有着很好的表现。王祯的《农书·农器图谱》是我国农具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记述的各类农具有一百零三种之多,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时代农具的发展。犁、耙、耨、碌碡等工具配套后,使旱地耕作技术能够达到一些精细的技术要求,从而保证了耕作质量。棉花的种植在元代逐渐广泛,宋末元初长江下游植棉业发展迅速,黄河中下游棉花的种植不晚于元初,一些技术措施至今仍有参考意义。蔬菜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大为提高,白菜和萝卜得到广泛种植,叶菜类、根菜类、果菜类、笋、菌等各类蔬食的生产技艺已相当精细,野菜也已为人们所注意。果树栽培管理和嫁接技术这时期有不少有价值的创造,蚕桑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

元朝的农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批总结生产经验的农书纷纷问世,官修的有《农桑辑要》、《农桑杂令》;私人撰写的各类农书有十七种之多,传世的有王祯的《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陆泳的《吴下田家志》及《田家五行志佚文》等,以《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影响最大。《农桑辑要》为元朝司农司主持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农书,完成于1274年以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方农书,元政府先后数次刊行,颁发给地方各级管农事的官员。曾任过县尹的王祯所写的《农书》最终完成于1313年,原分为三十七集,现为二十二卷,十三万余言,插图二百八十余幅,是我国第一部对全国范围的农业做系统研究的农学著作,而且大量收入农器绘图,在中国农学史上也是空前的。畏兀儿人鲁明善编写的《农桑衣食撮要》又名《农桑撮要》,重在实用,是农家历书性质的农书,而且总结了一些畜牧业的经验。

由于重农政策措施得力,元代初期在土



《农书·木绵轩床》

选自《农书》

元 王祯著

清乾隆活字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元代之前,纺好的棉线要通过框架式拨车缠绕成一把一把的形状,以便进行下面的工序,但一架拨车每次只能缠绕一根棉线,效率较低。元初首先在今福建地区创造并使用了轩床,功能与拨车相似,但是可以同时缠绕八根棉线并使其成把,效率大大提高。

地开发、水利兴修以及经济作物的推广栽培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出一派恢复与发展的良好势头。然而这种情况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积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原处于游牧社会的蒙古统治者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落后因素,这都对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严重,沉重的科差杂役已经成为农户的大敌,吏治的败坏更让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元朝中期以后,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令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开始走向衰败。

三、河运与海运

随着全国统一的渐渐临近,一个新的问题亟待元政府解决。到了两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了江南一带,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新兴的大型城市,迫切需要得到南方粮食的大量供应,将各地征

收的赋粮运送到大都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以往历代政府主要依赖运河进行输送，元政府最初也是这样计划。但经过长年的战乱，尤其是金与宋的南北对峙，著名的大运河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破败不堪，部分河道填塞干涸，或者成为道路，或者盖起了房屋，或者索性种上了庄稼。而且宋、金之时，黄河屡次于河南决口，下游河道剧烈变迁，形成了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这些都给恢复运河交通带来了很大麻烦。

最初航行的河运在到达“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后，进入改道后的黄河（原淮河河道）逆行向西，行至位于开封西北的中滦上岸，陆运一百八十里后进入御河，抵达通州后再陆行五十里，最后运至大都。这个路线曲折迂回不说，单是两段陆路的运输就要耗费众多人力物力，而且效果还不好。从中滦开始的这一段陆运，每年尽全力也只能运送二三十万石。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充分利用运河，问题就不是简单的整治和修葺能够解决了。

至元十二年（1275），掌管水利的郭守敬在经过实地勘察以后，提出开凿济州河的建议，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七年后，工程开始实施。至元二十年八月，一条全长三百里的河道沟通了原有的淮扬运河和入海口在渤

海的大清河，来自南方的粮船顺这条河可以入渤海，然后北上进界河口，最后到达通州。由于水量和潮汐的影响，大清的泥沙淤积问题严重，最后又被迫改用陆运。

为了彻底解决陆运的困扰，在经过不到半年的开凿后，1289年的六月，会通河通航了。这条全长五百里的运河不仅结束了陆运的历史，而且使南起杭州、北到大都的运河得以沟通，但是还有一个缺陷：从通州到大都之间的河道较为狭小，不能通行大船，粮食的运输主要还是依赖陆路，费用高昂不说，如遇雨天，交通十分困难。

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提出了在通州和大都之间穿凿新河的规划。第二年春天，忽必烈下令开工。两万多名军人和工匠用了一年多时间施工，至元三十年秋，这条河开始使用。从上都巡幸归来的忽必烈非常高兴，给这条河赐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修成，让从杭州出发的运粮船可以直接抵达大都的积水潭，海运的粮食也可以借助这条河运进大都。全线贯通的京杭大运河连接了中国的五大水系，是当时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而且带动了流经地域的经济发展。在元代，虽然相对于海运，运河运输居于辅助地位，但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仍然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民运、商运和私人旅行，运河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初期河运的不成功，迫使元朝政府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至元十三年，伯颜占领临安以后，曾经将南宋的库藏、图书和财货海运到大都，这给了元政府一个启示。至元二十年，伯颜在得到忽必烈的批准后开始试行海运。第一次海运只运送了四万六千余石粮食，而且由于受到风暴、潮汛等自然条件的影响，第二年才到达目的地，但这仍然是一个好的开端。与水陆转运、河海联运过程中

汇通祠

位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西北沿的汇通河畔。

汇通祠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旧称法华寺，又称镇水观音庵，清乾隆年间重修后，改名汇通祠，现在是郭守敬纪念馆所在地。这里在元代时是郭守敬主持开通的通惠河的终点、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



出现的不利因素相对比，海运在经济上的效益非常明显。从此，海运的数量不断增加。

至元二十五年，元朝政府设立了都漕运使司和京畿都漕运使司，专门管理南方运来的粮食物资，实际上主要的作用是处理海运的衔接，意味着海运已经代替河运，成为运粮北上的主要方式。南宋时期的两个海盗首领朱清和张瑄是海运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因为帮助元军平定南宋获得了元政府信任，经营海运以后，不但位高权重，而且借着特权成为豪富。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和酬报，忽必烈甚至将宝钞的钞版赐给他们，允许他们自行印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元政府对海运的重视。

海运的全盛时期是在1319年至1329年间，除1323年外，每年运粮数量都在三百万石以上，1329年更达到元代海运的最高额三百五十余万石。但是到了元朝后期，这项事业也逐渐走向衰败。元末农民战争全面爆发后，海运已经处于末路。元政府曾经尝试用就近屯田等方法解决粮食问题，都未能成功。起义者中的方国珍和张士诚一度降附，为元政府维持了几年海运，但每年北运粮食不过十余万石，而且随着他们先后再次叛乱，海运很快就中止了。惟一使海运一直坚持到元朝灭亡的是福建的陈友定，但他的忠心也不过让海运的残局多维持了几年而已。

四、青花与釉里红

早期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族，手工业十分落后，无法满足日常生活和战争的需要。因此在崛起后的每一次征服战争中，蒙古人都要大量掳掠工匠，为自己提供服务。在政府以管理赋役为目的的“诸色户计”中，世代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匠户是最基本的“军、站、民、匠”四类之一，占有很大比重。

在各种手工业产品中，能够提供奢侈消费的工艺美术品最受统治者欢迎，为此元朝政府设立了众多的职能机构专门负责生产制造，仅他们辖下的官府作坊就至少有二百座左右，远远超过历代的数量。

由于民族文化的关系，在工艺美术品中，蒙古统治者对丝织物、毛织品、金银器、玛瑙和玉器青眼有加，富有中国特色的瓷器不太受重视，官方只在将作院下设立了一个

青花蕉叶纹瓷觚

元

1980年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16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6厘米

觚最初是酒器，后演变为礼器。在元代的青花瓷器中，有一部分器形专门仿古，摹拟商周礼器，深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



品秩为九品的浮梁磁局负责管理。尽管如此，元朝的瓷器制造业仍然十分兴盛，北方的河南与陕西、河北的南部，南方的浙江、福建、江西，都是瓷窑密集的地区，可以确认的瓷窑有几百座。元朝的瓷器品种繁多，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影响也极为深远。

元代的瓷器制品中，具有创新意义的新品种是釉下彩瓷器，其中最著名的是青花和釉里红。所谓青花，是指用氧化钴为呈色剂，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面施以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成品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

彩瓷器。这种技术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宋代时也继续使用，但是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没能形成大规模生产。到了元代，青花的烧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较之以往的瓷器，青花优势是很大的。在釉下彩未能广泛使用以前，在瓷器上施以彩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在窑里进行高温烧制时，很难加以控制，所以对瓷器的装饰采用的大多是刻花、划花、印花等。釉下彩技术出现后，就可以直接在瓷器上进行绘画，制作者发挥的余地就更大了。而且青

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罐

元

1964年保定永华南路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藏

高42.3厘米，口径15.3厘米，
底径18.7厘米

在这件瓷器上使用了元代最著名的青花和釉里红两种瓷器制造技术，以及雕花、贴塑等装饰技巧，可以说代表了元代瓷器制造的最高水平。



花是运用钴料，着色力强，色彩鲜艳，在烧制过程中，窑内的气氛变化对其影响较小，烧成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呈色稳定。另外，因为应用了釉下彩技术，所以绘上去的图案永不褪色。由此可见，青花的大量烧制成功，实际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釉里红的制作与青花相似，只是呈色剂改为氧化铜。氧化铜对窑温和火焰性质比较敏感，很容易出现差错，所以现在能够见到的成功的元代作品不多。从保存下来的瓷器

看，釉里红的制作一般颇为草率，所以有这样的推测：在元代，釉里红属于商品瓷。随着元末明兴，釉里红瓷器在明初大放异彩。

现在看来，青花与釉里红技术能够在元代迅速发展，除了烧制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蒙古族的色彩喜好也起了很大作用。在蒙古族崇信的原始宗教萨满信仰中，蓝色象征天，白色象征善，而且这两种也正是蒙古族起源图腾“苍狼白鹿”的颜色。主要来自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文明对青花的色彩和图案也有明显的影响。红是蒙古族另一种表示尊



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瓶

元

1970年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
元代丰州城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45.5厘米，口径19.5厘米，
底径13厘米

龙泉窑始创于北宋，发源地在今浙江龙泉境内。进入元朝以后，龙泉窑系不断扩大，目前已知烧制龙泉窑系青瓷的窑场在当时多达两三百处。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器形转向高大厚重，而且大量使用刻画、模印、堆贴、镂刻等装饰手法。龙泉窑瓷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元代的海外贸易中，销售量非常可观，甚至还有来自国外的大量特殊订货。这件缠枝牡丹纹瓶通体挂粉青色釉均匀晶莹，是元代龙泉窑瓷器中的精品。

青白釉划花玉壶春瓶

元

1956年山东济南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29厘米，足径9.4厘米

这件玉壶春瓶的釉色在白中泛出青绿色，非青非白又似青似白，通常被称作“青白釉”或者“影青”。烧制这种釉色的瓷器水准最高的是景德镇窑。



贵的颜色，这可能与他们对火的崇拜很有关系。按照元朝的规定，只有王公亲贵、高级官员和西藏僧人才能穿着红色衣服。

尽管在后世看来，青花瓷代表了元朝瓷器技术和艺术两方面的最高成就，但当时的汉族士人却不这么想。典型的青花瓷图案色彩鲜丽浓艳，装饰带繁多，体形巨大，于是

有人作出了“且俗甚矣”的判断。或许在他们眼中，青花瓷的异族风格过于浓重，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还是仿照宋代定窑、哥窑、汝窑、龙泉窑等著名窑口烧制的白瓷、青瓷。在这种趣味的影响下，青花瓷也向着符合中原传统审美观点的方向发展，出现了造型典雅、装饰简洁的作品。



钧窑镂空座瓶

元

1970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郊元代丰州城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58.3厘米，口径17厘米，
底径18厘米

属于北方青瓷系统的钧窑，在北宋晚期产品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进入蒙古国时期后，钧窑的窑场数量大增，烧造地域包括河南、河北、山西，形成了钧窑窑系，产量也大大提高。元代钧窑出产的瓷器品种以民间日用品为主，在北方影响很大，但总体水准比前代有所下降。不过钧窑出产的祭器、供器等多为仿古造型，其形硕大雄浑，多施用天蓝色釉，是钧窑产品中的精华，此座瓶就很富有代表性。

在元代的出口商品中，瓷器占的比重很大，在整个亚洲和东北非洲的沿海国家都非常畅销，并且流入欧洲，有着很大的国际影响，成为足以替代陶器、铜器和玻璃器的日常生活用品。青花是外销瓷中最受欢迎的品种，一些国家不但大量购买，而且还自行仿制，可以说是另一种方式的文化交流。

第三节 西域南海

将元朝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陆路，一条是延伸了前代贸易路线的海道。大蒙古国的相对统一为欧洲与亚洲

之间的干线保障了一个世纪左右的畅通，而海上交通线的增长也与伊利汗国雄踞西亚很有关系。元朝统治者从前人那里继承了这份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驿道交通因此一直可以通达远方的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对外贸易借助南海航线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借助这些路线，中外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和使者自由往来，使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起来。

一、驿道连通八方

元朝时，在每一个来到中国的异邦人士眼中，空前发达的驿站交通无疑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事物之一。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传教士加宾尼在进入大蒙古国的疆域后，每天都可以换几次马，以便尽可能地快速前进。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世的派遣出使蒙古，遇到蒙古人以后知道了“站”的概念，并在路途中享受驿站供应食物的待遇。著名的马可·波罗对驿站的富丽堂皇感到惊讶，同时他也注意到忽必烈把交通体系扩展到了边远山区和

蛮荒之地。

元时通常把驿站称作“站赤”，这个词来源于古阿尔泰语，原意为掌驿站者。早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初，成吉思汗就已经开始了驿站建设，他命令“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做好安排”。窝阔台是大蒙古国驿站制度的实际创建者，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方便来往使臣，利于运输货物，他将所管辖的疆域中的道路联结在一起，建立了驿站制度。他有组织、有规模地签发站户，为驿站提供服务，同时也严格管理使用驿站的各项措施。在窝阔台的推动下，驿站在草原地区和农耕地区全面建设起来，向南可到达中原，向西可直抵拔都的领地。对于这一成绩，窝阔台本人颇为自得，认为是自己即位后所做的四件大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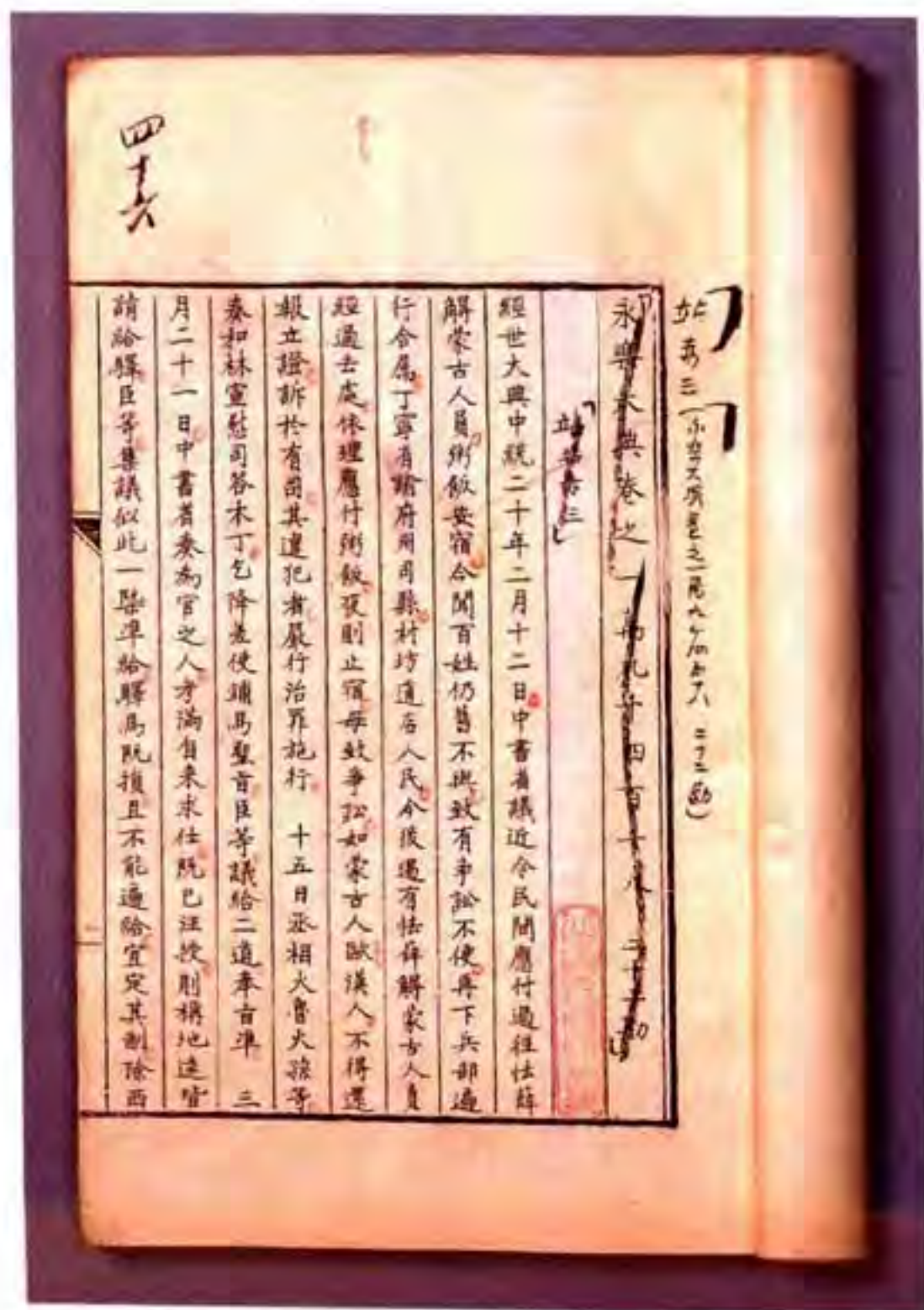
元朝建立以后，疆域之广阔在历代中国王朝中空前绝后，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的驿站将国家的各个角落联系在一起。四通八达的驿道以大都为中心向各个方向辐射，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抵西藏，南结安南、缅甸。到了元世祖后期，驿站的数目大约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个。

原先驿站只有陆站，元朝平定江南以后，又增设了水站，一度还曾经设有海站。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异，陆站又根据交通工具的不同分为马站、牛站、驴站、车站、轿站和步站。在位于北方寒冷地区的辽阳行省，还提供狗站，以狗拉雪橇提供服务。

根据政府发给使用者的符牌或者乘驿文书，驿站必须提供相应的交通工具和饮食住宿等服务。乘驿符牌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无论符牌本身还是使用制度，都有着浓厚的契丹遗风。海青牌是忽必烈在位

《经世大典·站赤》（书影）

选自《永乐大典》传抄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些材料原来是元代政书《经世大典》的内容，明朝永乐年间编纂《永乐大典》时被收录，许多关于元代驿站制度的珍贵资料因而得以保存。



初期最重要的乘驿证明，通常只有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和各地的统军将领才能使用。忽必烈开始推行八思巴字以后，1270年，蒙古字牌代替了海青牌，这里的蒙古字实际指的就是八思巴字。过了七年，又改为嵌有八思巴字的嵌铁圆牌，以嵌金字的最为重要，银字次之。一般只有军国要务才会使用牌符，通常用文书就可以了。元世祖前期，乘驿文书叫做“铺马札子”，后期改称为“铺马圣旨”。无论是文书，还是符牌，都必须与“铺马差札”一同使用，这是记录使用符牌文书者各项具体情况和所享受待遇的文件。

负责管理驿站的主要是通政院和兵部。前者几废几立，主要管理与驿站有关的事务，包括选拔、任命驿站负责人员，规划驿站、驿道建设，巡视各地驿站等等。兵部则更倾向于制度方面的工作，诸如掌管站户户籍和站田、制定相关制度、就驿站事务向中书省提出处理意见、传达中书省关于驿站的各项政令等。著名的画家赵孟頫曾经担任兵部郎中，处理驿站事务。

为驿站提供服务和物资供应的站户，在诸色户计中数量仅次于民户。站户是从民户中按一定财产标准签发出来的。一旦被作为站户登记，就会世代传承，不准变更。各站所领站户数目不等，多者两三千，少者只有几十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站户要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和服役的人，有部分站户还要向过往使臣提供肉、面、米、酒等。根据至元后期的官方资料统计，除西藏外，当时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包括44293匹马、8889头牛、6007头驴、4037辆车、378乘轿、5921只船、1150只羊、3000只狗，另外还有步站的递运夫3032名。这些绝大多数都由站户提供，其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为了及时迅速地传达朝廷与地方的文



八思巴字乘驿圆牌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藏
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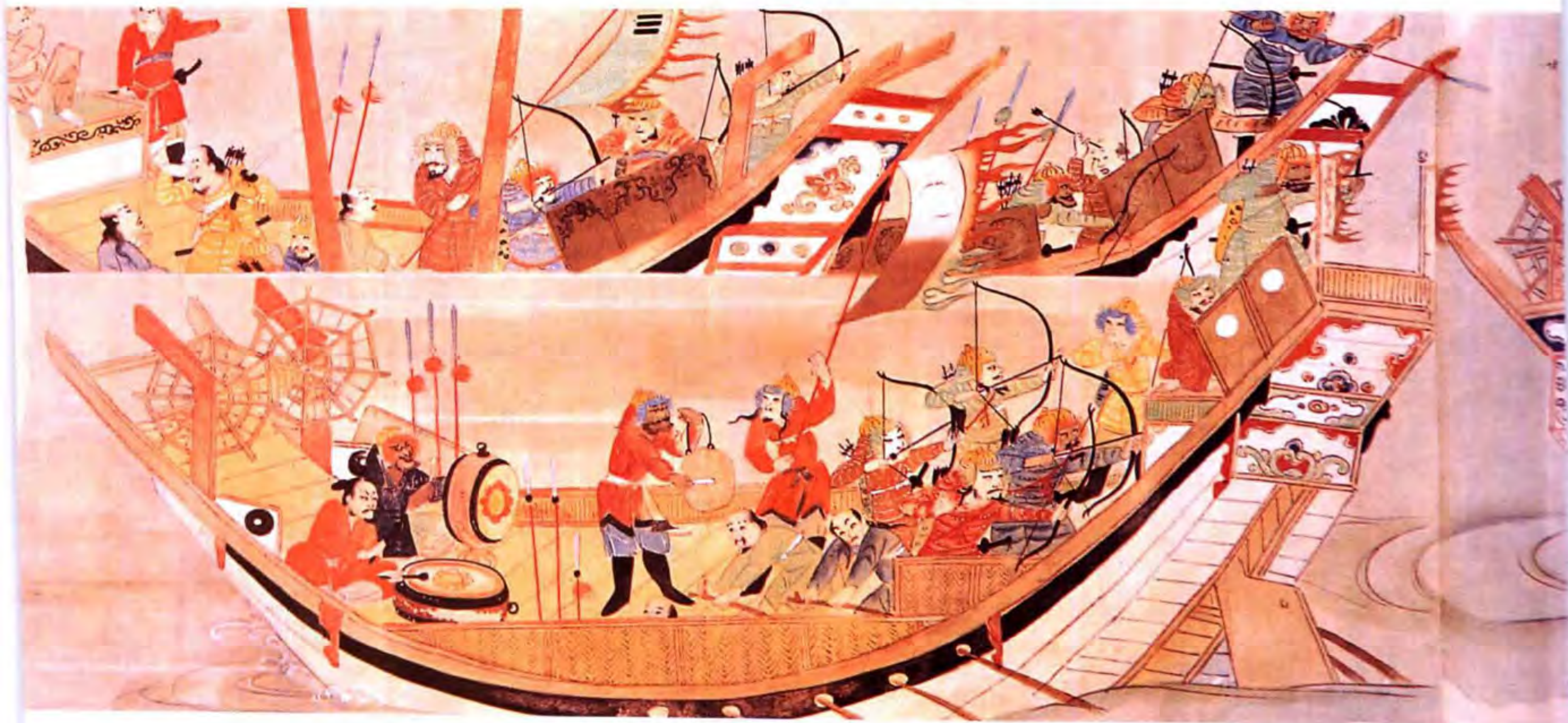
直径11.5厘米

牌上字句为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意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如违，要罪过者”。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政府一直通过使用牌符对驿站交通严加控制。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1277）开始，元朝政府开始使用这种乘驿圆牌，并规定只有发生军情急务才能使用。此种圆牌有金字、银字两种，这面是金字圆牌。

书，忽必烈在原有的驿站系统之外，又设立了急递铺系统作为补充。在驿道上，根据距离远近和人烟密集程度，每隔“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按照规定，在传递急递文书时，每昼夜要行走四百里。每个急递铺都要做到日夜兼行，风雨无阻，是一个效率很高的官方邮递系统。

二、一衣带水的邻邦

蒙古族在中国北方兴起的时候，统一了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王朝已经传了二十三代。1218年，蒙古军借口追击流窜的反蒙契丹贵族进入了高丽。高丽王朝出兵配合，于是与蒙古建立起了联系，每年向对方遣使通贡，并且相约“两国永为兄弟”。不过做蒙古人的兄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前去高丽索取高额贡物的蒙古使者连绵不绝，终于在1225年引发了杀害使者的事件，双方关系断绝。此后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都曾派军队入侵高丽，双方时战时和。高丽王朝外有强敌窥伺，内有权臣当道，处境非常艰难。



《元寇袭来绘词》(局部)

日本·永仁元年(1293)

日本菊池神社藏

纸质

原画分上下两卷，上卷长23米有余，下卷近20米

这是一幅日本镰仓幕府中期时代画家所画的关于日军抵抗元朝军队入侵的长卷。这个局部画面是双方在战船上交战的情景。

直到1259年，高丽国王去世，忽必烈派兵护送作为人质的太子王倂回国继位，并实施了一系列怀柔的政策，局面才有所改变。高丽成为元朝的藩属国，国王通常都娶有公主称号的元朝宗王之女为妻，凭借驸马身份提高在元朝政府和本国的地位，保有局部主权；元朝则达到了进一步控制高丽的目的，公主在高丽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力，广泛参与政务。自联姻后高丽没有再发生重大反元事件。元朝在高丽设有军事和地方行政机构，在进攻日本时，高丽是元朝最重要的基地。

尽管双方的关系很不平等，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却空前密切。理学和大量的中国典籍在这一时期传入高丽。元仁宗恢复科举后，高丽也按制度选送士人参加会试，即使未能合格，元朝也会授予官职，或者回国后凭此资历担任要职。如果考取进士，就会获得更高地位。有许多作为人质的高丽世家子弟和其他侨居中国的高丽人都在朝廷中谋求

职务，甚至世代留在中国，不再返回故乡。当时为到中国经商和旅行的高丽人编写的汉语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现在已经成为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文献。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希望能够将日本也纳为藩属，于是从1266年起，多次派人前往投递恩威并施的国书。日本正处在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的统治之下，多年以来与中国北方的政权没有任何联系，每次都使使者拒之门外，因此双方根本就无法建立有效的沟通。失去了耐心的忽必烈决定用最擅长的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1274年派出了蒙、汉、高丽军队共约二万五千人，大小战船九百艘的远征军，从高丽出发，发起攻势。开始时元军获得了一些战果，但在博多遭到了日军顽强的抵抗。久战疲惫之际，突如其来的台风损坏了元军大部分战船，元军只好撤退。日本称这场战斗为“文永之役”。

此后忽必烈又想用外交收服日本，但两次派出的使者都被幕府杀害。随着南宋的灭

亡，忽必烈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展开第二次对日战争。至元十八年（1281），蒙古、汉、高丽混合编成的东路军四万人、战船九百艘于五月自高丽出击；江南军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在六月由浙江出发。这次的战事后来被日本称为“弘安之役”。此次元军仍不顺利，两路军会合后试图组织更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再次遭到了台风的袭击。这次结局更为惨痛，战船大多被破坏沉没，淹死的元军不计其数，元军统帅只得败走。这是元军空前的惨败，回到高丽的士卒只有出发时的十分之一二。这两次台风被日本人称为“神风”。

不甘心的忽必烈还想发动第三次对日战争，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元、日双方始终没有建立起官方往来，但民间的交流并未因此停止。每年都有日本的商船携带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货物到庆元（今宁波）、泉州、福州等地进行交易，从中国带走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活跃在中日之间的还有僧侣们，有名可考的人元日本僧人就有二百二十余人，赴日的元朝僧人也不乏高僧大德。大量的经卷、典籍在这一时期从中国传到日本，同时还有大批雕版工匠前往日本从事印刷业。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先后与元朝建立了联系。位于今越南的安南和占城都与元发生过战争，安南还曾使元军遭受败绩，最终虽然入贡称臣，但还是以独立主权与元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今天的柬埔寨在元朝时被称作真腊，由吴哥王朝统治，也与元政府有密切的往来。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派遣使团前往诏谕真腊，其中的使团成员周达观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为后人留下了记录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最为丰富的资



《真腊风土记》（书影）

元 周达观著

1295年，周达观作为随员跟从元朝使臣出访真腊国（今柬埔寨）。1297年返回后，周达观写成此书，记录了当时柬埔寨的城郭、宫室、国王出行、军队、官署、语言文字、服饰、物产、山川、动植物、交通工具、贸易、风土人情等内容，丰富广泛。这本书是记载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的惟一文字材料。同时，书中还记载了海船的航线以及用指南针导航的针位，也是研究元代海上交通的重要资料。

料。

三、马可·波罗

1295年的一天，三个衣衫褴褛的人出现在威尼斯，他们是尼古拉·波罗、马赛·波罗和尼古拉的儿子马可·波罗。波罗家的人们拒绝承认这些形同乞丐的人是自家亲戚。等到他们从破旧的衣衫中取出了价值连城的



马可·波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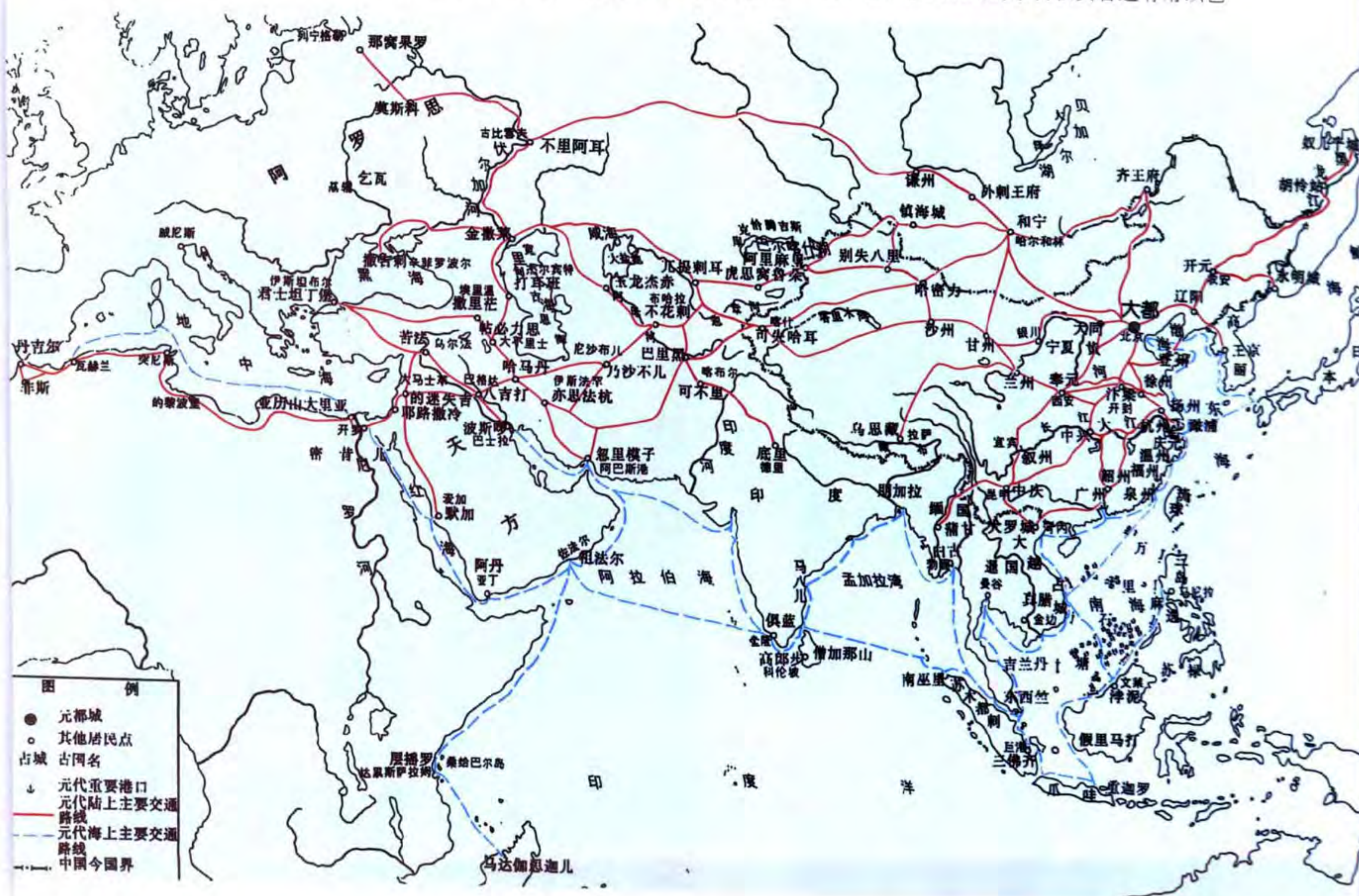
宝石和钻石后，消失了二十四年的亲情突然重新降临，他们被尊为游历远方的英雄，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一年后，已经成为著名商人的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然后在热那亚做了几个月囚徒。在这段时间里，小有名气的作家比萨人鲁斯梯谦根据马可·波罗的口述，写出了一本记录马可所见闻过的世界的著作。这本书在马可·波罗生前叫《寰宇记》，而在以后的岁月里，更为世人熟知的名字是《马可·波罗行记》。

这本书最吸引人的是马可·波罗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的经历。1275年的夏天，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了上都，并受到了忽必烈热情的接待。大约在十年前，尼古拉

和马赛以商人的身份谒见过忽必烈，并接受了出使教廷要求教皇向中国派遣一百名优秀教士的任务。新登基的教皇只派了两名修士随同他们前来，而且在路上被战争和强盗吓了回去。虽然任务并未圆满完成，忽必烈并不介意。此后尼古拉和马赛大概是继续他们的商人生涯去了，而年轻的马可被留在了宫廷中。

虽然马可·波罗宣称自己受到皇帝的尊重，并“当成心腹，以致其他官员心生嫉妒”，但是根据他自己的其他描述可以推测出，他担任了地位不高的忽必烈一般近侍，偶尔作为公务员到各地执行任务。而且他并不是惟一个获得这种位置的外来者，当时包括帝、侯、诸王在内的蒙古权贵普遍有用以色列

元代中外交交通路线图



目商人做近侍的习惯。至于他说自己曾经担任三年扬州总督,其实更为可能的是他以监察人员的身份居住在那里。蒙古的大汗和皇帝们确实有着用色目人监督和监视汉人官员的习惯。过分夸耀自己在遥远的国度中拥有显赫地位是很多冒险家共同的特点,马可·波罗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拥有权势,但并不妨碍他作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游历四方,对中国进行广泛而可信的观察。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包括大都、上都、杭州、苏州、扬州、西安、开封、成都、昆明、泉州等,甚至还有西藏。他满怀热情地记叙了这些地方的繁荣景象和风土人情,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一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纸币的广泛流通、煤和火药的使用、畅通无阻的驿道甚至人们爱吃的面条都成为他行记中最富影响力的内容。由于他本人不懂汉语,生活圈子主要局限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之中,所以有许多后人看来属于中国特色的事物没有被他提及,这也是部分学者对他是否来过中国表示怀疑的原因之一。即便如此,马可·波罗仍然为人们留下了元朝初年中国社会风貌的丰富记录,这些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几乎是全新的,而对于后世则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和历史文献。

《马可·波罗行记》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

端。当时它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在马可·波罗死后不久完成的地图已经充分体现了这种影响,宗教的教条和传说被淡化,地理状况被尽可能真实地加以反映。几乎一直到近现代,马可·波罗的记录仍然是欧洲了解亚洲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他对东方的富庶和神秘近乎夸大的描写,更是充分地诱发了商人的贪婪和探险家的好奇。从15世纪开始,众多的旅行家、航海家、探险家在读了这本行记后纷纷向东进发,寻找中国。哥伦布在他拥有的《马可·波罗行记》的空白处作满了笔记,这是他进行探险航行的信心根源。他最终发现了新大陆,但他的目标一直是马可·波罗讲述的东方。

尽管这本书几百年来一直受到热烈欢迎,但人们对行记真实性的怀疑一直围绕着马可·波罗。他在世时,人们认为他夸大其词。他死后,人们质疑他是否来过中国。这种压力对他的家人也产生了影响。1324年1月9日,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的朋友和孩子要求他承认一切都出于编造,而马可·波罗坚持表示自己还没有讲出所见所闻的一半。

四、海上商队

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元朝政府所表现出的重商精神是绝无仅有的。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使元朝的统治者们用非常宽容和支持

出使伊利汗国石刻(拓片)

元

1953年福建泉州南郊出土
原石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纵27厘米,横67厘米

这块石刻原被称作出使波斯国石刻,实际上当时波斯被伊利汗国所控制,所以改为现名。从所刻文字来看,这应该是一组石刻中的一块。据其内容推测,当事人是泉州籍的海上商人,受伊利汗国之托向元朝政府呈送贡品,因而受到元朝政府奖赏,并奉派以中国使者身份出使伊利汗国。这是元朝时期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被任命为临时使者前往外国活动的一个典型事例。



磁州窑白釉黑花婴戏图瓷罐

元

1994年辽宁绥中三道岗海域
元代沉船附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高30厘米，口径18.5厘米，
腹径31厘米，足径12厘米
磁州窑窑址在今河北磁县的
漳河两岸，这件瓷罐具有磁
州窑产品的典型风格。从出
土地点来看，这件瓷器也是
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灾难后遗
留下来的。



的态度看待商业活动，从大蒙古国时期开始，蒙古的皇族和权贵就开始与以回回人为主的外族商人开展了密切合作，这种以特权为后盾，前者投资、后者经营的方式称作斡脱，对元朝时期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外贸易可以带来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以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的需要，又可以通过商业活动获取厚利，因而在元朝的商业活动中占有很大比重，得到了政府远超以往的重视。

元朝的对外贸易有海道和陆道之分，早期以陆道为主，南宋灭亡后，海道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南宋的残余势力还没有完全清除，元朝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推动海上贸易的

努力。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曾经是南宋政府主管泉州海外贸易的官员，在元军到来之际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受到忽必烈的赏识。1277年，元政府仿照宋朝制度，在泉州设立了管理海外事务的市舶司，蒲寿庚成为贸易政策最初的执行者。他向海外各国传达了政府的积极态度，并得到了良好的回应。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口岸，泉州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元代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齐名的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因为长有许多刺桐树，所以泉州以刺桐港之名名扬世界。市舶司也在广州、宁波、上海等其他港口城市陆续设立，到了1293年，

已经有七个市舶司，后又经过合并改组，长期保留下来的是广州、泉州和宁波三个。

元政府为海外贸易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政策保护，对于表现出色的官员和商人，或者升官，或者厚赏。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可以免除杂役。在税收方面，政府定的税制很低，最初细货只征十分之一，粗货只征十五分之一，后来提高了，也不过细货五分之一，粗货十五分之二。即便如此，政府的所得也十分可观。对于外国商人的利益，政府明令保护，严禁官员勒索，而且外商有困难，相关官府要全力支持。在这样的环境里，海外贸易自然能够迅猛发展。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方面是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让政府与斡税商人垄断海外贸易，政府曾经四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但都很快恢复，中断的时间总共只在十年左右。

经营海外贸易的民间商人当时被称作“舶商户”或者“舶商”，他们往往因此而暴富，在一段时期里他们甚至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为了谋取利益，政府除了管理之外，也直接介入贸易活动。由市舶司制造海船，提供资本，招募商人出海贸易，这种制度叫做“官本船法”，所得利润，政府占七成，经营者占三成。

推动海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造船技术的提高。在13、14世纪，中国和南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几乎被中国海船垄断。当时的海船一般长十余丈，高三丈，宽两丈五尺，载重大约两千石，船体主要材料为松木，舵和桅杆由铁梨木制成，坚固耐用，很多外国商人都喜欢购买或者租用中国海船从事贸易。



龙泉窑瓷碗

元

1969年广东珠海蚊洲岛海底元代沉船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口径15.7厘米至17厘米
瓷器是元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从位置来看，运载这几件瓷器的海船应该是从广州出发，途经蚊洲岛时沉没。

易。

旅行家汪大渊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两次跟随商船出海，归来后写成了《岛夷志略》，为中国海外贸易的路线留下了真实的记录。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中国商品通过海上贸易行销的区域不但包括东南亚、南亚、印度东西海岸的城市，甚至已经到达了波斯西南海岸、波斯湾、红海以及东非海岸的一些港口。

通过海外贸易从中国输出的货物超过两百种，以丝织品和瓷器为最重要。泉州是丝织品外销的主要港口，以至在英语、德语和法语中，“缎子”一词都来源于“刺桐”的阿拉伯语音译。元朝是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通过海外贸易，中国瓷器成为在亚、非、欧三洲都广受欢迎的商品。对于商人们来讲，瓷器不仅是畅销的商品，在海上运输过程中，成批的瓷器还可以作为压舱物，使货物的运载量达到最大，可以牟取最大利润。

第八章

艺文之光



对于从落后的草原直接闯入文明世界的蒙古统治者来说，他们所能认识和了解的文化形式几乎只有宗教，这使他们将各种宗教抬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而对其他文化形式，即使有一些君主曾经接受过正统的中原文化教育，他们仍然无法了解其中的精髓。这就使元朝的统治者对文化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使中国文化能够相对自由地发展。大蒙古国虽然很早就分崩离析了，但是其留下的多元文化的遗产，给这个时代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第一节 宗教流布

萨满崇拜决定了蒙古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他们认为宗教人士都在以自己的方法与上天沟通，教派的差别只是因为方法不同。

成吉思汗奠定了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的政策，这种做法一直贯穿了元朝。实际上很难说蒙古统治者们真的笃信某种宗教，他们只是要利用宗教人士为自己“告天祝寿”，并通过宗教的力量来羁縻人民。虽然元朝建立后，藏传佛教获得了高出其他教派的地位，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只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其他宗教也没有因此失去地位。元朝政府的宗教政策十分灵活，每当一种宗教或教派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就必然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总的来说，元朝的宗教政策十分宽松，一些在以往被视为异端的教派也能够很好地发展，他们中的一支甚至直接导致了这个强大帝国的灭亡。

一、西天佛子

佛教在西藏重新振兴之后，由于在发展过程中融会了许多地方特色，所以形成了藏

传佛教这一新的体系，逐渐成为西藏社会的主导力量。又因为传承的不同，藏传佛教产生了多个流派。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有一些教派的僧侣与蒙古人发生了接触，萨迦派的班智达推动西藏归附蒙古以后，藏传佛教开始大规模进入蒙古社会，许多上层人物的身边都有西藏僧人在活动。

最初管领西藏地区的阔端对班智达非常看重，给予萨迦派在各教派中的领袖地位。但在1251年，蒙古大汗之位转移到拖雷家族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窝阔台系在政治上完全失败，阔端本人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是管理西藏的权力被剥夺，他在这一年的年底因病去世。班智达也在这前后去世。为了萨迦派能够继续保有自己的地位，他的侄子和继承人八思巴立即动身前往六盘山谒见忽必烈。

由于在形成过程中，藏传佛教吸收了很多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内容，而本教与蒙古人崇信的萨满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比起其他宗教来，藏传佛教更容易被蒙古人接受。忽必烈深为八思巴的宗教修养与渊博学识所吸引。不久之后，八思巴作为上师，向忽必烈及其王妃传授了喜金刚灌顶，同时确立了以下规则：传法或人少的时候，上师居上座，其他时候，帝王居上座；处理吐蕃事务必须经过上师同意，其他大小事务，上师不能发表意见。这可以说是元朝尊崇藏传佛教的真正开端。忽必烈回到开平经营汉地以后，八思巴也成为他幕府中的一员。

1253年，蒙哥将西藏的主要地区分给了自己的兄弟们作为领地。西藏各教派在传播中与地方势力结合在一起，各自拥有势力范围，实际上掌握了地方的管辖权，这次分封使他们分别与蒙古权贵建立了密切联系，新一轮的竞争愈演愈烈。噶玛噶举派的教主噶

玛拔希险些使八思巴失去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他为忽必烈和手下们演示了许多神通，这比讲经说法更能引起蒙古人的尊敬。为保持自己的形象，据说八思巴显露了刀断四肢以证明受佛保佑的神通，挽回了影响。

噶玛拔希拒绝了忽必烈留下他的意愿，接受了蒙哥的召请。在哈刺和林，他成功地使蒙哥皈依了佛教。蒙哥赐予他一顶黑色金边僧帽，由于噶玛噶举是最先开始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这顶黑帽成为这派教主转世的凭证。得到了大汗宠幸的噶玛噶举派似乎将要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但蒙哥死后，噶玛拔希站到了阿里不哥一方，并因为阿里不哥的失败受到惩罚，失去了政治地位。

八思巴像

元

西藏博物馆藏

纵151.5厘米，横118.5厘米





金刚手菩萨

元
浙江杭州飞来峰理公塔西
高160厘米

金刚手菩萨是佛教密宗中的八大菩萨之一，在藏传佛教中尤其受到尊崇。在飞来峰上保存有从五代到元代时期的佛教造像380余身，其中元代造像最为精美，共有67龕，大小116身，最大的高3米以上，小的也有1.5米左右，其中藏传佛教造像有46身。造像题记的时间跨度从1281年到1292年。元代藏传佛教受到皇家的崇信，势力大张。藏传佛教僧侣杨琏真伽被任命为管理江南佛教的僧官，在杭州、绍兴一带建寺造像，飞来峰上的藏传佛教石刻有一部分就是在其主持下建成的。

元朝建立后，原先在蒙古人中享有盛名的高僧大德已经先后去世，而八思巴与忽必烈又有特殊的关系，这使他成为中国佛教的最高领袖。原本各种宗教在蒙古统治下待遇相仿，佛教略占上风，八思巴的攀升使藏传佛教享有更加特殊的地位，许多上层人物被封官拜爵，萨迦派的历代领袖更是被尊为帝师、国师，也因此掌控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一直荣宠不衰。忽必烈以后的历代皇帝沉溺于藏传佛教之风愈演愈烈，他们给了僧人过于优厚的待遇。到后来，这种宠遇使藏传佛教变为元朝社会的一颗毒瘤。

历朝皇帝对藏传佛教领袖的赏赐数目非常惊人，而僧人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所耗费的财富也极为可观。仅1317年，政府供给佛事活动的就有面439500斤、油79000斤、酥21870斤、蜜27300斤，还不包括钱财的支

出，主要是由藏传佛教消耗的。元朝财政制度的败坏，和这种惊人的耗费很有关系。一些僧人又以“祈福”为名，要求政府释放囚犯，破坏法纪，甚至还介入朝廷政争。至于其他打着佛法旗号为害四方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即使是在西藏僧人写的历史里面，也说元朝的僧侣绝大部分只是追求利禄和饮食男女的庸俗享乐，可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二、中土释教

1214年，年仅十三岁的禅宗临济宗僧人海云印简被攻掠中原的蒙古军俘获，他意外地受到了蒙古人的尊重。禅宗是当时中原地区最有实力的宗教流派，而临济宗又传播最广，海云和他的师傅中观已经在北方颇具影响，所以他得到了成吉思汗的特别关照。大汗需要他为自己“告天祝寿”，更要借助他传播威德，于是海云成了蒙古人口中的“小长老”，登上了元朝的政治舞台。五年以后，远在西域的成吉思汗专门颁布命令，由海云和中观统领汉地的僧人，并免除他们的差役。在以后的岁月里，海云不仅是一名禅宗僧人，也扮演着蒙古大汗的政治顾问的角色，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的时代，他都有活跃的表现。

窝阔台时期，在对汉地户籍进行调查的时候，为了便于管理，负责的蒙古人居然想出了在人手臂上烙印的办法。海云得知后，劝阻说：人不是马，既然归附了大蒙古国，疆域这么广，就算逃也还在国家里，怎么能和畜牲一样对待呢？忽必烈曾经接受过海云传法授戒，他的长子出生后，海云为这个孩子摩顶，并起名为真金。经过海云的推荐，原为僧人的刘秉忠成为忽必烈最得力的臂助之一。海云死后，在修建元大都的时候，因为

筑城墙将要破坏他的灵塔，忽必烈特意下令，让城墙拐了个弯，以表示对他的尊崇。

当时另一个著名的禅宗领袖是曹洞宗的万松行秀，他在金朝时就已经得到皇帝的恩宠。成吉思汗身边的著名佛教徒耶律楚材曾经跟随他学法，并对他推崇不已。在万松的推动下，曹洞宗在北方形成了较大的势力，他的弟子雪庭福裕曾担任少林寺住持，并在忽必烈时代一度主管佛教事务。

在大蒙古国时期，北方的全真教在蒙古统治者的庇护下迅速发展。初期由于所受到的待遇基本相同，佛道两教还能相安无事，后来由于双方的势力都在不断扩张，所以就引起了大规模的斗争，在互相排挤倾轧之余，甚至发展到抢占对方庙产、聚众斗殴的地步。1255年，蒙哥在哈刺和林组织了第一次佛道辩论，双方主辩分别是全真掌教李志常和少林长老雪庭福裕，结果全真教落败。第二年组织的辩论，全真教没有参加。1257年，忽必烈受命组织了第三次辩论，场面空前，参加者有七百余人。佛教方面除了雪庭福裕，加入了萨迦教主八思巴和国师那摩，全真教方面则是掌教张志敬领军。这本是一次有倾向性的辩论，全真教大败当然在意料之中。这场胜利，确立了佛教，尤其是禅宗在各种宗教中的突出地位。

元朝建立以后，藏传佛教在忽必烈的大力支持下崛起，八思巴成为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原本风光无限的禅宗黯然失色。尽管政治上不得意，但是禅宗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藏传佛教的内容和形式与中国传统相差太远，进入内地时间又短，所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而随着国家的统一，禅宗挟着几百年的宗风，在大江南北都有极大的发展，因此又引起了统治者的猜忌。

唐朝以来，佛教主要形成了三大宗派，



禅宗讲究明心见性，教宗精通佛典，律宗重视修行戒律。1288年，忽必烈又召集了一次辩论，不过这次是在佛教内部进行的。一批江南佛教的领袖来到大都参加了这次集会。禅宗和教宗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辩论，在忽必

维寿和尚墓碑碑额

元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发现
内蒙古博物馆藏
碑额文字为“皇元敕赐大司徒筠轩长老寿公之碑”。寿公，即维寿，号筠轩，是上都著名寺院大龙光华严寺的第六代住持。大龙光华严寺建于1258年，是上都兴建的第一座佛教寺院，属于禅宗中的曹洞宗。维寿因为自身的修行和文化素养被元英宗赏识，授予荣誉官号“大司徒”。维寿善于文辞，与当时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有交往。



贴罗绣僧帽

元
1950年北京双塔庆寿寺海云印简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丝织品
长56厘米，宽12.4厘米
海云印简（1202—1257）死后墓地建在双塔庆寿寺，这顶僧帽是他的随葬品。

烈的裁决下，认定教宗的地位高于禅宗。随着“崇教抑禅”政策的推行，禅、教之间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禅宗仍然是重要的佛教宗派，但是不复以往的显赫。

一些从佛教衍生出来的流派，在元代非常流行。白云宗、白莲教和糠禅在下层社会中都很有号召力，但是他们的际遇差别很大。糠禅也叫头陀教，在金代被视作宗教异端而遭到禁止。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期，糠禅的领袖与蒙古军建立了联系，从此逐渐演化为朝廷尊奉的一种宗教。白莲教和白云宗都曾受到政府的打击，后者渐渐绝迹，但白莲教却几次被禁又几次解禁，越受压制越壮大，甚至将信徒发展到上层贵族中间，最后终于成为推翻元朝的主要力量。

三、丘处机与全真教

在金朝统治下的陕西，有一位叫王重阳

的奇人。他为自己起了个法号叫“生阳子”，自称得到了仙人的指引，在一座被他命名为“活死人墓”的弃坟中苦修了两年多，然后开始了传道生涯。在故乡，王重阳宣扬的儒释道三教平等合一的理论没能吸引足够的信徒，于是他放火烧了自己的茅庵，一路东行到了山东。在这里，他通过苦行消除欲望、以求返璞归真的思想渐渐被世人接受，若干松散的宗教团体在沿海地区建立起来，一个叫全真道的教团开始形成。在众多追随者中，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七个弟子最受他器重。

王重阳死后，在七大弟子的苦心经营下，全真道在中国北方声名鹊起，与太一道、真大道等共同成为新兴宗教的代表。随着影响的扩大，全真道的面目也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向传统的道教靠拢，以致人们把它视作道教的一个流派。到了丘处机掌教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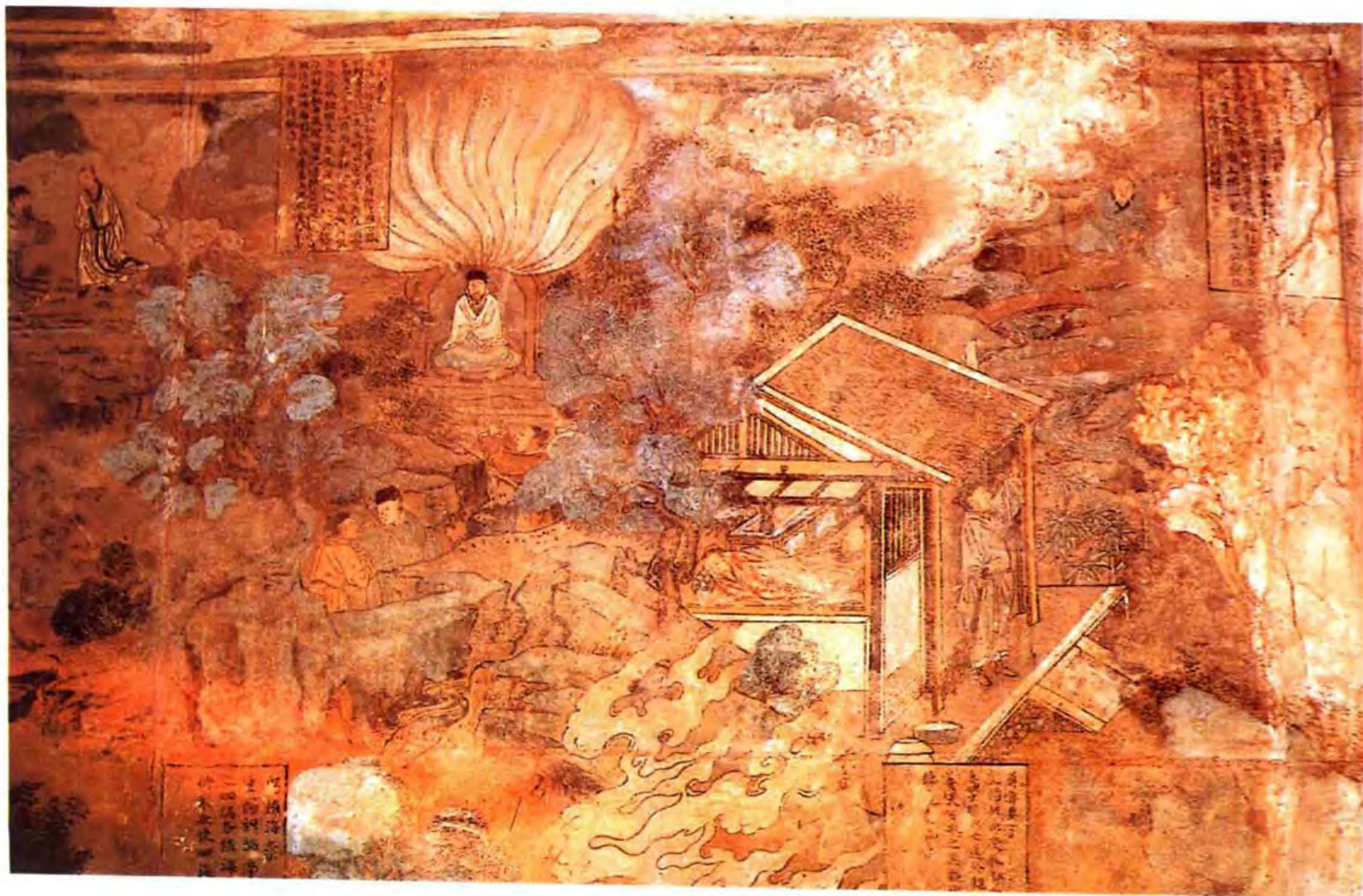
《王重阳故事·南时作居》壁画

元

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东壁发现

纵119厘米，横193厘米

壁画的内容是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在“活死人墓”进行苦修的情景。



代，全真教已经完全是道家正统的气象，同时受到了当时并存的几个政权的重视。1219年，金宣宗、宋宁宗先后派人召请王重阳的弟子、全真教最负盛名的丘处机，都被他推辞掉了。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成吉思汗的使者也来了。

正在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突然感到了生命的短暂，有人向他推荐了中原汉地最著名的道者丘处机，说他已经活了三百余岁，有长生保养之术。怦然心动的成吉思汗于是派近臣札八儿、刘仲禄等前去邀请。当时丘处机虽然处于隐修状态，但对天下大势看得很清楚。第二年的正月，七十二岁的丘处机带领十八位弟子踏上了旅途。

两年以后，在兴都库什山北麓的行宫里，丘处机见到了成吉思汗。这位长生天护佑的征服者迫不及待地询问远来的道长是否带来了长生药，丘处机告诉他自己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丘处机的诚实博得了大汗的嘉许，他得到了许多优待，并且被称为“神仙”。

在西行的路上，丘处机亲身感受到了蒙古军屠杀和抢掠后留下的惨状，于是吟出了

“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的诗句。几个月后在正式为成吉思汗讲解“卫生之道”的过程中，他规劝蒙古大汗要清心寡欲、敬天爱民，而且说要统一天下的人，必须要少造杀孽等等。成吉思汗听进去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他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并给了丘处机“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和全真门人及道观免除赋税差发的优厚待遇。

从西域归来，丘处机声望更重。凭借着成吉思汗赐予的旨意和金虎牌，全真教受到了蒙古官员的优待和礼遇。依靠这种特权，全真教在北方各地广收门徒，救援了数以万计在战乱中面临绝境的人，使很多沦落为奴隶的人恢复了平民的身份，将要被杀的人保全了生命，更多的人直接投到全真门下寻求庇护。全真教也因此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终于形成了与南方上千年历史的正一教并驾齐驱为道教两大分支的局面。

丘处机的政治远见使蒙古君主对该教的宠信持续了三四十年，在这期间，全真教的地位比佛教和儒家还要优越。在民间，全真教的影响根深蒂固，元杂剧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宗教剧有许多都以全真教为题材，王重



成吉思汗圣旨碑

山东青岛崂山太清宫藏
石质

纵59厘米，横74.4厘米

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被给予了一些特权。此碑的碑文内容是丘处机东返途中，成吉思汗派使者阿里鲜传达旨意，命令丘处机掌管中原地区的道教事务。

阳、马钰师徒在世人眼中已经完全是仙人的形象。原本奉行清静寡欲的教派逐渐走向贵盛，宗旨和行为与创教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真门人倚仗特权追逐权势，横行无忌，引起了其他教派的不满。在几次元政府组织的佛道辩论以后，全真教受到沉重打击，又重回到了普通教派的地位。

这种情况直到元朝中期才有所缓解。由于在武宗即位事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全真教再次受到尊崇。王重阳等五位祖师被封为帝君，马钰、丘处机等全真七子被追封为真君，而随同丘处机西行的十八弟子也得到了真人的称号。重新抬起头来的全真教完全放弃了初衷，转而热衷于与显贵们往来交游，竞赛富贵，比试豪奢。虽然教派一直传承了下去，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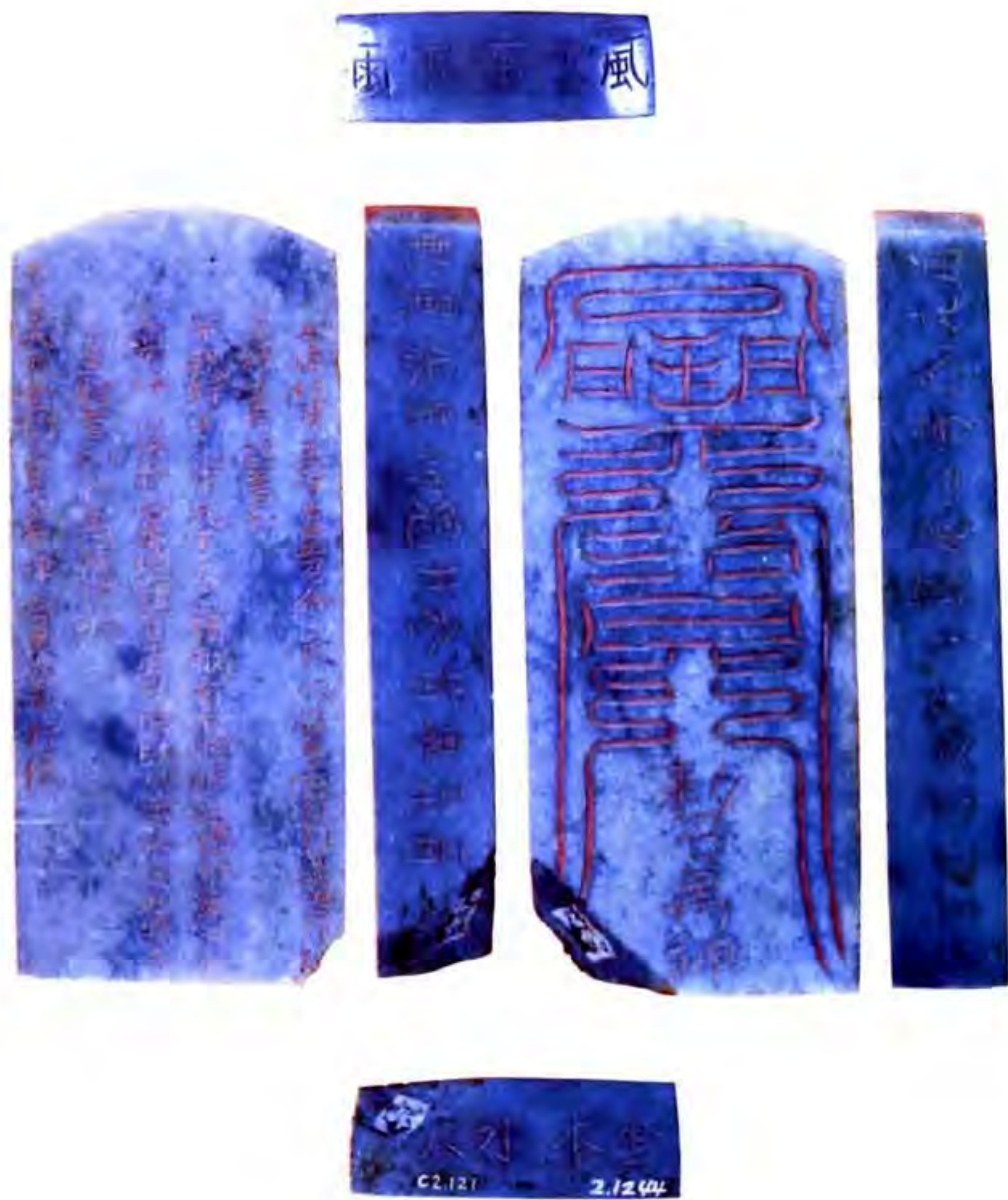
青玉敕召万神符牌

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长16.5厘米，宽7.1厘米，厚2.7厘米

道教人士在进行法事活动时所使用的法器，上面刻有道教符篆、二十八星宿的名称等。



四、龙虎山张天师

1259年，指挥东路攻宋军团的忽必烈在鄂州一带与宋军交战。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人被派往江西信州龙虎山，他的任务是像当年成吉思汗万里征召丘处机一样，与当时在社会上有着相当影响的天师张天师建立联系，为消灭南宋后管理江南做前期准备。

张天师的家族源远流长，始祖是在东汉时期创建道教的张道陵，由张道陵的子孙和信徒发扬光大的流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作天师道，每一代宗主都被尊称为张天师，而且一定与他有直系血缘关系。到了蒙宋交战的时候，天师的道统已经传递了一千一百多年，与上清、灵宝两派并立为以使用符篆为特征的旧派道教的三大主流。除了山东曲阜的孔子后裔，中国再也找不出历史与威望能够凌驾其上的家族了。在唐、宋两朝，虽然有许多帝王崇信道教，在民间极具声势的天师一脉也只是获得了一般性的尊重，未能在官方取得较高的地位，直到宋理宗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忽必烈的密使请这一代的天师张可大占卜天下统一之事，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提出这个特殊的问题，显然有着特殊的含义。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宗教领袖，三十四代先人对教派的经营给张可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就在五年前，宋理宗赐予了他“提举三山符篆、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观”的显赫地位，使他一跃成为江南旧派道教的最高领袖，张可大还是根据自己敏锐的洞察力作出了让来客非常满意的判断。他预言：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可以想见，这样的话从张天师的口中说出，会对遭受蒙古大军威压的江

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张天师的推算十分准确，二十年后正是1279年年初，南宋王朝最后的孤臣在崖山一战之后彻底烟消云散。不过忽必烈没有花费这么长时间来验证结果，1276年，临安陷落，江南初定，他便将张天师召到大都。这时张可大已经去世，继任为第三十六代天师的他的儿子张宗演，替他享受到了皇家的种种优厚待遇。忽必烈在接见张宗演时专门提到已故天师的预言，说：“神仙的话现在已经应验了。”此后张宗演颇得皇帝的信任，多次入朝觐见。忽必烈曾经观看天师祖传信物玉印、宝剑，并对随侍的臣子发了一番感慨：“王朝更替已经不知道换了多少代，可是天师的剑和印却可以子孙相传直至今日，难道真的有神明之相吗？”

作为对天师系统所给予支持的回报，张宗演获得了主领江南诸路道教、赐二品银印的封赏。自此，张天师就成为元朝政府管理江南道教的代理人，依照元朝的宗教政策，实际上也承担着遏制全真教发展的任务。历代皇帝对张天师多有加封，一直到元朝灭亡。有元一代，张天师系统在政治上并不是十分活跃，但在宗教上，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有主管江南道教的权力，所以比较顺利地将旧派道教中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另两大体系上清派和灵宝派吸纳合并，形成正一派，与主要流行于北方的全真教并列为道教的两大流派。

张宗演的弟子张留孙在随从天师入朝的时候，因为应对得体，被忽必烈所看重。尔后他又因为皇后和太子治病有功，因而得到重重的封赏。他在朝廷中获得的政治地位甚至已经超过了张天师。在朝廷有意无意的安排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张留孙为首的天师支系——玄教。其门下弟子并非很多，但往

往有着较高的地位。这未尝不是对在江南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天师系统的分化和抑制。

五、答失蛮与木速蛮

在蒙古军的三次西征之后，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纷纷被征服，这些地区的大批伊斯兰教信徒后来东迁到了中国。其中包括各地降附的贵族和官员、被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归附或者强征来参加征服战争和中国统一战争的军队、为政府服务的学者教士、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以及随他们而来的妇女和儿童。他们与唐、宋两代已经定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一同构成了元朝疆域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特殊群体。

对于这些人，元朝有专门的称呼。主持诵经、祈祷、教育等宗教事务的伊斯兰教经师被称作“答失蛮”，而“木速蛮”则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就是穆斯林。这两个词

波斯文碑

元

存于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

此碑是哈刺和林遗物。碑文的首行内容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其余文字都是波斯文。由于在16世纪修建额尔德尼召时此碑被刻上其他图案，导致内容已经无法辨识。从此碑可以看出当时伊斯兰教在北方草原的活动。



都来自波斯语的音译。而在元朝的汉语里，将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统称为“回回”，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词也泛指所有的西域人和色目人。

由于较早被征服，这些穆斯林在蒙古人心目中有着较高的信任度。从大蒙古国时代开始，已经有许多穆斯林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而商人们更为活跃，他们与皇室权贵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统治者运营资本，牟取厚利，并且负责代为购买奇珍异宝。到了忽必烈时代，李璫之变让他改变了重用汉人的做法，大力提拔以穆斯林为主的色目人加以牵制。随着“四等人制”逐渐成型，穆斯林作为色目人的组成部分，成为仅次于蒙古人的特权阶层。比起以往，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地位。

政治地位的提高对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大有助益。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后裔赛典赤·赡思丁在治理云南的时候，在昆明和大理都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他在昆

明修建了多达十二座清真寺。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自幼信奉伊斯兰教，袭封安西王以后，在辖地内大力传播伊斯兰教，据说曾使部下的十五万名士兵改变了信仰。

穆斯林们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他们的地位既然是因为政治而得到提升，那么也就会因为政治而受到打击。震惊朝野的阿合马事件发生后，回回人在朝廷中的势力遭到了遏制，直到元成宗即位后，重用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赛典赤·伯颜，回回人才重新抬头。但成宗死后，伯颜又卷入了阿难答争夺帝位的事件，被武宗处死。武宗上台后，没有重用回回人。仁宗即位后，更是撤去了掌管伊斯兰教事务的机构。泰定帝掌权，重用了回回人倒剌沙，但是他死后，倒剌沙又在两都之战中站在了失败者一方，穆斯林势力因此再次受到了打击。

因为无法与佛教、道教竞争，同是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势力便将伊斯兰教看作了对手。他们向忽必烈举报，说《可兰经》中有“尽杀所有多神教徒”的话。忽必烈大怒，召集了大都的答失蛮询问此事。如果不是答失蛮巧言应对，很可能就会给穆斯林们带来一场大祸。

元朝的穆斯林分布在全国各地，所以有“元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杭州、扬州、泉州等城市都是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方，在漠北蒙古人的大本营，也有他们的活动。为了加强对穆斯林的管理，元朝政府设立了回回哈的司这一政府机构，掌管穆斯林的宗教事务和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等其他相关事务。“哈的”在阿拉伯语中是法官的意思。为了对穆斯林进行教育，政府还设有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讲授阿拉伯语。

虽然也受到除纳地税商税外不承担任何差发赋役的优待，但是答失蛮的地位还是排

清净寺

位于福建泉州涂门街，清净寺又名艾苏哈卜大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由来华的阿拉伯人建于公元1009年。最初是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的，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现存的清净寺是由阿拉伯人在元代重修的。



在几大宗教的最后。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缺乏本土的基础，很难构成大的威胁，又没有统一的宗教领袖，对传教也不是非常热衷，再加上政府不是因为宗教原因才重用穆斯林，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

六、也里可温

蒙古军的第二次西征，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面对势不可当的敌人，基督徒们无计可施，他们相信蒙古人是上帝派来惩罚他们的罪过的。1245年，当选不久的教皇派遣教士带着他的两封信出使蒙古，斥责蒙古人对基督教国家的侵略和屠杀，并劝蒙古人改信基督教。他在信中大肆宣扬上帝的力量，企图使蒙古人感到恐惧。但他得到的是贵由更为傲慢的回答，贵由命令他“和所有的君主一道，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如果不遵守命令，“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

其实在大蒙古国内部，基督教的影响早已存在。在蒙古语里，将基督教和基督教徒都称作“也里可温”。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或者阿拉伯语，意思是有福分的人。

431年，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被以弗所宗教会议判定为异端，被迫向东发展，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传入唐朝，被称作景教，或者大秦景教。9世纪中叶以后，受到唐武宗灭佛的牵连，景教在中原地区几乎已绝迹，只得转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寻求发展。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之前，草原上几个较为强大的部落汪古、克烈和乃蛮都已经信奉景教。汪古部主要分布在漠南的阴山等地区，20世纪以来在这些地方发现了许多景教遗迹和遗物。约11世纪初，漠北最强大的克烈部接受了聂思脱里派的教义，多数人都成为景教徒，有些还取了基督教的名字。成吉思汗家族与汪古部和克烈部的关系非常

密切，前者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贡献很大，后者曾是成吉思汗的盟友，最终又为其所吞并，他们之间都互通婚姻，所以景教对成吉思汗家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著名的唆鲁和帖尼别吉就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她是克烈部首领王罕的侄女，嫁给了拖雷，也把景教带入了蒙古宫廷。类似于这种情况的还有窝阔台的妻子、贵由的母亲、同样来自克烈部的脱列哥那，以及旭烈兀的元妃托古斯敦，她是唆鲁和帖尼别吉的侄女。除了后宫的影响，还有大量的景教徒作为大臣在蒙古国早期诸汗的周围活动。

这种情况使西方的教会和基督教国家产生了错觉，以为蒙古可以成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度，于是屡屡派遣使节和教士前往蒙古。他们始终没有明白，蒙古大汗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信仰，而是更多的人或神为他们服务。

忽必烈统一中国以后，曾经绝迹于中原和江南的景教再次流传起来，在景教的二十五个教区中，中国占了四个。大都、宁夏、甘州、镇江、西安、泉州、扬州、温州、昆明等地都建有景教教堂，这些教堂依照中国传统的习惯被命名为寺，有些一直保存到明朝时期。到了1333年，教徒已经超过了三万人，

景教铜牌

元

发现于内蒙古

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元代的北方草原非常流行。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地区发现了大量景教僧侣喜欢佩带的铜牌，可见当时景教的活跃程度。





也里可温瓷墓碑

元

1982年内蒙古赤峰城子乡元代松州故址出土

内蒙古赤峰松山区文物管理所藏

高47厘米，宽39厘米，厚6厘米

在墓碑的正面，被十字架划分的四个区域里，上面两部分的文字为叙利亚文，下面两部分的文字为回鹘文。出土这块墓碑的地点是目前内蒙古有景教遗物的最东点，学者们据此判断当时景教的传播范围比原来认识到的大很多。

其中有许多都是蒙古官员和贵族。不过在一些罗马教士的眼中，中国的景教徒大多是酗酒、多妻和盘剥重利之徒。

1293年左右，罗马教士约翰·孟特·戈维诺将天主教传入了中国。他得到元成宗的许可，积极展开传教活动。在中国的第一年，信奉景教的汪古部高唐王和部众就被他劝说改信了天主教。在大都，经他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六千人。1299年和1305年，孟特·戈维诺在大都先后建起了两座天主堂。1307年，罗马教廷委任他为大都大主教暨全东方总主教，随后又派遣了一批教士来中国。几年后，泉州也设立了主教区。在扬州，也有天主教士活动。

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大主教的位置

空缺。一部分大都的忠实信徒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来。一个五十人的使团受教皇的派遣来到中国，向元顺帝献上了书信和包括一匹良马在内的礼物，但是接替孟特·戈维诺的人一直没有出现。

在元朝，也里可温的地位低于佛教和道教，而在伊斯兰教之上。1289年，元朝政府设立了崇福院，与领导道教的集贤院同级，专门管理基督教及其相关事务。经过教士们的努力，元代的也里可温信徒总共有数万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西域部族的色目人，汉人仍然对基督教缺乏了解，这使也里可温缺乏生存的深层基础，也难怪元朝一灭亡，基督教在中国就立即烟消云散了，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再次传入。

第二节 流行风尚

流行的风尚能够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面貌，在元朝这样有着丰富文化背景的国家，人们的好恶最能够描绘出社会的状态。由于自身文化的落后，蒙古的统治者们希望用自己的传统习俗来抵御被异族同化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混杂在一起的不同文化之间，完全的隔绝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在社会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蒙古人通过自身的强势地位将本民族的流行文化带入了中原和江南，对其他各族民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也无法摆脱更为先进的文明的冲击，更何况来自被征服者丰富多彩的娱乐、享受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

一、袍服·笠帽·罽毵冠

面对一个多个民族、多种文化并存的国

家，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希望能够保持自己固有的传统。在生活中，他们仍然喜爱穿着草原上的服饰，这既是民族习惯，又是尽量避免被中原文化同化的努力。

最典型的蒙古服装是袍服，与中原和江南大多数民族的“左衽”习惯不同，蒙古袍服采用的是“右衽”方式。对蒙古人的生活作过详细观察的传教士鲁不鲁乞这样描述：“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蒙古族无论男女，袍服都是主要服装，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同。蒙古妇女的袍服更为宽松肥大，在欧洲传教士看来，“同修女的长袍一样宽大”，“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更宽大一些和更长一些”。不仅如此，贵族女性的袍服下襟往往能够盖住足部，衣边拖地，走路的时候需要有两个女奴在后边托着。

早期的蒙古族制作袍服的材料非常简单，主要是毡子和动物的毛皮，都直接来源于游牧生活。在一系列的征服之后，中原、江南、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和棉织品被大量使用，其中不乏织金锦等名贵的织物。毛皮仍然是制作袍服的重要材料，做出的皮袍被蒙古人叫做“答忽”。为了在冬天御寒，蒙古人“总是至少做两件毛皮长袍，一件毛向里，另一件毛向外”。来自北方诸多被征服地区的贡品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提供制作袍服所需的珍贵毛皮。进入元朝以后，皮袍仍然非常流行，忽必烈的皇后察必曾经在皮袍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种叫“比甲”的新式服装，前短后长，没有领子和袖子，在骑射时非常方便。

笠帽是蒙古族男子夏天的必戴之物，到了冬天，他们改戴皮制的暖帽。笠帽的顶部是圆的，周围有帽檐，帽檐有的形状为圆，有的前圆后方。按照汉族文人的解释，笠帽是从作战用的头盔发展来的。早期的笠帽没有



元成宗像

前边的帽檐，有一次忽必烈在妻子察必面前抱怨被日光刺痛了眼睛，于是这位皇后亲自设计了加上前檐的笠帽，忽必烈非常高兴，就把这种形式作为制度保留了下来。王公贵族所用笠帽最主要的装饰品是珍珠和宝石，暖帽当然多数是用珍贵的皮毛制成，而且往往要与身上的袍服相配。

比起袍服和笠帽，罽毳冠更容易引起外族人的兴趣，几乎每一个曾经前往草原地区



察必皇后像

并留下了文字记录的人都提起过这种独特的服饰习惯。“罟罟”这个词来自蒙古语的音译，在一些文献里也被写作姑姑、固姑、故姑等等，专门指蒙古已婚妇女所戴的冠帽。通过罟罟冠上所用的织物和装饰品，很容易分辨出妇女的地位高低。

这种形状奇特的帽子通常用树皮、树枝、铁丝等比较轻的材料为骨架，外面包上各种织物。罟罟冠的顶端呈正方形，从上至下，越收越细，在顶端的正中间或者旁边，插着一根羽毛或者细棒，上面用孔雀的翎毛作为装饰。在鲁不鲁乞的眼中，“当几位贵妇骑马同行，从远处看时，她们仿佛是头戴钢盔手持长矛的兵士，因为头饰看来像是一顶钢盔，而头饰顶上的一束羽毛或细棒则像一只长矛”。进入元朝以后，罟罟冠仍然在宫廷和蒙古贵族家庭中流行，只是更为华丽和奢侈。这种草原的普通服饰到了江南便让人觉得无比新奇，所以一出现就有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景象。

虽然蒙古人努力维护着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但是在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下，变化的发生还是不可避免的。开国功臣木华黎由于负

责经略汉地，他的家族得以最早与中原文化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他的儿子孛鲁就接受了汉族的审美观点，拒绝按照蒙古的方式剃发，并且改穿汉装。忽必烈的幕僚们遵循儒家传统精心设计的礼仪制度，也对蒙古人的服饰观念发生了影响，朝廷官员和皇家近卫怯薛的服装都出现了中原化的倾向。同样，蒙古人的喜好也对中原和江南的各族居民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文化的交融总是在这样一种交互状态下进行的。

到了元朝末年，“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高丽的服装样式突然成为流行趋势，对蒙古人和汉人都产生了影响，即使是最为顽固的江南也不例外，“紫藤帽子高丽靴”成为一时的风尚。这一切只是因为来自高丽的宫女温婉娇媚，往往能够得到宠爱，在后宫中形成影响，结果将服饰的潮流都改变了。

二、骑射·蹴鞠·打马球

来自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蒙古人，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同时还要学习骑射。曾经出使蒙古的西方传教士卡宾尼对此非常惊讶，他看到“小孩刚刚三两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飞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教他们射箭”，而且不论男女，都是如此。战争之外，狩猎是蒙古人表现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本领的最佳方式。

对于蒙古人来说，狩猎不仅能够获取食物和做衣服的毛皮，作为牧业生产的有效补充，还可以有效地进行军事训练，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娱乐方式，所以在蒙古人的生活中，狩猎与战争、宴饮并列为国家的三件大事。成吉思汗的将领们普遍认为打猎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忽必烈本人也经常主持被汉人

《对坐图》(壁画)

元

1982年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宁家营沙子梁元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宁家营沙子梁元墓墓室北壁

高94厘米，宽243厘米
这是一幅蒙古上层人物的日常生活形象图，主人的服饰有着鲜明的蒙古族特点。



称为“打围”的大规模的围猎。这种围猎时间长达数月，参与者数万骑，完全按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最后的猎获物数量惊人，更重要的是部队得到了锻炼。以后的大汗、皇帝们对此更是热衷，不过寻欢作乐的意味远远大于获取食物或者军事训练。窝阔台抱着重病之身仍然不放弃打猎，结果中途死去。入主中原后，历朝皇帝借着每年前往上都的机会，都要搞几次围猎。

虽然对打猎如此狂热，蒙古人并不是一味地滥杀猎物，每次“打围”快将结束的时候，他们总会闪出一条通道，让余下的野兽逃生，而且狩猎的时间一定选择在秋、冬季节。元世祖忽必烈曾经为此专门下达旨意，宣布自正月初一至七月二十日之间，无论什么人打猎都会获罪。这样有利于各种野生动物的繁殖和生长，保障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和乐趣。当时的蒙古人虽然文化、科技都很落后，但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和保护却十分重视。

随着征服的疆域不断扩大，蒙古人接触到了更多种形式的娱乐方式。唐代传入中国，此后历经宋、金始终盛行于上层社会的运动方式——打马球在蒙古人中迅速流行起来。马球的“球”用皮制成，中间塞以绒毛，当时通常写作“毬”，打马球被称作“打毬”、“击鞠”或者“捶丸”。这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体育运动，二十余名参赛者分为两队，在场地中纵马往来奔驰，场面蔚为壮观。骑手用木制的长柄球杖控制球，以将球打入立有双柱为标记的球门为胜。这种比赛对参与者的骑术、胆量、臂力、相互配合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能够被蒙古人接受并由衷地喜爱。入元以后，宫廷和驻守地方的贵族们在每年的端午和重阳这两天都会举行大规模的马球比赛，胜者会得到优厚的奖赏。

在其他时候，有条件的贵胄子弟和军队中也会经常组织比赛和练习。

由于需要场地、装备、马匹等多方面条件，所以在民间打马球并不十分流行，与马球同时被称作“捶丸”的步打球则更受欢迎。步打球也使用球杆，但不用骑马，也不用立球门，只是在地上挖一个叫做“窝儿”的洞

《元世祖出猎图》

元 刘贯道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绢本

纵182.9厘米，横104.1厘米



《击球图》(壁画)

元

纵112厘米，横175厘米
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西壁北部上层发现
画中人物正在进行“步打球”的比赛。步打球又称“捶丸”，是元代非常流行的球类运动，在宫廷和民间都很受欢迎。



穴，参与者步行击球，入“窝儿”者获胜。步打球盛行于宋代，元代在民间非常普及，尤其是风流子弟和浪荡少年们必精的技艺。在宫廷中，步打球也颇盛行，萨都刺的诗句“内臣净扫场中地，官里时来步打球”说的便是宫中辟有专门场地，皇帝经常以此为乐。当时有人写了一部《丸经》，记录了步打球的各种规则和技法。

另一种风靡全社会的球类运动是“蹴鞠”，其普及程度还要高于打马球和步打球。所谓蹴鞠，就是用脚踢球，使用的球也是用皮制成，使用时吹气使其膨胀，所以也叫“气毬”。蹴鞠的对抗性较低，运动量也较小，但富于表演色彩，对技巧要求较高，元代的风流人物们常以精通此道自诩。关汉卿就是蹴鞠的好手，他的散曲中说“散闷消愁，惟蹴

《马球图》(壁画)

元

内蒙古赤峰三眼井元墓壁画
马球是元代上层社会中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这幅壁画描绘了进行马球比赛时的情景。



鞠最风流”。与其他运动不同，对蹴鞠的爱好不是男子的专利，许多青年女子也经常蹴鞠为乐。在宫廷生活中，蹴鞠也有一定地位。元武宗曾经想赏赐善于蹴鞠的近臣十五万贯钞，这即使是在生活极为奢侈的元代宫廷也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当然被大臣劝止，由此可以想见蹴鞠在宫廷娱乐中的流行程度。

三、尽教满酌大金钟

蒙古国的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在回顾即位后政事的得失时，认为自己有四大成绩和四大失误，失误的第一条就是沉迷于饮酒。虽然有着这样的反省，他仍没有任何要改变的意思，最终还是死于酗酒。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贵由也有着同样的爱好，而且很可能是因为酒醉后与人殴斗而死。酒对蒙古人有着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是因为在北方严酷的生存环境中，酒可以带来一些温暖和麻醉后短暂的快乐，使艰难的生活能够过得轻松一些。这种嗜好逐渐成为传统，被一代代继承下来，以至于饮酒成为蒙古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在早期的草原生活中，蒙古人的酒类饮料只有马奶酒，这是因为原料容易获得，而且制作技术简单。蒙古人将马奶放入大皮囊，然后用特制的棍棒快速搅拌，通过这种方式使马奶开始发酵，然后继续搅拌直至变为酒味，普通的马奶酒就制成了。如果是王公贵族所饮用的，还要经过更长时间，甚至多达八九天的搅拌，将马奶中固体的渣滓和酒液完全分离，最后的产品被称作黑马奶酒，颜色清澈，味道甘甜，与普通的马奶酒大有不同。尽管后来蒙古人接触到了更多种类的酒，但他们对马奶酒的喜爱一直未曾改变。元朝建立以后，宫廷里有专门的官员负责为皇帝和贵族制作马奶酒，还有专门的马



《蹴鞠图》书影

选自南宋陈元靓撰著《事林广记》

鞠蹴是元代流行于全社会的一种运动和娱乐方式，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这种运动的特点是对抗性小，炫耀技巧的成分在运动中占有很大比重。



葡萄酒瓶

元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巴彥塔拉乡原集宁城故址附近出土

在这件瓷瓶上刻有“葡萄酒瓶”四字，说明这是盛装葡萄酒的专用容器。葡萄酒在元代上层社会里非常流行，有着巨大的消耗量。



鏤花高足金杯

元

內蒙古包頭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大蘇吉鄉出土

高12.5厘米，口徑10.8厘米

群用来提供原料。但是这种酒对中原和江南的汉族社会影响不大，只有少数上层人物才对它有兴趣。

成吉思汗对中亚的征服，使这一地区的葡萄酒成为贡品，并且博得了蒙古人的欢心，成为宫廷中的常备之物，在以后的宫廷宴会中经常会出现“酹官庭前列千斛，万瓮葡萄凝紫玉”的壮观场面。在13世纪中叶使蒙古的南宋官员对这种酒印象很深，还因为没有机会多饮表示了小小的遗憾。南宋灭亡后，胜利者对亡国的君臣在生活上颇为优待，表现之一就是能够喝到御厨配给供应的葡萄酒。元朝建立后，与控制中亚地区的察合台汗国关系十分恶劣，那里的葡萄酒也断绝了供应，现在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和山西成为最重要的产地。出于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山西的葡萄酒略逊一筹，吐鲁番地区主

要承担了向宫廷进贡的任务。

对草原以南的农业区展开的进攻，让蒙古人接触到了粮食酒。当时的粮食酒是汉人社会中的重要饮料，主要以黍和糯米为原料，通过酒曲发酵而成。到了窝阔台时代，粮食酒在蒙古人中已经非常流行，窝阔台也承认自己酷爱这种酒。忽必烈迁都大都以后，所设置的政府机构中就有专门负责酿造粮食酒的光禄寺，属下包括专门生产皇帝所用“细酒”的尚饮局、为诸王百官提供服务的尚酝局、管理原材料的澧源仓，而且同样的班子在大都和上都各有一整套，可见需求有多么可观。就连居住在大都的高丽人都注意到，光禄寺所酿的酒质量远胜一般市集中所出售的，所以他们在聚会时也要设法搞到证明文件，从光禄寺讨要。

以上各种酒都是发酵而成，酒精含量不会很高。到了14世纪上半期，蒸馏技术从海外引入中国，并且开始大规模应用。此前虽然也有这项技术在中国出现的迹象，但无疑未能形成影响。通过这种技术，可以对马奶酒、葡萄酒、粮食酒进一步加工，从而得到酒精度数很高的蒸馏酒。这对于好酒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于酒的生产，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所以，蒸馏法很快就从宫廷传播开来，在民间广为普及。

豪奢的酒宴只能供王公贵族们享用，普通人自有寻找饮酒快乐的去处。大都造酒的作坊至少有一百多家，生产量可想而知。酒馆通常被称作酒楼、酒肆或者酒坊，也很发达。在大都，一家典型的酒馆是这样的：门首被盖成宫殿一样形状，升、斗模样结构的红漆栏杆护着，上面画着战国四君子：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和平原君；门两边的墙壁上画着车马、随从和伞盖仪仗；门额上画有汉钟离和吕洞宾的像；在正门前竖起像山

子一样的三层招牌，上面用金字写着店名。在夏天，酒馆还会将冰块放入大长石槽，用冰自然融化的水降低酒的温度。这些以普通民众为服务对象的酒馆，以酒旗为共同的标志，分布在元朝广阔疆域的大小城市中，为好酒的人们带来生活的乐趣。

四、御衫绣做满池娇

14世纪30年代前后，一种叫做“满池娇”的刺绣图案突然开始在元朝的达官贵人中流行起来。这个名称所代表的池塘中的荷花、禽鸟所构成的装饰题材其实早就出现，通常被叫作“池塘小景”。“满池娇”这个词汇也并非到了元代才被提出，南宋时候临安繁华的夜市里，一些商家就已经在夏、秋时节销售“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这样一种汉化风格的典雅图案怎么会忽然受到一直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蒙古上层社会的青睐呢？

出于皇室与王公贵族的偏爱，精美华贵的丝绸织物在元朝大行其道，从事丝织业的大型作坊都由官府设立，明确列入职官序列的就包括丝织作坊六十四所、织佛像作坊一所。这些机构每年各自的生产额度动辄三四

千匹，如果再算上民间出品，数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当时丝绸织物的主要品种包括风靡天下的织金锦，在元代通常以波斯语或阿拉伯语称其为“纳石失”；来自中亚的传统织锦“撒答刺欺”；四川的特产蜀锦；后世称之为缎的苧丝；唐代开始从西北传入中原的缣丝；专为皇家制作、记录已故帝王后妃形象的织御容；应用范围极广的刺绣等等。

虽然后人对绣画工艺多有诟病，元代的实用品刺绣其实较之以往有着不小的发展。在官方而言，至少有工部大都人匠总管府的绣局和匠作院异样局总管府的异样纹绣提举司这两个机构专门负责刺绣的生产制作。到了元朝中期，当时最为著名的刺绣产地福建仅福州一地就有五千名男女绣工为官府提供服务。而在被禁止获得和使用高级丝绸织物的民间，刺绣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精美的刺绣作品的价值还在达官显贵所喜爱的织金锦之上。

元朝的社会生活中，刺绣的应用非常广泛，甚至在达官贵人们的帐幕、车舆中也往往用为点缀，但使用最多的，还是在服饰上。“满池娇”正是作为元文宗所喜爱的御衣图

罗地刺绣夹衫及局部

元

1976年内蒙古元代集宁路城窖藏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衣长62厘米，两袖通长43厘米，袖宽34厘米，领口深3.5厘米，腰宽53厘米，下摆宽54厘米

这件夹衫的刺绣手法，与现代苏州的刺绣针法非常相近。衫上共有刺绣图案99组，题材广泛，大小不一。最大、最精彩的两组图案分别被绣在双肩，内容是莲塘仙鹤，也是典型的满池娇图案。



景德镇窑青花莲池鸳鸯纹碗

元

香港葛氏天民楼基金会藏
高12厘米、口径29厘米，足
径10厘米

这件瓷碗为元代惟一的官府瓷器作坊浮梁磁局所烧制。碗内心单圈线内绘制的莲池鸳鸯纹是典型的满池娇图案。以往这种图案通常被称作池塘小景，非常流行。满池娇图案在浮梁磁局出品的青花瓷器中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元代中期以前，满池娇图案构成差别比较大。到了晚期趋于整齐划一。这可能与元文宗对满池娇图案的喜爱有关。

案而得以流行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开始接受汉族文化，而且有着颇深的造诣。用典型的蒙古草原式阴谋手段从兄长手中夺回皇帝宝座的元文宗，是历代蒙古君主中对汉族传统文化浸淫最深的一位。文宗在位期间不但推广儒学，编纂经籍，而且大力提倡艺术。他设立了奎章阁，聚集一批书画家品评鉴定古今书画名作，他本人也能书善画，当时的名家曾这样评论他的作品：“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有着这样的文化背景，清雅秀丽的“满池娇”图案会被文宗所欣赏，并选为御衣图案频频使用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汉族文人来说，“满池娇”出现在蒙古皇帝的御衣上，是一件给人深刻印象的事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诗句：“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起，御衫绣作满池娇。”

皇帝的喜好往往对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

有着深远的影响，“满池娇”因此在元朝的上层社会流行起来，一些权贵也纷纷穿起有这种图案的衣服。此事给在大都的高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甚至注意到在大都午门外骑马的贵胄中就有人“拴着一副鸦青缎子满刺娇护膝”。或许是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他们将“池”误为“刺”。对于这种图案，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以莲花、荷叶、藕（即藕）、鸳鸯、蜂、蝶之形，或用五色绒绣，或用彩画画于段（即缎）帛上。”

“满池娇”的流行，在元朝后期受到直接影响的不仅仅表现在服饰上，还有官方烧制的青花瓷器。在元朝惟一的官方瓷器作坊，位于景德镇的浮梁磁局所烧制的作品中，“满池娇”是运用最多的主题之一。以往“满池娇”使用虽多，但是构图、形象的差异较大，但是到了元朝晚期，突然趋于一致，可能是受到了文宗所用御衣图案的影响吧。

第三节 典章文化

在民族等级制压迫下的中国文人，由于失去了参与政治的可能，于是转而将才能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文人直接参与到文化和艺术的创作中，他们的文化素养，为元朝的文化和艺术营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而文人们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也让他们更为深入地接触生活，给各种艺术形式带来了生命力。在另一方面，统治者们也希望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因为缺乏基础，他们只能借助外部的力量，尤其是通过宗教。

一、崇尚复古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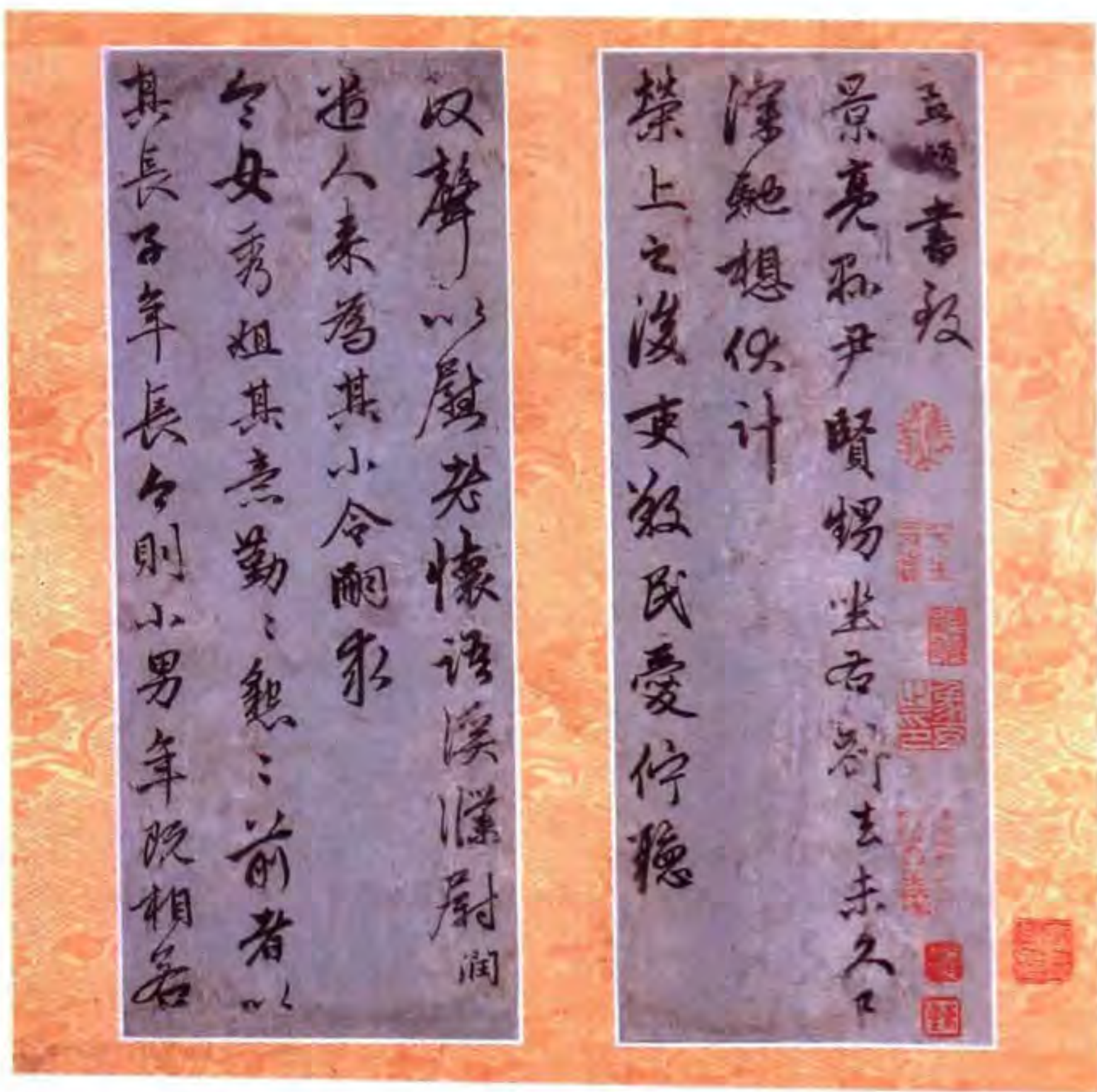
在元朝初年的文人中，书法这种艺术形



式已经广泛流行。长期的南北分裂对书法的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延续的都是宋人“尚意”的笔法，但北方盛行的是由金朝传承下来的追求奇绝险峻的风气，南方则追求狂放不羁的神韵，书法家们过于热衷于表现自己的胸中意气，而忽视技法功底，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没能出现真正具有个人风格的书法家。

这种情况直到赵孟頫在艺坛崛起以后才发生了变化。赵孟頫早年曾经学习钟繇、智永、褚遂良等人，但终其一生，一直在追求王羲之、王献之的书风。经过长期的学习，赵孟頫在四十六岁以后终于兼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能够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这些前辈大家比肩。他对篆、隶、小楷、行、草书等各种字体无不精通，但成就最高的还是楷书和行书。宋人所崇尚的险怪的书法潮流为赵孟頫深深抗拒，他提倡复古，强调以“古法”为准则，具体来说，便是恢复晋唐清隽的风范，尤其要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楷模。赵孟頫本人的书法法度谨严，用笔遒劲，体势朗逸，风格柔媚，有“匀净平顺”的特点。

在赵孟頫的引领下，一批有成就的书法家在元初的书坛上先后涌现。赵孟頫的朋友鲜于枢出身平凡，主要通过自学领悟了书法的精髓。二人当时齐名，并称为“二妙”，又有“南赵北鲜”的说法，但是在理论上，鲜于枢非常服膺并且追随赵孟頫的复古观点，只是赵孟頫主要师承魏晋，而他则取法唐人。他的书法成就主要在于行书和草书，在草书方面师法的是唐代的名家怀素，而且还能够创出新意。赵孟頫对他在草书上的成就非常推崇，认为远在自己之上。鲜于枢的笔法骨力遒健，气势雄伟跌宕，行笔潇洒自然，自成一格。



邓文原与赵孟頫和鲜于枢并称为元初三大大书法家。由于他早年学习王羲之、王献之，后来又改宗唐代李邕，所以他的书法风格恰好在赵孟頫和鲜于枢之间。他擅长楷、行、草书，行书与赵孟頫很接近。邓文原运笔清劲秀丽，韵致古雅，流利矫健，很有个人特色，但是中年以后他进入官场，书法之道也就渐渐荒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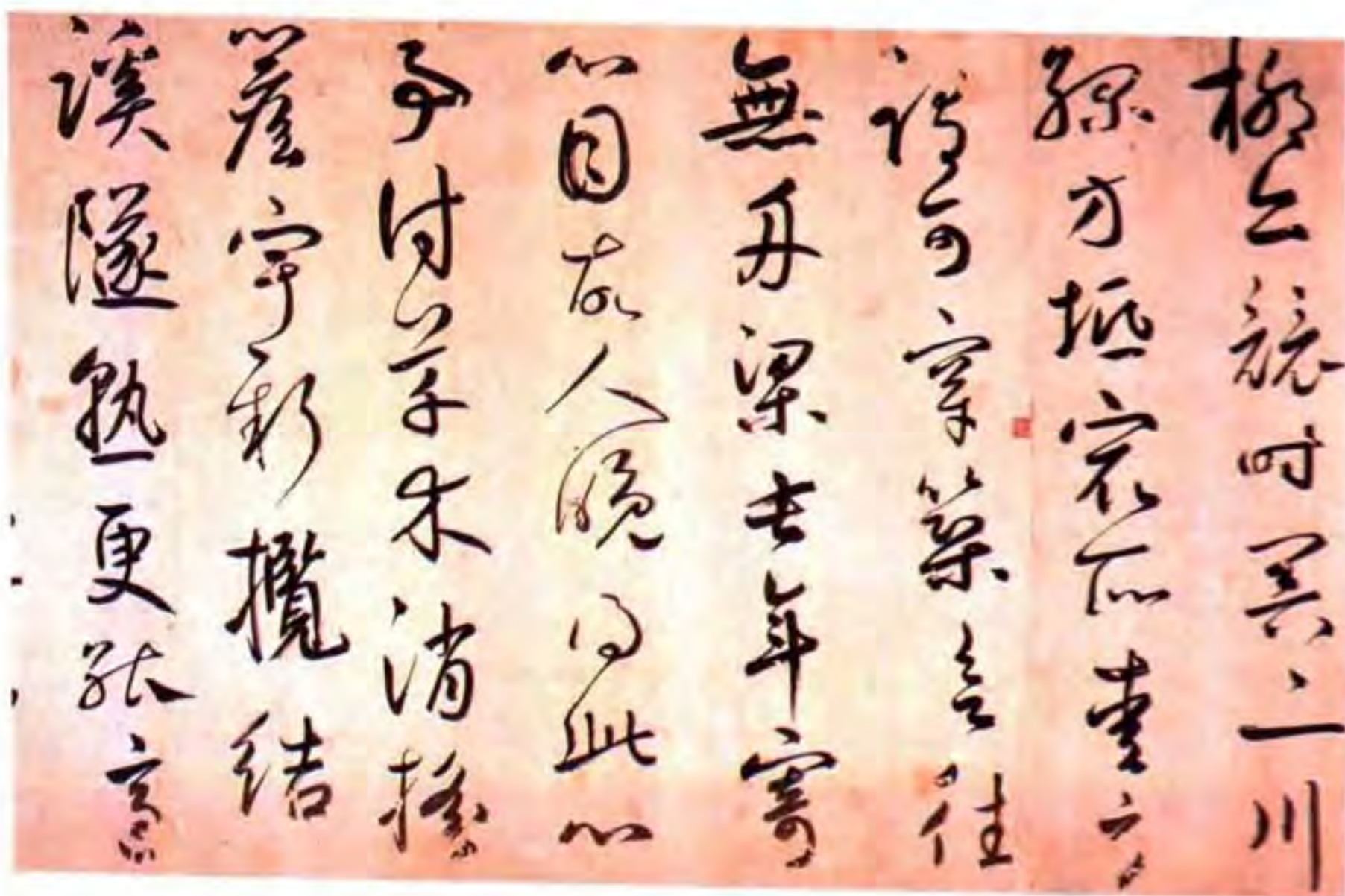
赵孟頫的书法创作和理论给元朝书坛带

《致景亮书册》

元 赵孟頫书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共四幅，每幅纵29厘米，横11.5厘米。

《王安石杂诗卷》

元 鲜于枢书
辽宁省博物馆藏
纵50厘米，横1025厘米
鲜于枢(1257—1302)是元代著名书法家。





《陈氏方寸楼记》

元 危素书

故宫博物院藏

纵23.4厘米，横10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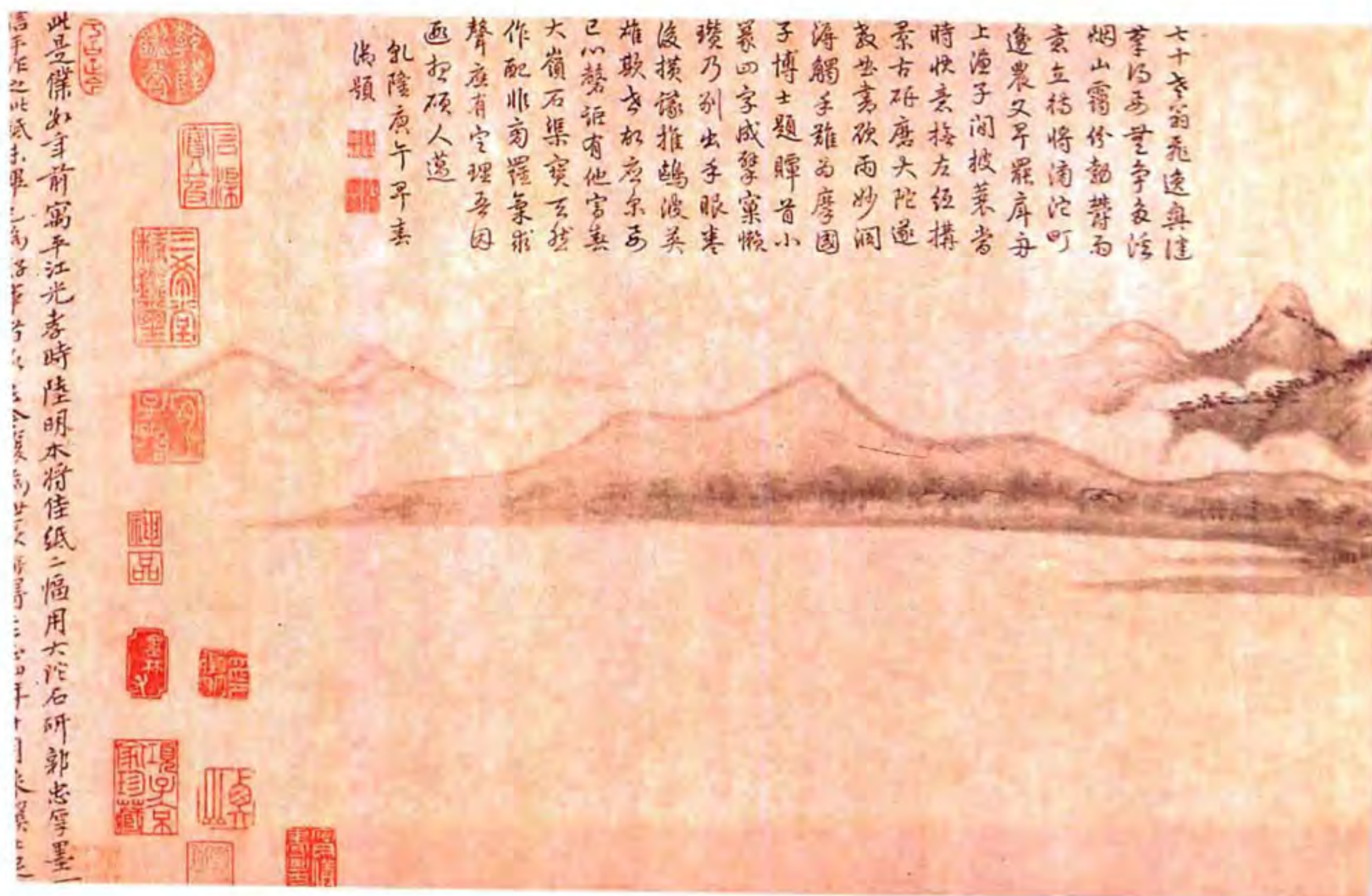
著名书法家危素（1303—1372）字太朴，号云林，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危素主要活动在元代，直至明初仍然很有影响。这篇《陈氏方寸楼记》是危素为陈贵所住的“方寸楼”撰写并书写的文章。

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虞集、柯九思、揭傒思、周伯琦、张雨、吾衍、俞和等人不是学他，就是遵循他的理论，其结果是风格渐渐定型，面貌日益单一，反而将书法界带入了新的困境。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一些书法家进行了努力和尝试。冯子振和杨维禎对赵氏风格笼罩书坛非常不满，他们打破常规，另辟蹊径，用古拙、怪异和放纵的方式为元朝的书坛带来了一些新意，形成了“尚趣”的潮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许多少数民族人士对中原

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回回人**虞**就是其中的一个。**虞**出身于显贵之家，自幼学习书画。在书坛追随赵孟頫的大潮下，**虞**试图让局面有所改变。他吸收了赵孟頫的长处，更广泛汲取晋唐各大名家的精华，最终摆脱了赵孟頫的影响，建立起了自己的风格。他擅长楷、行、草书，行笔迅急，笔画遒媚，转折圆劲，是赵孟頫和鲜于枢之后成就最为突出的书法家。

从赵孟頫开始的诗、书、画相结合的风气在艺术品的形制上是个突破，到了王冕的时代，又加入了篆刻的内容，这使书画艺术



的表现力更加丰富，更具有观赏性。总的来说，元朝的书法成就比较有限，但是仍然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元朝书法避开了宋朝的流弊，远接晋唐，对古典传统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并创造出鲜明的时代风格，对后来的明清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绘画名家辈出

宋、金、蒙彼此攻伐不休引起的战乱，使中国的绘画完全陷入了低谷，直到蒙哥在位时期，一直没有出现有成就的画家和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从忽必烈时代开始，特别是元朝统一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书法的情况一样，长期的战争让南北的绘画流派和风格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北方沿着自五代至金的传统，几乎不受南宋画风的影响。南方的许多文人在民族等级制度的压抑下，因为仕进无门，转而投身于艺术活动，发展了宋朝以来的文人写意画，并逐渐成为元朝绘画的主流。元朝的统一，使得隔

绝已久的南北画界有了相互了解和接触交流的可能，从而推动了艺术的进步。

就身份而言，元朝的画家大致可以分为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两大类。元朝没有设置画院，宫廷和政府下的专门机构直接掌握了一批被称作“画匠”、“画工”的职业画家，为宫廷、王公贵族和官府绘制肖像、佛像和装饰陈设画，刘贯道、王振鹏、李肖岩等人都是这种情况。在民间也有一批职业画家，社会地位不高，其中较为著名的可以得到“画师”和“画史”的尊称。他们的作品多数属于写实风格，在寺观的壁画中可以看到许多优秀之作。

文人画家是元朝画坛的主流，但是在人数上要远远少于职业画家。文人画家中包括高级官员、一般官吏以及普通文人。他们有一定传统文化修养，以绘画为业余爱好，并且作为怡情养性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文人画家的作品强烈突出绘画的文学性，重视画中的书法趣味和诗、书、画的进一步结合。赵

《溪山雨意图》

元 黄公望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纵30厘米，横217.5厘米

与吴镇、王蒙、倪瓒并称为“元四家”的黄公望是常熟人，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生于1269年，死于1355年前后。黄公望以山水画闻名于世，对后人的创作有一定影响。此画比较能够代表黄公望的画风，倪瓒在题跋中说“此卷尤其得意者”。





《棘竹幽禽图》

元 张彦辅绘

美国奈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藏

纵63.8厘米，横50.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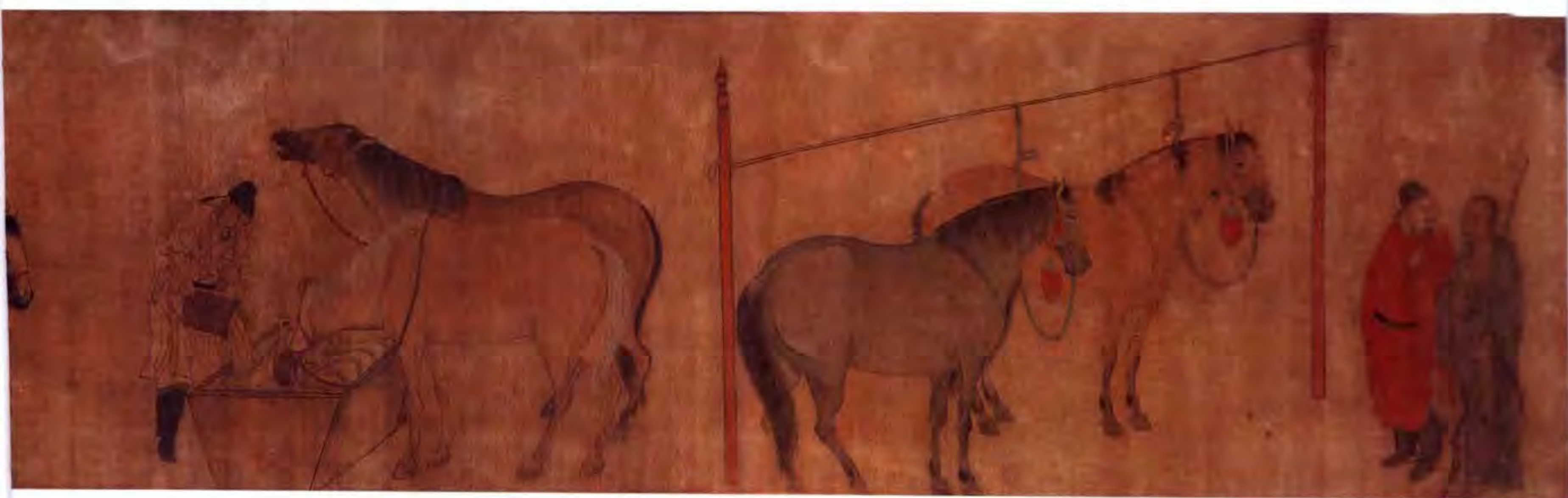
孟頫是文人画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对于绘画的不同题材和不同技法，赵孟頫都非常精通，并且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自成一派。针对南宋院体画留下的弊端，赵孟

頫提出了作画要有“古意”、“不求形似”的理论，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画坛风气为之一变。

在以前无古人的面貌出现的文人画中，山水画占有很大比重。早期的山水画名家在北方有高克恭和商琦，前者是久居大都的色目人，他与赵孟頫并称为元初二大家，山水宗米芾父子一派。南方的领袖是赵孟頫及其好友钱选。赵孟頫的山水画有学唐人、学董巨、学李郭三种风格。到了元朝中后期，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被合称为元季四大家，都继承了被赵孟頫改造过的董源、巨然派山水画。在职业画家中，盛懋是少数受到文人画影响而改变画风的人之一。

木石梅兰这类绘画题材，自宋代起为文人所喜爱，日趋兴盛。进入元代，仍是文人画的主要题材，而且开始向水墨方向发展。赵孟頫创作了许多这类题材的作品，他的妻子管道昇对此也十分擅长。李衍是元朝前期享有盛名的画竹大家，他学习的对象是历代的画竹名家。李衍还专门著有《竹谱评录》一书，讲述他学习画竹的经过和心得，并且收集了各种竹的资料作为创作参考。遗民郑思肖是首屈一指的画兰名家，他画的兰花根茎都露在外面，表示故土沦丧。





人物画又可分道释、人物故事、肖像三类，历来在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元代的文人画中并不兴盛，原因是复杂的社会背景使文人画家们对画人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画人物的高手仍然很多。赵孟頫的人物画风格古朴，富有变化。水利专家任仁发的人物鞍马师法唐人，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手法，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元初与赵孟頫齐名。钱选擅长人物故事，风格古朴淡雅，而且极力试图摆脱南宋院画的不良影响。

在花鸟、界画、画马等其他方面，元朝的文人画也都有着很高的成就。

元朝统治的百年中，由北宋末年的苏轼、米芾等人倡导发起的文人画得到了迅速发展，绘画的风格也从写实向写意转化，创作中主观意兴的抒发代替了对自然景物的刻意求工，给中国的绘画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在元朝特殊的背景下，有成就的画家不断涌现，使这个由落后的草原民族统治的时代，在艺术史上盛况空前。

三、勾栏天地

在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融会之后，从宋杂剧和金院本发展而来的元杂剧作为中国第一种成熟的戏剧形式出现了。孕育这种艺术



《饮饲图》

元 任仁发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纵29.7厘米，横189.5厘米

《墨梅图》

元 王冕绘
上海博物馆藏
纵68厘米，横26厘米
王冕，字元章，会稽人，是元代后期著名的画家。王冕以画梅著称于世，笔法师出宋人，但有所创造发扬。首创“以胭脂作没骨体”的技法。这幅墨梅是王冕68岁时所画，是他艺术臻入化境以后的杰作。

的是一个战乱的时代。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中国北方遭受了残酷的打击，而恰恰就在这一时期，元杂剧完成了从以前的艺术形式中脱胎换骨的过程。忽必烈试行汉法前后，部分北方城市已经迅速从金蒙之战的废墟中恢复起来，与种种国计民生相关的事业同时重兴的，还有宗教设施、饮食业和娱乐业。忽必烈受命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时，正是元杂剧迸发光芒的开端。大蒙古国在中原实施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汉军世侯们的领地是元杂剧得以萌生的庇护所。直到进入元朝，元杂剧达到了繁荣兴盛的顶点。

在宋朝时就已经出现的“勾栏”和“瓦舍”是元杂剧演出的主要场所，以至到后来，勾栏成为了元杂剧剧场的名称。演出元杂剧的场所还有农村的寺庙、酒楼茶肆，甚至直接在路边随处表演。随着元杂剧的发展，演出的舞台也渐渐变成单独而且完整的建筑物，从前期可以从三个方向观看，演变为只能在正面进行观赏。在剧场外边，演出前会贴出叫做“纸榜”和“招子”的广告，门前

有专人收费，在舞台上方挂出的横额上写着剧团和主要演员的名字。这些现在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当时都是元杂剧走向专业化的重要表现。

元代汉族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与元杂剧的兴起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在蒙古统治者实施的压抑汉人和南人的政策下，文人们失去了厕身朝廷的机会。政治上没有了前途，经济上自然就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文人被迫从事他们原本看不起的职业，其中有一部分就成为职业剧作家。这些人的文化修养提升了元杂剧的品位，直接促进了元杂剧的繁荣，反过来，兴盛的元杂剧又为更多文人成为职业作家提供了条件。这些作家被称为“才人”，在他们得到这个名称的同时，就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身份，变为社会下层的一员。“书会”是才人们自己的同业团体，在大都有著名的“玉京书会”，杭州有“武林书会”，温州有“九山书会”等。

有名字可考的元代剧作家有一百三十人左右，最著名的是关汉卿，他是元代最早的杂剧作家之一，主要活跃在大都。关汉卿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至少创作过六十三个元杂剧的剧本，不过大部分都已经佚失。他的剧本有一些至今仍然在舞台上演出，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始终不肯出仕的白朴早年主要活动在真定，后来也曾南下。白朴的创作以历史传说和爱情故事为主要题材，著有剧本十五个，流传后世的只有寄托了他兴亡感慨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爱情喜剧《墙头马上》。到了元朝中期，大都的元杂剧更加兴盛。马致远是大都元贞书会的重要人物，后半生活动在江浙一带。他的作品重视抒情，词藻华丽，对以后的杂剧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马致远的代表作是《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但他更著名

《感天动地窦娥冤》(书影)

这是元代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1297—1307)所撰写的杂剧剧本，一般简称为《窦娥冤》。剧中描写寡妇窦娥被诬陷杀人而判死刑，受刑前窦娥指天设誓，誓言在她死后全部实现。这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悲剧之一。



的是散曲的创作。善于描写爱情故事的大都人王实甫，曲辞清丽优美，他最重要的作品《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被普遍认为中国爱情文学中的奇葩。在元朝中叶以后的剧坛上，郑光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当时他已经与马致远、关汉卿、白朴一起，被合称为“元曲四大家”，最能表现他的艺术风格的是《醉思乡王粲登楼》。

被称作“路歧人”的演员也是推动元杂剧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也被叫作“散乐”、“行院”或者“乐人”，其中有些人具备很强烈的个人魅力和艺术感染力，能够紧紧地将观众吸引住。而在演员中，又以女演员更受欢迎。当时的杂剧演员多用艺名，女演员的艺名中往往带有“秀”字。本姓朱的珠帘秀是元朝前期最著名的演员，她主要活动在扬



《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
(壁画)

元

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南壁东侧发现

纵390厘米，横312厘米

这是演出杂剧时的情景。

“大行”即“太行”，指太行山一带。“散乐”是当时对杂剧演员的一种称呼。“忠都秀”是这个杂剧演出团体主要演员的艺名，当时女演员的艺名最后一字通常是“秀”字。“作场”就是表演。画面中央戴幞头、穿长袍、持笏板的角色就是忠都秀。

州，不但是位优秀的演员，而且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当时人对珠帘秀的艺术功力赞叹不已，称她“杂剧为当今独步”，晚辈们都敬仰地称她为“朱娘娘”，关汉卿等许多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都与她有交往。到了元朝中期，顺时秀成为风靡一时的明星。她本名郭顺卿，是隶属官府机构教坊司的演员。“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由此可见她的魅力。

四、八思巴字

从漠北草原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蒙古族，自身的文化比较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用刀在三四寸长的小木块上刻画，再佐以口述，以这种非常原始的方法记事和传递信息。在成吉思汗展开的统一草原的战争中，从乃蛮部俘虏了掌管金银和钱粮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这个人由于精通本民族的文字，得到了成吉思汗的重用。他奉命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和其他诸王用畏兀儿字拼写蒙语。畏兀儿字就是来源于粟特字的古回鹘字，这是一种创始于8世纪的拼音文字，有字母二十个左右，书写的时候从左至右竖写。大蒙古国建立以后，用畏兀儿字拼写蒙古语被广泛应用，大汗的各种

重要文件如诏令、书信等大多采用这种方式记录。

随着征服的疆域越来越大，蒙古帝国在行使政令的时候必须针对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汉字、波斯文、畏兀儿体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藏文、阿拉伯文、梵文……甚至还有拉丁文、叙利亚文，如此众多的文字同时被应用，政府必须雇用大量的翻译人员，这就让翻译得到了空前的地位。

忽必烈即位以后，虽然所辖有的领土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所使用的文字仍然以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并用为主。随着各项政治制度逐渐趋于完备，作为一个正统王朝的君主，忽必烈希望可以用统一的文字行使政令，通行全国。出于征服者的骄傲和自尊，当时应用比较广泛的几种文字因为来自被征服的民族，所以都不在考虑之列，他需要拥有一种蒙古人独有的全新文字。创制文字的任务交给了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宗教领袖八思巴，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曾经以藏文表音字母丰富了畏兀儿体蒙古文，并形成了一套新的字母。八思巴这位佛学大师深受忽必烈信任，学识非常渊博，他十岁时随从伯父前往凉州与阔端会面，之后的十几年里一直生活在蒙古上层社会中，可以说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在畏兀儿人文书奴等人的协助下，八思巴用了几年时间发明出一套拼音字母，基本达到了忽必烈“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的要求。1269年，忽必烈颁布诏书，将这套字母称为“蒙古新字”，明确指出以后颁降诏谕都以“蒙古新字”为主，其他各族文字为辅。第二年，又下令改称为“蒙古国字”。再过一年，政府又明令发布，“不得将蒙古字称作新字”。这一系列的举措，用意只有一

大元通宝

元

直径4.1厘米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征集
币面文字为八思巴文拼写的“大元通宝”。



个：确立这种新文字惟一的合法地位。此后，元人通常称之为“国字”或者“国书”。后人则因其创制者为八思巴，所以习惯地称其为“八思巴字”。

八思巴字在由梵文发展而来的藏文的基础上创制而成，共有四十一个字母，包括九个元音和三十二个辅音。这是一套可以用于多种语言的符号系统，尤其在拼写蒙古语的时候较之畏兀儿字更为精准。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也十分准确，可以说是汉语拼音文字的一次重大尝试。其他如藏语、梵语、畏兀儿语等也可以用八思巴字进行记录。八思巴字的字母为方体，书写时按照汉文和畏兀儿体蒙古文的方式自上而下书写，由左向右展开。

为了推行八思巴字，忽必烈在发布诏书的同时，决定在各路府州设立蒙古字学，吸收官僚子弟和民间人士入学，而且将教师的地位设置为高儒学教师一等，学生学成后考试合格即可担任学官或译史。1281年，元政府又在大都设立蒙古国子学，重点教授八思巴字蒙文。在政府机构内部，用八思巴字书写奏文和其他文件的要求也逐渐从中央的省部台院推广到各级大小衙门。

行政手段的大力推动使八思巴字得以在一定范围内被运用起来。但是要兼顾拼写多种语言的初衷，却让这种文字在表示音值和构制字体的时候存在着缺陷，而且在拼写蒙古语时，方形字体也远不如畏兀儿体蒙古文方便。所以即使是在强力推行的元代，八思巴字也主要是应用于官方文书，民间更多的还是在使用原有的文字。随着元朝的灭亡，失去了官方支持的八思巴字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在西藏，直至清代还有人使用八思巴字，但仅仅是作为装饰纹样。相比之下，畏兀儿体蒙古文的生命力要强得多。元文宗

时，国师孛思吉·斡节儿在萨迦班智达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畏兀儿体蒙古字。随着历史的发展，畏兀儿体蒙古字最终成为现代蒙古文字的基础。

五、白塔与永乐宫

对宗教的宽容和保护政策，使元朝时期的各种教派都表现得非常活跃。政府对宗教事业的投入不遗余力，各个教派也在努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元朝的疆域里，僧寺道观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各朝，出家人和信徒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背景下，元朝的宗教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修建大都的工程中，大圣寿万安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忽必烈亲自勘查确定了地址，以这座寺院来表现他对藏传佛教的崇信，也作为政权和神权的象征。这座寺院始建于1271年，最初修建的是用来供奉释迦牟尼舍利的白塔。1279年，被命名为“释迦舍利灵通宝塔”的白塔落成，忽必烈非常满意，命人从白塔向四面各射一箭，划出了一



《蒙古字百家姓》(书影)

选自《事林广记》

为了方便学习推广八思巴字，当时的人们编写了《蒙古字百家姓》等入门教材。

妙应寺白塔

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
妙应寺白塔始建于元朝至元八年(1271),竣工于1279年,随后又在塔下兴建了大圣寿万安寺。白塔是国内现存最早、最大的藏式佛塔,它的主要设计者和负责人是来自尼泊尔的阿尼哥。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寺院遭雷火焚烧,但白塔保存下来。明朝天顺元年(1457)寺院重建,改名为“妙应寺”,民间俗称“白塔寺”。

块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土地,以白塔为中心,兴建起能够容纳七万僧人的大圣寿万安寺。作为寺院中心建筑的白塔,原型是藏传佛教中的噶当塔,通高50.9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基底座面积810平方米,高9米,分三层须弥座。塔身为覆钵体,直径18.4米,在塔身与塔基的结合处雕有二十四个突起的莲瓣围成的莲座,莲座上有内迭五道环带形的金刚圈,使方形塔基自然过渡到圆形塔身。塔刹的底座是一层小须弥座,上面是下大上小十三道水平轮圈的圆锥体刹身,即所谓的十三天,也称相轮。顶层是一个直径为9.7米的厚木衬底的铜质华盖,刹顶是

一个铜鎏金空心的小型藏式佛塔。

设计建造白塔的负责人是来自尼泊尔的阿尼哥。1260年,为了纪念忽必烈登上汗位,八思巴准备在西藏建造一座黄金塔,为此他从尼泊尔招来了一批工匠,年仅十七岁的阿尼哥就是其中的一个。塔修成后,八思巴将阿尼哥收为弟子,并把他推荐给忽必烈。从此阿尼哥就以他精湛的艺术才能在元朝政府中担任负责建筑和雕塑的官职,最后获得了与丞相相同的官位。白塔寺是阿尼哥流传至今的惟一一件作品。阿尼哥最出色的弟子刘元原先是道士,投到阿尼哥门下以后,将中原传统的雕塑艺术与阿尼哥带来的“梵式”造像技术融会贯通,成为一代名家,被政府赐予二品的高位。师徒二人以工艺方面的成就达到这样高的地位,这在其他朝代是难以想象的,也可以说是元代的一个特色。

1368年六月,大圣寿万安寺突然被雷火焚毁,白塔幸存。两个月后,元顺帝从大都逃走,这座寺院与元朝几乎是同生同灭。

金元之际崛起的全真教由于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保护,在北方影响很大,到处大兴土木,建造宫观。传说山西的永乐镇是全真教的祖师之一吕洞宾的故里,所以丘处机的弟子们在这里兴建了永乐大纯阳万寿宫。

从1252年开始动工,到1368年左右重阳殿壁画最终绘制完成,永乐宫的修建前后花去了一百一十多年时间,几乎经历了从大蒙古国到元朝的全部历史。完成后的建筑占地86880平方米,在由南向北的主轴线上,排列着五座主体建筑:宫门、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后面有丘祖殿。西部有披云道院、吕祖祠、潘公祠、玉皇阁、报功祠、书院、三官殿、城隍殿等,并排横列。三清殿是主殿,最为宏大,殿前有七条并列的人造水渠。



基本保存了元代风貌的永乐宫建筑固然不可多得，而更为著名的是殿堂中总面积达873平方米的壁画，三清殿壁画的题材是道教神仙朝元的盛况，反映了道教神祇的完整体系。在东、西、北三壁及神龛的左右两侧，分别画有八位身高3米的主神。围绕主神，二百八十余位神仙重叠地排成四层。纯阳殿壁画描绘了吕洞宾一生经历的故事，由连续性的五十二幅组画组成。重阳殿壁画构图及画风与纯阳殿相近，用四十九幅连续性的画面讲述了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故事。

永乐宫壁画的创作者是一批民间的职业画家，襄陵画师朱好古和他的弟子们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技巧精湛，既保存了前代的优秀传统，又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是中国古代宗教艺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珍品。

第四节 中西交汇

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许多科技遗产直接被征服者们接收了。元朝建立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繁荣，也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蒙古国疆域内空前便利的交通，使中外交流更为紧密和深入，也给中国的科技界接触其他地区的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些基础上，元代的科技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蒙元帝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影响，又使中国的科技成就得以向西方广泛传播，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观天与测星

在蒙古人的萨满信仰里，天是至高无上的。为了探知天的意愿，获得天的保护，早

《朝元图·南极长生大帝》
(壁画)

元

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东扇面墙外侧发现

纵433厘米，横345厘米

三清殿又名无极殿，是永乐宫的主殿，始建于1262年。三清殿内四壁及扇面墙两侧绘满壁画，内容是道教诸神谒元始天尊，所以称作《朝元图》，是由洛阳民间画师马君祥等人在1325年创作的。本幅画面以高达三米的南极长生大帝像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三名玉女和玄元十子。



期蒙古统治者们对于掌握天文知识的人总是非常看重，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对待天文学，而仅仅看作占卜的手段。在大蒙古国时代，耶律楚材之所以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不是因为他的治国才能，而是由于他精通历法，能够比其他占星家更准确地测知天象变化。随着形势的变化，对于蒙古君王来说，天文学有了更广泛的用途。

在登上汗位的同一年，忽必烈就上都设立了司天台，几年后又增设了回回司天台。将首都迁到大都后，为了编修新的历法，忽必烈大力网罗人才，建立太史院。作为修历的基础，一个新的天文机构应运而生。大都司天台在1279年落成于大都的东城墙下，这里也是太史院的办公地点。当时汉地最优秀的天文人才齐聚一堂，刘秉忠的两个得意弟子数学家王恂和多才多艺的郭守敬是领军人物，前者负责历法的推算，后者负责仪器和观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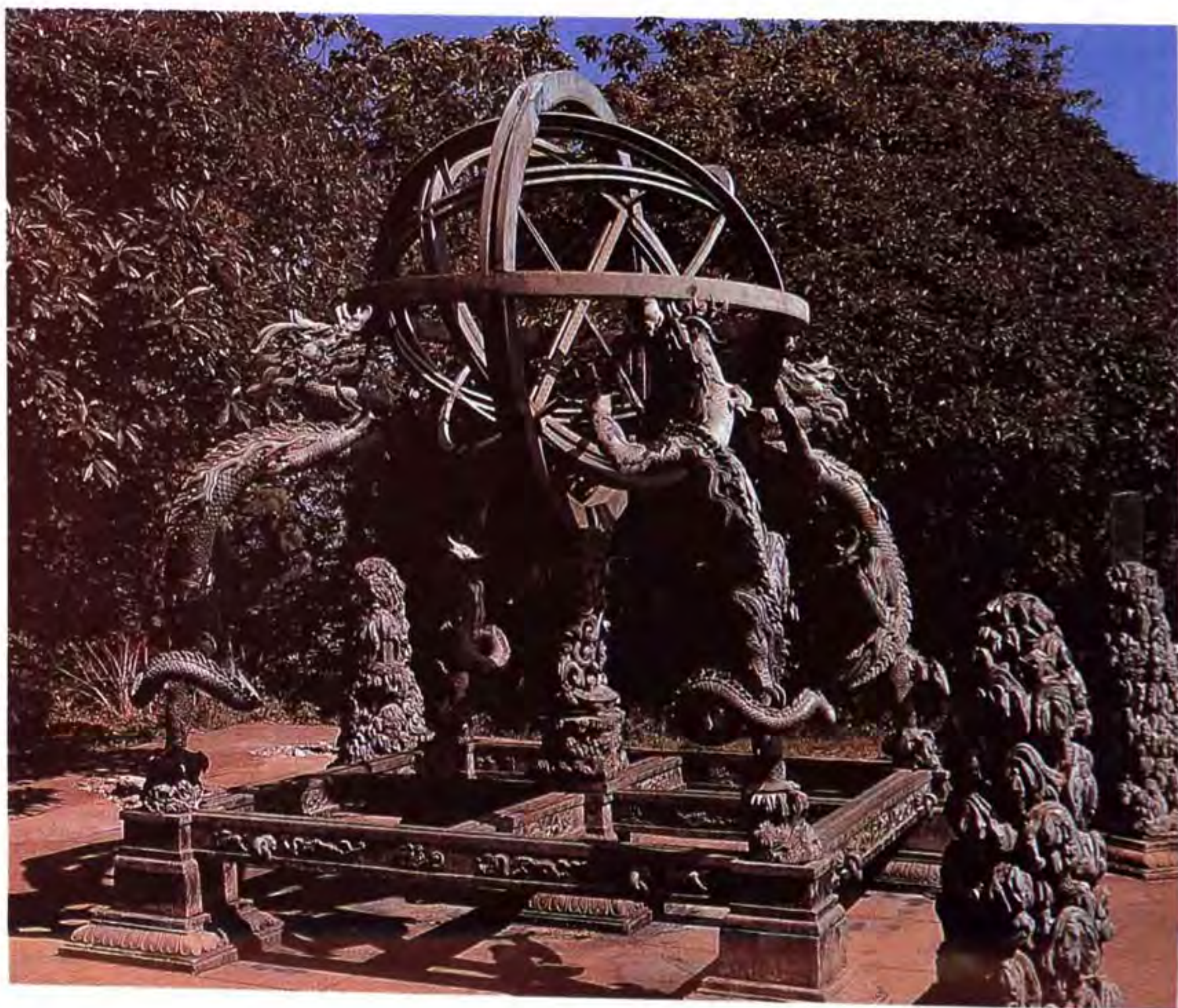
司天台的最高层是观测台，使用的都是郭守敬设计制造的仪器，其中包括：将中国传统的浑仪加以简化、改造而成的简仪，这是郭守敬发明的最重要的仪器，也是13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天文测量仪器，不但观测范围和效率都有了增加，读数精度也大大提高了，从机械装置来讲，可以说是近代滚柱轴承的发端，西方类似的发明是两个世纪之后的意大利大科学家达·芬奇做出的；另一项重要发明仰仪是一台铜制中空的半球面形仪器，可以读出太阳此时在天球上的位置，还可以观测出日、月食发生的方位，亏缺部分的多少，以及各种食相发生的时刻等数据；浑象是一台天球仪，继承了张衡所创的水运浑象传统，内有机轮系统，可以用漏壶流水来推带，使之与实际的天球作同步运转。

为了制定历法的需要，郭守敬一共创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四件可携至野外观测用的仪器。这些仪器设计科学，结构

简仪模型

明

现存江苏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浑仪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天文仪器之一，大约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被我国古代科学家发明。这是一种赤道装备，是古代科学家观测天体运动不可缺少的仪器。郭守敬最初也是使用这种仪器，后在浑仪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简化，发明制造出了简仪。



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在科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仪器在明初被运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又在清初运回北京，继续发挥着作用，然而在康熙、乾隆年间，这些伟大的仪器都被当作铜材熔化掉了。

利用这些仪器，郭守敬组织了一系列天文观测活动，在他的主持下，对二十七个地点进行日影测量以及测定北极出地高度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昼夜时刻；通过在大都历时三年半、共约二百次的测量，定出准确的冬至时刻，再推算出与现代通用历法相同的一回归年时间长度为365.2425日，与实际周期只差26秒；通过全天星表测定，测得恒星约二千五百颗；重新测定了黄道与赤道的交角，所得数据虽然不是当时中国最精密的，但也领先欧洲三个世纪……在这些实际观测的基础上，一部新的历法修成于1280年，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新历颁布不久，郭守敬的几个主要合作者相继去世，他独自主持完成了相关观测资料的整理和数据用表的编制。

在上都的回回司天台由来自西域的回回



天文学家札马鲁丁主持，他在忽必烈即位前，受旭烈兀的派遣来到中国。他为中国引进了七种天文仪器：咱秃哈刺吉，汉译为浑天仪，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与中国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相比较，在外形上大体相似，但是两者的具体构成和功用则不相同；咱秃朔八台，据分析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发明的天文仪器，西方学者称之为托勒密长尺；鲁哈麻亦渺凹只，是18世纪初的印度天文学家摩诃罗阇·贾伊·辛格所创造的，可以定节气；鲁哈麻亦木思塔

仰仪

元

位于河南登封城东南十五公里告成镇周公庙内。这是郭守敬发明制造的天文仪器之一。仰仪利用针孔成像的原理，可以观测出日、月食发生的方位，亏缺部分即食分的多少，以及各种食相发生的时刻等等数据。



观星台

建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位于河南登封城东南十五公里告成镇周公庙内。为进行科学的天文观测，郭守敬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下，在全国北纬15度—65度之间建立了27座天文台和观测站，此台是其中之一。观星台由台身与石圭、表槽组成，台高9.46米，台下边宽16米多。台顶小屋是明代增建的。由台底到台顶的凹槽是“高表”。在凹槽正北是三十六块青石平铺的石圭，俗称量天尺。石圭通长31.13米。

余,可以测定冬、夏至的准确时刻,实际上就是后来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墙仪;苦来亦撒麻,是一种天球仪,与中国传统的浑仪无大差别,只是上面绘制的应该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苦来亦阿儿子,应该是地球仪;兀速都儿刺不,是一件星盘,可以测定昼夜时刻。

1267年,札马鲁丁向忽必烈呈上了他以回回天文学为基础制定的“万年历”,但是这种历法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也没有在中国推广。郭守敬曾经借鉴过札马鲁丁带来的仪器,但是这种交流并没能深入下去,所以其对中国的天文学的影响十分有限。忽必烈将回回司天台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回回历书的工作,与大都的司天台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使元朝科学家们错失了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天文学发展的机会。

二、混一疆理

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人就表现出了对拥有广阔领土的自豪,一直以“大”作为国家的名称。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汉文的文书中自称为“大朝”,与蒙语中的大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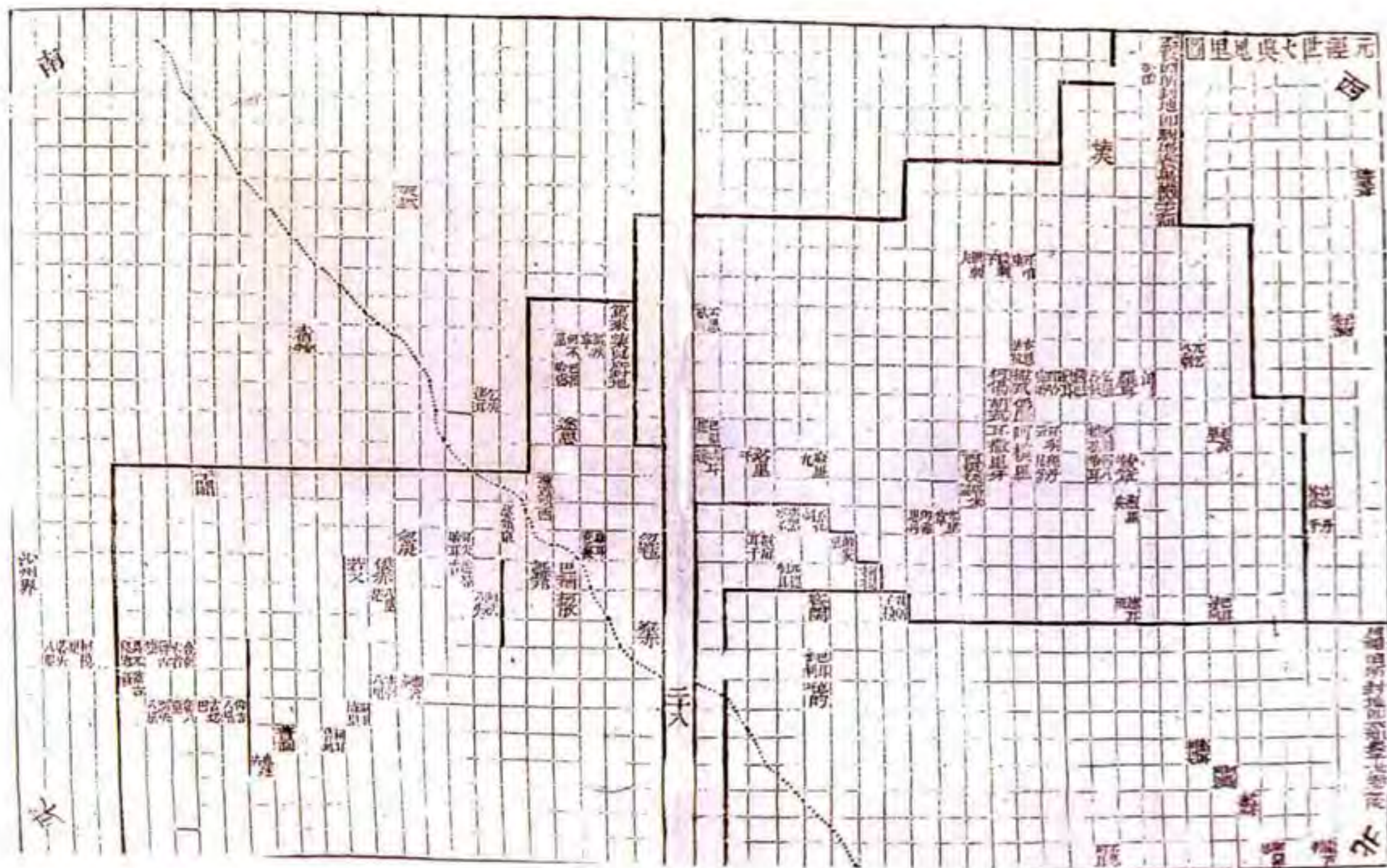
国相对应。决定按照中原正统方式建立政权后,统治者又使用了表示大到极点的“元”。大一统的实现,使元朝出现了“皇元疆理无外之大”的局面,让人们深入了解空前辽阔的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地图作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首先感受到认识地理状况迫切性的是政府。分裂和战争延续了数百年的中国,无论是行政区划,还是自然地貌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无疑对实施有效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障碍。来自波斯的札马鲁丁在1285年向忽必烈提出了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得到皇帝的批准后,他成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在1285年到1291年这段时间里,札马鲁丁和他的同事们编成了一部七百五十一卷的《大一统志》,内容主要是关于内地的省份。这部书在几年后又得到修订,补充了边远地区的内容,并绘制了一些图册,最终于1303年形成了一千三百卷的《大元大一统志》,简称《元一统志》。在《元一统志》的每卷卷首都附有相关地区的彩色地图,在此基础上又绘制了表现全国地理形势的彩色大地图,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各个行省的位置和

经世大典地理图

元
纸质
纵20.1厘米,横32.2厘米
此图原来收录在元至顺二年(1331)虞集等编著的《经世大典》中,后该书佚失。清人魏源从《永乐大典》中将此图录出,收入自己的著作《海国图志》中。此图的绘制方法明显与中国传统方法不同,可能受到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影响。



地形的差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彩色全国地图，可惜与《元一统志》一样散佚了。

龙虎山张天师的门下朱思本出身于一个很有南宋遗民色彩的家庭，这种背景使他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并放弃了像他的许多同门一样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而专注于地图的绘制。他以玄教宗师张留孙助手的身分在1299年离开龙虎山前往大都，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游历和考察。在1311年之后的十年里，他经常奉命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朝中重臣也因为他的才能而托付他留意各地的情况，绘制地图。在实地考察的同时，朱思本参考了大量地理学著作和各地政府部门收藏的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甚至还有包括藏文在内的少数民族文献。

源自魏晋时代的“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被朱思本重新应用，他在地图中画上间距相等的纵线和横线，构成一个个正方形的格子，通过这些格子对实际地形作等比例的缩放，格子的每一边相当于真实距离五十里，这样画出的图非常精准可靠。先绘制出来的是各个地方的小图，然后朱思本将这些图汇总成为一张大图。在十年的努力之后，1320年，一幅长宽各七尺的全国大地图问世了，朱思本命名这幅图为《舆地图》。直到百年之后，《舆地图》仍然是中国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

空前便利的交通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阿拉伯地理学的许多内容随着东来的回回人传入了中国。札马鲁丁曾经把大量的阿拉伯地图带进了元朝政府，他在奏章中对忽必烈说：“如今从日出到日落的地方都是咱们的。中原地方有地图，但是远处的怎么办？我有回回地图，把它们和中国的集在一起，做成一张总图，好不好？”于是不但地图，包括阿拉伯绘图法也被引进了



中国。这种绘图法已经以地球概念为背景，与朱思本使用的“计里画方”大不相同。札马鲁丁带来的仪器中还包括地球仪，在这个木制圆球上用白色表示陆地，绿色表示江河、湖、海，并有经纬线组成的网格。

受到了阿拉伯地理学影响的还有元朝的另外两幅全国地图。李泽民在1330年左右绘制了《声教广被图》，这幅地图涵盖的范围包括欧洲、阿拉伯半岛和非洲，非洲的轮廓已经非常完整，好望角的形状也很明确。天台山的僧人清睿绘制的《混一疆理图》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两幅地图虽然未能流传，但是它们直接影响了明朝初年的地图绘制。1389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局部)

朝鲜·太宗二年(1402)

汉城大学奎章阁藏

1399年，朝鲜贺使金士衡将元代李泽民绘制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清睿绘制的《混一疆理图》的副本带回国。1402年，由金士衡和李茂进行研究，李荃进一步详校后将两图合为一图，又经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的地理形势，完成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从这幅图可以看出元代时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和地图绘制的水平，以及当时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

年明朝政府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和1402年朝鲜李朝使臣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与之大同小异，连在非洲中部画了一个大湖的错误都相同，可见两者的渊源关系，而后者的题记中明确表示是根据《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重新绘制的。

三、军中利器——火炮

11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一直处在分裂之中。辽、宋、西夏、金、元之间长期的对峙和战争，使中国的军事科技得到迅猛的发展。这一时期，火器在战场上被大规模使用，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初投入战争的火器主要包括燃烧性的和爆炸性的两种，多数都是依托于投石机抛投或者弓弩射击，也有直接用人力施放的。“火炮”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其含义主要指外壳为铁、陶等质地的爆炸性武器。到了北宋末年，在宋金战场上使用的“火炮”无论是数量还是威力都比较惊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转变发生在1259年，南宋的寿春府制造出了最早的管状射击火器“突火枪”。这种武器以巨竹为枪筒，利用火药燃烧爆炸产生的动

力发射弹丸，可以说是后世枪炮的鼻祖，标志着中国的军事科技达到了新的高峰。但即使有如此先进的武器，南宋仍然无法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反倒是它的敌人将这项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广泛传播。

经过改进的管状金属射击武器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种口径较大，发射炮石，使用时必须借助支架，通常称之为炮，是以后各种火炮的前身；另一种口径较小，可以单人操作，一般叫做铳，与枪类兵器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不过在当时，炮和铳这两个名称经常被混用，并没有特别严格的区分。

现存有纪年可考的火炮生产最早开始于至顺三年，即1332年。虽然1935年被人重新发现时，这尊火炮的用途是充当寺院中的香炉，但在六百年前，它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这尊火炮器身上的铭文说明这是同一批产品中的第300号，可见当时生产和应用的规模。从至顺三年火炮与现存其他火炮可以看出，元代的火炮用铜铸造而成，包括炮膛、药室和尾部三部分，炮口呈碗口状，比炮膛大出很多。使用时，火炮被安装在木架上，用铁栓将炮尾与木架相连接，通过在炮

至顺三年铜炮

元

1935年河北房山（今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发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长35.3厘米，炮口直径10.5厘米，炮尾直径7.7厘米，重6.94千克

这是现存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火炮。在炮身外壁纵向阴刻铭文“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 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 马山”。



身下加垫木楔调整发射角度。当时的人们通过填放火药的数量来控制射击的距离，所以装入炮身的火药往往不仅填充药室，甚至装满炮膛。炮弹是圆形石头，放置在碗形炮口上，借助火药燃烧后膨胀的气体发射。

铳的整体结构与炮相似，但是口径小得多，管身也比较长，重量当然也轻很多。与主要用于守御关口或是攻城破坚的火炮相比，铳的射击距离比较远，穿透能力更强，适用于野战中的冲锋陷阵。铳的尾部可以安装木柄，适于手持，而且在近战无法进行射击时，也能当作冷兵器使用。还有一种铳的变种，口径和重量都略大于普通的铳，在药室的上面铸有铜把手，便于手提，可以单人使用，也可双人操作。

元代的火药配制也有所发展，因而可以提供给炮和铳更大的威力。根据考古发现，元代火炮使用的火药与宋代相比，已经去除了各种杂质，可燃物比例增加，大致的配方

是硝石占60%，硫磺占20%，木炭占20%。这种火药燃烧能力加强，可以产生更多的气体，爆炸力也随之增大。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关于这种火药的威力，可以从1280年扬州炮库的一次爆炸看出。在这次灾难中，爆炸声如同山崩海啸，远在百里外的房屋都受到震动，守卫的上百名士兵被炸得无影无踪，平地炸出了深达丈余的大坑，周围的居民二百余家也遭到了横祸。

在1235年的第一次西征中，蒙古军已经使用了多种火药武器。第二次西征的蒙古军攻击匈牙利时，使用了瓶形火炮。但是就此断言火药武器是这样传入了欧洲似乎还言之过早，没有材料能够直接证明这一点。首先从西征过程中获取了这项知识的是阿拉伯人，他们在与蒙古军的长期对抗中掌握了火药武器，又在14世纪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将技术传进了欧洲。在那里，火药和火药武器发挥了比在中国更大的作用。

参考书目

-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第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
-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
-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
-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邓广铭：《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79年。
- 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
-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1988年7月初版。
-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
-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
- 朱瑞熙、王曾瑜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 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 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
-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
-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
- 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
- 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
-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 景爱：《金上京》，三联书店，1991年。
- 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
- 吴天序：《西夏史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
- 白滨：《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 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 王天顺主编：《西夏学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
- 周清澍：《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
- 萧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 萧启庆：《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 萧启庆：《元朝史新论》，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 陈学霖：《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
- 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 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 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 A J.H.Charignon 注，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申友良：《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 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 陈庆英：《元代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
- 黄卉：《元代戏曲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李修生：《元杂剧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丘刚主编：《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 朱天舒：《辽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98年。
- 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
- 马文宽编：《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 上海市钱币学会编：《钱钞辨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 刘森：《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 管成学：《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 王冠倬编著：《中国古船图谱》，三联书店，2000年。
- 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 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
-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钟少异主编：《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陈桥驿系马槐	3
陈桥驿遗址	3
宋太祖像	4
赵普像	5
《宋太祖蹴鞠图》	6
《宝篋印经》	7
嵩德宫铜铍	8
三彩印牡丹纹方碟	9
绿釉凤首瓶	9
黄釉长颈瓶	10
大康通宝	10
道宗哀册	11
西夏文刻石残片	11
绿釉兽面瓦当残片	12
褐釉剔刻花瓷扁壶	13
乾祐元宝	14
宋太宗像	15
“神卫左第四军第二指挥第五都记”铜印	16
寇准像	16
定州料敌塔	17
镶铜口白瓷盘	17
腰牌	18
“鄜延第四将带器械”铜牌	19
铜铁钱	20
古格王统世系图（壁画，局部）	23
崇圣寺三塔	24
宋陵武将像	27
“拱圣下千都虞候朱记”铜印	27
花卉纹银六角杯盘	28

泰山天贶殿	29
《泰山神启跸回銮图》	30
宋真宗像	30
《大驾卤簿图》（局部）	33
开宝寺塔	34
范仲淹像	35
嘉祐铜则	36
王安石像	37
宋神宗像	38
司马光像	40
融水元祐党籍碑	41
宋陵文官像	43
《大驾卤簿图》（局部，武将）	44
鎏金腰带	45
《大驾卤簿图》（局部，文官）	45
《戒石铭》（拓片）	46
《文臣七条》（拓片）	47
包拯像	48
包孝肃公墓园	49
《中秋诗》	50
列鞞	53
《听琴图》中的宋徽宗	54
蹴鞠纹铜镜	54
李纲像	55
李纲铜	56
记述靖康之难的福建鼓山石刻	57
河东义军书信	59
《中兴四将图》	60
宋高宗像	62

杭州岳庙中的岳飞塑像	65	哥窑鱼耳炉	100
岳飞墓	66	钧窑玫瑰紫海棠式花盆	100
南宋与金划界图	67	钧窑玫瑰紫大花盆	101
南宋铜钱	68	耀州窑刻花莱菔尊	101
韩州刺史铜印	70	龙泉窑凸花葫芦瓶	102
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铜印	70	影青瓷带温碗酒注	103
正隆元宝	71	吉州窑玳瑁釉碗	104
金界壕边堡	72	三彩釉印花游鱼海棠式长盘	104
白釉刻花鱼纹瓷钵	75	黑釉瓷瓶	105
钓鱼城遗址	76	朱克柔缂丝山茶	106
宋少帝陵	78	褐黄色罗镶印金彩绘花边广袖女袍	107
鎏金龙凤纹银鞍桥	81	烟色地双鸾朵梅织金绸绵南护胸	108
辽墓壁画	81	济南刘家针铺广告铜版	109
驭者引马图	82	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	110
褐釉马铎壶	82	吉州李道工夫葵花镜	110
《四季山水图》(局部)	83	柳毅传书铜镜	111
妇女结发砖雕(局部)	84	双鱼纹大铜镜	112
吹笛、击节板陶俑	84	菱花形漆奁	113
妇女涤器砖雕	85	剔犀梳妆盒	114
妇女剖鱼雕砖	86	“李四郎”乳钉狮纹鎏金银盏	115
银丝网络	87	五瓣花口金杯	116
金面具	87	“张四郎”花卉纹银碟	116
童戏图	88	玲珑银塔	117
《耕织图 二耘》	89	鎏金鹿纹银鸡冠壶	118
《耕织图 收刈》	90	金翅鸟	119
宋代谷物移植图	91	百一砚	120
铁犁镜	93	北宋东京城图	122
铁犁铧	93	北宋东京城砖	123
王桢《农书》中的秧马图	94	《清明上河图》(局部)	125
王桢《农书》中的梯田图	95	《清明上河图》(局部)	126
《耕获图》	96	《金明池争标图》	129
官窑贯耳瓶	98	《咸淳临安志·京城图》	130
定窑划花萱草葵瓣口碗	98	《咸淳临安志 西湖图》	131
汝窑洗	99	《货郎图》	132
官窑粉青弦纹三足炉	99	铜钞版(拓片)	133

行在会子库铜钞版	134	《通鉴纪事本末》南宋湖州刻本书影	170
辽上京遗址航拍(照片)	136	《文献通考》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本	
金中都水关遗址	138	书影	171
鸥吻	139	《宝庆四明志》卷首地图	173
汴河客船模型	141	《咸淳临安志》书影	174
《武经总要·游艇》	142	《考古图》书影	176
西夏敕牌	143	白鹿洞书院	177
泉州南宋海船模型	144	岳麓书院	178
海船纹铜镜	145	《二程先生全书》书影	180
青瓷残片	146	朱熹像	181
广东南海1号沉船上的宋代瓷器	146	《白石道人歌曲》书影	182
宋代海外贸易交通示意图	147	苏轼像	182
苏州天文图碑(拓片)	149	明刊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书影	183
河北宣化辽墓星图	150	北宋“丁都赛”杂剧雕砖	184
水运仪象台结构图	151	砖戏台	185
禹迹图(拓片)	152	参军戏绢画《眼药酸》	185
《平江图》(拓片)	153	傀儡戏纹铜镜	186
《景定建康志 府城图》	154	《踏歌图》	187
元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书影	155	《溪山清远图》	188
针灸铜人	156	《千里江山图》(局部)	189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	157	《大观帖》	190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158	《新年展庆帖》	191
《营造法式》书影	159	《自书诗卷》	191
蒺藜陶弹	160	《苕溪诗卷》	192
缕悬法指南针(模型)	161	《明瓚诗后题卷》(局部)	193
地磁偏角示意图	161	成吉思汗像	195
水浮法指南针(模型)	162	双龙戏珠马鞍	196
《赵城金藏》	163	成吉思皇帝圣旨银牌	197
刻本《史记集解》	163	成吉思汗陵	197
平阳刻《四美图》	164	蒙古军攻城图	198
泥活字版(模型)	164	蒙古骑兵押送战俘图	199
西夏木活字版《吉祥遍至□和本续》	165	窝阔台像	200
明嘉靖刻本《太平广记》书影	166	《觐见蒙古大汗图》	201
司马光像	168	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	202
《资治通鉴》手稿	169	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	203

耶律楚材像	204	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瓶	237
忽必烈像	205	青白釉划花玉壶春瓶	238
许衡像	205	钧窑镂空座瓶	239
刘秉忠像	206	《经世大典·站赤》(书影)	240
《大元混一图》	206	八思巴字乘驿圆牌	241
察合台汗国银币	207	《元寇袭来绘词》(局部)	242
蒙古骑兵作战图	208	《真腊风土记》(书影)	243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209	马可·波罗像	243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210	元代中外交通路线图	244
大理城门	211	出使伊利汗国石刻(拓片)	245
《元典章》中关于“四等人制”的记载	212	磁州窑白釉黑花婴戏图瓷罐	246
《卖鱼图》壁画	213	龙泉窑瓷碗	247
答己太后像	214	八思巴像	249
元武宗像	215	金刚手菩萨	250
管军万户府印	216	维寿和尚墓碑碑额	251
龙凤通宝	217	贴罗绣僧帽	251
天佑通宝	218	《王重阳故事·南时作居》壁画	252
哈刺和林遗址	221	成吉思汗圣旨碑	253
石座狮	222	青玉敕召万神符牌	254
元上都遗址航拍图	223	波斯文碑	255
上都宫殿建筑遗址	224	清净寺	256
汉白玉螭首	224	景教铜牌	257
元大都图	225	也里可温瓷墓碑	258
双凤麒麟石雕	226	元成宗像	259
《卢沟运筏图》	227	察必皇后像	259
元中都宫城城墙东北角楼遗址	228	《对坐图》(壁画)	260
莲花灯	229	《元世祖出猎图》	261
至元宝钞	230	《击球图》(壁画)	262
至大通宝、至正通宝	231	《马球图》(壁画)	262
中统元宝交钞	231	《蹴鞠图》书影	263
《农书》书影	232	葡萄酒瓶	263
《农书·木绵轩床》	233	鍐花高足金杯	264
汇通祠	234	罗地刺绣夹衫及局部	265
青花蕉叶纹瓷觚	235	景德镇窑青花莲池鸳鸯纹碗	266
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罐	236	《致景亮书册》	267

《王安石杂诗卷》	267	《蒙古字百家姓》(书影)	275
《陈氏方寸楼记》	268	妙应寺白塔	276
《溪山雨意图》	269	《朝元图 南极长生大帝》(壁画)	277
《棘竹幽禽图》	270	简仪模型	278
《饮饲图》	271	仰仪	279
《墨梅图》	271	观星台	279
《感天动地窦娥冤》(书影)	272	经世大典地理图	280
《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	273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局部)	281
大元通宝	274	至顺三年铜炮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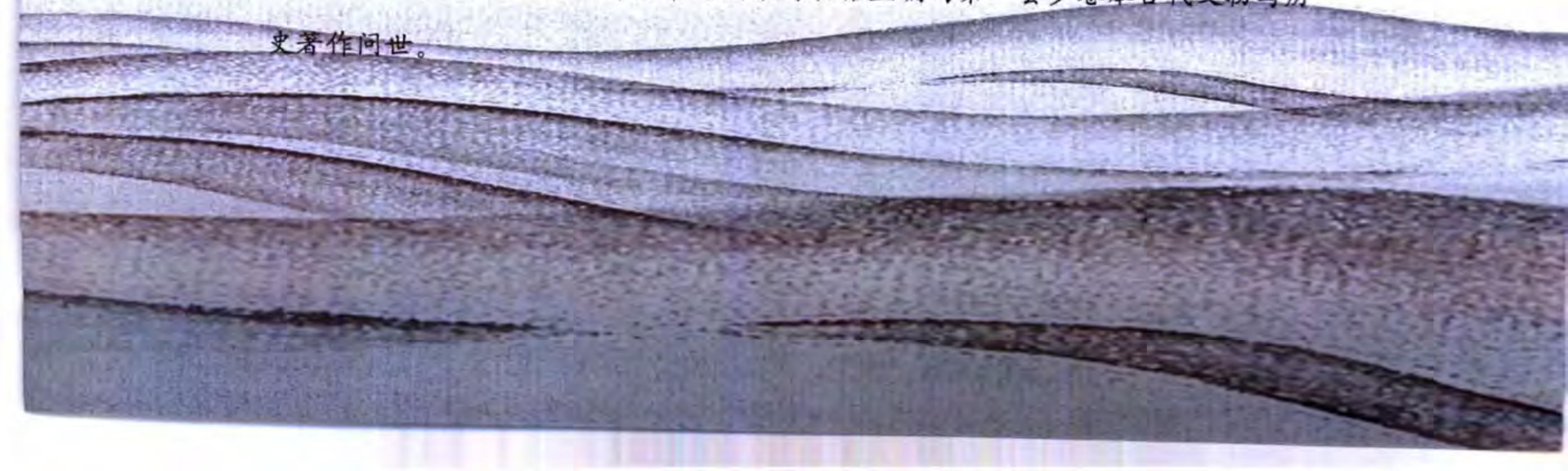
后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瑗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



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

